巴金译文全集

第四卷

往事与随想

家庭的戏剧

巴金译文全集

第四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七年·北京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金译文全集　第四卷/巴金译.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6

ISBN　7-02-002342-8

Ⅰ.巴…　Ⅱ.巴…　Ⅲ.①文学-作品综合集-世界②巴金-翻译-全集Ⅳ.I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05635 号

巴金译文全集

第四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　23.125 印张　445 千字

1997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定价 41.50 元



赫尔岑

目　录

往事与随想

家庭的戏剧

往事与随想

〔俄〕赫尔岑 著

《往事与随想》，一九七九年十月上海译文出版社初版；其中的第三卷是这次补入的。

献给尼·普·奥加略夫[①]

在这部书里面讲得最多的是两个人的事情。一个已经逝世,[②] ——你还健在,所以,朋友,它当然属于你。

伊斯康大[③]

一八六〇年七月一日

于博恩默思[④],鹰巢。

---

① 尼可拉·普拉东诺维奇·奥加略夫(1813—1877):俄国诗人,作者的好友。

② 指娜塔里雅·亚历山德罗芙娜·扎哈利娜(1817—1852):作者的妻子,原来是他的堂妹。

③ 作者的笔名,阿拉伯语中称“亚历山大”(作者的本名)为伊斯康大。

④ 博恩默思:在英国英格兰南部,面临英吉利海峡,气候优良,是夏季避暑、冬季避寒的胜地。

序

许多朋友劝我出版《往事与随想》的全本，这并不困难，至少头两卷是这样。但是他们说，在《北极星》[①] 上面发表的片段是零碎的，它们不统一，偶然地断断续续，时而提前叙说，时而移后描述。我觉得的确是如此，不过我无法改正。作一点增补，把各个篇章按年代顺序编纂起来，并不是难事；然而 d'un jet〔法语：马上，一下子〕要把全书回炉重写，我不想这样做。

《往事与随想》并不是连贯地写成的；某些篇章之间相隔好几年。因此书中处处都留下写作时期的时代色彩和各种情绪的痕迹，——我不想抹掉它。

这与其说是笔记，不如说是自白，围绕着它，和它有关的都是从往事里抓出来的片段回忆，在随想里留下来的思绪点滴。然而把这些外屋、顶楼、厢房合并在一起，它也是统一的，[②] 至少我是这样看法。

这些笔记并不是初次的试作。我在二十五岁左右，就动

---

① 《北极星》：一八五五年到一八六二年和一八六九年作者（同尼·奥加略夫合作）在伦敦出版和在俄国国内秘密传播的定期刊物。

② 这就是说：把不同时期写成的篇章编在一起，就好像把东一间、西一间先后搭起来的屋子合并在一起那样，它们也是连贯的，统一的。

手写过类似回忆录的东西。事情是这样的:我从维亚特卡[①]给转移到弗拉基米尔[②],感到十分寂寞。在靠近莫斯科的地方待下来使我感到苦恼,感到屈辱;我落到了这样一种境地:就像坐在最后一个驿站里得不到马的人那样。

事实上这差不多是“行将结束的青年时代的最纯洁、最严肃的时期”。[③] 那个时候我虽然寂寞,却心里开朗而幸福,好像小孩们在节日或者生日的前夕感到寂寞一样。每天都有写着小字的书信[④] 到来;我为它们感到骄傲,感到幸福,它们帮助我成长。然而别离折磨我,我不知道该做什么来更快地度过这无限长的时光——充其量不过四个月[⑤] ……我听从了对我的劝告,开始在空闲时候写下我关于克鲁季次的回忆,关于维亚特卡的回忆。我写满了三本笔记本……这以后,过去的事便淹没在现实的世界里了。

一八四〇年别林斯基读了它们,他喜欢它们,他把两本笔记本刊登在《祖国纪事》[⑥] 上(第一本和第三本);其余的一本

---

① 维亚特卡:俄国城市,现在改称基洛夫,作者曾流放在那里。

② 弗拉基米尔:俄国城市,距莫斯科一百多公里,作者曾流放在那里。

③ 见《监狱与流放》。

④ 小字的书信:指作者的未婚妻娜·亚·扎哈利娜的信。

⑤ 指一八三八年一月二日(作者到弗拉基米尔的日期)到五月初。五月九日作者同扎哈利娜在弗拉基米尔结婚。

⑥ 《祖国纪事》:学术、文学和政治性的刊物,一八三九年在彼得堡创刊,当时文学界一些优秀代表人物(包括刊物的思想领导者维·别林斯基在内)都在上面发表文章,《一个年轻人的笔记》发表在《祖国纪事》一八四〇年第十二期和一八四一年第八期上。

倘使没有给当作引火材料烧掉的话，现在一定弃置在我们莫斯科住宅里的什么地方。

十五年过去了，[1]“我住在伦敦樱草山附近一个偏僻地方，遥远、浓雾和我自己的心愿把我同全世界隔绝。

“在伦敦我没有一个亲近的人。有一些人，我尊敬他们，他们也尊敬我，可是没有一个亲近的人。一切来来去去的人，同我交往的人都在从事一种共同的利益、全人类的事业，至少是全民族的事业；我和他们的交谊可以说是没有私人感情的。——岁月过去了，没有谈过一句我想谈的话。

“……然而那个时候我刚刚在一连串可怕的事件、不幸和错误[2]之后开始清醒，恢复元气。我最近几年的生活事迹越来越清楚地浮现在我的眼前，我怀着恐怖地发现除我以外没有一个人知道它，真相会随着我的死亡而消灭。

“我决心写下来；可是一个回忆唤起了几百个别的回忆；一切旧的、半遗忘了的都复活了：少年时期的梦想，年轻人的希望，青年时期的大胆，监狱与流放——这些并不曾在心灵中留下半点痛苦的早年的不幸，像春雷一样一下子过去了，这一声霹雳使年轻的生命焕发青春而且更加坚强了。”[3]

这一次我写作不是为了赢得时间——我用不着匆忙。

---

[1] 一八五四年五月写的《监狱与流放》的引言。——作者原注

[2] 不幸和错误：作者在这里指他在一八四八年法国革命失败以后的经历和他的家庭所遭到的一连串极大的不幸，其中包括一八五一年秋他的母亲和幼子乘船遇难以及一八五二年五月二日他的妻子病故的事。

[3] 以上四段见《监狱与流放》。

我开始写这部新作品的时候，完全不记得《一个年轻人的笔记》的存在了，有一天我在 British Museum〔英语：大英博物馆〕里翻阅俄国杂志，偶然看见了它们。我找人把它们抄下来，并且重读了一遍。它们激发起来的感情是奇怪的：我非常明显地看到在这十五年中间我竟然这么衰老了，这使我开始大为震惊。那个时候我还是以人生和幸福为儿戏，好像幸福就没有止境似的。《一个年轻人的笔记》的调子差异太大了，因此我不能从那里取用任何东西；它们属于青年时期，它们应当保存本来面目。它们的早晨的亮光不适宜于我的黄昏的工作。它们里面有许多真实，但也有许多玩世不恭；此外它们那里还留着海涅[①] 的明显的痕迹，我在维亚特卡曾经入迷地阅读海涅的作品。在《往事与随想》里面看得见生活的痕迹，此外就不会看到任何其他的痕迹。

我的写作进行得很慢……要使某一种往事经过沉淀变成明晰的思想——尽管它不能给人安慰，它是忧郁的，却为理智所谅解——这需要花许多时间。倘使做不到这一点，纵然会有真诚，却不可能有真实！

几次的尝试都没有成功，——我便把它们抛弃了。后来在今年夏天我向一个青年时期的朋友[②] 重读我最后的稿本，这个时候我才自己认出了熟悉的面目，我便停下来……我的

① 亨利希·海涅(1797—1856)：德国诗人。

② 指尼·米·沙青(1814—1873)：俄国诗人、翻译家，作者的大学同学，赫尔岑-奥加略夫小组的成员。沙青一八六〇年出国，在伦敦见到作者。

作品完成了！

很可能我对它的评价过高，很可能这些刚刚显露出来的轮廓里只是为我一个人埋藏了许多东西；可能我读的时候理会到的比我写在纸上的多得多；这里叙述的事情唤起了我的一幕幕的梦景，它好像是难认的字，只有我才有开启它的钥匙。可能只有我一个人听见精灵怎样在字里行间跳动……可能是这样，但这部书并不因此就对我减少价值。对我来说，它多年来一直代替了人们和我失去的东西。如今到了我和它也得告别的时候了。

凡是属于个人的东西都会很快地消失，对于这种消逝只好顺从。这不是绝望，不是衰老，不是凄凉，也不是淡漠；这是白发的青春，恢复健康的一种形态，或者更恰当地说，就是恢复健康的过程。人只能用这个方法忍受某些创伤。

一个修道士，不管他的年纪多大，在他身上总是老年同青年合在一起。他用埋葬属于个人的一切这个办法恢复了青春。他从而感到了轻松，心胸开阔……有时过分开阔……的确，在毫无个性的共性、众多的历史事件和像浮云一样地漂浮在它们之上的未来的形象中间，人有时感到空虚、孤独。但这又怎样呢？人们想保存一切：要蔷薇，也要雪；他们希望在一串串熟了的葡萄旁边开放着五月的鲜花！修道士在苦闷的时刻靠着祈祷得到解脱。我们并不祈祷，我们从事写作，写作就是我们的祷告。也许，二者的结果是一样的，不过现在我们谈论的不是这个。

不错，在生活里有爱好重复的韵律、爱好反复的曲调的；

谁不知道老年多么近似童年？仔细看看，就不难发现在生命全盛时期的两头，连同它那用鲜花编成的花冠和用荆棘做成的荆棘冠[1]，连同它的摇篮和棺材，类似的时代常常重复，而主要点又是如此相像。青年时期还不曾有过的事物，它已经丧失了；青年时期毫无个人考虑所幻想的事物，也同样没有个人考虑地从乌云和霞辉里现出来更加光辉，更加宁静。

……当我想到我们两人[2] 现在快到五十岁，站在俄国自由语言的第一架印刷机[3] 前面，我觉得我们在麻雀山上少年时期的格留特里[4] 不是在三十三年前，而是至多——三年！

生活……许许多多生命、不同国家的人民、革命、极其亲爱的人们都在麻雀山和樱草山之间出现、变换、消失了；它们的痕迹几乎已经给事件的无情的旋风扫掉了。四周的一切全改变了：太晤士河代替了莫斯科河在流动，身旁都是外国人……我们再也没有返回祖国的路了……只有两个孩子(一个

---

① 荆棘冠："当下彼拉多将耶稣鞭打了。兵丁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这是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之前所受的戏弄。(见《新约全书·约翰福音》第十九章第一节，圣书公会官话译本。)

② 指尼·奥加略夫和作者。

③ 一八五三年作者在伦敦创办了"自由俄语印刷所"。

④ 格留特里：根据传说瑞士的乌里、施维次和翁特尔瓦尔登三州的代表于一三〇七年在乌里州的格留特里草原上宣誓结盟，争取祖国的自由，奠定了成立瑞士独立国家的基础。作者拿这个传说中的宣誓结盟来和他同奥加略夫在莫斯科麻雀山上的宣誓结盟相比。麻雀山现已改名列宁山，在莫斯科市内，位于莫斯科河高耸的右岸。关于作者同奥加略夫宣誓结盟的事情，可参看本书第一卷第四章。

十三岁，另一个十四岁）[1] 的梦想完整地保存了下来。

让《往事与随想》算清个人生活的帐，而且作为个人生活的总目吧。剩下来的思想就用到事业上去；余下来的力量就投到斗争中去。

我们的同盟仍然如此……
我们又一次走上忧郁的路，
不倦地宣扬真理啊，——
由它去吧，让梦想和人们在我们身旁过去！[2]

---

① 指尼·奥加略夫（当时十三岁）和作者（当时十四岁）。

② 见奥加略夫的诗《给伊斯康大》，这是那首诗的最后几行，其中头一行漏掉一个词："傲慢的"。

第　一　卷

育儿室和大学(1812—1834)

往昔的回忆使我们激动
我们重新踏上旧日的路，
一切过去日子的感情
又逐渐活在我们的心里；
使我们再次心紧的是
曾经熟习的震颤；
为了回忆中的忧伤
真想吐出一声长叹。

尼·奥加略夫(《幽默》)①

---

① 《幽默》：尼·奥加略夫的一首长诗，这里引的诗句见原诗第二篇。

第一章

我的保姆和 La grande armée[1] ——莫斯科大火——我的父亲见拿破仑——伊洛瓦依斯基将军——同法国战俘一起旅行——爱国主义——卡·卡洛——共同管理产业——分产——枢密官

“韦拉·阿尔塔莫诺夫娜，喂，再给我讲一回法国人到莫斯科的事情吧。”我老是这样说，一边在小床上伸着懒腰，用绗过的被子裹住身子，我的小床四周都缝上了布，免得我摔出来。

“咳！这有什么可讲的呢，您已经听过那么多回了，况且现在是睡觉的时候了；您还是明天早点儿起来好。”老妈妈照例这样回答，其实她很愿意再讲她所喜爱的故事，就像我很愿意再听那样。

“您就讲一点儿吧，您怎么知道的呀，它怎么开头的呀？”

“就是这么开头的。您知道您的爸爸是怎样的人——他总是拖拖拉拉的；他收拾行李，收拾行李，总算收拾好了！人人都说：‘该动身了，还等什么呢？城里头人差不多走光了。’

---

① La grande armée：法语，伟大的军队，指拿破仑一世的军队。

可是不,他跟巴威尔·伊凡诺维奇[①]商量来商量去:大家一块儿怎么走,起初是这一位没有准备好,然后又是那一位没有准备好。后来我们都收拾好了,马车也准备好了;老爷们坐下来吃早饭,突然我们的厨师脸色十分惨白,跑进饭厅里来报告:'敌人进了德拉果米洛夫门了。'我们大家心都紧了,叫了一声:'啊,上帝保佑吧!'全都惊慌起来;我们正在忙乱、唉声叹气的时候,看见街上跑过一队龙骑兵来,他们戴着这样一种头盔,脑袋后面还拖着一条马尾巴。城门全关上了,您那位爸爸这下可交了'好运'了,还有您同他一块儿;您的奶妈达利雅那个时候正抱着您喂奶,——您是那么娇嫩、柔弱。"

我骄傲地笑了笑,我高兴自己也参加了战争。

"起初,就是说头几天,我们还可以勉勉强强地过下去,只有两三个兵进来,用手比划着要点儿酒喝;我们照规矩给他们每人一杯,他们就走了,还举手敬个礼。可是您知道后来起了火,火越来越大,这个时候就出现了混乱、抢劫和各种各样的灾难。我们当时住在公爵夫人[②]家的厢房里,房子烧起来了;巴威尔·伊凡诺维奇说:'到我家里去吧,我的房子是砖造的,在院子的深处,墙又结实。'我们就去了,主人、仆人一块儿,这时候就不分彼此了;我们走进特威尔大道,连两边的树

① 戈洛赫瓦斯托夫,我父亲的小的姐姐的丈夫。——作者原注〔按照俄国习惯,把别人的名字和父名(或译"父称"是由父亲名字派生出来的)连在一起叫,算是客气的称呼,单称姓就不客气了。〕

② 公爵夫人:指安娜·包利索夫娜·美谢尔斯卡雅(1738—1827),作者父亲的姨母。

也烧起来了。我们终于走到戈洛赫瓦斯托夫的宅子，它正在燃烧，每个窗口都冒出火来。巴威尔·伊凡诺维奇吓呆了，他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您知道，房子后面有一座大花园，我们就到那儿去，以为那儿安全。我们垂头丧气地坐在长凳上，突然出现了一群喝醉了的兵。一个兵扑到巴威尔·伊凡诺维奇的身上，要脱掉他那件旅行皮袍；老头子不给，兵就拔出短剑砍他的脸，他脸上那块伤疤一直保留到他在世的最后一天；其他的兵就来对付我们，有一个兵把您从奶妈的怀里抢走，解开您的包布，想在里面找到什么钞票或者钻石；这个强盗看见什么都没有，就故意把包布撕碎，扔了。他们刚刚走开，我们又闯了大祸。您还记得我们那个给送去当兵的普拉东吗？他很爱喝酒，这天他喝得醉醺醺的，腰间挂上一把军刀，就这样到处逛荡。罗斯托普钦伯爵[①] 在敌人进城的前一天，把军械库里的各种武器全拿出来分发了；因此他弄到了一把军刀。快到晚上，他看见一个龙骑兵骑着马进了院子；马房旁边也有一匹马立在那儿，龙骑兵要把它牵走，可是普拉东拚命跑到他跟前，抓住缰绳，说‘马是我们的，我不给你。’龙骑兵掏出手枪来吓唬他，不过看得出枪里并没有子弹；老爷亲眼看见，对他大声说：‘你不用管马，这跟你不相干。’一点儿也没有用！普拉东拔出军刀，朝他的脑袋上砍下去，龙骑兵的身子摇晃了两下，普拉东砍了又砍。我们想：好吧，这下我们的死期到了，等

① 费多尔·瓦西里叶维奇·罗斯托普钦伯爵（1763—1826）：一八一二至一八一四年莫斯科的陆军总督。

到他的伙伴看见了他，我们就完了。然而这个普拉东看见龙骑兵倒了下来，就抓住他的双足拖到一个石灰坑旁边，可怜的人，尽管他还活着，就给扔进坑里去了。他的马站在那儿，不跑开，只是拿蹄子顿着地，好像它懂得似的；我们家的人把它关在马房里；它一定给烧死在那儿了。我们大家都连忙跑出了院子，火越来越厉害了。我们十分疲劳，又没有吃一点儿东西，进了一所完好的房子，就连忙找地方休息。还不到一个小时，就听见我们家的人在街上大叫：'出来，出来，火，火！'我马上拉下一块弹子台上的绿呢把您裹起来，抵挡夜里的寒气；我们就这样走到特威尔广场，法国人正在那里救火，因为他们的官长住在总督府里；我们干脆坐在街上，哨兵到处走来走去，还有一些是骑在马上的。您在大声叫，拚命哭，奶妈没有奶，没有一个人有一小块面包。当时纳塔里雅·康斯坦季诺夫娜[①] 跟我们在一块儿，您知道，她是个胆子很大的姑娘，她看见有些兵在一个角落里吃东西，就抱起您径直到他们那儿去，指给他们看，又说：'给小孩，忙热[②]'；起初他们板起脸看她，说'阿列，阿列'[③]，可是她骂起他们来，——她说，你们这些该死的，这样那样的；那些兵一点儿也不懂，可是他们哈哈大笑，拿了水泡过的面包给您吃，另外还给了她一点面包皮。大清早来了一个军官，把所有的男人全带走了，您那爸爸也在里头

① 纳塔里雅·康斯坦季诺夫娜（"柯斯千卡"）：作者的第一个保姆。

② 忙热（法语：manger）：吃，用俄国腔讲法国话。

③ 阿列（法语：aller）：去，用俄国腔讲法国话。

(只留下女人和受了伤的巴威尔·伊凡诺维奇),军官带了他们去扑灭附近房屋的火。我们就这样一直待到晚上;我们坐着,光知道哭。天黑了,老爷回来了,还有一个军官跟他一块儿……"

让我来替换老妈妈把她的故事讲下去。我的父亲完成了他这个消防队长的任务以后,在基督受难修道院碰到了一连意大利骑兵;他就去找他们的长官,用意大利语把他一家的情况对他讲了。意大利人听见 la sua dolce favella〔意语:亲切的乡音〕,便答应去报告特列维兹公爵[1],他决定先派一名哨兵保护我们,防止再发生像在戈洛赫瓦斯托夫的园子里发生过的那种野蛮的事件。他派一个军官带着命令送我的父亲回去。军官听说我们一伙人两天没有吃一点儿东西,就把大家带到一家已经给人打开进去过的商店里去;高级茶叶和近东的咖啡,还有很多的海枣、干无花果、杏仁都扔了一地;我们的仆人把自己的衣服口袋装得满满的,甜食是很够的了。哨兵显得非常有用:一群一群的兵过来围着这些安顿在特威尔广场一个角上露宿的不幸的女人和仆人找麻烦,一共十来次,可是听到哨兵的命令,他们马上走开了。

莫尔季叶[2] 还记得他在巴黎认识我的父亲,并且向拿破仑报告了;拿破仑下令要我的父亲第二天早晨去见他。我的

① 爱德华·莫尔季叶·特列维兹公爵(1768—1835):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和拿破仑一世时期的军人,元帅,参加过一八一二年的侵俄战争。

② 莫尔季叶:即特列维兹公爵,拿破仑当时任命的"莫斯科总督"。

父亲穿着打猎时候穿的钉铜钮扣的蓝色旧上衣、脏的衬衫和几天不曾刷过的长筒靴子，没有戴假发，也没有刮脸，他素来讲究礼貌、严格遵守礼节，可是他就这样地应召到克里姆林宫的金銮殿去见法国皇帝了。

他们的谈话，我后来听见人转述过多次，在范男爵和米哈依洛夫斯基-达尼列夫斯基的历史书[①]中都有相当正确的记载。

拿破仑起先讲了些通常的空话、不连贯的句子和简短的意见（三十五年来人们一直认为这些话有深刻的意义，到后来才明白它们大都是十分无聊的废话），然后他责骂罗斯托普钦放火，说这是汪达尔人的野蛮行为[②]，他还是讲他的老话，说他热爱和平的信念是不可抵抗的，认为他进行战争是对付英国、而不是对付俄国的，他又自己吹嘘说，他派了守卫去保护育婴堂和乌斯片斯基大教堂，他还埋怨亚历山大，说是让坏人包围了，他〔拿破仑〕的和平的意图皇帝并不知道。

我的父亲说，和平的建议还是由胜利者提出来好些。

“我已经做过我所能做的了；我给库图佐夫[③] 去过信，他

---

① 历史书：指范男爵的《一八一二年的手稿》（一八二七年巴黎版）和米哈依洛夫斯基-达尼列夫斯基的《一八一二年卫国战争记》（一八三九年彼得堡版）。范男爵的全名是弗朗索瓦·范（1778—1837），法国历史学家、拿破仑的副官。亚·伊·米哈依洛夫斯基-达尼列夫斯基（1790—1848）：俄国将军、军事历史家。

② 野蛮行为：原文是 вандализм，这个词来源于古代日耳曼部族汪达尔人，它的意义是：肆无忌惮地破坏文化与物质财富的行为。

③ 米·伊·果列尼雪夫-库图佐夫（1745—1813）：俄国元帅，一八一二年卫国战争中担任俄国军队的总指挥。

不肯进行任何谈判，也不把我的建议报告皇上。他们要打仗，这不是我的错——就让他们打仗吧。”

在这幕喜剧结束以后，我的父亲要求他签发一张离开莫斯科的通行证。

“我下了命令不准发给任何人通行证。您为什么要走？您害怕什么呢？我下了命令开放市场。”

这个时候法国皇帝看来忘记了除了开放的市场以外，也不妨有一所避风雨的房屋，而且在特威尔广场上敌军士兵中间的生活也不是挺愉快的。

我的父亲向他说明了这一点；拿破仑想了想，忽然问道：

“您愿意把我的一封信送到皇帝那儿吗？要是您答应，我就下命令发给您带您全家离开的通行证。”

“我接受陛下的建议，”我的父亲对他说，“不过我很难保证送到。”

“您可以保证您要尽一切力量把信亲自送去吗？”

“Je m'engage sur mon honneur, Sire.〔法语：陛下，我拿我的名誉担保。〕”

“这就够了。我会差人去找您。您还需要什么吗？”

“我在这儿的时候，我一家人要一个住处，别的什么也不要。”

“特列维兹公爵会尽力去办的。”

莫尔季叶果然在总督府里拨了一间屋子给我们，并且下令供给我们吃的东西；他的总管甚至把酒也送来了。就这样

地过了几天，一天清早四点钟，莫尔季叶派了一个副官来找我的父亲，要他到克里姆林宫去。

在这些天里大火蔓延达到了可怕的规模：炽热的空气里烟雾弥漫，热得叫人受不了。拿破仑穿好了衣服，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样子很焦急，很烦躁，他开始感觉到他那烧焦了的荣冠不久就要冻坏，在这里不像在埃及那样，可以轻易脱身了。作战的计划是荒谬的，除了拿破仑以外，奈伊、拿尔旁纳、伯尔季叶[①] 和普通的军官们——大家都知道；他对于一切的反对意见，总是用这个神秘莫测的字眼“莫斯科”来回答；在莫斯科连他也懂了。

我的父亲进去以后，拿破仑拿起放在桌子上的一封密封的信交给他，向他鞠躬答礼，说：“我信任您的保证。”信封上写着：“A mon frère l'Empereur Alexandre.〔法语：致我的兄弟亚历山大皇帝。〕”

发给我父亲的通行证至今还完整地保存着；通行证是由特列维兹公爵签字，而且由莫斯科的警察总监勒赛卜斯[②] 副署的。有几个外人听说我们有通行证，便到我们这里来，央求我父亲让他们冒充仆人或者亲戚把他们带走。给受伤的老人[③]、

① 米歇尔·奈伊(1769—1815)：法国元帅、拿破仑的一个亲信；路易·德·拿尔旁纳－那拉伯爵(1755—1813)：法国政治活动家和外交官，一八一〇至一八一二年拿破仑的副官；亚历山大·伯尔季叶(1753—1815)：法国元帅，一八一二至一八一四年拿破仑的参谋长。

② 让·巴·巴·勒赛卜斯男爵(1766—1834)：法国外交家，一八一二年由拿破仑任命为“莫斯科警察总监”。

③ 指巴·伊·戈洛赫瓦斯托夫。

我的母亲[1] 和奶妈准备了一辆敞篷马车;其余的人步行。几个枪骑兵[2] 把我们护送到俄军的后卫,到了看得见那个地点的时候,他们就祝我们一路平安,打起马走了。一分钟以后一队哥萨克骑兵围住这一伙古怪的外来的人,把他们带到后卫的司令部去。这里的指挥官是文曾盖罗杰和伊洛瓦依斯基第四[3]。

文曾盖罗杰知道送信的事,就对我的父亲说,马上派两名龙骑兵送他到彼得堡去见皇上。

"您的那些人怎么安顿?"哥萨克将军伊洛瓦依斯基问道,"不能待在这儿;这儿不是在炮火的射程以外,而且随时都可能发生严重的事情。"

我的父亲要求,倘使办得到的话,把我们送到他的雅罗斯拉夫的庄园去,不过他附带地说了一句,他身上连一个戈比也没有。

"我们以后算帐,"伊洛瓦依斯基说,"您不用担心,我保证把他们送走。"

---

① 指德国女人亨利特·哈格(1795—1851,在俄国改名为路易莎·伊凡诺夫娜),一八一一年十六岁时同作者的父亲伊凡·阿克谢叶维奇·雅科甫列夫(1767—1846)在德国斯图加特结婚。他们回到俄国后没有作过合法的登记,因此他们的孩子被当成私生子,不可以姓父亲的姓。雅科甫列夫就给儿子取了"赫尔岑"这个德国字做姓。"赫尔岑"是德文的"心"字,他父亲就常用这个字称他母亲。

② 枪骑兵:指拿长矛的轻骑兵。

③ 费·费·文曾盖罗杰(1770—1818):俄国少将;伊·德·伊洛瓦依斯基第四(1767—1827):俄国将军。

我的父亲就由信使车通过当时用柴把垫的大路送走了。伊洛瓦依斯基弄到了一辆老式大马车把我们送到最近的城市，同行的还有一队由哥萨克骑兵押送的法国俘虏；他还供给我们到达雅罗斯拉夫的驿马费，总之，在战争时期的忙乱和紧张中他已经尽力做了一切了。

这就是我在俄国的头一次旅行；我的第二次旅行[①]中没有法国枪骑兵，没有乌拉尔哥萨克骑兵和战俘——我是一个人，还有一个喝得醉醺醺的宪兵坐在我旁边。

我的父亲给直接带去见阿拉克切叶夫[②]，就软禁在他的公馆里。伯爵[③]要那封信，我的父亲说，自己保证过要亲自送到；伯爵答应向皇上报告，第二天他用书面通知我的父亲，说皇上命令他拿了信立刻送去。他还写了一张收到原信的收条（收条保存下来了）。我的父亲给拘留在阿拉克切叶夫的公馆里大约有一个月；不准他会见任何人；只有谢·谢·希什科夫[④]奉皇上的命令来看过他，向他打听关于大火、敌人进入莫斯科和他同拿破仑见面的详细情况；他是到彼得堡来的头

---

① 第二次旅行：指一八三五年作者动身去流放地彼尔姆和维亚特卡的“旅行”。（见本书第二卷第十三章。）

② 阿·安·阿拉克切叶夫(1769—1834)：伯爵、陆军大臣，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俄国的反动政治活动家，保罗一世和亚历山大一世统治时期中最有势力的人。

③ 伯爵：即阿拉克切叶夫。

④ 谢·谢·希什科夫：应该是亚·谢·希什科夫(1754—1841)，他当时经常在亚历山大一世的身边，一八一二至一八一四年担任国务秘书，一八二四至一八二八年担任教育大臣。

一个亲眼看见那一切的人。最后阿拉克切叶夫通知我的父亲，皇帝下令释放他，说鉴于他当时处在急迫的情况下向敌人领取通行证，情有可原，对他不予追究。释放他的时候，阿拉克切叶夫吩咐他马上离开彼得堡，不许同任何人见面，只同意他跟他的哥哥[1] 告别。

我的父亲傍晚才赶到雅罗斯拉夫省的一个小小村子，在一家农民的小木房里找到了我们（这个村子里并没有主人的宅子），我睡在窗下一张长板凳上，窗关不紧，雪穿过窗缝飘了进来，盖满了长板凳的一部分，而且还堆在窗框上面，不融化。

大家都很惊惶不安，尤其是我的母亲。在我的父亲到来前几天，有天早晨村长同几个家仆慌慌忙忙地跑进了她住的木头房子，打着手势向她说明什么事情，要求她跟着他们出去。我的母亲那个时候俄国话一句也不会说；她只懂得他们在讲巴威尔·伊凡诺维奇的事情；她想不出这是怎么一回事；她想大概是他们把他杀死了，不然就是他们要杀死他，然后杀她。她把我抱在怀里，吓得半死，浑身发抖，跟着村长走了出去。戈洛赫瓦斯托夫住在另外一间木头房子里：他们进去了；老人的确躺在桌子旁边死了，他当时正坐在那里打算刮脸，突然中风，一下子就结束了他的生命。

我母亲的处境是可以想象到的（她那个时候只有十七

---

① 哥哥：指作者的伯父彼·阿·雅科甫列夫（1760—1813），军事委员会委员。

岁)：她住在一间给烟熏黑了的小小木房里，生活在这些留着长胡子、穿着不挂面子的大皮袍、讲着完全不懂的语言的“半开化的”人中间；而且这一切都发生在一八一二年那个可怕的冬季十一月里。她的唯一的依靠就是戈洛赫瓦斯托夫；他死了以后她白天黑夜都哭。可是这些“野蛮人”却真心十分可怜她，对她表示非常亲切，表示他们独特的浑厚的好心；村长还几次差他的儿子到城里去买葡萄干、蜜糖饼干、苹果和小面包圈给她送来。

十五年后村长还活着，有时上莫斯科来，头发雪白而且秃了顶；我的母亲经常招待他喝茶，同他回忆一八一二年冬天的情况，说她当初怎样害怕他，谈他们彼此言语不通，怎样共同料理巴威尔·伊凡诺维奇的丧事。老头子还是像过去那样叫我的母亲做尤里扎·伊凡诺夫娜，不叫路易莎，他还讲我当时不怕他的长胡子，愿意让他抱我。

我们从雅罗斯拉夫省搬到特威尔省，末了，在一年以后我们又搬回莫斯科。那个时候我父亲的哥哥[①]从瑞典回来了，他做过驻维斯特法利亚[②]的公使，后来带着某种使命去见过伯尔纳多特[③]；他同我们一起住在一所大房子里。

---

① 父亲的哥哥：指作者的另一个伯父列·阿·雅科甫列夫(1764—1839)，枢密官和外交家。枢密官就是枢密院的成员，由沙皇任命或批准。

② 维斯特法利亚：原是普鲁士来因河东岸的一省。一八〇七年拿破仑一世把他的兄弟杰罗姆·波拿巴封为维斯特法利亚国王，首都是卡塞耳。

③ 让·巴·茹·伯尔纳多特(1763—1844)：法国元帅。一八一〇年被选为瑞典王位的继承者，一八一八至一八四四年在位，称为卡尔十四世。

我还模糊地记得大火的痕迹，这些痕迹一直保留到二十年代的初期：没有窗框、没有屋顶的烧毁了的大房子，塌了的墙，围在篱笆里面的废墟，上面堆着的炉子和烟囱的残余。

莫斯科大火，波罗丁诺战役①、别列津纳河战斗②、占领巴黎，这些故事都是我的摇篮曲，我的儿童故事，我的《伊里亚特》和《奥德赛》③。我的母亲和我们的仆人们、我的父亲和韦拉·阿尔塔莫诺夫娜，他们不断地回想到那些时间隔得那么近、事情就在他们身边发生、而又来得那么突然的可怕的日子。这以后，从前方回来的将军和军官们开始大批回到莫斯科。我父亲过去在伊兹玛依洛夫斯基团的老同事现在是这场刚刚结束的流血战争的英雄，他们经常到我们家来。他们在讲述自己的劳累和经历的时候，感到在休息。这的确是彼得堡时期的最光辉的时刻；感觉到自己的力量这样一种意识产生了新的生命；工作和操心好像都给推到明天，推到平日，现在人们要在胜利的欢乐中陶醉。

在这里我听到的关于战争的事情比从韦拉·阿尔塔莫诺

---

① 波罗丁诺战役：波罗丁诺村在莫斯科以西一一〇公里，这次战役是一八一二年卫国战争中最大的一次，库图佐夫指挥的俄军使拿破仑率领的法军蒙受重大损失后向莫斯科撤退。

② 别列津纳河战斗：别列津纳河是第聂伯河的右支流，一八一二年由莫斯科退却的拿破仑的残军在渡过别列津纳河时被全部歼灭。

③ 《伊里亚特》和《奥德赛》：《伊里亚特》是古希腊叙事长诗，据称与《奥德赛》同为诗人荷马所作。《伊里亚特》是描写特洛伊战争的叙事诗；长诗《奥德赛》则叙述奥德赛在特洛伊战争结束后返回故乡、途中漂泊、历险的情况。

夫娜的口里听到的多得多。我非常喜欢米洛拉多维奇伯爵[①]讲的故事；他讲得十分生动，做出活龙活现的摹仿、比划，还常常出声大笑，我不止一次在他的笑声中在他背后的长沙发上睡着了。

不用说，在这种环境里我就成了一个极端的爱国主义者，我还准备将来到军队里去。然而狭隘的民族感情从来不会产生好的结果；在我身上就发生了下面一个事故。在那些到我们家里来的客人中间，有一位甘索纳伯爵，是法国侨民，又是俄国军队的中将。他是个极端的保皇党，参加过那个著名的节日，在那一天国王的爪牙们把国民的帽徽践踏在脚下，玛丽·安多瓦纳特举起酒杯祝革命垮台。[②] 甘索纳伯爵是个瘦长的白发老人，不过生得端正，他是雅致和礼貌的典范。在巴黎给他留得有一个贵族爵位，他已经到那里去庆祝过路易十八[③] 的登位了，这次是回俄国来出售他的产业。该我倒霉的是，这位所有俄国军队中最有礼貌的将军在我面前谈起了战争。

---

① 米·安·米洛拉多维奇伯爵(1771—1825)：俄国将军，参加过苏沃洛夫的远征军和抗击拿破仑的卫国战争。一八一八年起任彼得堡总督。

② 指一七八九年十月一日在凡尔赛举行的盛大宴会。关于这次的宴会，法国历史学家阿·马迪厄在他的《法国革命史》中有这样的记载："十月一日近卫军在宫内歌剧院大厅举行盛大宴会，欢迎佛兰德旅团。国王和抱着太子的王后也来应酬宾客。……宾客听了音乐乘着酒兴，发出狂热的喝彩声，把国民的帽徽抛在地上践踏，而戴起了国王的白徽和王后的黑徽。"玛丽·安多瓦纳特是路易十六的王后。

③ 路易十八：即路易十六的兄弟，拿破仑一世下台后，他登上了王位，做了十年国王(1814—1824)，死后由查理十世继承王位。从一八一四年他即位起，到一八三〇年查理十世下台逃到英国止，称为波旁王朝的复辟时期。

"那么您一定是在打我们吧?"我极其天真地问道。

"Non, mon petit, non, j'étais dans l'armée russe.〔法语:不是,小朋友,不是,我是在俄国军队里。〕"

"怎么?"我说,"您一个法国人,参加我们的军队?不会有这样的事!"

我的父亲严厉地瞪了我一眼,用别的话支开了。伯爵勇敢地弥补了这件事情;他对我的父亲说,他"喜欢这种爱国主义的感情"。可是我的父亲不喜欢这种感情,他在伯爵走了以后就把我痛骂了一顿。"你冒失地乱讲你自己不懂、而且你也没法懂的事情,闯了这个祸;伯爵由于对自己的国王忠心才来替我们的皇帝效劳。"① 的确我不懂这个。

我的父亲在国外住了十二年,他的哥哥更久一些;他们打算仿照外国方式安排他们的生活,同时又不增加开支,而且还要保持俄国式的舒适。他们的生活却始终不曾安排好——也许是由于他们不善于安排吧,不然就是因为在他们的身上俄国地主的本性胜过了他们的外国习惯。他们的产业是共同管理的,田地是合在一起的,宅子的底层住满了大群的家仆,因此产生混乱的一切条件都有了。

有两个保姆照料我——一个俄国人,一个德国人;韦拉·

① 甘索纳是一个拥护波旁王朝的法国贵族,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中一七九二年波旁王朝被推翻后,他逃到俄国。他后来在俄国军队中服务,还参加了一八一二年的抗法卫国战争,为了实现波旁王朝复辟这个反动目的。

阿尔塔莫诺夫娜和普罗沃太太都是很和善的女人，不过我看见她们整天编结长袜子，不停地彼此挖苦，也感到厌烦，只要有机会我就跑到枢密官(做过公使的那位伯父)住的那一半宅子里去，找我的唯一的朋友——他的听差卡洛。

我很少遇见过比卡洛更善良、更温和、更宽厚的人。他离开了所有自己的人，孤零零地待在俄国，俄国话也讲得很不好，他对我却有一种类似女人的感情。我整小时、整小时地待在他的屋子里，麻烦他，打扰他，顽皮淘气——他都带着好心的微笑忍受下去了；他还用硬纸板给我剪出各种各样好玩的东西，用木头给我做出各式各样的小玩意儿(我为这个多么喜欢他！)。晚上他常常从图书室里给我拿些图画书到楼上来——赫麦林和帕拉斯的旅行记①，还有一本厚厚的书《图画世界》② 我非常喜欢，我看来看去，看到后来连那硬皮封面也经受不住了。卡洛接连一两小时指点我看同样一些图画，而且翻来覆去把同样的解说讲了千百遍。

在我的生日和我的命名日③ 到来之前，卡洛就要把自己

① 旅行记：这是十八世纪两个博物学家在俄国边境地带进行考察后写的旅行记，由俄国科学院分别出版。萨·果·赫麦林(1744—1774)是德国博物学家约·格·赫麦林(1709—1755)的侄子，他也是彼得堡科学院的院士，叔侄二人都出版过旅行记。彼·西·帕拉斯(1741—1811)是俄国籍德国博物学家，一七六七年起担任彼得堡科学院院士，他到过乌拉尔、吉尔基斯草原和西伯利亚部分地区进行考察。

② 《图画世界》：一七七三年在彼得堡出版的一种带图的儿童读物，以后重版多次，到一八一七年为止。

③ 命名日：和本人同名的圣徒的纪念日。

关在房里；从他的房里传出来铁锤和别的工具的声音；他常常迈着急匆匆的足步经过走廊，有时候他拿了一个小小的胶水锅，有时候还拿进去用纸包着的什么东西，但每次进出他都把门锁上。可以想象到我多么想知道他在准备什么；我差了家仆的小孩们去打听，可是卡洛十分小心。有一次我们发现楼梯上有个小窟窿，可以直接看到他的房间里面，不过它对我们也没有用处；只看得见窗户的上部和腓特烈二世[①]的肖像，像上有一根大鼻子，有一颗大宝星，还有一种消瘦的兀鹰的样子。到了那个日期的前两天，响声停止了，房门打开了——屋子里的一切都和平时一样，只是地上有一点金纸和花纸的切边；我的脸涨红了，我受到好奇心的折磨，可是卡洛带着不自然的严肃表情，完全不提那件微妙的事。

我痛苦地一直熬到那个重大的节日，大清早五点钟我已经醒了，就在想卡洛准备的东西了；八点他本人出现了，打着白领结，穿着白背心，套上深蓝色燕尾服——双手空空的。“他准备的东西什么时候拿出来呢？是不是他弄坏了呢？”时间过去了，寻常的礼物送来了，叶丽莎威塔·阿列克谢叶夫娜·戈洛赫瓦斯托娃[②]的听差已经来了，他送来用餐巾包好的贵重玩具，枢密官也已经给我带来很好玩的东西，可是对那个猜

① 腓特烈二世：即腓特烈大帝（1712—1786），普鲁士国王。

② 叶丽莎威塔·阿列克谢叶夫娜·戈洛赫瓦斯托娃（1763—1822）：作者的姑母，巴·伊·戈洛赫瓦斯托夫的妻子。

想不到的礼物的焦急等待妨碍了我的快乐。

午饭后或者用茶后，保姆好像无意地突然告诉我：

"您到下面去一会儿，有一个人找您。"

我想："现在是了"，就双手按住楼梯扶手滑到下面去。通大厅的几扇门带着响声一下子打开了，奏起了音乐，绘着我的名字缩写花字的彩灯亮起来了，家仆的小孩们打扮成土耳其人给我送来糖果，然后就是木偶戏或者室内焰火。卡洛满头大汗，一个人忙来忙去，完全由他亲自动手。他的高兴并不亚于我。

有什么礼物可以同这样的喜庆相比呢？——我从来没有喜欢过什么东西，在我任何年岁，所有权和贪得心的结节[①]都不曾在我身上发达过——现在我正受着悬念折磨的时候，一下子出现了许多蜡烛、薄金片和火药的气味！只缺少一样——同伴，我整个儿童时代都是在孤寂中度过的，[②] 所以我在这方面并没有给惯坏。

---

① 根据当时流行的所谓骨相学的说法，人的才能由颅骨上的结节决定，作者经常讽刺这种反动说法，因此在这里使用了"结节"这个词。

② 除了我以外，我的父亲还有一个比我大十岁的儿子。我很喜欢他，可是他不能够做我的同伴。从十二岁到三十岁这一段时期，他是在外科医生的手术刀下面度过的。他以极大的勇气忍受了一连串的痛苦，这些痛苦使他的整个生活变成了接连不断的手术，但是经过了这些痛苦的手术之后，医生们竟然宣告他的病是无法治好的。他的健康给损害了；环境和性情促成了他的生活的完全毁灭。我那些叙述他孤寂、忧郁的生存的文字已经被我删去了；在没有得到他的同意的时候，我不想发表它们。——作者原注

作者的这个哥哥的全名是：叶戈尔·伊凡诺维奇·赫尔岑(1803—1882)，比作者大九岁。

我的父亲还有一个哥哥，比他和枢密官都要大些，[①]他们同这个哥哥之间有着公开的争执；不过大家的田地还是合在一起，由他们共同管理，也就是说共同糟蹋。三个人的共同管理在争吵的情况下所造成的混乱是十分令人愤慨的。两个弟弟千方百计反对哥哥，哥哥也是一样地反对他们。村长们和农民们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办：一位老爷要大车，另一位要干草，第三位要柴火，每个人都发命令，每个人都派去自己的代理人。哥哥派了一个村长——不到一个月两个弟弟找了一桩没有道理的事情做借口把他撤了职，另外派了一个哥哥不承认的村长。在这种情形下面闲言闲语、搬弄是非、暗探、得宠的人全都出现了，平日得不到公道、也得不到保护的贫苦农民在这一切底下，在各方面作牛作马，担负着加倍的劳役，而且为老爷们那些任性要求所造成的混乱现象出力卖命。

弟兄间的争执产生了第一个使他们自己感到震惊的结果，这就是他们同杰维叶伯爵家[②] 的官司打输了，尽管是他们这一边有理。他们的利益虽然是一致的，可是他们从来无法达成协议采取共同的行动；这种情况当然有利于对方。他

① 他们原来是四弟兄：彼得，就是本书第三章中提到的“柯尔切瓦的‘表姐’”的外祖父；亚历山大，就是这里讲的哥哥，据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长篇小说《卡拉玛卓夫兄弟》中用他作模特儿塑造了费多尔·巴甫洛维奇这个人物；列夫，在本书中经常被称为“枢密官”；伊凡，就是赫尔岑的父亲。姐妹中一个是叶丽莎威塔·阿列克谢叶夫娜·戈洛赫瓦斯托娃，还有一个是玛利亚·阿列克谢叶夫娜·霍万斯卡雅。雅科甫列夫家族是俄罗斯最老、最高的贵族之一。——英译者加尔纳特夫人注

② 杰维叶伯爵家：雅科甫列夫家的亲戚。

们除了失去一份大的很好的田产以外，枢密院[1]还判决三兄弟每人支付诉讼费和赔偿损失费三万纸卢布[2]。这个教训开了他们的眼睛，他们决定分产。预备谈判进行了大约一年；全部产业分成相当平均的三份，谁得哪一份，由抽签决定。枢密官和我的父亲去拜访了他们几年没有见面的哥哥，为了进行谈判和得到和解；然后就传出来这样的消息：他要到我们家来完成这件事情。这位哥哥来的消息在我们家里散布了恐怖和不安的情绪。

这是一个独特怪诞的人物，这种人只有在独特怪诞的俄国生活中才能够存在。他是一个很有天赋的人，可是他一辈子尽做荒唐事，而且经常荒唐到犯罪的地步。他受过很好的法国式教育，读书多，——却整天荒淫和游手好闲，一直到死为止。他起初也是在伊兹玛依洛夫斯基团里服役，担任波将金[3]手下副官一类的职务，后来又在某使馆供职，回到彼得堡以后被任命为东正教事务管理局总监察长。不论是外交方面或是僧侣方面的环境都不能够驯服他那不肯就范的个性。他同高级僧正们的争吵使他丢掉了这个职位；在总督府举行的一次正式宴会上他想打或者打了一位先生一记耳光，因此

---

① 枢密院：帝俄的枢密院是最高的政权机关，有权监督司法、财政和行政。在十九世纪前半期，"执政的"枢密院已变成最高司法机关。

② 纸卢布：十八世纪中期在俄国发行的钞票，它的价值时涨时落，到过一个纸卢布只换二十五个银戈比的时候。

③ 格·亚·波将金(1739—1791)：公爵、元帅、俄国的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宠臣。

给驱逐出彼得堡。他就到他的坦包夫省的田庄上去；在那里农民们因为他凶暴残忍和欺侮妇女的行为差一点儿杀死他；他的马车夫和他的马救了他的命。

这以后他就在莫斯科住下来。他的亲戚、朋友都不跟他来往，他一个人孤零零地住在特威尔大道上他那所大公馆里面，干着压迫他的家仆、压榨他的农民的勾当。他有一个收藏丰富的图书室，又有一个完整的收容农奴姑娘的“后宫”，这两处他都上了锁。他什么事也不做，私下虚荣心又很强，有时甚至到了幼稚的程度，他为了解闷买了许多用不着的东西，打了一连串更不必要的官司，而且不达目的不肯罢休。他为了一只阿马地小提琴[①]，打了三十年的官司才打赢了。他特别费了大力打赢了另一场官司，得到两院公馆中间一堵公墙，他占有这堵墙一点儿用处也没有。他已经退休了，在报纸上读到他的老同事们晋级受勋的消息，他就花钱把颁发给他们的勋章买来，陈列在桌子上，作为悲伤的提示：这些和那些勋章他本来也可以得到！

他的兄弟和姐妹们都害怕他，不跟他来往；我们的仆人宁可走一大段路绕过他的公馆，免得遇到他，他们看见他的时候脸色都吓白了；女人们害怕他无耻的追逐，家仆们到教堂去做祷告，求保佑他们不要落到他的手里。

要到我们家里来的就是这个可怕的人。从清早起整个宅子都异常地惊动起来了；我虽然出生在他的公馆里（我的父亲

---

① 意大利克雷莫纳城阿马地家族制造的一种小提琴。

从外国回来就住这所公馆里),可是我从未见过这个神话性的"哥哥—仇人";我很想看见他,同时我又害怕——我不知道为什么,可是我很害怕。

在他来以前两小时光景,我父亲的最大的外甥[①],两个至友和一个和善的、虚胖的办理法律事务的官员来了。大家坐在那里默默地等候他;管事忽然进来,用一种不像是他自己的声音报告:

"兄长驾到。"

"请。"枢密官带着看得出来的激动说。我的父亲闻了一撮鼻烟,外甥整整领结,官员呛了起来,大声咳嗽。本来命令我到楼上去,可是我浑身发抖,待在隔壁屋子里。

"兄长"慢慢地、尊严地朝前走来,枢密官和我的父亲走去迎接他。他双手把一幅圣像捧在胸前(就像人们在结婚和丧葬仪式上那样),用拖长的声音(略略带了一点鼻音)对他的兄弟们讲了下面的话:

"先父在临终前用这幅圣像祝福我,委托我和亡兄彼得代替他做你们的父亲并且照顾你们……要是先父知道你们反对哥哥的行为……"

"好啦,mon cher frère〔法语:亲爱的哥哥〕,"我的父亲用他那经过考虑的冷静的声音说,"您执行先父的遗志执行得很

① 外甥:指德·巴·戈洛赫瓦斯托夫(1796—1849),作者的表兄,巴威尔·伊凡诺维奇的儿子,一八三一年起任莫斯科教育区的副督学,一八四七至一八四九年任督学。

好。最好还是把这些对您、对我们都是痛苦的回忆丢开吧。”

“怎么？什么?”笃信上帝的兄长吼道，“你们邀请我来，就是为了这个……”他把圣像扔在地上，银制的像饰叮当地响了起来。这个时候枢密官的吼声更加可怕。我慌忙地跑上楼去，正好看见官员和外甥躲到阳台上去，他们惊惶失措的样子并不比我好一些。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而且是怎样发生的，我讲不出来；那些吓坏了的仆人都躲在角落里，没有一个人知道出了什么事，不论是枢密官或者我的父亲都没有在我面前讲过这个场面。吵闹渐渐地平息了，分产决定下来了，是在当天，或者是在另外一天——我记不得了。

我的父亲分到了瓦西里叶夫斯柯耶[1]，这是在莫斯科附近鲁兹基县的一个大的田庄。第二年我们在那里度过了整个夏天；这个时候枢密官在阿尔巴特给自己买了一所房子；我们回到莫斯科就单独住在我们那座空空荡荡、死气沉沉的大公馆里面。这以后不久我的父亲也在老马房街买了一所房子。

首先是枢密官，其次是卡洛，他们一去，我们家里活跃的因素也就消失了。只有他〔枢密官〕一个人阻止了我父亲忧郁、多疑的性格的发展，现在它完全没有阻拦了。新房子很阴郁，叫人联想到监狱或者病院；下层楼是按照有柱子支持的拱顶式修建的，厚厚墙壁上开着的窗户就像要塞的炮眼一样；房

① 瓦西里叶夫斯柯耶：作者父亲在莫斯科河岸上的庄园，离莫斯科市七十公里。

子四周有一个大得没有用处的院子。

说实在话，使我感到奇怪的倒是枢密官能够同我的父亲在同一所宅子里住了那么久，而不是他们的分居。我很少见到像他们那样完全相反的两个人。

枢密官是一个性情和善、喜欢娱乐的人；他一生都是在灯烛辉煌的世界里，在官场、外交和宫廷服务的世界里度过的，他想不到另外还有一个更严肃的世界——尽管他同从一七八九年到一八一五年中间的一切重大事件不仅有接触而且有密切关系。沃龙佐夫伯爵① 派他去见过格伦维尔勋爵②，打听波拿巴将军③ 离开埃及军队以后有什么打算。他在巴黎参加过拿破仑的加冕典礼。一八一一年拿破仑下令把他扣留在卡塞耳④，他当时在那里担任驻"在杰利米亚王的宫廷"⑤ 的公使，我的父亲在烦恼的时候常常这样说。总之，近年来发生的一切重大事情他都参加过，只是参加的方式奇特，不合常规。

---

① 谢·罗·沃龙佐夫伯爵(1744—1832)：俄国外交家，一七八四年起任驻英大使多年。

② 威廉·格伦维尔勋爵(1759—1834)：英国外交大臣(一七九一年起)和首相，反对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和以后的拿破仑一世的帝国。

③ 波拿巴将军：拿破仑·波拿巴，也就是后来的拿破仑一世。

④ 卡塞耳：维斯特法利亚的首都，现在德国中部。

⑤ 杰利米亚王：指杰罗姆·波拿巴(1784—1860)，从一八〇七年到一八一三年维斯特法利亚的国王。"在杰利米亚王[一]的宫廷"是一句俗话，和"在玛土撒拉[二]的日子"差不多。——英译者注

[一]"杰利米亚王"是给杰罗姆起的讽刺的绰号。

[二]玛土撒拉是《旧约·创世记》中一个长命的人，诺亚时代的族长。

他虽然是伊兹玛依洛夫斯基团禁卫军的大尉，却给派到伦敦的使馆里供职。保罗[①] 在名册上看到这个，下令要他立刻回到彼得堡。这个军人—外交官就搭第一班船动身，去向沙皇报到。

“你愿意待在伦敦吗？”保罗用他那嘶哑的声音问道。

“要是陛下恩准的话。”这个当时在使馆工作的大尉回答道。

“马上回去，不要浪费工夫。”保罗声音嘶哑地说，他果然动身走了，连那些住在莫斯科的亲戚，他也不去看他们。

在外交问题靠刺刀和霰弹来解决的时候，他做了公使，他在维也纳会议[②]（这个所有外交官的光辉节日）的时候结束了他的外交官的前程。他回到俄国，被任命为莫斯科宫内最高侍从[③]，虽然在莫斯科并没有宫廷。他不懂法律，也不懂俄国的诉讼程序，他却进了枢密院，担任监护院[④] 的委员，又担任玛利医院的院长，还是亚历山大学院院长，他处理他的工作

---

① 保罗：保罗一世(1754—1801)，俄国皇帝，即所谓疯狂的沙皇，彼得三世和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儿子，一七九六年即位，一八〇一年被密谋分子刺杀。

② 维也纳会议：一八一四年九月到一八一五年六月，欧洲各强国联盟结束了对拿破仑的战争以后，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召开的会议。在会议上各战胜国之间订立了条约，恢复和加强各旧王朝封建反动势力与所谓“合法”政权，把欧洲地图进行了重新分割。一八一五年九月的反动的“神圣同盟”宣言是这个会议的决议的补充。

③ 最高侍从：宫内的荣誉称号。

④ 监护院：在沙皇俄国，管理照顾寡妇、孤儿和私生子一类人的组织的机关。

很热心，很严格，而且很诚实，其实这种热心是不必要的，这种严格是有害的，这种诚实是没有人注意的。

他从来不肯待在家里。一天中间他要跑乏两套拉车的壮马：每套四匹，早晨一套，午饭后一套。除了去枢密院（他从未忘记到那里去）和监护院（他一个星期去两次）以外，除了去医院和学院以外，他很难得错过一场法国戏，而且每星期到英国俱乐部[①] 去三次。他从来不曾有过无聊的时候，他经常很忙，而且有事情消遣；他总是有地方去，他的生活就像安装在好的弹簧上，在一个卷宗和文牍的世界里轻轻巧巧地滚过去。

而且，他一直到七十五岁都是像年轻人一样地健壮，他参加一切大的舞会和午宴，出席所有的庆祝大会和年会，不论是农业方面的，或者是医学方面的，不论是承保火险公司的，或者是博物学家协会的。……此外，也许正是因为这些，他在老年还保存了一点好心肠和一些热情。

跟活泼爱动、难得待在家里的枢密官相比，再没有像我的父亲那样鲜明的对照了：他很难得走出院子，他讨厌官场，老是不高兴，不满意。我们也有八匹马（都是很坏的），可是我们的马房就像劣马的收容所一样；我的父亲养着它们，一半是为了面子，一半是为了让那两个马车夫和那两个御者[②] 除了去取《莫斯科新闻》[③] 和搞斗鸡戏之外（这种斗鸡戏他们在马车

① 英国俱乐部：当时莫斯科贵族的俱乐部。

② 御者：指纵列驾马时、骑在前导马上的马夫，通常是小孩。

③ 《莫斯科新闻》：一七五六年由莫斯科大学创办的报纸。

棚和邻家院子中间的空地上搞得很成功),还有一点事情做。

我的父亲差不多完全没有工作过;他在一位虔诚的、笃信宗教的姨母[①] 家中由一个法国家庭教师教他念书,在十六岁时进伊兹玛依洛夫斯基团当中士,一直服役到保罗即位的时候,他就退伍了,军衔是禁卫军大尉;一八〇一年他出国,游历了一些国家,在国外待到一八一一年。他同我的母亲一起在我出生前三个月回来了,在莫斯科大火以后,他在特威尔省的田庄上住了一年,然后搬回莫斯科住下来,他尽可能地把生活安排得孤寂和枯燥。可是他哥哥的活泼爱动的性情阻止了他。

枢密官搬走以后,我们家里的一切越来越显得阴郁了。墙壁、家具、仆人——一切都现出不高兴和愁眉苦脸的样子;不用说,其中最不高兴的就是我的父亲本人。那种不自然的清静、仆人们的低声耳语和小心的脚步声——这些叫人联想到的并不是殷勤、注意,而是压抑和恐惧。屋子里的一切都是静止不动的,同样一些书放在同样一些地方,书里面夹着同样一些书签、标记,五、六年中间没有人动过一下。在我父亲的寝室和书房里,一连几年没有开过窗,也没有移动过家具。他到乡下去的时候,也把他的房门钥匙放在口袋里带走了,不让人趁他不在家时想起冲洗地板或者擦洗墙壁。

---

① 姨母:指安娜·美谢尔斯卡雅公爵夫人(1738—1827),作者祖母娜·包·雅科甫列娃(1734—1781)的妹妹。

第二章

保姆们的议论和将军们的闲谈——不明不白的身份——俄国百科全书派——寂寞无聊——女仆房和门房——两个德国人——功课和阅读——教义问答和福音书

十岁以前我一直没有感觉到我的身份有什么古怪、特别的地方；我住在我父亲的家里，我在他住的那一半宅子里应当规规矩矩，在我母亲住的另一半宅子里我可以任意吵嚷胡闹，在我看来这都是很自然、很简单的事情。枢密官溺爱我，给我玩具，卡洛抱我，韦拉·阿尔塔莫诺夫娜给我穿衣服，管我睡觉，给我洗澡，普罗沃太太带我出去散步，跟我讲德国话；一切都按照常规进行，然而我开始思索起来了。

偶尔听到的几句话、别人随意的闲谈开始引起了我的注意。普罗沃老太太和所有的仆人都十分爱我的母亲，然而他们都害怕、而且一点也不喜欢我的父亲。我的父母之间有时候发生的夫妻争吵常常成为普罗沃太太和韦拉·阿尔塔莫诺夫娜议论的题目，她们两个总是站在我母亲的一边。

我母亲确实忍受了许多不愉快的事情。她是一个非常善

良的女人,却缺乏坚强的意志,她完全给踩在我父亲的足下,就像一般性格软弱的人那样,她只能在一些无关重要的细小事情上拚命地反对一阵。然而不幸的是在这些细小事情上偏偏差不多全是我的父亲对,结果总是他胜利。

“要是我真的处在太太的地位,”譬如普罗沃太太就常常这样说,“我就干脆回到斯图加特去;她在这儿得到什么快乐——只有发脾气和不痛快,而且沉闷得要死。”

“那还用说,”韦拉·阿尔塔莫诺夫娜补充说,“不过她的手足都给这个绑住了,”她用她的编织袜子的织针指着我,“她带着他——到哪儿去呢?怎么办呢?要是丢他一个人在这儿,照我们这儿这样过下去,那么连旁人看来也会觉得可怜!”

一般地说来,儿童的领悟力比人们所想象的要高,一件事打动了他们,他们不久就会让别的事情分了心,把那件事暂时忘记,可是他们后来又会接连不断地回到那件事上面,如果那是一件神秘的或者可怕的事,就更是这样,他们带着异常的耐心和灵敏继续打听下去,一直探听出真相为止。

我一旦留神起来,不到几个星期的工夫,就弄清楚了我父亲当初认识我母亲的详细情形,也知道了我母亲怎样打定主意离开她父母的家,怎样躲藏在枢密官在卡塞耳的俄国使馆里面,又怎样女扮男装跨过国境;我从来没有向任何人问过一句话,就打听出了这一切。

这些发现的头一个后果就是我跟我父亲疏远起来——由于我讲过的他同我母亲之间的那些争吵。我以前也见过他们的争吵,不过我觉得这是寻常的事情;家里所有的人(连枢密

官也在内)都害怕我的父亲,他指摘所有的人,这种事我已经习惯了,并不觉得奇怪。现在我开始有不同的看法了,我想到这一切中间有一部分是由于我的缘故才忍受下去,这种思想有时候在我那儿童的明朗的想象上面投下了沉重的乌云。

从这个时候起在我的脑子里生了根的第二个思想,就是我比一般的小孩更少依赖父亲。我喜欢自己想象出来的这种独立。

又过了两三年,有一天晚上两个我父亲团里的老同事,奥连堡省总督彼·基·艾森① 和前比萨拉比亚总督、一位在波罗丁诺打掉了一只腿的将军阿·尼·巴赫美捷夫② 来看我的父亲。他们坐在客厅里,我的房间就在客厅的隔壁。我父亲在谈话中间告诉他们他同尤苏波夫公爵③ 谈过给我安排职务的事。

"再不能耽搁了,"他补充说,"你们知道,他必须工作一个长时期才能够混到一官半职。"

"老兄,您又何必叫他当抄写员呢,"艾森好意地说,"把这件事交给我办,我要让他进乌拉尔哥萨克骑兵队,提升他当军官,这是主要的,然后再听其自然,像我们大家一样,步步高

① 彼得·基利洛维奇·艾森(1772—1844):俄国少将,后来作过彼得堡的总督。

② 阿列克谢依·尼可拉叶维奇·巴赫美捷夫(1774—1841):俄国将军,一八一六至一八二〇年任比萨拉比亚总督,后来在几个省里担任省长职务。

③ 尼可拉·包里索维奇·尤苏波夫公爵(1750—1831):俄国大官僚、大地主,叶卡捷琳娜二世、保罗一世和亚历山大一世时代的显贵,克里姆林宫部的主任。

升。”

我父亲不同意，他说他现在不再喜欢军事方面的事情，他希望将来给我弄到一个职位，到某个气候暖和的国家的使馆里工作，他也可以在那里度过他的晚年。

巴赫美捷夫一直很少讲话，这时拄着双拐站了起来，说：

“我看您应当多多考虑彼得·基利洛维奇的劝告。您不愿意把他放到奥连堡，那就把他放在这儿吧。我和您是老朋友，我习惯于跟您坦率地讲话：您安排他做文职工作、上大学，对您的年轻人没有好处，会使他对社会无用。他很明显地处在一种不明不白身份的地位，只有军役才可以给他的前程开路，改善他的地位。不等他升到连指挥官，所有危险的思想都会消失了。军纪是个大学堂，以后的事就取决于他了。您说他有才能，难道就只有蠢材才服军役吗？那么您和我、我们又怎样呢，所有我们这号人又怎样呢？您还可以提出一个反对的理由，就是他必须服役一个比较长的时期才会升到军官，然而正是在这方面我们可以给您帮忙。”

这一番对话和普罗沃太太同韦拉·阿尔塔莫诺夫娜的谈话有同样大的效力。当时我已经十三岁了。[①] 这样的教训翻来覆去，从各方面思索分析，经过多少个星期、多少个月孤独中的考虑，它们终于结出了果实。这番对话产生的结果就是：在这以前我和所有的男孩子一样想望着军役和军服，而且知

① 这大概是笔误，因为这番谈话发生在一八二〇年，作者当时只有八岁。

道我父亲想要我担任文职,我几乎要哭出来,但是现在我对军役的热心突然冷下来了,我对军官服上面的肩章和缨带、军裤上面的颜色镶条的喜爱虽然不是一下子而是逐渐地完全根除了。不过我那逐渐消失的对军服的热情又爆发过一次。我们的一个亲戚[1] 在莫斯科一所寄宿中学校念书,有时候到我们家来过节日,后来他参加了杨堡枪骑兵团。一八二五年他来莫斯科,是个贵族候补军官,在我们家住了几天。我看见他一身的细带子和细绳子,还挂了一把军刀,一顶四只角的高筒军帽戴得略有一点歪,用一根细带子拴在下巴底下,这个时候我的心跳得非常厉害。他只有十七岁,而且个子不高。第二天早晨我穿上他的军服,挂上他的军刀,戴上他的军帽,照着镜子看。我的天,我穿上这件镶红边的蓝色短军服多好看!还有帽缨、帽上的绒球和子弹带……我平时在家里穿的厚毛短上衣和黄色中国棉布裤怎么能跟它们相比呢?

我的亲戚的到来动摇了将军们谈话的效力,但是不久环境又使我而且是永远地厌弃军服了。

我对自己的"不明不白的身份"进行了反复思考以后,心里的结论跟我听见两个保姆的闲谈后所推断出来的结果差不多。我觉得自己更不依赖这个我对它毫无所知的社会了,我觉得实际上我是被抛弃,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了,我还带着一点孩子气的高傲这样想:我要做给阿列克谢依·尼可

[1] 一个亲戚:指阿列克谢依·彼得洛维奇·库钦(1808—1839年以后),枪骑兵军官,作者的外甥(作者堂姐娜·彼·库钦娜的儿子)。

拉叶维奇[1] 和他的同事们看，我是个什么样的人。

虽是这样，然而也可以想象到我在父亲家那种古怪的修道院生活里日子过得多么痛苦，多么单调。既没有鼓励，也没有消遣；我父亲溺爱我到十岁，现在他几乎总是对我不满意；我没有同伴，教师们来了又走了，我送走了他们，就偷偷地跑到院子里去同家仆的小孩们一起玩，这件事本来是严格禁止的。其余的时间里我就在那些白天不开窗、晚上灯光不亮的又大又暗的屋子里走来走去，什么事也不做，不管碰到什么东西就拿起来读。

门房[2] 和女仆房是给我唯一极大快乐的地方。在那里我感到毫无拘束，我参加他们的争论，袒护一方，反对另一方，同我的朋友们一起商谈他们的事情，提出我的意见，知道他们的一切秘密，这些门房里的秘密我从来没有在客厅里泄漏过一句。

在这个题目上我不能不停留一下。其实我完全不想避开离题的情节和插曲，——任何谈话都是这样进行的，生活本身也是这样。

儿童一般都喜欢仆人；父母却禁止他们同仆人接近，特别是在俄国；孩子们并不听父母的话，因为客厅里很无聊，而女仆房里却热闹。在这种场合和在其他千百种场合一样，父母就不知道他们在做些什么了。我绝不能够想象我们的门房比

① 这是巴赫美捷夫的名字和父名。

② 门房：男仆们住的房间。

我们的“茶室”或“休息室”对孩子们更有害。在门房里孩子们学到一些粗话和坏习气，这是真的；可是在客厅里他们学到粗暴的思想和恶劣的感情。

命令孩子们跟他们经常接触的人疏远，这个命令本身就是不道德的。

我们中间经常有人谈起仆人特别是农奴的极端的道德败坏。的确他们并不是品行端正的模范，他们精神上的堕落表现在他们过分忍受一切，他们极少愤怒，极少反抗。可是问题不在这里。我希望知道的是，——在俄国什么阶层比他们腐化少一些？是贵族呢还是官吏？也许是教士吧？

你们为什么笑呢？

也许只有农民们才有某些权利……①

贵族和家仆之间的差别是很小的。② 我不喜欢那些怀着恶意的宣传家对群众的假意奉承（尤其是在一八四八年的灾难③ 以后），可是我更加痛恨贵族们对人民的诬蔑。俄国的大地主们把仆人和奴隶描绘成淫荡的野兽，他们蒙住了别人的眼睛，也窒息了他们自己的良心。我们很少比下层阶级好，可是我们却把自己表现得更温和，我们会更巧妙地掩饰我们

---

① 这一句的原意大概是：“只有农民们才有权笑”，英译文作“也许只有农民们有权说他们不同……”。

② 原文下面还有半句：“就像他们的名称之间的差别那样。”（英译者没有译出。）因为“贵族”的原文是 дворянин（德沃利雅宁），家仆（或译“家奴”）的原文是 дворовый（德沃罗维依），念起来，声音相差不太大。

③ 灾难：指一八四八年法国资产阶级政府镇压巴黎工人六月革命的事。

的利己心和情欲；我们的欲望容易得到满足，我们平时又不用抑制它们，因此它们并不显得十分粗野，而且也不十分显眼；干脆地说，我们阔些，吃得饱些，因此我们也更会挑剔。阿勒马维华伯爵向塞维勒的理发师举出他要求他的仆人所应有的品德，那个时候费加罗叹口气说："照你们对仆人要求的品德，大人，您见过多少主人配当仆役的？"①

一般地说，俄国人的道德堕落并不深，与其说是深，倒不如说是更野蛮，更淫猥，更吵闹，更粗鲁，更乱，更无耻。教士关在家里，同商人们一起大吃大喝。贵族们当着人喝得大醉，毫无顾忌地拚命打牌，打他们的仆人，调戏他们的女仆，对自己的事情处理得很坏，处理家庭生活更坏。官员们也是一样，不过做得更肮脏些，再加上在上级跟前卑躬屈节，还偷点小东西。说到偷盗，贵族的确少犯偷盗罪，他们公开地把别人的东西据为己有，而且只要碰到机构，他们绝不松手。

这一切可爱的弱点在那些十四级以外的公务员② 身上，在那些不依存于沙皇而依存于地主的贵族的身上就表现得更加粗鲁。但是作为一个阶层他们比别的阶层又坏在哪里呢——我却不知道。

我回顾过去，不仅把我们家和枢密官家的家仆、而且也把

① 这句话见法国剧作家奥·博马舍(1732—1799)所作四幕喜剧《塞维勒的理发师》第一幕第二场。(引用吴达元的译文。)

② 彼得大帝一七二二年规定俄国文官官阶为十四级，十四级以外就不是政府的文职官员，因此英译者把"那些十四级以外的公务员"译作"那些在私人的和非政府的机构中工作的人"。

二十五年来和我们有密切往来的两三家人家的仆人的事情仔细地回想了一番，我想不起他们的行为中有什么特别不道德的坏事。也许有人说，小偷小摸……不过在这件事情上，概念被地位完全搅乱了，因此很难下断语：人一财产[①] 对自己的同类是不用讲礼貌的，那么他们对待老爷的财物就不必客气了。倘使我们把那些亲信、得宠的男女仆人、老爷的情妇、进谗挑拨的人除外，那就更公平了；然而首先他们这些人都是例外——这些马房里的克来英米赫尔们[②]，这些管地窖的卞肯多尔夫们[③]，这些穿粗布衣服的彼列库西希娜们[④]，这些赤足的庞帕杜尔们[⑤]；况且，他们的行为比所有其他的人都好些，他们只是在夜里才喝个痛快，又不把他们的衣服押在酒馆里面。

其余人的天真朴直的放荡也没有超出喝一杯烧酒和一瓶啤酒、愉快的聊天和抽一袋烟、不请假擅自外出、互相争吵有时吵到打起架来、对有些要他们做出不近人情的和不可能的事情的主人要点欺骗的花招等等的范围。不用说，一方面由

---

① 这是说，他们是人，却又被当作主人的财产。

② 彼·安·克来英米赫尔(1793—1869)：俄国反动政治家、尼古拉一世时期的交通大臣、尼古拉的亲信。

③ 亚·赫·卞肯多尔夫伯爵(1783—1844)：尼古拉一世军警专政制度的一个反动头子，一八二六年起任宪兵司令和第三厅厅长。

④ 玛·沙·彼列库西希娜(1739—1824)：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宫内女官和宠信。

⑤ 让·安·庞帕杜尔(1721—1764)：法国侯爵夫人、国王路易十五的情妇。以上四种人都是专制君主宠爱信任的人物。

于他们缺少任何教育,另一方面由于处在奴隶地位,缺少农民的憨直,他们的性格里就增加了不少古怪的、畸形的东西,然而他们像美国的黑人那样,有一半的孩子气:一点小事情就会使他们高兴,一点小事情也会使他们伤心;他们的欲望也很有限,这些欲望与其说是不道德的,倒不如说是天真的、合乎人情的。

烧酒和茶、小酒馆和小饭馆——这是俄国仆人两种经常的嗜好;为了它们的缘故他偷盗,为了它们的缘故他贫穷,为了它们的缘故他忍受迫害和惩罚,扔下家里人让他们无衣无食。像马修神甫那样从他那陶醉于戒酒主义的高度去谴责酗酒,[①] 坐在茶桌旁边,想不通为什么仆人要到小饭馆去喝茶,不肯在家里喝,尽管在家里喝便宜些,再没有比这个更轻易的事情了。

烧酒使人麻醉,使人能够忘掉自己,让人感到虚假的快乐,给人刺激;倘使一个人的智力发展较差而生活又更狭隘、空虚,那么这种麻醉和刺激就会使他更加感到愉快。一个仆人给注定永远待在门房里,处在永久的贫困中,当奴隶,让人买来卖去,他怎能不喝酒呢?他能够喝的时候,他就喝得很多,因为他不能每天喝酒;十五年前森科夫斯基[②] 在

① 西奥巴德·马修神甫(1790—1856):爱尔兰天主教神甫,一八三三年组织戒酒会,宣传戒酒,有"戒酒的使徒"之称。"陶醉于戒酒主义"是作者讽刺马修神甫活动的用语。

② 约瑟夫·伊凡诺维奇·森科夫斯基(1800—1858):原籍波兰,记者、反动的批评家和作家,他用的笔名是布拉姆别乌斯男爵。

《读者文库》[①] 中就讲到这个了。在意大利和法国南部并没有酒鬼,因为那里有很多酒。关于英国工人疯狂的酗酒,这样的解释也适用。这些人在对付饥饿和贫穷的毫无出路的和力量悬殊的斗争中给毁掉了;不管他们怎样艰苦地挣扎,他们到处都碰到铅皮的屋顶[②] 和无情的回击,把他们扔回到社会生活的阴暗的底层去,判决他们从事没有目的的终身劳役,这种劳役把他们在身心两方面都折磨得不成样子。一个人当了六天的杠杆、齿轮、弹簧、螺丝钉,到星期六晚上他粗野地挣脱了工厂劳动的苦役,在半个小时里面就喝醉了,尤其是因为他已经精疲力尽,支持不了多久。道德家们还是去喝自己的 Irish〔英语:爱尔兰的〕或者 Scotch whisky〔英语:苏格兰的威士忌酒〕、一声不响为好,否则他们那种惨无人道的慈善事业会给他们招来可怕的反应。

在小饭馆里喝茶对仆人来说有着不同的意义。在家里喝茶在他看来不像是喝茶;在家里什么都使他记起他是个仆人;在家里他是住在龌龊的下房里面,他得自己生茶炊[③];在家里他用的是断了把的茶杯,而且每时每刻老爷都会打铃叫他去。在小饭馆里他是个自由的人,他是一位顾客,人们为他铺好桌

① 《读者文库》:森科夫斯基编辑的一种"文学、科学、艺术、工业、新闻和时装杂志",在彼得堡出版,销行很广,由十九世纪三十到四十年代中大的出版家兼书商斯米尔津(1795—1857)发行。

② 这里可能指工厂厂房。英译文作"一面压迫的高墙"。

③ 茶炊:即沙莫瓦尔,俄国特有的一种铜制茶具,上面煮开水(泡茶用),下面生火,中间有一根烟囱。

布，为他点起灯；茶房为他端着托盘跑来跑去；茶杯发亮，茶壶闪光，他发命令，有人照他的话办，他很高兴，还愉快地叫一份压紧的黑鱼子或者露馅的馅饼来佐茶。

在这一切里面幼稚的天真朴直更多于道德堕落。印象总是很快就控制了他们，但是并不在他们心上生根；他们经常为一些偶然的事情、微小的欲望、毫不足道的小目的操心或者更可以说是分心。对一切怪异事物的幼稚信仰使一个成年男人变成了胆小鬼，这同样的幼稚信仰在最痛苦的时刻又给了他安慰。我见过两三个我父亲的仆人的死亡，我很感到惊奇：只有在这里才能谈到生命结束时的那种纯朴的心安理得；他们的良心清白，没有犯过大罪，万一有点什么，也已经在忏悔的时候同“好神甫”一起结束了。

儿童和仆人互相喜欢的感情就建立在他们之间的这种近似上面。小孩们痛恨成年人的贵族统治和那种垂青的、俯就的态度，因为他们聪明而且明白在成年人的眼里他们是小孩，而在仆人的眼里他们是人。因此他们不高兴同客人打纸牌、玩罗托①，倒更喜欢同女仆们玩这些。客人同他们玩这些是为了他们，由于迁就的原因，让让他们，作弄他们，只要不想玩，就放下它们走开了；女仆们玩这些，不仅是为了小孩，也同样为了自己；这样就使游戏本身有趣味了。

仆人们特别喜欢小孩，这并不是奴性的忠心，这是弱者和

---

① 罗托：一种游戏，从袋中取出有号码的牌子，放在本人手里纸板上相同的号码上，谁先摆满了纸板上的号码，谁就得胜。

普通人的互相喜爱。

古时候在地主和家仆之间常有一种宗法的、世袭的爱，这样的爱在土耳其现在还存在着。今天在俄国，再也没有忠于自己主人的家族和种族的忠心耿耿的仆人了。这是可以理解的。地主并不相信自己的权力是正当的，也不认为在可怕的最后审判日① 里他要对自己的仆人负责，他只是用他的权力来为他自己谋利益。仆人也不相信自己应当处于从属地位，他忍受暴力压制，并不认为这是上帝的惩罚、这是考验，——仅仅是因为他没有办法保护自己；俗话说得好：弱不敌强。

我还在年轻的时候就知道两三个那种奴隶制狂热拥护者的样本，八十高龄的地主们经常惋惜地谈起他们，讲他们小心勤劳的工作，讲他们耿耿的忠心，可是这些地主们就忘记讲自己的父辈和他们本人用了什么来酬劳仆人们的这种自我牺牲。

在枢密官的某一个田庄上有一个衰弱的老人安德列依·斯捷潘诺夫，他赋闲在家，就是说靠人养活。

枢密官和我父亲在禁卫军中服役的时候，他当过他们的随从，他是一个善良、诚实、滴酒不沾的人，根据他们自己的说法，他只要看少爷们的眼睛，就猜得出他们要什么，我以为这并不是容易的事。以后他在莫斯科近郊管理田地。一八一二年的战争开始，交通就完全切断了，他后来孤零零地待在那

① 最后审判日：根据耶稣教传说，这是上帝举行最后大审判、给所有恶人以永久惩罚的日子。

儿，没有钱，守着烧得精光的村子的瓦砾堆，为了不致于饿死，他卖了一点木料。枢密官回到俄国后，着手整顿自己的田产，知道了木料的事情。作为惩罚，枢密官撤销了他的职务，把他赶走了。老头子拖着一家人到处寄食。我们经常到安德列依·斯捷潘诺夫住的那个村子去住一天、两天。那个衰颓的老人得了瘫痪症，每次都支着拐杖来向我父亲问好，同我父亲谈话。

他谈话时那种忠诚和温顺的样子，他的愁苦的面容和他的秃顶两边灰黄色的发绺使我深受感动。

“老爷，听我说，”他有一回说道，“您哥哥又得到一枚勋章。尊敬的老爷，我上了年纪了，不久就要把灵魂交还给上帝了，可是天主不赐给我恩惠，让我看见您哥哥佩戴勋章，在我去世以前连一次也不给我看见他系上绶带、戴上全部的勋章！”

我望着这个老人：他的脸上现出非常孩子气的真诚表情，他那伛偻的身子，他那痛得变了样的面孔，他那黯然无光的眼睛和有气无力的声音——这一切都取得人们的信任；他不是在撒谎，他不是在奉承，他真的想望在死去之前看见那个为了他卖掉一点木料十五年来一直不肯宽恕他的人佩戴着“绶带和勋章”。这是一个圣人，还是一个疯子？是啊，也许只有疯子才做得到圣人吧？

新的一代人没有这种偶像崇拜，要是偶尔还有农奴不要自由，那不过是由于懒惰和物质上的考虑。这无疑地是更加堕落，不过这说明是接近结束了；倘使他们希望看见老爷的脖

子上挂着什么东西,那一定不会是符拉季米尔绶带[1]。

我在这里顺便讲一点我们的仆人一般的情况。

不论是枢密官,或者我父亲,他们都不曾特别压迫家仆,就是说,他们不曾在肉体上虐待他们。枢密官脾气暴躁,不耐烦,因此常常粗暴,不讲道理,然而他很少同家仆们接触,他很少注意过他们,他同他们几乎是彼此不认识。我的父亲却拿他那些任性的要求去折磨他们,不论是一瞥眼光、一句话、一个动作,他都不放过,老是不停地教训人;对俄国人来说,这常常比打骂更坏。

在我们家体罚差不多已经不用了,有两三回枢密官和我父亲使用了"警察所"的卑劣手段[2],这太不寻常了,因而所有的家仆都在谈论这件事,整整谈了几个月;而且这都是由于重大的过错引起的。

更常见的是家仆给送去当兵;这种惩罚是所有的年轻人都害怕的;他们虽然无亲无故,可是他们还是宁愿当家奴,觉得比作二十年苦工好些。这些可怕的场面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地主找来了两个警察兵,他们偷偷地、突如其来地和出其不意地抓住了那个指定的人;通常村长就在这个时候宣布老爷昨天晚上下了命令要把他送到征兵处去,本人忍住眼泪,装出不在乎的神气,妇女们却哭了起来,所有的人都送礼物给

① 符拉季米尔绶带:指悬挂符拉季米尔勋章的绶带。作者这句话的意思是:他们希望看见老爷脖子上挂的不是绶带,而是绞索一类的东西。

② 指帝俄大城市中每个警察区里的警察所,当时根据农奴的主人(地主)的要求,农奴在警察所里受到鞭打的刑罚。

他，我也送给他我能够拿出来的东西，那大概是一个二十戈比的钱，一条围巾之类。

我还记得我父亲因为某一个村长把他收到的代役金[①]花光了，下令剃掉他的胡子。我一点也不明白这算什么惩罚，可是这个六十岁老人的面容使我大吃一惊；他放声大哭，鞠躬到地，要求给他免去这个耻辱，他愿意退赔全部代役金，此外再缴纳一百卢布的罚款。

枢密官同我们住在一起的时候，全家的仆人一共有三十个男的和差不多同样数目的女的；然而结了婚的女人不做任何事，她们料理自己的家务；听候使唤的只有五、六个女仆和洗衣女人，她们从来不上楼。此外，还得加上男孩和女孩，他们正在养成当差的习惯，就是说，养成游手好闲、懒惰、撒谎、喝酒的习惯。

为了说明那个时候俄国生活的特点，我想，讲几句关于家仆生活费的话，也不是多余的。起初，每个家仆每月只得到五个纸卢布的伙食费，后来增加到六个。女人每月少一个卢布，小孩从十岁起拿成人的一半。仆人组织了“公会”[②]，他们并不抱怨收入不够，这说明当时吃的东西的确非常便宜。最高的工资是每年一百个纸卢布，另一些人只拿到这个数目的一半，有些人一年只拿到三十卢布。十八岁以下的男孩没有工

① 代役金：农奴向地主缴纳的代替劳役的钱。

② “公会”：原文是 артель，或译组合。这里指的是当时俄国农民中间，有一些人为了某种共同经济利益，或者为了从事一种共同的劳动组织起来的团体。这是一种为了在劳动或消费上合作互利的自由组织。

资。除了工资以外,对仆人还发给衣服、大衣、衬衫、床单、被子、毛巾、帆布床垫;不拿工资的男孩可以得到使他们精神和肉体干净的费用,那就是洗澡费和斋戒祈祷[1]费。把一切都算在内,一个仆人每年只花费大约三百纸卢布;要是再加上吃药、看病,还有偶尔从村子里运来的储存的食物,就是连这些费用都算上,也没有超过三百五十卢布。这同巴黎或者伦敦的仆人相比只值他们的四分之一。

俄国大地主通常还要计算奴隶制度的保险费,这就是由地主供养奴隶的妻子儿女,而且奴隶本人老年时候还可以在村子里某个地方得到一点点面包过日子。当然,这是应当算进去的;然而由于对体罚的恐惧、奴隶地位的不可能改变、供养的标准非常低等等——这种保险费就大大地减低了。

我看够了奴隶地位这种可怕的意识怎样摧残、怎样毒害着家仆们的生存,它怎样压迫、麻痹他们的心灵。农民,特别是缴纳代役金的农民,较少感觉到人身的不自由;他们多多少少可以不相信自己完全处在奴隶地位。可是那些从早到晚坐在门房里龌龊的长木板箱上面或者端着盘子站在饭桌旁边的家仆们,他们却没有疑惑的余地。

不用说,也有一些人,他们住在门房里就像鱼在水里一样,他们的心灵从来不曾觉醒,他们对自己的生活方式已经有了嗜好,履行他们的职务时也感到津津有味。

[1] 斋戒祈祷:指耶稣复活节(三月二十一日或这天以后,月圆以后第一个星期天)前的斋戒祈祷。

关于这类人，我们家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就是我们的老听差巴卡依。这个人有大力士一般的体格、高高的身材、相貌堂堂，带着一副深思远虑的神态，他活得很久，他始终认为听差的地位是极其重要的。

这个可敬的老人经常发脾气，不然就是喝醉了，或者同时又发脾气又喝醉。他总是把他的职责看得高，而且给它加上一种庄严的重要性；他做出特别的声音和响动掀起马车的踏蹬，像开枪一样砰的一声关上车门。他绷着脸、笔直地站在马车后面的足蹬上，每一次车轮越过辙窝发生颠簸的时候，他就发出他那低沉的、不高兴的声音对马车夫吆喝："稳一些！"并不管辙窝已经在后面五步远了。

他除了跟车出去以外，还有一个重要职务（这个职务是他自愿担任的），就是教家仆的男孩们学习贵族的仆人礼节。他清醒的时候，倒没有什么问题，可是他喝了酒，脑子糊涂起来，他就挑剔、苛求、专制、横暴到了叫人不能相信的程度。我有时候出来替我的朋友们打抱不平，然而我的威信对巴卡依的那种罗马人严厉的性格影响不大；他会给我打开通客厅的门，说：

"这儿没有您待的地方，请出去，不然我就把您拖出去。"

他从来不放过任何责骂那些男孩的机会，不管是一个动作也好，一句话也好，他不但骂，而且经常拳打，或者"挖油"，那就是用他的大拇指和小指头巧妙地、熟练地像弹簧一样地弹他们的脑袋。

后来他把男孩们都赶了出去，只剩下他一个人的时候，他就虐待他那个唯一的朋友麦克佩斯、一条大的纽芬兰种公狗，

这条狗是他养的，他喜欢的，他给它刷毛，他细心地照料它。他在屋子里单独地坐了两三分钟，就到院子里去唤着麦克佩斯跟他一起坐到长木板箱上；他就对狗谈起话来：

“笨蛋，暖和的屋子你不待，你干吗坐在院子里挨冻？真是个畜生！你瞪着眼干吗——嗯？你没有话回答我吗？”

他说了这些话，经常接着就是一记耳光。麦克佩斯有时候也会对它的恩人做出要咬的样子；那个时候巴卡依就会无情地、毫不让步地痛骂它。

“可不是，你喂狗吧——喂来喂去，还是一条狗；它向你龇牙咧嘴，也不想想你是谁。……要是没有我，跳蚤早就把它吃掉了！”

他的朋友的忘恩负义使他感到委屈，他气愤地闻了一撮鼻烟，把留在手指头的一点点烟扔到麦克佩斯的鼻子上去；狗就打起喷嚏来，很狼狈地用爪子从眼睛上刷掉鼻子上的鼻烟，十分不高兴地离开了长木板箱跑去抓门；巴卡依骂了一声：“坏蛋！”就给它开了门，一足踢了它出去。通常在这个时候男孩们就回来了，于是他又弹起他们的脑袋来。

在麦克佩斯之前我们有一条猎狗叫做别尔塔；这条母狗病得厉害，巴卡依带着它睡在他的褥子上，照料它两三个星期。有一天大清早我到了门房里。巴卡依想对我讲什么话，可是他的声音变了，一滴大的泪珠滚下脸颊来，——狗死了。这是又一件事实可以供研究人心的人参考。我绝不以为他恨那些男孩；这是由于他那冷酷性格，这种性格给酒加强了，而且不知不觉地受了门房里气氛的影响。

可是除了这些奴隶制爱好者以外，还有多少不幸的人和毫无指望的受苦受难人的愁容经常悲惨地闪现在我的记忆里。

枢密官有一个厨子，他有特殊的才能，勤劳而头脑清醒，他在工作上一帆风顺。枢密官亲自设法让他到御厨房去学习，那里有一位著名的法国厨师。他在御厨房学成出来以后，在英国俱乐部工作，积了钱，结了婚，过着老爷一样的生活；然而奴隶身份的绳索使他夜里也睡不安稳，他的地位使他很不开心。

在伊威尔圣母大教堂做完祈祷以后，阿列克谢依鼓起勇气去见枢密官，要求准许他缴纳五千纸卢布，赎回他的自由。枢密官一向以他的厨子自豪，就像他以他的画家自豪那样，因此他不肯收钱，他对厨子说在主人死后，不用花钱便可以得到自由。

对厨子来说，这真是一个晴天霹雳；他心里不痛快，变瘦了，头发也灰白了，而且……他是一个俄国人，就喝起酒来。他不好好地干活，英国俱乐部把他辞退了。他给介绍到特鲁别茨卡雅公爵夫人家里工作，公爵夫人吝啬得要命，老是同他斤斤计较。有一回她过分地委屈了阿列克谢依，他平素喜欢表现自己的口才，就做出他那庄严的神气，带着他的鼻音说：

“您的光辉的身体里有一个多么阴暗的灵魂！”

公爵夫人气坏了，赶走了厨子，而且像一般俄国贵妇人那样，给枢密官写了一封抱怨的信。枢密官本来不必理睬，可是他为了顾全绅士的礼貌，就把厨子叫了来痛骂一顿，命令他到公爵夫人那里去求她饶恕。

厨子并没有到公爵夫人那里去，他到小酒馆去了。一年中间他把什么都花光了：从他积蓄起来作赎金的那笔款子到他的最后一条围裙。他的妻子同他一起挣扎着，挣扎着，以后她也走了，到什么地方作保姆去了。我们好久没有听到他的消息。后来警察把阿列克谢依带来了，穿得破破烂烂，像个野人似的；他们在街上找到他，他没有住处，从一个小酒馆出来，又去另一个小酒馆，就这样地流浪着。警察要求主人收容他。枢密官也难过，也许还感到惭愧；他收容了他，对他相当和善，给了他一间屋子。阿列克谢依继续喝酒，他喝醉了就吵吵闹闹，以为自己在做诗；他的确不缺少某种杂乱的幻想。我们当时在瓦西里叶夫斯柯耶村。枢密官不知道该怎样对待厨子，就把他送到我们这里来，以为我的父亲可以劝好他。可是这个人已经完全毁掉了。在他的身上我看到农奴心上那种日积月累的对主人的愤怒和仇恨：他讲起话来就咬牙切齿，脸上带着表情，这种表情特别在厨子身上可能是危险的。他在我面前讲话毫无顾忌；他喜欢我，他常常亲切地拍拍我的肩膀，说：

"一棵烂树的好枝子。"

枢密官死后，我父亲立刻给他自由；这太迟了，这不过是把他甩开罢了；他就这样地完了。

除了他，我还不能不回想起农奴制度的另一个受害者。枢密官还有一个三十五岁上下的家仆，在他身边担任办事员一类的职务。我父亲的大哥[①]（死于一八一三年）本来打算

① 父亲的大哥：指作者的大伯父，即彼·阿·雅科甫列夫。

创办一所乡村医院，在他还是小孩的时候就把他送到一位有名的医生那里让他学点医术。那位医生还替他请求得到在内外科医学院听讲的许可；这个年轻人有才能，他学会了拉丁文和德文，也会治一点病。他二十五岁的时候爱上了一个军官的女儿，隐瞒着自己的身份同她结了婚。欺骗不能够长久继续下去，在他的主人去世以后，他的妻子惊恐地知道了他们原来是农奴。他的新主人枢密官一点没有歧视他们，他甚至喜欢年轻的托洛恰诺夫，可是他同他妻子一直不断地吵架；她不能原谅他欺骗她的行为，她终于同另一个男人跑掉了。托洛恰诺夫一定很爱她，他从这个时候起就陷入一种接近精神失常的悒郁，整夜整夜地喝酒，自己的钱光了，就花主人的钱；他看出来没有办法应付下去的时候，就在一八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服毒自杀。

枢密官那天不在家；托洛恰诺夫来看我父亲，当着我的面对我父亲说他来向他告别，请他转告枢密官，缺少的钱都是他花掉的。

"你喝醉了，"我父亲说，"你去吧，好好地睡一觉。"

"我马上就要去长睡了，"医生说，"我只是求您不要记住我的坏处。"

托洛恰诺夫的泰然自若的表情使我父亲感到吃惊，我父亲注意地望着他，问道：

"你怎么啦，你在说胡话吗？"

"没有什么，老爷，我不过喝了一小杯砒霜。"

找来了医生，找来了警察，给他服催吐剂，给他喝牛

奶。……他开始要呕吐的时候，他极力忍住，他说：

"待着，待在那儿，我吞下你，并不是为了要吐出来。"

后来毒性发作得更加厉害的时候，我听见他的呻唤和痛苦的叫声，他反复地嚷：

"烧！烧！火！"

有人劝他请一个教士来，他不肯，他对卡洛说，人死后不可能再有生命，他很懂解剖学。夜里十二点钟光景，他用德国话问那个一等军医，几点钟了，然后他说："现在是新年了，祝贺您，"——就死了。

早晨我跑到那间当作浴室用的小小侧屋里去，——托洛恰诺夫停在那里；他的身体躺在桌子上，还是他临死时那个样子：穿着燕尾服，没有打领带，胸口敞开；他的面貌完全变了样，而且已经变黑了。这是我见到的头一具死尸；我走开了，差一点晕倒。我在新年里得到的礼物，那些玩具和图画并没有使我高兴；脸变黑了的托洛恰诺夫在我的眼前晃来晃去，我一直听见他的声音："烧！火！"

我只再讲一件事情来结束这个悲痛的题目：门房的确没有在我身上留下坏的影响。正相反，在我的早年它就培养了我对一切奴隶制度和一切专制的制止不了的憎恨。我还是小孩的时候，韦拉·阿尔塔莫诺夫娜因为我淘气狠狠地刺我一下，就说："等着吧——您长大起来，就会跟别的老爷一样。"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侮辱。老妈妈可以满意了：至少我并没有跟别的老爷一样。

除了门房和女仆房以外，我还有一个消遣的地方，在那里

我至少不会遇到干扰。我喜欢看书就像我不喜欢上课那样。我非常喜欢没有系统地看书，这种爱好一般说来，是对于认真研究的一个重要障碍。譬如，我当时和后来都很讨厌语言的理论研究，可是我很快就学会对这些语言的大致理解和勉强讲话，而且停留在这个阶段上，因为用来看书这就够了。

我父亲和枢密官两人当时共有一个相当丰富的图书室，收藏着不少上个世纪的法文书。书堆在楼下一间没有人住的潮湿的屋子里。钥匙在卡洛那里。我可以在这个文学仓库里随意翻来翻去，我看书看得很痛快。我父亲认为我这样做有两个好处：第一，我学法文会学得更快，其次是，我有事情做，这就是说，我会安安静静地坐着，而且在自己的房间里。我并不让他看见所有我看的书，也不把书放在桌子上，——有些书给藏在衣橱里面。

我看什么书呢？不用说是长篇小说和喜剧。我看了五十册法国《戏剧节目》[1] 和俄国《戏剧》[2]；每一卷有三个或者四个剧本。除了法国长篇小说，我母亲还有拉封登[3] 的小说和科采布[4] 的喜剧，——我也把它们看了两三遍。我不能说长

---

[1] 《戏剧节目》：指《法国戏剧节目》，六十八卷，法文原版，一八二三至一八二九年出版。

[2] 《戏剧》：指《俄国戏剧》，或《全俄戏剧创作全集》，四十三卷，一七八六至一七九四年出版。

[3] 奥·拉封登（1756—1831）：德国感伤主义的小说家。

[4] 奥·科采布（1761—1819）：德国反动作家。

篇小说对我有多大的影响；虽然我也像所有的男孩那样，对书中一切暧昧的或者有点欠妥当的场面都不肯放过，但是它们并不使我特别感到兴趣。给我的影响大得多的一个剧本是《费加罗的婚姻》[①] ——这个戏我爱得神魂颠倒，反复看了二十遍，不过我看的是《戏剧》中的俄文译本。我爱上了薛侣班和伯爵夫人[②]，而且我自己就是薛侣班；我看书的时候我的心好像停止跳动了，而且我感到一种新的感觉，自己却完全没有意识到。那个侍从武士改扮女装的场面多么令人陶醉，我真想把谁的丝带藏在我的怀里，偷偷地吻它。事实上在我那样的年岁，我完全没有同女性交际过。

我只记得偶尔在星期天巴〔赫美捷夫〕的两个在女子寄宿中学校念书的女儿来我们家作客。小的一个只有十六岁，长得非常漂亮。她走进房里来我就局促不安，从来不敢对她讲话，只是暗中不断地看她那双非常好看的深色眼睛，看她那一头深色的鬈发。我从来不曾向人提过这件事，这一点最初的恋爱气息没有让任何人看出来就过去了；连她本人也不曾觉察到。

好些年以后我同她见面，我的心还是跳得厉害，我记得我

---

① 《费加罗的婚姻》，又名《狂欢的一日》：法国剧作家博马舍创作的五幕喜剧，是《塞维勒的理发师》的续篇，后来由奥国音乐家沃·阿·莫扎特(1756—1791)改编为歌剧。

② 伯爵夫人和薛侣班都是《费加罗的婚姻》中的人物。伯爵夫人就是阿勒马维华伯爵的妻子，薛侣班是他的侍从武士。薛侣班拿了伯爵夫人的丝带藏在身上。在第四幕中薛侣班打扮作女孩子。

十二岁的时候多么爱慕她的美丽。

我忘记说,《维特》[1] 和《费加罗的婚姻》同样地打动我的心;这本小说有一半我看不懂,就连忙翻过去,急于想看那个可怕的收场[2],它叫我哭得像一个疯人似的。一八三九年《维特》又偶然落到我的手里来了;当时我在弗拉基米尔[3];我告诉我的妻子[4],我还是小孩的时候就为这本小说哭过,我把书中最后的几封信读给她听。……我读到那个地方,我的眼泪又夺眶而出,我不得不停了下来。

在我十四岁以前,我不能说我父亲特别限制我的自由,可是我们家的整个气氛使一个活泼的男孩感到受压制。对我的身体健康固执地和不必要地关心而同时对我精神上的需要却丝毫不注意,这是非常讨厌的。提防着感冒,提防着不消化的食物,有一点伤风咳嗽,就很紧张。冬天我一连几个星期待在家里,到了准许我出门的时候,又得穿上暖和的高统靴,裹上围巾之类的东西。在家里火炉经常热得叫人受不了。要不是我从我母亲那里继承了钢铁般的健壮身体,这一切就会使我成为瘦弱的、娇生惯养的孩子。我母亲丝毫没有我父亲的那种偏见,在她住的那一半宅子里,她允许我做在我父亲的那一

---

① 《维特》:即德国诗人和作家歌德的中篇小说《青年维特的痛苦》(有郭沫若的中译本《少年维特之烦恼》)。

② 指小说结尾维特的自杀和他的绝命书。

③ 弗拉基米尔:俄罗斯古城,作者在流放期间在这里待过。

④ 一八三八年五月作者在弗拉基米尔同他的堂妹娜·亚·扎哈利娜结婚。

半宅子里禁止做的任何事情。

在没有竞赛、没有鼓励、没有称赞的情况下，我的教育收效很差；没有系统，又没有监督，我做功课很不起劲，我还以为靠记忆力和生动灵活的想象就可以代替用功。不用说，对家庭教师们也同样没有人过问；薪金谈妥以后，只要他们按时上班，坐完这一段时间，——他们可以一连教几年，不必向任何人报告他们教学的成绩。

我当时的教育上一个最古怪的插曲就是聘请法国演员达勒斯来教我朗诵课。

"现在没有人注意这个了，"我父亲对我说，"然而我哥哥亚历山大[①] ——他一连六个月每天晚上跟奥弗列纳[②] 一块儿读 le récit de Théramène〔法语：特拉美纳的故事〕[③]，可是总不能达到奥弗列纳所想望的那样完美。"

所以我就开始学习朗诵了。

"那怎么样，monsieur Dalès〔法语：达勒斯先生〕，"我父亲有一次问他道，"我想您可以教他上点跳舞课吧？"

达勒斯是一个六十开外的胖老头子，他做出完全了解自己长处、也完全了解谦虚礼貌的样子回答说他"不能判断自己

---

① 亚历山大：作者的伯父，娜·亚·扎哈利娜的父亲，也就是本书第一章里提到的"兄长"。

② 奥弗列纳：原名让·利瓦尔(1720—1806)，法国演员，一七八五年移居俄国。

③ 见法国剧作家让·巴·拉辛(1639—1699)创作的五幕悲剧(诗剧)《费德尔》第五幕第六场特拉美纳同雅典王特塞的对话。

的才能，不过自己经常给 au Grand Opéra〔法语：大歌剧院的〕芭蕾舞出主意。”

“我就是这样想的，”我父亲说，他把他那开着的鼻烟壶递给达勒斯，他对俄国的或者德国的家庭教师从来没有这样做过，“我很想您能够 le dégourdir un peu〔法语：使他活跃些〕，在朗诵以后，稍微跳跳舞。”

“Monsieur le comte peut disposer de moi.〔法语：伯爵先生可以调度我。〕”

我父亲非常喜欢巴黎，开始回忆起一八一〇年歌剧院的休息室、乔治[①] 的青年时期和玛尔斯[②] 的晚年来，他还问起咖啡馆和戏院的情况。

现在请设想一下我那间小小的屋子，一个凄凉的冬天晚上，窗户冻上了，水沿着绳子从窗上流下来，桌子上有两支脂油蜡烛，我们两个人 tête-a-tête〔法语：对坐谈心〕。达勒斯在舞台上讲话还是相当自然的，可是在教课中他却认为朗诵的时候不宜于自然。他读拉辛的剧本用唱歌一般的腔调，而且在每一行诗停顿的时候来一个分开，就像英国人在后脑勺梳的分头那样，因此每行诗看起来都像一根折断了的手杖。

同时他挥舞着手，好像一个掉在水里而又不会游泳的人

① 乔治：本名玛格丽特·约瑟芬·文美尔(1787—1867)，法国女演员，擅长表演古典悲剧。

② 玛尔斯：本名安娜·布杰(1779—1847)，法国女演员，擅长表演法国喜剧作家莫里哀(1622—1673)的喜剧。

那样。每一行诗他都叫我重读几遍，并且他总是摇头。

“不对，完全不对！ Attention！〔法语：注意！〕‘Je crains Dieu, cher Abner〔法语：我害怕上帝，亲爱的阿布奈尔〕，’①”于是来一个分开，这个时候他闭上眼睛，微微摇着头，用他的手轻轻地推开波浪，接着念下去：“et n'ai point d'autre crainte.〔法语：别的什么我都不怕。〕”②

随后，这个“除了上帝，什么也不怕的”小老头儿看了看表，合上书，推了一把椅子到我面前：这就是我的舞伴。

在这种情况下面，我从来不会跳舞，这是不足为奇的。

这样的教课并没有继续多久，大约两个星期以后就很悲惨地停止了。

我同枢密官一起去看法国戏；序曲已经奏过了一遍、两遍——幕还是没有升起；前座的观众想表示懂得他们的巴黎规矩，就像巴黎的后座观众那样叫嚷起来了。一位导演走到幕前面来，向右面鞠一个躬，向左面鞠一个躬，又向正前面鞠一个躬，说：

“我们请求观众们原谅；我们遭到了可怕的不幸事故：我们的同事达勒斯，”导演的声音的确让眼泪打断了，——“在他的屋子里由于煤气中毒逝世了。”

---

① 见拉辛的五幕悲剧《阿黛莉》，这是该剧第一幕第一场中大僧正约德对阿布奈尔讲的话，达勒斯把一行诗“分开”了。

② 同上注。

俄国炉子的煤烟就用这样残暴的手段给我免除了朗诵、独白和同我那个有着四只脚的红木女舞伴的单人跳舞了。

在我十二岁的时候，照料我的事就从女人的手移到男人的手里了。大约在那个时候，我父亲两次请了德国人来照管我，可是这两次尝试都不成功。

照管小孩的德国人——不是家庭教师，也不是照看小孩的老家人；这是一种完全特殊的职业。他不教小孩念书，也不给他们穿衣服，可是他监督别人教小孩念书、给小孩穿衣服，他关心小孩的健康，带小孩出去散步，对小孩谈什么废话都行，只要是讲德国话。要是家里有一个家庭教师，德国人就听他的话；要是有一个带小孩的老家人，他就得听德国人的话。那些持证签到的教师常常由于意外的原因迟到和由于他们自己无法控制的情况早退，就要讨好德国人，他尽管一窍不通，却也开始把自己看成一个有学问的人了。女家庭教师使用德国人替她们买东西、办各种各样的事，可是只有在她们找不到别的崇拜者或者她们实在生得难看的场合，她们才允许他向她们献殷勤。十四岁的学生瞒着父母到德国人的屋子里抽烟，他容忍了这种事情，因为他不得不想尽方法留在这个家里。的确，大半在这个时候，照管小孩的德国人会受到主人感谢，收到主人赠送的表，然后给辞退了；要是他不耐烦带着小孩逛街，和因为小孩伤风感冒或者弄脏衣服受到申斥，那么，照管小孩的德国人就变成了单纯的德国人，开一个小店卖给他从前的学生琥珀烟嘴、花露水、雪茄烟，还替他们办其他秘

密的事情。①

第一个照管我的德国人是西里西亚② 人，姓约基席；据我看，根据他这个姓就有充分理由不该找他来。他个子高高，是一个秃头，他有一个特点，就是极不爱干净；他经常吹嘘他的农业知识，我想我父亲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找他来的。我非常厌恶地看待这个西里西亚的巨人，只有一件事我容忍了他，那就是我们到杰维奇草地和普列斯年斯基水池散步的时候，他经常对我讲一些猥亵的故事，这些故事我都在门房里重复讲过了。他至多待了一年；他在村子里干了什么丑事，园丁要用大镰刀杀死他，我父亲便叫他滚蛋了。

在他之后来了一个布伦瑞克—沃尔芬比特尔③ 的大兵（也许是逃兵），他名叫费多尔·卡尔洛维奇，他的特点是写得一笔好字和过分的愚蠢。他先前已经在两家人家照管过小孩，有了一点经验，就是说，有家庭教师的气派；而且他讲法国话总是把重音念错。④

我对他毫不尊敬，我使他在这里的每时每刻都过得不愉

① 在《一个年轻人的笔记》中讲到的风琴手和音乐教师伊·艾克〔一〕只是教音乐课，没有什么影响。——作者原注

〔一〕伊凡·伊凡诺维奇·艾克（1758—1827）：他在作者少年时期当过作者的音乐教师。《一个年轻人的笔记》是作者早年的著作。

② 西里西亚：在东欧，当时是普鲁士的一省。

③ 布伦瑞克：在德国中部。布伦瑞克公国的公爵住在沃尔芬比特尔。一八〇七至一八一三年布伦瑞克公国曾合并到威斯特伐利亚。

④ 英国人说法国话比德国人还差，但英国人只是歪曲了语言，德国人使它变成下流的东西。——作者原注

快，特别是在我相信不管我怎样花费力气，也无法使他懂得数学上的小数和比例的运算法则以后。一般地说男孩的心里有很多无情的甚至残忍的东西；我恶狠狠地拿比例的问题来折磨这个可怜的沃尔芬比特尔的猎兵；我对这件事很感兴趣，虽然我平时很少有机会同我父亲谈论这种事情，这次却扬扬得意地对他讲述了费多尔·卡尔洛维奇的愚蠢。

费多尔·卡尔洛维奇还向我吹嘘他有一件新的燕尾服，深蓝色的，有金钮扣，我的确看见他有一次出去参加什么人的婚礼，穿了一件燕尾服，这件衣服他穿起来显得宽大，不过有金钮扣。那个伺候他的男孩告诉我说，这件衣服是他向一个在化妆品店当店员的朋友借来的。我毫无同情地逼着这个可怜人，要他讲：蓝色燕尾服在哪里？——我总是这样逼他。

"您家里蛾子很多，我把它寄放在一个相识的裁缝那儿，让他保管。"

"这个裁缝住在哪儿？"

"您要知道干吗？"

"为什么不告诉我？"

"您不用管别人的事情。"

"好啦，就算这样吧，可是过一个星期就是我的命名日，——您就让我高兴吧，请您在那一天从裁缝那儿把燕尾服拿回来。"

"不，我不拿，您不配，因为您'伊姆彼尔季年特'①。"

---

① 费多尔用德国口音讲了一个法国字 impertinent，意思是：顽固，没有礼貌。

我用手指指着吓唬他。

费多尔·卡尔洛维奇最后一次的碰壁，就是他有一回在我的法国教师布肖的面前吹嘘他当过兵，参加过滑铁卢[①]的会战，还说德国人狠狠地揍了法国人。布肖只是看着他，带着吓人的样子闻了一撮鼻烟，使得这个打败了拿破仑的人感到有些狼狈。布肖生气地拄着那根多瘢节的手杖走了，以后讲到他从来不提他的姓名，只说“le soldat de Vilain-ton〔法语：惠兰吞的兵〕”。[②] 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个双关俏皮话是从贝朗瑞[③]那里来的，我非常喜欢布肖的巧思。

末了这个布吕赫尔[④]的战友同我的父亲大吵了一场，离开了我们家；这以后我父亲就不再拿德国人来折磨我了。

我们这位布伦瑞克—沃尔芬比特尔的大兵还没有撤退的时候，他有一个朋友也担任“德国人”的职务，我有时就去看他所照管的那些男孩，和他们一起到远处游逛；他走了以后，又剩下我孤零零一个人了——我感到无聊，想摆脱孤寂，可是找

---

① 滑铁卢：比利时的一个村子，在首都布鲁塞尔以南，一八一五年六月十八日拿破仑军队在滑铁卢会战中被英荷联军和普鲁士军队打败，受到了致命的打击。

② 这是一句双关俏皮话，表面上是说“惠灵吞的兵”，照法语读音把“惠灵吞”这个姓读成“惠兰吞”，“惠兰吞”的意思是“下流人”。阿·惠灵吞（1769—1852），英国的公爵，滑铁卢会战中他是英荷联军的指挥官，一八二八至一八三〇年任英国首相。

③ 比尔·让·德·贝朗瑞（1780—1857）：法国诗人。他在《一个姑娘的诉苦》一诗中讽刺地把“惠灵吞”称为“惠兰吞”。

④ 盖·勒·布吕赫尔（1742—1819）：普鲁士的元帅，参加了反对拿破仑的战争和滑铁卢的会战。

不到方法。我不能够改变我父亲的意志，倘使不是在这以后不久一种新的精神的活动和两次的会晤挽救了我(我在下一章里讲到它们)，我也许就会在这样的生活中给毁掉了。我相信我父亲一点也不会想到他强迫我过着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否则他不会拒绝我那些最天真的愿望，不会不答应我那些最自然的要求了。

有时候他也允许我同枢密官一起去看法国戏，这对我来说是很高的享受；我非常爱看演戏，不过这种娱乐带给我的乐趣同痛苦一样多。枢密官带着我赶到戏园子老是在戏演了一半的时候，而且晚上总是有人邀请他，不等戏散场他就把我拖走了。戏园子在阿尔巴特门、阿普拉克辛的公馆，我们住在旧马房街，就是说隔得很近，可是我父亲绝不许我离开枢密官一个人回家。

在我十五岁的光景，我父亲按照上大学的需要，聘请了一个教士[1] 来给我上神学课。我拿到《教义问答》[2]，是在读过伏尔泰[3] 以后。没有一个地方像俄国这样宗教在教育事业上起的作用是那么微小，这不用说是很大的幸运。担任神学课的教士通常只拿一半的薪金，倘使这个教士还教拉丁文，那

---

① 教士：指瓦·瓦·包戈列波夫，作者少年时期的宗教课程的教师。

② 《教义问答》：指根据莫斯科总主教菲拉列特的《东方希腊—俄罗斯教会基督教教义问答》编辑的教义问答课本，全名是《基督教教义入门或圣徒略传与教义问答浅说》。

③ 弗·马·伏尔泰(1694—1778)：法国作家和哲学家，资产阶级的启蒙学者。

么他的薪金就比教《教义问答》多。

我父亲把宗教看做一个有教养的人所不可缺少的东西；他经常说应当毫无异议地相信圣经，因为在这个领域里理性是没有用的，自作聪明只会把问题弄糊涂；他又说应当遵守自己在其中诞生的那个宗教的仪式，不过也不要过分虔敬，对老太婆来说过分虔敬是可以的，对男人就有失体统了。他自己信教吗？据我猜想，他有一点点相信，这是由于习惯，由于礼貌，出于他想保护自己以防万一。然而他自己从不遵守教会的戒律，他拿身体不好作为借口。他几乎从不接待教士，至多就是把教士请来在一间没有人的客厅里唱唱圣诗，然后就在那里送他五个卢布的钞票打发他走了。冬天他借口说教士和教堂执事随身带来大量的寒气，使他老是感冒。在乡下他却到礼拜堂去，也在家接待教士，但这并非出于敬畏上帝，倒不如说是出于世俗的、实际方面的考虑。

我母亲是一个路德派[①] 教徒，因此她比一般的信教又高了些；她每个月总有一两个星期天坐车到她的礼拜堂去，或者照巴卡依顽固的说法："到她的基尔黑[②] 去"，我在家无事可做，便同她一起去了。在那里我学会了摹仿德国的新教牧师，摹仿他们的朗诵和长篇空话像得不得了，——这个本领我成年以后仍然保留着。

---

① 路德派：基督教新教的一派，创始人是德国宗教改革的社会活动家马丁·路德（1483—1540）。

② 基尔黑：即德语 kirche（礼拜堂），巴卡依用俄国口音讲德语，讲成了这样。

每年我父亲都命令我斋戒祈祷。我害怕作忏悔，而且总的说来，礼拜堂的 mise en scène〔法语：演出〕使我惊奇，使我畏惧；我怀着真正的恐惧走去受圣餐；可是我并不把这个叫做宗教的感情，这种恐惧是由一切不可了解的、神秘的事物来的，特别是在这种事物给加上了重大、庄严的意义的时候；念咒和算命对我也有这样的作用。我在复活节的晨祷以后开斋，吃过了染红的蛋、过节的甜奶渣糕和圆柱形甜面包，这一整年我就不再想到宗教了。

然而我经常读福音书[①]，也喜欢读，读的是斯拉夫文本和路德翻译的德文本。我读的时候没有得到任何的指导，也不是完全了解，可是对我读的那些内容我却感觉到一种真正的、深切的敬意。在我很年轻的时候，我常常醉心于伏尔泰主义[②]，喜欢讽刺和嘲笑，但是我不记得什么时候我拿起福音书来有过冷淡的感觉；我一生都是这样；我在任何年岁，在不同的情况下面，重新阅读福音书，每一次它的内容都给我的心灵带来和平与宁静。

那个教士给我上课的时候，他惊奇地看出我不单是对福音书有一般的知识，而且我还可以一字不差地引用原文；他说："可是主上帝虽然开了他的智慧，却还没有打开他的心。"我这位神学教师耸了耸肩膀，对我的"两面性"感到惊讶，不过

① 福音书：即《新约全书》中《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等四篇。

② 伏尔泰主义：这个字眼是根据"伏尔泰"这个姓来的，十八世纪后半期和十九世纪初期对进步的特别是反宗教的社会政治思潮和观点所用的称呼。

他倒满意我，以为我可以通过捷尔诺夫斯基[1]的考试了。

不久另一种宗教就占据了我的心灵。

---

① 彼·玛·捷尔诺夫斯基神甫(1798—1874)：一八二七年起任莫斯科大学神学教授。

第 三 章

亚历山大一世逝世和十二月十四日——精神的觉醒
——恐怖主义者布肖——柯尔切瓦的"表姐"

一个冬天的早晨,[1] 枢密官不知为什么不是按照他往常来的时间到了我们家里;他带着焦急的神情,匆匆忙忙地走进我父亲的书房,就锁上房门,做个手势叫我待在客厅里面。

幸而我不用花费多长的时间绞尽脑汁去猜想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门房的门开了一点,一张一半藏在制服皮外套的狼皮里的红脸小声招呼我;这是枢密官的听差。我连忙跑到门那里。

"您没有听见吗?"他问。

"什么事?"

"皇上在塔甘罗格[2] 逝世了。"

这个消息使我震惊;我以前从未想到他会死去;我是在

① 指一八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② 塔甘罗格:俄国的一个城市,亚速海的港口。亚历山大一世一八二五年十一月十九日死在塔甘罗格。

对亚历山大怀着大的敬意的环境中长大的,我忧郁地回想起我不久以前在莫斯科看见他的情景。我们出去散步,在特威尔门外面遇见他,他静静地骑在马上,和两三个将军同行,他是在霍登广场参加了检阅仪式以后回来的。①他的面貌和蔼,有一张温和的圆圆脸,带着疲倦和忧郁的表情。等他到了同我们并排的时候,我脱下帽子,举起来;他含笑向我点点头。这和尼古拉比起来有多么大的差别,尼古拉始终像是一个剪了发的、稍微秃顶的、留小胡子的米杜萨②!不论是在街上,在宫里,同他的儿女和大臣们在一起,同侍从和女官们在一起,他总是不停地试验他的眼光有没有响尾蛇的性能——使血管里的血凝结起来。③倘使亚历山大外貌的温和是假装的,那么这种伪善也比赤裸裸的横暴无耻的专制

---

① 作者遇见亚历山大一世,是在一八二三年八月,作者当时十一岁。亚历山大一世在霍登广场检阅的日期是八月三十日。

② 米杜萨:希腊神话中三个蛇发女怪("戈尔贡")中的一个;谁要是看到她的脑袋,马上就变成石头。

③ 流传过这样的故事:有一次尼古拉在他自己的家里,当着两三个秘密警察的头子、两三个御前女官和侍从将军,试着用他那米杜萨的眼光看他的女儿玛利雅·尼古拉叶夫娜。她像她的父亲,她的眼光的确和他那可怕的眼光一样。女儿勇敢地对抗父亲的注视。他的脸发白,他的脸颊哆嗦起来,眼睛变得更加凶恶;女儿也用同样的眼光回答他。所有在场的人都变了脸色,浑身发抖;御前女官和侍从将军们让这种像拜伦在《唐·璜》〔一〕中所描写的同类相食的、沙皇的斗眼吓得连气也不敢出。尼古拉站了起来,——他觉得镰刀碰到石头上了。——作者原注

〔一〕《唐·璜》:英国诗人乔治·戈登·拜伦(1788—1824)的讽刺长诗,共十六曲。作者在这里指的是第四曲中的第四十四首:

好些。

……当一些模糊的思想在我的头脑里浮动的时候，当新皇康斯坦丁的画像在商店发售的时候，当宣誓效忠的通知发出、善良的人们争先宣誓的时候，皇太子[4]退位的消息散布开了。枢密官的那个听差对政治新闻非常感兴趣，而且他有搜集它们的好地方——所有枢密官们的门房和政府机关（他从早到晚都要骑马到那里去，因为他不像马那样得到午饭后换班的优待），随后还是他告诉我在彼得堡发生了暴动，在加列尔纳雅街“开了炮”。

第二天晚上宪兵队将军柯马罗夫斯基伯爵[5]到我们家来；他讲起圣伊萨克广场[6]上的讨伐，讲起禁卫骑兵队的进攻，讲起米洛拉多维奇伯爵的死[7]。

“她望着他，他望着她；真奇怪
他们的脸多么相似！脸色也一样；
又安详，又蛮横，那又大又黑的眼睛里
互相射出的火焰不大有变动；
…………
她父亲的血就在她父亲的面前沸腾，
并且证明她确实不愧为他的女儿。”（引用旧译文，略有改动。）

④ 皇太子：即康斯坦丁·巴甫洛维奇大公爵，保罗一世的第二个儿子；亚历山大一世没有儿子，立他的兄弟康斯坦丁做皇太子，亚历山大突然逝世后，康斯坦丁宣布退位，由他们的兄弟尼古拉继承皇位。

⑤ 叶·费·柯马罗夫斯基伯爵（1769—1843）：俄国将军，一八一六至一八二八年任内卫军的司令官。

⑥ 圣伊萨克广场：彼得堡伊萨克大教堂前面的广场。

⑦ 米·安·米洛拉多维奇伯爵，参看第三〇页注①。他在一八二五年十二月十四日被十二月党起义军人杀死。

随后就是逮捕;"某某人被捕了","某某人给抓起来了","某某人给从乡下带出来了";受惊的父母为他们的孩子吓得发抖。天给阴郁的乌云遮住了。

在亚历山大统治时期中政治迫害是不常见的;固然普希金① 因为自己写的诗被他流放,艺术院的会议秘书拉勃津因为建议选举马车夫伊里亚,巴依科夫做院士,也遭到流放;② 不过有系统的迫害当时还没有。秘密警察也没有发展成为专制独裁的宪兵队,还只是由德-山格连③ 管辖的一个厅,山格

---

① 亚·普希金(1799—1837):俄国诗人。

② 当时艺术院院长提名阿拉克切叶夫为名誉院士。拉勃津[一]问,伯爵对艺术有过什么贡献? 院长无话可说,就答道,阿拉克切叶夫是"离皇上最近的人"。秘书便说:"要是这个理由站得住的话,我就推荐马车夫伊里亚·巴依科夫,他不单是离皇上近,他还坐在皇上前面。"拉勃津是一个神秘主义者和《郇山通报》[二]的出版者;亚历山大本人也是这一类的神秘主义者,但是在戈里曾[三]的部撤销以后,他把他从前的"基督和灵魂的师兄弟"交给阿拉克切叶夫处理。拉勃津给流放到辛比尔斯克[四]去了。——作者原注

〔一〕亚·费·拉勃津(1766—1825):作家,彼得堡艺术院的会议秘书,一八一八年起任副院长。

〔二〕《郇山通报》:犹太复国主义的报纸。

〔三〕亚·尼·戈里曾公爵(1773—1844):宗教事务和教育部的大臣,这个部是在一八一七年建立的,由于阿拉克切叶夫和修士大司祭(诺夫哥罗德尤利修道院的)福季依的阴谋破坏,戈里曾所主持的宗教事务和教育部在一八二四年被撤销了。拥护戈里曾的"圣经会"会员,也受到福季依派的迫害,本来"圣经会"是得到亚历山大一世的赞助的。

〔四〕辛比尔斯克:伏尔加河岸一个城市,列宁出生的地方,现已改名乌里扬诺夫斯克。

③ 雅·伊·德-山格连(1776—1864):亚历山大一世的亲信,一八一二至一八一六年间俄国秘密警察的头子。

连是个老伏尔泰派,爱说俏皮话,又多嘴,而且是茹伊① 一类的幽默家。在尼古拉的统治下面,连德-山格连本人也受到了警察的监视,他被人当作自由派,其实他还是像往常那样,并没有变;单单从这一件事就可以看出两个朝代的不同了。

尼古拉在他即位以前完全不出名;在亚历山大统治时期,他没有什么作用,也没有人注意他。现在大家都迫不及待地到处打听他的事情;只有禁卫军军官才能够答复这些问题;他们憎恨他的冷酷无情、他那繁琐的拘泥细节、他那爱记仇的天性。最初传遍全城的故事里面有一个就充分证实了禁卫军军官们的看法。据说在某一次操练的时候,大公爵忘乎所以,居然要抓一个军官的衣领。军官回答他说:"殿下,我的佩刀在手里。"尼古拉没有说什么,就退了回去,可是他没有忘记这个回答。在十二月十四日以后,他两次问起,这个军官有没有牵连在里面。幸而军官并没有牵连在里面。②

社会的舆论显著地改变了;迅速的道德堕落可悲地证明

---

① 维克多·茹伊(1764—1846):法国作家和政治活动家。

② 倘使我没有记错的话,这个军官就是沙莫依洛夫伯爵[一],他退了伍,安静地住在莫斯科。尼古拉在戏园里认出了他,认为他的衣服相当讲究、新奇;于是陛下表示了圣意:应当在舞台上把这种服装讽刺一下。戏园经理和**爱国者**扎戈斯金[二]指派某一个演员在一出轻松喜剧里扮演沙莫依洛夫。这个消息传遍了全城。戏演完的时候,沙莫依洛夫本人走进经理的包厢,要求同扮演他的演员讲几句话。经理有些担心,可是他又怕闹出事情,便把那个丑角叫了来。"您扮演我演得很好,"伯爵对他说,"不过要完全像我,您还缺少一样东西,就是我经常戴的这个钻石;请允许我把它交给您:下次您再给指派来扮演我的时候,就可以戴上它。"这以后沙莫依洛夫又从容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这个平淡无味的玩

在俄国贵族中间个人尊严的意识多么不发达。没有人(除了女人)敢于表示同情,敢于替那些昨天还同他们握过手、可是夜里就给逮捕的亲戚、朋友说一句好话。相反,倒出现了野蛮的狂热拥护奴隶制的人,有的是由于卑鄙,有的却不是出于私心,这就更坏。

只有女人不曾参预这种抛弃亲近的人的可耻行为。……只有女人单独地站在十字架跟前,而且在血迹斑斑的断头机前面出现了——首先是吕西·德木南①,那个革命的娥菲利雅②,徘徊在刀斧的旁边,等候哪一天轮到她;然后是乔治·桑③,她把同情和友谊的手伸到断头台,伸给狂热的青年阿里包④。

笑和宣布恰达叶夫〔三〕发疯以及皇上的其他恶作剧一样愚蠢地结束了。——作者原注

〔一〕尼·亚·沙莫依洛夫伯爵(死于一八四二年):亚历山大一世的侍从武官。

〔二〕米·尼·扎戈斯金(1789—1852):俄国作家,一八三一至一八四二年间莫斯科国家剧院的经理。

〔三〕彼·雅·恰达叶夫(1794—1856):俄国哲学家,普希金和十二月党人的朋友,《哲学书简》的作者,由于他在一八三六年发表的一封《书简》,根据尼古拉一世的指示宣布他发了疯。

① 吕西·德木南(1771—1794):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政治活动家加米·德木南的妻子。加米(1760—1794)是山岳党的成员,国民议会议员,后来他公开反对进一步革命,和丹东派站在一起,一七九四年四月被革命法庭判处死刑。在他上断头台的时候,吕西呼吁群众起来造反,因此被捕,八天后也死在断头机上。

② 娥菲利雅:英国诗人和剧作家威廉·莎士比亚(1564—1616)的五幕悲剧《哈姆雷特》中的"美人",丹麦王国御前大臣普隆涅斯的女人。"革命的娥菲利雅",指吕西·德木南。

③ 乔治·桑(1804—1876):法国女作家。

④ 路易·阿里包(1810—1836):法国青年,因暗杀法国国王路易·菲力浦未遂罪被处死刑。

那些给判处苦役的流放人的妻子[①] 被剥夺了一切公民权利，抛弃了财富和社会地位，动身到西伯利亚东部去，一辈子忍受那里的可怕的气候，和当地警察的更加可怕的压迫。姐妹们没有权利到她们的哥哥或者兄弟那里去，她们就退出宫廷，过着隐居生活，许多人离开了俄国；几乎所有妇女的心里都保留着对那些受害者的热爱；然而这种爱在男人中间是不存在的，在他们的心里爱给恐惧吃掉了，没有一个人敢提起那些不幸的人。

我讲起这个题目，就不能不谈到一个这样的英雄故事，这个故事很少有人知道。[②]

在老式的伊瓦谢夫[③] 的家里有一个年轻的法国家庭女教师[④]。伊瓦谢夫唯一的儿子打算同她结婚。这就使他所有的亲族急得发狂；吵闹、眼泪、哀求都来了。这个法国姑娘没有一个像切尔诺夫那样的哥哥，切尔诺夫为了妹妹的缘故在

---

① 她们里面有特鲁别茨卡雅、沃尔康斯卡雅、穆拉维叶娃等人。十二月党人罗真男爵的《回忆录》中说："叶·伊·特鲁别茨卡雅……她是我们十二月党人的妻子里面……第一个动身去西伯利亚的。"诗人尼·亚·涅克拉索夫(1821—1878)后来写了歌颂特鲁别茨卡雅和沃尔康斯卡雅的英雄事迹的长诗《俄罗斯女人》。特鲁别茨卡雅，参看第八九页注①。

② 关于这个故事的细节，奥·克·布拉诺娃的《十二月党人的爱情》(一九二五年莫斯科版)中有记载，这本书的作者参考了瓦西里·彼·伊瓦谢夫的家庭档案。

③ 彼·尼·伊瓦谢夫(死于一八三八年)：俄国少将，辛比尔斯克的地主。他的独子瓦·彼·伊瓦谢夫(1797—1840)被捕判刑前是骑兵大尉。

④ 家庭女教师：即加米拉·勒·唐狄(1808—1839)，伊瓦谢夫家法国家庭女教师的女儿。

决斗①中杀死了诺沃西尔采夫，自己也因伤重死去。她听从劝告离开了彼得堡，他也被劝告暂时放弃了自己的打算。伊瓦谢夫是一个相当活跃的密谋分子；他被判处终身苦役。他的亲族们并没有能打消这种 mésalliance〔法语：门第不相当的婚姻〕。这位年轻姑娘在巴黎听到这个可怕的消息，她就动身去彼得堡，要求许可她到伊尔库次克省去找她的未婚夫伊瓦谢夫。卞肯多尔夫想说服她打消这种犯罪的意图；他没有办到，便向尼古拉报告了。尼古拉叫人向她解释明白那些不肯离弃被流放去做苦工的丈夫的妇女的地位，他还附带说，他并不阻止她去，不过她应当知道，要是那些由于对丈夫忠实而到西伯利亚去的妻子可以享受某种宽大的待遇，她也毫无权利享受，因为她心甘情愿去同犯人结婚。

她和尼古拉两人都遵守了诺言：她去了西伯利亚——他一点也不肯改善她的艰苦处境。

沙皇严厉而公正。②

要塞监狱里并不知道她得到了许可，这个不幸的姑娘好不容易到达那里，却不得不住在一个小小的居民点，等候监狱

---

① 指符·德·诺沃西尔采夫（1800—1825，亚历山大一世的侍从武官）和康·巴·切尔诺夫（1803—1825，陆军少尉）的决斗。贵族军官诺沃西尔采夫同没有钱的非贵族的将军切尔诺夫的女儿有了婚约，后来由于家庭的压力，背信毁约。未婚妻的哥哥康·巴·切尔诺夫为了维护妹妹的名誉，挑起了决斗。决斗发生在一八二五年九月十日，两人都受重伤，几天以后死去。（康·巴·切尔诺夫还是十二月党人秘密结社的成员。）

② 见亚·普希金的诗《沙皇尼基达》。——英译者注

当局向彼得堡请示，这个居民点里面住着各种各样刑满的犯人，她毫无办法打听到伊瓦谢夫的消息，也没法让他知道她的情况。

她渐渐地和她的新邻居相熟起来。其中有一个流放的强盗；他在监狱里劳动，她把自己的经历对他讲了。第二天强盗带给她伊瓦谢夫的一张字条。过一天他又向她表示愿意替她和伊瓦谢夫传递书信。他从早到晚都得在监狱里劳动；到了夜间他拿了伊瓦谢夫的信，不顾大风雪，不顾他自己的疲倦，总是带着信回来，第二天天刚亮他又动身去上工。①

最后许可证到了，他们结了婚。过了几年，苦役改为永久

---

① 那些同伊瓦谢夫家相熟的人后来对我说，他们怀疑这个强盗的故事。他们还说，孩子们的回来和兄弟的同情这些事我既然都讲了，那么就不应该不提到伊瓦谢夫妹妹们的高尚行为。我从雅赛科娃[一]那里听到这件事的详细情况，她去西伯利亚探望过她的哥哥（伊瓦谢夫）。然而是不是她对我讲过强盗的故事，我记不起来了。是不是人们把伊瓦谢娃和特鲁别茨卡雅公爵夫人[二]的事情混为一谈了？特鲁别茨卡雅公爵夫人曾经通过一个不相识的分离派教徒[三]把信和钱带给奥包连斯基公爵[四]。伊瓦谢夫的信是不是保存下来了？我们认为我们有看到它们的权利。——作者原注

〔一〕叶·彼·雅赛科娃（1805—1848）：伊瓦谢夫的妹妹，作者的远亲。

〔二〕叶·伊·特鲁别茨卡雅公爵夫人：十二月党人谢·彼·特鲁别茨科依公爵的妻子，到了西伯利亚以后，一八五四年死在那里。

〔三〕分离派教徒：十七世纪中叶，一部分俄罗斯东正教教徒反对当时莫斯科总主教尼康所实行的教会改革，因此受到迫害，从东正教分离出来，他们保持着旧的信仰、仪式和习惯，后来被称为“分离派”或“旧信仰者”。他们反对官方教会，因此一直受到沙皇政府的迫害。作者所关心的伊瓦谢夫的信在一九二五年出版的《十二月党人的爱情》（伊瓦谢夫的外孙女布拉诺娃著）中发表了。

〔四〕叶·彼·奥包连斯基公爵（1796—1865）：十二月党人。

流放。他们的处境稍微好了些，可是他们已经是精疲力尽了；妻子由于她所遭受到的一切沉重压力，首先倒了下来。她枯萎了，就像一朵南国的鲜花必然在西伯利亚的雪地上枯萎那样。伊瓦谢夫并没有比她多活了好久，他正是在她死后一年死去，其实那个时候[①] 他已经离开人世了；他的书信（它们叫第三厅[②] 也感到惊讶）中就有一种无限忧伤、虔诚痴狂和阴郁诗意的痕迹；其实在她死后他就没有活下去，他不过是缓慢地、庄严地死去。

这个"传记"并没有因为他们的死亡而结束。伊瓦谢夫的父亲在儿子遭到流放以后，把产业改传给非正式的儿子[③]，要求他不要忘记那个不幸的哥哥，并且要帮助哥哥。伊瓦谢夫夫妇留下了两个孩子，两个没有姓氏的小孩[④]，两个未来的世袭兵[⑤]，西伯利亚移民流刑犯——没有依靠，没有权利，没有父母。伊瓦谢夫的兄弟请求尼古拉许可他抚养这两个小孩；尼古拉批准了。几年以后他冒险再一次提出申请：把他们的父亲的姓氏还给他们；这一次他居然也成功了。

关于暴动和审讯的传说以及在莫斯科的恐怖给我留下了

---

① 英译文改为"那个时候之前"，意思就是：他的妻子死去以后，他的心已经死了。

② 第三厅：当时的秘密警察机关。

③ 指瓦·彼·伊瓦谢夫的外祖父托尔士太的私生子安·叶·戈洛文斯基，实际上是伊瓦谢夫的舅父，他同伊瓦谢夫兄妹一起由伊瓦谢夫的母亲抚养成人。

④ 判处苦役的犯人所生的儿女是没有姓氏的。

⑤ 世袭兵：十九世纪上半期，俄国兵的儿子生下来要在军事机关登记，以后得受训入伍。

很深的印象；一个新的世界出现了，它越来越成为我的整个精神生活的中心；我不知道这件事是怎样发生的，不过我虽然并不理解它的全部意义，或者只有一点很模糊的概念，但是我觉得我并不站在霰弹和胜利、监牢和镣铐的一边。伯斯捷尔和他的同志们的处死[①] 彻底地唤醒了我心灵里的孩子的梦。

所有的人都期待着减轻那些被判刑的人的刑罚——加冕的仪式[②] 就要举行了。连我的父亲，不管他平日小心谨慎和容易怀疑，他也说，死刑不会执行，说这一切做法只是为了吓唬人们。然而他和所有其他的人一样，太不了解这个年轻的君主。尼古拉离开了彼得堡，没有到莫斯科，在彼得罗夫宫停下来了。[③] ……莫斯科的居民在《莫斯科新闻》上读到七月十四日的可怕的消息[④] 时，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俄国人民已经不习惯死刑了；在米罗维奇（不是叶卡捷琳

① 巴威尔·伊凡诺维奇·伯斯捷尔（1793—1826）是著名的十二月党人，俄军上校，南方军队的领袖，主张推翻专制政体，建立共和制度，因叛徒告密在起义前夕被捕，后来和其他四个十二月党革命领袖在一八二六年七月十三日同时被处绞刑，那四个人是谢·伊·穆拉维约夫-阿波斯多尔（一七九六年生），米·巴·别斯土热夫-廖明（一八〇三年生），彼·格·卡霍夫斯基（一七九七年生）和诗人康·费·雷列耶夫（一七九五年生）。

② 历代的沙皇都要从涅瓦河畔的首都彼得堡到莫斯科来接受加冕。

③ 彼得罗夫宫在彼得堡到莫斯科的公路上，一七七五至一七八二年修建，有古俄罗斯的建筑风格。尼古拉在彼得罗夫宫停下来，不到莫斯科，这是一八二六年七月二十一日的事。

④ 五个十二月党人的死刑执行日期是一八二六年七月十三日。以后《莫斯科新闻》刊登了关于处死他们的政府公告。

娜二世、而是他被处了死刑)[1] 之后,在普加乔夫[2] 和他的同伴之后,就不曾有过死刑;固然,人们给鞭打致死,兵士们受夹笞刑[3] (这是违法的)一直到死,但是 de jure〔拉丁语:法律上的〕死刑是不存在的。[4] 有过这样的传说:在保罗〔一世〕统治时期,顿河哥萨克人发动了局部的暴动,有两个军官牵连在里面。保罗〔一世〕下令军事法庭审讯他们,并且授予赫特曼[5]

---

① 瓦·雅·米罗维奇(1740—1764):陆军少尉,企图发动政变,把关在席吕谢尔堡要塞中的俄国皇位合法继承者伊凡六世·安东诺维奇(1740—1764)放出来,拥护他登位,失败后,被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下令斩首。伊凡六世出生后只有八个星期,就让人抱着登上皇位,由当时德国反动集团头子艾·约·比伦(1690—1772)担任摄政,独揽实权,同年十一月比伦被禁卫军推翻,伊凡六世就给监禁起来,最后几年给关在席吕谢尔堡要塞里。米罗维奇救他未成,他被卫兵杀害。叶卡捷琳娜二世(1729—1796):一七六二至一七九六年间的俄国统治者,由于禁卫军发动宫廷政变,推翻了她的丈夫彼得三世,她才做了女皇。她加强了农奴制度,扩大了贵族特权,镇压了普加乔夫领导的农民起义。

② 叶·伊·普加乔夫(约 1742—1775):顿河的哥萨克人,一七七三至一七七五年俄国最大一次农民起义的领导人,失败后,一七七五年一月十日在莫斯科被处死刑。

③ 夹笞刑:叫犯罪人走在两排人当中受鞭打。

④ 根据叶里扎威塔·彼得罗夫娜女皇一七五四年九月三十日的诏令,对要判决死刑的犯人,把他们的死刑一律改为苦役劳动、打烙印等等刑罚。叶卡捷琳娜二世一七七五年四月六日颁发诏令承认一七五四年诏令有效,不过认为这个诏令并不适用于像米罗维奇、普加乔夫那样的叛国罪犯。一八二三年俄国国务会议计划编制法典,提出死刑的问题,少数人认为一七五四年诏令主张对一切罪犯都废除死刑,叛国罪犯也包括在内;多数人则认为一七五四年诏令只适用于一般罪犯,对叛国罪根据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旨意采用死刑,并不违法。尼古拉一世后来就利用这个解释判处五位十二月党领袖的死刑。

⑤ 赫特曼:乌克兰一六五四至一七六四年间的执政,查坡洛什哥萨克公选的首领。

或将军以处理的全权。法庭判决他们死刑，然而没有人敢批准这个判决；赫特曼向皇上呈报。保罗说："他们全是女人，他们想把死刑推在我身上，很感谢，"他把死刑减为苦役。

尼古拉又把死刑放进我们的刑法里面，起初还是不合法地，可是后来就写进法典中去了。①

可怕的消息传来的第二天，在克里姆林宫里举行了一次祷告式。②尼古拉在庆祝了死刑执行以后，凯旋地进入莫斯科了。③ 这个时候我才第一次看见他；他骑着马走在一辆马车

---

① 一八三二年公布的法典中把死刑固定下来了。

② "在莫斯科举行了一次祷告式，来庆祝尼古拉镇压了五个人的胜利。菲拉列特〔一〕总主教在克里姆林宫里为这次的谋杀感谢上帝。皇族全体参加了仪式，靠近他们站的是枢密官们、大臣们，四周围了密密的一大圈禁卫军，他们摘了军帽跪在那里，也在祷告；炮声在克里姆林宫的高处响了起来。

"从来没有用过像这样隆重的仪式来庆祝绞刑架的；尼古拉明白胜利的重要性！

"我参加了祷告式，我当时只有十四岁，隐没在人丛中，就在那里，在那个被血淋淋的仪式玷污了的圣坛前面，我发誓要替那些被处死刑的人报仇，要跟这个皇位、跟这个圣坛、跟这些大炮战斗到底。我并没有报了仇；禁卫军和皇位、圣坛和大炮——一切都依然存在；可是三十年以后我仍然站在这面旗帜下，从来没有离开过。"(《北极星》〔二〕，一八五五年)——作者原注

〔一〕德·瓦·米·菲拉列特(1782—1867)：从一八二六年起担任莫斯科总主教。

〔二〕《北极星》参看第五页注②，到一八六九年为止，共出版八期。刊物的封面上印着伯斯捷尔、雷列耶夫等五个被处绞刑的十二月党领袖的半身像。

作者在这里引用了他在《北极星》上发表的文章《给我们的人》里面的三段话。(《北极星》，一八五五年，第一册。)

③ 祷告式在七月十九日举行；尼古拉是七月二十五日到莫斯科的，他并没有参加祷告式。

的旁边，马车里坐的是皇太后和年轻的皇后。尼古拉长得漂亮，可是他的漂亮使人不寒而栗；再没有一张脸能够比他的脸更不留情地暴露出一个人的性格了。迅速向后倾斜的前额、充分发达而使颅骨受到影响的下颔表示出坚强的意志和贫弱的智力，表示出残忍多于敏感。然而主要的是眼睛，没有丝毫的温暖，没有一点仁慈，冰冷冷的眼睛。我不相信他曾经热烈地恋爱过任何一个女人，像保罗〔一世〕爱安娜·洛普希娜[1]那样，像亚历山大〔一世〕爱自己妻子以外的一切女人那样；他不过是“对她们略施恩泽”罢了。

在梵蒂冈[2] 有一个新的美术陈列室[3]，大概就是庇护七世[4] 陈列大量在罗马及其附近出土的雕像、半身像和小雕像的地方。罗马衰亡的全部历史就反映在这些眉毛、前额、嘴唇上；从奥古斯都的女儿[5] 到坡拍亚[6]，这些罗马贵妇人居然变

---

① 安娜·洛普希娜(1777—1805)：保罗一世的情妇，莫斯科警察头子洛普兴的女儿，加加陵公爵的妻子。

② 梵蒂冈：罗马教皇宫殿所在地，在罗马城西北角，一九二九年意大利政府同教皇庇护十一世签订条约，承认梵蒂冈主权属于教皇。

③ 指教皇庇护七世在一八一七至一八二二年间修建的“新臂陈列室”(Braccio Nuovo)。

④ 庇护七世(1742—1823)：一八〇〇至一八二三年的罗马教皇。

⑤ 指尤里亚(公元前 39—公元 14)，第一个罗马皇帝奥古斯都·卡·屋大维的独养女儿，因为品行不端，被她的父亲逐出罗马。

⑥ 坡拍亚·沙比娜(死于六五年)：她先是罗马皇帝奥托(由兵士拥立为皇帝，在位只有三个月)的情妇，后来做他的妻子，然后是罗马皇帝尼罗的情妇，最后做了尼罗的妻子。

成了娼妓,而且娼妓的典型占着优势,保存下来了;男性的典型(可以说,以安提诺乌斯[1] 和赫尔马弗罗狄图斯[2] 为最高代表)分成了两类:一类是,肉体的和道德的堕落,让放荡和贪吃、流血和世界上一切坏事玷污了的相貌,前额很低,面目猥琐,像高等娼妓赫里奥加巴路斯[3] 那样,或者两颊塌陷,像加尔巴[4] 那样;这后一种类型在那不勒斯国王[5] 身上出色地再现了出来。……然而还有另一类——这是军事长官的典型,在这种典型的身上,一切公民的东西,一切人的东西都死灭了,只剩下一个统治欲;智力有限,完全没有心肝——这是些爱权力的僧侣,在他们的面貌上看得出力量和严峻的意志。那样由叛乱的兵士临时拥上皇位的禁卫军和军队的皇帝就是

---

① 安提诺乌斯:罗马皇帝哈德利安宠爱的美丽的青年,公元一三〇年淹死在尼罗河里。

② 赫尔马弗罗狄图斯:希腊神话中赫尔米斯(兼司学艺、商业、辩论等等的神)与阿弗罗狄特(爱与美的女神)的儿子。他有一天在沙尔玛西斯泉水中洗澡,泉水的宁芙(半人半神的少女)爱上了他,不顾他的拒绝,紧紧搂住他,终于和他成了一体。古代美术中表现赫尔马弗罗狄图斯的作品不少。

③ 赫里奥加巴路斯:即艾那加巴路斯,公元二一八至二二二年的罗马皇帝,道德败坏,荒淫无耻,还是一个性欲倒错的人,自己装作女人,同他喜欢的一个解放了的奴隶"结婚"。

④ 塞·苏·加尔巴(公元前5—公元69):他在尼罗死后做了六个多月的罗马皇帝,被杀害。

⑤ 那不勒斯国王:指斐迪南二世(1810—1859)。维也纳会议上分割意大利时,建立了两西西里王国,以那不勒斯为首都,让波旁王室的斐迪南一世(斐迪南二世的父亲)做国王。斐迪南二世在一八三〇年即位,同他的父亲一样背叛了自己的实行改革的诺言,残酷镇压人民,一八四八年炮轰起义的西西里城市,因此得到"炮弹国王"的绰号。

这样。在这一类典型中我找到许多脑袋，它们很像还没有留小胡子时候的尼古拉。我明白为了守护在疯狂中逐渐死去的事物需要这些阴森的、顽固的卫兵，然而对于正在成长的、年轻的事物这些卫兵有什么用处呢？

尽管政治的梦想日夜占据着我的心思，可是我的思想并没有显出特殊的洞察力；我的思想非常混乱，我竟然真的认为彼得堡起义[1] 的目的有一个就是：拥戴皇太子[2] 登位，一方面把他的权力加以限制。由此我把这个怪人整整崇拜了一年。他在当时比尼古拉得人心；我不知道为什么缘故群众（他从未作过有益于群众的事）和兵士（他只做过损害兵士的事）都喜欢他。我记得十分清楚，在加冕典礼上他在脸色苍白的尼古拉身旁走着，他皱着他那淡黄色的浓眉，拱着背，把两个肩头耸到耳边，他穿了一身带黄色领子的立陶宛禁卫军制服。他作主婚人把俄国嫁给尼古拉以后，就动身继续摆弄华沙[3]去了。一直到一八三〇年十一月二十九日[4]，才听见他的消息。

这位人物并不好看，在梵蒂冈里也找不到这种典型。要

---

① 彼得堡起义：即十二月党人的起义。

② 皇太子：指康斯坦丁大公爵。

③ 华沙：波兰的首都，康斯坦丁是波兰的“总督”。

④ 一八三〇至一八三一年波兰起义开始的日期。那天起义者冲进总督府高呼“处死暴君！”康斯坦丁已经躲了起来，没有给找到。

是我没有见过撒丁国王[①]，我就会把这个典型叫做加特契纳[②]型了。

不用说，现在孤寂比以前更使我感到痛苦了，我急于想把我的思想和梦想告诉人，急于想检验它们，听见它们得到别人的赞同；我认为做一个"预谋犯罪的人"[③]是值得十分自豪的事，因此我不能闭口不谈它，同时也不能随意乱谈。

我第一个挑中的就是我的俄语教师。

伊·叶·普罗托波波夫的脑子里装满了不明确的、慷慨大度的自由主义，这种自由主义等到一个人头发开始花白，等到一个人结了婚、有了工作就常常会消失，不过它也能使一个人高尚。伊凡·叶符多基莫维奇很受感动，他离开的时候，同我拥抱，一面说："但愿这些感情在您身上成熟并且巩固下来。"他的同情对我是很大的安慰。这以后他开始给我带来一些用小字抄写、磨得很破烂的诗抄本，有普希金的《自由颂》、《短剑》，雷列耶夫的《沉思》[④]，我偷偷地把它们抄了下来……（现

① 撒丁国王：指国王卡洛·阿尔伯托（1798—1849），他在一八四八至一八四九年的抗奥战争中战败，让位给儿子维克多·艾曼努埃尔二世，流亡国外，死在葡萄牙的俄伯尔多。撒丁王国是一七二〇至一八六一年存在于意大利的国家（包括皮蒙特和撒丁岛）。一八六一年宣布成立意大利王国，由维克多·艾曼努埃尔为意大利国王，意大利的统一完成。

② 加特契纳：离首都彼得堡四十几公里的城市，有皇宫庭园的建筑群和陈列珍贵物品与图书的宫殿。过去沙皇的夏宫在这里。

③ 作者的意思大概是，他同情十二月党人的起义，曾发誓要替那些被处死刑的人报仇，要同沙皇战斗到底。

④ 《沉思》：十二月党的诗人雷列耶夫在一八二一至一八二三年间写的纪念俄国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诗集，一八二五年出版。

在,我把它们公开地印出来了!)[1]

不用说,我的阅读范围也改变了。政治领先,主要的是——革命史[2],这以前我只是从普罗沃太太讲的故事里知道了一点点。我在地下室的藏书室里发现了一本保王党人写的九十年代[3] 的历史。这本书偏见太深,连我这个十四岁的小孩也不相信它。我偶尔听见老布肖说革命时期他在巴黎,我很想向他打听;可是布肖是一个严厉的、整天愁眉苦脸的人,有一根大鼻子,戴一副眼镜;他从来不同我作多余的谈话,他做动词变位,口授习题,责骂我,然后拄着他那根多瘸节的粗手杖走了。

"他们为什么处死路易十六?"我在上课的时候问他道。

老人望着我,皱着他的一只灰白色眉毛,扬起另一只,他把眼镜推到额上,好像是脸甲[4] 一样,掏出一块大的蓝色手帕,擦了擦鼻子,庄严地说:

"Parce qu'il a été traître à la patrie.〔法语:因为他是祖国的叛徒。〕"

"倘使您是一个审判官,您会在判决书上签字吗?"

"用双手签。"

---

① 普希金的《自由》作于一八一七年,《短剑》作于一八二一年。在一八五六年出版的《北极星》第二册中,作者发表了他的《往事与随想》的第一卷,同时也刊出了普希金的诗《自由》、《乡村》、《给西伯利亚的问候》、《给恰达耶夫》和雷列耶夫的诗《公民》,以及一些其他的诗。

② 革命史:指法国革命史。

③ 九十年代:指十八世纪九十年代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时期。

④ 脸甲:指过去头盔的脸甲。

这一课抵得上所有的动词虚拟式;对我来说已经够了;很明显,国王被处死是罪有应得。

老布肖不喜欢我,认为我没有头脑而且顽皮,因为我不肯好好做功课,他常常说:"您不会有出息的,"可是他发觉我同情他的 régicides〔法语:杀国王的〕思想以后,他对我和善起来,不再生气了,对我的错误也肯原谅,常常给我讲九三年[①]的一些故事,讲他怎样在"那些淫荡的人和狡猾的人"得势的时候,[②] 离开了法国。他还是像从前那样庄严地、不带笑容地结束他的讲课,不过现在他宽大地说:

"我的确以为您不会有出息,不过您那高尚的感情会挽救您。"

除了我的教师的这种鼓励和同情,不久又增加了一种更亲切的同情,它对我有更大的影响。

我父亲的大哥的外孙女[③] 住在特威尔省一个小城[④] 里。我在很小的时候就认识她,可是我们彼此很少见面;她每年一次跟她的姨母[⑤] 到莫斯科来过圣诞节或者谢肉节。然而我

---

① 九三年:指一七九三年,这年一月二十一日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被处死在断头台上。

② 指一七九四年七月二十七日的反革命"热月政变"。

③ 外孙女:即本章小标题中的"柯尔切瓦的'表姐'",实际上是作者的外甥女塔季雅娜·彼得罗夫娜·库钦娜(1810—1889)。她是阿·彼·库钦的妹妹,后来同瓦季姆·瓦·巴谢克结婚。作者在本书中又称她为"柯尔切瓦的外甥女"。她也是作家,写过一部《远年回忆》(一八七二年出版)。一八五九至一八六一年她在国外见到作者,《往事与随想》第一卷早已发表了。

④ 小城:指柯尔切瓦,伏尔加河岸上一个小城市。

⑤ 姨母:指作者的堂姐叶里扎韦塔·彼得罗夫娜·雅科甫列娃(嫁斯玛兰)。

们还是成了朋友。她比我大五岁,[①] 但是她生得瘦小,面貌很年轻,看起来年纪同我的一样。我喜欢她特别因为她头一个把我当大人看待,这就是说,她并不动辄表示惊讶,说我长高了,她也不问我在学什么,学得好不好,是不是想到军队里去,到哪一个团去。她同我谈话,就像一般人相互交谈一样;不过她还没有丢掉一般少女对待比她们稍微年轻一点的男孩子所喜欢使用的那种权威性的教导口气。

我们中间书信来往,从一八二四年起更加频繁,可是书信——这又少不了纸笔,又少不了上面有墨水点和用削笔刀刻出图画的课桌;我很想看见她,同她谈我的新思想——因此可以想象到我听说表姐[②] 二月(一八二六年)来,要到我们家作客,住几个月,我是多么高兴。我在我的桌子上划出一直到她来的那天的全部日期,然后把过去了的日子一天天地抹掉,有时故意忘记三天,为了可以有一下子多抹掉几天的快乐,然而时间还是过得非常慢;后来预定的日期过去了,又改订了新的日期,这个日期又过去了,事情常常是这样。

有一天晚上我同我的教师伊凡·叶符多基莫维奇坐在我的课室里,伊凡·叶符多基莫维奇像往常那样读一句就喝一口起泡沫的克瓦斯[③],他正在讲"六音步诗",用可怕的声音和手

① 这大概是作者的笔误,塔·库钦娜比作者年长两岁。

② 表姐:指塔·彼·库钦娜,其实是作者的外甥女,下同。

③ 克瓦斯:一种用面包或水果发酵制的清凉饮料。

势在韵脚上砍断格涅季奇[1] 翻译的《伊里亚特》的每一行诗，——院子里的雪突然嘎扎嘎扎地响起来，不像是城里雪橇辗过的声音，拴住的铃铛还发出一点点叮当声，院子里有人在讲话。……我涨红了脸，再没有心思去想给砍碎了的"俾勒乌斯的儿子阿溪里斯"的愤怒了；[2] 我连忙跑进前厅，我那位从特威尔省来的表姐全身裹着皮袄、披肩和头巾，头上戴一顶风帽，足上穿一双毛茸茸的白色高统靴，脸冻得通红，也许还是高兴得发红，扑到我身上来同我接吻。

人们回忆他们的童年，回忆当时的悲欢，经常露出一点宽大的笑容，仿佛他们要学《聪明误》里的索菲亚·巴甫洛夫娜那样装腔作势，说"幼稚！"[3] 好像他们后来变得更好了，感觉更强、更深了。小孩过了两三年就瞧不起自己过去的玩具——让他们去吧，他们想成为大人，他们长得很快，也变得很快，他们从自己穿的短上衣和用的课本的篇幅上也看出了这一点；然而成年人好像也会明白："小孩儿时候"再加上刚刚进入青年时期的两三年是生活中最充足的、最优美的、最属于我们的部分，也几乎是最重要的部分：它不知不觉地决定整个的未来。

---

① 尼·伊·格涅季奇（1784—1833）：俄国诗人和翻译工作者，他按照古希腊诗的六音步格翻译的荷马的史诗《伊里亚特》在一八二九年出版。

② 《伊里亚特》的第一句便是"女神啊，请唱俾勒乌斯的儿子阿溪里斯的愤怒……"这里说"砍碎了的愤怒"，意思是：家庭教师伊凡·叶符多基莫维奇把一行诗砍成了几段。阿溪里斯是传说中古希腊的英雄。

③ 见《聪明误》第一幕第七场。《聪明误》是俄国作家亚·谢·格利包耶陀夫（1795—1829）的诗体喜剧。索菲亚·巴甫洛夫娜是剧中的女主角，是贵族法穆索夫的女儿。

一个人一步不停地迅速朝前走去，不在中途停留，也不考虑什么的时候，他没有走到悬崖，也不曾摔伤脖子的时候，他总以为他的生活还在前面，他看不起过去，也不会重视现在。然而在春天的花朵被经验摧残、夏日的热情给经验冷却了的时候，在他懂得他的生活虽然还在继续，其实已经完结的时候，那么他对那些欢乐的、温暖的、美好的童年回忆就会有不同的看法了。

大自然会使用经常不断的诡计和巧妙的节约办法，它把青春给人，可是它又把长成的人据为己有；它拖住他走，把他缠在社会关系和家庭关系的网里面，这些关系的四分之三都是不由他的意志决定的；当然他也使自己的行为带有他个人的性质，可是他属于他自己的却要少得多；他个性中抒情的成分减弱了，因此感情和欢乐也减弱了——除了智慧和意志以外，一切都减弱了。

表姐的生活并不是在玫瑰花丛中度过的。她童年时期就失去了母亲[1]。父亲[2]是一个不可救药的赌徒，像所有嗜赌成性的人那样，他十次输光了，又十次赢回来，然而最后还是完全破产。他把他的财产的les beaux restes〔法语：剩余〕用来办了一个养马场，他把他的全部思想和激情都花在那上面。他的儿子[3]，枪骑兵的候补军官，表姐唯一的哥哥，一个心肠

① 母亲：指娜·彼·库钦娜（雅科甫列娃），作者的堂姐，一八二二年逝世。

② 父亲：指彼·伊·库钦。

③ 儿子：指阿·彼·库钦，作者在第二章里曾提到他。

很好的年轻人，也走上了毁灭的捷径；他只有十九岁就成了比他父亲还要厉害的赌徒。

那位父亲在五十岁的时候，毫无必要地同一位以前在斯莫尔尼修道院[①] 念过书的老小姐[②] 结了婚。这样一种完全的、完备的彼得堡贵族女子中学学生的典型，我从来没有机会遇见过。她是最优秀的学生里面的一个，后来就担任了修道院里的级任女教师；她是一个瘦瘦的女人，淡黄色头发，高度近视，她的外貌上就带了一种教诲人、教训人的气味。她一点也不愚蠢，她在口头上很会表现那种冷漠的热诚，她讲话喜欢用一些关于品德和忠诚的陈词滥调，对地理和历史年表她都记得很熟，她讲法国话正确到令人讨厌的程度，她内心隐藏着一种和耶稣会[③] 教徒虚伪的谦虚相似的自尊心。除了"围着黄披肩的学究"[④] 的这些共同的特点之外，她还有纯粹涅夫斯基[⑤] 或者斯莫尔尼的学生的特征。她讲起她们共同的母亲（玛利雅·费奥多罗芙娜皇后[⑥]）来视察的时候，就会抬起眼睛望天，眼里充满着泪水，她单恋着亚历山大皇帝，我记得她

---

① 斯莫尔尼修道院：在彼得堡斯莫尔尼宫近旁，一九一七年前俄国贵族女子学院就设在这里。十月革命时期斯莫尔尼宫是革命的大本营，列宁曾在这里领导十月武装起义。

② 老小姐：指叶·米·屠希涅娃，"表姐"的后母。

③ 耶稣会：由西班牙人伊·洛耀拉在一五三四年创立，过去曾是天主教反对宗教改革的重要工具，后来又是教皇用来反对社会进步力量的一种主要工具。

④ 引自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第三章二十八节第四行。

⑤ 涅夫斯基：指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

⑥ 费奥多罗芙娜皇后：指沙皇保罗一世的妻子（1759—1828）。

不是在脖子上挂着一个小金盒就是在手上戴着一个戒指，上面刻了一句从叶里扎威塔女皇① 的书信里摘录下来的话："Il a repris son sourire de bienveillance! 〔法语：他的嘴上又露出了好意的笑容！〕"

读者们可以设想这个和谐的 trio〔意大利语：三重唱或者三重奏〕：父亲，他是一个赌徒，非常喜欢马，喜欢茨冈人②，喜欢热闹，喜欢大宴会，喜欢赛跑马、赛走马；女儿，她是在完全独立自由的情况中教育大的，习惯了在家里随意行动；那位有学问的小姐，她突然从一个年纪较大的级任老师变成了年轻的妻子。不用说，她不喜欢她的继女，不用说，她的继女也不喜欢她；一般地说，在三十五岁的女人和十七岁的姑娘之间要有深厚的友情，只有在那个女人自我牺牲、下定決心不结婚的时候。

对于继女同继母之间那种常见的敌视，我并不感到惊奇，这是自然的，也是合乎道德的。一个新的人给安置在母亲的位置上，这引起了儿女们的反感。对他们来说，第二次结婚就是第二次葬礼。儿女们的爱明显地表现在这种感情上，它悄悄地对孤儿们说："你父亲的妻子绝不是你的母亲。"基督教最初也明白第二次结婚是跟它所阐明的婚姻的概念和它所宣扬的灵魂不死的概念相冲突的；然而教会继续不断向世俗让步，

① 叶里扎威塔·彼得罗夫娜(1709—1761)：俄国女皇，彼得一世的女儿。

② 茨冈人：或称吉普赛人，原出生于印度，后散居在土耳其、俄、匈、西、英等国，以占卜、卖艺、补锅为生的流浪民族。

它就花言巧语，应付生活的无情逻辑，哄骗单纯的孩子的心，孩子的心实际上反对这种把父亲的伴侣当作自己母亲的由宗教认可的自相矛盾。

对那个女人来说，她在教堂行了婚礼出来，就遇到一个现成的家庭和儿女，她处在一种为难的境地；她跟他们毫不相干，但是她必须装出她不可能有的感情，她必须说服自己，也让旁人相信：别人的儿女对于她是和她亲生的儿女一样地宝贝。

因此在她们的互相不喜欢这件事情上，我绝不责备那位从修道院来的小姐，也不怪表姐，不过我明白这个不习惯服从别人的年轻姑娘，多么急着要冲出牢笼离开父亲的家，到任何地方去。父亲渐渐地老了，越来越听他那个有学问的妻子的话。她的哥哥枪骑兵又闹得越来越不像话，总之，家中的生活是痛苦的，末了，她说服了继母让她到我们家来住几个月，甚至住到一年。

表姐来到以后第二天，她就把我的整个作业安排(除了上课外)推翻了；她独断地规定了我们共同阅读的钟点，她劝我不要读小说，介绍我读赛居尔的《世界史》① 和《安纳哈尔西斯的游记》②。她根据她的禁欲主义的观点反对我那个偷偷

---

① 《世界史》：法国外交官和作家路易·菲·赛居尔伯爵(1753—1830)的著作《世界史简编，古代和现代(供青年阅读)》，法文，共四十四卷，一八一七年开始出版。

② 《安纳哈尔西斯的游记》：指法国作家和考古学家让·巴尔太勒米神甫(1716—1795)的著作《青年安纳哈尔西斯漫游希腊记》，法文，一至八卷，一七九〇年，第三版。

地用纸卷着烟草抽的强烈嗜好(当时还没有纸烟);一般说,她喜欢向我宣讲道德,虽然我并不照她的话办,至少我是心平气和地听她讲下去。幸而她并不坚持,她忘了自己的规定,她同我一起不读什么考古的长篇小说,却读确凯[①] 的中篇故事,她还偷偷地差小孩出去买东西,冬天买荞麦饼和素油的豌豆羹,夏天买醋栗和茶藨子。

我认为表姐给我的影响是很好的;一股暖流跟着她流进了我这个幽居的少年时期,它温暖了、也许还保全了我那些刚刚发展起来的感情,这种感情本来很可能被我父亲的嘲讽完全毁掉。我学会了殷勤,学会了因为一句话伤心,学会了关心别人,学会了爱;我学会了谈自己的感情。她支持我的政治抱负,预言我会有不寻常的前途和荣誉,我怀着儿童的虚荣心相信了她的话:我是——未来的"布鲁都斯或者法布利基乌斯"[②]。

她只对我一个人倾吐她的秘密,她偷偷地爱上了一个披黑色披肩、穿黑色短上衣的亚历山大骠骑兵团[③] 的军官;这的确是秘密,因为连骠骑兵本人(他指挥一个骑兵连)从来没

① 约翰·亨·确凯(1771—1848):德国作家,他写过一些关于瑞士生活的中短篇故事(五卷)和历史小说,以及宗教著作,一直流行到十九世纪中期。他在作品中强调宗教感情,不宣传东正教信仰,曾因此受到攻击。

② 从诗人达威多夫(1784—1839)的诗体小册子《现代歌曲》中引来。玛尔库斯·尤·布鲁都斯(公元前85?—前42)是古罗马政治家,他领导了暗杀朱·恺撒的阴谋,杀死了恺撒。加·法·路西卢斯·法布利基乌斯(死在公元前二八二年以后)是古罗马将军和政治家,曾任执政官,以诚实著名。

③ 亚历山大骠骑兵团:穿着匈牙利样式军服的轻骑兵团。

有想到一个十八岁少女的心为他燃起了多么纯洁的火花。我不知道我是不是羡慕他的好运——大概是有一点,——不过她挑选我作她的心腹,我感到自豪,并且(按照维特[1]的方式)认为这是一种悲剧的爱情,会有一个离不了自杀、服毒和匕首的伟大结局;我甚至想去找他,向他谈出一切。

表姐从柯尔切瓦带来了羽毛球;其中的一个球上插了一根别针,除了这个球外,她从来不玩别的球,每逢这个球落到我的或者任何别人的手里,她总要拿了过去,说是她已经玩惯了这个球。Espièglerie〔法语:恶作剧〕这个魔鬼经常引诱我做坏事情,它怂恿我掉换了别针,就是说,把别针改插到另一个球上。我的恶作剧完全成功:表姐经常拿那个插了别针的球。一、两个星期以后,我告诉了她;她变了脸色,眼里满是泪水,走进她的屋子里去了。我吓坏了,很难过,等了大约半个小时,就去找她;她的房门锁上了,我求她开门,表姐不让我进去,说是她生病,说我不是她的朋友,只是一个没有心肝的小孩。我给她写了一张字条,求她宽恕我;在喝茶的时间以后我们和好了,我吻她的手,她拥抱了我,马上就对我说明了这件事情的十分重要性。一年前骠骑兵在他们家吃午饭,午饭后同她一起打羽毛球,——他打的这个球给做上了记号。我受到了良心的谴责,我明白我做了一件真正缺德的事情。

表姐一直住到十月。她的父亲差人来接她回去,答应让她明年到我们的瓦西里叶夫斯柯耶庄子来。我们怀着恐惧等

[1] 维特:歌德小说的主人公,因爱情自杀,参看第六九页注①。

待着分别，于是在一个秋天的日子里，一辆轻便四轮马车来接她了。她的女仆把一些柳条筐和硬纸盒搬进车子里，我们家的仆人拿整整一个星期在路上吃的各种食品把车子塞得满满的，然后挤在大门口送别。我们紧紧地拥抱，——她哭，我也哭，马车开到了街上，转进巷子里（旁边就是那个卖荞麦饼和豌豆羹的地方），不见了；我走过院子——它显得这样冷，这样讨厌；我上楼到自己的房间——那里也显得空，显得冷。我坐下来做伊凡·叶符多基莫维奇教的功课，可是我一直在想：马车现在在什么地方，它是不是已经出了城门？

我的唯一的安慰是——明年六月我们一块儿在瓦西里叶夫斯柯耶！

对我说来乡下是复苏的时期，我非常喜欢乡村生活。树林、田野和自由自在——这一切对我这个在砖墙里面长大的娇生惯养的人是多么新鲜（我从来不敢不得到许可、不要听差陪同就找个借口走出大门）……

“我们今年是不是要去瓦西里叶夫斯柯耶？”从春天开始我就很关心这个问题。我父亲每年都在说，这一年他要早去，他想看见树木长叶子，可是他从来没有能够在七月以前动身。有两年他耽搁得太久，我们就索性不去了。他每个冬天都写信到乡下去，吩咐把房子准备好、房间烧暖和，这种做法多半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并不是认真的打算，——目的是让村长和乡干事害怕他随时到来，因此会更小心地办事。

看来我们就要动身了。我父亲对枢密官说他很想在乡下休息休息，田庄上的事情也需要他照料，可是几个星期又过

去了。

希望又渐渐地多起来了，需要的食品开始送出去了：糖、茶叶、各种谷物、酒——接着又是停顿，最后给村长发去了命令，要他在某一天派多少匹农民的马来，——这样看来，我们要动身了，真的要动身了！

我当时并没有想到，在地里劳动最紧张的季节损失四五天的工夫，对农民是多大的负担，我只是万分高兴，急急忙忙地收拾我的书和练习本。马已经牵来了，我听见它们在院子里大声咀嚼和喷响鼻子，心里很满意，我对马车夫忙来忙去，对仆人们争论谁坐哪一辆车，谁的行李放在哪一辆车上，很感兴趣。在仆人的房间里灯火点到天亮，大家都在打包装袋，把大小口袋到处拖来拖去，穿好上路的衣服。（一共才走八十多里[①]路！）我父亲的随从的脾气最大，他认为打包装袋十分重要，恶狠狠地把别人装好的东西全扔了出来，苦恼地拉自己的头发，简直叫人不能接近他。

我父亲第二天也绝不早一些起床，我看他起得比平日更晚，他像往常那样慢慢地喝咖啡，最后到了十一点钟，他才吩咐套车。六匹马拉的轿式马车里有四个座位，它后面还跟着三辆（有时是四辆）别的车子：一辆四轮马车，一辆轻便四轮马车，一辆带篷大车（或者换上两部农家大车）；这些车子里面装满了家仆和他们的东西；虽然运送行李的车队已经先期出发，可是车子里还是塞得满满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坐得舒服。

① 原文是维尔斯塔，即俄里，一个维尔斯塔等于一·〇六公里，下同。

我们半路上在一个大的村子彼尔胡希柯沃[①]停下来吃午饭、喂马，这个村子的名字在拿破仑的通报上也出现过。这个村子属于我在前面讲起分家时提到的那个“兄长”的儿子[②]。没有人照管的地主宅子立在大路上，四周都是平平的、凄凉的田地；可是我在城里给憋得透不过气来，看到了这个满是尘土的旷野，也非常喜欢。宅子里翘起来的地板和楼梯摇摇晃晃，脚步和声音听起来都很刺耳，墙壁就像受了惊似地发出了回声。从旧主人的珍品收藏室搬来的老式家具在这种流放生活中度过它们的残年；我怀着好奇心从一间屋子走到另一间屋子，上楼下楼，后来走进了厨房。我们的男厨子带着不高兴和讽刺的表情正在那里准备一顿快速的旅途午餐。庄园管理人照例坐在厨房里，他是一个头上长了瘤的白发老人；厨子对他批评起炉灶来；庄园管理人听厨子讲着，偶尔简单地回答一句：“也许，是这样。”他闷闷不乐地看着这一切骚扰，心里在想：“什么时候鬼才把他们带走？”

午饭开出来了，用的一套特制的英国餐具，是用洋铁或者别的什么材料做的，我们就是 ad hoc〔拉丁语：为了这个〕买来的。这个时候马也套好了；在门厅和门廊里聚集了一群喜欢迎送的人，他们是靠面包和乡间干净空气度过余生的听差和三十年前还是很好看的侍女的老太婆，——所有这些地主家

① 彼尔胡希柯沃村：在马查依斯科依公路上（白俄罗斯铁路上，离莫斯科三十三公里），拿破仑在信上曾提到它（一八一二年九月十二日）。

② “兄长”的儿子：指阿列克谢依·亚·雅科甫列夫（1795—1868）：作者的堂兄，即本书第六章里的“化学家”。

的蝗虫，自己并没有过失，但是他们却像真的蝗虫一样，吃光了农民的劳动果实。一些浅黄色头发的小孩同他们一起来；小孩们光着脚，一身泥土，老是朝前乱闯，那些老太婆总是把他们朝后拖。小孩们喜欢大喊大叫，老太婆们就大声呵斥他们；她们从来不肯放过我，每年都在惊讶我怎么长得这样快。我父亲对这些人讲了几句话；有几个人走上前来要亲他的手，他从来不把手伸给他们，其他的人鞠躬，——我们就动身了。

离戈里曾公爵[①]的维亚兹玛庄园几里路的光景，瓦西里叶夫斯柯耶的村长骑着马在树林边上迎接我们，把我们引进了乡下土路。在村子里，一条长的菩提树荫路通到主人的宅子，在宅子前面来迎接我们的有教士、教士的妻子、教堂的下级职员们、家仆们、几个农民，还有那个傻瓜普龙卡，只有他一个人表现出人的尊严这种感情，不肯揭下他那顶油污的帽子，他只是站在稍远一点的地方，微笑着，要是城里来的什么人想挨近他，他转身就跑。

我很少看见比瓦西里叶夫斯柯耶风景更优美的地方。对于熟悉昆采沃和尤苏波夫的阿尔汉盖尔斯柯耶或者洛普兴在沙文修道院对面的庄园[②]的人，只要告诉他们，瓦西里叶夫斯柯耶是同一条莫斯科河河岸的延长部分，离那个沙文修道院三十里，就够了。在有慢坡的河岸上——有村庄、教堂和主

---

① 德·瓦·戈里曾（1771—1844）：莫斯科总督（1820—1843），维亚兹玛庄园的主人，以专制、独断出名。

② 昆采沃、阿尔汉盖尔斯柯耶、沙文修道院对面的庄园：它们都是在莫斯科河高高的岸上的莫斯科近郊地主庄园。

人的老宅。在另一面——有山、有一个小村庄，我父亲还在那里修建了一所新宅。从这里可以看到周围十五里的景色；微微翻腾的麦浪无边无际；各种各样的庄园和有白色教堂的村庄到处都看得见；五颜六色的树林形成了一个半圆形的框子，莫斯科河像一根浅蓝色丝带在它中间穿过。大清早我在楼上我的房间里打开窗，我眺望，我倾听，我呼吸。

然而我怀念那所砖砌的老宅，也许是因为我头一次下乡住在那里的缘故；我非常喜欢那条通到宅子跟前的阴凉的林荫路和旁边那个荒芜了的花园；房子倒塌了，从门廊的一个裂缝里长出来一棵纤细、苗条的白桦树。左边沿着河岸有一条柳树的荫路，路外面是一片芦苇和白沙，它们倾斜下去与河水相接；我在十一岁、十二岁的时候，常常在这沙滩上，在这芦苇丛中整整地玩一个早晨。那个伛偻的老园丁差不多经常坐在宅子前面，蒸馏薄荷水、煮果子，偷偷地请我吃各种蔬菜。园子里有许多乌鸦；树顶上尽是它们的窝，它们经常绕着窝盘旋，呱呱地叫着；有时候，特别是在傍晚，它们几百只一齐飞起来，竞赛着哪一只叫得更响；有时候，一只乌鸦急急忙忙地在树丛中飞来飞去，然后全静了下来。……快到黑夜的时候，远处什么地方有一只猫头鹰一会儿像小孩似地哭着，一会儿发出一阵大笑。……我害怕这种古怪的哭声，然而我还是走去听它们。

我们每年或者至少每隔一年到瓦西里叶夫斯柯耶去。我去的时候，总是在靠阳台的墙上量过我的身高，作个记号，根据这个来检查我究竟长了多少。然而在乡下我不仅能够测量

我身体的长度，而且这种和同样事物定期接触的情况明显地向我指出我内心发展的变化。我带去的书不同了，使我感兴趣的事物也不同了。一八二三年我完全是一个小孩，我带的是小人书，而且连这些小人书我也不读，我对于在我房间近旁小贮藏室里做窝的兔子和松鼠倒更感兴趣。我的主要娱乐中有一样是：我父亲许可每天晚上放一次鹰炮[①]，这件事不用说叫全体家仆都忙起来，连五十岁的头发花白的老人也同我一样地开心。一八二七年我带的书是普卢塔克[②]和席勒[③]的著作；我经常大清早出去，走到树林里，走进密林里，尽可能走得远些，我躺在树下，大声读着剧中对白，把这里当作波希米亚树林[④]；然而我对我得到一个家仆小孩的帮助在一条小溪上修筑的堤坝也很感兴趣，我每天要跑去察看十来次，并且随时进行修补。在一八二九年和一八三〇年我写了论席勒的《瓦伦斯坦》的哲学论文[⑤]，——至于我从前的娱乐，只有鹰炮一样我还是十分喜欢。

然而除了放炮外，还有一样娱乐我对它的热爱始终未变，那就是——乡村夜景；现在和那个时候一样，这样的夜晚对我

---

① 鹰炮：过去使用的老式小口径炮。

② 普卢塔克(约46—约120)：古罗马教育家和作家，他的著作，论述希腊罗马名人的《传记集》在西方史学上占重要地位。

③ 约·弗·席勒(1759—1805)：德国诗人。

④ 波希米亚树林：席勒的五幕剧《强盗》中："强盗们"藏身的地方。

⑤ 作者的这篇文章并未保存下来。《瓦伦斯坦》是席勒的三部曲(剧本)。第一部：《瓦伦斯坦的阵营》(十一场)；第二部：《皮柯乐米尼父子》(五幕)；第三部：《瓦伦斯坦的死》(五幕)。

依然是虔诚、宁静和诗的时刻。我生活中最近一些明净的时刻里有一次使我记起过去乡村的夜晚。太阳庄严地、光辉地渐渐下落到一个火海里,溶化了。……浓浓的紫红色一下子变成了深蓝的幽暗,什么都给蒙上了一层烟霭,在意大利黄昏来得快。我们骑着骡子;从弗拉斯卡提到罗马,[①] 我们要经过一个小村庄;有些地方已有灯光闪烁,万物都很幽静,骡蹄声音清脆地踏在石头上,新鲜的而且有点潮湿的风从亚平宁山吹过来。我们走出了村子,看见一尊小小的圣母像立在一个壁龛里,面前点着一盏灯;农家姑娘收工回来,头上还包着白头帕,她们跪在像前唱起了祷告诗,一些过路的吹木笛讨饭的山地牧民[②] 也同她们一起唱着。我的心给深深地打动了,我很受感动。我们互相望着……骑着骡子慢慢地到 osteria〔意大利语:客栈〕去,马车在那里等候我们。我们回家的路上,我谈起瓦西里叶夫斯柯耶的夜晚。可是我谈些什么呢?

> 园里的树静悄悄地立着,
> 村子的围篱蜿蜒地竖在山中,
> 成群的牛羊没精打采地
> 慢慢走在回家的路上。　　　　(《幽默》)[③]

……牧人把他的长鞭子抽得响,吹起他那支桦树皮做的

① 作者指的是他们夫妇一八四七年末到一八四八年初在意大利的旅行。弗拉斯卡提在罗马省,是一个避暑的地方,有古罗马时代的遗迹。

② 山地牧民:指意大利南部阿布鲁威的善吹木笛的山地牧民。

③ 见尼·普·奥加略夫的长诗《幽默》的第二部分。

笛子；牛羊的叫声，回来的畜群的哞哞声、咩咩声和过桥的杂沓声，狗边叫边追赶一只失散的羊，这只羊足步有些呆板地跑着；随后从地里回来的农家姑娘的歌声越来越近了——可是小路向右转了弯，歌声又远去了。大门轧吱地响了一声，男孩、女孩从房子里跑了出来，迎接他们的牛羊；劳动结束了。孩子们在街上、在河边玩，他们的声音清脆地荡漾在河面上和晚霞中；空气里掺和着禾捆烤干房的焦味；露水开始在田地上渐渐地铺起来，像烟一样；风吹过树林发出一种声音，仿佛树叶给煮沸了；远处的闪电颤抖着，用一种快要消失的、闪烁的浅蓝色光照亮了四周，——这个时候，韦拉·阿尔塔莫诺夫娜与其说是生气，不如说是爱唠叨，她在菩提树下找到我，就说：

“怎么到处都找不见您？茶早准备好，大家都坐好了，我可是找您呀，找您呀，找得腿都乏了，在我这个年纪我实在跑不动；您为什么像这样躺在潮湿的草上面呢？……您明天会伤风的，一定会。”

“好，够啦，够啦，”我边笑边对这个老太婆说，“我不会伤风的，茶我也不想喝，不过您给我偷点好的奶油来，要最上面的。”

“真是的，瞧您那个样，真叫人没法生您的气。……什么好吃的东西！我不等您要，早就给您把奶油准备好了。您瞧这闪电……好！对庄稼有好处。”

我一边跳着，一边轻轻地打口哨，走回家去。

一八三二年以后，我们就没有再到瓦西里叶夫斯柯耶去。

在我流放期间我父亲把它卖了。[①] 一八四三年我们住在莫斯科近郊的另一个庄园[②]，在兹威尼戈罗德县，离瓦西里叶夫斯柯耶二十来里。我忍不住要去看看我们的故居。我们又坐车经过那条乡下土路；熟悉的松林和长满榛树的山出现在眼前，然后是过河的浅滩——这个浅滩二十年前带给我很大的快乐，——流水的飞溅声，小石子的嘎吱声，马车夫的吆喝，马的挣扎……于是到了村里，到了教士的房屋，过去教士经常坐在小长凳上，穿一件棕褐色的教士内长衣，他朴实、善良，红头发，经常淌汗，老是在咀嚼什么东西，他一直有打呃的毛病；我们到了办事处，乡干事瓦西里·叶皮法诺夫正在写报告书，他从来没有清醒过，蜷伏在纸上，捏住笔杆的紧底下，把中指紧紧地弯起来顶住它。教士死了，瓦西里·叶皮法诺夫还在另一个村子里记帐、写报告，并且拚命喝酒。我们在村长家停留了一会，只见到他的妻子，原来丈夫在地里。

这十年中间在这里出现了一些陌生的东西；我们山上的房子没有了，换上了一所新的宅子，它旁边还修建了一座新的花园。我们经过教堂和墓园回来的时候，我们遇见一个很难看的怪物，几乎是四肢爬着慢慢地往前走；它向我指点着什么，我走上前去：原来是一个驼背的、瘫痪的、半疯狂的老太婆，靠人周济度日，在前任教士的菜园里干点活；她当时已经

---

① 一八三五年卖给作者的表兄尼可拉·巴甫洛维奇·戈洛赫瓦斯托夫(1800—1846)。

② 即波克罗夫斯柯耶－扎谢基诺村，离莫斯科五十二公里。

七十光景，可是死偏偏躲开她。她认出了我，流着泪，摇摇头，反复地说：

“啊呀，你也老多了，我只有从你走路的样子才认出你来——可是我——我已经——啊——啊呀——还是不谈吧!”

我们坐车回去的时候，我远远地望见村长在地里，还是我们从前的那个村长；他起初没有认出我来，可是我们车子走过以后，他好像忽然想了起来，脱下帽子，深深地鞠躬。我们又走了一阵，我回过头去：村长格利哥里·戈尔斯基仍然站在原处，望着我们的背影；他那在麦田中间鞠躬的长着大胡子的高高的身形友好地给我们送别，把我们送出已经到了别人手里的瓦西里叶夫斯柯耶。

第四章

尼克和麻雀山

“那么你写吧，写下来，在这个地方（在麻雀山）我们的（就是说我的和你的）生活的故事是怎样发展起来的。”

——摘自一八三三年的信。①

在我上面讲到的〔表姐来的〕② 时候的前三年，我们有一天在莫斯科河畔卢日尼基（就是在麻雀山的另一面）散步。我们就在河边遇见了我们认识的一个法国家庭教师，身上只穿了一件衬衫，他吓得不得了，大声叫着：“他落水了！ 他落水了！”可是不等到我们这位朋友脱掉衬衫或者穿上裤子，一个乌拉尔哥萨克就从麻雀山跑了下来，跳进河里不见了，过了一分钟他又出现了，带出来一个奄奄一息的人，这个人的脑袋和胳膊好像悬挂在风里的衣服一样，摆来摆去。他把这个人放

① 指一八三三年六月七日尼·奥加略夫给作者的信，但不是照录原信。

② 括弧里的字是英译者加的。

在岸上，说道："他还没有缓过气来，得摇摇他。"

周围的人凑了五十个卢布送给哥萨克人。哥萨克人并不推辞，很老实地说："做这种事情拿钱是罪过，而且可以说，毫不费力，你们瞧这个人，像一只猫。"他又说："不过话又说回来，我们是穷人，伸手要钱，我们是不要的；可是既然有人给了钱，为什么不拿呢？真正十分感谢。"他拿手帕包好了钱，又上山放马去了。我父亲问到了他的姓名，第二天，便给艾森写了信去，讲起这件事情，艾森提升他做军士。过了几个月这个哥萨克人来看我们，他带来一个麻脸、秃顶的德国人，德国人身上洒了香水，头上还戴着卷曲的浅黄色的假发，他来替哥萨克人向我们道谢，——这就是落水的人。从此他经常到我们家来。

卡尔·伊凡诺维奇·仲伦倍格当时担任两个放荡子弟的德语家庭教师刚刚结束，他离开他们，便到一个辛比尔斯克地主的家里，从那里他又到了我父亲的一位远亲[1] 的家中。仲伦倍格照顾一个男孩的健康，并且教他学习德语标准发音，仲伦倍格称呼这个男孩做尼克，我很喜欢他，他有一种善良的、温和的、喜欢梦想的气质；他和我平常遇见的别的男孩不同；然而我们却成了要好朋友。他沉默寡言，喜欢沉思；我爱玩、好动，不过我也不敢打扰他。

在我那特威尔省的表姐回柯尔切瓦的前后，尼克的祖母死了（他在幼年时期就失去了母亲）。他们家里乱得不得了，仲伦倍格无事可做，他也帮忙张罗，做出疲于奔命的样子；那

① 远亲：指普·包·奥加略夫（死于一八三八年），尼·普·奥加略夫的父亲。

天一早他带了尼克来，要求让尼克在我们家待完这一天。尼克又伤心，又害怕；大概他很爱他的祖母。后来他是这样富于诗意地记起她：

现在在夜晚时间
霞光照着长长的路，
我记得在我们家中
我们仍旧遵守古老的风俗，
每个星期日的前夕
白发庄严的教士到我们这里，
还有那些助祭执事们同他一起
跪在神像面前祈祷。

白发老太太，我的祖母，
站在那里，靠着扶手椅，
拨动着她的念珠，
她埋下头低声祷告。
房门口一群熟习的仆人
在把那祝告聆听，
他们鞠躬到地，
要求赐给他们长生不死。

这个时候有一抹晚霞
映在玻璃窗上……
从香炉里冒出的一缕青烟
在大厅中飘散。

这里是一片深沉的肃静，
只听见教堂执事诵经的声音，
一种模糊的渴望
压在我的心上。
我感到莫名的忧伤，
搀杂着孩子的幻想，
不知为了什么，我心里充满了
我自己也讲不出来的渴望。

（《幽默》）①

……我们稍微坐了一会儿，我便提议读席勒的作品。我很惊奇我们的兴趣完全一样；他记住的东西比我记得的多，而且正是我最喜欢的那些地方；我们放下了书，可以这样说，互相试探我们之间的同感。

从袖子里藏着匕首"要把城市从暴君手中解放出来"的米罗斯②，从在吉斯那黑特附近的狭窄山路上等待总督的威廉·

---

① 这里的诗还是从奥加略夫的《幽默》的第二部分引来的。中间删去了四行半，用虚点来表示。

② 米罗斯：公元前一世纪左右罗马作家希吉鲁斯歌颂忠实友谊的故事中的反暴君的希腊英雄。他被判死刑，要求回家三天办理妹妹出嫁的事，这期间由友人赛里龙提乌斯入狱为他担保。他办好私事回原地，路上遇到困难，到达时间稍微迟了些，他的朋友快要被钉到十字架上了，但是他并未超过期限。国王知道这个情况，就下令释放了这两个朋友。这个故事收在希吉鲁斯的《故事集》中。席勒根据这个故事写了他的叙事诗《担保》，不过主人公的名字改用另一同类传说中一对友人的名字：达蒙和皮提亚斯（席勒只写出达蒙一个人的名字）。这里引用的一行诗是从原诗第一节中引来的。

退尔[①]，过渡到十二月十四日和尼古拉〔一世〕是容易的。这些思想和这种对比对尼克说来并不是陌生的。普希金和雷列耶夫的没有发表的诗他也熟悉；他和我偶尔遇到的那些头脑空虚的男孩有显著的区别。

这以前不多久，我散步到普列斯年斯基水池，脑子里装满了布肖的恐怖主义，我向一个和我同岁的同伴说明处死路易十六是正确的行动。

"就算是这样吧，"年轻的奥——公爵说，"不过您知道他是涂过圣油的君主啊！"

我怜悯地看了看他，不再喜欢他，以后就再也没有去找过他了。

我和尼克之间就没有这种障壁，他的心跳得同我的一样，他也离开了阴森的保守派的海岸；我们只有更加同心协力撑得离岸更远，我们几乎是从第一天起就下定决心要为扶持康斯坦丁皇太子竭尽全力！

在这以前我们很少长谈过，卡尔·伊凡诺维奇就像秋天的苍蝇那样打扰我们，而且我们每次谈话都因为有他在场受到妨碍；他什么也不懂，却什么都要管、要批评，拉直尼克的衬衫的领子，连忙回家，总之，非常令人讨厌。过了一个月，我们两天不见面或者不通信就受不了；我由于容易冲动的天性越来越离不开尼克了，他也静静地、深深地爱着我。

---

① 威廉·退尔：瑞士山民中的勇士，自由射手。这里指席勒五幕诗剧《威廉·退尔》第四幕第三场的开始，在这一场中威廉·退尔用箭射死了总督。

我们的友谊从一开始就带着严肃的性质。我不记得在我们中间顽皮、恶作剧占重要地位的事情，特别是我们两个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当然，我们不会安静地坐在一个地方，我们的年纪到底还小，我们喜欢打闹、逗笑，戏弄仲伦倍格，在院子里弯弓射箭；不过在这一切的基础上有一种和玩乐朋友关系完全不同的东西。除了我们的同样年纪，除了我们的“化学的”亲合力之外，我们还是由共同的信仰结合在一起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事物像激昂慷慨的全人类利益那样，使一个人的少年时期纯洁、高尚，保护它不受腐蚀。我们尊重自己身上的我们的未来，我们认为彼此都是命中注定的优秀的人。

我和尼克常常走到城外，我们有两个心爱的地方——麻雀山、德拉果米洛夫门外的田野。他总是在早晨六、七点钟同仲伦倍格一起来找我，倘使我还在睡，他就朝我的窗扔沙子和小石子。我醒过来，微微笑着，连忙出去见他。

这种早晨的散步是固执的卡尔·伊凡诺维奇规定的。

在奥加略夫所受的地主-宗法式教育中，仲伦倍格扮演着比伦[1] 的角色。他来了以后原来带孩子的老家人[2] 的影响消除了；这位门房里的寡头虽然不满意，却不得不勉强忍住，因为知道那个该死的德国人和老爷同桌吃饭，奈何他不得。

---

① 比伦：安娜·伊凡诺夫娜女皇的宠臣，她在位期间，实际的统治者是艾·比伦。参看第九二页注①。

② 老家人：指伊·米·布拉托夫，在尼·奥加略夫幼年时期照管他的老仆人。

仲伦倍格急剧地改变了原先的秩序,老家人知道那个德国鬼子把少爷本人带到店里去买现成的靴子,他竟然流了眼泪。仲伦倍格的改革和彼得一世的改革一样,特点是甚至在最和平的事情上也带了一种军事的性质。这并不是根据卡尔·伊凡诺维奇的瘦削的肩上佩带过肩章或者带穗肩章来论断的。德国人生来是这样:要是他达不到一个语言学家或者神学者的不修边幅和 sans-gêne〔法语:随便、不拘小节〕,那么即使他是个文职人员,他也还是有军人的气味。由于这个,卡尔·伊凡诺维奇喜欢窄小的衣服,扣紧钮扣,并且显出腰身来,由于这个,他严格遵守他自己的规矩,要是他规定早晨六点起身,他就在五点五十九分叫尼克起来,再迟也不超过六点零一分,就同尼克出去呼吸新鲜空气。

卡尔·伊凡诺维奇几乎淹死在山脚下的麻雀山,不久就成了我们的"圣山"。

有一天午饭后我父亲说要坐车到城外去。奥加略夫在我们家,我父亲就约他和仲伦倍格同去。这次出游简直是受罪。我们坐在有四个座位的轿车里走了一个小时或者更多一些,才到了城门口,这辆车子虽是"约兴制造"① 的,但在十五年的平稳使用中也不免变旧,变得不成样子,而且依旧比一尊攻城炮重。四匹拉车的马大小不同,毛色不一,它们闲得发胖变懒了,跑了一刻钟就浑身出汗冒气;马车夫阿符杰得到命令,不准出现这种情况,他只好让它们慢步走。不管天气怎样热,

① 约兴:当时在莫斯科和彼得堡著名的马车制造商。

窗始终关着；除了这一切，还有我父亲连续不断、叫人受不了的监视和卡尔·伊凡诺维奇的手脚忙乱而又叫人厌烦的监视，——但是为了我们两个能在一起，我们心甘情愿地忍受下来了。

在卢日尼基我们坐小船过莫斯科河，正好停在哥萨克人上次从水里拉出卡尔·伊凡诺维奇的地方。我父亲像平日那样拱着背，愁眉苦脸地走着；卡尔·伊凡诺维奇在他旁边用细碎步子走，一面同他谈些闲言闲语和无聊废话。我们走在他们的前头，越走越远，跑上了麻雀山，跑到维特别尔格① 的教堂埋置基石的地方。

我们喘不过气来，脸通红，站在那里擦汗。太阳在往下沉，圆屋顶闪闪地发光，城市铺展在山下一望无际的地面上，清新的微风迎面吹来，我们站着，站着，互相依靠着，突然间我们拥抱起来，我们当着整个莫斯科发誓，要为我们所选定的斗争献出我们的生命。②

这一件事，别的人可能认为是十分不自然，十分做作的，可是我在二十六年以后想起它，还感动得流泪；它是极其真诚的，我们的整个一生就可以为它作证。然而在这个地方作的

---

① 亚·拉·维特别尔格(1787—1855)：俄国建筑师和画家。他设计过纪念一八一二年卫国战争胜利的宏伟教堂，准备建筑在麻雀山上。他担任教堂的建筑师和修建委员会主任。他后来受到官僚们的阴谋陷害，被判罪，流放到维亚特卡(1835—1840)，在那里同作者结交，参看本书第二卷第十六章。

② 作者和奥加略夫在麻雀山上宣誓的最可信的日期是一八二七年，参看涅奇基娜的《奥加略夫的〈我的自白〉》。

一切誓言都会得到同样的命运；亚历山大〔一世〕在这里埋置那座教堂的第一块基石的时候，他也是真诚的，[1]这块基石正如约瑟二世[2] 在为新俄罗斯[3] 某一个城市奠基的时候所说（虽然当时说得不对）会成为最后的一块基石。

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所反对的敌人的全部力量，然而我们进行了战斗。那个力量使我们受到很大的损害，可是它并没有完全打败我们，不管它怎样打击我们，我们并没有投降。从它那里得到的伤疤都是光荣的。雅各的扭伤的大腿窝就是他夜里同神摔跤的记号。[4]

从那一天起麻雀山就成了我们朝拜的地方，我们一年要去一两次，而且总是单独去。在这个地方，五年以后奥加略夫胆怯地、不好意思地问我是不是相信他有写诗的才能，这以后在一八三三年他又从他的乡下写信来，说："我离开了，我很忧郁，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忧郁。完全是为了麻雀山。长时期来我隐藏起我的喜悦；不好意思或者别的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的原因阻止我把它倾吐出来，然而在麻雀山上这种喜悦并不

① 一八一七年十月十二日在麻雀山为维特别尔格设计的教堂举行奠基典礼。"皇帝陛下埋置了第一块基石。"（见同年十月二十六日的《圣彼得堡新闻》。）

② 约瑟二世（1741—1790）：所谓"日耳曼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765—1780）；匈牙利国王（1780—1790）。他在一七八〇年曾到俄国访问过叶卡捷琳娜二世。

③ 新俄罗斯：帝俄十八、十九世纪对欧俄南部黑海北岸和亚速海岸一带地区的总名称。

④ 雅各同天使摔跤，天使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扭伤了。这个故事出于《旧约全书·创世记》第三十二章。

曾让孤独压了下去。你同我分享了这种喜悦，这些时刻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它们就像过去幸福的回忆一样，在我的旅途中伴随着我，虽然一路上我见到的只是树林；一切都是这么深蓝，深蓝，而我的心上却是一片黑暗，黑暗。"①

"你写吧，写下来，"他收尾写道，"在这个地方（在麻雀山）我们的（就是说我的和你的）生活的故事是怎样发展起来的。"②

又过了五年，我远离麻雀山，可是麻雀山的普罗米修斯③——亚·拉·维特别尔格阴郁地、忧伤地站在我的身边。一八四二年我最后回到莫斯科，我再去访问麻雀山，我又立在那个埋置基石的地方，眺望同样的远景，也是两个人——不过却不是同尼克了。④

从一八二七年起我们就没有分开过。每次我回忆起那个时期，不论是单独的或者共同的回忆，他和他那带孩子气的面貌以及他对我的友爱总是占着最显著的地位。在他身上很早就显出来一种少数人所具有的天赋，对他这究竟是祸还是福，我不知道；不过这却使他和一般人不同。奥加略夫那个时候（一八二七——一八二八年）的一幅大的油画像挂在他父亲的

① 引用尼·奥加略夫一八三三年六月七日来信里的话。

② 这一段话不是照录原信。

③ 普罗米修斯：希腊神话中的盗火者，他偷了大神宙斯禁止给人间的神火赐给了人类，因此被罚锁在高加索高山上，让饿鹰啄食他的肚肠，后来被希腊英雄赫拉克勒斯所救。

④ 这一次作者是和他的妻子娜塔里雅·亚历山德罗芙娜·赫尔岑同去的。

宅子里一直挂了好些年。后来我常常站在画像前长久地注视他。在画上他穿着翻领的衬衫；画家出色地绘出了他那浓密的栗色头发，他脸部不规则的线条构成的少年时期尚未定型的美和他那稍微带黑的肤色；画布上还可以看出显示着睿智的沉思；他的灰色的大眼睛闪露出一种无意识的忧郁和极端的温和，这对眼睛暗示着一个伟大心灵未来的成长；他后来果然长成了这样。这幅画像本来是送给我的，却让一个陌生的女人[①] 拿走了——也许她会见到这几行文字，她会把它给我送来吧。

我不知道人们为什么给初恋的回忆以某种专利，而忽视了青年友情的回忆。初恋的芬芳在于它忘记了性别，在于它是热烈的友情。另一方面，青年间的友情有着爱情的全部热情，和爱情的一切特点：同样不好意思地害怕用言语谈到自己的感情，同样不信任自己，同样无条件的忠诚，同样离别时的万分痛苦，同样完全独占的妒忌的欲望。

我早已爱着尼克，而且热烈地爱他，可是我下不了决心称他做“朋友”，他在昆采沃过夏天的时候，我写给他的信中末尾说：“我是不是您的朋友，我还不知道。”他先在信里用“你”称呼我，并且经常按照卡拉姆辛的方式称我做他的阿加统[②]，我

---

① 陌生的女人：指叶·瓦·沙里阿斯·德·屠尔涅米尔伯爵夫人（1815—1892），作家，笔名叶甫盖尼雅·屠尔，尼·奥加略夫的友人。原画下落不明。

② 尼·米·卡拉姆辛（1766—1826）：俄国历史学家和感伤主义作家，阿加统是他创造的人物，见他的《我的阿加统墓前的花》。

也根据席勒称他做我的拉法依尔[1]。

您要笑，就请笑吧，只是请温和地、好心地笑，就像想到您自己十五岁时候那样地微微一笑。或者还不如思索这个问题："难道盛年的我竟是这样？"[2] 而且，倘使您有过青春（单单是年轻过，这是不够的），那就要感谢您的命运，倘使那个时候您还有一个朋友，那就要加倍地感谢。

那个时期的语言我们现在看来显得不自然而且带书卷气了，我们已经不习惯它那种动摇不定的热情，它那不和谐的兴奋（这种兴奋又会突然转为缠绵的温情或者小孩般的大笑）。一个三十岁的男人要像有名的"Bettina will schlafen〔德语：贝丁娜要睡觉〕[3]"那样，就荒谬可笑了，然而在当时，这种少年的语言，这种 jargon de la puberté〔法语：成年人的行话〕，这种心理声音的变化是十分真诚坦率的，连书卷气的腔调，对于理论上有知识而实际上无知的年龄来说，也是很自然的。

席勒仍然是我们喜爱的。[4]他的剧本中的人物在我们的

---

① 见 *Philosophische Briefe*〔德语：《哲学书信》〕。——作者原注。拉法依尔：这是席勒的《哲学书信》中两个通信人之一。

② 这一句诗是从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里引来的，见原书《奥涅金的旅行（断章）》。

③ 贝丁娜·冯·阿尔宁姆（1788—1859）：德国作家，她的著作中有一本是《歌德同一个孩子的通信》，是她同歌德的通信集，里面有一封她在一八〇八年七月二十六日写给歌德的信，收尾有这样的话："我倦了，亲爱的歌德，我得睡了。"

④ 席勒的诗对我的影响并没有消失；几个月以前我向我的儿子朗读《瓦伦斯坦》，这是一部巨著！凡是丧失了对席勒的爱好的人，他不是变老了，就是成了学究，或是变得冷酷，或是忘记了自己。不过对那些在十七岁时候就非常清楚自己缺点的早熟的 altkluge Burschen〔德语：小老头儿〕该怎么说呢？——作者原注

眼里都是活着的人;我们分析他们,爱他们,恨他们,不是把他们当做诗的创作,而是当作活人。而且我们在他们身上看到了我们自己。我写信给尼克,有点担心他太喜欢费艾斯科①,而在"每个"费艾斯科的背后就站着他的威利纳②。我的理想人物是卡尔·穆尔③,可是不久就改变了,换上了波查侯爵④。我设想了一百种不同的方式,我怎样对尼古拉⑤讲话,他以后怎样把我送到矿山或者处死。奇怪的是,所有我们这些幻想的收场都是西伯利亚或者死刑,几乎没有胜利的结局。难道这是俄国人的想象方式?不然就是彼得堡用它的五座绞架和苦役劳动在年轻一代身上产生的效果?

就这样,奥加略夫,我同你手拉手,我们一起走进了生活!我们无畏地、自豪地前进,我们慷慨地响应每一个号召,我们真诚地为了每一次的热情献出自己的一切。我们挑选的并不是一条容易走的路,可是我们从来没有离开过它;我们负了伤,受到损害,我们仍然前进,也没有人追过我们。我走到了……不是到了目的地,而是到了下山路开始的地点,我不知不觉地伸出手来找你的手,让我们一起走下去,让我握住你的

① 费艾斯科:席勒的早期作品五幕悲剧《热那亚费艾斯科的密谋》中的主人公,费艾斯科伯爵是策划这个反对多利亚朝暴虐统治者的密谋的年轻领袖。

② 威利纳:《费艾斯科的密谋》中的一个人物,密谋的参加者,最后他把费艾斯科推到海里淹死,因为费艾斯科执政以后也成了暴君。

③ 卡尔·穆尔:席勒的五幕剧《强盗》中的主人公,穆尔伯爵的长子,"强盗"的头子。

④ 波查侯爵:席勒的五幕悲剧《唐卡洛斯》中的马尔他骑士。

⑤ 尼古拉:指沙皇尼古拉一世。

手，带着忧郁的微笑说："再没有别的了！"

在我烦闷无聊的空闲时候（这是我生活中那些事故判定我忍受的），我在自己身上找不到力量，也找不到朝气来从事新的工作，我就写下我们的回忆。许多把我们非常紧密地连结在一起的东西都凝聚在这些篇幅里面了。我把它们献给你。对你说来，它们有双重的意义，——还有墓碑的意义，在这些碑上我们会遇见熟悉的姓名。①

……现在想起来难道不奇怪，要是仲伦倍格会游泳，或者要是他当时淹死在莫斯科河里，或者要是救起他的不是一个乌拉尔哥萨克轻骑兵，而是阿普谢龙斯基步兵团的兵士，那么我就不会遇见尼克，或者后来才遇到他，而且情况一定不同，我们不会在我们老宅的那间屋子里偷偷地抽着雪茄，深入彼此的生活，互相汲取对方的力量。

他并没有忘记它——我们的"老宅"。②

老宅，老朋友！我来探访，
终于见到你一片荒凉，
我又回忆起过去的时日，
我忧郁地向你凝望。

---

① 写于一八五三年。——作者原注。作者的母亲在一八五一年遇难，他的妻子一八五二年病故。

② 伊·阿·雅科甫列夫的宅子在莫斯科勃·符拉西叶夫斯基巷，作者一八二四至一八三〇年在这里居住。宅子并未保存下来。

眼前这院子久无人扫，
井已崩塌，井水腐败，
往日悄悄私语的枝上绿叶
枯黄地朽烂在潮湿的土壤。

房屋衰败，荒芜，
灰泥散落在四处，
灰色浓云在天空移动，
见到这里的情景也忍不住哀哭。

我走了进去。屋子没有改变，
牢骚满腹的老人经常坐在这里埋怨，
我们不喜欢他那些谈话，
他的冷酷无情的语言使我们烦厌。

啊，就是这间小屋，从前在这个地方，
我们的心灵融合在一起，
许多光辉的思想在这里产生，
在这间小屋，在早已流逝的年光。

一颗小星的微光射进窗里，
墙壁上留着我们的字迹：
青春之火在我们心灵中燃烧，
我们当时亲手写下这些字句。

这间屋子里曾经产生
幸福的往事，欢乐的友情，
如今蜘蛛网悬挂在角上，
这里只有荒凉，死气沉沉。

我突然感到恐怖，我颤栗，
我好像来到了墓地，
我呼唤我死去的亲人，
却没有一个死者苏醒。①

① 见尼·彼·奥加略夫的诗《老宅》。

第五章

家庭生活的细节——俄国的十八世纪的人——我们家里的一天——客人和 habitués〔法语：常来的人〕——仲伦倍格——随从和其他的人

我们家里那种难以忍受的寂寞无聊一年比一年更厉害了。要不是我进大学的时间已经逼近，要不是新的友谊，要不是我对政治的强烈兴趣，要不是我的生性活泼，那么我就会离家出走，不然就会死亡。

我父亲很少有高兴的时候，他总是对所有的人都不满意。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有很敏锐的观察力，看得很多，听得很多，也记得很多；他是一个 accompli〔法语：道地的、完美的〕上流社会的人，他可以做到非常亲切有礼貌，又使人发生兴趣，然而他不肯这样做，却越来越厉害地变得喜怒无常，跟人们疏远了。

很难说究竟是什么东西把这么多的苦恼和愤怒带进了他的血里面。热情奔放的时期，大不幸的时期，错误和挫折的时期，在他的生活里完全不曾有过这些。我始终不能完全明白那种他心灵里充满的毒辣的挖苦和忿恨、他那种多疑的孤僻

和那种一直在折磨他的烦恼是从什么地方来的。难道他还有什么从来没有告诉人的回忆让他带进了坟墓，不然这只是像十八世纪和俄罗斯生活这样两种完全对立的东西得到那个大大助长了喜怒无常脾气的第三者（地主的闲散）的帮助结合起来所产生的结果？

上个世纪① 在西方，特别是在法国，产生了一批出色的人，他们具有摄政时期② 的一切弱点和斯巴达与罗马的一切优点。这种浮布拉斯③ 和列古路斯④ 的结合体——把革命的门大打开，首先冲了进去，争先恐后地赶到断头机的“窗口”。我们这个时代不会再产生这种一贯的、刚强的人物；刚相反，上个世纪到处在召唤他们，即使是并不需要他们的地方，即使是他们在那里只能发展为怪人的地方。在俄国受到这种强大的西方潮流影响的人不会成为历史的人物，却成了一些古怪的人。他们在本国是外国人，在别国也是外国人，他们是懒散的旁观者，在俄国人看来他们是让西方的偏见败坏

① 上个世纪：指十八世纪。

② 摄政时期：指一七一五至一七二三年路易十五未成年时由奥尔良王室的菲力浦摄政的时期。

③ 浮布拉斯：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期间国民议会的议员（右派）卢威·德·古弗内（1760—1797）在革命前写的《骑士浮布拉斯冒险记》的主人公。

④ 马·阿·列古路斯（死于公元前二五〇年左右）：罗马的英雄、政治家，曾任执政官。他打败过迦太基的舰队，后来又大败迦太基的陆军。迦太基后来得到斯巴达人的援助，他因此在公元前二五五年战败被俘。公元前二五〇年迦太基派人到罗马议和，要他同去，约定议和不成，他仍要回到迦太基。到了罗马，他劝元老院主战，他自己仍回迦太基作俘虏，被处死。

了，在西方人看来，他们又是让俄国的习惯毁了，他们是一种聪明的多余人，他们完全沉溺在矫揉造作的生活里、肉欲的快乐中和叫人受不了的利己主义里面。

这一类人中间在莫斯科占首要地位的就是在智慧和财富两方面都极显要的俄国大贵族和欧洲的 grand seigneur〔法语：显贵〕，鞑靼公爵尼·包·尤苏波夫。在他周围聚集了一大批头发白了的喜欢向妇女献殷勤的人和 esprits forts〔法语：自由思想者〕，所有的玛沙尔斯基[1] 们、山契[2] 们，以及 tutti quanti〔意语：一切其他的人〕。他们全是有相当修养的、文化程度相当高的人；他们无事可做，就拚命去享乐，娇纵自己，爱护自己，温厚地宽恕自己的一切罪孽，他们夸大自己讲究饮食的行为，说是柏拉图式的感情[3]，同时又把他们对女人的爱情缩小地说成一种老饕的贪馋。

这个上了年纪的怀疑派和享乐主义者尤苏波夫是伏尔泰和博马舍的朋友，又是狄德罗[4] 和卡斯提[5] 的友人，他的确有艺术的欣赏力。要证实这一点，只消到阿尔汉盖尔斯柯耶去看看他收藏的美术品就行了，当然是说，要是他的继承人还

---

① 彼·格·玛沙尔斯基(死于一八三九年)：俄国政治家米·斯彼兰斯基(亚历山大一世的国务大臣)的亲密朋友。

② 亚·里·山契(1769—1838)：俄国中将，伯爵，做过基辅省长(一八一一年)。

③ 指精神恋爱。

④ 德·狄德罗(1713—1784)：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和作家，百科全书的创办者和编辑人。

⑤ 基·卡斯提(1724—1803)：意大利诗人，一七七八年曾访问俄国，后来写过一首讽刺叶卡捷琳娜二世宫廷的讽刺诗。

没有把那些美术品一点一点地卖出去的话。他是在八十岁时在大理石的、画上的和活着的美人中间豪华地死去的。在他的莫斯科郊区的住宅里普希金同他交谈过，还寄给他一首优美的诗信[①]，贡扎加[②] 在那里作过画，尤苏波夫把自己的戏院专供贡扎加使用。

我父亲由于他所受的教育，由于他在禁卫军里服过役，由于他的生活和社会关系，是属于这个圈子的；不过他的性情和他的健康都不允许他到七十岁还过着轻浮荒唐的生活，于是他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他想过一种孤独的生活，可是他却把生活安排得死气沉沉，无聊乏味，尤其因为他想安排得专为他自己，结果更是无聊乏味。他那坚强的意志变成了固执的任性，他那无处使用的精力败坏了他的性格，使他变得更不合群了。

他上学念书的时候，欧洲文明在俄国还是很新的东西，因此上学念书就等于尽量消除俄罗斯的气味。他毕生写法文比写俄文更流畅、更准确。他 à la lettre〔法语："真正地"〕不曾读过一本俄文书，连俄文圣经也没有读。不过别种文字的圣经他也没有读过；他知道人们经常谈论的圣经中的事情，一般都是听来的或者是从摘句中看到的，他也不想知道得更多些。

---

① 诗信：指普希金的诗《致某显贵》（一八三〇年）。

② 彼·戈·贡扎加（1751—1831）：意大利画家，舞台装置家和布景画家，十八世纪九十年代初移居俄国，创作了很多舞台布景，其中有一些仍然保存在阿尔汉盖尔斯柯耶庄园。庄园的戏院修建于一八一八年。庄园现已改为博物馆。

他的确佩服杰尔查文[①]和克雷洛夫[②]:因为杰尔查文写过一首诗悼念他的舅父美谢尔斯基公爵[③],克雷洛夫在尼·尼·巴赫美捷夫[④]的决斗中同他一起充当助手。我父亲有一次拿起了卡拉姆辛的《俄国史》,他听说亚历山大皇帝读过它,可是他不久就把它丢开,轻视地说:"全是伊齐亚斯拉维奇家族[⑤]和奥尔戈维奇家族[⑥],怎么能叫人感到兴趣呢?"

他毫无隐瞒地、毫不掩饰地瞧不起人——而且是所有的人。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信任别人,我不记得他向什么人提过重要的请求。他自己也从不为别人做什么事情。他同外人交往中只要求一件事——遵守礼节;les apparences, les convenances〔法语:外貌,礼节〕构成他的全部道德的信条。他可以宽恕许多事情,或者说得恰当些,放任许多事情,但是任何违反规矩和礼节的行为都会使他愤怒失常,这个时候他就完全不能容忍了,连一点点宽大和怜悯也没有了。我一直暗中愤恨他这些不公正的行为,到后来我才了解了他:他先就认定每个人都可能做一切坏事,倘使没有做,或者是因为没有这个需

---

① 加·罗·杰尔查文(1743—1816):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的俄国桂冠诗人。

② 伊·安·克雷洛夫(1769—1844):俄国著名的寓言诗的作者。

③ 亚·伊·美谢尔斯基公爵(1730—1779):俄国的显贵,作者祖母的弟兄。

④ 尼·尼·巴赫美捷夫(约1770—约1830):阿·尼·巴赫美捷夫的哥哥,一七九八至一八〇三年任奥连堡省省长。

⑤ 伊齐亚斯拉维奇家族:古俄罗斯公爵世系。

⑥ 奥尔戈维奇家族:十二、十三世纪古罗斯的几个公爵,奥列格·斯维雅托斯拉维奇的后代。

要,或者是因为没有得到机会;他把违反规矩看作对私人的侮辱,对他本人的无礼,或者看成"市侩的教育",他认为这种"教育"使人同一切人类社会隔绝。

他常说:"人心莫测,谁知道什么人的心里有什么东西?我自己的事情多得很,管不了别人的事,更顾不上去判断、批评别人的心思;不过我不能和一个不懂礼貌的人待在同一间屋子里面,他侮辱了我,触犯了我;说不定,他可能是世界上最善良的人,因此天堂里也有接待他的地方,可是我不需要他。生活里最重要的是 esprit de conduite〔法语:品行的原则;有礼貌〕,它比最高的智慧、比一切学识都重要。随处都能从容应付,绝不往前乱闯、多管闲事,对什么人都表示最大的礼貌,对任何人都不过分亲密。"

我父亲不喜欢任何 abandon〔法语:没有节制,随便〕,不喜欢任何直爽,他把这一切都称为"过分亲密",就像他把一切感情都称为"多愁善感"那样。他一直把自己装扮成一个看不起这一切琐碎小事的人;为什么缘故,有什么目的呢?他把心贡献给什么最高的利益呢?——我不知道。这个傲慢的老人毫不掩饰地瞧不起人,而且非常了解人,他究竟为了谁才扮演这个冷酷无情的裁判官的角色呢?——为了那个女人[1](虽然她有时候会反抗他,但是她的意志终于让他毁掉了);为了那个病人[2](病人经常在外科医生手术刀下面过日子);为了

① 女人:指作者的母亲路·伊·哈格。

② 病人:指作者的异母哥哥叶·伊·赫尔岑。

那个男孩[1]（孩子的活泼好动被他培养成了倔强）；为了那十来个听差（他从来不把他们当作人看待）！

他在这上面花了多大的力气、耐心，多大的倔强，不管他上了年纪，又有病，他还是非常忠实地扮演他那个角色。的确，人心莫测。

后来我被捕的时候，再后我被流放出去的时候，我看见老人心里流露出更多的爱，甚至更多的温情，比我所料想的多得多。我从没有为了这个感谢过他，因为我不知道他会怎样看待我的感谢。

不用说，他并不幸福：他总是小心提防着，对什么人也不满意，他看见他所引起的全家人的敌意，心里也痛苦；他一到场就看见人们收起脸上的笑容，咽下未讲完的话；他带着嘲笑、带着烦恼地讲起这件事情，然而他一点也不让步，他还是十分顽固地走他的路。冷酷的、刻薄的和极端轻视的嘲讽，这些都是他使用得非常巧妙的武器，他用这种武器来对付我们，也同样对付仆人。人在少年时期可以忍受许多事情，就是忍受不了挖苦，事实上我在被捕入狱之前就跟我父亲疏远了，而且同男女仆人联在一起对他进行了小小的战斗。

除此以外，他还使自己相信他患了重病，不断地进行治疗；除了家庭医生以外，他还请了两三个大夫来给他看病，并且每年至少有三次会诊。来访的客人看见他那不高兴的脸色，又只听见他诉苦说身体如何坏，而实际上他的身体并不是

[1] 男孩：指作者。

那样,因此就不常来了。他为了这件事很生气,可是他没有责备过任何一个人,但也没有邀请过谁。宅子里非常寂寞无聊,特别是在漫长的冬天晚上,——一整套门对门的直通房间里只点了两盏灯;老人脚上穿一双呢子的或羔毛的长统靴(类似毡靴的一种),头上戴一顶天鹅绒帽子,身上穿一件白羊羔皮的皮袄,他躬着腰,两手交叉在背后,不停地走来走去,一句话也不说,两三条棕毛狗跟在他后面。

随着忧郁症的发展他对一些微不足道的东西的小心节省也越来越厉害了。他管理他的产业管得很不好,对他自己,对农民都很不好。村长们和他的 missi dominici〔拉丁语:"主人派来的人"或"主人的助手们"〕抢劫了老爷和农民;另一方面,凡是有目共睹的东西都受到加倍的监视;蜡烛节省了,用酸的克里米亚葡萄酒代替薄的 vin de Graves〔法语:格拉弗葡萄酒〕[1],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村子的整个树林给砍伐了,在另外一个村庄里,他买下的燕麦却是他自己的。他养了一批享受特权的贼。他派到莫斯科去征收代役金的那个农人,也就是他每年夏天派到乡下去查看村长、菜园、树林、地里劳动的那个人,十年以后在莫斯科买了一院房子。我从小就恨这个没有公事包的"大臣";有一次他当着我的面在院子里打一个老农民,我气得揪住他的胡子,差一点昏了过去。从那个时候起我看到他就不能不感到厌恶,一直到一八四五年他死去为止。我几次问我的父亲:

① 法国格拉弗地方出产的白葡萄酒。

“希昆从哪儿弄来钱买房子?”

“就看出戒酒的好处,”老人回答我说,“他一滴酒也不进口。”

每年将到谢肉节[1] 的时候,奔萨省的农民[2] 就从凯连斯克送来实物代役租。破旧的大车队在路上走了两个星期,满载着猪肉、乳猪、鹅、鸡、谷物、黑麦、蛋、黄油,最后还有粗麻布。凯连斯克农民的到来是所有家仆的一个节日,他们简直抢劫了农民,每一步都要克扣,而其实他们毫无权利这样做。马车夫向农民索取井水费,不付钱就不许农民的马喝水。女仆们要农民付房屋的取暖费;农民还得向门房的权贵们进贡,给这位送一头乳猪和一条毛巾,给那位送一只鹅和黄油。农民们待在主人家院子里的这段时期中,仆人一直在举行盛大的宴会,做肉杂拌汤,烤小猪,门房里经常充满洋葱、烧焦的脂油和刚刚喝光的白酒的气味。到了最后两天,巴卡依干脆不到门房去了,也不穿好衣服,披着一件旧号衣外套,不穿背心,也不穿短上衣,坐在厨房的过道里。尼基塔·安德列叶维奇明显地瘦了些,脸黑了些,也老了些。我父亲相当平静地容忍了这一切,他知道这是不可避免的,也是阻止不了的。

我父亲收到这些冻起来的家禽以后——这里最奇怪的是:这种做法每年照样重复一次——总是叫了厨子斯皮利东

---

① 谢肉节:大斋前的一星期。

② 奔萨省的农民:指作者父亲在奔萨省凯连斯克县阿尔汉盖尔斯柯耶村的农奴。

来，差他到家禽市场和斯摩棱斯克市场去打听市价。厨子回来报告他编造的价钱，比市价少一半多。我父亲说他是个傻瓜，就叫人把希昆或者斯列卜希金找来。斯列卜希金在伊林斯基门那里开了一家水果店。这两个人都说厨子报的价钱太低了，他们又去打听，带回的价钱要高一些。最后，斯列卜希金表示愿意把蛋、乳猪、黄油、黑麦——所有这些全拿去，“免得给您老爷增加麻烦”。我不用说，他出的价比厨子报的价稍微高一点。我父亲同意了。斯列卜希金为了表示庆贺，给我父亲送来橙子和蜜糖饼干，还送给厨子两百纸卢布。

这个斯列卜希金很得我父亲的欢心，常常向我父亲借钱，他在这方面有独到之处，因为他充分研究了老人的性格。

譬如，他向我父亲借了五百卢布，期限两个月，在到期的前一天他就来到门房，带来一个复活节吃的圆柱形大甜面包，用大盘子盛着，五百卢布就放在面包上面。我父亲收了钱，斯列卜希金深深地鞠了一个躬，要求吻主人的手，这个我父亲从来就没有同意。可是过了两三天斯列卜希金又来了，他要借一千五百卢布。我父亲把钱借给他，斯列卜希金到期又来还钱；我父亲还拿他做一个榜样；可是一个星期以后，他又来借更大的数目，就这样他每年可以有额外的五千卢布作他的营业的周转金，只消付两三个圆柱形大甜面包、几磅无花果和希腊胡桃、一百个橙子和克里米亚的苹果这样微小的利息就行了。

最后我谈一下在诺沃谢里耶几百亩[1] 建筑木材失去的

[1] 即结夏吉纳，俄亩，一亩等于一·〇九公顷。下同。

事情。我记得在四十年代中米·费·奥尔洛夫[①] 受安娜·阿列克谢叶夫娜伯爵夫人[②] 的委托，为她的孩子们买一份田产，来接洽购买特威尔省的产业，这份田产是枢密官传给我父亲的。价钱谈妥了，事情好像也定下来了。奥尔洛夫去看了地，以后写信给我父亲说，在地图上他指给他看过有一个树林，可是这个树林根本不存在。

"真是个聪明人，"我父亲说，"他参加了密谋，写过一本des finanses〔法语：论财政的〕书[③]，可是一到办正经事，就看得出他是个没有头脑的人。这些内克[④]！好吧，我就请格利戈里·伊凡诺维奇[⑤] 去一趟；他不是密谋分子，他却是一个可靠的人，懂得怎样办事情。"

格利戈里·伊凡诺维奇去了诺沃谢里耶，带回来的消息是没有树林，只有类似树林的布景，这样无论是从主人的宅子里看，还是从大路上看，砍伐树林的迹象都看不出来。枢密官分到这份地产以后，他至少到诺沃谢里耶去过五次，可是这个秘密一点也不曾被他发现。

---

① 米·费·奥尔洛夫(1788—1842)：十二月党人，俄国少将，参加过一八一二年的卫国战争。

② 安娜·阿列克谢叶夫娜·奥尔洛娃-切斯敏斯卡雅(1785—1848)：富有的伯爵夫人，接近亚历山大一世和尼古拉一世的宫廷的人物。她是米·费·奥尔洛夫的堂姐。

③ 指奥尔洛夫的著作《公债论》。

④ 雅克·内克(或译奈开尔，1732—1804)：法国财政家，路易十六政府的财政大臣。

⑤ 格·伊·克留恰列夫：在莫斯科替作者父亲管理银钱事务的职员。

为了让人们对我们的生活有一个完整的概念，我现在描述一下我们家从早到晚一天的生活；那样的单调正是最致人死命的一种东西，我们的生活就像一座英国钟那样调准了不慌不忙地、准确地、大声地提醒着每一秒钟的时间。

早晨九点多钟，那个坐在寝室隔壁房间里的随从通知韦拉·阿尔塔莫诺夫娜（我以前的保姆）：老爷起来了。她就去准备咖啡，我父亲照例是一个人在书房里喝咖啡。宅子里的一切都现出另外一种样子，仆人们开始打扫房间，至少也作出在做事情的姿态。在这时以前门房是空的，现在人满了，连那条纽芬兰种大狗麦克佩斯[①] 也坐在火炉跟前，不眨眼地望着火。

老人喝咖啡的时候，就看《莫斯科新闻》和 *Journal de St. Pétersbourg*〔法语：《圣彼得堡日报》[②]〕；我不妨说，他还吩咐过要把报纸烤热，免得纸张潮湿使他的手受寒，还有我父亲看政治新闻要看法文，他觉得俄文讲不清楚。有一个时期他还从什么地方弄来一份汉堡的报纸，可是他受不了德国人排印报纸用的德国字体，他经常指给我看法文印刷字体和德文印刷字体的差别，说这些古怪的有小尾巴的哥特字体对视力有害。以后他订了一份 *Journal de Francfort*〔法语：《法兰克

---

① 麦克佩斯（俄文读作：马克别特）：英国剧作家威·莎士比亚（1564—1616）的五幕名剧《麦克佩斯》中的人物，苏格兰军中大将，他谋杀了国王，篡夺了王位。

② 《圣彼得堡日报》：一八一三年起在彼得堡出版的法文日报，俄国政府的报纸。

福日报》[①]〕,不过最后他就只看本国的报纸了。

他看完报纸以后觉察到卡尔·伊凡诺维奇·仲伦倍格已经在他的房里了。在尼克十五岁的时候,卡尔·伊凡诺维奇开了一家小店,可是他既没有货,也没有顾客,他把自己积攒起来的一点钱在这个赚钱的生意上面花光了,换到一个"勒佛尔[②]商人"的荣誉的称号,关了店停了业。他当时四十多岁,他在这种愉快的年纪,就过着无忧无虑的小鸟或者十四岁男孩的生活,这就是说他不知道明天睡在什么地方,吃什么东西。他依靠着我父亲对他有一点好感;我们现在就看这是怎么一回事情。

一八三〇年我父亲买了我们宅子旁边另一所更大、更好而且有花园的房子;这所房子以前属于罗斯托普契娜伯爵夫人,她就是有名的费多尔·瓦西里叶维奇[③]的妻子。我们住进了新宅子。这以后他又买了第三所房子,这是完全用不着的,不过它是在新宅的隔壁。两所房子都空着,他也不把它们出租,因为害怕火灾(房子是保了险的),又怕房客吵闹;而且

① 《法兰克福日报》:一八三四年在法兰克福(来因河岸)创刊的法文报纸,是拥护君主制度的。

② 勒佛尔(列威尔):即塔林,爱沙尼亚(现在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的首都,沙俄时代称为列威尔,这是一个工商业很发达的波罗的海重要港口。"勒佛尔商人":外国商人不愿参加俄国商业公会或者不让参加,就自称为某个波罗的海城市的商人,或某外国商人。

③ 费多尔·瓦西里叶维奇:即费·瓦·罗斯托普钦伯爵:一八一二至一八一四年莫斯科总督和总司令。他的妻子名叫叶卡捷琳娜·彼特罗夫娜(1775—1859)。

房屋也不给修理，就让它们走上必然损坏的路。无家可归的卡尔·伊凡诺维奇得到许可住在这样的一所房子里，条件是：晚上十点以后不许开大门（条件容易遵守，因为大门从来不关）；他自己买柴火，不得取用我们家里的储存（事实上他向我们的马车夫买柴火）；作为我父亲的负责特殊事务的秘书，那就是每天早晨去见我父亲，问他有什么吩咐，午饭的时候又去见他，晚上再去，倘使没有人同我父亲在一起，他就向他讲一些新闻故事，闲聊一阵。

卡尔·伊凡诺维奇的职务虽然看起来十分简单，可是我父亲很会在这里面加进很多难咽下的苦味，因此我这个可怜的“勒佛尔商人”，他虽然已经习惯了一个没有家、没有脑筋、身材瘦小、一脸麻子的德国人所能遇到的一切灾难，却也不是经常忍受得了。每隔两年或者一年半，卡尔·伊凡诺维奇感觉到受的侮辱太大了，就宣布“这是完全不能忍受的”，收拾起行李，买来或者交换来各种完好性颇为可疑、质量也有问题的小东西，动身到高加索去了。恶运总是无情地跟踪着他。有一次他那匹劣马（他在梯弗里斯和烈杜特-卡列都是骑他自己的马）在离顿河哥萨克地区不远的地方倒下了；另一次他的货物被人偷去了一半；不然就是他的两轮轻便马车翻了，法国香水洒在厄尔布鲁士峰[1] 脚下破车轮上，没有人惋惜；再不然他就丢失了什么东西，要是他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丢失的话，他就会丢掉自己的护照。过了十个月左右卡尔·伊凡诺维奇

① 厄尔布鲁士峰：大高加索山的最高峰。

人老了些，脸上皱纹多了些，穷了些，牙齿和头发都少了些，他照例恭顺地来见我父亲，带来波斯的杀跳蚤臭虫的药粉、褪了色的丝绸和起锈的契尔克斯短刀，他又会住在空房子里面，接受同样的条件：履行同样的义务，并且用他自己的柴火升炉子。

我父亲看到卡尔·伊凡诺维奇，马上就对他进行小规模的军事行动。卡尔·伊凡诺维奇问起我父亲的健康，老人鞠一个躬表示感谢，然后想了一下，就问道，例如说：

"您在哪儿买的发蜡？"

我在这里应当说，卡尔·伊凡诺维奇这个最丑陋的人却是一个非常喜欢向妇女献殷勤的人，平日以洛夫莱斯[①] 自居，很讲究穿衣服，还戴上卷曲的金黄色假发。不用说，这一切我父亲早已知道、而且有过评价了。

"在铁匠桥[②] 布依斯那儿。"卡尔·伊凡诺维奇吞吞吐吐地答道，有点感觉到话中带刺了，他把一只腿架在另一只腿上，好像准备自卫似的。

"这种气味叫做什么？"

"Nachtviole〔德语：夜紫萝兰[③]〕。"卡尔·伊凡诺维奇答道。

"您受了骗了，violette〔法语：紫萝兰〕是淡淡的清香，c'est

① 洛夫莱斯：英国小说家散·理查孙（1689—1761）的长篇小说《克拉利莎·哈尔洛》中的男主人公，一个有钱的所谓"风流少年"。

② 铁匠桥：即库兹涅茨桥，这是高级法国商店所在的地区。

③ 夜紫萝兰：一种香花草。

un parfum〔法语：这是一种香〕，然而您那种气味太浓，叫人厌恶，他们给尸体涂油防腐就用这东西。我的神经非常脆弱，我受不了它；叫人给我拿花露水来。"

卡尔·伊凡诺维奇亲自跑去拿花露水瓶。

"啊，不，您还是叫别人来，否则您再靠近一些，我就会更不行，我就要昏过去了。"

卡尔·伊凡诺维奇本来期望他的发蜡在女仆房里会起作用，现在十分伤心了。

房间里洒过花露水以后，我父亲又想出一些差使：买法国鼻烟、英国泻盐，看登报出售的马车（他绝不会买它）。卡尔·伊凡诺维奇愉快地连连鞠躬，心里很高兴可以抽身走了，便告辞出去，等到午饭时候再来。

卡尔·伊凡诺维奇走后，厨子来了；不管他买了什么，定了什么，我父亲总是认为太贵。

"唔——唔，多么贵啊！为什么，是没有货运来吗？"

"老爷，正是这样，"厨子答道，"路很坏。"

"好吧，你听我说，路修好以前，我们就少买一点。"

这以后他就在他的写字台前坐下来给村子里下命令、写书面答复、算帐，在这中间他还要教训我，还要看医生，而主要的是跟他的随从争吵。这个人是我们全家的第一个受难者。他是小个子，活泼敏感，性子急，脾气暴躁，好像他是特地生来逗恼我父亲、引起我父亲的训斥似的。他们两人中间每天重复出现的那些场面可以填满任何一出喜剧，然而这一切全是十分认真的。我父亲非常明白自己很需要这个人，也常常容

忍他的一些粗鲁的答话，可是一直在想法教育他，虽然这种努力继续进行了三十五年，而且始终没有收效。而在随从这方面，倘使他没有自己的解闷的办法，他也受不了这种生活；他经常在午饭时间里带一点醉态。我父亲看到了这种情况，但也只限于绕弯抹角地暗示，例如，劝他拿一点黑面包跟盐一起嚼着，免得给人闻到伏特加的气味。尼基塔·安德列叶维奇有一个习惯，每逢他喝了酒，他上菜的时候总要把两脚并齐做出一种特别的姿势。我父亲只要看到这个，就马上想出了什么差使差他出去，例如差他去打听"理发师安东是不是搬了家"，同时又用法国话对我说：

"我知道他并没有迁移；不过这个人喝醉了，他会失手摔了汤碗，打碎它，把汤泼在桌布上，吓坏我；让他出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le grand air〔法语：新鲜空气〕对他有好处。"

随从碰到这种花招照例要回答几句；不过要是他当面找不到答话，他就走出去，一路上小声自言自语。那个时候老爷就用同样平静的声音唤他回来，问他对他讲些什么。

"我并没有向您请示过一句。"

"那么你到底对谁讲话呢？除了我跟你以外，这间屋子里再没有一个人，隔壁屋子里也没有人。"

"对我自己讲。"

"这太危险了，疯狂就是这样开头的。"

随从很生气地走到寝室隔壁他那间屋子里去；他在那里看《莫斯科新闻》，给准备出售的假发编头发。很可能为了平息自己的怒气，他就拚命闻鼻烟；不知道是他的鼻烟太厉害，

还是他的鼻神经太脆弱，接下来几乎总是一连打六、七个喷嚏。

老爷拉铃唤他。随从扔下手里的一把头发，走进房去。

“你在打喷嚏吗？”

“老爷，是我。”

“我想给你祝福。”——他做了一个手势叫随从走开。

在谢肉节的最后一天，按照古老的风俗，全体仆人晚上都要来请求主人的宽恕：在这种庄严的场合，我父亲通常总是由随从陪着，走进大客厅里面。他装出认不得某一些人的样子。

“站在角上的那位可敬的老人是谁？”他问随从道。

“马车夫达尼洛。”随从一板一眼地答道，他知道这全是在演戏。

“啊哟，你瞧，他变得多厉害啊！我真的相信人老得这样快，全是由于喝酒；他现在在干什么？”

“他搬柴进来生炉子。”

老人做出痛苦难熬的样子。

“你怎么三十岁还没有学会讲话？……搬，他怎样搬柴呢？柴是抱进来的，不是搬进来的。好吧，达尼洛，感谢上帝，主又让我再见到你一次。我宽恕你这一年中间的一切罪过，宽恕你大量耗费燕麦、还有不把马洗刷干净的事情，也要请你宽恕我。趁你有气力的时候，还是去搬柴吧，可是现在四旬斋到了，你少喝一点酒，在我们这样的年纪喝酒是有害的，而且还是一件罪过。”

他就是照这个样子把全体检阅了一番。

我们经常在三点到四点之间吃午饭。午饭的时间很长，而且非常乏味。斯皮利东是一个很好的厨子；然而一方面由于我父亲的节省，另一方面由于他本人的节省，就使得午饭相当菲薄了，虽说上菜的道数还是不少。我父亲身边有一个红色瓦盆，他把各种喂狗的东西都放在这里面；此外他还用自己的叉子喂狗，仆人们非常厌恶他的这个举动，因此后来我也深感厌恶了。为什么呢？我也说不清……

到我们家来的客人向来很少，来吃饭的更少。在来客中间我记得有一个人，他到我们家吃饭有时候会使我父亲脸上的皱纹平下来，这就是尼·尼·巴赫美捷夫。他是那位同姓的瘸腿将军的哥哥，他本人也是将军，不过早已退伍了，我父亲和他还是同在伊兹玛依洛夫斯基团里服役的时候做朋友的。在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时代，他们两个人一起吃喝玩乐，在保罗〔一世〕的时代，两个人一起受到了军法审判：巴赫美捷夫因为同什么人决斗，我父亲因为充当他的助手；后来一个人到国外游历去了，另一个人到乌法当省长。他们之间并没有相似的地方。巴赫美捷夫是一个结实、健康、漂亮的老人，喜欢吃得好，还爱喝一点酒，喜欢愉快的聊天和别的许多事情。他吹嘘他年轻时候一连吃过一百只烤馅饼，他将近六十岁的时候还可以吃一打泡在油里的荞麦饼不闹肚子；我不止一次地看见他的这些成绩。

巴赫美捷夫对我父亲有一点点影响，或者至少对他有一些约束力。每逢巴赫美捷夫看到我父亲的情绪过分不好的时

候，他就戴上帽子，军人那样地碰一下鞋跟，说：

"再见，——你今天生病，人也傻了；我本来想待下来吃午饭，可是我吃饭的时候看不得生气的面孔！Gehorsamer Diener！〔德语：忠实的仆人！〕……"

我父亲对我解释道：

"Impressario①！〔意语：这里的意思是'精力旺盛的人'〕尼·尼·还是多么精力充沛！感谢上帝，一个健康的人，他不可能了解像我们这一类受罪的约伯②；现在是零下二十度的严寒，他坐雪橇……从波克罗夫卡……跑到这儿来，一点也不在乎……而我每天早晨感谢造物主，总算让我活着醒来，让我还在呼吸。啊……啊……啊呀！俗话说得好：饱汉不知饿汉饥。"

这是我父亲所能表示的最大的宽容了。

有时候我们家也举行家庭宴会，枢密官、戈洛赫瓦斯托夫家的人和其他的人参加，这种宴会并不是为了开心举行的，也不是平白无故的，这是从经济和交际方面仔细考虑的结果。因此二月二十日在列夫·卡坦斯基节，也就是枢密官的命名日，就在我们家举行午宴庆祝，而在六月二十四日我父亲的命名日，也就是伊凡节，宴会就在枢密官的家中举行，这种安排除了树立一个弟兄友爱的道德榜样外，还免掉各人在自己家

---

① 意大利语，原来的意思是，剧院经理、舞台监督、音乐会等的主持人。

② 约伯：乌斯地人约伯受上帝考验，遇到一切灾难，极其痛苦，却并不改变信仰，见《旧约·约伯记》。

里举行规模更大的宴会。

然后还有各种 habitués〔法语：常来的人〕；卡尔·伊凡诺维奇·仲伦倍格 ex officio〔拉丁语：因为职务有关〕来了，他刚刚在午饭之前在家里灌了一杯伏特加和吃了一点勒佛尔的鳁鱼①，现在连一小杯用果料特别泡制的伏特加也不肯喝；有时候我最后一个法国教师也来了，他是个很吝啬的老头子，满脸横肉，喜欢挑拨是非，讲别人坏话。Monsieur Thirié〔法语：狄利埃先生〕经常弄错，不是把啤酒，却把葡萄酒斟到他的杯子里，一边道歉一边喝光了酒，因此我父亲终于对他说：

"Vin de Graves〔法语：格拉弗葡萄酒〕在您右面，您不要再弄错了。"——狄利埃捏了一大撮鼻烟胡乱塞进他那掉向一边的大鼻子，把鼻烟洒在他的盆子里面了。

在这些常来的人中间有一个非常可笑的人。他是个秃头的小老头，经常穿一件又窄又短的燕尾服，还有一件背心，他的背心收尾的地方正是现时背心开头的地方，他还拿了一根细小的手杖——他的整个外貌表现了二十年以前的那段时期，在一八三〇年表现的是一八一〇年，在一八四〇年表现的是一八二〇年。德米特利·伊凡诺维奇·皮美诺夫，五等文官的官阶，谢烈美捷夫斯基养老院② 的一个负责人，而且还从事文学工作。他天分有限，他是被卡拉姆辛的感伤的词句，被

① 勒佛尔的鳁鱼：亦称鳎鱼，即沙丁鱼，制罐头食品的优良原料。

② 谢烈美捷夫斯基养老院：枢密官尼·彼·谢烈美捷夫斯基伯爵（1751—1809）在莫斯科开办的收容老、弱、病、残的慈善机关。

玛尔蒙特尔[①] 和玛利沃[②] 的作品教养出来的，皮美诺夫可以在沙里科夫[③] 和符·巴纳叶夫[④] 两人之间做个二兄弟。这密密一排可敬的人中间的伏尔泰就是亚历山大〔一世〕时期的秘密警察头子雅科夫·德-山格连[⑤]；他们中间有希望的年轻人是皮敏·阿拉波夫[⑥]。他们都和那个共同的族长伊凡·伊凡诺维奇·德米特利叶夫[⑦] 有密切关系；他没有竞争的对手，不过有一个瓦西里·里沃维奇·普希金[⑧]。皮美诺夫每星期二都到"上帝"德米特利叶夫那里去，在他的花园街的住宅里讨论文体的美，讨论今天新语言的堕落。德米特利·伊凡诺维奇自己就擅长在祖国文学不平坦的园地中摘花样；他起初出版了一本《拉罗席富科公爵的思想》[⑨]，后来他又出了一本《关于女性美和女性魅力》[⑩] 的论文。这本论文我十六岁以后就没有再

① 让·弗·玛尔蒙特尔(1723—1799)：法国作家，写过《道德故事》及其他短篇小说。

② 彼·玛利沃(1688—1763)：法国剧作家和小说家。

③ 彼·伊·沙里科夫公爵(1768—1852)：俄国感伤主义的诗人。

④ 符·伊·巴纳叶夫(1792—1859)：俄国诗人，感伤主义田园诗的作者。

⑤ 雅科夫·德-山格连：他是一个老伏尔泰派，参看第八四页注③。

⑥ 皮·尼·阿拉波夫(1796—1861)：俄国显贵，又是剧作家，还写过一部《俄国戏剧编年史》。

⑦ 伊·伊·德米特利叶夫(1760—1837)：俄国诗人，寓言作家，他以青年文学家的保护者自居，一八一〇年任司法大臣。

⑧ 瓦·里·普希金(1767—1830)：俄国诗人，亚历山大·普希金的伯父。

⑨ 原书全名《拉罗席富科公爵弗朗索瓦六世的思想、名言和道德感想录》。拉罗席富科(1613—1680)：法国作家和道德家。

⑩ 这本《关于女性美和女性魅力》的论文是皮美诺夫从法文译出的，一八一八年出版。

翻过，我只记得书中那些长段的比较就像普卢塔克拿他的英雄们作比较那样[①]——浅黄色头发的女人同黑头发女人的比较。"虽然浅黄色头发的女人是这样，这样和这样，而黑头发的女人却是这样，这样和这样……"皮美诺夫的主要特点并不在于他出版过几本从来没有人读的书，而是这样一个事实：他笑起来，就不能停止，一直笑下去，连呛带咳，轰然大笑中还夹着一阵阵闷雷似的笑声。他自己也知道这个毛病，因此，要是他预感到有什么可笑的事情要发生，他就逐渐采取预防的措施：掏出手帕，看表，扣好燕尾服的钮扣，拿两只手蒙住脸，到了紧要关头，他就站起来，脸朝墙壁，顶住墙，痛苦地过了半个小时或者更多一些时间，然后他由于这样的发作弄得精疲力竭，满面通红地坐下来，揩着秃头上的汗珠，不过在以后一段长时间里，还会重新发作。

不用说，我父亲一点也不尊重他，他温和、善良、不灵活，是一个文学家，又是穷人——因此，没有任何值得重视的条件；我父亲充分了解他那种带痉挛性的笑癖，正因为这个缘故我父亲努力使他发笑，笑得屋子里所有别的人都受到他的影响，跟着他不自然地笑起来。于是这个愚弄人的罪魁祸首却微带笑容望着我们大家，仿佛一个人在欣赏一群小狗吵闹似的。

我父亲有时候把这个不幸的女性美和女性魅力的欣赏者

① 指普卢塔克在他的名人《传记集》中收入的《特赛乌斯同罗木鲁斯的比较》等十八段"比较"。

作弄得很厉害。

“上校工程师某某。”仆人进来通报说。

“请，”我父亲说，然后向皮美诺夫补充了一句：“德米特利·伊凡诺维奇，他来了，您要当心啊：他有一种不幸的抽筋病，他说话的时候总是结结巴巴讲得很古怪，好像他有慢性打呃病似的。”接着他就逼真地摹仿上校说话的动作。“我知道您是个爱笑的人，请您节制一下。”

这就够了。工程师讲到第二句话，皮美诺夫就掏出手帕来，用手掩住嘴，最后就跳了起来。

工程师惊诧地望着他，可是我父亲十分镇静地对我说：

“德米特利·伊凡诺维奇怎么了？Il est malade〔法语：他有病〕，这是抽筋；叫人赶快给他拿一杯冷水来，还有花露水。”

在这种场合皮美诺夫就会拿起他的帽子，大声笑着，一直笑到阿尔巴特门，才在十字路口停下来，身子靠在灯柱上。

一连几年他都是每隔一个星期日到我们家来吃午饭，无论他按时来也好，不按时来也好，只要他有一次不到，我父亲就会生气，就会欺侮他。然而善良的皮美诺夫还是照常来，并且从红门步行到老马房街，一直到他死都是这样，而且一点也不可笑。这个孤寂的单身老人病了一个长时期，躺在床上睁着垂死的眼睛看见他的女管家拿走了他所有的东西、衣服，甚至他床上的被单，丢下他，完全没有人照料。

然而我们午饭时候真正的 souffre-douleur〔法语：出气筒〕是各种各样的老太婆，她们都是玛·阿·霍万斯卡雅公爵夫人

(我父亲的姐姐)[1] 的穷苦的、没有一定住处的寄食者。为了换换环境,同时她们也想打听我们家里有些什么情况,主人们是不是经常吵嘴,厨子是不是跟老婆打架,老爷是不是知道巴拉希卡或者乌里雅沙要生孩子等等,——她们有时候在节日里来待一个整天。应当注意到,这些寡妇在四、五十年前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就依靠美谢尔斯卡雅公爵小姐[2] 和公爵夫人家生活,从那个时候起就认识我父亲;从她们年轻时候的依赖别人到老年的生活不定,这中间她们还花去二十年左右的时间跟丈夫吵架,不让他们多喝酒,在他们瘫痪了的时候照料他们,一直到把他们送到墓地。有的还跟着一个驻防军军官带着一大群孩子在比萨拉比亚[3] 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地搬来搬去,另一些人年复一年地跟丈夫打官司,所有这些生活经验都在她们身上留下了衙门和县城的痕迹,对世上有权有势者的畏惧,自卑感,有点愚蠢的残忍。

我父亲同她们之间出现过一些奇怪的场面。

"你这是为什么,安娜·雅基莫夫娜,生病吗,你什么也不吃?"我父亲这样问道。

这个克列敏楚格[4] 的什么管理人的寡妇,身上老是有很

---

① 霍万斯卡雅公爵夫人(1755—1847):作者的姑母,作者后来的妻子娜·亚·扎哈利娜就是在她的家里教养成人的。参看本书第三卷。

② 美谢尔斯卡雅公爵小姐:作者父亲的阿姨。

③ 比萨拉比亚:在沙俄西南部,与罗马尼亚接壤,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改属罗马尼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划归苏联。

④ 克列敏楚格:乌克兰第聂伯河上一个工业城市。

浓的膏药气味、面容憔悴、衰老的可怜的老太婆，身子缩成一团，带着恭恭敬敬的眼光和手势回答道：

“原谅我，我的爷，伊凡·阿列克谢叶维奇，对，老爷，我真不好意思，老爷，是这样，老爷，这是我的老规矩，老爷，哈，哈，哈，现在是圣母升天节的斋期。”

“啊，多无聊！你太信教了！老太太，亵渎上帝的并不是进嘴的东西，而是从嘴里出来的东西；你吃这个或者吃那个——结果都是一样；现在说到从嘴里出来的，——你必须注意……你对旁人的议论。得啦，在这种日子你最好还是在家里吃饭，不然我们这儿再来一个土耳其人——他要吃抓饭①，我又不是在开 à la carte〔法语：点菜〕的小饭馆②。”

老太婆吓坏了，她本来还想要一点面粉和谷物，现在只好拚命喝克瓦斯、吃酸菜，做出吃得很多的样子。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她或者她们中间任何别一个只要在斋期开始吃点荤食，我父亲（他从来不吃素食）就会悲伤地摇摇头说：

“我看，安娜·雅基莫夫娜，你不值得在你这一生的最后几年里改变祖宗的规矩。我有罪过，我吃荤，因为我多病；可是你，上帝保佑，你一辈子都持斋，忽然，在这样的年纪……你给他们作出什么样的榜样。”

① 抓饭：中亚细亚、伊朗和我国新疆等地杂有碎羊肉、加上葡萄干的羊油炒的大米饭。

② 小饭馆：这里用的是一个带俄国腔的德国字 Herberge(小客栈)。

他一面指着仆人们。这个可怜的老太婆又只好拚命喝克瓦斯、吃酸菜了。

这些场面使我十分气愤；有时候我居然敢于出来打抱不平，向他提醒他以前发表过的跟这相反的意见。那个时候我父亲就会欠欠身子，拿着帽缨揭下头上那顶天鹅绒小帽，举在空中，感谢我给他上了一课，请求原谅他善忘；然后对老太婆说：

"真是个可怕的时代！无怪乎你在斋期中吃荤，因为孩子们居然教训起父母来了！谁知道我们将来怎么样？想起来很可怕！幸而你我都不会看到。"

午饭后我父亲睡下来休息一个半小时。家仆们立刻散去，有的到啤酒店，有的去小饭馆。七点喝茶；有时候有人来，枢密官比任何人来的次数多；这是我们大家休息的时候。枢密官经常给我们带来各种消息，并且兴奋地讲述它们。我父亲听着这些消息，故意做出并不注意的样子：他哥哥相信他会放声大笑的时候，他却露出严肃的面容，要是他哥哥讲了什么惊人的事情，他就再三追问，好像他没有听见似的。

枢密官要是反对他弟弟的意见或者有另外意见的时候（不过这种事情很少发生），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有时候遇到我父亲的情绪特别不好，他并不反驳。在这种悲喜剧的场面中，最滑稽的是枢密官的真正的急躁和我父亲勉强的、装出来的冷静。

"好吧，你今天不舒服。"枢密官不耐烦地说，拿起帽子，冲了出去。

有一次他在气愤中打不开门，使劲地用足踢它，一面说："该死的门！"我父亲不慌不忙地走过去，朝相反的方面打开了

门，声音很低地说：

“这扇门是尽了职的，它是朝那面开的，您却要它朝这面开，而且跟它生气。”

在这里我不妨说明一下，枢密官比我父亲大两岁，他用“你”称我父亲，而我父亲因为是弟弟便称他作“您”。

枢密官走了以后，我父亲就到他的寝室里去，他每天都要问大门关好没有，得到了肯定的回答，他还表示有点不相信，不过也不去检查了。然后就开始了一长串盥洗、热敷、服药的“例行公事”；他的随从在他床前一张小桌子上准备了一个完整的各样东西的仓库：药瓶、通宵燃着的小灯、小盒子。老人照例要看一小时的书：布利昂纳[1] 的书、《圣海伦岛回忆录》[2]和其他一般的《笔记》；于是夜幕落了下来。

我一八三四年离开家的时候，家里是这样的情况，一八四〇年我看见家里的情况还是这样，一直到一八四六年他逝世的时候，情况都是这样。

我三十岁从流放地回来，才明白我父亲对许多事情的看法都不错，才明白不幸他对人的了解深刻到十分瞧不起人的地步。然而错并不在我，他即使在阐明真实的道理，也是用了

① 路易·安·福·德·布利昂纳(1769—1834)：法国政治活动家，做过拿破仑一世的私人秘书。后来效忠于路易十八。他是《回忆拿破仑》(一八二九)的作者。

② 《圣海伦岛回忆录》：它的作者是拉斯-卡兹 (1766—1842)。拉斯-卡兹是拿破仑的亲信，拿破仑流放到圣海伦岛时他同行，他还记录过拿破仑口述的部分回忆。这本《回忆录》出版于一八二三年。

一种叫年轻人憎恶的方法。他长期生活在堕落的人的圈子里面，心也变冷了，他对所有的人都 en garde〔法语：提防着〕，他那冷淡无情的心并不要求和解，因此他对世界上一切人始終保持着敌对的态度。

我在一八三九年看到他衰弱而且真的有病，在一八四二年看到他病得更厉害了。枢密官死了，他的寂寞空虚也更扩大了，连他的随从也换了一个人；可是他本人还是那个样子，只有他的体力不行了：还是那样的心怀不满，还是那样的记忆力强，他还是用细小事情使大家苦恼，仲伦倍格也没有改变，他也还是像从前那样借住在旧宅里，照常执行职务

只有在那个时候我才看清楚他这种生活的凄凉；我怀着悲痛的心考虑这种与人世隔绝的孤寂生存的悲凉的意义，他就这样在这块枯燥无味、坚硬不毛、到处石头的荒地上凋残下去，这块荒地是他给自己创造出来的，可是他又无力改变它；他知道这个，他看见死一天天地靠近，他克服着病弱和衰老，顽强地竭力支撑着自己。我非常可怜老人，可是我毫无办法——他是很难接近的。

……我有时悄悄地走过他的书房，他坐在又硬又不舒适的很深的扶手椅上，他养的那些狗围着他，他孤零零一个人同我的三岁的儿子在玩。仿佛老人一看见孩子，他的捏紧的手和僵化的神经都松弛了，他的垂死的手挨到摇篮的时候，他也脱离他长期以来一直摆脱不了的连续的紧张、斗争和烦恼而得到休息了。

第六章

克里姆林宫部——莫斯科大学——化学家——我们——马洛夫事件——霍乱——菲拉列特——孙古罗夫案——瓦·巴谢克——列索夫斯基将军

啊，自由的、欢欣的梦想
和无限期望的岁月！
如今没有苦恼的笑声，宴会的喧哗在什么地方？
充满希望的劳动在什么地方？

（《幽默》）①

我父亲不顾瘸腿将军②的不吉祥的预言，还是找到尼·包·尤苏波夫公爵在克里姆林宫部③给我派了一个职务。我在一份呈文上签了字，事情就完了；以后我再也没有听见人讲起这个职务，只有在三年以后尤苏波夫差了宫廷建筑师来通

---

① 引自《幽默》的第一部分。

② 瘸腿将军：指阿·尼·巴赫美捷夫，参看第四六页注②。

③ 克里姆林宫部：这个机构是在一八一二年莫斯科大火以后设立的，经管克里姆林宫的修理工作，克里姆林宫的总管就是尼·包·尤苏波夫。

知,我已经得到初级军官官衔,这个建筑师老是喜欢大叫大嚷,好像站在五层楼的屋架上向底层的工人发号施令似的。我顺便提一下,这种古怪的事情其实并无用处,因为我考上学士以后,一下子就有了那种就职所得到的功名,——为了这两、三年的资历不值得花费许多力气。同时这个虚职几乎还妨碍我投考大学。大学校务会认为我是克里姆林宫部办公厅的官员,不发给我准考证。

当时曾经为在政府机关工作的人员开办了一种饭后的专门讲习班,仅限于准备参加所谓“委员会考试”①,并取得投考资格。一切有钱的懒汉、什么都不懂的贵族地主的少爷、一切不愿意到军队里服役并且急于获得八等文官头衔的人都去参加“委员会考试”;类似某种转让给老教授们的金矿,他们 privatissime〔拉丁语:最私下地〕教这些学生,每一课收二十个卢布。

要在这种学问的考狄纳叉口② 上开始我这一生,很不符合我的思想。我坚决地对我父亲说,要是他找不到别的办法,我就辞去我的职务。

我父亲很生气,他说我这样任性会妨碍他替我猎取功名,

① “委员会考试”:帝俄时期,从一八〇九年到一八三四年间,凡是希望取得八等文官官衔而又未受过高等教育的官员,可以通过俄国各种大学特别委员会的考试(考试分数理、文学、法律各科,委员会由少数大学教授和讲师组成),对考试合格的人颁发一份证书,说明他对某一科的知识经过考试合格。当时为准备参加考试的人开办了夜校(晚间讲习班)。

② 考狄纳叉口:意大利南部卡普亚附近山中一个隘口,古罗马执政官威士利乌斯等三人率领军队通过这里,被桑尼特人(意大利中部的古民族)打败,全军覆没。

他又责骂那些家庭教师把这种荒唐的想法塞进了我的脑子，然而他看见这一切对我都不发生作用，就决定去找尤苏波夫。

尤苏波夫一半照大贵族、一半照鞑靼人的方式，一瞬眼的工夫就把事情解决了。他把秘书叫来，吩咐他给我写一张准假三年的假条。秘书再三犹豫，后来带着一半恐怖地报告他，凡是假期在四个月以上的假条，没有皇上的批准，就不能签发。

"老弟，胡扯，"公爵对他说，"有什么为难呢？好吧——假条要是不能签发，你就写我派他去深造——让他上大学听课。"

秘书照他的吩咐写了，第二天我就坐在数理系教室的阶梯形讲堂里了。①

莫斯科大学和沙皇村中学在俄国教育史上和最近两代人的生活中起了巨大的作用。

莫斯科大学同莫斯科这个城市一起在一八一二年以后变得重要了；彼得大帝取消了莫斯科的沙皇首都的地位，而拿破仑大帝（一小半是有意的，一大半是无意的）又把它提升为俄罗斯人民的首都。人民听见莫斯科陷落到敌人手里的消息感到极大的痛苦，因而领会到他们同这个城市的血肉相连的关系。从此这个城市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莫斯科城内的大学也越来越成为俄国教育的中心。大学的发展所必需的一切条件，如历史的意义、地理的位置和沙皇不在这里等等，都齐备了。

① 作者在一八二九年八月十九日呈请克里姆林宫部批准他进大学深造，同年十月十四日得到批准，入学听讲。

彼得堡在保罗〔一世〕死后思想界非常活跃的活动在十二月十四日① 阴郁地结束了。尼古拉带着五座绞刑架，带着苦役②、兵役和穿浅蓝色制服的卞肯多尔夫③ 上了台。

一切都后退了，血涌上了心头，在外表上活动消沉了，暗中它却澎湃汹涌。莫斯科大学坚定地屹立着，在一片暗雾中轮廓分明地出现在最前列。沙皇从波列查叶夫事件④ 以来就仇恨它。他派了《卡路查夜话》⑤ 的少将亚·皮萨列夫做督学，命令学生穿制服，命令学生佩军刀，后来又禁止学生佩军刀；因为波列查叶夫写的诗就罚他去当兵，给送去当兵的还有柯斯捷涅茨基⑥ 和他的朋友们，由于他们写了文章；因为克利茨基弟兄⑦

---

① 指尼古拉一世一八二五年镇压十二月党人起义的事件。

② 五座绞刑架：指五位十二月党起义领导人被处绞刑的事实。苦役：指其余的十二月党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矿坑等处服苦役的事实。

③ 卞肯多尔夫：参看第五二页注③。秘密警察穿浅蓝色制服，系白色肩带和腰带。

④ 亚·伊·波列查叶夫(1804—1838)：俄国诗人。关于他的事情，本书第七章后面的补遗(即第一卷补遗)《亚·波列查叶夫》中有详细的叙述。

⑤ 《卡路查夜话》：亚·皮萨列夫在一八二五年编辑出版的两本名家作品选集。

⑥ 雅·伊·柯斯捷涅茨基(1811—1885)：莫斯科大学学生，参加了孙古罗夫小组，被判决流放到高加索当兵，一八三九年提升为军官。三年后定居在乡间。尼·彼·孙古罗夫，参看第一八六页注。

⑦ 克莉茨基弟兄：弟兄三人，即彼得·伊凡诺维奇(1806—1855年以后)、米哈依尔·伊凡诺维奇(1809—1836)和瓦西里·伊凡诺维奇(1810—1831)。彼得是文职人员，米哈依尔和瓦西里都是莫斯科大学学生。他们因参加秘密结社，在一八二七年被捕。彼得过了六年的流放生活，以后又服兵役，一八五五年回到莫斯科；米哈依尔关在索洛威茨基修道院的监狱中，一八三四年被送到高加索当兵，后来在那里被杀害；瓦西里关在席吕谢尔堡要塞监狱中，病死在那里。

损坏了半身像[①]就消灭他们，因为圣西门主义[②]就把我们[③]流放出去，然后又任命谢尔盖·米哈依洛维奇·戈里曾公爵[④]做督学，后来就不再管这个"邪恶的苗床"，诚心诚意地劝告那些在贵族中学和贵族法学院毕业的青年不要进莫斯科大学了。

戈里曾是一个古怪的人，他很早就看不惯因教授生病停课的现象，认为这是没有秩序；他以为应当按次序由名单上的下一个人代替他讲课，这样有时候就轮着捷尔诺夫斯基神甫去讲授妇女病的临床学，产科医生利赫捷尔[⑤]去讲〔圣母玛利亚的〕纯洁受胎了。

然而不管这个，失了宠的大学的影响却还是一天天地增大；俄国年轻的力量从各个方面，从各个阶层流到这里来，仿佛流进一个总的贮水池一样；在大学的教室里他们肃清了他们在家庭里得到的那些迷信、成见，达到了一个共同的水平，

---

① 损坏半身像是士官生祖包夫的"罪状"，（"他和别的同学砍坏皇帝陛下的半身像，并胆敢出言诽谤：'我们要这样砍掉祖国的暴君，砍掉所有俄罗斯的沙皇。'"）他因此在一八二六年被送往疯人院。彼得·克利茨基等人的罪状是"对皇帝陛下的肖像进行诽谤"，其中有一个路希尼科夫"居然敢于刺穿先皇陛下肖像上的眼睛"。作者误把"半身像"事件和"肖像"事件混淆起来了。

② 圣西门主义：指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亨利·克·圣西门（1760—1825）的学说。

③ 这里的"我们"，指尼·奥加略夫和作者。

④ 谢·米·戈里曾（1774—1859）：即大戈里曾，一八三〇至一八三五年莫斯科教育区的督学（一个教育区往往包括几个省，督学是这个教育区内各学校的实际最高领导人）；一八三四年兼任奥加略夫、赫尔岑等人被捕后成立的第二次侦讯委员会的主任。

⑤ 米·维·利赫捷尔（一七九九年生）：医生，一八二七至一八五一年莫斯科大学产科学教授。

结成了弟兄般的朋友，然后又分散到俄国各地去，到俄国各阶层中去。

一直到一八四八年我国大学的体制都是纯粹民主的。除了农奴，除了被所属农村公社开除出来的农民，只要通过了入学考试，每个人都可以进大学。尼古拉却破坏了这一切；他对招收学生加以限制，增加了自费生的学费，而且只允许给贫穷的贵族以免费待遇。这一切都属于一连串的糊涂措施，这些措施将来要随着俄国车轮上那个煞车的毁灭一起消失，——还要和护照法①，和宗教排他的法令② 等等同时消失③。

① 护照法：这里指尼古拉一世一八四四年发出的限制签发出国护照的命令。根据这个命令，从这一年三月十五日起，出国护照专门由内务部签发，请领护照的人必须年满二十五岁；申请出国治病的人除了得到警察方面的许可外，还要缴呈医生的诊断书等等。

② 这里指尼古拉一世遵奉正统的东正教、压制其他宗教信仰的措施：如强迫实行教会合并，镇压旧教派，强迫伏尔加、乌拉尔、高加索、西伯利亚等地民族信奉东正教等等。

③ 顺便说一下，这里还有"永志不忘的"尼古拉的一项慈父般的措施。孤儿院和社会救济厅是叶卡捷琳娜〔二世〕在位时期的一样最好的纪念物。〔…〕用贷款银行从资金周转中获得的利息的一部分来开办医院、养老院和孤儿院这种想法本身就是很聪明的。

这些机构成立了，押款银行和救济厅发了财，孤儿院和慈善机关在官吏盗窃成风所能容许的范围内兴旺起来了。孤儿院收容的小孩一部分留在院内，另一部分就交给乡下女人抚养；农民抚养的那一部分做农民，留院的一部分就在院内受教育。这部分人中天分最好的给选拔出来继续进修中学课程，天分较差的就学手艺或者进工艺学校。对待女孩也是这样：有的学做针线活，有的学做照料小孩的保姆，最有才能的就做女教员或者家庭教师。这一切本来进行得很好。可是尼古拉对这种机构也横加摧残。据说皇后有一次在她一个亲信的家里见到他小孩的家庭教师，皇后同她谈了话，对她很满意，问她在什么地方受的教育；她答

各种各样的年轻人从上、下、南、北来到这里，很快地就融合成一个紧密团结友爱的集体。在我们中间社会地位的差别并没有像我们在英国学校和兵营里所遇到的那种侮辱性的影响；(英国的大学不在我所说的之列，它们是专为贵族和有钱人办的。)倘使有一个学生打算在我们当中吹嘘他的贵族身份或者他的财富，他就会遭到大家的排斥，成为同学们的笑柄。

学生中间存在着的一些表面的差别(这种差别并不深)是由别的原因产生的。例如在花园对面的医科就不像其他科系那样同我们关系密切；而且医科学生大多数是宗教学校学生和德国人[④]。德国人有点不愿意同别人接近，并且充满了西方小市民的习气。那些不幸的宗教学校学生所受的一切教

道，她是"孤儿院的寄宿学生"。大家都以为皇后会感谢当局做了这件好事。然而皇后不是这样——她反而因此考虑到：让弃儿受到这样的教育是多么不体面的事情。

几个月以后尼古拉把孤儿院高级班迁到尉官学校去，(二)这就是说不许弃儿到高级班学习，由尉官们的小孩代替他们。他还想出了更彻底的办法，他不准外省的这类机构收容新生的婴儿。(三)关于这个聪明措施的最好的注解可参看司法大臣报告中的"杀婴罪"一栏。——作者原注。

(一)根据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命令，一七六三年在莫斯科、一七七〇年在彼得堡开办了孤儿院。

(二)根据尼古拉一世一八三七年的命令，孤儿院的教学班改设在尉官孤儿学校内。

(三)根据尼古拉一世一八二八年的命令，除彼得堡和莫斯科两大城市外，俄国其他城市不得设立孤儿院。

育，他们的一切思想都和我们的完全不同；我们讲的不是共同的语言：他们是在修道院专制的压迫下成长起来的，是在修辞班和神学班上磨炼出来的，因此他们羡慕我们不受拘束；而我们却看不惯他们那种基督教的恭顺。⑤

虽然我对数学并没有高的天分，也并不太喜欢数学，可是我进了数理系。我曾经和尼克一起跟着一个教师⑥学数学，我们喜欢听他讲笑话讲故事；这个教师虽然很有趣，他却未必能培养我们对他那门学问的爱好。他的数学知识就到圆锥曲线为止，这就是说只限于中学生准备投考大学所必需的知识；他是一位真正的明哲之士，从来不曾好奇地去看看"大学程度"的数学。在这方面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他只读一本书，而且反复地读了十年左右——这是一本弗朗凯尔的教科书⑦；他生性爱节制，不喜欢奢侈浪费，他的阅读从未超过某些篇页。

我挑选数理系，因为在这个系里讲授自然科学，而在当时

---

④ 按照当时规定，投考医科，必须懂拉丁语。在俄国工作的外国人（主要是医生、药剂师、外语教员）的子弟纷纷报考。当时鉴于军队中缺乏医生，政府决定增加大学医科和医学专科学校中学生的名额，招收懂拉丁语的宗教学校学生。宗教学校每年都要保送一批医科官费生上大学。

⑤ 在这方面后来有了大的进步。我最近听到的关于神学院和甚至关于宗教学校的一些事情证实了这个。我用不着说，这个进步并不是由于教会当局，却应当归功于学生们的精神。——作者原注

⑥ 教师：指伊·费·沃尔科夫，中学教员。

⑦ 教科书：指路易·弗朗凯尔（1773—1849）的著作《纯粹数学完全教程》（一八一九年莫斯科版）。

我对自然科学有强烈的爱好。

一种相当奇特的接触引起了我对这些课程的兴趣。

在我讲过的一八二二年① 有名的分家之后,“兄长”就搬到彼得堡住了下来。我们很久没有听到他的消息,后来突然听说他结了婚。当时他已经过了六十,而且我们都知道他除了一个成年的儿子以外,还有别的儿女。他就同他的长子的母亲正式结婚;“新娘”也已经过了五十。他通过这次结婚就像老早人们讲的那样,使他的儿子“合法化”。为什么不是使他所有的儿女都“合法化”呢?倘使我们不知道他这样做的主要目的,那就很难回答这个为什么了;他有一个愿望就是不让他的兄弟继承他的遗产;他使儿子“合法化”,就完全达到了这个目的。在著名的一八二四年彼得堡水灾期间,这个老人坐在马车里给泡了,受了寒,睡下来了,一八二五年初就死了。

关于这个儿子有一些古怪的传说,说他是个孤僻的人,不同别人来往,老是一个人坐在家里研究化学,一辈子的工夫都用来看显微镜,吃饭的时候也在看书,很不喜欢同女人交际,可以用《聪明误》里面的话来讲他:

> 他是化学家,他是植物学家,
> 他看见女人就逃,甚至躲开了我。
> 他就是费奥多尔公爵,我们的外甥。②

---

① 实际上这次分家发生在一八二一年。

② 见《聪明误》第三幕第二十一场,公爵夫人讲的话。

他的叔父们把他们对他父亲的怨恨都发泄在他身上，讲起他的时候就只称他“化学家”，他们使用这个字眼带着谴责的意义，暗示化学根本不是正派人干的事情。

父亲去世以前把儿子折磨得很厉害，他不仅用年老父亲厚颜无耻的淫乐表演来侮辱儿子，而且真的妒忌儿子，担心儿子在他的“后宫”夺他的爱。化学家有一次服用了雅片剂企图结束这种卑贱的生活；同他一起从事化学研究的朋友偶然地救了他。父亲给吓坏了，去世前就开始对儿子温和一点了。

化学家在父亲死后就把那些不幸的女奴[①] 全放了，又把他父亲向农民征收的过重的代役金减少一半，豁免欠缴的尾数，免费地把免役收据[②] 交给农民，而他父亲却是把家仆送去当兵以后，将免役收据卖给农民。

大约一年半以后他到了莫斯科。我很想见他；一方面由于他对待农民的态度，另一方面由于他的叔父们对他那种不公平的仇视，我喜欢他。

一天早晨有一个戴金丝眼镜的小个子来拜访我的父亲，他有一根大鼻子，头发半秃，手指上带着化学试剂烧伤的痕迹。我父亲冷淡地接待他，话里带刺；侄儿照样地对待，并不比我父亲差一点；他们较量了一番之后，就做出毫不在乎的神气，谈起一些不相干的事，分别的时候都是彬彬有礼，可是暗

① 女奴：作者在这里用了这样一个词 одалиски，原意指旧日东方皇宫中的宫女、女奴、姬妾等。

② 免役收据：当时缴纳一定的款项由国家雇人当兵，这种收据的持有者就可以免服兵役。

中都心怀怨毒，互相仇恨。我父亲看出来这个侄儿是他的一个决不让步的对手。

他们以后也从没有亲近起来。化学家很少到他的叔父家里去。他最后一次来看我父亲是在枢密官去世以后，他来向我父亲借三万卢布买地。我父亲不借；化学家生了气，他伸手揉揉鼻子，带笑说："不会担风险的，我的田产是祖传的；我借钱来改善它。我没有小孩，我们是彼此的继承人。"七十五岁的老人永远不宽恕侄儿这种狂妄的举动。

我有时去看望化学家。他的生活方式非常特殊。在特威尔大道上他那座大房子里，他只占用一间很小的屋子，还有一间他用来作实验室。他的老母亲住在走廊另一头的一间小屋子里面；其余的房间全空着，完全保留着他父亲动身去彼得堡时候的那个样子。发黑的枝形大烛台，不寻常的家具，各种各样的古董，据说是彼得一世在阿姆斯特丹[①]买来的挂钟，据说是从斯坦尼斯拉夫·列欣斯基[②]王室传下来的扶手椅，没有画的画框，一些翻过来面朝墙壁的画，——这一切都随随便便地放着，堆满了三间没有生火、没有点灯的大客厅。仆人们在门房里平常就弹托尔班琴[③]、抽烟（从前在这里他们连吐气和祷告也不敢）。一个男仆点起一支蜡烛送我走过这个"古物陈列馆"，每次都提醒我不要脱掉我的大衣，因为客厅里太冷。

---

① 阿姆斯特丹：荷兰的工商业大城市。

② 斯·列欣斯基（1677—1766）：一七〇四年到一七〇九年间的波兰国王，他的女儿是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王后，他后来长住法国，在那里以奢华出名。

③ 托尔班琴：从前波兰、乌克兰等地人们喜爱的一种双颈拨弦乐器。

那些带角的和奇奇怪怪的东西上面盖着很厚的灰尘，它们在精巧的大镜面上映出来，并且跟随着蜡烛在镜子里移动，包装时留下的干草同剪剩的纸头和绳子一起原封不动地到处躺着。

最后我们走到一扇挂着毯子的门前，进门去便是一间热得可怕的书房。化学家穿了一件弄脏了的松鼠皮镶里的长工作衫，足不出门地坐在书房里，四周都是书本、小玻璃瓶、蒸馏瓶、坩锅和别的仪器。书房里现在是谢瓦里耶① 的显微镜占统治的地位，在这里老是有氯气的臭味，可是就在这里几年前还干着可怕的、令人发指的事情——还有，我就是在这个房间里诞生的。我父亲从国外回来，同他哥哥吵架之前，在哥哥的宅子里住了几个月。而且我的妻子② 也是在这所宅子里出世的（那是一八一七年的事）。化学家在两年后卖掉了他的宅子，后来我又有机会到这所宅子参加斯威尔别耶夫③ 家的晚会，在这里辩论泛斯拉夫主义，生霍米雅科夫④ 的气（霍米雅科夫对任何事情却从不发怒）。房间都翻修过了，不过大门、门厅、楼梯、门房——都没有动，那间小书房也保留了下来。

化学家的家务更加简单，特别是在他母亲到莫斯科近郊

---

① 查·路·谢瓦里耶（1804—1859）：法国物理学家和光学家。

② 即娜·亚·扎哈利娜，是作者伯父的私生女儿。

③ 德·尼·斯威尔别耶夫（1799—1876）：莫斯科贵族，当时“斯拉夫派”和“西欧派”的代表人物常常到他的家里参加晚会，进行辩论。

④ 阿·斯·霍米雅科夫（1804—1860）：斯拉夫派运动的理论家、哲学家和诗人。

去度夏的时候,她把厨子也带去了。每天四点钟他的随从拿着咖啡壶进来,把少量的浓汤倒进壶里,就利用化学炉把它烧热,同那里的各种有毒的药品放在一起。以后随从又在小饭馆里买了半只松鸡和面包送来——他的午饭就只有这些。午饭后随从把咖啡壶洗干净,让它去执行它本来的职务。晚上随从又进来把长沙发上一大堆书搬开,把那张他父亲遗留下来的虎皮拿走,然后铺上床单,放好枕头和被子,书房很容易就变成了寝室,就像它变成厨房和饭厅那样。

在我们刚刚认识的时期,化学家看出来我读书认真,就劝我丢开“空洞的”文学研究和“毫无用处的、危险的”政治学习,去研究自然科学。他给我看居维叶的关于地质激变的演讲①和德·冈多勒②的《植物形态学》。他看见它们在我身上起了作用,便建议我使用他那完备的藏书、仪器和植物标本,他甚至亲自指导我学习。他在他这个方面很能引起别人的兴趣,他非常博学,而且聪明,甚至和蔼可亲;但也无法引他超出猴子的范围;从石头到猩猩他全感兴趣,可是在这个范围以外,他就不想掉进去了,特别是哲学,他认为这是废话。他不是保守派,也不是落后的人,他只是不相信人,这就是说,他相信利己主义是一切行动的唯一的原因,他还认为利己主义只有由于一些人的丧失理智和另一些人的愚昧无知而受到制约。

---

① 乔治·居维叶(1769—1832):法国动物学家。原书的全名是《关于地球表面的激变和这些激变在动物界中产生的变化的演讲》。

② 奥·德·冈多勒(1778—1841):瑞士植物学家。

他的唯物论[①]当时引起了我的反感。我们父亲那一辈的浅薄的、胆小的半伏尔泰主义完全不像化学家的唯物论。他的见解是沉着的、一贯的、全面的。他使我想起拉郎德[②]对拿破仑的有名的回答。波拿巴[③]对他说："康德[④]接受关于上帝的假设。"天文学家反驳道："Sire〔法语：陛下〕，我做研究的时候，从来不需要使用这种假设。"

化学家的无神论超出了神学的范围。他认为若弗鲁阿·圣伊奈尔[⑤]是一个神秘主义者，奥肯[⑥]不过是一个堕落的人。他就像我父亲阖上卡拉姆辛的《历史》[⑦]的时候那样，带着同样的轻视阖上自然哲学家们的著作。他说："他们自己发明出来第一原因，精神的力量，随后又惊奇他们怎么找不到它们，也不能够理解它们。"这是在另一个时代和另一种教育的条件下我父亲的翻版。

他对于一切人生问题的见解是更加乏味的。他认为人和兽一样，对善恶是不负责任的；这全是体质、环境和一般神经系统构造的事情，据他说神经系统所能给的东西比人们期待

① 指十八世纪自然科学的唯物论，"化学家"的哲学思想是在它的影响下形成的。

② 约瑟夫·拉郎德(1732—1807)：法国天文学家和数学家。

③ 波拿巴：指拿破仑一世(拿破仑·波拿巴)。

④ 伊·康德(1724—1804)：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家。

⑤ 艾·若·圣伊奈尔(1772—1844)：法国动物学家和解剖学家。他发展了在环境的影响下物种变异的学说。

⑥ 洛·奥肯(1779—1851)：德国自然哲学家、博物学家、唯心主义者。

⑦ 《历史》：指卡拉姆辛的《俄国史》。

于它的少得多。他不喜欢家庭生活，谈到结婚就感到恐怖，坦率地承认他活了三十岁没有爱过一个女人。然而在这个冷漠的人身上也还保留着一小股暖流；这从他对待老母的态度上看得出来；他们一起在他父亲的手里受过多大的折磨，灾难把他们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他令人感动地尽力使她的寂寞多病的老年得到安静和照顾。

除了化学理论以外，他从来没有宣传他的理论；它们都是偶尔吐露出来，不然就是我引出来的。他甚至不愿意回答我那些带浪漫主义的和哲学上的反驳；他的答复都是简短的，他回答的时候面带笑容，而且态度温和，好像一只大的老猛犬同小狗玩一样，猛犬让小狗逗弄它，它只消用它的脚爪轻轻一拍就把小狗赶走了。然而正是这个使我最生气，我不厌烦地 à la charge〔法语：对（他的）袭击〕进行报复，可是我从没有赢得一寸地盘。后来，就是在十二年以后，我多次回忆起化学家，也多次回忆起我父亲对他的评论；不用说，我同他持反对意见的一切事情中有四分之三都是他对的。不过我也并不错。有一些真理（我们已经谈过了）就像政治权利那样，在没有到一定年龄的人，是得不到的。

化学家的影响使我挑选了数理系；也许我进医科更好，不过我起初随便学到一点微积分的知识然后完全忘记，这也没有什么大害处。①

① 作者毕业考试时，应用数学得了“三”分。当时实行五级记分制，最高成绩是“四”分，最低“〇”分。

没有自然科学，现代人就没有生路。没有这种适合健康的食物，没有这种通过事实对思想的严格训练，没有这种同我们周围生活的密切接触，又不甘心承认生活的独立性，——在灵魂深处必然保留着修道院修士的潜修室，那里面隐藏着神秘主义的种子，它可能发起愚暗的水淹没了全部理智。

我还没有念完大学课程，化学家就到彼得堡去了，一直到我从维亚特卡回来才再看见他。我结婚以后过了几个月，半秘密地到莫斯科近郊的庄园里住了几天，我父亲当时住在那儿。这次旅行[①]的目的是实现同我父亲的完全和解，他因为我的婚姻还在生我的气。

我中途在彼尔胡希柯沃停留，在那个地方我们从前不知停留过多少次；化学家在那里等我去，他甚至准备了午饭和两瓶香槟酒。这四五年中间他一点也没有改变，只是稍微老了一些。午饭以前他一本正经地问我：

"请您坦白地对我说，您觉得家庭生活、结婚怎么样？有什么好处，或者好处不多？"

我笑了起来。

"您倒真勇敢，"他继续说，"您使我惊奇；在正常的条件下面，人绝不敢走这样可怕的一步。有人给我提说过两三起很好的婚事，然而我想到一个女人住进我的房间来当家作主，一切都要按照她的意见重新整顿，说不定还要禁止我抽烟，"（他抽一种劣等烟草）"会吵吵闹闹，搞得乱七八糟，那个时候，我

① 指作者同他的妻子一八三八年七、八月到波克罗夫斯柯耶的旅行。

就会狼狈不堪，倒宁愿在孤单中死去。”

吃过午饭以后我问他：

“您说，我留在您这儿过夜呢，还是继续赶到波克罗夫斯柯耶去？”

“您在我这儿住不成问题，”他答道，“不过，替您着想，还是继续往前走好，十点钟光景您就可以到您爸爸那儿。您当然知道，他还在生您的气；我说，晚上睡觉前老年人的神经通常都松弛下来、萎缩不振，他今天接待您大概比明天好得多；您早晨去，就会看到他作好了战斗的准备。”

“哈，哈，哈，我认出我的生理学和唯物论的教师来了，”我说，衷心愉快地大笑起来，“您的高见使我记起过去那些幸福的日子，我当时经常像歌德的瓦格纳[①] 那样到您那儿去，拿我的唯心论去折磨您，而且不是没有愤怒地听着您那些冷酷的言论。”

“您从那个时候起有了充分的生活经验，足以知道，”他答道，也笑了，“人的一切行动只不过是由他的神经和化学成分来决定的。”

后来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彼此不来往了；大概两个人都有错。……然而在一八四六年他给我写了一封信来。我当时因为发表《谁之罪?》[②]的第一卷开始出了名。化学家在信里对

---

① 瓦格纳：老博士浮士德的忠实弟子，见歌德的诗体悲剧《浮士德》。

② 《谁之罪》：作者的长篇小说，一八四六至一八四七年在《祖国纪事》和《现代人》上面发表，在文学界中获得广大的声誉。

我说，他看见我把自己的才能耗费在空洞无聊的事情上他感到难过。"我因为您的《论自然研究的信》[①]同您言归于好了；在那些信里我理解了(在人的心智所能理解的范围内)德国哲学——那么您为什么不继续从事严肃认真的工作却写起故事来了？"我写了几行友好的词句回答他——从此我们的来往就完全断了。

要是化学家亲眼看到这些文字，我请求他在神经松弛、躺在床上预备睡觉的时候读它们，我相信他会原谅我这种友好的饶舌，尤其因为我对他始终保持着恳切的、良好的纪念。

这样我在老家的隐居生活终于结束了。我是 au large〔法语：无拘无束〕了；现在不再是我们小屋子里的孤寂了，不再是悄悄的、半躲藏的同奥加略夫单独的见面了——我周围有一个一共是七百人的热闹家庭。我在这里两个星期里面就习惯了，比在我生下来就住在那里面的老家还更习惯。

然而老家一直不肯放松我，甚至在大学里还用听差的形式表现出来，我父亲派了一个听差来陪伴我，尤其是在我步行的时候。整个学期里面我都在设法摆脱这个"保镖"，好不容易正式办到了。我说"正式"，因为担负这个任务的我的随从彼得·费多罗维奇很快就明白，第一，我不喜欢有人陪伴，第

① 《论自然研究的信》：作者在一八四五至一八四六年在《祖国纪事》上面发表的哲学论文。

二,他有比数理系门房愉快得多的各种娱乐地方,在这里他唯一的消遣就是同两个守卫聊天,和他们互敬鼻烟,有时自己闻闻鼻烟。

派一个“保镖”给我是为了什么目的呢?难道从年轻时候起一醉就是几天的彼得能够阻止我做任何事情吗?我猜想我父亲并没有想到这上面,不过为了使自己心安起见,他采取了措施,措施虽然没有效,但究竟是措施,这就像某些人那样,他们虽然并不相信宗教,可是也在做斋戒祈祷。这是我们旧式地主教育的一部分。七岁前我在家上楼梯(楼梯稍微有点陡),都得有人拉住我的手,这是一个规矩;十一岁前都是韦拉·阿尔塔莫诺夫娜在盆子里给我洗澡;因此我进大学的时候派一个仆人跟着我,二十一岁前不许我在十点半以后回家,这也是很合乎逻辑的。我在流放期间才实际上享受到自由、随意行动;倘使我不被流放,这种办法会一直推行到二十五岁……甚至到三十五岁。

和大多数在孤寂中长大的活泼的男孩一样,我那么真心诚意、那么感情冲动地拥抱每一个人,带着狂热的粗心大意进行宣传,毫不掩饰地爱每一个人,这样就不可能不会在差不多和我同样年纪的同学中间唤起热烈的响应(我当时十七岁)。

所谓明智的准则——对所有的人都彬彬有礼,同谁也不亲近,对任何人都不相信,同我们进大学时候带去的形影不离的思想——认为我们的梦想要在这里实现、认为我们要在这里撒下种子、奠定联合的基础的思想一样,都有助于我们的互

相接近。我们相信会有密密的一排人从这个教室出去，跟着伯斯捷尔和雷列耶夫的脚步前进，我们就在他们中间。

我们年级里都是些优秀的青年。正是在这个时候我们中间研究理论的兴趣越来越显著了。学究式的死记和贵族式的懒惰同样地在消失，可是还没有由德国的功利主义来代替，德国的功利主义用科学来丰富人的心智，就像人们为了增加收成在地里施厩肥那样。相当多的学生不再把科学看作取得八等文官官衔所必需的枯燥乏味的捷径了。在我们中间现在发生的问题完全同官衔、品级表不相干了。

另一方面科学的兴趣还来不及蜕化为空谈理论；科学并没有使我们脱离对周围苦难生活的干预。对周围痛苦的这种同情以不寻常的方式提高了学生们的公民道德。我们和我们的同学在课堂上公开地议论我们想到的任何事情；禁诗的手抄稿从一个人传给另一个人，我们阅读禁书，还加以评论，然而我不记得教室里有过一桩告密的事，也没有发现过一个叛徒。有过一些胆小的青年，他们躲开，不敢接近，——可是他并没有讲出什么。①

有一个糊涂的小青年被他的母亲问起马洛夫事件②，她用树条吓唬他，他对她讲出了一些。这位心疼儿子的母亲是一个贵族，又是公爵夫人，她连忙赶到校长那里把儿子告密的

① 那个时候并没有在课堂上执行像我的〔听差〕彼得·费多罗维奇所执行的那种任务的学监和副学监。——作者原注

② 马洛夫事件：发生在一八三一年三月十六日。

话都讲了，作为他悔过的证据。我们知道了这件事情，大家都责难他，使他无法在学校里待到学业结束。

这个事件（由于它我也受到了禁闭）是值得在这里讲一讲的。

马洛夫是一个愚蠢的、粗鲁的、没有学问的政治系教授。学生瞧不起他，嘲笑他。①

“你们系里有多少教授？”有一次督学在政治系教室里问一个学生道。

“不算马洛夫九个。”② 学生答道。

就是这个不能和其他九个并列、必须除外的教授，他对待学生越来越粗暴了；学生们也下了决心要把他赶出教室。他们经过商议之后派了两个代表到我们系里来邀请我带着支援力量去协助。我马上鼓动大家去参加反对马洛夫的战斗，还有几个人同我一起去了；我们走进政治系教室的时候，马洛夫正在那里，他看见了我们。

所有学生的脸上都露出同样担心的表情：生怕他在这一天不再作任何粗暴的评语。这种担心马上就过去了。挤满了人的教室里很不安静，发出一种低沉的、压抑住的嘈杂声。马洛夫说了一句不满意的话；人们开始用脚在地板上摩擦。

“你们就像马一样，用脚来表示你们的思想。”马洛夫说，

---

① 学生憎恶马洛夫，不仅因为他粗暴，他还是专制制度的辩护士，他在讲课中赞扬农奴制度。

② 这是一句双关俏皮话，马洛夫这个姓本来含有“少”和“小”的意思。

他大概以为马是用跑步、快步思想的，——这样一来一场风暴就起来了；吹哨声，嘘声，喊叫声："叫他滚，叫他滚！Pereat!〔拉丁语：叫他完蛋！〕"马洛夫的脸色十分苍白，他拚命想制止吵闹，可是没有办法；学生们跳到长凳上面。马洛夫静悄悄地走下了讲台，他缩着脑袋，朝门口走去；教室里的学生跟着他，把他送出大学的院子直到街上，在他背后把他的胶皮套鞋扔了出去。后一个情节很重要，因为到了街上这件事情就有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性质；然而世界上哪里有十七、八岁的年轻人会考虑到这个？

大学校务会害怕得不得了，说服督学私下了结这个事件，因此就得把肇事的人，或者随便几个什么人关起来。这个办法相当聪明。否则很容易发生这样的事情：皇上派一个侍从武官① 来调查，他想得到一枚十字勋章，就会把这件事说成是结党密谋、暴动、叛乱，建议把所有的罪人都送去服苦役，而皇上又会恩赦把刑罚减为服兵役。皇上看见了罪人受罚、正气伸张，便开恩批准学生们的要求，辞退了教授。我们只把马洛夫赶到学校门口，他〔尼古拉〕却把他赶出了大学。对于尼古拉，总是 vae victis〔拉丁语：打败的人倒楣〕；然而这一回我们倒没有理由埋怨他。

这样，事情就紧张起来了；第二天午饭以后，办公室派了一个门警，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头子来找我（他真心实意 à la lettre〔法语：按照字义〕认为学生给他的酒钱是用来买伏特加

① 侍从武官：直属沙皇、办理特殊重要公务的武官。

喝的，因此他始终保持着不太清醒倒更接近醉醺醺的状态）。他从制服大衣翻卷的袖口里面拿出来"教长"① 的字条：命令我晚上七点钟去见他。门警去了以后，又来了一个脸色苍白的吓坏了的学生，一个波罗的海东岸的男爵②，他也接到同样的请帖，他是我带去的不幸的受害者中间的一个。他把我抱怨了一通，然后问我他应当讲些什么话。

"拚命撒谎，什么都不承认，只承认有过吵闹和您在教室里这两件事。"我回答他说。

"然而校长会问，我为什么不在我们的教室却在政治系教室呢？"

"怎么为什么呢？难道您不知道罗季昂·盖依曼③没有来上课，您不愿意浪费时间，所以去听别人的课吗？"

"他不会相信。"

"那是他的事情。"

我们一起走进大学院子里的时候，我看看我的男爵，他那胖胖的小脸蛋十分苍白，总之，他心情很坏。

"听我说，"我说道，"您可以相信，校长不会先跟您谈话，而是先跟我谈；所以您就照我的意思用不同的话讲一遍，事实上您并没有做过什么特别的事情。只是您不要忘记一件事：由于在教室里吵闹，和因为撒谎，您至多不过给关进禁闭室；

---

① 门警把校长说成了"教长"。

② 波罗的海东岸的男爵：俄国籍日耳曼人的贵族。

③ 罗·格·盖依曼（1802—1865）：莫斯科大学化学教授（一八三三年起）。

然而要是您当着我的面胡扯，把别人牵连进去，我就要告诉同学们，我们就不会让您安宁。"

男爵答应了，他忠实地遵守了诺言。

当时的校长是德维古勃斯基①，他是太古时代的，更正确地说是大火以前的、也就是一八一二年以前的教授中的遗老和典型。他们现在已经绝迹了；一般地说，奥包连斯基公爵②监督的时期结束，莫斯科大学的家长制时期也跟着结束了。在那个时候政府并不过问大学的事，不管教授上课不上课，学生到不到，不管学生来去不穿 à l'instar〔法语：按照〕轻骑兵军官制服式样的制服礼服，却穿了各种奇形怪状的衣服，而且戴着很小的制帽，几乎连他们的女孩般的头发也压不住。教授分为暗中互相憎恨的两个营垒或者两个阶层：一个全是德国人，另一个则是由非德国人组成的。德国人中间包括像洛德尔、费谢尔、希尔德勃兰特和盖依姆本人③那样脾气好、有学问的人，他们有这样共同的特点：对俄文一无所知，也不想知

---

① 伊·阿·德维古勃斯基(1771—1839)：俄国博物学家、教授，一八二六至一八三三年任莫斯科大学校长。

② 安·彼·奥包连斯基公爵(1769—1852)：一八一七至一八二五年莫斯科教育区的督学。他担任督学的那段时期中莫斯科大学就是在他的统治之下。

③ 克·伊·洛德尔(1753—1832)：医生、解剖学者、御医，一八一八至一八三一年间任莫斯科大学教授。格·伊·费谢尔·冯·巴尔德海姆(1771—1853)：一八○四至一八三五年间任莫斯科大学动物学教授。费·安·希尔德勃兰特(1773—1845)：一八○四至一八三九年间任莫斯科大学外科学教授。伊·安·盖依姆(1758—1821)：历史、地理、统计学教授，一八○八至一八一八年间任莫斯科大学校长。

道它;对学生漠不关心;崇拜西方;墨守成规;毫无节制地抽雪茄烟;拥有大量十字勋章,而且经常佩戴它们。而非德国人这方面,除了俄国话外,其他(活的)语言一种也不懂,他们奉行狭隘的爱国主义,像宗教学校学生那样顽固,而且除了美尔兹里雅科夫① 外,都受到不好的待遇,他们并不是毫无节制地抽雪茄烟,却都是毫无节制地喝酒。德国人大多数都是从哥庭根② 来的,而非德国人却是教士的儿子。

德维古勃斯基属于非德国人。他的相貌极其尊严,有一个宗教学校毕业的学生来拿表格,居然走到他跟前请求他给他祝福,并且经常称他为"校长神甫"。同时他又非常像一只脖子上挂着安娜勋章③ 的猫头鹰,另一个受过更多世俗教育的学生给他绘了一幅这样的肖像。他有时到我们教室里,或者同系主任楚马科夫④,或者同柯捷里尼茨基⑤ 一起来,柯捷里尼茨基负责管理一个上面挂着"Materia Medica"〔拉丁语:医疗用品〕的牌子的橱,不知什么缘故这个橱一直放在数学教室里面;他或者同列依斯⑥ 一起来,列依斯是从德国聘请来

① 阿·费·美尔兹里雅科夫(1778—1830):俄国诗人、评论家、翻译家,一八〇七年起任莫斯科大学俄国文学教授。

② 哥庭根:德国工业城市,过去有著名的大学和藏书丰富的图书馆等。

③ 二级安娜勋章,是挂在脖子上的。

④ 费·伊·楚马科夫(1782—1837):莫斯科大学数学教授,一八二七至一八三一年间任数理系主任。

⑤ 瓦·米·柯捷里尼茨基(1770—1844):莫斯科大学教授和医科主任。

⑥ 费·费·列依斯(1778—1852):一八〇四至一八三二年间任莫斯科大学化学教授。

的，因为他的叔父[①] 是一个很好的化学家，他读法文的时候把“灯芯”〔法语：cordon de coton〕读成“棉棍”〔法语：bâton de coton〕，把“毒药”〔法语：poison〕读成“鱼”〔法语：poisson〕，他读“闪电”这个词的发音非常古怪，使得好些人都以为他在咒骂人，——我们睁大两只眼睛望着他们，好像在看出土文物，好像在看阿文塞拉赫[②] 的末代，另一个时代的代表人物，这个时代与其说是同我们接近，不如说同特列季雅科夫斯基[③]和柯斯特罗夫[④] 更接近；他们那个时代，人们还在读赫拉斯科夫[⑤] 和克尼雅日宁[⑥]；那个时代，脾气好的季里捷依教授[⑦]养了两条狗：一条老是叫个不停，另一条却从来不叫，他因此很恰当地给它们起了两个名字，一条叫“小多嘴”，另一条叫“小谨慎”。[⑧]

---

① 指奥·克·列依斯，德国化学家，德国符腾堡、提宾根大学教授。

② 阿文塞拉赫：在西班牙格拉纳达的摩尔人家族，法国作家弗·沙多勃利昂（1768—1848）根据这个家族在格拉纳达的悲剧命运的传说，创作了他的浪漫小说《阿文塞拉赫末代的冒险记》。

③ 瓦·基·特列季雅科夫斯基（1703—1769）：俄国诗人、文学理论家，翻译过不少作品。

④ 叶·伊·柯斯特罗夫（1750—1796）：俄国诗人，翻译家，译过《伊利亚特》等作品。

⑤ 米·马·赫拉斯科夫（1733—1807）：俄国作家，诗人，剧作家。

⑥ 雅·包·克尼雅日宁（1742—1791）：俄国诗人，剧作家。

⑦ 菲·亨·季里捷依（死于一七八一年）：莫斯科大学第一任法学教授（从一七五六年起）。

⑧ “小多嘴”和“小谨慎”（“巴瓦尔卡雅”和“普鲁登卡雅”）：两个名字都是从法国话来的。“小多嘴”来自法语 bavard（多嘴的）；“小谨慎”来自法语 prudent（小心谨慎的）。

然而德维古勃斯基完全不是脾气好的教授;他接见我们的时候非常严厉、粗暴;我拚命拉长地瞎扯了一通,而且没有礼貌,男爵跟着又重复了一遍。德维古勃斯基生了气,叫我们第二天早晨到校务会去,在那里他们审问了我们半个小时,给我们定了罪,判了刑,然后把判决书送给戈里曾公爵批准。

我刚刚来得及在教室里向同学们表演了五、六回大学评议会的审讯和判决的情景,在讲课开始的时候,学监(他是俄国军队的少校,又是法国舞蹈教师)突然带着一个军士来了,手里拿着将我逮捕押送禁闭室的公文。一部分学生送我出去,院子里已经聚集了一群年轻人;看来我并不是头一个被捕的;我们经过的时候,他们全挥动制帽,挥手;大学的卫兵赶他们向后退,然而学生们不肯走。

在当作禁闭室的肮脏的地下室里,我见到两个被捕的同学:阿拉彼托夫和奥尔洛夫;安德列·奥包连斯基公爵和罗旬盖依姆给关在另一个房间里面,因为马洛夫事件受处罚的一共是六个人[①]。命令只给我们面包和水。校长差人送了汤来,我们拒绝了,我们做得好。天刚刚黑,学校里没有别人的时候,同学们就给我们送来干酪、野味、雪茄烟、葡萄酒和烈性的甜酒。看守我们的卫兵生了气,抱怨起来,不过他收了二十戈比的铜币以后,就把吃的东西拿进来了。过了半夜,他更松

① 除了这里提到的四个人再加上作者以外,还有一个学生巴·巴·卡敏斯基(1812—1870)。伊·巴·阿拉彼托夫(1811—1887);安·亚·奥包连斯基(1814—1851年以后);罗旬盖依姆的名字叫米哈依尔。

了些，放了几个人进来探望我们。所以我们就这样地过日子：夜晚吃喝，白天睡觉。

有一回司法大臣的兄弟、副督学潘宁[①]按照他那禁卫骑兵队的习惯，忽然想起晚上来巡视大学地下室里面的国家监狱。我们刚刚点燃一支蜡烛放在椅子下面，免得外面看见亮光，正要开始我们半夜的早餐，突然听见有人敲外面的门，——并不是平常那种轻轻要求卫兵开门的敲门声，不是那种并非怕人听不见倒是怕人听见的敲门声；不，这是权威的、命令的敲门声。卫兵发呆了；我们把酒瓶和同学们藏在小贮藏室里面，吹灭了蜡烛，连忙躺在我们的铺位上。潘宁进来了。

“看来你们在抽烟吧？”他说，屋子里烟雾弥漫，我们几乎看不清楚他和那个打着灯笼的学监。“他们从哪儿弄来的火，是你拿给他们的吗？”

卫兵发誓说，他没有给我们火。我们回答说，我们自己带了火绒来。学监答应把火绒没收、雪茄烟全部拿走，潘宁就出去了，他并没有注意到屋子里制帽的数目比脑袋多一倍。

星期六晚上学监来通知，我和我们中间另一个同学可以回家，可是其余的同学还得待到下星期一。我觉得这个建议是对我的侮辱，我便问学监，我是不是可以待下来；他向后退

① 亚·尼·潘宁(1791—1850)：俄国执行特殊任务的官员，一八三〇至一八三三年在戈里曾的莫斯科教育区督学处办理重要公务。一八三四年任哈尔科夫大学副督学。

了一步,他带着威严而又优雅的表情,就像芭蕾舞剧中沙皇和英雄们用舞蹈表示愤怒的那种神气,说了一句:"那您就待下吧,"便走了。我最后这个愚蠢的举动比整个事件给我招来家里更多的责难。

因此,我最初不在父母家中睡觉的夜晚都是在禁闭室里度过的。以后不多久我又尝到了另一种监狱的滋味,那一次却不是待八天,而是待了九个月,出狱后不是回家而是去流放地。然而那是后来的事情。

从这个时候起我在教室里享有很高的声誉。我入学的时候被认为是个好学生;马洛夫事件之后我成了像果戈理[①] 的著名的太太那样的"各个方面都好的"同学了。

在这一切事情当中,我们能学到什么吗,我们还能够学会什么吗? 我认为:"能够。"教课比在四十年代还差一些,它的范围也更窄一些。[②] 可是话又说回来,大学职责并非对学生进行任何知识部门的全面训练;它的任务是培养人 à même〔法语:使他有可能〕独立自主地继续学习、研究;它的任务是提出问题,并且教会人发问。像米·格·巴甫洛夫[③] 那样的教授就的确是这样做的,另一方面,像卡切诺夫斯基[④] 那样的教授也这样

① 尼·瓦·果戈理(1809—1852):俄国作家,"通体漂亮的太太"(即"各个方面都好的太太")是他的长篇小说《死魂灵》中的人物,见小说的第九章。

② 赫尔岑在莫斯科大学念书是三十年代初的事。

③ 米·格·巴甫洛夫(1793—1840):俄国物理学、矿物学和农学教授,一八二〇年起在莫斯科大学任教。

④ 米·特·卡切诺夫斯基(1775—1842):俄国历史学教授,一八一〇年起在莫斯科大学任教,一八三七年担任校长职务。

做。然而在教室里年轻人之间的接触，思想和学习心得的交流，对学生们的发展来说比讲课和教授的作用更大。……莫斯科大学是尽了自己的职责的；那些用讲课促进了莱蒙托夫、别林斯基、伊·屠格涅夫、卡威林和皮罗果夫[1]的发展的教授可以安心地打波士顿[2]，更可以安心地在地下长眠了。

然而他们中间也有一些十分希奇古怪的人物——从费多尔·伊凡诺维奇·楚马科夫（他带着特权地主毫无顾忌的放任，随意改变公式，增减字母，把平方当作根、把X当作已知数，使它们和普安索[3]的教科书中的公式符合）到加弗利洛·米雅格科夫[4]（他讲世界上最硬性的科学——战术）。米雅格科夫由于长期讲述有关英雄的题目，他本人的外貌也带了一种训练有素的军人气概；他的上衣的钮扣一直扣到喉咙，打了一根毫无绉纹的领带，他讲课的时候，不像在讲话倒像是在发号施令。

"诸位，"他嚷起来，"上战场！关于炮兵！"

这并不是说大炮在运往战场，这只是书上的小标题。可

① 米·尤·莱蒙托夫（1814—1841）：俄国诗人。维·格·别林斯基（1811—1848）：俄国文学评论家。伊·谢·屠格涅夫（1818—1883）：俄国小说家。康·德·卡威林（1818—1885）：俄国历史学家、法学家、自由主义的政论家。尼·伊·皮罗果夫（1810—1881）：俄国外科医生，彼得堡大学医科教授。这些人都在莫斯科大学念过书。

② 波士顿：一种纸牌戏。

③ 路易·普安索（1777—1859）：法国数学家和机械工程师。

④ 加·伊·米雅格科夫：他在莫斯科大学教战争科学到一八三三年，写过一本题为《炮兵战术经验》的书。

惜尼古拉不肯到莫斯科大学来;要是他见到米雅格科夫,他一定会任命他当督学。

至于费多尔·费多罗维奇·列依斯,他讲授化学从来不超出化学三元素中的第二位尊神[①],就是氢的范围!列依斯,他给聘请来作化学教授,并非因为他本人、而是因为他的叔父研究过这门科学。在叶卡捷琳娜女皇统治的末期,曾经邀请老人到俄国来;老人不肯来,就打发他的侄子来了。……

在我上大学的四年中间(因为在发生霍乱的时候大学停课整整一个学期)的几件特别大事就是霍乱本身、洪波尔特[②]的到来和乌瓦罗夫[③]的视察。

洪波尔特从乌拉尔回来,在莫斯科受到大学自然科学家协会[④]举办的隆重集会的欢迎,协会的会员是各种各样的枢密官和省长——总之是那些不论和自然科学或者非自然科学的学问都毫不相干的人。洪波尔特的名声,普鲁士陛下的三等文官,皇上[⑤]授予他安娜勋章并且下令对勋章和证书一律

---

① 第二位尊神:作者在这里讽刺地用了神学用语,指化学元素——气体:氧、氢、氮。

② 亚·弗·威·洪波尔特(1769—1859):德国自然科学家和旅行家,对中美和南美进行过研究,到过俄国的乌拉尔和阿尔泰地区。

③ 谢·谢·乌瓦罗夫(1786—1855):俄国反动的国务活动家,一八一八至一八五五年任科学院院长,一八三三至一八四九年兼任国民教育大臣。他的视察发生在一八三二年秋季。

④ 大学自然科学家协会:指莫斯科自然科学家协会。

⑤ 指沙皇尼古拉一世。

不收费[①]，他们都听到了。他们下决心不在那个到过琴博腊索山[②]、住在无愁宫[③] 里的人跟前丢脸。

我们直到现在对欧洲人和欧洲[④] 的看法就同外省人对住在首都的人的看法一样，——卑躬屈节，自卑自贱，服从他们，摹仿他们，把任何跟他们不同的地方当作缺点，由于自己的特别地方感到脸红，并且把它们掩盖起来。问题在于我们被彼得一世的讥笑、比伦的侮辱、德国军官和法国老师的高傲吓坏了，而且还没有恢复过来。西方人[⑤] 谈论我们的心口不一和狡猾奸诈；他们把喜欢表现自己和喜欢自夸当成了存心欺骗。在我们中间同一个人对待自由主义者会天真地采取自由派的态度，对待反动派会装做正统派[⑥]，并不是什么阴谋诡计，这只是为了礼貌，为了讨好别人；de l'ap probativité〔法语：讨好人的〕结节在我们的头颅骨里是异常发达的。

"德米特利·戈里曾公爵，"有一回德拉姆爵士[⑦] 说，"是一位真正的民权党[⑧]，内心里是个民权党。"

---

① 不收费：洪波尔特在一八二九年十一月一日接受一级安娜勋章，按照当时法律规定，受勋人员要向勋章局纳费。

② 琴博腊索山：在拉丁美洲厄瓜多尔的中(偏西)部。

③ 无愁宫：十八世纪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在波茨坦修建的宫殿。

④ 欧洲人和欧洲：指西欧人和西欧。

⑤ 西方人：指西欧人。

⑥ 正统派：指拥护法国波旁王朝的保皇派。

⑦ 约翰·德拉姆伯爵(1792—1840)：英国政治活动家，一八三五至一八三七年间英国驻俄大使。

⑧ 民权党：即辉格党，跟王党和保守派对立的英国政党的成员。

德·瓦·戈里曾公爵是一位可尊敬的俄国贵族，然而他为什么是个"民权党"，而且怎样会是"民权党"——我就不明白了。我们不妨相信公爵到了晚年为了讨好德拉姆，就装成民权党的样子。

在莫斯科和在大学里欢迎洪波尔特，并不是开玩笑的事。总督、各种高级文武官员、枢密院成员——全出席了：都在肩头斜挂着绶带，穿上全身制服，教授们像军人一样佩带军刀，把三角帽挟在腋下。洪波尔特并没有料想到这些，他穿着钉金钮扣的深蓝色燕尾服来了，不用说他感到很窘。从门廊到自然科学学会的大礼堂，到处都设了埋伏：这里是校长，那里是系主任，这里是新进的教授，那里是即将退休因而讲话很慢的老教授，——大家都讲拉丁语，讲德国话，讲法国话欢迎他，而且这一切都是在称为走廊的那些可怕的石头洞子里举行的，在这些地方谁也不能待上一分钟而不患一个月的感冒。洪波尔特脱下帽子听每一个人的欢迎词，并且一一作答。我相信红皮肤的和铜色的未开化的人（他曾在他们中间生活过）给他的烦恼也比莫斯科的欢迎少一些。

他到了礼堂，刚刚坐下，可是马上又得站起来。督学皮萨列夫认为应当用简短而有力的俄文辞句下令表彰著名旅行家洪波尔特阁下的丰功伟绩；这以后"军官"谢尔盖依·格林卡①，

① 谢·尼·格林卡（1776—1847）：俄国作家和记者，参加过一八一二年的卫国战争。一八二九年十一月九日《莫斯科新闻》第九十号刊载了十月二十六日自然考察学会会议的报道，讲到格林卡用法文写的歌颂洪波尔特的诗。

用他那低沉而嘶哑的一八一二年的声音，朗诵他的用下面的句子开头的诗：

"Humboldt—Prométhée de nos jours!"〔法语：洪波尔特——当代的普罗米修斯！〕

洪波尔特想谈谈他对磁针的观察，[①]拿他在乌拉尔的气象记录同莫斯科的气象记录相比较，可是校长不让他谈，却请他看彼得一世的御发编成的什么东西……；艾伦堡和罗节[②]费了大力才找到机会讲了一点他们的发现。[③]

在非官方的范围内我们处理这种事情并不好多少：整整十年以后李斯特[④]在莫斯科受到的接待就是一模一样。在德国人们欢迎他已经做得够蠢了，可是在这里又是另外一种性质。在德国全是老处女般的过度兴奋，自作多情，全是Blumenstreuen〔德语：散花〕；在我们这里却全是卑屈，颂扬权势，

---

① 磁针的观察：根据《莫斯科新闻》九十号刊载的报道，洪波尔特在会上的讲话中谈到他在乌拉尔旅行期间所作的磁性观察。

② 克·哥·艾伦堡（1795—1876）：德国动物学家，参加了洪波尔特的乌拉尔考察队。古·罗节（1798—1873）：德国地理学家和矿物学家，陪同洪波尔特到西伯利亚和乌拉尔旅行。

③ 在俄国对洪波尔特的旅行有着各种不同的看法，这可以从一个在彼尔姆省长公署工作的乌拉尔哥萨克的记述中看出来；他喜欢描述他怎样护送"那位疯狂的普鲁士亲王洪卜洛特"。"他干些什么呢？"——"就是干这种傻事：采集青草，察看砂粒；有一次在盐沼地上他通过翻译官对我说：'钻到水里去，把水底的东西拿来'；好，我就把通常在水底找到的东西拿出来了。他又问道：'底下的水很冷吗？'我想：'老兄，你骗不了我。'我就立正，回答道：'大人，凡是责任所在，对我们都是一样，我们乐于尽力而为。'"——作者原注

④ 弗·李斯特（1811—1886）：匈牙利作曲家和钢琴家。李斯特到俄国访问过三次，即一八四二年，一八四三年和一八四七年。

立正，我们这里全是"我有幸拜见阁下"。在这种场合，不幸李斯特还有一个著名洛夫莱斯的名声；太太小姐们包围他就像农家小孩在乡下土路上围着一个马车正在套马的过路客人，好奇地打量他本人、他的马车、他的帽子那样……所有的人都只听李斯特一个人讲话，所有的人都只同他一个人谈话，也只回答他一个人的问话。我还记得在一次晚会上霍米雅科夫替这些可尊敬的先生女士感到害羞，他对我说：

"请您跟我争论点什么吧，让李斯特看到在这间屋子里还有一些人心里并不是只有他。"

为了安慰我们的太太小姐们，我只能讲一件事情：英国女人也正是这样地把别的著名人物——先是柯苏特[①]，然后是加里波的[②]以及其他名人团团围住，缠住他们，不让他们安静，不放他们走；那些想向英国女人和她们的丈夫学习礼节的人该倒楣了！

第二个"著名的"旅行家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当代的普罗米修斯"，不过他不是从周比特[③]那里、而是从人那里盗窃光明。这个普罗米修斯不是受到格林卡、而是受到普希金本人（在他

① 拉·柯苏特（1802—1894）：匈牙利政治家，一八四八至一八四九年匈牙利革命时期匈牙利人民斗争的主要组织者。

② 朱·加里波的（1807—1882）：意大利人民争取民族解放斗争中的英雄。

③ 周比特：古罗马神话中的最高的神，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宙斯。这里应当用宙斯，即希腊神话中的最高的神。

的《致卢苦鲁斯》[①] 中)"歌颂"的,他就是国民教育大臣谢·谢·乌瓦罗夫(他当时还不是伯爵)。使我们吃惊的是他懂得许多种语言和应有尽有的各种东西;他是教育商店一个地道的掌柜的,他的脑子里装满了所有学科的样品,它们的陈列样品,或者更正确地说,试制品。在亚历山大〔一世〕统治时期,他用法文写了几本自由主义的小册子[②];然后他又用德文同歌德通信谈希腊的事情。[③] 他做了大臣以后大讲第四世纪斯拉夫民族的诗,卡切诺夫斯基向他指出那个时候我们的祖先只好同熊搏斗,谈不上做诗歌唱萨莫色雷斯岛[④] 的神和专制君主的仁慈。他经常在衣服口袋里放一封歌德的来信作为证物,歌德在信里对他讲了很古怪的恭维话,说:"您不用为您的文体道歉;您已经做到了我从来没有做到的事情——您忘记了德文文法。"

就是这位二等文官皮克·德·米兰多勒[⑤] 采用了一种新

---

① 《致卢苦鲁斯》:指普希金的诗《祝卢苦鲁斯恢复健康》(一八三五),这首诗是讽刺谢·谢·乌瓦罗夫的。卢苦鲁斯是古罗马的将军、执政官,生活豪华,经常同第一流的诗人、艺术家和哲学家交往。

② 小册子:指谢·谢·乌瓦罗夫写的法文小册子,有《悼念莫罗》(一八一三)和《亚历山大皇帝与波拿巴》(一八一四)。让·维·莫罗原先是法国拿破仑军队的军官,参加过多次战争,后来反对拿破仑,被流放国外,到俄国军队服役,在一八一三年德累斯顿战役中受伤致死。

③ 乌瓦罗夫同歌德通信:见于G·施密特的文章《歌德与乌瓦罗夫和他们的书信往来》(一八八八年圣彼得堡德文刊物《俄国杂志》第二十八卷第二期)。

④ 萨莫色雷斯岛:爱琴海东北一个岛,第三世纪中统治它的君主经常更换。它受到人注意的地方是它对于双生的神卡比里的崇拜。

⑤ 皮克·德·米兰多勒,即乔万尼·皮可·德拉·米兰多拉(1463—1494):意大利哲学家,懂多种语言。

的考试方法。他下令挑选最好的学生代替教授讲课，每人讲一课，就讲自己学的那门科学。不用说，系主任挑选了最灵活的学生。

这样的讲课进行了整整一个星期。学生们应当准备好他们所学课程的各个题目，系主任用抽签办法来决定学生的名字和题目。乌瓦罗夫请来了所有莫斯科的显贵。修士大司祭们和枢密官们，总督和伊凡·伊凡诺维奇·德米特利叶夫——全出席了。

我得在洛威茨基① 主持下讲矿物学。……他现在已经死了！

> 我们的老同事兰热龙在哪儿！
> 我们的老同事别尼格松在哪儿！
> 你也已经不在了，
> 你就像根本没有存在过！②

阿列克谢依·列昂季叶维奇·洛威茨基是一个高个子，相貌很粗，步履沉重，大嘴大脸，脸上毫无表情。他在走廊上脱去他那件豆绿色大衣（上面装饰着各种大小的领子，就像在第一执政时期③ 人们穿的那样），他还没有走进教室，

---

① 阿·列·洛威茨基（1787—1840）：医生、自然科学家，一八三四年起任莫斯科大学教授。

② 这四行诗是从俄国诗人瓦·安·茹科夫斯基（1783—1852）的《波罗丁诺周年纪念》中引来的。

③ 第一执政时期：指一七九九年拿破仑·波拿巴发动雾月十八日（即公历十一月九日）政变后担任法国第一执政的时期。

就用平板的、毫无感情的声音(这种声音与他的矿石对象非常符合)说起来:"我们上次讲课中讲过了有关硅石的一切必需的知识,"然后坐下来继续往下说:"关于矾土……"他创造了一种记录每一矿石性质的固定不变的表,他从来没有超出这种表的范围;他有时还会从反面来鉴定某些矿物的特征:

"晶化——不结晶,

"使用——无处可用。

"用处——会给有机体带来损害。"

然而他并不避开诗,也不避开道德的评价,他每一次拿给我们看人造宝石,并且讲述它们是怎样制造出来的,接着他总要加上一句:"诸位,这是欺骗。"讲到农业,他认为一只好的公鸡倘使"爱叫,爱追母鸡",它就有道德的品质;他又认为一头良种的公绵羊倘使"膝盖秃了",它就品德很高。他还对我们讲动人的故事,让苍蝇描述它们怎样在一个晴朗的夏天在树上散步,身上粘满了树脂,这些树脂就变成了琥珀,他每次都要补充一句:"诸位,这是拟人法。"

系主任① 叫我出来的时候,听众已经有点疲倦了;两次数学课叫那些听讲的人感到沮丧和抑郁,他们一句也听不懂。乌瓦罗夫要求讲得生动些,要找一个"擅长讲话的"学生。谢普金就指着我。

我登上讲台。洛威茨基坐在旁边动也不动一下,两只手

① 指巴·司·谢普金(1793—1836):莫斯科大学数学教授和数理系主任。

放在膝上，就像一尊门浪或者奥西利斯[1]，露出担心的样子。我对他小声说：

"我有幸在您主持下讲课，我不会给您丢脸。"

"上战场的时候不要吹牛。"[2] 这位可敬的教授直截了当地说，几乎不动一下嘴唇，也不看我。

我差一点笑出声来了；可是我朝面前一看，我眼花缭乱起来，我觉得脸发白，嘴发干。我从来没有在大庭广众之间讲过话，教室里坐满了同学——他们指望着我；讲台下桌子后面坐的都是"大人物"和我们系的全体教授。我抓了问题，[3] 用不自然的声音念道："晶化，它的条件、法则，形式。"

我正在想怎样开头的时候，我有了一个幸运的想法：倘使我讲错了，教授们可能会注意到，不过他们不会讲一句话，别的人一点也不懂，至于同学们，只要我不是中途讲不下去，他们就会满意，因为我的人缘很好。就这样我根据阿于、威尔纳尔和米彻尔里赫[4]，讲完了这一课，最后用哲学的评论结束，我自始至终是对同学们讲话，而不是向大臣讲话。同学们和教授们都同我握手，表示感谢。乌瓦罗夫把我引去介绍给戈

---

① 门浪：希腊人经常把在底比斯的国王阿美诺菲斯三世的塑像称为"门浪"，传说每天日光最初照到像上，像就会发出琴弦断折声。奥西利斯：古埃及的主神，女神艾西斯的丈夫。

② 这是旧俄的谚语。

③ 指抽签。

④ 列·芮·阿于(1743—1822)：法国矿物学家。阿·哥·威尔纳尔(1750—1817)：德国地质学家。艾·米彻尔里赫(1794—1863)：德国化学家。作者的意思是他在讲课里利用了这几个人的著作。

里曾公爵，公爵讲了几句话，可是我只听到元音字母的声音，意思一点也不懂。乌瓦罗夫说要送我一本书作为纪念，可是始终没有把书送来。

我第二次和第三次登台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一八三六年我在维亚特卡包括丘菲亚耶夫① 在内的全部上流社会跟前扮演"乌加尔"，而宪兵上校的妻子扮"玛尔法"。② 我们排练了一个多月，可是在序曲奏完后静寂无声中幕布带着一阵可怕的抖动拉了起来，那个时候我的心还跳得很厉害，我的手还在打颤；我和玛尔法在幕后等待开场。她替我十分担心，也许她还很害怕我破坏了整个演出，所以她给我喝了一大杯香槟酒，就是这样我仍然演得半死不活。

因为托了国民教育大臣和宪兵上校的福开了头，以后我在伦敦波兰人大会③ 上就没有紧张的现象，也没有爱面子的害羞了；这是我第三次的公开登台。在这次会上前部长赖德律-洛兰④接替了前大臣乌瓦罗夫的位置。

然而大学生生活的回忆是不是够多了呢？我害怕过多地

---

① 基·雅·丘菲亚耶夫(1775—1840年以后)：彼尔姆省长(一八二四年起)；特威尔省长(一八三一年起)；维亚特卡省长(一八三四至一八三七年)。

② 《玛尔法与乌加尔》或《奴才们的战争》：十九世纪初俄国剧作家和翻译家阿·阿·科尔沙科夫改编的法国独幕喜剧(狄布瓦原著)。

③ 波兰人大会：指作者参加的一八五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在伦敦举行的纪念波兰起义二十三周年大会。

④ 亚·奥·赖德律-洛兰(1807—1874)：法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一个领袖，一八四八年法国临时政府的一个成员，一八四九年流亡英国，一直住到一八七〇年初。

停留在那个时期，会成为一种衰老的表现；我只再谈一点关于一八三一年霍乱的详细情况。

霍乱(这个字眼现在在欧洲很熟，在俄国也极常见，因此有一位爱国诗人把霍乱称为尼古拉唯一的忠实盟友)当时在北方还是头一次听到。所有的人提起这个从伏尔加朝莫斯科移动的可怕的瘟疫就吓得发抖。夸大的传闻使人们的想象里充满了恐怖。疫症的传播是变化莫测的，它停了下来，跳过一些地方，看起来它好像绕过了莫斯科，忽然间可怕的消息"霍乱到了莫斯科!"传遍了全城。

早晨政治系的一个学生感到恶心，第二天他就死在大学医院里面。我们赶去看他的遗体。他很瘦，仿佛害过长期的病，眼睛陷了进去，脸变了形，他旁边躺着一个门警，是夜里得病的。

我们得到通知大学奉命关闭。这个命令是由工艺系教授杰尼索夫[1] 到我们系来宣读的；他显得很忧郁，也许很害怕。第二天傍晚他也死了。

我们各个科系的学生全部聚集在学校的大院子里；在这一群奉命在瘟疫到来前散开的年轻人中间有着动人的景象。他们脸色苍白，特别激动；许多人在担心自己的亲友；我们向那些公费生告别(他们遵守隔离措施跟我们分开)，就三三两两地各自回家去了。我们在家里都碰到漂白粉的臭气、醋和规定的饮食，这种饮食，即使没有氯气(漂白粉)和霍乱，也会

---

① 费·阿·杰尼索夫：莫斯科大学工艺系教授。

叫人躺倒在床上起不来。

说来奇怪，这个惨痛的时期留在我的记忆里面就像是一种庄严的时期。

莫斯科的景象完全不同了。平时人们不知道的公众活动使莫斯科有了新的生命。街上轻便马车少了，忧伤的人群站在十字路口谈论放毒药的人；载病人的马车由警察护送，慢慢地走着；人们避开装载尸体的黑色柩车。报道瘟疫情况的公报一天刊印两次。全城戒严，就像在战时一样，兵士枪杀了一个偷偷过河的贫穷的教堂执事。这一切使人心浮动，对瘟疫的恐怖代替了对当权者的恐怖；老百姓在抱怨，而这时候消息接二连三地传来——某某人得了病，某某人死了……

菲拉列特总主教安排了一次共同的祈祷式。在同一天同一个时候，所有的教士都举着神幡巡视各人的教区。他们经过的时候，吓坏了的居民们都走出家门跪在地上，含着眼泪，祈求赦免他们的罪；连那些习惯于对上帝讲话不拘礼节的教士也变得严肃起来，深受感动。有一部分教士到了克里姆林宫；在那里总主教（他四周都是高级教士）跪在露天里祷告祈求这个灾难平安地过去。就在这同一个地方六年前他曾经为了绞杀十二月党人作过感谢的祷告。

菲拉列特是一个反政府派的主教；他为了什么反对政府，我始终不明白。也许是为了他个人。他有学问，又聪明，精通俄文，他成功地把教会斯拉夫文介绍到俄文里面来；不过这一切都不会是他成为反对派的理由。老百姓不喜欢他，叫他做

共济会[①] 会员，因为他同亚·尼·戈里曾公爵很接近，而且在圣经会[②] 全盛时代在彼得堡传教。东正教事务总管理局不准用他的教义问答做教本。在他管辖下的教士们都非常害怕他的专制。也许正是由于互相竞争的缘故，他同尼古拉〔一世〕彼此憎恨着。

菲拉列特善于狡猾、巧妙地贬低世俗的权势；他的布道演说里有一种朦胧的基督教社会主义，就是拉戈尔德尔[③] 和其他有远见的天主教徒所传播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菲拉列特从他最高主教的布道讲台的高处，宣告人在法律上决不能成为另一个人的工具，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能是相互效劳，他是在一个有一半人口做奴隶的国家里讲这番话的。

他对麻雀山上押解犯羁押监牢中带脚镣的犯人说："民法判了你们的罪把你们赶走了，可是教会追上你们，要对你们再讲一句话，为你们再作一次祷告，祝福你们一路平安。"然后他又安慰他们说，他们，"判了罪的犯人同自己的过去断绝了关系，他们面临着新的生活，而这个时候在别的人中间（除了官员以外，大概就没有别的人在场）还有更大的罪犯，"他还举出同基督一起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强

① 共济会：十八世纪在欧洲各国产生的宗教神秘运动，号召人们在友爱的基础上团结互助，这个秘密组织的参加者大半是贵族或资产阶级。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在俄国许多共济会组织被官方查禁。

② 参看第八四页注②。

③ 让·巴·拉戈尔德尔（1802—1861）：法国天主教传教士，拥护一八四八年的共和国。

盗作例子。[①]

菲拉列特在因霍乱而举行的祈祷式上的讲道[②] 超过了所有他的布道演说；他把天使怎样让大卫挑选三种惩罚：战争、饥荒或者瘟疫的故事作为讲道的内容；大卫挑选了瘟疫。[③] 皇上来到莫斯科，非常生气，派宫内大臣沃尔康斯基[④]去把菲拉列特痛斥了一顿，并且威胁说要把他派去作格鲁吉亚总主教。菲拉列特恭顺地屈服了，他发了一篇新的讲话[⑤]给各个教会，说明不能把他上次布道演说的内容应用在极其笃信宗教的皇帝身上，他上次讲的大卫是指被罪过玷污了的我们自己。不用说，这样一来连起先不理解上次布道演说意义的那些人也懂了。

莫斯科总主教就是这样地扮演反对派的。

祈祷式和漂白粉一样，对瘟疫没有什么效用；疫病越来越

---

① 《新约全书》的《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中都有类似这样的记载："当时有两个强盗和他同钉十字架，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

② 指一八三〇年九月十八日菲拉列特在祈祷式上的讲话。

③ 这个故事是从《旧约全书》中引来的，见《历代志》。"耶和华吩咐大卫的先见迦得说：'你去告诉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我有三样灾，随你选择一样，我好降与你……'……大卫对迦得说：'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他有丰富的怜悯……'……于是耶和华降瘟疫与以色列人。……"（二十一章）大卫是古以色列王。

④ 彼·米·沃尔康斯基公爵（1776—1852）：俄国元帅，一八一四年任总参谋部负责人，一八二六年起任宫内大臣。

⑤ 新的讲话：没有见到有关新讲话的材料。可能指一八三〇年十月五日菲拉列特发表的布道演说，他讲到沙皇时这样说："他不是我们灾难的原因，决不像大卫是耶路撒冷和以色列的灾难的主要原因那样。"

扩大。

一八四九年瘟疫在巴黎最猖獗的时候，我一直在那里。疫病肆虐，非常可怕。六月的炎热又助长了它的蔓延，穷人像苍蝇一样地死亡；小市民逃出了巴黎，别的人就锁上大门关在家里。政府全力进行镇压革命者的战斗，并未想到对瘟疫采取积极的措施。募集起来的微小的捐款不能满足需要。贫穷的劳动人民得不到照顾，完全听从命运的摆布，医院里没有足够的病床，警察局没有足够的棺材，在那些住满了人家的房屋里面，尸体常常在内房里停留了两三天。

在莫斯科情况就不是这样。

当时的总督德·瓦·戈里曾公爵是一个软弱然而正直的人，有教养，受人尊敬，他设法引起莫斯科上流社会对瘟疫的关心，不过他是按照私人方式安排一切，这就是说，不用政府特殊的干预。成立了一个由知名人士，也就是由有钱的地主和商人组成的委员会。每一个委员负责莫斯科的一个区。在几天里二十所医院就开办起来了；它们并没要政府花一个钱，一切都是用捐款开支的。商人免费供应医院需要的一切用品，——被子、内衣和给初愈的病人穿的暖和衣服。年轻人志愿义务担任医院的管理员，为了保证这些捐赠物品的半数不会让职员们偷掉。

大学也没有落在后面。整个医科，en masse〔法语：全体〕学生和医生向霍乱委员会报到听候调遣；他们给分派到各个医院，在那里一直工作到瘟疫结束为止。这些优秀的青年在医院里待了三、四个月，担任主治医师、医生、助理护士、办事

员——这一切没有任何的报酬，而且是在传染瘟疫的恐怖给讲得那么夸张的时候。我还记得一个同学，小俄罗斯人，可能是菲茨赫拉乌罗夫[1]，霍乱刚刚开始，他请假回去处理重要的家事。在学期中间不容易请准假；可是他终于请准了；他正要动身的时候，大学生全到医院去了。小俄罗斯人把他的假条放在衣袋里跟同学们一起去医院。等到他离开医院，他的假条早已满期，他谈起他这次旅行，自己首先哈哈大笑起来。

莫斯科表面上是死气沉沉、萎靡不振，平日热中于造谣生事、拜神朝圣、举行婚礼、无所事事，然而每逢需要的时候，它就醒过来，并且能够适应俄罗斯天空爆发响雷的情况。

在一六一二年它（莫斯科）同俄罗斯举行了血腥的婚礼，[2] 它们的结合又让一八一二年的大火[3] 焊接起来。

它（莫斯科）在彼得[4] 面前低头，因为俄罗斯的未来给捏在他的凶残的手掌里。然而它带着小声怨言和轻视接纳了那个双手染满自己丈夫鲜血的女人[5]，那个不知改悔的麦克佩

---

① 斯·彼·菲茨赫拉乌罗夫：一八二七年进莫斯科大学医科念书，一八三一年毕业后，留校一年继续学习兽医。旧时帝俄政府轻视乌克兰，把它定名为小俄罗斯，俄罗斯人称乌克兰人为小俄罗斯人。

② 一六一一至一六一二年科兹马·米宁·苏霍鲁克（死于一六一六年）率领俄国国民军从波兰武装干涉者手中解放了莫斯科，以后全国各地派代表到莫斯科来选举皇帝，产生了罗曼诺夫王朝。

③ 一八一二年的大火：指抵抗拿破仑侵略的卫国战争。

④ 彼得：指沙皇彼得一世，他把帝俄的首都从莫斯科迁到彼得堡去。

⑤ 指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她的丈夫彼得三世被禁卫军发动的政变推翻后，她作了女皇（一七六二至一七九六），在她的纵容下彼得三世被她的拥护者杀害。

斯夫人[1]，那个不是意大利血统的露克列吉雅·包尔齐亚[2]，那个德国出生的俄国女皇[3]，——她皱着眉、噘着嘴、悄悄地离开了莫斯科。

拿破仑皱着眉、噘着嘴，在德拉果米洛夫门等待莫斯科的钥匙，他不耐烦地玩他的烟嘴，拉他的手套，他不习惯于没有人迎接、单独进入外国城市。

可是我的莫斯科不出来，[4]

正如普希金所说，——它纵火自焚了。

霍乱来了，这个人民的城市又显得热情洋溢、精力充沛了。

一八三〇年八月我们去瓦西里叶夫斯柯耶，像往常那样，我们中途在彼尔胡希柯沃的拉德克里弗式的古堡[5]停下来吃了饭，喂了马，准备继续往前走。巴卡依拿一条毛巾当带子束在腰间，他已经叫了一声："走！"突然有人骑着马跑来，做个

---

① 麦克佩斯夫人：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著名悲剧《麦克佩斯》中的女主角，她是野心很大的女人，她的丈夫是苏格兰军中大将，她鼓动丈夫暗杀了国王，夺取了王位。

② 露克列吉雅·包尔齐亚(1480—1519)：费拉拉公爵夫人，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女儿，因政治目的结婚三次，以玩弄政治阴谋和不道德的行为出名。

③ 叶卡捷琳娜二世是德国的公主。

④ 这句诗引自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第七章第三十七节，但不是抄录原句。

⑤ 拉德克里弗式的古堡：英国小说家拉德克里弗夫人(1764—1823)写了好些关于所谓凶宅的神秘恐怖的小说，当时很流行。

手势要我们停下。枢密官的一个马车夫[1]一身尘土，满头大汗，从马上跳下来，交给我父亲一个封套。这个封套里有七月革命的消息！——他随信附来两张 *Journal des Débats*〔法语：《辩论报》[2]〕，我反复读了一百次，完全背得出来，我第一次在乡下感觉到寂寞无聊了。

这是大好的时候，事件发生得很快。查理十世瘦削的身形刚刚在哈利路德的浓雾后面隐去，[3] 比利时又燃烧起来，[4] 国王-公民[5] 的宝座摇晃了，热烈的革命精神开始在辩论中、在文学中出现。小说、剧本、诗歌——这一切又变成宣传和战斗了。

当时我们完全不知道法国革命演出的装饰性的、观赏的一面，我们把一切都当成真实的东西。

要是有人想知道七月变革的消息对年轻一代发生了多大的影响，应当读一读海涅叙述他在赫耳果兰听到"伟大的异教徒的潘死了"的情况。这里并没有虚假的热情：三十岁的海涅还是那么狂热，还是那么孩子气的兴奋，就和十八岁的我们一

---

① 马车夫：这里指的是四匹马拉车时前排左马的驾驶人。

② 《辩论报》：一七八九年开始在巴黎出版的保守派的报纸。

③ 查理十世(1757—1836)：一八二四至一八三〇年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和路易十八的兄弟。七月革命后他逃到英国，住在爱丁堡的哈利路德宫。

④ 指一八三〇年比利时的革命。

⑤ 国王-公民：指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力浦(1773—1850)，一八三〇至一八四八年的法国国王，七月革命后上台。他喜欢标榜为"国王-公民"。

样。[1]

我们一步一步地注视着每一句话，每一个事件，注视着大胆的问题和果断的回答，注视着拉法夷脱将军[2] 和拉马克将军[3]；我们不仅知道有关他们的细节，我们还热爱所有当时的

① 海涅在赫耳果兰岛上听到法国七月革命的消息，十分兴奋。作者在这里提到的是海涅的著作《路德维希·别尔纳》(第二卷)，海涅在书中对七月革命表示热烈欢迎。他说这些“温暖、灼热的新闻”是“包在报纸里的阳光”，“它们在我的灵魂中燃起了大火”。但是他后来到了巴黎就明白波旁王朝的查理十世虽然垮台，资产阶级却夺取了人民革命的果实，法国的实际的主人是银行家和交易所经纪人。

潘是希腊神话中的牧羊神，过去有个传说：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一个叫声传遍海上：“伟大的潘死了。”后来英国诗人伊·勃朗宁夫人(1806—1861)根据这个传说写过一首诗(一八四四)。海涅当时是把潘当作被推翻的旧世界的象征的，他在八月六日写的那一节的最后一句就是“潘死了！”在七月十八日的一节中他叙述了关于潘的另一个传说：“你知道普卢塔克讲的那个故事吗？那个在船夫中间流传的故事非常出色。它是这样的：在提伯利乌斯统治的时期，有一天傍晚一只船驶近了爱托里海岸外的帕腊岛。船上的人还没有睡。多数人刚吃过饭，坐着在喝酒。突然间从岸上传来一个响亮的声音，叫着撒姆斯这个名字(就是舵工的名字)，声音那么响亮，众人都给惊动了。撒姆斯听到头两声的时候，他一声不响，到第三声，他应了；于是声音更加响亮地对他讲了这样的话：‘你到帕洛德斯峰的时候，就通知说：伟大的潘死了！’船到了那里，撒姆斯就履行他的诺言，在船尾向陆地高呼：‘伟大的潘死了！’在这叫声之后，岸上响起了异常的悲叹声调，一种交织着呻吟和惊呼的声音，仿佛许多人异口同声地叫起来似的。眼见的人在罗马向别人讲这件事，引起人们极大的惊奇。提伯利乌斯叫人进一步调查这件事，他对它的真实性一点也不怀疑。”

② 拉法夷脱将军：即玛·约·波·拉法夷脱侯爵(1754—1834)，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七月革命时期他站在自由主义的君主制的立场上。

③ 拉马克将军：即玛·拉马克侯爵(1770—1832)，法国军事、政治活动家，国会议员，他指摘路易-菲力浦的政策。

活动家(不用说,是指急进派的),并且还保存了他们的肖像,从曼纽艾尔[①]和本查曼·贡斯当[②]到杜邦·德·雷厄尔[③]和阿尔芒·卡列尔[④],他们的像都有。

正在这种人心激动的时候,忽然像一颗炸弹在近旁爆炸一样,华沙起义的消息震得我们耳朵发聋。这是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这是在我们家里,我们眼含泪水互相望着,反复地吟诵我们心爱的诗句:

"Nein! Es sind keine leere Träume! 〔德语:不! 这不是幻梦一场!〕"[⑤]

季比奇[⑥]每一次打败仗都使我们高兴;我们不相信波兰人的战败,我立刻在我的圣像龛里添上了法德依·柯斯秋什科[⑦]的肖像。

正是在这个时候,我第二次见到了尼古拉,这一回他的面

---

① 让·安·曼纽艾尔(1775—1827):法国波旁王朝复辟的时期中自由主义反对派的代表人物。

② 本·贡斯当(1767—1830):法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和作家。

③ 让·查·杜·德·雷厄尔(1767—1855):法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一八三〇年任司法大臣。

④ 阿·卡列尔(1800—1836):法国政论家,《民族报》主编,反对查理十世。

⑤ 这句诗是从歌德的《希望》中引来的,不过原诗中的"不"字并不是"keine",而是"nicht"。

⑥ 伊·伊·季比奇伯爵(1785—1831):俄国元帅,一八三一年尼古拉一世派他去镇压波兰起义,任俄军总司令。

⑦ 法·柯斯秋什科(1746—1817):一七九四年波兰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

貌更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贵族们为他举行了一次跳舞会①,我在大厅上方的回廊上②,可以随意地饱看他。他当时还没有留胡子,他的面貌还年轻,可是加冕时候以来他的面容的改变使我吃惊。他板起脸站在一根圆柱旁边,他冷漠而严酷地望着他的前面,不看任何人。他瘦了。在这个面貌上,在这一对锡蜡一样的眼睛里,可以清楚地看出波兰的命运,以及俄国的命运来。他受到震动,吓坏了,他怀疑③他的宝座是不是稳固,他准备为他饱受的痛苦、为他的恐惧和疑虑向人们

---

① 这次舞会于一八三一年十月二十一日在莫斯科举行。

② 英译文作:在会议厅的旁听席中。

③ 杰尼斯·达威多夫〔一〕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告诉我们:"皇上有一天对阿·彼·叶尔莫洛夫〔二〕说:'在波兰战争期间,我有一个时期处在非常可怕的境地。我的妻子快要生产的时候,在诺夫哥罗德爆发了叛乱〔三〕,我身边只有两连禁卫重骑兵;军队里来的消息只有通过哥尼斯堡〔四〕传到我这里。我不得不把刚刚出军医院的士兵调来保护我。'"

这位游击队员的《回忆录》充分证明,尼古拉像阿拉克切叶夫那样,像所有冷酷残忍、怀恨在心的人那样,是一个胆小鬼。下面是切倩斯基将军〔五〕告诉达威多夫的话:"您知道,我能够赞赏〔一个人的〕勇气,因此您会相信我的话。十二月十四日那一天我在皇上身边,我一直注视着他。我愿对您说句真心话,皇上一直脸发白,吓得要命。"

现在再听一听达威多夫本人的话:"在谢纳亚地带叛乱的时候,皇上只是在第二天秩序恢复以后才来到首都。皇上在彼得高府〔六〕,他自己无意地说出来:'我整天同沃尔康斯基一块儿站在花园里一个土丘上,侧耳细听有没有彼得堡方面传来的炮声。'"达威多夫接着说:"他应当做的事不是在花园里焦急地听炮声和接连派遣信使到彼得堡去打听消息,而是亲自赶到那里去;凡是有一点勇气的人都应当这样做。第二天(一切都平靖了的时候),皇上坐马车到挤满广场的人丛中去,对人们大叫'跪下!'。人们连忙服从他的命令。皇上看见跟在他的马车后面的人中间有几个穿便服的人,以为他们是可疑分子,便下令把这些可怜的人抓住关起来,然后对群众嚷道:'这些都是卑鄙的波兰人,他们煽动了你们。'据我

报复。

征服波兰之后，这个人身上过去压抑住的一切怨毒都施展开来，不久我们就感觉到了这个。

从尼古拉即位开始就在大学周围布下的特务网拉得更紧了。一八三二年我们系里一个波兰学生失踪了。[④]他作为公费生给保送到大学来，没有根据他的志愿，就给安排在我们年级上课；我们同他交了朋友；他态度谦虚，神情忧郁，我们从来没有听见他说过一句粗暴的话，但也没有听见他说过一句刺

看，这种不合时宜的荒唐行为只有坏的效果。"这个尼古拉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家伙呢？——作者原注

〔一〕杰·瓦·达威多夫(1784—1839)：一八一二年卫国战争中的英雄，游击队的领袖。他写的《回忆录》，被检查机关查禁，不准在俄国国内刊行。

〔二〕阿·彼·叶尔莫洛夫(1772—1861)：俄国将军，一八一二年卫国战争中的英雄，一八一六至一八二七年任格鲁吉亚总督和高加索独立军团司令官。

〔三〕诺夫哥罗德：古俄罗斯城市之一，在彼得堡东南六十一公里，一八三〇年俄国瘟疫流行的时候，这里发生过"叛乱"。

〔四〕哥尼斯堡：当时是东普鲁士的首府，现在划归苏联，改名加里宁格勒。

〔五〕亚·尼·切倩斯基：一八一二年卫国战争的参加者，达威多夫进行游击战时的同僚。

〔六〕彼得高府：彼得宫的旧称。彼得宫是彼得一世修建的郊外离宫，离彼得堡将近三十公里。它的宫园建筑群和喷泉是很有名的。

④ 根据莫斯科大学的档案，这个波兰学生名叫加尔巴尔·斯捷潘诺维奇·沙尼亚夫斯基(生于一八〇八年左右)，一八二七年在明斯克省中学毕业后，作为公费生到莫斯科大学医科念书。一八三一年沙尼亚夫斯基被捕，然后流放到西伯利亚。这是在一八三一年发生的事，不是在一八三二年。

耳的话。有一天早晨他没有来听讲，第二天也不见他来。我们开始打听，一些公费生偷偷告诉我们在夜里把他带走了，先把他叫到办公室，然后有人来拿走他的文件和行李，吩咐他们不要对别人讲。事情就这样结束了，关于这个不幸的年轻人的命运，我们此后就再也没有听到什么了。[1]

过了几个月，有一天突然在教室里传开来：几个学生在夜里给抓走了，——是柯斯捷涅茨基、柯尔列依夫、安托诺维奇等人；[2] 我们熟悉他们，他们全是很出色的青年。柯尔列依夫，基督教新教牧师的儿子，是一个很有才能的音乐家。他们受到军事法庭委员会的审讯；这就是说他们注定要灭亡了。我们焦急地等待他们的消息，可是他们一开始就如石沉大海。一场摧毁刚刚冒出来的新苗的大风暴来了。我们不仅感觉到它的到来，我们还听到它，看到它，我们互相靠得越来越紧。

危险使我们受了刺激的神经更加紧张，使我们的心跳得更加厉害，使我们更加热烈地互相爱着。开头我们一共是五

---

① 克利茨基兄弟们在哪儿呢？他们做了什么事情？谁审判他们？他们判罪的罪名是什么？——作者原注

② 雅·伊·柯斯捷涅茨基，参看第一六六页注⑥。尤·巴·柯尔列依夫(1813—1844)：莫斯科大学学生，孙古罗夫小组的参加者，被送到奥连堡军团当兵，一八四二年回莫斯科。普·亚·安托诺维奇(1812—1883)：莫斯科大学学生，孙古罗夫小组的参加者，一八三三年被送到高加索当兵，后来提升为军官。柯尔列依夫和安托诺维奇是在一八三一年六月二十日被捕的；柯斯捷涅茨基当时不在学校，他被捕的时间还要晚一些。

关于克莉茨基三兄弟的事情，参看第一六六页注⑦。

个人，[①]现在我们又遇到了瓦津·巴谢克[②]。

在瓦津的身上有许多对我们说来是新的东西。我们中间只有微小的差异，我们大家都有同样的成长过程，这就是说，我们除了莫斯科和乡村以外什么都不知道，我们念同样的书，听同样的教师讲课，过去都是在家里或者大学预备寄宿学校里受的教育。瓦津生在西伯利亚，是他父亲流放在那里的时候，在贫困中出生的。他父亲亲自教他念书。他是在一个兄弟姊妹很多的大家庭里、在贫苦难堪的环境中，但是在充分自由的气氛中长大的。西伯利亚在他的身上打下了它的印记，这和我们外省的完全不同；他并不粗俗、浅薄，却显得十分强健、坚毅。瓦津同我们相比就像是野生的树苗。他的勇敢是另外的一种，和我们的不同，那是古代勇士[③] 的勇敢，有时候还带了一点骄傲。这种对苦难的贵族派头[④] 在他身上发展成了一种特殊的自尊心；可是他也很会爱别人，也会毫不吝惜地把自己的心交给别人。他胆大，甚至过分粗心大意，——一个生在西伯利亚、又生在流放人家庭里的人在不害怕西伯利亚这一点上比我们强得多。

瓦津由于家庭的传统极端憎恨专制制度，我们同他刚刚

---

① 五个人：作者、尼·奥加略夫、尼·伊·沙左诺夫、尼·米·沙青和阿·尼·沙维奇。

② 瓦津·巴谢克(1808—1842)：俄国历史学家和人种志学者。

③ 古代勇士：原文是“包加狄尔”(богатырь)，俄罗斯民间传说和英雄史诗中的武士，身材非常高大，力气大，胆量也大。

④ 贵族派头：大概是说，他经受的苦难太多，以此自豪，甚至于轻视别人。

见面，他就真诚地对待我们。[1] 我们很快就成了朋友。不过说真话，在那个时候我们的这个圈子里并不讲什么礼节，也没有适当的小心谨慎这一类的东西。

“你想认识你常常听见人谈起的克〔彻尔〕[2] 吗？”瓦津对我说。

“当然想。”

“你明天来，晚上七点钟，不要迟到，——他会在我家里。”

我去了——瓦津不在家。一个高身材的男人在等候他，这个人有一张善于表情的脸，眼镜下面射出好心而威严的眼光。我拿起一本书，他也拿起一本书。

“那么您是，”他打开书的时候说，“您是赫尔岑吧？”

“是的，那么您是克〔彻尔〕吗？”

我们就交谈起来，——越谈越起劲……

“对不起，”克〔彻尔〕粗鲁地打断了我的话，“对不起，请用‘你’称呼我。”

“我们就用‘你’互相称呼吧。”

从这一分钟起（可能是在一八三一年年终），我们就成了分不开的朋友；从这一分钟起，在我们成长的各个时期中，在

---

① 瓦津的父亲瓦·瓦·巴谢克在当时是一个有进步思想的人，一七九四年被捕时，在他家里发现亚·尼·拉季谢夫（1749—1802）的反对农奴制度的著作《从彼得堡到莫斯科的旅行记》的抄本和他在拉季谢夫的影响下写的爱好自由、反对君主专制的诗。

② 尼·克·克彻尔（1806—1886）：医生和诗的翻译家。

我们生活里的一切事故中都听得见克〔彻尔〕的嬉笑怒骂。

我们同瓦津的见面给我们的查波罗什营地[①]带来了新的成份。

我们还是像先前那样经常在奥加略夫家里聚会。他的生病的父亲已经住到奔萨的田庄上去了。奥加略夫一个人住在尼基茨基门他们宅子的最下一层。他的住所离大学不远，大家都很高兴到他那里去。奥加略夫有一种磁铁的吸力，对于任何杂乱地聚合在一起的原子团，只要这些原子彼此之间有亲和力，它就会构成它们结晶化的第一个羽状花纹。这种人给扔到了随便什么地方，他们都会不知不觉地成为有机体的心脏。

然而除了奥加略夫的明亮、欢乐而且糊着金黄条纹的红色糊墙纸的屋子(在这里雪茄的烟雾和糖酒等等的气味始终不断……我本来想说——好吃的东西和饮料的气味，可是我打住了，因为除了干酪外，难得有别的食品)，总之，除了奥加略夫的学生味极重的住处(我们常常在那里辩论通宵，有时整夜狂饮)，还有一个家庭越来越成为我们心爱的地方，在那里我们差不多第一次懂得尊重家庭生活。

瓦津常常在我们谈话的中间回家去，他要是好久不见他的母亲和姐妹，就会想念她们。我们整个身心都放在同志爱

① 查波罗什营地：十六——十八世纪在乌克兰的哥萨克人的自治组织，由武装移民组成，他们大部分是受不了封建压迫而逃亡到查波罗什的农奴。他们对敌人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作者借用它来指他们的小组。

上面，因此觉得奇怪：他怎么会把他的家庭看得比我们这个大家庭更重。

他把我们介绍给他的家庭。在这个家里一切都带着沙皇迫害的痕迹；这一家人昨天才从西伯利亚来，他们给毁了，他们受尽了折磨，然而同时他们的举止又充满了苦难所留下来的尊严（这种尊严并不是每个遭受苦难的人都有的，只有那些懂得怎样对待苦难的人才有）。

他们的父亲在保罗〔一世〕统治的时期由于某种政治上的陷害，给抓了起来，关在席吕谢尔堡里面，随后又给流放到西伯利亚。亚历山大〔一世〕把几千名被他那个疯狂的父亲流放到西伯利亚去的人叫了回来，可是巴谢克给忘掉了。他是那个参加了谋杀彼得三世的事件、后来又到波兰省份做总督的巴谢克[①] 的侄儿，他本来有资格要求已经落到别人手里的遗产一部分的继承权，正是这些“别人的手”[②] 使他一直待在西伯利亚。

巴谢克关在席吕谢尔堡里的时候，他同当时驻扎在那里的一个军官的女儿结了婚。那个年轻姑娘知道将来生活一定艰苦，可是她并不害怕流放。他们起初在西伯利亚卖掉他们身边仅有的东西，还可以勉勉强强地过下去，可是随着他们家庭的人口增多，他们也就穷得越厉害了。他们贫困，劳累，穿

---

① 这里指瓦·瓦·巴谢克的叔父和监护人彼·包·巴谢克(1736—1804)，俄国的大臣。

② “别人的手”：这里指彼·包·巴谢克把瓦·瓦·巴谢克应当继承的遗产据为己有。

不暖，有时还吃不饱，但是终于熬过去了，而且把整整一家的小狮子养大了：父亲把他那桀骜不驯的、骄傲的精神和自信心，忍受巨大苦难的秘诀传给了他们；他拿自己作榜样教育他们，母亲拿她的自我牺牲和伤心的眼泪教育他们。在英勇刚强这方面，姐妹们并不比兄弟们差。为什么害怕用这样的话呢？——这是一个英雄的家庭。至于他们怎样互相支持，忍受一切，他们为家庭做了些什么事情，讲出来叫人不能相信，而且他们始终是昂着头，从不灰心丧气。

在西伯利亚三姐妹只有一双鞋子；她们留着出门穿，不让外人看到她们的窘迫情况。

一八二六年年初巴谢克得到了迁回俄罗斯本土的许可。[①] 这是在冬天，带着这样一大家人，没有皮大衣，没有钱，从托包尔斯克省动身赶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在另一方面大家心里都急坏了——流放已到结束的时候就更难以忍受了。我们这几位受难者慢慢地挣扎着回去了；有一个乡下女人，她在那位母亲生病的时候，给一个孩子喂过奶，她把自己辛辛苦苦攒起来的一点钱拿出来给他们路上花用，只要求他们把她带去；驿站的马车夫们让他们坐车到俄罗斯本土的边境，只要很少的车钱或者完全免费；一部分家里的人步行，另一些人坐车，年轻人轮流走路，他们就这样完成了从乌拉尔山到莫斯科的冬季长途旅行。莫斯科是年轻人的梦想，是他们

① 瓦西里·巴谢克在一八二四年年尾得到迁回俄罗斯本土的许可。巴谢克一家人一八二五年到达俄罗斯中部。

的希望,——然而饥饿在那里等着他们。

政府在赦免巴谢克的时候,并没有想到发还一部分田产给他。这位老人让劳累和贫困弄坏了身体,病倒了;他们不知道明天能吃到什么。

这个时候尼古拉正在庆祝他的加冕典礼,[1] 宴会一次接一次,莫斯科好像一个装饰得很华丽的跳舞厅,到处是灯光、彩色的灯牌、漂亮衣服……两个姐姐[2] 没有同任何人商量,就写了一份呈给尼古拉的申请书,叙述了家庭的情况,要求皇上复审这个案件,发还他们家的田产。她们一清早悄悄地离开家,走到克里姆林宫,挤到人群的前面,等候"加了冕的、被捧上了天的"沙皇。尼古拉走下红色台阶的时候,两个姑娘静静地走上前去,递上呈文。他装作没有看见她们,就走过去了;一个侍从武官接过了呈文,警察把她们带到警察所去了。

尼古拉当时不过三十光景,他就能这样冷酷无情。这种冷漠,这种沉着是普通人、小官吏、出纳员和庶务官[3] 的特性。我常常在邮局办事员、戏园的售票员和铁路上的售票员的身上,在那些经常受到人们打扰、时时刻刻都有人来麻烦的人的身上,看到这种不屈不挠的坚定性。他们学会了对人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本领。这种专制主义的办事员怎样也学

---

[1] 尼古拉一世的加冕典礼,于一八二六年八月二十二日在莫斯科举行。

[2] 指奥尔加·瓦西里也芙娜·巴谢克和齐娜依达·瓦西里也芙娜·巴谢克。

[3] 庶务官:帝俄时期掌管机关总务的官员。

会了视而不见呢？他们又有什么必要上班不迟到一分钟呢？

姑娘们在警察所给扣押到晚上。她们受了惊，又受了很大委屈，含着眼泪说服了所长放她们回家，因为她们要是不回去，全家都会急坏了。申请毫无效果。

父亲再也经受不住了，他受够了，他死了。留下子女和母亲一起一天一天地拖下去。生活越困难，儿子们越是勤奋地工作；三弟兄[①] 都是成绩优异地念完了大学课程，得到了学位。两个哥哥[②] 到彼得堡去了；两个人都是优秀的数学家，工作时间以外(一个在海军服务，另一个当工程师[③])，他们还教课，他们省吃节用，把收入的钱寄给家里。

我记得很清楚老母亲[④] 穿着深色的家常便服，戴着白色包发帽；她那瘦削的苍白色脸上布满了皱纹，她看起来比她的实际年龄老得多，只有一对眼睛显得年轻些，那里面还看得出很多的温柔、爱、操心，很多的过去的眼泪。她十分钟爱自己

---

① 三弟兄：指季奥米德·瓦西里也维奇·巴谢克、瓦津·瓦西里也维奇·巴谢克和波姆彼依·瓦西里也维奇·巴谢克。季奥米德(1807—1845)，一八二九年在莫斯科大学毕业，一八三二年作交通工程师，几年后进军事学院，一八四一年到高加索军队中服务，是高加索军团的少将，一八四五年攻占沙米尔(高加索山民宗教民族主义运动的组织者)的总部所在地达尔果时战死。波姆彼依生于一八一七年，是最小的弟弟，一八三九年在莫斯科大学毕业，获得数学系的学位。

② 两个哥哥：指大哥叶甫盖尼·瓦西里也维奇·巴谢克(1804—1842，彼得堡大学法学系毕业，在内务部工作)和二哥列奥尼德·瓦西里也维奇·巴谢克(莫斯科的军官)。他们是瓦西里·瓦西里也维奇·巴谢克的前妻生的。

③ 列奥尼德在海军服务；季奥米德当时是交通工程师。

④ 老母亲：指叶卡捷琳娜·伊凡诺夫娜·维列费尔德(巴谢克)，瓦·瓦·巴谢克的第二个妻子，瓦津的母亲。

的孩子们；她觉得由于他们她也变得富裕、有名、而且年轻了……她对我们反复地念他们的来信，她带着极其神圣、深厚的感情，用她那衰弱的声音谈起他们，她的声音有时候由于她忍住眼泪而打哆嗦，或者甚至嘶哑了。

当他们在莫斯科全家团聚、坐在一起吃一顿简单的午饭的时候，老太太欢喜得忘了自己，她围着桌子打转，忙碌地张罗；她忽然停下来，望着她那些年轻人，她带着那样的骄傲，那样的幸福望他们，然后抬起眼睛看我，好像在问："他们多好呀，不是这样吗？"——在这些时刻我真想扑过去搂住她的脖子，亲她的手！而且甚至在外貌上，他们也的确都长得很漂亮。

她当时是幸福的。……为什么她不在这样一次吃午饭的时候死去呢？

两年中间她失去了她的三个大的儿子。一个在胜利和荣誉中间光荣地死去，连敌人也钦佩他，不过他并不是为了自己的事业牺牲的。他是在达尔果被契尔克斯人杀死的年轻将军[①]。荣誉医治不了母亲的心。……另外两个连这样的结局也没有；俄罗斯的艰苦生活沉重地压在他们的身上，一直到压毁了他们。

可怜的母亲，可怜的俄罗斯！

瓦津死于一八四三年二月。[②] 我陪伴他到最后，而且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看见一个亲近的人的死亡，同时还看见了死

---

① 年轻将军：即季奥米德·瓦西里也维奇·巴谢克，参看第二二二页注①。

② 瓦津实际死于一八四二年十月。

亡的全部最折磨人的恐怖，它的全部毫无意义的偶然性，它的全部盲目的、不道德的不公平。

瓦津去世前十年同我的表姐[1]结了婚，我在婚礼中充当傧相。家庭的生活和生活习惯的改变使我们有些疏远了。他在自己的 à parte〔法语：在这里解释作“私人生活中”〕很幸福，可是他在对外生活方面却不顺心，他的工作也没有进展。我们被捕以前不多久，他到哈尔科夫去了，有人答应给他安排在那里的大学里教书。他去那里虽然使他免掉被捕入狱，可是他的名字并没有逃过警察的注意。教书的职位取消了。副督学[2]对他承认他们收到一份不许他教课的公文，说是政府已经掌握了他同预谋犯罪分子有联系的材料。

瓦津失业了，就是说丢掉饭碗了——这是他的维亚特卡[3]。

我们被流放了。同我们联系是危险的事情。对他来说，艰难的贫苦岁月来了；他为着仅仅能糊口的生活艰苦奋斗了七年，他同那些粗暴、冷酷的人接触中受到了种种的侮辱，他远离了朋友，而且完全不能同他们通消息，这一切损害了他身体的建康。

“有一次我们把最后一个铜板也花掉了，”他的妻子后来告诉我说，“前一天我设法到别处去借十个卢布，可是毫无结

---

[1] 表姐：即塔·库钦娜，作者的外甥女。
[2] 副督学：即亚·尼·潘宁。
[3] 维亚特卡：作者流放的地方。

果；凡是可以借一点钱给我们的人家，我都去借过了。除非付现钱，小店也不肯卖给我们吃的东西；我们只想一件事——明天拿什么给孩子吃？瓦津坐在窗前闷闷不乐，后来他站起来，拿起他的帽子，说他想出去走走。我看见他心事重重，我很担心，不过我也高兴他出去散散心。他出去以后，我倒在床上很伤心地哭起来，随后我就想该怎么办：我们有的只要是稍微值点钱的东西，像戒指、汤匙之类，都早已进了当铺；我看只有一个办法：去找我们家里的人，要求他们那种冷淡的、令人难堪的帮助。这个时候瓦津毫无目的地在街上逛来逛去，就这样走到了彼得罗夫大街。他走过希利雅叶夫[①]的店门前，忽然想起进去问问他的书是不是连一本也没有卖掉；他五天前到过这里，可是什么也没有拿到；他怀着恐惧走进店里去。'看见您我很高兴，'希利雅叶夫对他说，'我们彼得堡的代理人来信说您的书他卖掉了三百卢布，您愿意把钱拿去吗？'希利雅叶夫数了十五个金卢布给他。瓦津高兴得发狂了，路上他看见头一个小饭馆就进去买吃的东西，还买了一瓶葡萄酒和水果，扬扬得意地坐了马车回家来。这时我正在拿锅里剩下的一点肉汤兑上水给孩子们吃，还打算留一点给他，并且要使他相信我已经吃过了，他突然像过去有时候那样高兴地、快乐地捧了纸包和酒瓶走进房来。"

她大声哭起来，再也讲不出一句话了……

我从流放地回来以后在彼得堡匆匆见过他一面，发现他

① 亚·谢·希利雅叶夫（死于一八四一年）：出版家和书商。

改变多了。他还坚持着自己的信仰，不过他像一个虽然感觉到自己受了致命的伤、却不肯放下手中利剑的战士那样，坚持他的信仰。他这时带着沉思的样子，显得精疲力竭，对前途也没有什么指望。我一八四二年在莫斯科见到他，他也还是这样；他的情况有了一点好转，他的著作受到了重视；可是这一切来得太迟了——这就像波列查叶夫的带穗肩章[①] 一样，这就像柯尔列依夫的赦免[②] 一样，并不是俄国沙皇的恩赐，而是俄国生活赐予的。

瓦津渐渐地衰弱下去，一八四二年秋天发现了肺结核，——这个可怕的病，我以后还得再看见一次。[③]

他临死前一个月我怀着恐怖注意到他的智力在逐渐消失、衰退，仿佛蜡烛逐渐燃尽，屋子里越来越昏暗似的。不久，他要讲几句不连贯的话也很吃力、很困难，只发出一些声音，后来他就索性不大讲话了，只是焦急地问起他的药，问是不是到了服药的时候。

二月里一天，夜间三点钟瓦津的妻子派人来找我去；病人很不好，他问起我；我走到他身边，轻轻地拿起他的手，他的妻子讲了我的名字；他看了我许久，显得疲倦，认不出我来，闭上了眼睛。孩子们给引进来了；他望着他们，但是我看他也认不出他们了。他的呻吟声更痛苦了，他稍微停了一下，又突然带

① 波列查叶夫在死前三星期才被提升为军官。

② 柯尔列依夫回来不久就死了。

③ 这里指作者的妻子一八五二年死于肺结核。

着叫声叹了一口长气；附近教堂里响起了钟声；瓦津倾听着，说："这是早礼拜。"以后他就再没有讲一句话。……妻子哭着跪在死者的床前；最近来照料他的一个亲切、和善的年轻人（大学时期的一位同学），忙忙慌慌地跑来跑去，挪开放药的桌子，拉起了窗帘。……我出去了，院子里很冷，很亮，初升的太阳光辉地照在积雪上，仿佛发生了什么好事情；我去定购棺木。

我回来的时候，小小的家里笼罩着一片死沉沉的静寂，按照俄罗斯的风俗，死者睡在客厅里一张桌子上，他的朋友画家拉布斯[①] 坐得稍微离开一些，含着眼泪，用铅笔给他画像；死者身旁站着一个高身材的女人，她默默地抄着两只手带着无限哀伤的表情；没有一个艺术家能够塑造出这样崇高和深刻的《悲痛》来。这个女人并不年轻，可是还保持着一种严肃、端庄的美的痕迹；她裹在一件灰鼠毛镶里的黑天鹅绒长斗篷里面，站在那里动也不动一下。

我在门口站住了。

在这样的静寂里，过了两、三分钟，她忽然俯下身子，热烈地吻死者的前额，说："永别了，永别了，瓦津朋友！"然后迈着坚定的脚步走进内屋去了。拉布斯一直在画像，他朝着我点个头，我们都不想讲话。我静静地坐在窗前。

这个女人是由于十二月十四日的事件遭到流放的扎哈

① 卡·伊·拉布斯(1800—1857)：画家、艺术院院士。

尔·切尔内谢夫伯爵的妹妹叶·切尔特科娃[①]。

西莫诺夫修道院的修士大司祭美尔希谢杰克[②] 主动地提出在院内送一块地埋葬他的遗体。美尔希谢杰克很早以前是一个普通的木匠和一个极端的分离派教徒，后来又皈依东正教，做了修士，又当了修道院院长，最后作了修士大司祭。不管这一切，他还是一个木匠，这就是说，他还没有失掉他的心，没有失掉他的宽肩膀，也没有失掉他的红色的健康的脸。他认识瓦津，也重视瓦津所写的莫斯科的历史的研究著述[③]。

死者的遗体到了修道院大门口，大门开了，美尔希谢杰克率领全体修士低声唱着悼歌出来迎接这个受难者的简陋的棺木，伴送它到墓地。离瓦津的墓不远埋着我们另一个亲爱朋友的骨灰——威涅维契诺夫的骨灰，墓石上刻着："他多么了解生活，他活得多么短！"[④] 瓦津也非常了解生活！

对命运说来，这还不够。说实在话，为什么老母亲活得那么久？她已经看见了流放的结束，已经看见了她的孩子们焕

---

① 扎·格·切尔内谢夫伯爵(1796—1862)：十二月党人，被捕时是骑兵大尉。叶·格·切尔特科娃(死于一八五八年)是他的妹妹，她是巴谢克家的亲密朋友。根据塔·库钦娜(巴谢克)的《远年回忆》，瓦津生活的最后两年中切尔特科娃对他们一家很友好。

② 西莫诺夫修道院是在十四世纪中建成的。美尔希谢杰克(1773—1853)当时是这个修道院的修士大司祭。

③ 指瓦津·巴谢克的著作《莫斯科帝国记述》(一八四一年《莫斯科省报》增刊七至十五号)和《彼得大帝时期莫斯科和莫斯科省的情况》(同上增刊二十八号)等。

④ 德·符·威涅维契诺夫(1805—1827)：年轻的诗人，他的墓石上刻的诗句是他的哀诗《诗人与友人》的最后一行。

发出青春的美丽，表现出辉煌的才能——她还要活下去做什么呢！爱惜幸福的人，就应当追求早死。长久的幸福是不存在的，就像世间没有不融化的冰一样。

瓦津的大哥在另一个哥哥季奥米德战死以后几个月也死了；[①]他受了凉，又耽误了治病，他的衰弱的身体支持不住了。他大概还不到四十岁，但他是老大。

三个朋友的三口棺材向后面投下了长长的黑影；我的青春的最后岁月是在服丧的黑纱和香炉的烟雾中度过的……

过了大约一年，被捕的大学同学的审判结束了。他们（像后来我们那样，和再后一些的彼得拉谢夫斯基派[②] 那样）被控企图组织秘密团体和进行犯罪谈话的罪行；为了这个罪名他们就被送到奥连堡省去当兵。尼古拉却把一个被告区别开来——那就是孙古罗夫[③]。他已经念完了大学课程，有了工作，结了婚，还有孩子；他给判处褫夺公权，流放到西伯利亚去。

---

① 大哥即叶甫盖尼，他死在一八四二年，而三哥季奥米德死于一八四五年，作者在这里把年代记错了，他在前面还写道："两年中间她失去了三个大的儿子。"

② 彼得拉谢夫斯基派：一八四五至一八四九年间彼得堡俄国知识分子集团的成员，这个集团是由米·瓦·彼得拉谢夫斯基（1821—1866）领导的，团体的成员后来就称为"彼得拉谢夫斯基派"。这个集团于一八四九年四月被破获，一部分成员（包括作家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内）被判决死刑，后来减为到西伯利亚作苦役，一部分成员被判处流放罪。

③ 尼·彼·孙古罗夫（生于一八〇五年）：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莫斯科一个秘密结社的领导人，一八三一年六月被捕，判处苦役劳动，死在西伯利亚。

“几个年轻的大学生能够做什么呢？他们只是白白地毁了自己！”这些话是很有道理的，有这种主张的人对于我们下一代的俄国年轻人的明智应该满意了。从在孙古罗夫案件之后发生的我们的案件到彼得拉谢夫斯基案件，这中间平静地过了十五年，俄罗斯刚刚开始从这十五年恢复过来，这十五年中间有两代人给毁掉了，老的一代毁在放荡上面，年轻的一代自小就中了毒，我们今天看见的就是这一代人的萎靡不振的代表人物。

在十二月党人之后一切企图组织团体的尝试确实都没有成功；力量的薄弱和目的的不明确给我们指出来另一种工作的必要性——准备的、内部的工作。正是这样。

但是年轻人怎么能够无动于衷地旁观着周围发生的事情，旁观着成百的波兰人戴着脚镣手铐走在往弗拉基米尔去的大路上，[①] 旁观着农奴制度，旁观着某一个拉什凯维奇将军在霍登广场上鞭打士兵，旁观着自己的同学突然失踪永无消息，而等待理论问题的解决呢，这又算是什么年轻人呢？为了这一代人道德的净化，作为对未来的保证，他们不能不极端愤怒，到了不择手段、不顾危险的地步。对于十六、七岁男孩的野蛮惩罚提供了一个可怕的教训，从某一点来看也是一个锻炼的过程；一只魔掌从毫无心肝的胸膛前伸出来，举在每个人的头上，它永远赶走了那种认为会对年轻人宽大的美梦。闹着自由主义玩是危险的事，谁也不敢想搞密谋了。谁要是

① 作者后来也给流放到弗拉基米尔。这条路是当时流放犯人必经之路。

没有能掩盖住自己为波兰流的一滴眼泪，谁要是说了一句大胆的话——那就会得到几年的流放罪，给送去当兵，有时候甚至关进要塞里的单人牢房；正因为如此，重要的倒是这类话还在说，这些眼泪还在流。有的时候年轻人牺牲了；然而他们的牺牲不仅没有阻碍思想活动（正在从事解答俄罗斯生活的斯芬克司[1] 谜语的思想活动），反而证明它的想望是正确的。

现在轮到我们了。我们的名字已经列入秘密警察的名单了。[2] 浅蓝色猫[3] 玩弄老鼠的最初的把戏是这样开始的。

那些判了罪的年轻人给押解到奥连堡去，他们步行，又没有足以御寒的衣服，这个时候奥加略夫就在我们的小组里，伊·基列叶夫斯基[4] 在他的小组里进行募捐。所有判了罪的人都没有钱。基列叶夫斯基把捐来的钱交给要塞司令斯塔阿尔[5]，一个心肠很好的老人，我以后还要谈到他。斯塔尔答应

---

① 斯芬克司：根据古希腊神话，斯芬克司是一个狮身女面、有双翼的怪物，它常常坐在路旁岩石上，拦住行人，要他们猜一个难解的谜，猜不中的人就会被它弄死。

② 奥加略夫和沙青由于同孙古罗夫集团的关系，从一八三〇年夏天起，就受到秘密警察的监视。一八三三年十二月警察当局还注意到奥加略夫和索科洛夫斯基在小剧院门口唱《马赛曲》。奥包连斯基从一八三二年起也受到监视。符·伊·索科洛夫斯基：参看第二四六页注③。

③ 浅蓝色猫：指秘密警察。

④ 伊·瓦·基列叶夫斯基（1806—1856）：俄国政论家、唯心主义哲学家。

⑤ 卡·古·斯塔阿尔（1777—1853）：一八三〇至一八三五年莫斯科要塞司令、枢密官，参加过抵抗拿破仑的卫国战争。

把钱转交给判了罪的人，他还问基列叶夫斯基：

"这几张单子是什么？"

"捐款人的名字，"基列叶夫斯基说，"和数目。"

"您相信我会把钱交给他们吗？"老人问道。

"这还用说。"

"我想，那些把钱交给您的人也是相信您的。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保留他们的名字呢？"斯塔阿尔这样说过以后就把名单扔进火里烧掉了，而且不用说，他做得非常好。

奥加略夫亲自把钱送到兵营，这件事倒平安地过去了。然而那些年轻人想从奥连堡写一封感谢同学们的信，刚巧有一个官员要去莫斯科，他们就利用这个机会请求他把信带去（将这封信交邮局寄递，他们不放心）。这个官员并没有放过可以充分证明自己对皇上一片忠心的难得机会，就把信交到莫斯科区宪兵队将军那里。

当时的宪兵队将军是列索夫斯基[①]，他是在前任亚·亚·沃尔科夫发了狂、幻想波兰人要选举自己做波兰国王的时候来接替这个职位的（一个宪兵队将军竟然为亚哥龙王朝[②]的宝座发了狂，这是多大的讽刺！）。列索夫斯基本人也是波兰人，他是个不凶、不坏的人；由于赌钱和为了某一个法国女演员，花光了他的财产，他明智地认为就任莫斯科宪兵队的将军

---

① 斯·伊·列索夫斯基（1782—1839）：一八三三至一八三四年莫斯科区宪兵队的首长。

② 亚哥龙王朝：一三八六至一五七二年波兰-立陶宛王国的王朝。

比在同一个城市里因欠债坐牢好些。

列索夫斯基把奥加略夫、克〔彻尔〕、沙〔青〕、瓦津、伊·奥包连斯基等人传了去,[1] 指责他们同国事犯有联系。奥加略夫说他没有给任何人写过信,要是别人给他写信来,他不能负责,而且他并没有收到谁的信,对这些话列索夫斯基回答说:

"你们为他们募捐,这更坏。因为是头一次,皇上对你们十分仁慈,饶恕了你们;只是,先生们,我警告你们,对你们要严加监视,你们以后要小心。"

列索夫斯基用含有深意的眼光轮流看了看每一个人,他的眼光停留在克〔彻尔〕的脸上(克〔彻尔〕比大家都高,年纪也稍微大一点,而且威严地扬着眉毛),他又加了一句:

"亲爱的先生,在您这种地位,您不感到羞耻吗?"

他大概把克〔彻尔〕误认为俄国纹章局的副局长[2] 了,其实克〔彻尔〕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县医。

我没有给传去,也许是信上没有我的名字。[3]

这个威胁就像是一次晋级,一次封爵,就像是一种强大的推动力。列索夫斯基的劝告在火上加了油,而且我们好像就

---

① 当时因为和柯斯捷涅茨基通信的"罪名"被传去的人是:亚·托波尔宁、伊·奥包连斯基、尼·奥加略夫、伊·柯尔列依夫、尼·斯坦凯维奇、雅·涅威罗夫、尼·沙青、尼·克彻尔和雅·波切克,他们的名字都是柯斯捷涅茨基的信上提到了的。

② 彼得一世设置的俄罗斯帝国的一种较高的官职。

③ 柯斯捷涅茨基的信上没有提到作者的名字(根据莫斯科省国家档案,一八三三年)。

是为了使警察将来更容易监视我们起见，特地戴上天鹅绒的卡尔·桑特[①] 式无檐软帽，脖子上系着一样的三色围巾[②]。

舒宾斯基上校[③] 静静地、轻轻地迈着轻柔的步子，爬上列索夫斯基的地位，紧紧抓住他对我们的“软弱”；他要用我们来做他升官的阶梯，——我们果然让他利用了。

然而首先我还要补充几句，谈谈孙古罗夫和他的同志们的命运。

尼古拉准许柯尔列依夫十年后从奥连堡回来（他那个团驻扎在那里）。尼古拉赦免他，因为他患了肺结核，波列查叶夫给提升为军官，也正因为他害肺结核，别斯土热夫获得十字章，因为他已死亡。[④] 柯尔列依夫回到莫斯科，死在他那个万分悲痛的年老父亲的怀里。

柯斯捷涅茨基在高加索当兵，有了成绩，给提升为军官。安托诺维奇也是这样。

不幸的孙古罗夫的命运可怕得多。到达麻雀山上头一个押送站以后，孙古罗夫便向负责押送的军官要求让他离开那

---

① 卡尔·桑特（1795—1820）：德国耶纳大学学生，德国反动剧作家奥·科采布讽刺当时的学生会运动，桑特认为科采布是俄国间谍，是人民的敌人，就把科采布刺杀了，第二年他被判处死刑。

② 三色即白、蓝、红，一七八九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后共和国国旗的颜色。

③ 尼·彼·舒宾斯基（1782—1837）：宪兵上校，莫斯科案件的主管人，后来又是赫尔岑、奥加略夫等人案件的两个侦讯委员会的成员。

④ 亚·亚·别斯土热夫（笔名“马尔林斯基”，1797—1837）：十二月党人、作家，一八二九年从雅库特流放地被派到高加索当兵，后来阵亡。他由于英勇作战获得乔治十字章的消息，自己生前并不知道。

间挤满了流放犯人的闷热的小屋，到外面透透空气。军官是个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就亲自同他一起到大路上去。孙古罗夫挑选了一个适当的时刻，在路上拐一个弯不见了。他大概很熟习这个地方，——他从军官那里逃掉了，然而第二天宪兵找到了他的踪迹。孙古罗夫看见自己无法脱逃，就割开喉咙自杀。宪兵们把他押送到莫斯科来，他失去了知觉，而且淌着血。

那个不幸的军官也给夺去军衔降为普通士兵了。

孙古罗夫并没有死。他再次受到审判，这次不是作为政治犯，而是作为逃犯受审，——半边头给剃光了。这是一种古怪的方法（大概是从鞑靼人那里传下来的），用来防止逃跑，这种方法甚至比体罚更能说明俄国法律对人的尊严的极端蔑视。在这种表面的耻辱之外，还加上在监狱里面鞭打一下的判决。这个判决究竟执行了没有，我不知道。这以后孙古罗夫就给押送到纳钦斯克[1]矿场去服苦役了。

他的名字我还听见人提到一次，以后它就完全消失了。

在维亚特卡，我有一次在街上遇见一个年轻医生，我们过去的大学同学，他到某地的工厂去。我们谈起过去的岁月，谈起共同的熟人。

“我的天啊，”医生说，“您知道我到这儿来的时候看见了谁吗？我坐在尼日尼-诺夫哥罗德省的驿站里等候马。天气非常坏。一个押解犯人的军官进来取暖。我们就谈起来；他

---

① 纳钦斯克：西伯利亚东南部外贝加尔城市，产金、银、铅、铁等矿石。

听说我是医生,就请我到押送站去,看看犯人中间的一个病人是装病,还是真正病得厉害。我去了,不用说,我打定了主意,不管情况如何,都肯定那个戴脚镣的犯人有病。在那个小小的押送站里有八十个戴脚镣的人,有剃了头的,也有未剃头的,有女人,还有小孩;军官一进来,他们就让出了一条路,我们看见龌龊的地板上一个角落里稻草上面躺着一个裹在流刑犯穿的长袍里面的人形。

"'这就是病人。'军官说。

"我用不着撒谎:这个不幸的人发着高烧;他给监牢生活和路上辛苦弄得精疲力竭、十分消瘦,半个头剃光了,胡子长得长,看起来很可怕,他毫无目的地向左右移动眼睛,不停地要水喝。

"'喂,老兄,不舒服吗?'我对病人说,然后又向军官补充一句:'他不可能再往前走了。'

"病人的眼睛注视着我,低声含糊地说:'是您吗?'他讲出了我的名字。'您不认得我了,'他又说了一句,他的声音像刀子一样刺到我的心上。

"'原谅我,'我对他说,一面拿起他那只干枯的、灼热的手,'我记不起来了。'

"'我是孙古罗夫。'他答道。"

"可怜的孙古罗夫!"医生摇着头重复了一遍。

"那么他们让他留下来了吗?"我问道。

"没有,不过他们弄了一辆大车给他。"

我写了以上的文章以后,才知道孙古罗夫在纳钦斯克死

了。他的田产共有两处，一处在莫斯科近郊布龙尼茨县，有二百五十个农奴，一处在尼日尼－诺夫哥罗德省阿尔扎马斯县，有四百农奴，都给没收，作为支付他本人和同案人在狱中候审时的费用了。他的家庭也给毁了；政府首先考虑的就是减少这个家庭的人口：孙古罗夫的妻子同两个孩子给抓了起来，在普列契斯千斯基警察分局里大约关了六个月，她的吃奶的婴儿就死在那里。让尼古拉的统治永世受到咒骂吧！ 亚门[①]！

① 亚门：耶稣教祈祷的结尾语，意思是“心愿如此”。

第 七 章

课程结束——席勒时期——青春的初期和艺术家的生活——圣西门主义和尼·波列沃依

雷电还没有在我们头上突然响起来的时候，我在大学的课程修完了。照例的忙一阵子、为了死记硬背通宵不睡、临时马马虎虎的学习、为了考试提心吊胆破坏了我对科学的兴趣，——始终是那一套。我写了一篇争取金质奖章的天文学的论文①，却得到了银质奖章。我相信我现在不会看懂我当时写的那篇论文，而且也不会懂它的价值有银子那样重。

我有时还做过这样的梦，梦见我还是大学生，去参加考试，我惊恐地想，我已经忘记了好多，一定会不及格——我一下子醒了过来，非常高兴海洋和护照、年岁和签证把我和大学隔开了，再也没有人来考我了，再也没有人敢于给我打最讨厌的一分了。说实话，教授们一定很惊奇，我在这几年内竟然退

① 论文的题目是《哥白尼太阳系的分析的叙述》（一八三三年，五月二十八日）。

步这么多。其实已经有一位向我这样表示过了。[①]

在毕业考试之后，教授们就关在屋子里计算分数，而我们怀着希望又怀着疑虑，心里不安，三五成群地在走廊上和穿堂里走来走去。有时候有人从校务会出来，我们连忙过去围着他打听我们的命运，可是我们的命运很久都还没有决定；最后盖依曼出来了。

"祝贺您，"他对我说，"您是学士了。"

"还有谁？还有谁？"

"某某人和某某人。"

我又难过又高兴；我走出大门的时候，我觉得我现在出去

---

① 一八四四年我在谢普金的家里遇见彼列沃希科夫〔一〕，吃饭的时候坐在他的旁边。快吃完的时候，他忍不住对我说：

"可惜，先生，很可惜，先生，情况妨碍您从事工作，先生，——您有非常的才能，先生。"

我对他说："您知道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跟着您爬上天去。我们在这儿、在地面上也忙着，做另一种工作。"

"别那么想，先生，那算是一种工作，先生，什么样的工作，先生，黑格尔哲学吧，先生。我读过您的文章，先生，我没法懂，先生；鸟的语言，先生。这算是什么工作，先生，不，先生。"

他的这个判决使我好久都觉得可笑，这就是说，我好久都不明白我们的语言当时会真是这样糟；如果它是一种鸟的语言，那么这种鸟一定是密纳尔伐宠爱的鸟〔二〕。——作者原注

〔一〕德·玛·彼列沃希科夫(1788—1880)：院士，天文学家，数学家，一八二六年起任莫斯科大学教授，一八四八至一八五一年任大学校长。作者听过他讲球面天文学的课。

〔二〕根据罗马神话，密纳尔伐是智慧、学问、战争的女神，她的塑像头上戴盔、身披甲、手拿盾牌。据说密纳尔伐经常带着一只猫头鹰(智慧的象征)，不是在盔上，就是在脚边。这里说她"宠爱的鸟"就是指猫头鹰。

已经不像昨天那样、不像过去每天那样了；我跟大学分开了，跟我这么年轻、这么美好地度过四年光阴的共同的老家分开了；可是另一方面我感觉到我现在是一个大家公认的成年人也很高兴，——为什么不承认这个呢？——而且我一下子得到了学士的称号。①

Alma mater!〔拉丁语：母校！〕我从大学得到了很多的益处，我修完大学课程以后好久还过着大学生的生活，而且也没有离开大学，所以我想到它就不能不爱它，不能不尊敬它。它至少不能责备我忘恩负义，在对待大学的关系上表示感激是容易的，这种感激是和爱、和青春时期的愉快回忆分不开的。……现在我从遥远的外国向它祝福！

---

① 从莫斯科给我寄来的文件中间我发现了一张我写给当时同公爵夫人〔一〕一起住在乡下的堂妹、通知她我毕业的字条。“考试结束了，我是个学士了！您想象不到经过四年学习之后那种甜蜜的自由感觉。您星期四想过我吗？这是一个叫人憋气的日子，我从早晨九点一直给折磨到晚上九点。”（一八三三年六月二十六日）〔二〕我想我大概是为了取得效果或者为了修辞起见多写了两个小时。然而不管这一切快乐，由于别的同学（亚历山大·德拉舒索夫〔三〕）获得金质奖章，我的虚荣心给伤害了。我在七月六日写的第二封信里说：“今天是发奖典礼的日子，可是我不在，我不想在接受奖章的时候当第二名。”〔四〕——作者原注

〔一〕指作者的姑母霍万斯卡雅公爵夫人。

〔二〕这是从作者一八三三年六月二十六日写给娜·亚·扎哈利娜的信中摘引来的。

〔三〕亚·尼·德拉舒索夫（1816—1890）：一八三一年进莫斯科大学念书，一八四〇至一八五五年任莫斯科大学教员，后来成为有名的天文学家。

〔四〕这段话是作者一八三三年七月五日或六日写给娜·亚·扎哈利娜的信上面的附笔，作者引用时作了小的改动。

我们毕业以后度过的那一年庄严地结束了青春的初期。这是连续不断的友谊、交换思想、鼓舞和狂欢的欢乐聚会……

一小群大学的朋友在毕业以后还不分散，继续生活在共同的同情和幻想里面，没有人想到自己物质的状况和未来的前途。成年人有这种情况我不会赞扬，可是我却重视年轻人中间的这种情况。当青春还没有被市侩习气所引起的道德堕落消耗尽的时候，它总是不切实际的，特别是在一个有很多打算却很少成就的年轻国家里是这样。而且不切实际远远不是说要讲假话，对于未来的一切想法都带有理想主义的成份。要是没有这种不切实际的性格，那么所有的实践家都会反复唱着枯燥乏味的老调了。

有的兴奋热情比一切道德教训更能防止真正的堕落。我还记得年轻人的狂饮，记得偶尔作得太过分的狂欢的时刻，可是我却记不起我们这个圈子里发生过什么不道德的事件，没有一件叫人认真感到脸红的事，没有一件人们想忘记、想掩盖的事。我们做过的一切事情都是公开地做的，——而坏事却很少是公开地做的。一半的心，而且一半以上的心都厌弃逸乐的情欲和病态的自私自利，——而这些就集中在龌龊的念头上面并且加强了恶习。

我认为一个民族的年轻一代人要是没有青春，那就是这个民族的大不幸；我们已经看到了，单是年轻还不够。德国大学生生活中最怪诞反常的时期也要比法英两国年轻人那种市侩气的成熟好一百倍。据我看来美国的老成的十五岁青年只有使人感到厌恶。

在法国曾经有过出色的贵族青年，然后是革命的青年。所有这些圣芮斯特[①] 和奥什[②]、玛尔索[③] 和德木南——这些由让·雅克[④] 的悒郁诗篇培养大的英雄的孩子们是真正的青年。革命是由年轻人干出来的；不论丹东[⑤]，不论罗伯斯庇尔[⑥]，甚至路易十六，都没有活过三十五岁[⑦]。在拿破仑时期年轻人当传令兵，到了复辟时期[⑧]，“老年复活时期”（青春是跟它完全不相容的），一切都变得老气横秋、精明干练，就是说变得市侩气了。

法国最后一批年轻人是圣西门主义者[⑨] 和法郎吉[⑩]。若

---

① 路·安·圣芮斯特（1767—1794）：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雅各宾派革命民主专政的领导人之一。在反革命的热月政变后同罗伯斯庇尔一起被处死刑。

② 拉·奥什（1768—1797）：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将军，镇压过汪德省王党的叛乱。

③ 弗·塞·玛尔索（1769—1796）：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将军，镇压过汪德省王党的叛乱。

④ 即让·雅克·卢骚（1712—1778），法国思想家、哲学家和作家，罗伯斯庇尔曾说自己是卢骚的学生，卢骚的著作对这一代人有很大的影响。

⑤ 乔·雅·丹东（1759—1794）：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和著名演说家，一七九四年被处死刑。

⑥ 玛·罗伯斯庇尔（1758—1794）：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雅各宾党的领袖，一七九三至一七九四年革命政府的负责人。

⑦ 路易十六被处死的时候有三十九岁（1754—1793）。

⑧ 指拿破仑一世失败后波旁王朝的路易十八（1814—1824）和查理十世（1824—1830）回到法国作国王的时期。

⑨ 圣西门主义者：信奉圣西门的学说的人。

⑩ 法朗吉：法国空想的社会主义者查·傅立叶（1772—1837）的理想社会中一千五百人至两千人的基本生产消费单位，这里指的是傅立叶的信徒。

干例外并不能改变法国青年平凡无味的性格。杰古[1] 和勒布拉[2] 用手枪自杀,因为他们是生活在这个老人社会里的年轻人。别的人就像出了水落在泥岸上的鱼一样拚命挣扎,一直到有的死在街垒的战斗中,另一些人掉进了耶稣会教士的圈套里面。

然而年轻人会维护自己的权利,因此大多数的法国青年都在所谓艺术家生活里消磨掉自己的青春,这就是说,没有钱的带着小歌女[3] 在 quartier Latin〔法语:拉丁区〕[4] 的小咖啡馆里面鬼混,有钱的就带着交际花在上等咖啡店里玩。这不是席勒时期,而是保尔·德·柯克[5] 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力量、精力以及一切年轻的东西都迅速地而且相当悲惨地消耗光了,——于是一个商号里的 commis〔法语:雇员〕的人就准备好了。艺术家生活的时期在他们的心灵深处只留下了一种欲望——要钱,为了这个欲望牺牲了整个未来的生活,再没有

---

① 杰古:这个人是维克多·艾斯古斯,作者误作杰古。艾斯古斯(1813—1832)是法国的诗人和剧作家,同他的朋友勒布拉一起自杀。

② 奥·勒布拉(1811—1832):法国诗人和剧作家。他同比他小两岁的朋友艾斯古斯合作写了一个剧本《法吕克·勒·莫尔》,得到了成功,可是第二个剧本《拉伊蒙特》就失败了,两个人一八三二年在一起自杀。法国诗人贝朗瑞写了一首诗《自杀——哀悼年轻的维克多·艾斯古斯和奥居斯特·勒布拉的死》,称他们为"可怜的孩子们"。

③ 法国的喜剧和小说中不庄重的年轻女人,大都是女裁缝、小歌女一类人物。

④ 拉丁区:巴黎的第五区,大学生区。

⑤ 保尔·德·柯克(1794—1871):法国小说家和剧作家,以表现资产阶级出名。

其他的兴趣了；这些讲究实际的人不关心普遍的问题，他们瞧不起女人（这是他们多次征服那些以被征服为职业的女人的结果）。艺术家生活的时期通常总是在这种人的指导下度过的：没落名人中某一个放纵过度而衰老的罪人，靠别人生活的d'un vieux prostitué〔法语：一个老男娼〕，一个嗓子坏了的演员，一个手打颤的画家；在吐字、发音方面，在喝酒方面，特别是在对人事的傲慢见解和对菜单的完备知识方面，他是摹仿的榜样。

在英国艺术家生活的时期是由动人的新奇和古怪的殷勤这样的冲动代替了，例如荒唐的把戏，没有道理的乱花钱，令人难堪的恶作剧，小心掩盖的严重淫乱，毫无益处的旅行——到卡拉布利亚[①] 或者基多[②]，往南方，往北方，路上骑马，带狗赛马，胡闹的宴会，然后是妻子和一大群又红又胖的 baby〔英语：娃娃〕；生意周转，*Times*〔英语：《太晤士报》〕[③]，国会，还有压得他们翻不了身的陈年葡萄酒。

我们也胡闹，我们也吃喝，然而基调完全不同，音域也非常宽阔。胡闹同狂饮从来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相信我们的使命；即使假定说我们错了，然而我们有实际的信仰，我们都是共同事业的工具，我们因此重视自己，也互相尊重。

---

① 卡拉布利亚：意大利西南部的一个省。

② 基多：拉丁美洲厄瓜多尔的首都，建筑在同名的高原上。

③ 《太晤士报》：英国保守派的日报，一七八五年在伦敦创刊。

我们的宴会和狂饮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呢？我们突然想起来再过两天就是十二月六日，圣尼可拉节。叫“尼可拉”的人实在多极了：尼可拉·奥加略夫、尼可拉·沙〔青〕、尼可拉·克〔彻尔〕、尼可拉·沙左诺夫……

“诸位，谁庆祝命名日？”

“我！”“我！”

“那么我第二天。”

“这全是废话，为什么第二天？我们搞一个共同的节日，大家出钱！那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宴会啊！”

“对，对！在谁那里举行呢？”

“沙〔青〕生病，当然在他那里。”

我们于是制定方案，做出预算，这叫未来的客人和主人忙得令人不能相信。一个尼可拉坐车到雅尔[1]去预订晚饭，另一个尼可拉去马捷尔纳[2]买干酪和萨拉米熏肠。葡萄酒不用说是在彼得罗夫卡的德普列店买的，在这个店的价目表上面奥加略夫写下这样的题词：

> “De près ou de loin
>
> Mais je fournis toujours.”
>
> 〔法语：不论远近

① 雅尔：当时莫斯科的一家大饭店。

② 马捷尔纳：当时莫斯科的一家熟食店。

我总是供应。〕[①]

我们的毫无经验的口味并不曾超过香槟酒的范围，而且幼稚得有时甚至认为 Rivesaltes mousseux〔法语：起泡沫的利威扎尔特葡萄酒〕[②] 比香槟好。在巴黎我有一次在饭店的酒单上看到这个名字，想起了一八三三年，我便要了一瓶。然而，唉！连回忆也不能帮忙我喝得比一杯更多。

在节日之前我们要尝一下酒，要是结果很满意，就得差人去多买一些。

我谈到这里，就不能不讲索科洛夫斯基[③] 的事情。他总是没有钱，而且要是得到钱就马上花光。他被捕前一年，来到莫斯科，住在沙〔青〕那里。我记得那个时候他把《赫威利》[④]这本稿子卖出去了，因此决定请客庆祝，不单是请我们，还要 pour les gros bonnets〔法语：请大人物〕，就是说请波列沃依、玛克西莫维奇[⑤] 等人。前一天的早晨他同波列查叶夫（他的团当时驻扎在莫斯科）一起出去购买物品，买了许多茶杯，甚至买了茶炊和各种并不需要的东西，末了还买了葡萄酒和吃

---

① 德普列店是法国人德普列开设的。德普列（de près）在法文里是“近”的意思，因此奥加略夫开玩笑地题了这样的话。

② 法国利威扎尔特地方出产的白葡萄酒。

③ 符·伊·索科洛夫斯基（1808—1839）：俄国诗人，一八三二年同赫尔岑、奥加略夫大学生小组接近，一八三四年被捕。

④ 《赫威利》：索科洛夫斯基写的诗剧。但索科洛夫斯基这个时候出版的并不是《赫威利》，而是长篇小说《一与二，或诗人的恋爱》。

⑤ 米·亚·玛克西莫维奇（1804—1873）：俄国植物学家、历史学家和民俗学家，一八三三年任莫斯科大学博物学教授。作者听过他讲的植物学的课。

的东西，那就是酥皮大馅饼、塞肉的火鸡等等。晚上我们到了沙〔青〕家里。索科洛夫斯基建议把酒打开一瓶，然后又开一瓶；我们一共五个人；过了这一晚，就是说到第二天刚开头，酒就光了，索科洛夫斯基的钱也光了。他偿还了几笔数目小的欠款，剩下的钱都让他买东西花光了。

索科洛夫斯基焦急得不知怎样才好，他勉强镇静下来，想了又想，随后就写信给所有的 gros bonnets〔法语：大人物〕，说他患了重病，只好将宴会推迟。

为了庆祝四个人的命名日举行宴会，我起草了一个完整的节目单，这个节目单后来当然引起了审问官戈里曾[①] 的特别注意，他在委员会上问我是不是按照这个节目单做了的。

“A la lettre，〔法语，这里的意思是‘一字不差’〕”我答道，他耸了耸肩头，好像他一生都在斯莫尔尼修道院里或者都在过圣星期五[②] 似的。

晚饭以后我们中间通常要发生一个重大的问题——一个引起辩论的问题，这就是“怎样煮热糖酒[③]?”别的东西都是照平常那样吃掉、喝光的，就像在国会里投信任票那样，——不用争论。可是对这个问题每个人都参加，而且又是在吃过晚饭以后。

“点火——还不点火吗？怎样点火呢？用香槟或者索特

① 戈里曾：指谢·米·戈里曾公爵。

② 圣星期五：即复活节前的星期五，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日子。

③ 热糖酒：把甜酒或白兰地浇在大块糖上点燃溶化而成。

尔纳[1] 浇灭吗？在它燃烧的时候放进水果和菠萝，还是以后才放呢？”

“显然是在它燃烧的时候，那么香味都到潘趣酒[2] 里去了。”

“得了吧，菠萝浮起来，它们的边皮会烧焦的，这就糟了。”

“这都是废话！”克〔彻尔〕说，声音比所有其他的人都高，“应当吹灭蜡烛，——这才不是废话。”

蜡烛灭了，所有人的脸色都发青，脸上的线条都跟着火焰的摇晃在颤动。这个时候小屋子里的气温由于燃烧的糖酒变得非常高。大家都很渴，热糖酒却还没有做成。可是雅尔饭店派来的法国人 Joseph〔法语：约瑟夫〕[3] 在场；他做了一种跟热糖酒相反的东西，用各种葡萄酒做成 à la base de cognac〔法语：以白兰地为主的〕冰冻的饮料。他是真正的“伟大人民”的儿子，他把法国葡萄酒倒进去的时候，还向我们解释道，这种酒非常好，因为它两次经过赤道。“Oui, oui, messieurs, deux fois l'équateur, messieurs!〔法语：是的，是的，各位先生，两次过赤道，各位先生！〕”

这种像北极一样冰冷的出色的饮料喝光以后，也实在不需要再喝什么了，克〔彻尔〕一面搅动汤碗里的火湖，让最后几块方糖发出嗞嗞声和哀号声溶化了，一面嚷道：

---

① 索特尔纳：指法国索特尔纳产的白葡萄酒。
② 潘趣酒：柠檬汁、糖和葡萄酒的混合饮料。
③ 约瑟夫：法国人，雅尔饭店的服务员。

"该弄灭火了！ 该弄灭火了！"

香槟倒了进去，火焰变红了，火在潘趣酒面上跑来跑去，现出一种忧郁和不祥的预兆。

于是有人发出失望的声音：

"我说，老兄，你发昏了，你不看见松脂熔化到潘趣酒里面去了吗？"

"那么你自己来拿好瓶子，不要让热度把松脂熔化了。"

"好吧，应当先用什么东西包住它。"那个苦恼的声音继续说。

"杯子，杯子！ 你们这里杯子够吗？ 多少？ 我们一共是——九、十……十四，——对，对。"

"哪里去找十四个杯子呢？"

"好吧，没有杯子的人就用——玻璃杯。"

"玻璃杯会炸的。"

"决不会，决不会，只要放一小匙进去就行。"

蜡烛拿来了；最后的火光跑过当中，来一个急转弯——就没有了。

"热糖酒成功了！"

"成功，大成功！"四面八方都在说。

第二天我头痛，恶心。这明明是由于热糖酒——这种混合酒！我当时真正下定决心以后决不再喝热糖酒了，这是毒药。

彼得·费多罗维奇走进房来。

"少爷，您今天回来不是戴自己的帽子：我们的帽子要好

一些。"

"让它去吧。"

"您是不是要我去找尼可拉·米哈依洛维奇的库齐马[1]?"

"你以为有人没有戴帽子回家吗?"

"少爷,不管怎样,您还是让我去吧。"

这时我猜到了问题不在帽子,却在于库齐马约彼得·费多罗维奇上战场[2]。

"你到库齐马那儿去吧,不过你先向厨子给我要点酸菜汤来。"

"看来,历克山大·伊凡雷奇[3],少爷们的命名日过得不寒伧吧?"

"什么——寒伧?这样的宴会我上大学以来不曾有过。"

"那么我们今天不到大学去吗?"

我受到良心的责备,不作声了。

"您的爸爸问我:'怎么样了,还没有起来吗?'您知道,我可不会上当,我说:'少爷头痛;他大清早就讲他头痛,老爷,所以我没有拉起窗帘来。'他就说:'好,你做得对。'"

"你看在基督的面上让我好好地睡一觉吧。你要去沙〔青〕那儿,你就去吧。"

"我就去,少爷,不过我先跑去把酸菜汤拿来,少爷。"

---

① 库齐马:尼·米·沙青的仆人。
② 指一起喝酒。
③ 即亚历山大·伊凡雷奇,作者的名字和父名。

我又闭上眼睛睡着了，一两小时以后我再醒过来，觉得好多了。我想：他们在那里干什么呢？克〔彻尔〕和奥加略夫在那里过夜。可惜热糖酒对脑袋会起这样的作用，必须承认它的味道很好。我不该用玻璃杯喝热糖酒，今后我喝热糖酒决定永远不超过一小杯。

这个时候我父亲已经读过了报纸，也同厨子谈过了话。

"你今天头痛吗?"

"很厉害。"

"是不是你太用功了?"——他这样发问的时候，就是在我回答以前也看得出来他已经在怀疑了。——"我记不起，好像你昨天是同尼可拉沙① 和奥加略夫在一块儿的。"

"是，是这样，爸爸。"

"他们庆祝命名日……拿什么招待你呢？又是马德拉酒② 汤吗？啊，我不喜欢这一切。我知道，尼可拉沙太好酒了，他这个毛病是从哪儿来的，我却不明白。已故的巴威尔·伊凡诺维奇③ ……啊，六月二十九日是他的命名日，往常他一定会邀请所有的亲戚吃一顿饭，是按照常规的宴会，既朴素，又体面。然而今天流行的是香槟酒和油浸沙丁鱼，——看

① 尼可拉沙：即尼可拉·巴甫洛维奇·戈洛赫瓦斯托夫(1800—1846)，作者的表兄。

② 马德拉酒：马德拉岛出产的白葡萄酒。

③ 巴威尔·伊凡诺维奇：作者的姑父，尼可拉沙的父亲，死于一八一二年，参看第一八页注①。

起来就叫人厌恶。至于普拉东·包格达诺维奇那个不肖的儿子[①]，我不谈论他，——他一个人，又没有人管他！莫斯科……有钱，叫马车夫叶列美依‘去买酒’。马车夫当然高兴：他在店里会得到一枚十戈比的银币。”

“是的，我是在尼可拉·巴甫洛维奇那儿吃早饭的。不过我并不以为那是我头痛的原因。我要出去散散步，这通常对我有好处。”

“好吧；我希望你在家里吃午饭。”

“当然，我只是出去走走。”

要解释马德拉酒汤的来源，我就得从这次庆祝四个命名日的著名宴会的前一年或者更早些时候讲起，那时在复活节我和奥加略夫一起出去散步，为了不在家吃午饭，我就说奥加略夫的父亲请我去吃饭。

我父亲向来不喜欢我的熟人；他经常把他们的姓叫错，而且经常错得一样，譬如他总是叫沙〔青〕做沙凯尼，叫沙左诺夫做斯纳齐尼。他最不喜欢奥加略夫，因为奥加略夫留着长头发，而且不请求许可就抽起烟来。可是另一方面他把奥加略夫看作远房的外孙，因此他不能随意歪曲亲戚的姓。而且普拉东·包格达诺维奇不论家世或财产都属于我父亲所尊重的少数人之列，他很高兴我同这一家人来往。倘使普拉东·包格达诺维奇没有儿子的话，他就更加高兴了。

因此他认为这一家人的邀请是不好拒绝的。

---

① 指尼可拉·奥加略夫，他的父亲普拉东死于一八三八年。

可是我们并不待在普拉东·包格达诺维奇的可尊敬的饭厅里面，却先跑到诺文斯柯耶附近、普列依斯[1]的演艺场去(我后来在日内瓦和伦敦又非常高兴地遇见了这个杂技演员家族)；那里有一个小姑娘我们很喜欢，就叫她做"迷娘"[2]。

我们注意地看了一阵迷娘，并且决定晚上再来看她一次，便动身到"雅尔"去吃午饭。我有一个金币，奥加略夫有的同我差不多。我们当时完全是外行，因此我们考虑了好久，才要了一份 ouka auchampagne〔法语：香槟酒鱼汤〕、一瓶来因葡萄酒和一份小小的野味，我们吃完这一顿贵得吓人的午饭站起来，肚子还是很饿，我们又看迷娘去了。

后来我跟父亲道晚安的时候，他对我说，他觉得我有酒的气味。

"这大概是，汤里面放了马德拉酒吧。"我说。

"Au madère〔法语：放马德拉酒〕；这大概是普拉东·包格达诺维奇的女婿的主意；cela sent les casernes de la garde.〔法语：这是禁卫军营房的气味。〕"

从这个时候起到我流放为止的这段时期中，倘使我父亲以为我喝了酒，或者他看见我的脸发红，他就一定要对我说："大概你今天又喝了马德拉酒汤吧！"

于是，我就快走赶到沙〔青〕家里去。

---

① 普列依斯弟兄是德国马戏、杂技演员，又是班主，当时不止一次地在俄国巡回演出。

② "迷娘"：歌德的长篇小说《威廉·迈斯特尔的学徒时期》中一个美丽的、热情的意大利少女。

不用说,奥加略夫和克〔彻尔〕还在那里。克〔彻尔〕的脸上现出疲乏的表情,他对当时的某一些安排不满意,正在发表严厉的批评。奥加略夫采用了以毒攻毒的同种疗法把剩下的酒喝光了,这不仅是在昨天的晚宴以后,而且还是在彼得·费多罗维奇采办了粮草以后的事,彼得·费多罗维奇已经在沙〔青〕的厨房里唱歌、吹哨、用手指打拍子了:

在玛利伊诺村树林中游乐
就在悼亡节[①] 那个日子。

……我回想起我们的青年时期,回想起我们这一伙人在一起度过的日子,我记不起一件使我的良心受到谴责的事情,记不起一件使我感到羞愧的事情。这毫无例外地对我们所有的朋友都适用。

我们中间有柏拉图式[②] 的梦想家和悲观失望的十七岁的青年。瓦津甚至写了一个剧本,企图表现"他那备受痛苦的心的可怕经历"。剧本是这样开头的:"花园——远处有房屋——窗内有灯光——暴风雨——没有一个人——花园小门没有关上,啪来啪去,还发出吱咀声。"

"剧本里除了小门和花园外还有没有人物?"我问瓦津道。

瓦津带了一点不高兴的样子对我说:

"你总是开玩笑!这并不是笑话,这是我内心的真实

---

① 悼亡节:复活节后第七个星期四举行的民间纪念亡人的节日。这是一个春天的节日。

② 柏拉图式:精神的、空想的、不切实际的。

记录；要是你再这样，我就不读下去了，"——他继续往下读。

也有完全不是柏拉图式的恶作剧；有的结局甚至不是写出剧本，而是进了药房。然而并不曾有过欺负女人、侮辱人的那些粗俗勾当，也没有人养过一个姘头（我们连这个下流的字眼也没有用过）。我们这伙人里面也从来没有过不声不响的、没有危险的、平淡无奇的、庸俗的恶行，——得到法律保障的恶行。

"那么您容许更坏的恶行——卖淫吗？"有人会这样问我道。

"不是我容许，是你们容许！这是说，不是您个人，而是你们全体。它是极其牢固地建筑在整个社会制度上，因此它不需要我来承认。"

普遍的问题和对自己社会职责的热诚救了我们；不单是这些，还有对科学和艺术的兴趣的高度发达。它们像燃烧的纸张一样，烧掉了油迹。我保存了几封奥加略夫在那个时期写的信，根据它们就可以容易判断我们当时生活的基调。例如一八三三年六月七日奥加略夫写信给我：

"我认为我们彼此了解，我认为我们是可以开诚布公的。你不要把我的信拿给别人看。那么，你告诉我——从某个时候以来我就充满了这样的感觉和思想，也可以说它们压得我透不过气来，因此我觉得，我不仅是觉得，而且这个思想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我的天赋宜于做诗人、做写诗的人或者音乐家，alles eins〔德语：反正一样〕，不过我觉得我应当始终保

持这个想法,因为我自己有我是诗人的这种感觉;即使我还写得很糟,然而我心灵里的那种火、我那种丰富的感情使我抱有希望将来会写出过得去的(原谅我使用这种庸俗的词句)的诗来。朋友,告诉我,我可以相信我的天赋吗?你也许比我自己更知道我,你不会看错的。——一八三三年六月七日。"

"你写着:'你的确是一个诗人,真正的诗人!'[①] 朋友,你了解得到这些字对我产生的全部影响吗?那么我所感觉到的一切,我所追求的一切,我所生活于其中的一切,都不是幻觉了!它不是幻觉!你说的是真话吗?这不是发热病人的胡话——这是我感觉到的。你比任何人都更了解我,不是这样吗?我的确觉得这样。不,这种昂扬的生活并不是发热病人的胡话,并不是想象的幻觉,它太昂扬了,不可能是骗人的幻觉,它是真实的,我生活在它里面,我不能想象我还会过另外的生活。我为什么不懂音乐,不然一曲多么出色的交响乐现在就要从我的心灵里产生出来!现在你听到宏伟的 adagio〔意语:柔板,缓徐调〕,可是我没有表达自己思想感情的力量,我需要比过去已经说过的说得更多;presto〔意语:急板,流水调〕,presto,我需要一个强烈的、不能制止的 presto。Adagio 和 presto〔意语:缓徐调和流水调,或柔板和急板〕,两个极端。去

① 这句话是从作者在一八三三年八月七日或八日给奥加略夫的信里引来的。

掉这些中间的东西:andante〔意语:行板,平调〕、allegro mo-derato〔意语:中庸快板〕,它们不是结结巴巴,就是头脑迟钝,它们既不能发出有力的语言,也不能有强烈的感觉。——切尔特科沃村,一八三三年八月十八日。"

我们早已丢开了这种年轻人讲天真话滔滔不绝的习惯,它对我们显得很陌生,然而从一个不到二十岁的青年写的这些话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来他是不会被下流行为和下流恶习玷污的,即使他掉进了泥坑,他也会干干净净地从泥坑里出来。

这并不是缺乏自信心,这是对信仰的怀疑,这是希望得到肯定、听到我们所极其重视的不必要的友爱语言的强烈愿望。是的,这是即将产生艺术作品时的焦急不安,这是孕育艺术创作的心灵的焦心悬念的仓皇四顾。

在同一封信里他还写道:"我还捉不住我的心灵所听到的那些音响,肉体的无能为力限制了想象。然而,见鬼!我是一个诗人,凡是我不能靠冷静的理智了解的地方,诗就悄悄地告诉我真理。这就是启示的哲学。"

我们青年时代的头一部分就这样地结束了;第二部分是在监牢里开始的。然而在谈到监牢之前,我应当讲一讲这个灾祸压在我们头上的时候我们的倾向是什么,我们有的是什么思想。

波兰起义被镇压以后的那个时期很快地教育了我们。我

们不仅因为尼古拉已经羽毛丰满、他的严厉统治已经固定下来而感到苦恼;而且我们开始发现在欧洲,特别在法国(我们过去常常从法国找到政治暗语和口号)情况不妙,而感到内心的恐惧;我们开始对我们的见解怀疑起来。

一八二六年的幼稚的自由主义,后来逐渐变成由拉法夷脱派和本查曼·贡斯当所鼓吹、由贝朗瑞所歌唱的法国观点,它在波兰毁灭以后失去了迷惑我们的魔力了。

这个时候有一部分年轻人(瓦津也在内)便埋头去深刻地、认真地研究俄国历史。

另一部分青年就去研究德国哲学。

奥加略夫和我,我们不在这两部分人里面。我们同某些思想的关系太密切了,无法很快地把它们丢开。我们对贝朗瑞宴会上的革命[1] 的信仰动摇了,可是我们还在寻求一种在涅斯托尔的《编年史》[2] 中和在谢林[3] 的先验的唯心论中都找不到的东西。

在这种骚动中间,在猜想、在我们为了解答使我们惊恐的那些疑问所作的努力中间,圣西门主义者的小册子,他们的宣传,他们的审讯,到了我们的手里。它们给我们留下很深的印

---

① 宴会上的革命: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贝朗瑞的诗歌用隐蔽的玩笑、讽刺的调子,借友好宴会上祝酒的形式,发表对共和主义的同情,又结合着特殊的给肉欲恢复名誉和生活享乐的主张。因此作者有这样的说法。

② 涅斯托尔的《编年史》:即《往年故事》,是现存最早的俄罗斯历史书,据说作者是基辅山洞修道院的僧侣(十一世纪后半叶到十二世纪初)。

③ 弗·威·谢林(1775—1854):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

象。[1]

肤浅的和不肤浅的人们把昂方丹神甫[2] 和他的使徒们嘲笑够了;现在到了用另一种方式承认这些社会主义的先驱者的时候了。

这些意气昂扬的青年穿着没有开襟的背心,留着长胡子,庄严地、带着诗意地出现在小市民世界中间。他们宣告一种新的信仰,他们有话要说,他们要用这种新事物的名义批判旧事物秩序,并不害怕受到拿破仑法典[3] 和奥尔良宗教[4] 对他

---

① 作者在这里讲当时(三十年代初)他和奥加略夫对真理的追求。一八三〇年法国七月革命后资产阶级统治得到了巩固,这以后作者和奥加略夫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思想("由拉法夷脱派和本查曼·贡斯当所传播的法国政治理论")开始怀疑起来。一八三一年波兰起义受到镇压之后,他们再也不能以在他们少数同志的小组里唱革命歌曲、谈论革命为满足了。作者还认为他们不会脱离当前的紧要问题去研究远古的历史(如"涅斯托尔的《编年史》")或者研究抽象的德国唯心主义的哲学(如"谢林的先验的唯心论")。接受空想的社会主义思想("圣西门主义者的小册子"),在当时说来,是他们在思想发展史上迈出了新的一步。

② 巴·普·昂方丹(即昂方丹神甫,1796—1864):法国空想的社会主义者,圣西门主义的领袖,曾带了四十个信徒在巴黎郊外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居住点,因而被捕,关了一个时期。

③ 拿破仑法典:拿破仑一世执政以后相继制定了《民法典》《商法典》和《刑法典》。一八〇四年颁布的《民法典》,后来(一八〇七年)改称为《拿破仑法典》。一八三二年法国圣西门主义者以违反社会道德和习俗的罪名根据刑法第二九一条受审判。作者在这里批判资产阶级法律的伪善。

④ 奥尔良宗教:这是作者用的讽刺话。七月(奥尔良)王朝掌权时期的特点就是金融贵族统治的极端道德败坏。在这个时期中圣西门主义者却被控告犯了宣传"新宗教"和男女平等、也就是道德败坏、主张"公妻"的罪名,受到审判。

们的审判。

一方面妇女的解放,号召妇女参加公益劳动,让妇女掌握自己的命运,把妇女当作平等的人同她联合起来。

另一方面为肉欲昭雪、辩护,réhabilitation de la chair!〔法语:给肉欲恢复名誉!〕

这是些伟大的词句,它们包含着人与人之间新关系的整个世界,——一个健康的世界,精神的世界,美的世界,自然道德的世界因此也是道德上纯洁的世界。许多人挖苦妇女解放,挖苦对肉欲权利的承认,给这些字眼加上肮脏的、庸俗的意义;我们那种修道士一般贪淫好色的想象害怕肉欲,害怕女人。心地善良的人明白对肉欲的净化尊重就是基督教的丧钟;生命的宗教来代替死亡的宗教,美的宗教来代替提倡斋戒和祈祷的惩罚和禁欲的宗教。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肉体也复活起来,而且不再为自己感到害羞了;人达到了和谐的统一,领悟到他是一个活的整体,并不是像钟摆那样,由两个互相制约的不同金属做成的,还领悟到同他连结在一起的敌人也已经消失了。

要在法国向全体公众宣传这些摆脱唯灵论的言论,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唯灵论在法国人的观念里是很牢固的,而在他们的行为里却又完全没有它!

那个旧世界,伏尔泰所嘲笑的、革命所破坏的、但又被小市民为了自己的生活习惯所巩固、所修补、所加强的旧世界,还不曾经受过这样的事。它要根据它口是心非的伪善来审判它所谓的叛徒,可是这些年轻人揭露了它。他们被控告背叛

了基督教，然而他们指着法官头上一八三〇年革命以后用帷幔罩起来的神像①。控告的罪名是他们替色欲辩护，可是他们问法官，他的生活是不是很贞节？

新世界在推门了，我们的灵魂、我们的心敞开来迎接它。圣西门主义成了我们信仰的基础，它始终不变地是我们信仰的精髓。

我们敏感，又真正年轻，因此容易被卷进它的巨大洪流里面，而且很早就游过了那条分界线（那里有整整一大群人，他们抄了手站着，有的朝后退，有的在两边寻找浅滩）——要横渡海洋！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敢于同我们一起冒险的。社会主义和现实主义② 一直到今天都是革命和科学的道路上的试金石。一群群游泳的人被时事的浪潮或者由思考的结果冲到了这些岩石上，立刻分成两个永远存在的党派，它们（经常改变装束）贯穿整个历史，贯穿一切变革，通过不计其数的政党，甚至通过由十多个青年成立的小组而存在下来。一派代表逻辑，另一派代表历史；一派代表辩证法，另一派代表发生学③。一派更正确，另一派更实际。

这里不可能谈到选择，控制思想比控制任何激情更难——思想不知不觉地把人引到什么地方；要是能够用感情、用

① 在七月王朝统治的时期，法庭上的神像给用绿色盖布遮了起来。

② 现实主义：作者在这里指唯物主义。

③ 发生学：动物和人发展的科学。

梦想、用害怕后果的顾虑来束缚思想，也可能把思想拴住，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办到。要是思想在一个人身上占了优势，那么他就不问这思想是否合乎实际，实行起来是困难还是容易，——他追求真理，坚定地、无私地实行他的主张，像过去圣西门主义者、现在蒲鲁东[①] 所做的那样。

我们的小组团结得更紧密了。甚至在那个时候，在一八三三年，自由主义者看见我们就要皱起眉头，认为我们走错了路，正是在我们关进监牢之前，圣西门主义成了我和尼·阿·波列沃依中间的障壁。波列沃依是一个头脑十分灵敏、精力旺盛、容易吸收一切养料的人；他是生就的新闻记者，一切成就、发现、政治与学术论战的编年史家。我是在大学念书快结束的时候认识他的——我有时在他的家里，有时在他的兄弟克谢诺丰特[②] 的家里。这是在他声誉最高的时候，就是在《电讯》[③] 查禁前不久的时候。

这个人，他生活在最近的发现里面，在当前的问题里面，在理论和事件的新奇新闻里面，他像变色龙那样变来变去，不管他的头脑多么灵活，他是不会懂得圣西门主义的。对我们说来，圣西门主义是启示，在他看来是发疯，是阻碍社会发

---

① 比·约·蒲鲁东(1809—1865)：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

② 克谢诺丰特·阿列克谢叶维奇·波列沃依(1801—1867)：新闻记者，尼·阿·波列沃依的兄弟和《莫斯科电讯》的同事。

③ 《电讯》：即《莫斯科电讯》，两周刊，科学和文学评论杂志，由尼·阿·波列沃依编辑，一八二五年创刊，一八三四年被查封。

展的空洞无聊的乌托邦。不管我怎样阐说、解释、论证，波列沃依是听不进去的，他不高兴，发了脾气。一个大学生反对他，使他特别恼怒，因为他非常重视他在年轻人中间的影响，在他同我的辩论中他看出来这种影响正在逐渐地消失。

有一次我认为他的反驳不讲道理，给激怒了，就对他说，他同他毕生所反对的那些人一样地落后、保守。我这番话使波列沃依很难过，他摇着头，对我说：

“将来会有一天，您也会为您一生的努力和辛劳得到这样的报酬：一个年轻人含笑地对您说：‘走开，您是个落后的人。’”

我怜悯他，而且因为自己伤了他的心感到惭愧，但是同时我也明白，在他的忧郁的话里听得出他的结论来。他的话不是出于一个坚强战士的口，而是一个上了年纪的、精疲力竭的角斗士[①]讲的话。我那个时候就明白他不会前进了，可是他也不能带着这样灵活的头脑、踏着这样不牢固的基地，长久站在同一个地方。

你们知道他后来怎样了吗，——他写了《西伯利亚姑娘巴拉莎》[②]……

对于到了时候不能前进又不能退出舞台的人，及时死去

① 角斗士：在古罗马与其他武士或野兽角斗的奴隶或战俘。

② 《西伯利亚姑娘巴拉莎》：尼·阿·波列沃依后来转变以后写的一个剧本。尼·阿·波列沃依在《莫斯科电讯》一八三四年被查封以后转到了反动的阵营。

倒是多么大的幸福！我看到波列沃依，看到庇护九世[1] 以及许多别的人，就有这样的想法！

① 庇护九世(1792—1878)：罗马教皇，又是教皇国世俗君主(1846—1849和1850—1870)，曾经同自由主义集团作了某些不得已的周旋，以后就成为欧洲反动势力的一个主要鼓舞者。

补　遗

亚·波列查叶夫

要补足那个时期阴暗抑郁的记录，我应当增加一点关于亚·波列查叶夫的详细情况。

波列查叶夫在大学念书的时候，就因为诗写得好出了名。他写的诗中间有一篇模仿《奥涅金》的幽默诗《沙希卡》。在这篇诗里他不顾礼节，用开玩笑的调子和十分优美的诗句抨击了许多事情。

一八二六年秋天尼古拉绞死了伯斯捷尔、穆拉维约夫和他们的朋友以后，在莫斯科庆祝他的加冕典礼。对别的君主说来，这种典礼常常是大赦和宽恕的机会；尼古拉在欢庆自己登极之后又继续“打击祖国的敌人”，像罗伯斯庇尔在举行了他的 Fête－Dieu〔法语：主宰节〕[①] 以后那样。

秘密警察把波列查叶夫的长诗送到他那里……

---

① 作者指的是一七九四年新历九月二日在巴黎“罗伯斯庇尔手执花束与麦穗主持的崇敬主宰与自然的盛大纪念会”（马迪厄语）。这个新宗教仪式结束以后，对国内敌人的镇压也加强了。

于是在某一天深夜三点钟，校长[1] 把波列查叶夫唤起来，叫他穿上制服到办公室去。督学在那里等着他。督学看见制服上的钮扣全在，不多不少，不说什么就请波列查叶夫坐进自己的马车把他带走了。

他把波列查叶夫带到国民教育大臣那里。国民教育大臣又让波列查叶夫坐进他的马车，带走了——然而这次是直接去见皇上。

里温公爵[2] 叫波列查叶夫在会客室里等候，他到内室去了，虽然这时不过是清早六点钟，却已经有几位内侍官和其他高级官吏等在那里。内侍官以为这个年轻人有了什么出色的成就，便马上同他交谈起来。有一位枢密官还邀请他给儿子教课。

波列查叶夫给带到书房里去。皇上靠了写字台站着，正在同里温谈话。他朝着进来的人投了一瞥审视的、带恶意的眼光，他的手里拿着诗稿本。

“是你写的这些诗吗？”他问道。

“是我。”波列查叶夫答道。

“公爵，您瞧，”皇上说，“我要给您看一个大学教育的样本，我要让您看看年轻人在那里学些什么。”然后他又向波列

---

① 校长：指安·安·普罗科波维奇－安东斯基（1762—1848），一八一八至一八二六年任莫斯科大学的校长。

② 作者记错了，当时担任国民教育大臣职务的不是卡·安·里温公爵，而是亚·谢·希什科夫，他在一八二四年到一八二八年担任国民教育大臣。里温是接替希什科夫职务的人，他任职的时期是一八二八年到一八三三年。

查叶夫吩咐道:“把诗稿大声读出来。”

波列查叶夫十分激动,他读不出声。尼古拉的眼睛牢牢地盯着他。我知道这对眼睛,再没有比这种灰暗无光的冷冷的锡镴一样的眼光更可怕、更没有指望的了。

“我不能。”波列查叶夫说。

“你读!”禁卫军军士长吼叫道。

他这一声吼叫使波列查叶夫的能力恢复了。他翻开了诗稿本。他后来对我们说:“我从没有见过《沙希卡》抄写得这样工整,而且写在这样好的纸上。”

他起初读得很吃力,然后他逐渐振作起来,他大声地、生动地读完了这首诗。到了特别尖锐的地方,皇上就向大臣作手势。大臣恐惧地闭上自己的眼睛。

“您怎么说?”尼古拉在他读完以后,问大臣道,“我要制止这种道德败坏,这不过是遗迹,最后的残迹;我要根除它们。他的操行怎样?”

不用说,大臣并不知道波列查叶夫的操行,可是他起了一点怜悯心,他就说:

“陛下,他的操行很好。”

“这个评语救了你,然而你应当受到处分,为了给别人作个例子。你愿意到军队里去吗?”

波列查叶夫不做声。

“我给你一个在军队里服役赎罪的机会。怎样,你愿意吗?”

“我应当服从。”波列查叶夫答道。

皇上走到他面前，把一只手放在他的肩上，说："你的命运决定于你自己；要是我忘记了，你可以写信给我，"便吻了吻他的前额。

我逼着波列查叶夫讲了十来遍接吻的事情，——我觉得这太不可信了。波列查叶夫发誓说这是真事。

波列查叶夫离开皇上便给带到季比奇那里去，季比奇就住在宫里。他还睡着，给叫醒来了，他走出来，还打着呵欠，他读了文件以后，便问侍从武官道：

"就是他吗？"

"是他，大人。"

"好吧！很好的事，您到军队去服役；我过去一直在军队里服役——您瞧，我升到了元帅，您将来也可能做到的。"

这种愚蠢的、不合时宜的德国式的开玩笑，就等于季比奇的接吻。波列查叶夫给带到营房当兵去了。①

过了大约三年，波列查叶夫记起了皇上的话，便给皇上写了一封信。没有回信。几个月以后他又写了一封信，——仍然不见回信。他相信他的信没有送到，他就逃跑了，② 他逃跑，原是为了亲自向皇上呈递申请书。他的行动不谨慎，他去看莫斯科的老同学，受到他们的款待；不用说，就不能保守秘密了。在特威尔他让人捉住了，把他当作逃兵，戴上镣铐，徒步押送到团里去。军事法庭判决他受夹笞刑；判决书送到皇

① 一八二六年七月二十八日波列查叶夫给派到布狄尔斯基团当军士。

② 波列查叶夫一八二七年六月离开布狄尔斯基团。

上那里请求批准。

波列查叶夫想在处罚之前自杀。他在监牢里想找一件锐利的工具，好久都没有找到，就请一个对他友好的老兵帮忙。老兵了解他，尊重他的愿望。老头子听说批示下来了，就带来一把刺刀，含着眼泪把刺刀递给他，一面说：

"我亲自把它磨尖的。"

皇上并没有批准惩罚波列查叶夫。

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写下了他那首优秀的诗：

得不到安慰
我孤寂地死去，
附在我身上的恶魔
他扬扬得意……①

波列查叶夫给送到高加索去了；② 在那里他立了功、升为军士。一年一年地过去了；他那种毫无出路的、寂寞无聊的处境毁了他；要他做一个警察诗人歌颂尼古拉的功德，他办不到，然而这却是逃离军队的唯一办法。

可是还有另一个办法，他倒挑选了这个：他借酒来忘记一切。他有一首可怕的诗《白酒颂》。

他后来给调到驻扎在莫斯科的马枪兵团。③ 他的处境有

① 这四行诗是从波列查叶夫的《预见》中摘来的，与原诗有出入。

② 波列查叶夫一八二九年充当莫斯科步兵团列兵，去高加索。

③ 一八三三年波列查叶夫在那里服役的莫斯科团从高加索调往弗拉基米尔省的柯甫罗夫城。

了大的好转，但是可恶的肺结核已经损坏了他的身体。我就是在这个时候认识他的，在一八三三年左右。他又支持了四年光景，后来死在士兵医院。①

他的一个朋友到医院去要他的尸体来埋葬的时候，却没有人知道他的尸体在什么地方；士兵医院做着出卖尸体的生意；它把尸体卖给大学、卖给医学院、做成骷髅等等。末了，那个人在地下室里找到可怜的波列查叶夫的尸体，——他躺在一堆别人的尸体底下，老鼠啃掉了他的一条腿。

他死后他的诗集出版了，② 本来要把他的一幅穿着士兵大衣的照片附在集子里，书刊检查机关认为这样做不体面，于是就给这个可怜的受难者换了戴上军官肩章的照像，——他是在医院里提升的。

---

① 波列查叶夫死于一八三八年一月十六日。

② 指一八三八年在莫斯科出版的《竖琴。亚历山大·波列查叶夫的诗》。

第　二　卷

监狱与流放(1834—1838)

第 八 章

预言——奥加略夫被捕——火灾——一个莫斯科的自由主义者——米·费·奥尔洛夫——墓地

……一八三四年一个春天的早晨我去找瓦津；他和他的兄弟姐妹都不在家。我走上楼，到他那个小房间里，坐下来写字条。

门轻轻地打开，瓦津的老母亲进来了；她的脚步声轻得几乎听不见；她带着倦意和病容走到一把扶手椅跟前，她坐下的时候对我说：

"您写吧，您写吧，——我来看看瓦季亚[1] 回来没有；孩子们出去散步去了，楼下空得很，我感到心烦，又有些害怕。我在这儿坐一会儿；我不妨碍您，您做您的事。"

她脸上带着深思的表情，我在她的脸上比平日更清楚地看到她过去所遭受的苦难的痕迹和她对于未来所怀有的疑惧，那种在多次长期的巨大灾难以后遗留下来的对生活的不信任。

---

① 瓦季亚：瓦津的爱称。

我们交谈起来。她对我谈了一点西伯利亚的事情。

“我遭受过许多许多苦难，而且以后难免还会遇到，”她摇着头继续说，“我的心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我记起来过去有时候她听见我们大胆的讲话和带煽动性的谈论以后，她脸色发白，轻轻地叹口气，走到另一间屋子里去，好久不讲一句话。

“您和您那些朋友们，”她往下说，“你们在走着必然毁灭的道路。您会毁掉瓦津，毁掉您自己和大家；您知道，我也像爱儿子一样地爱您。”

眼泪沿着她憔悴的脸颊滚下来。

我不作声。她拿起我的手，勉强笑了笑，又说下去：

“不要生气，我心情不好；我全明白，你们走你们的路吧，对你们来说，并没有别的路，要是有别的路，那么你们都不是现在的你们了。我知道这个，可是我克服不了我的恐惧；我经历过那么多的不幸，我再没有力量来忍受新的灾难了。您当心，不要对瓦津谈起这个，一个字也不要提，他会难过，他会来劝我。……他来了。”她又说，连忙揩去了眼泪，用眼光再一次恳求我不要对瓦津讲什么。

可怜的母亲！神圣的、伟大的女人！

这比得上高乃依的“qu’il mourût!〔法语：他该死！〕”①

---

① “他该死”（或译“他还是死了好”）：这句话是从法国古典主义剧作家彼·高乃依（1606—1684）的五幕悲剧《贺拉斯》中引来的。这个名句是主人公贺拉斯的父亲讲的话（见该剧第三幕第六场），老贺拉斯听见误传他的儿子怕死，临阵脱逃，深以为耻，就气愤地说了这句话，表示爱国心高于亲子情。

她的预言很快地就实现了;幸运的是这次的暴风雨没有落到她一家的头上,然而也给这个可怜的女人带来许多恐惧和痛苦。

“怎么给抓走啦?”我问道,就跳下床来,伸手摸了摸头,要证实我不是在梦里。

“警察局长夜里带着警察分局局长和哥萨克兵来了,在您离开我们家以后两小时光景,把文件全拿走了,带走了尼〔可拉〕·普〔拉东诺维奇〕①。”

这是奥加略夫的随从讲的话。我不明白警察找到了什么口实,——最近一切都很平静。奥加略夫到了才一两天……为什么他们抓走他,不抓走我呢?

束手不动是不行的,我穿好衣服,走出家门,没有一定的目的地。这是我碰到的头一个麻烦。我的心情很不好,我因为自己无能为力感到苦恼。

我在街上徘徊,最后我想起了一个朋友,他的社会地位使他能够打听出来是怎么一回事情,而且也许还可以帮忙。他住得非常远,在沃龙佐夫广场后面的别墅里;我碰到头一部出租马车就坐上,赶到他那里去。这个时候还不到早晨七点钟。

我认识瓦② ——大约在一年半以前;他是别具一格的莫

① 尼可拉·普拉东诺维奇·奥加略夫在一八三四年七月九日被捕,七月十二日由他的父亲保释出来,同月三十一日第二次被捕。

② 瓦:指瓦西里·彼得罗维奇·祖布科夫(1799—1862),担任过莫斯科民事和刑事法庭的顾问,后来又担任枢密院的总检察官。

斯科的大交际家。他在巴黎受过教育，有钱、聪明、有学问、机智、有自由思想，他因为十二月十四日的事件给关进了彼得保罗要塞监狱，后来又是在那批开释的人的中间；他不曾有过流放的经验，却得到了这方面的荣誉。[①] 他在总督手下工作，得到总督的信任。戈里曾公爵喜欢有自由思想的人，倘使他们用流利的法国话表达他们的这种见解，他更满意。公爵不擅长俄国话。

瓦——比我们大十岁，他那些老练的言论、他对政治事务的知识、他那漂亮流利的法国话和口才以及他对自由主义的热情都使我们感到惊讶。他知道的非常多，而且非常详细，他谈话谈得非常动听，而且非常从容；他的意见非常明确干脆，对任何事情他都有答案、建议和解决办法。他什么都读——新的长篇小说、论文、杂志、诗歌，而且还研究动物学，很有成绩，[②] 替公爵起草计划草案，并且草拟儿童读物的编写提纲。

他的自由主义是极其纯粹的、三色的[③] 那一类，是属于莫甘和拉马克将军[④] 两人之间的左翼。

他的书房里挂满了所有革命名人的肖像，从汉普登[⑤] 和

---

① 指作为十二月党人的荣誉。

② 祖布科夫自一八二五年起担任莫斯科自然科学家协会会员，后担任协会的第一秘书，在协会的刊物上发表过三篇关于甲虫新种的文章。

③ 法国国旗是三色旗，这里用来指法国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

④ 弗·莫甘(1785—1854)：法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政治活动家，国会议员；拉马克将军：参看第二一一页注③。

⑤ 约·汉普登(1594—1643)：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家。

伯伊[①] 到菲艾斯基[②] 和阿尔芒·卡列尔。在这个革命圣像壁下方有一个完备的禁书库。一具骷髅、几只鸟的标本、几只制过的两栖动物和若干保存在酒精里的动物内脏——它们给这间气氛非常热烈的书房加上一种思考和研究的严肃色彩。

我们常常带着羡慕的眼光来看待他那种对人的知识和经验;他那含蓄而带讽刺的反驳方式对我们有很大的影响。我们把他看做一个能干的革命家,一个 in spe〔拉丁语:未来的〕国家大员。

我在瓦——的家里没有找到他,他昨天进城去见〔戈里曾〕公爵去了;他的随从说一个半小时以后他一定会回家。我留下来等他。

瓦——的别墅很漂亮。我待在他的书房里等候他,书房 au rezde-chaussée〔法语:在底层〕。高大、宽敞,有一扇大门通到阳台和花园。这一天很热,从园里送进来花香和树木的香气,小孩们在房屋前面玩,发出响亮的笑声。富裕、满足、自由自在、阳光和阴影、花和绿荫……然而在监狱里却是狭小、黑暗、透不过气。我坐在那里沉溺在痛苦的思想中不知道过了多久,忽然那个随从带着一种古怪的兴奋在阳台上唤我。

"什么事?"我问道。

---

① 让·西·伯伊(1736—1793):法国天文学家,十八世纪末叶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家,一七九三年被处死刑。

② 居·菲艾斯基(1790—1836):科西嘉人,一八三六年因密谋暗杀路易-菲力浦(未遂),被处死刑。

“请到这儿来看看。”

我不想得罪他，就到阳台上去，——我发呆了。整整半个圆圈的房屋都在熊熊地燃烧，好像它们是在同一个时候烧起来似的。火势以非常快的速度蔓延开来。

我待在阳台上；随从带了一种神经质的高兴望着火，说道：

“烧得太好了，右边这所房屋烧起来了，一定烧起来了。”

火灾带了某种革命的性质：它蔑视所有制，消除财产的差别。随从本能地了解了这一点。

半个小时以后四分之一的天边都让上面灰黑、下面红色的浓烟盖住了。这一天拉费尔托沃[①]烧毁了。这是五个月中间一连串纵火案的头一件；我们在后面还要谈到它们。

最后，瓦——回来了。他精神饱满、亲切、殷勤，对我谈起火灾的事（他刚刚经过火灾场），还谈起一般人的讲法，说是有人放火，然后他又半开玩笑地接着说：

“先生，这是普加乔夫叛乱[②]，您瞧，我和您都逃不掉，他们要把我们绑在木桩上[③]……”

“在他们把我们绑在木桩上以前，”我答道，“我担心他们会给我们戴上镣铐的。您知道昨天夜里警察抓走了奥加略夫吗？”

---

① 拉费尔托沃：即列福尔托沃，过去是莫斯科的郊区，彼得一世曾在这里建筑了宫殿，后来这里又修建了叶卡捷琳娜宫；现已划入莫斯科市区。

② 参看第九二页注②。

③ 古时候的一种死刑，即绑在木桩上烧死。

"警察,——您在讲什么?"

"这就是我来找您谈的事情。应当想点办法。您到公爵那儿去,打听出是什么缘故,要求他同意接见我。"

瓦——没有回答,我望着他,然而现在他变了,好像不是他,而是他的哥哥坐在这里带着没精打采的神情和憔悴的面容,——他唉声叹气,显得惊惶不安。

"您怎样了?"

"您听我说,我经常对您说,这样下去,准会出事……对,对,这是我们料得到的,哎呀,谢谢! ……不论在思想和行动两方面我都没有罪,可是看来我也会坐牢的,这不是在开玩笑,我知道要塞的单人牢房是什么滋味。"

"您去找公爵吗?"

"说实话,有什么用处? 我作为朋友劝告您,不要谈奥加略夫的事;尽可能地不要做声,不然会倒楣的。您不知道这种事情多危险——我的真诚的劝告是:置身事外;不管您怎样奔走,您帮不了奥加略夫的忙,却只有毁掉您自己。专制制度就是这么一回事,——毫无权利,毫无辩护;律师和法官有什么用?"

这一次我没有心思听他那些大胆的见解和尖锐的批评。我拿起帽子走了。

我回到家,看见大家都很焦急。我父亲因为奥加略夫被捕在生我的气,枢密官已经来了,在清查我的图书,拿走那些他认为是危险的,而且很不高兴。

我在桌子上看到米·费·奥尔洛夫请我去吃午饭的字条。

他能不能替我们做点事情呢？虽然经验给了我一些教训，可是——试试并不吃亏。①

米哈伊尔·费多罗维奇·奥尔洛夫是著名的福利社② 的一个创办人，他没有去西伯利亚，并不是他的过错，这是由于他的哥哥③ 受到尼古拉的特殊宠幸，而且在十二月十四日那一天头一个带着骑兵队跑去保卫冬宫。奥尔洛夫被遣送到他的田庄上去，过了几年才得到批准迁回莫斯科居住。他在乡下孤寂的生活中研究了政治经济学和化学。我头一次见到他，他就谈起他那个化学上的新的命名法。凡是精力充沛的人研究一门科学开始得较迟的时候，就会有这样一种嗜好：把家具搬来搬去，照自己的心意安排一番。他的命名法比通用的法国命名法更复杂。我想转移他的注意力，就采用 captatio benevolentiae〔拉丁语：讨好〕的办法，向他指出：他的命名法很好，不过旧的命名法更好。

奥尔洛夫起初还争论，后来就同意了。

我讨好他的做法生了效，从那个时候起，我们就成了亲密的朋友。他认为我很有前途，我把他看做我们思想上的一位

---

① 这是旧俄的谚语。

② 福利社：这个社是在一八一八年成立的十二月党人的秘密团体。它在俄国头一个提出建立共和国的要求。它在一八二一年宣告“业已解散”，实际上改组成为两个团体：即由伯斯捷尔领导的“南方协会”（主张成立共和国）和主张成立立宪政府的“北方协会”，它们共同参加了十二月党人的秘密计划。

③ 指阿·费·奥尔洛夫伯爵（1786—1861），俄国反动国务活动家、军人和外交家，积极参加了一八二五年镇压十二月党人起义的罪行，一八四四年起担任宪兵队和第三厅的首脑。

老同志，我们所崇拜的英雄们的一位朋友，我们生活中的一位崇高人物。

可怜的奥尔洛夫就像关在铁槛里面的一头雄狮。他到处碰着栅栏，他没有地方可以活动，没有工作可做，对行动的渴望慢慢地消耗着他的身体。

在法国〔革命〕失败以后，我不止一次地遇见这样的一种人，他们给政治活动的需要弄得心神不定，不能够在书房的四面墙壁里面过日子，也不能在家庭生活中消磨时间。他们不会单独地生活；孤独的时候他们会感到忧郁，会变得喜怒无常，会同他们的最后一批朋友争吵，会在各处都看到反对他们的阴谋，他们自己也搞阴谋，想借此发现那一切事实上并不存在的阴谋诡计。

他们需要舞台和观众，就像需要空气一样；在舞台上他们的确是英雄，也会忍受一般人忍受不了的一切。他们离不开喧嚣、热闹、喝采，他们要发表演说，听政敌的答辩，他们少不了战斗的鼓舞和危险的刺激，——没有这些强身剂，他们就痛苦，就憔悴，就消沉下去，就死气沉沉，他们会冲出去，会犯错误。赖德律-洛兰就是这样，他的面貌也恰好同奥尔洛夫相似，特别是在他蓄了小胡子以后。

奥尔洛夫生得很漂亮；他的高高的身材、优雅的姿态、美丽的男性的容貌、光光的颅骨，这一切和谐地融合在一起使他的外貌有一种无法抗拒的魅力。他的半身像 pendant〔法语：配得上〕阿·彼·叶尔莫洛夫的半身像，叶尔莫洛夫的皱起来的方形的前额、厚厚的灰白头发、看到远处的锐利眼光给他的外

貌增加一种身经百战的大将风度，马泽巴[①] 就是靠这种风度得到玛丽雅·科楚白[②] 的欢心的。

奥尔洛夫实在寂寞无聊，不知道干什么好。他试着开办一所玻璃工厂制造中世纪那种绘图的玻璃，它们的成本比售价还高；他着手写一本《论信贷》的书——不，他的心向往的并不是这个，可是他没有别的出路。狮子给注定只能在阿尔巴特和巴斯曼街之间游荡，甚至不敢放任自己的舌头随便讲话。

奥尔洛夫拚命想做一个学者、一个理论家，这叫人看了感到很痛心。[③] 他有清楚的头脑、卓越的才能，可是完全不擅长推理，对待那些久已熟习的问题，他很容易一下子就迷失在新发明的体系中间，例如他那个化学命名法。他对待一切抽象的事物都毫无办法，然而他十分顽强坚决要搞形而上学。

他不谨慎，讲话不检点，经常犯错误；他受到最初印象的影响往前走了（他的这些印象都是骑士风度般高贵的），可是他突然记起了自己的地位，就在中途回转身来。他在这种有

---

① 伊·斯·马泽巴(1644—1709)：一六八七至一七〇九年乌克兰哥萨克首领，一七〇八年瑞典侵入俄国时期，投到瑞典方面，瑞典失败后，他逃到土耳其。

② 玛丽雅·科楚白：瓦·列·科楚白的女儿。少女玛丽雅和马泽巴的爱情，是普希金在长诗《波尔塔瓦》中描写的。瓦·列·科楚白：乌克兰哥萨克上层人物的杰出活动家，曾向彼得一世告发马泽巴，后被马泽巴处死。

③ 米·费·奥尔洛夫于一八三二年九月当选为自然科学家协会名誉会员。后来他作为学会理事会理事，企图修改学会章程、开放学会的会议厅、开办自然科学等讲座，未成。一八三六年十一月他在学会会议上作过《关于自然界的一些哲学思想》的报告。

策略的大转弯中比在形而上学和命名法中更不行;他有时落进一个套索里面,努力想摆脱它,却反而掉进两个、三个里面去了。他因为这个受到责难;人们太肤浅、太粗心,他们重视语言胜过重视行为,把个别的错误看得比整个性格更重要。没有必要用生硬的列古路斯[①] 的观点来责备人,应当责备这种阴暗的环境,在这个环境里任何崇高的感情只能当作违禁品一样关起门来,秘密交流;而且倘使有人大声说了一句话,他会整天都在想警察会不会马上就来……

应邀参加午宴的客人不少。我正好坐在奥尔洛夫的内弟拉耶夫斯基将军[②] 的旁边。他在十二月十四日以后也不得意;他是著名的尼·尼·拉耶夫斯基的儿子,他十四岁就同他哥哥一起在波罗丁诺他父亲的身边;后来他负伤死在高加索。[③]我对他讲起奥加略夫的事,我问他奥尔洛夫能不能有一点办法,或者愿意不愿意想一点办法。

拉耶夫斯基的脸上现出了乌云,然而并不是我上午看见的那种胆小怕死的悲伤表情,却是痛苦回忆和厌恶交织在一起的表情。

"这不是愿意不愿意的问题,"他答道,"只是我怀疑奥尔洛夫是不是能够做点什么;吃过午饭请您到书房去,我陪他来

① 列古路斯的事迹参看第一三五页注④。英译本把这一句译作"从罗马人品德的观点来责备人有什么用"。

② 尼·尼·拉耶夫斯基将军(1801—1843):一八一二年卫国战争英雄尼·尼·拉耶夫斯基将军(1771—1829)的第二个儿子,普希金的朋友。

③ 实际上小尼·尼·拉耶夫斯基死在沃龙涅什省的克拉斯宁科耶田庄。

找您。”他停了一下，又接下去说：“那么也就轮到您了；都要给卷进这个漩涡里去的。”

奥尔洛夫向我问清楚以后，就给戈里曾公爵写了信，要求会见公爵。

“公爵是个正派人，”他对我说；“即使他无能为力，他至少会讲出真相来。”

第二天我去听回音。戈里曾公爵说奥加略夫是奉皇上御旨逮捕的，并且已经指派了一个侦讯委员会，罪证就是六月二十四日的一次宴会，①在宴会上唱了带煽动性的歌。我一点也不懂。那一天是我父亲的命名日；我整天在家，奥加略夫也在我们家里。

我心情沉重地和奥尔洛夫告别；他也不愉快；我伸手给他的时候，他站起来，把我紧紧抱在他的宽阔的胸前，同我接吻。

好像他感觉到我们要长期分别了。

这以后我只见到他一次，那是在整整六年之后。② 他在逐渐委顿下去。他脸上的病容、沉思的表情和一种新的颧骨凸出的形状使我吃惊；他很忧郁，感觉到自己在走向毁灭，知道事情遭到挫折——可是找不到出路。过了两个月他就死了，血在他的血管里凝固了。

---

① 参看第三一九页正文。据作者自己说：“有一个大学生念完了大学的课程，在一八三四年六月二十四日邀请他的朋友们吃一顿饭。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参加宴会，的确没有一个人接到邀请。”

② 作者在一八三四年被捕，米·费·奥尔洛夫死于一八四二年，那么作者再见到奥尔洛夫，应当在**八年之后**。

……卢塞恩[1] 有一座出色的纪念碑；这是托尔瓦尔特孙在天然岩石上面雕刻出来的。[2] 一只垂死的狮子躺在洼地里；它得了致命的伤，血从伤口流出来，伤口上还露出一支折断了的箭；它把那个威武的脑袋放在它的脚爪上，它在呻吟，它的眼光里露出难熬的痛苦；四周一片空旷，下面有一个池塘，这一切都隐藏在山、树和绿荫中间；人们经过这里不会注意到有一个万兽之王在这里逐渐死去。

有一回我坐在这个石头雕刻的受难者对面的长凳上，坐了好久，忽然想起了我最后一次同奥尔洛夫的会见。……

我从奥尔洛夫那里回家，经过警察总监[3] 家门前，我忽然想起去公开要求他准许我探望奥加略夫。

我有生以来从未到过一个警察官员的家里。我等了许久，最后警察总监出来了。

我的要求使他吃惊。

"您有什么理由要求准许您去探望他？"

"奥加略夫是——我的亲戚。"

"亲戚？"他问道，笔直地望着我的眼睛。

我不答话，可是我也笔直地看着他阁下的眼睛。

"我不能准许您，"他说，"您的亲戚是 au secret〔法语：秘

---

① 卢塞恩：瑞士中部卢塞恩州的首府，在卢塞恩湖畔。

② 伯·托尔瓦尔特孙(1770－1844)：丹麦雕刻家，卢塞恩的纪念碑是他设计的，它在一八二一年雕成，纪念一七九二年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保卫巴黎杜伊勒里王宫的瑞士卫兵。

③ 指列·米·曾斯基少将，一八三四至一八四五年任莫斯科警察总监。

密拘押的〕。我很抱歉。”

……杳无音信和束手无策折磨着我。在城里几乎连一个朋友也没有。简直什么也打听不出来。看来警察好像忘记了我，不然就是把我漏掉了。非常，非常沉闷无聊。然而正是在灰云满天、流放和监狱的长夜逐渐逼近的时候，一道亮光照到我的身上。

一个十七岁的少女[①] 我以前一直把她当作小孩看待，她的几句深切同情的话使我又振作起来了。

在我的故事里第一次出现了女性的形象……正是这一个女性的形象出现在我一生中间。

在我的心灵里激荡着的短暂的、青年时期的、春天的热情在她面前褪了色、消失了，像幻灯里的画面一样；再也没有别的、新的热情了。

我们在墓地上见面。她站着，身子靠在墓碑上，对我谈起奥加略夫，我的悲伤平静下来了。

“明天见。”她说，把手伸给我，含泪地微微一笑。

“明天见。”我答道……久久地望着她的逐渐消失的背影。

这是一八三四年七月十九日的事。[②]

① 指娜·亚·扎哈利娜。

② 作者和扎哈利娜会见实际上是在一八三四年七月二十日。

第九章

逮捕——见证人——普列契斯千斯基警察分局办公室——家长作风的审判

“明天见。”我快要入睡前又重复地说了一声。……我感觉到非常轻松，非常愉快。

夜里一点到两点之间我父亲的随从叫醒了我；他没有穿上外面衣服，而且很惊慌。

“有个军官要见您。”

“什么军官？”

“我不知道。”

“好，我知道了。”我对他说，就披上了我的晨衣。

一个裹在军人大衣里面的人形站在大厅的门口；窗上映出白色帽缨，后面还有别的人，我认出哥萨克军帽来。

这是警察局长米勒尔。

他对我说他奉军事总督的命令（命令还拿在他的手里）来检查我的文件。蜡烛拿来了。警察局长拿去我的钥匙；区警察长和他手下的警官动手搜查我的书和衣服。警察局长就忙着翻看文件；他觉得它们全都可疑，把它们全放在一边，他突

然转身对我说：

“我请您现在就穿好衣服：您跟我一块儿去。”[①]

“到哪儿去？”我问道。

“到普列契斯千斯基警察分局。”警察局长用安慰的声音回答道。

“以后呢？”

“总督的命令里再没有别的。”

我开始穿衣服。

这时惊慌的仆人叫醒了我的母亲；她冲出她的寝室，到我的屋子里来，可是在客厅和大厅中间的门口让哥萨克兵拦住了。她大叫一声，我打了一个哆嗦，就朝她那里跑去。警察局长扔下那些文件，跟着我一起到大厅去。他向我母亲道歉，让她进来，他把那个并没有错的哥萨克兵骂了一顿，又回去翻看文件。

随后我父亲来了。他脸色苍白，不过还坚持他那勉强做出的冷静姿态。这个场面是很痛苦的。我母亲坐在角落里哭。年老的父亲同警察局长谈一些不相干的事，可是他的声音在打颤。我担心自己不能再支持 à la longue〔法语：多久〕了，我不愿意让警察长看见我掉眼泪而高兴。

我拉了拉警察局长的袖子。

“我们走吧！”

“我们走吧。”他高兴地说。

---

① 作者是在一八三四年七月二十一日深夜被捕的。

我父亲走出房去，过了一分钟回来；他拿来一个小圣像，给我挂在脖子上，说他父亲临死前曾经用这个圣像祝福过他。我受到感动；这个宗教的礼物给我说明了老人心上恐怖和痛苦的程度。他给我戴圣像的时候，我跪在地上；他扶我起来，拥抱我，给我祝福。

圣像是珐琅质的，绘着放在盘子上的施洗约翰[①]的砍下来的头。这是什么意思——榜样，忠告，还是预言？——我不知道，可是圣像的含义给我的印象很深。

我母亲几乎昏过去了。

所有的家仆陪着我走下楼，淌着眼泪，抢先吻我或者亲我的手，——我觉得我好像活着参加自己的葬礼一样。警察局长皱着眉头，催我走。

我们走出了大门，他把他的人集合起来；他一共带来四个哥萨克兵，两个警察长和两个警察。

"请让我回家吧。"坐在大门口的一个有胡子的人向警察局长说。

"去吧。"米勒尔说。

"这是什么人？"我坐上了马车，问道。

"见证人，[②] 您知道，没有见证人在场，警察就不能到人家里去。"

① 施洗约翰：耶稣以前的传道者，在犹太的旷野中传道，耶稣从他那里受洗。约翰后来被犹太王希律杀害，"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了希罗底的女儿。（见《新约·马太福音》第十四章。）

② 当时警察到人家搜查、逮捕人，需要有见证人在场。

“那么为什么您让他待在大门口呢?”

“这是空空洞洞的形式！不过白白地教人睡不成觉罢了。”米勒尔说。

我们由两个骑马的哥萨克兵护送走了。

警察分局里没有关押我的特别房间，警察局长吩咐把我关在办公室里待到早晨。他亲自把我带到那里；他连忙坐到一把扶手椅上，疲乏地打呵欠，嘟哝说：

“倒楣的差使，下午三点我就跑起，现在又跟您磨到天亮，——我看有三点多了吧，明天九点我还要去报告。”

“再见。”他过了一会又加上这一句，就出去了。一个军士用钥匙把我锁在房里，他说倘使我需要什么，可以敲门。

我打开了窗——白天已经开始，吹起了早晨的风；我向军士要了一点水，喝光了满满一大杯。丝毫没有想到睡觉。而且也没有地方可以躺下；办公室里除了几把龌龊的皮椅和一把扶手椅外，只有一张堆满公文的大桌子，角落里还有一张文件堆得更高的小桌。一盏光线微弱的小灯没法照亮整个房间，却在天花板上留下一个摇摇晃晃的光点，这个光点跟着天亮越来越淡了。

我坐在警察分局局长的座位上随手拿起桌子上的一份公文，——这是加加陵公爵的一个家仆的掩埋证和一份证明他的死亡完全合乎科学规律的诊断书。我拿起另一份公文，——这是警察条例。我匆匆地看了一遍，看到有一条说道：“每个被捕的人在被捕后三天有权知道他被捕的原因或者得到释放。”我记下了这个条款。

一个小时以后我从窗里看见我们的管事来了，他给我带来枕头、被子和大衣。他向军士要求什么，大概是央求准许他进来看我。他是个白头发的老人，我还是小孩的时候就给他的两、三个孩子祝过福。军士粗暴地、生硬地拒绝了他。我们的一个马车夫站在近旁。我在窗里叫唤他们。军士慌张起来，吩咐他们走开。老人向我深深地鞠躬，流着眼泪；马车夫打了一下马，揭下他的帽子，揩了揩眼睛，——马车开动了，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我的心情十分激动。这是我整个被捕入狱的时间里第一次也是末一次的眼泪。

清晨起办公室里逐渐满了人，录事来上班的时候还带着昨天晚上的酒意，这是一个患肺病的人，红头发，一张粗野、放荡的脸，脸上长满了小疙瘩。他穿了一件很脏的、剪裁得很坏的、磨得发亮的砖色燕尾服。在他之后来了另一个非常放肆的穿军士大衣的人。他马上对我发问道：

"您是在戏园子里给抓来的吗，先生？"

"我是在家里给逮捕的。"

"是费多尔·伊凡诺维奇亲自抓的吗？"

"费多尔·伊凡诺维奇是什么人？"

"米勒尔上校，先生。"

"对，是他。"

"我明白了，先生。"他向红头发使了一个眼色，红头发却毫无兴趣。这个世袭兵也不再谈下去了；他看见我既不是由于闹事、也不是由于酗酒被捕，对我完全失掉了兴趣，而且也许还害怕同一个*危险的*犯人交谈。

不久各种带睡容和醉意的警察官员们出现了，最后请求人、申诉人等等也来了。

一个妓院老鸨控告一个啤酒店老板，说他在他的店里当众辱骂她，他讲了极其下流的话，她是个女人，没法在官长面前把这些话重说一遍。啤酒店老板赌咒说他绝没有讲过那样的话。老鸨发誓说，他不止一次地讲过，而且是大声讲出来的；她又说，他还伸出手打她，要不是她埋下头躲开，她整个脸都会让他砸烂了。酒店掌柜的说，她，第一，不偿还欠他的债，第二，就在他的店里辱骂他，更坏的是她还恐吓他说，她的那班人要来把他揍个半死。

老鸨是一个不爱干净的高个子女人，有一对鼓胀的眼睛，讲起话来声音刺耳，又响又尖，而且非常喜欢讲话。酒店掌柜的使用表情和动作比讲话多。

所罗门[①]——警察长不去判断是非，把两个人都狠狠地骂了一顿。

"狗喂饱了，就要作怪，"他说，"你们这些浑蛋应当安分地待在家里，感谢我们没有作声而且纵容了你们。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你们吵起来了，马上跑来麻烦长官。你算个什么人物呢？好像对你是头一回一样——要称呼你不提到你干的那一行怎么成？"

啤酒店老板摇摇头耸耸肩表示十分满意。警察长立刻骂

① 所罗门：以色列王（前973—前约933），以智慧出名，有《所罗门的歌》、《所罗门的智慧》等著作。这里用"所罗门"（即贤明的警察长），有讽刺的意思。

起他来。

“你这狗，你在你柜台后面吠些什么？你想坐牢吗？你这个爱说下流话的东西！你举起你的爪子——你想尝尝桦树条的滋味是不是？”

对我来说这个场面有一种新奇的魅力，它长久地留在我的记忆里；这是我所见到的头一桩俄国家长作风的审理案件。

妓院老鸨和警察长一直叫嚷到警察分局局长进来为止。他也不问这些人为什么到这儿来，他们来干什么，他就用更粗野的声音大吼道：

“滚开，滚！难道这儿是澡堂，还是酒馆？”

他把这些“坏蛋”赶出去以后，又转身对警察长说：

“您让这儿乱成这样怎么不害臊？我跟您讲过好多次！要维持官府的尊严——像这些废物会把这儿弄得一团糟。您太放任这些骗子了。”他又指着我问道：“这个人是谁？”

“犯人，”警察长答道，“费多尔·伊凡诺维奇带来的，这里有公文，请看。”

警察分局局长把公文匆匆地看了一遍，又看了看我，不愉快地遇到了我朝他射过去的笔直的、毫不畏缩的眼光，知道他对我讲头一句话就会得到我同样的还击，便说了一句：“对不起。”

妓院老鸨和啤酒店老板的官司又打起来了；她坚决要求宣誓——来了一个教士；看来他们两方面都发了誓；我并没有看到结果。我让人带到警察总监那里去了，我不知道为了什么——没有人对我讲一句话，然后我又被带回警察分局来，这

里已经给我准备了一间屋子，就在瞭望台下面。那个军士告诉我，倘使我想吃什么，就得找人出去买，公家的伙食费还没有批下来，再过两天也不会批下来；而且它们不过三、四个银戈比，家境好的犯人也不会申请这笔伙食费。

靠墙放着一张不干净的长沙发，时间已经过了正午，我感到十分疲倦，便躺倒在长沙发上，睡得像死人一样。我醒来的时候，心里完全平静而且轻松。我最近因为得不到奥加略夫的消息非常焦急痛苦，现在轮到我了，危险不再是远远地望得见，而是布满在我的四周，乌云就在我的头上。这第一次的迫害应当是我们的就职典礼吧。

第十章

在瞭望台下面——里斯本警察长——放火犯

一个人倘使有一点内心的养料，他不久就会习惯于监狱生活。他很快地就会习惯笼子里面的宁静和充分自由——没有一点烦恼，也没有一点消遣。

起初不准送书进来；警察分局局长要我相信决不允许从家里拿书来。我要求他给我买书。“像什么教科书、语法书，也许能行，别的就得向将军请示。”读语法书来排遣寂寞的建议非常可笑，然而我却双手抓住这个机会，便要求警察分局局长替我买一本意大利语语法和一本辞典。我身上有两张十个卢布的钞票，就给了他一张；他马上派警官去买书并且把我写给警察总监的信交给他，在那封信里我根据我读到的那个条款要求警察总监让我知道我被捕的原因，不然就将我释放。

我当着警察分局局长的面写了这封信，他劝我不要把它送出去。“这是不对的，先生，凭着上帝说，去麻烦将军是不对的，先生。——他会说：‘这些不安分的人’，对您不利，不管怎

样不会有好处。"

晚上警察长出现了，他告诉我警察总监吩咐他对我说在适当的时间里我会知道我被捕的原因。随后他从衣袋里掏出一本满是油迹的意大利语语法，带笑说："幸而这里面有词汇表，用不着买辞典了。"他完全不提找回的钱。我还想再给警察总监写信，可是在普列契斯千斯基督察分局里充当一个小型汉普登[①] 的脚色，我感觉到太可笑了。

我被捕后一个半星期，有一天晚上九、十点钟，一个黑黝黝的、麻脸的、身材矮小的警察长带着命令来叫我穿好衣服到侦讯委员会去。

我正在穿衣服的时候，发生了下面这件可笑而又不愉快的事情。我的午饭是从家里送来的，仆人把它交给下面值班的军士，军士差一个警兵给我送上来。许可每天给我送来半瓶到一瓶的葡萄酒。尼·沙左诺夫[②] 利用这个许可给我送了一瓶上等的约翰尼斯堡葡萄酒[③] 来。警兵和我两人居然用两根钉子弄开了瓶塞；酒的香味老远就闻到了。我打算享用它三四天。

只有坐过监牢的人才知道一个人身上还保留着多少孩子气，从一瓶葡萄酒到作弄守卫这样的小事都会使人感到十分高兴。

---

① 约翰·汉普登：参看第二七六页注⑤。他曾因拒绝缴纳非法的税款而入狱。

② 尼·沙左诺夫：赫尔岑-奥加略夫小组的成员，参看第二一六页注①。

③ 指德国约翰尼斯堡出产的上等白葡萄酒。

麻脸的警察长发现了我的酒瓶，便转身向我要求允许他尝一尝。我并不愿意；然而我还是说我很愉快。我没有酒杯。这个恶棍拿了一只大玻璃杯，把酒斟得不能再满，一口气喝得光光的；像这样地喝酒，只有俄罗斯人和波兰人办得到；我后来在整个欧洲也没有见过有人一口气喝干一大玻璃杯的酒，或者能一口喝光一酒杯。使我对这一大玻璃杯酒的损失感到更难受的，是他用一张给鼻烟弄脏了的蓝手帕揩他的嘴唇，向我道谢，说了一句："非常好的马德拉[①]。"我狠狠地瞅了他一眼，幸灾乐祸地高兴没有人给这个警察长种牛痘，大自然对他也没有吝惜天花。

这个喝酒的行家把我带到特威尔大道上警察总监的公署里去，引进一间侧厅，就让我一个人待在那里。半小时以后，一个胖胖的人从里面房间走了出来，他脸上带着懒散的、和善的表情；他把一个装文件的公事包扔在椅子上，又把站在门口的宪兵差遣走了。

"您大概是，"他对我说，"同最近被捕的奥加略夫和其他年轻人的案子有关系的吧？"

我说是。

"我偶然听到一点，"他继续说，"奇怪的案子，我一点儿也不明白。"

"我牵连在这个案子里面，坐了两个星期的牢了，我不但一点儿也不明白，而且我什么也不知道。"

① 马德拉：大西洋中马德拉岛上产的白葡萄酒。

“这倒很好，”他说，注意地望着我，“您什么也不用知道。请原谅我，我要向您进个忠告：您年纪轻，血气盛，您想讲出来——麻烦就在这儿；不要忘记您什么也不知道，这是唯一的生路。”

我惊讶地望着他：他脸上没有露出丝毫的恶意；他猜到了我的心理，便含笑说：

“我自己十二年前也是莫斯科大学的学生。”

一个官员进来了；胖子以上级的身份向他转过身来，发了些指示，讲完话便出去了，临走对我友好地点一下头，还把手指放在嘴唇上。我以后就再没有遇见这位先生，我并不知道他是谁；然而他劝告的诚意我是感觉到了的。

随后警察局长进来了，是另外一个，不是费多尔·伊凡诺维奇，他叫我到委员会去。在一间大的、相当漂亮的厅子里，五个人坐在桌子后面，除了一个衰老的老人外都穿着军服。他们抽着雪茄烟，在愉快地聊天，解开了军服的钮扣，手足伸开懒洋洋地坐在扶手椅上。警察总监主持审讯。

我走进去的时候，他转身向着一个谦恭地坐在角落里的人形说：

“神甫，请吧。”

只有在这个时候我才注意到角落里坐了一个老教士，他有一张青红色的脸和一部灰色胡子。教士在打瞌睡，想回家，心里想的是别的事情，用手掩着嘴在打呵欠。他懒洋洋地、有点拉长声调地告诫我，他谈起在沙皇委派的官员面前隐瞒真相的罪过，又谈到巧辩的无用，因为上帝的耳朵是什么都听得

见的;他甚至没有忘记引用像“没有权柄不是出于上帝”、“该撒的物当归该撒”[①] 这一类永远不变的经文。在讲话结束的时候他还说我应当虔诚地吻神圣的《福音书》和洁白的十字架来证明我那愿意真诚、坦白地讲出真相的誓言(可是我并没有宣誓,他也不曾坚持)。

他讲完了,连忙包好《福音书》和十字架。曾斯基(警察总监)从座位上稍微欠了欠身,告诉他,他可以走了。这以后曾斯基转身朝着我,把那篇宗教的演说翻译成世俗的语言:

“对于教士讲过的话,我只补充一点:您不可以抵赖,即使您想抵赖也没有用。”

他指着故意散乱地放在桌上的那一堆堆文件、信函和相片。

“只有坦白地招认才可以得到从宽发落;或者释放,或者到博布鲁伊斯克[②],到高加索,——这由您自己决定。”

问题是用书面提出来的;有几个问题天真得叫人吃惊:“您知道任何秘密团体的存在吗?您参加过文学团体或者其他任何团体吗?它的成员是些什么人?他们在什么地方聚会?”

对这一切问题,很容易用一个“不”字来回答。

“我看,您什么都不知道,”曾斯基看过了我的回答以后

① 见《新约全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三篇。该撒即罗马的独裁者朱·恺撒(前100—前44)。

② 博布鲁伊斯克:白俄罗斯的城市,在明斯克的东南。

说，“我警告过您，——您将会使您的情况变得更加复杂。”

第一次审讯就这样结束了。①

……八年后就在侦讯委员会所在的这座房子的另外一部分，住着一位曾经是美人而现在她的女儿又很美丽的女人，她就是新警察总监的妹妹②。

我经常到她们那里去；每一次我都要走过曾斯基一伙审讯和管教我们的那个厅子；厅子里当时和以后一直挂着保罗〔一世〕的肖像——这究竟是为了提醒人们：专横跋扈和滥用权力会使人堕落到什么程度，还是为了鼓励警察使用一切残暴手段，我不知道，不过他挂在那里，手里拿着手杖，翘鼻子，皱眉毛。我每一次来，不论从前是作为犯人，现在是作为客人，我都要站在肖像前看一看。旁边那间弥漫着美丽和女性的芳香的小客厅同这所进行侦讯的森严的房屋显得不调和；我在这里感觉到很不痛快，我有些惋惜那么鲜艳的花会开放在拘留所的阴暗的砖墙里。在这些听惯了审问、告密和挨户搜查的报告的墙壁里面——在这些把我们跟警察官员的小声讲话、跟犯人的唉声叹气、跟宪兵的靴上马刺、跟乌拉尔河流域哥萨克兵军刀的响声分隔开来的墙壁里面，我们讲的话和聚在这里的小圈子的朋友们讲的话听起来非常带讽刺味道，

① 这次审讯是在一八三四年七月二十四日进行的，一共提出了十五个问题，作者用书面回答。

② 新警察总监的妹妹：指伊·德·卢仁的妹妹玛·德·霍符利娜（1801—1877），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同文学界接近，经常接待莫斯科的进步人士。

非常刺耳……

一两个星期以后麻脸的警察长又来了，他又把我带到曾斯基那里去。门廊里坐着或者躺着几个戴镣铐的人，由带枪的兵围在四周看守着；穿堂里也有几个人，属于不同的阶层，没有戴镣铐，但是看守很严。警察长告诉我这些人都是放火犯。曾斯基到起火的现场去了，我们得等候他回来；我们是晚上九点到十点之间来的；到夜里一点钟还没有人问过我，我仍然非常安静地同放火犯一起坐在穿堂里。放火犯一个一个地给叫了出去，警察前前后后跑来跑去，镣铐一路响着，兵感到无聊，就玩着枪弄出响声，做操练的动作。一点钟光景曾斯基来了，一身烟黑、龌龊，并不停留就匆匆跑进了书房。大约过了半个小时，我那位警察长给叫了进去；他回来的时候脸色惨白，张惶失措，脸上现出痉挛性的哆嗦。曾斯基在他背后探头出来，说：

"赫尔岑先生[①]，全委员会的人等您等了整整一个晚上，本来要您到戈里曾公爵那儿去，这个糊涂虫却把您带到这儿来。我很抱歉，让您在这儿等了这么久，然而这不是我的错。对这种执达员有什么办法呢？我看，他工作了五十年了，却还是个笨蛋。"他换上更粗暴的声调对警察长说："好吧，现在回去！"

警察长在路上一直不停地唠叨：

"上帝啊，多么倒楣！人想不到、也预料不到自己会碰到

① 原文是法语"麦歇"(monsieur)。

什么事情,——好,现在他准跟我没有完了。倘使那儿并没有等您,他倒满不在乎,可现在他觉得丢脸了。上帝啊,多么不幸!”

我原谅他喝了我的来因葡萄酒,特别是他告诉我他在里斯本[①]附近差一点淹死的时候,也不像现在这样害怕。这句话是我完全没有料到的,我忍不住发出了一阵狂笑。

“您怎么会到里斯本呢?得啦吧,哪里会有这种事!”我问他道。

老头子当了二十五年以上的海军军官。我们不能不同意那位大臣要戈贝金大尉相信的话:“在俄国如果有一个人给他的祖国是所谓尽了义务,对这样的人置之不理,是还未有过先例的。”[②]命运在里斯本救了他,只是为了让他在担任公职四十年之后给曾斯基当作用人辱骂。

很难说是他有错。

皇上不满意由总督成立的侦讯委员会;[③]他任命了一个新的委员会,由谢尔盖·米哈依洛维奇·戈里曾公爵来主持。这个委员会的成员是:莫斯科要塞司令斯塔阿尔[④]、另一个戈

---

① 里斯本:南欧国家葡萄牙的首都。

② 这一句话是从果戈理的长篇小说《死魂灵》第十章《戈贝金大尉的故事》中引来的(引用鲁迅的译文)。

③ 第一个侦讯委员会从一八三四年七月二十四日工作到八月七日,由尼古拉一世下令撤销。

④ 卡·古·斯塔阿尔(1777—1859):参加过一八一二年的卫国战争,一八三〇至一八五三年任莫斯科要塞司令。

里曾公爵[①]、宪兵上校舒宾斯基、前军事法庭检察官奥兰斯基[②]。

警察总监的命令并没有提起委员会变更的事，无怪乎里斯本的警察长就把我带到曾斯基那里去了……

警察分局里也十分惊惶：一个晚上发生三起火灾，然后侦讯委员会两次派人来问我出了什么事情，是不是我逃走了。曾斯基在申斥中没有提到的事，警察分局局长现在对里斯本的英雄讲出来了；这是料得到的事情，因为警察分局局长本人也有责任，他并没有问明白应当把我带到哪里去。办公室一个角落里有人躺在几把椅子上呻吟；我看了看，——是一个年轻人，长得漂亮，衣服整洁，他在吐血、呻唤；分局的医生建议早晨尽早地送他到医院去。

军士把我送回到我的房间，那个时候我从他那里打听出来受伤的人的故事。他是一个退伍的禁卫军军官，他同某一家的女仆相好，这一家的厢房起火的时候，他正在她的房里。这是放火恐怖最厉害的时期；的确没有一天我不曾听见三、四次警钟；每天夜间我都从窗里看到两三处火光。警察和居民都在拚命地搜索放火的人。军官为了不要连累那个姑娘，在听到火警的时候，马上翻过篱笆，躲在隔壁人家的板棚里，等待机会出去。一个小姑娘在院子里看见他，就向头几个骑马

① 指亚·费·戈里曾，又称小戈里曾（1796—1864）：御前侍从，在尼古拉一世时期主持第三厅的工作。

② 尼·季·奥兰斯基：莫斯科总督办公室秘书，在两次的侦讯委员会中担任秘书职务。

跑来的警察报告:放火的人躲在板棚里面;他们带着一群人冲了进去,扬扬得意地把军官拖了出来。他挨了一顿饱打,第二天大清早就死了。

对抓到的人都进行了审查;有一半释放了,其余的作为嫌疑犯给拘留起来。警察局长布利扬恰尼诺夫每天早晨要坐车来审问他们三、四个小时。有时候用鞭子抽受审的人或者打他们;那个时候他们的号哭、叫嚷、哀求、尖声叫,女人的呻吟同警察局长刺耳的声音和办事员单调的宣读声一起传到了我这里。这是很可怕的,叫人忍受不了的。夜里我梦到了这些声音,醒来的时候我想到这些受害人就在离我只有几步远的地方,躺在干草上,戴着镣铐,背上给打得皮开肉绽,而且很可能他们一点罪也没有,一想到这些,我真是气愤若狂。

要了解俄国监狱、俄国法庭和俄国警察的真相,必须做农民、家仆、手艺人或者小市民才行。政治犯大多数都属于贵族,对他们看守严密,处罚也很凶残;然而他们的命运不能同大胡子的穷人的命运相比。对待穷人,警察是不会客气的。农民或者手艺人以后能够向谁控诉呢?到哪里去伸冤呢?

俄国法庭和俄国警察的紊乱、野蛮、专横和腐败已经到了极点,因此一个普通人落到了法网里面,他害怕的并不是法庭的判刑,而是审判程序本身。他焦急地等待着他给流放到西伯利亚去的时候,——他的处罚开始执行,就是他受难的结束。现在让我们记住,警察当作嫌疑犯抓来的人,有四分之三都在审讯的时候被法庭无罪释放,但他们和罪人一样受尽了

拷打。

彼得三世废除了拷问和秘密室。①

叶卡捷琳娜二世废除了刑讯。②

亚历山大一世又一次废除了它。③

"在威胁下"作的回答是法律所不承认的。拷问过被告的官员本人就要受到审判和严厉的制裁。

然而在俄国全国,从白令海峡到陶罗根,人们一直受着拷打;在不便用鞭子、树条抽打的地方,他们就用忍受不了的热、渴和咸的饮食来进行拷问。在莫斯科,警察在零下十度的天气叫一个赤足的被告人站在一块铁板上——他就得病,死在美谢尔斯基公爵④ 管辖的医院里,公爵很愤慨地谈起这件事情。当局完全知道这一切,但是省长们包庇它,有最高政治权力的枢密院也纵容它,大臣们不作声;皇上和东正教事务总管理局、地主和警察长——全同意绥里方的话:"农奴是应该给点鞭子的,要不然就不听话。"⑤

奉命侦查放火案的委员会审讯了,也就是说鞭打了连续六个月,却什么也没有打出来。皇上发了火,下令三天里结束这个案子。案子在三天里结束了;罪人查出来了,判处了鞭

① 沙皇彼得三世在一七六二年二月二十一日下令废除"秘密侦讯室"。

② 叶卡捷琳娜二世在一七六三年二月十日下令限制使用刑讯。一七七四年十一月八日她又密令禁止刑讯。

③ 亚历山大一世在一八〇一年九月二十七日下令废除刑讯。

④ 美谢尔斯基公爵:莫斯科医院的总督官。

⑤ 绥里方是果戈理的小说《死魂灵》中主人公乞乞科夫的马夫,他的这句话见《死魂灵》(鲁迅译)第一部第三章。

打、打火印和流放去作苦工等等刑罚。每所房屋的管院子的人都给召集起来观看“放火犯”受到严惩。那个时候已经是冬天了，我给关在克鲁季次营房里面。这次的行刑，宪兵大尉也在场，他是一个好心肠的老头子，他对我讲了详细的情况，我转述在这里。头一个判处鞭刑的人大声告诉人们，他发誓他没有罪，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在忍痛不过的情况下招认了些什么，然后他脱掉衬衫，转过身去，背朝着人群，说：“你们看啊，信东正教的同胞们！”

人丛中发出一阵恐怖的惊叹声；他的背上现出一道道青条子的伤痕，在这些伤痕上面他还要挨新的鞭子。群众的怨声和阴沉的面容逼得警察赶快地收了场。行刑人打完了法定的鞭数，有的人给犯人打了火印，有的人给犯人钉上了脚镣，事情似乎结束了。然而这个场面使一般居民感到震惊；在莫斯科各个阶层的人都在谈论这件事。总督向皇上报告了。皇上下令重新审讯，特别是对那个在行刑前提出抗议的放火犯的案件进行复查。

几个月以后我在报上读到这样的消息：皇上为了赔偿两个无辜受到鞭刑的人的损失，下令对每一下鞭打赔偿二百卢布，并且发给他们每人一份特别证书，证明他们虽然给打上了火印，却并没有犯罪。这两个人就是向群众讲话的“放火犯”和他的一个同案人。

一八三四年莫斯科接连大火的故事（十年后在各省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到现在还是一个谜。有人放火，这是毫无疑问的；总的说来，火，所谓“红公鸡”，在我国是带强烈国民性的

复仇工具。我们经常听说地主的庄园、谷物干燥室、粮仓给人烧掉。然而一八三四年莫斯科接连大火的起因，却没有人知道，委员会的成员尤其不知道。

在八月二十二日加冕日[1] 之前，有些调皮捣蛋的人在各处投递信件，通知居民不用为彩灯操心，会有很漂亮的焰火。

胆小的莫斯科当局惊慌起来。从早晨起警察分局里就挤满了兵士，还有一连枪骑兵驻扎在院子里。晚上，骑马的和步行的巡逻队一直在各条街道巡逻。练兵大厦内，炮兵已作好了准备。警察局长们带着哥萨克兵和宪兵各处跑来跑去，戈里曾公爵[2] 亲自带着副官骑马在城内巡视。文雅的莫斯科的这种战争面目显得很古怪，它刺激着人们的神经。我斜躺在瞭望台底下的窗台上，望着院子，一直到夜深。……下了马的枪骑兵三五成群地坐在他们马的旁边，另一些正纵身上马；军官们来回走动，用轻视的眼光看看警察，戴黄色领子的要塞副官们[3]带着焦虑的表情骑马跑来，什么事也没有做，就走了。

火灾并没有发生。

紧接着皇上亲自到莫斯科来了。他不满意刚刚开始的对我们的侦讯，他不满意仍然由普通警察管理我们，他不满意放火犯始终没有查出来。一句话，他对一切事和一切人都不满意。

我们很快地就感觉到最高当局驾到了。

---

① 加冕日：一八二六年八月二十二日尼古拉一世在莫斯科举行加冕典礼。

② 戈里曾公爵：指德·瓦·戈里曾，参看第一一一页注①。

③ 指卫戍司令部执行特殊任务的军官。

第十一章

克鲁季次营房——宪兵的故事——军官们

皇上到后三天，已经是夜里了——所有这一类事情都是在黑暗中做的，免得惊动居民——一个警官带着命令来，要我收拾好东西跟他一起走。

“到哪儿去？”我问道。

“您会看见的。”警官聪明而有礼貌地答道。随后不用说我不再发问，收拾好我的东西，动身走了。

我们坐车走着走着，走了大约一个半小时，最后经过了西门诺夫修道院，车子停在沉重的石头大门前面，有两个拿着卡宾枪的宪兵在门前走来走去。这是克鲁季次修道院，早已改做了宪兵的营房。[1]

我给带进了一间不大的办公室。录事、副官、军官们全穿浅蓝色的衣服。值日的军官戴着头盔，穿着全套军装，他请我等一等，甚至建议我点燃手里拿的烟斗抽袋烟。这以后他便写了一张收到一名犯人的收条；他把收条交给了警官，便出去

---

[1] 克鲁季次修道院改做兵营，是从十八世纪末期开始的。

了,后来同另外一个军官一起走了回来。

"您的房间准备好了,"另外那个军官对我说,"我们去吧。"

一个宪兵给我们拿着蜡烛,我们走下楼梯,走了几步路,跨过院子,通过一扇小门走进了一道长廊;长廊上只点着一盏灯,两边都有一扇扇不大的门,值日军官打开了其中的一扇;这扇门通入一间小小的守卫室,守卫室后面还有一间小屋子,房里又潮、又冷,还有一股地窖的气味。那个带我来的肩上有缨带的军官便用法语对我说,他 désolé d'être dans la nécessité〔法语:非常抱歉必须〕[1]搜查我的口袋,然而军人职务、职责、服从……在这一段漂亮动听的开场白之后,他就干脆对着宪兵用眼光指了指我。宪兵马上把他那只大得叫人不能相信的长毛的手伸到我的口袋里来。我对那位彬彬有礼的军官说,这是完全不必要的,倘使他愿意的话,我自己可以把口袋里的东西全翻出来,用不着这种强制手段。而且我已经关了一个半月,还能够有什么呢?

"我们知道,"那个肩上有缨带的军官带着一种无法摹仿的得意微笑道,"我们知道这些警察分局的规矩。"

值日军官也讽刺地笑了笑,不过他们告诉宪兵只要看看就行了;我把口袋里所有的东西全掏了出来。

"把您的烟草倒在桌子上。"désolé〔法语:非常抱歉的〕军官说。

①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很不愿意(搜查您的口袋)……

我的烟荷包里面有一把裁纸小刀和一支铅笔，是用纸包着的；我一开头就想着它们，我在同军官讲话的时候一面拿烟荷包在玩，一直到我的手拿到了小刀，我在外面捏住荷包里的小刀，大胆地把烟丝全倒在桌子上，宪兵又把烟草装了进去。小刀和铅笔就给保住了；对那个肩上有缨带的宪兵队军官说来，这就是他傲慢地瞧不起普通警察的一个教训。

这件事使我十分高兴，我就愉快地开始查看我这个新居。

在那些三百年以前修建、后来已经下沉到地里的修道小室中间，有几间给安排为关政治犯的世俗的单人牢房。

我的房间里有一张没有铺床垫的床，一张小桌子，桌上一个带把的杯子盛了水，桌旁有一把椅子，一只大的铜烛台上面燃着一支细的脂油烛。潮湿和寒冷刺到了人的骨头；军官吩咐生起火炉，随后他们全走了。一个兵答应送点干草来；我暂时把大衣放在脑袋底下，躺在光光的床上，点燃了我的烟斗。

过了一会，我发现天花板上爬满了“普鲁士”蟑螂。它们好久没有看见烛光了，就从四面八方朝着有光的地方跑来，挤在一起，忙乱一阵，落到桌子上，然后顺着桌子边，慌忙地跑来跑去。

我不喜欢黑蟑螂，正如我不喜欢一切不速之客那样；我这些邻居使我感到十分厌恶，可是我毫无办法，我总不能一开头就抱怨有黑蟑螂，我的神经只好屈服。然而两三天以后所有这些普鲁士家伙都跑到隔壁兵的房间里去了，因为那里比较暖和；只是偶尔有一只孤单的蟑螂跑了进来，摆动它的胡须，又马上跑回去取暖了。

不管我多少次向宪兵提出要求，他始终把火炉关上。我开始感到不舒服，头发晕，我想下床去敲兵的房门；我果然起来了，可是我记得的东西也就到此为止了……

……我恢复知觉的时候，我躺在地板上，头痛得厉害。一个高身材、白头发的宪兵抄着手站在旁边，眼睛毫无表情地注视着我，就像在著名的铜像上一条狗注视着一只乌龟那样。

"您很厉害地中了煤气毒，先生。"他看见我清醒过来，就这样说，"我给您拿来了洋姜同盐和克瓦斯；我已经让您闻过了，现在您喝下去吧。"

我喝下去了，他把我扶起来，放到床上去；我还是很不好过，这里的窗是双层的，又没有通风小窗；兵就到办公室去要求准许我到院子里走走；值日军官说，上校和副官都不在，他负不起这个责任。这样我就不得不留在有煤气的房间里面。

我连克鲁季次营房也住惯了，学习意大利语动词的变位，读一点无聊的小书。起初相当严格地照规则办事。晚上九点钟熄灯的军号声刚落，兵就走进我的房间，吹灭蜡烛，锁好门。从晚上九点到第二天早晨八点，我只好在黑暗中坐过去。我从不贪睡，我在监牢里一动也不动，睡四个小时就足够了——没有蜡烛不就是够大的惩罚吗？而且哨兵们每一刻钟从走廊的两边发出拖长的大声叫喊："听—听—着！"①

过了几个星期，谢美诺夫上校（著名女演员谢美诺娃即后

① 沙俄时代哨兵夜里互相呼应的用语。

来的加加陵公爵夫人的兄弟)[①] 允许晚上给我留下一支蜡烛,却禁止在窗上挂任何东西,窗户比院子低,因此哨兵可以看见犯人的一举一动,他还命令哨兵不要在廊上喊“听着”。

后来要塞司令[②] 允许给我们墨水,还让我们在院子里散步。还给我们一定数量的纸,不过有一个条件:不能撕毁一张。我还可以每隔二十四小时一次由一个兵和值日军官陪同到那个有围墙的和哨兵线内的院子里去散步。

生活单调地、安安静静地过去了,军队的严格遵守时间给这生活添了一种类似一行诗中间的停顿那样机械的准确性。早晨我得到宪兵的帮助,在火炉上煮好咖啡;十点,值日军官戴上大翻袖口的手套,戴着头盔,穿着军大衣,军刀一路响着,带了几立方英尺的冷气走进来;一点,宪兵送来一块脏的餐巾和一碗汤,他总是拿着碗边,因此他的两根大拇指显然比其他的手指干净些。我们的伙食还算不错,可是不应该忘记我们每天要付两个纸卢布的伙食费,九个月监禁中的费用合在一起,对没有钱的人来说也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数目。一个犯人的父亲干脆说他没有钱;他得到的是冷酷的回答:从他的薪金中扣除。要是他没有薪金,他很可能坐牢。

此外,我还应当指出,要塞司令办公厅为了我们的伙食每天补贴营房的谢美诺夫上校一个半卢布。这件事情几乎闹了

① 伊·谢·谢美诺夫(1797—1848):驻克鲁季次营房宪兵营的上校司令。他的姐姐叶·谢·谢美诺娃(1786—1849)是著名悲剧女演员,后来同加加陵公爵结婚。

② 要塞司令:指卡·古·斯塔阿尔。

出来，可是得到好处的要塞副官们给宪兵队送来剧院首次演出和游艺会的包厢座票子，事情就结束了。

太阳落下以后，这里非常静，这样的静寂并不曾让我窗前雪地上兵的咯吱的脚步声或者哨兵们远远的呼声打破。我通常总是读书到一点，然后吹灭蜡烛。睡眠使我得到了自由，有时候我迷迷糊糊地好像觉得：呸，我做了一个多可怕的噩梦——监狱、宪兵，我很高兴，这完全是梦，可是突然间不是廊上响起了军刀的声音，就是值日军官带着一个提灯的兵来打开门，不然就是哨兵凶暴地叫喊："谁?"再不然就是在我的窗下吹起了小号，它那尖尖的"起床号"划破了清晨的空气……

在烦闷无聊、不想读书的时候，我就同看守我的宪兵们、特别是同我中煤气毒的时候治好我的那个老头子聊天。上校为了照顾老兵，免除他们的勤务，派他们担任看守囚犯这种轻闲的职务；由一个上等兵(他是一个奸细和流氓)管他们。担任这个工作的一共有五、六个宪兵。

我提到的这个老头子是一个憨厚、善良的人，他受到一点恩惠就一定报答，而他一生中受到的恩惠大概也不多。他参加了一八一二年的战争，胸前挂满了奖章；他的服役期满了，他自愿留在军队里，因为他没有可去的地方。

"我，"他说，"两次给莫吉列夫省家乡去了信，都没有回信，分明是我家里没有人了；那么回到家乡也并不好受，像倒楣蛋那样住一阵子，就到处流浪，靠讨饭过日子。"

俄国的兵役和它那吓人听闻的服役期限安排得多么野蛮残酷！在我们国家里人的个性到处受到摧残，毫不顾惜，也毫

无赔偿。

老菲里莫诺夫自负很懂德国话，那是他在攻陷巴黎以后在冬季宿营地学的。他很巧妙地用德国话的词来说明俄国的实物：叫马做“费尔特”，蛋做“叶雷”，鱼做“皮希”，燕麦做“奥别尔”，油煎薄饼做“潘库希”①。

他讲的那些故事带了一种天真的味道，这使我悲伤，也使我沉思。在一八〇五年土耳其战争时期，他在摩尔达维亚，在一个大尉的连里，这个大尉是世界上最善良的人，他对待每个兵就像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战斗的时候他总是跑在前头。

“一个摩尔达维亚姑娘迷住了他；我们看见：我们的连长心神不定，您知道，他发觉那个姑娘同另一个军官有来往。所以有一天他就把我和另一个弟兄找了去(这个弟兄是一个很好的兵，他后来在小雅罗斯拉威次给打断了两条腿)，告诉我们那个摩尔达维亚姑娘怎样欺侮他，问我们是不是愿意帮忙他，给她一个教训。我们对他说：‘那还用说，我们任何时候都高兴给长官尽力。’他表示感谢，并且指给我们看那个军官住的房子，又说：‘你们晚上在桥上待着，她一定会到他那儿去，你们悄悄地捉住她，把她扔到河里。’我们对他说：‘长官，办得到，’我和那个弟兄就准备了一个口袋。先生，我们就坐在那儿，快到半夜，摩尔达维亚姑娘跑过来了。我们说：‘小姐，您忙什么？’就给了她的头上一下；这个小姑娘，她一声也没有

① 德语：马是 pferd；蛋是 eier；鱼是 fisch；燕麦是 hafer；油煎薄饼是 pfannkuchen。他的发音都不准确。

叫，我们就把她装进口袋扔到河里去了。第二天大尉就去找军官，告诉他：'您不要生摩尔达维亚姑娘的气，我们把她扣留了一会儿，也就是说，她现在躺在河里，至于您呢，我打算找您玩玩儿，玩儿军刀还是玩儿手枪，随您的便。'他们就互相砍杀起来了。军官在大尉的胸前狠狠地砍了一刀，这个可怜的好人就蔫下去了，大约三个月以后就把灵魂交给上帝了。"

"摩尔达维亚姑娘呢，"我问道，"她就这么淹死了吗？"

"淹死了，先生。"兵答道。

我惊奇地望着老宪兵对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那种天真的、毫不在乎的神情。他好像头一次猜到了或者想到了这个，为了使我心安，也安慰自己的良心，便补充了一句：

"她是个邪教徒，先生，反正是一个没有受过洗礼的人，这样一种人。"

每逢沙皇的节日宪兵们都有一杯伏特加喝。司务长同意让菲里莫诺夫五、六次不喝酒积起来一次发给他；菲里莫诺夫在木头号牌上记下他积存了多少杯酒，到了最大的节日他就去把它们一次领回来。他把酒盛在一个碗里，把面包弄碎泡在酒里面，然后用汤匙舀着吃。他这样吃过以后，就点燃他那只烟嘴小的大烟斗，里面装的烟叶劲大得叫人不能相信，他总是自己切碎它，因此俏皮地叫它做"自切牌"。他抽烟的时候，就躺在小小的窗台上（兵的房间里没有椅子），而且拼命折弯身子缩做一团唱起这首歌来：

姑娘来到草地上，

那里有繁茂的绿草，又有鲜花。

他的酒喝得越多，唱词就越是不清楚——“花”就变成“画”、“话”、“活”，一直唱到他睡着了。这个人两次受了伤，而且在六十多岁还可以这样吃喝，他的身体真是健康！

在我离开这些沃威尔曼①—卡洛②式的弗来米画派③兵营画和结束这些监狱闲话（它们类似所有被迫坐牢者的回忆录）之前，我还要谈点军官们的事情。

大多数的军官都是相当善良的人，他们完全不是什么奸细，不过是偶然参加到宪兵队里来的。受教育不多、或者没有受过教育、又没有财产的年轻贵族们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安身，他们当了宪兵，只是因为找不到别的工作。他们按照军人的严格遵守纪律执行他们的任务，然而我在他们任何一个人身上，都看不到一点点劲头，只是除了那个副官，但是正因为这个他才当了副官。

军官们和我相熟了以后，他们极力设法给我一些小的方便，减轻我的痛苦，我完全没有理由讲他们的坏话。

一个年轻的军官告诉我一八三一年他给派去搜捕一个躲

① 费·沃威尔曼（1619—1668）：十九世纪弗来米画派的荷兰画家，作品大都表现战马和兵营等等。

② 雅·卡洛（1592—1635）：法国画家和版画雕刻家，作品多数表现乞食者、流浪音乐家、兵士等人的生活，也表现战争的悲惨。

③ 弗来米画派：一般指十四世纪到十七世纪在弗兰德斯兴起的画派。过去的弗兰德斯包括目前的比利时、荷兰南部和法国北部（现在的弗兰德斯是比利时王国的两个州）。

在自己庄园附近的波兰地主。这个人的罪名是同密使[1]有联系。军官根据他所收集到的情报，知道那个地主隐藏的地点，就带了一队人到那里去，把房子包围了，自己带着两个宪兵走进里面。房子是空空的；每个房间他们都进去过，到处都搜查了，没有找到一个人，然而有些细小迹象明显地说明这所房子里面最近还有人住过。这个年轻人叫宪兵们待在下面，他第二次到顶楼上面去；他注意地检查四周，看见有一道小门通到小贮藏室或者什么小房间；门是从里面锁的，他用脚踢门，门开了，一个高高的、漂亮的女人站在门口；她默默地指给他看一个男人，他怀里抱着一个差不多失去知觉的十二岁光景的小姑娘。这就是那个波兰人和他的一家。军官感到为难了。那个高高的女人看出了这一点，就问他：

"您要狠心地弄死他们吗？"

军官道了歉，说了些关于绝对服从、关于职责的老一套废话，最后看见他的话一点也不起作用，就绝望地问：

"我该怎么办呢？"

女人高傲地望着他，用手指着门说：

"走下去，告诉他们，这儿没有人。"

"说实在话，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发生的，我自己是怎么了，"军官对我说，"可是我从顶楼下去，吩咐军士集合队伍。过了大约两个小时，我们又在另外的地点认真地搜寻他，而这

[1] 密使：一八三〇至一八三一年波兰起义时期成立的波兰革命政府的特派员。

时他正在偷越国境。唉，女人啊！我承认！”

……世界上再没有比用标签、用道德的分类、用行业的主要特点对整个阶层加以笼统的谴责更残酷、更眼光狭窄的了。名称是可怕的东西。让-保·利席特尔[①] 说得非常对：“倘使一个小孩撒谎，要让他因为自己的坏的行为感到害怕，就告诉他，他撒了谎，却绝不要对他说他是一个撒谎的人。您断定他是撒谎的人，这样就伤害了他道德上的自信心。人们告诉我们‘这是杀人犯’，我们仿佛马上就看见一把暗藏的匕首、凶狠的表情、恶毒的阴谋，好像杀人就是那个一生中偶然一次杀了人的人的行业，他的终身职业。一个人既然做了奸细，拿别人的道德败坏做买卖，就不可能同时是一个正直的人，然而做一个宪兵队军官却可以不完全失去人的尊严，正如我们在‘社会道德败坏’的不幸的受害者中间经常可以遇到心地和善的甚至高贵的女性那样。”

我讨厌这样一种人：他们不能或者不肯淘神费力走到名称以外，跨过犯罪的障碍、跨过错综复杂的不明白的身份的障碍，却只是清高地避开这些障碍，再不然就是粗暴地推开它们。那些远离现实的、枯燥冷酷的、自私自利的、自己纯洁得令人厌恶的人或者那些还没有机会暴露或者还不需要暴露自己的卑鄙、庸俗的人经常就是这样做的；他们说是出于同情在别人失足掉进去的肮脏的底层里倒会安之若素。

---

① 让-保·利席特尔(1763—1825)：德国浪漫主义的小说家和讽刺作家，经常用“让·保尔”的笔名发表作品。

第十二章

侦讯——大戈里曾——小戈里曾——斯塔阿尔将军——索科洛夫斯基——判决

……然而我们的案子究竟怎样了呢，侦讯和审判究竟怎样了呢？

新的委员会的工作进行得并不比旧的委员会顺利。警察已经监视我们好久了，然而他们没有耐心，又很着急，不能等到适当时机找到借口，却干了蠢事。他们派了一个叫做斯卡里雅特卡的退伍军官来把我们诱进圈套，以便揭发我们；他同我们圈子里的人几乎全认识了，可是我们很快就觉察出来他是什么样的人，跟他疏远了。其他的年轻人，大多数是大学生，却并不是这样小心，然而这些年轻人同我们并没有任何正式的关系。

有一个大学生[1] 念完了大学的课程，在一八三四年六月二十四日邀请他的朋友们吃一顿饭。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参加宴会，的确没有一个人接到邀请。这些年轻人酒喝得太多，

[1] 大学生：指作者的同学叶·彼·马希科符采夫(1812—1855)。

胡闹起哄，跳起玛组卡舞[①] 来，还合唱了索科洛夫斯基[②] 的那首有名的歌：

俄国皇帝
升了天，
外科医生
划开他的肚皮。

国家在哭，
老百姓都在哭，
丑八怪的康斯坦丁
要来统治我们。

可是在天上的主宰、
至高无上的上帝面前，
我们有福的沙皇
递上了一份呈文。

读了那份申请，

① 玛佐卡舞：一种波兰的舞蹈。

② 这首讽刺尼古拉的歌据说并不是索科洛夫斯基写的，是他在一八二六年夏天离开武备中学时听到的。一个参加宴会被捕的人阿·瓦·乌特金在受审讯时说他是从亚·依·波列查耶夫那里学来的。波列查耶夫可能是这首歌的作者。乌特金，参看第三三五页注①。

上帝感到怜悯，
就另外派了尼古拉，——
还带着什么什么……下流人。

晚上斯卡里雅特卡忽然记起这一天是他的命名日，就讲了他怎样卖了一匹马占了便宜的故事，邀请这些大学生到他家里，答应开一打香槟酒。他们都去了，香槟也拿出来了，主人身子摇摇晃晃，建议大家再唱一次索科洛夫斯基的歌。大家正在唱的时候，门开了，曾斯基带了警察进来。这一切做得既不细致，又愚蠢，而且也不成功。

警察想抓我们，他们寻找表面的口实想把他们早已注意到的五、六个人牵连在案件里面——可是他们却只抓到二十个无辜的人。

然而要俄国警察认输是很难的。两个星期以后他们拿我们同宴会案件有关的罪名逮捕了我们。[1] 他们在索科洛夫斯基那里搜到沙〔青〕的信，在沙〔青〕那里搜到奥加略夫的信，在奥加略夫那里搜到我的信，但是什么也没有发现。第一次的侦讯失败了。为了保证第二个委员会取得大的成绩，皇上从彼得堡派来最得力的审问官[2] 亚·费·戈里曾。

这种人在我们俄国是不可多得的。他们就是著名的第三

---

① 作者在这里提到的几个人并不是在同一天被捕的，索科洛夫斯基于七月十九日或二十日在彼得堡被捕。奥加略夫于一八三四年七月九日被捕，七月三十一日第二次被捕。

② 这里用的词是指中世纪宗教法庭的喜欢拷打罪犯的残酷的审问官。

厅的头子莫尔德维诺夫[1]、维尔那的大学校长彼里康[2]和少数几个做官的波罗的海东部沿海地区的日耳曼人和堕落的波兰人。[3]

然而对这个"宗教法庭"[4]不幸的是莫斯科要塞司令斯塔阿尔被任命为第一委员。斯塔阿尔是一个直爽的军人和果敢的老将军，他审查案件，发现这件案子里包含了两种彼此不相干的情况：一是宴会案，对这件事应当根据警察法予以处分；二是毫无理由地逮捕了一些人，他们唯一的举得出来的罪名就是一点非公开发表的意见，为了这个审讯他们，既困难又显得荒唐可笑。

小戈里曾不满意斯塔阿尔的看法。他们争论得很厉害；老军人发了脾气，用他的军刀打着地板，说：

"您与其毁掉别人，不如上个呈文请求关闭所有的学校和大学；这样会警告别的不幸的年轻人；——话又说回来，您要怎么干都由您，不过您得撇开我去干；我以后绝不再到委员会来。"

老人说完这番话就匆匆走出了大厅。

---

① 亚·尼·莫尔德维诺夫(1792—1869)：第三厅办公室主任，卞肯多尔夫的助手。

② 温·温·彼里康(1790—1873)：外科医生，维尔那大学校长，反对波兰起义和波兰解放运动。

③ 后来在这方面有突出表现的人中间有一个出名的里卜兰季，他在一八五八年作出一个设立间谍学院的计划(一八五八)。——作者原注

④ 宗教法庭：即中世纪残酷迫害、审讯所谓异端的宗教裁判所。这里指侦讯委员会。

皇上当天就知道了这件事情。

早晨要塞司令带着报告去见皇上，皇上问他为什么不愿意出席委员会；斯塔阿尔说明了原因。

“真瞎扯！”皇帝说，“同戈里曾吵架，真不害臊！我希望你还是像先前那样出席委员会。”

“陛下，”斯塔阿尔答道，“请顾惜我满头的白发吧，我活到这样的年纪从没有沾上一点污点。我的耿耿忠心陛下是知道的，我的血、我的余生都属于陛下。然而这件事关系到我的荣誉——委员会里做的事情是违反我的良心的。”

皇上皱起了眉头，斯塔阿尔鞠躬退了出去，从此他就没有再出席过委员会。

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是无可怀疑的，它很可以说明尼古拉〔一世〕的性格。他怎么不会想到，既然这个他不能不尊敬的人、一个果敢的军人、一个有功勋的老人这样坚决地要求顾惜他的荣誉，那么案情不是完全明白了吗？他本来应当把戈里曾叫来，命令斯塔阿尔当着戈里曾的面说明案情。他并不这样做，却下令把我们严加看管。

斯塔阿尔去了以后，委员会里就只剩下一些仇视被告的人了，主持人是一个头脑简单的老人，谢·米·戈里曾公爵，他在案子进行了九个月以后还是像案子开始以前九个月那样一无所知。他保持着威严的沉默，很少讲话，在审问结束的时候，他总是问一句：

“可以让他走了吗？”

“可以。”小戈里曾回答道，大戈里曾就威严地对犯人说：

“走吧。”

对我的第一次审问进行了四个小时。

问话分两类。第一类问话的目的是要发现像小戈里曾和军事法庭检查官奥兰斯基所说的那种“充满非常有害的圣西门学说的革命主张，和违反政府精神”的思想方式。

这些问题是容易回答的，而且它们也不算是什么问题。在搜去的文件和书信里意见表示得相当清楚。本来问题只牵涉到具体事实：这个人是不是写过这种话。委员会却认为有必要在写过的每句话上面加了如下的问话：“您信中的下述词句如何解释？”

不消说，这是用不着解释的；我写了空洞、含糊的句子来回答。那个军事法庭检查官在一封信上发现了这段话：“所有的宪章都不会产生什么结果，这是老爷和奴隶之间的合同；问题不是在使奴隶过得好一点，而是在于不要有奴隶。”① 要我解释这段话的意思，这时候，我就说我认为我没有替立宪政府辩护的义务，还说，要是我替立宪政府辩护，这又会成为我的罪名。

“对立宪政体的攻击可能来自两方面，”小戈里曾用他那神经质的、发咝咝音的声音说，“您并不是从君主制的观点来攻击它，否则您就不会谈到奴隶了。”

“在这一点上我同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一块儿犯了错误，

① 这是作者一八三三年八月三十一日写给尼·奥加略夫信里的话，不过这里的引文是凭记忆写下来的。

她下过命令不许把她的臣民称为奴隶。"

小戈里曾让我这个讽刺的回答气得喘不上气来，他对我说：

"您大概以为我们聚在这里是为了进行学究式的辩论，您是在大学里做学位论文的答辩吧。"

"那么您要求解释有什么目的呢？"

"看来您假装好像您不明白对您要求的是什么。"

"我不明白。"

"他们全都很顽固。"主任大戈里曾插了一句，他耸了耸肩头，看看宪兵上校舒宾斯基。我笑了笑。

"同奥加略夫一样。"和善的主任继续说。

接着便是暂停。委员会是在谢尔盖·米哈依洛维奇公爵[①]的图书室里进行审讯的；我转过身朝着书架，看架上的图书。这些书中间有一部多卷本的圣西门公爵回忆录[②]。

"您看，"我转脸向着主任说，"多不公平啊！我因为圣西门主义受审讯，可是您，公爵，您却收藏了他的二十卷著作！"

这个和善的老人从来不读书，仓卒间他回答不出来。然而小戈里曾用他那狠毒的眼睛瞅了我一眼，问道：

"难道您看不出来这是路易十四时期的圣西门公爵的《回忆录》吗？"

---

① 米哈洛维奇公爵：即大戈里曾。

② 圣西门公爵：即路易·德·圣西门(1675—1755)，十七世纪末到十八世纪前半叶的法国国务活动家。他的《回忆录》共二十一卷，描写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统治时期三十年中间法国的宫廷生活和当时的重大事件等等。

主任笑了笑，对我点了一下头，意思是："老弟，你搞错了，是吗？"然后说：

"您走吧。"

我走到门口的时候，听见主任问道：

"就是他写了您刚才给我看的那篇论彼得一世的文章[①]吗？"

"他。"舒宾斯基答道。

我站住了一会。

"Il a des moyens〔法语：他有才能〕。"主任说。

"这更坏。毒药在聪明人手里更危险，"审问官[②]插嘴说，"一个十分有害的、完全不可救药的年轻人……"

对我的判决就在这句话上面。

再顺便提一下圣西门，警察局长去抄奥加略夫的信件和图书的时候，他把一本梯也尔[③]的《法国革命史》放在一边，接着他又找到一本……又是第三本……一直到第八本。最后他忍不住了，说："上帝啊！革命的书这么多……又是一本，"他把居维叶的 *Sur les révolutions du glode terrestre*〔法语：《关于地球激变》的〕[④]演讲交给警察长。

---

① 指作者的文章《一月二十八日》(一七二五年彼得大帝逝世的日期)。

② 这里仍然用那个词："中世纪宗教法庭的审问官"，还是指小戈里曾。

③ 路·阿·梯也尔(1797—1877)：法国反动政客和历史家，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法国革命史》是他的著作，共十卷。

④ 居维叶：参看第一七五页注①；这是一本法文科学著作，它的全名是《关于地球表面的激变和这些激变在动物界中产生的变化的演讲》。警察局长把"激变"误解为革命，以为这是一本宣传革命的书。

第二类问话更加复杂。其中各种警察的狡猾手段和侦讯的花招都使用了，为着把一个人弄糊涂，把他拉进圈套，使他自相矛盾。诱供和各种精神上的折磨都用过了。不值得在这里讲述它们，我只消说，尽管他们在我们四个人[1]中间使尽了阴谋诡计，却无法逼我们任何一个讲出需要对质的口供。

我收到了最后的问题以后，一个人坐在我们写答词的那个小房间里。门忽然开了，小戈里曾带着忧郁的、焦虑的面容走了进来。

"我在您写完供词以前，"他说，"来同您谈谈。先父同令尊长时间的交谊使我对您特别关心。您年轻，您还有前程；因此您必须从这个案件脱身出来……幸而这是您办得到的。令尊十分关心您这次被捕的事，他一心盼望您能获释；谢尔盖·米哈依洛维奇公爵同我刚刚谈过这件事，我们的确准备尽力设法；但是请您协助我们。"

我看出了他这番话的用意，我的血冲上头来，我恼怒地咬我的笔。

他继续说下去：

"您正在走一条直接通到服兵役[2]、或者到要塞单人牢房去的路，半路上您就会逼死令尊的；他看见您穿上兵士的灰大衣，连一天也不会活下去。"

我想讲话，可是他不让我说。

① 四个人：即奥加略夫、沙青、伊·阿·奥包连斯基和作者。

② 服兵役：指送到高加索等地去当兵。

“我知道您要讲些什么。您耐心点。您图谋反对政府，这是明显的事实。您要得到陛下的宽恕，就必须拿出您悔过的证据来。您很顽固，您的答词都是不老实的，您由于顾全面子，保护了那些我们比您更了解的人，那些并不像您这样谦虚文雅的人；①您帮不了他们的忙，可是他们要把您拉下去，跟他们一块儿完蛋。您给委员会写封信来，简单地、坦率地说，您承认自己的罪行，说您由于年轻人的狂热走上了歧路，招出那些把您引上歧路的不幸的堕落的人。……您是不是愿意用这样轻易的代价赎回您的前程呢？挽救令尊的性命呢？”

“我什么也不知道，而且在我的供词上也不要补充一个字。”我答道。

戈里曾站起来用干巴巴的声音说：

“啊，那么您不愿意，——这就怪不得我们了！”

审讯就这样地结束了。

一八三五年一月或者二月我最后一次到委员会去受审讯。我是给带去重读我的答词，我可以随意补充，最后在这些答词上面签字。只有舒宾斯基一个人在场。我读完以后对他说：

“我想知道，根据这些问题、根据这些答词可以把一个人判什么罪？您认为我犯了法典的哪一条款？”

“帝国法典是为另一种罪行制定的。”穿浅蓝色制服的上校说。

① 我用不着说这是无耻的谎话、卑鄙的警察的狡猾手段。——作者原注

"这是另一回事。我读完了所有这些书面习题以后,我不能相信它们会构成我的罪名,使我因此坐了六个多月的牢。"

"难道您真的认为我们相信您,说你们并没有组织秘密团体吗?"舒宾斯基反问道。

"秘密团体在哪儿呢?"

"这倒是您的幸运,我们没有找到线索,幸而你们还没有能够做出任何事情。我们及时制止了你们,干脆地说,就是我们挽救了你们。"

这又是重复果戈理的《钦差大臣》中铜匠老婆波希列普金娜和她丈夫的故事[①]了。

我签了字,舒宾斯基就打铃叫人把教士找来。教士进来后就在我的签字下面签了字,证明我的全部供词都是我自愿写的,并不曾施用任何暴力。我用不着说,审讯的时候他并不在场,而且他甚至没有按照手续问我审讯的情况(我那个待在大门外的见证人又来了)。

侦讯结束以后,牢里就管得松了些。家里的人也可以来到要塞司令部领取探监证了。这样又过了两个月。

三月中旬我们的判决批下来了;没有人知道它的内容;有些人说我们会给送到高加索去,另一些人说我们要到博布鲁伊斯克,还有一些人则盼望我们全体得到释放(这是斯塔阿尔的意见,他也单独向皇上呈报了;他建议把我们在押的时间作为处罚)。

---

① 见果戈理的五幕喜剧《钦差大臣》第四幕第十一场。

最后，在三月二十日我们全体集合在戈里曾公爵家里听宣判。[1] 对我们说来，这是一个盛大的节日。我们被捕以后，这还是头一次见面。

我们吵吵嚷嚷地、愉快地互相拥抱握手，我们站在那里，宪兵队军官和卫戍区的军官在我们四周围成了一条警戒线。这次见面使我们振奋起来，大家问这问那，讲有趣的事没完没了。

索科洛夫斯基也到了，他瘦了些，脸色苍白，然而还是谈笑风生。

《宇宙》、《赫威利》和其他相当好的诗篇的作者索科洛夫斯基赋有很高的诗才，然而豪放的独创性不足，就得靠文化修养，可是他的修养又不很高，不能发展他的才能。他是一个亲切可爱的放荡不羁的人，是一个天生的诗人，完全不是一个搞政治的人。他很有趣，很殷勤，是一个会及时行乐的朋友，一个 bon vivant〔法语：乐天派〕，像我们大家一样，喜欢玩乐一下……也许有一点过分。

索科洛夫斯基从狂欢的宴会无意间落到监牢里来，他的表现非常好，他在监狱里成熟了。委员会中那个军事法庭的检查官是一个在细节方面苛求的人、虔信派教徒、密探，他由于妒忌、贪财和诽谤告密而消瘦、衰老了，他由于对皇室和宗教的一片忠诚不敢理解那首诗最后两行的语法意义，他问索科洛夫斯基：

---

① 宣判的日期是一八三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这首歌最后那些无礼的话指的是谁?”

“请您相信,”索科洛夫斯基说,“我指的不是沙皇,我要特别请您注意这个可以使罪行减轻的情况。”

军事法庭检察官耸了耸肩头,抬起眼睛望天花板,然后默默地朝索科洛夫斯基看了好久,闻了闻鼻烟。

索科洛夫斯基是在彼得堡被捕的,并没有告诉他去什么地方就把他带到莫斯科来了。我们的警察经常开这种玩笑,这是完全不必要的。这是他们的诗才。①世界上没有一种职业会平庸、恶劣到自己不想方设法做得更巧妙、自己不需要乔装打扮和装饰门面的。索科洛夫斯基给径直带到监狱、关在阴暗的牢房里。为什么他给囚禁在监狱里而我们却关在营房里呢?

他随身只有两三件衬衫,再没有别的了。在英国任何一个犯人一进监牢,立刻给带去洗澡,在我们那里却用尽方法防止清洁。

要是哈斯大夫不把自己的一叠内衣给索科洛夫斯基送去,那么他会脏得不得了。

哈斯大夫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怪人。对这个古怪的疯子的纪念不应当让那个记述头两等人德行(他们这些德行在他们逝世前从来没有人听说过)的官方讣告的垃圾堆淹没。

他是一个又瘦又小,脸色蜡黄的老人,穿一件黑色燕尾服

① 这是一句讽刺的话,英译者译作:“这是他们的创造性幻想所采取的形式。”

和一条短短的裤子，还穿着黑色丝袜和带扣的皮鞋，他看起来像是才从十八世纪的什么戏剧里走出来似的。哈斯穿着这身婚丧大事中穿的grand gala〔法语：大礼服〕，在北纬五十九度的适意的气候，每星期在流放犯出发的时候，就到麻雀山的押解站去。他靠着监狱医生的身份接近他们，他给他们检查身体，经常随身带去满满一篮子的各种东西、食品和各样好吃的东西——核桃、姜饼、橙子、苹果，都是带给女犯人的。这引起了慈善的太太们的恼怒，她们害怕慈善行为会给人们带来愉快，害怕会作出不必要的更多的慈善行为使犯人不致于因冻饿死去。

然而哈斯是难说得通的，他温和地听了对他"姑息女犯人的愚蠢行为"的责备以后，擦了擦手，就说：

"亲爱的太太，请您瞧瞧，一块面包，一个铜板，任何人都会给她们，可是糖果或者橙子她们很久都不会看到的，没有人给她们，这是我从您的话里可以推断出来的；因此我带给她们这种愉快，她们很久都不会再有这种愉快的。"

哈斯住在医院里。午饭前有一个病人来找他治病。哈斯给他检查过了，就到书房里去开药方。他回来的时候病人不见了，桌子上放的银餐具也不见了。哈斯唤了守门人来，问他除了病人以外还有什么人进来过没有。守门人猜到了这种情况，马上跑了出去，一分钟以后就带着银匙和病人回来，他得到院里另一个看守兵的帮助把病人拦住了。这个骗子跪下来向大夫求饶。哈斯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你去找警察长来，"他对一个守门人说，对另一个又说：

"你马上去叫录事来。"

守门人很满意这次的发现、胜利和在这件事情上他们出的一份力，他们就跑出去了，哈斯却趁他们不在的时候对小偷说：

"你是个虚伪的人，你骗我，想偷我的东西，上帝会审判你……现在趁兵还没有回来，赶快从后门跑掉……不过，等一下，也许你一个钱也没有，——这儿有半个卢布；可是你要努力改好你的灵魂；——岗警躲得开，上帝是躲不开的！"

在这一点连他家里的人也反对他。然而这个无法改变的大夫却有他自己的意见：

"偷窃是大坏事；不过我知道警察，我知道他们怎样拷问小偷，他们要审问他，要打他；把别人送去挨打，这是坏得多的坏事；而且谁知道——也许我这样做倒会打动他的心！"

他家里的人摇摇头，说："Er hat einen Raptus〔德语：他是一个性情古怪的人〕"；慈善的太太们说："C'est un brave homme, mais ce n'est pas tout à fait en règle là.〔法语：这是一个好人，不过他这儿并不很正常。〕"她们指了指前额。可是哈斯擦擦手，还是按他自己的心愿办事。

……索科洛夫斯基刚刚讲完他那些故事，其他的几个人就同时讲起他们的事情来；好像我们都是经过长途旅行回来似的，问询、笑谈、俏皮话没完没了。

沙〔青〕在肉体上吃的苦头比别人多；他很瘦，而且一部分头发脱落了。他在坦包夫省他母亲的村子里得到我们被捕的消息，自己马上动身去莫斯科，免得宪兵到村子里来惊动他的

母亲，他在路上受了寒，到家时发着高烧。警察来抓他的时候，他还躺在床上，不能把他带到警察分局去。他们将他作为留家逮捕，派了一个警察兵在寝室门的内侧看守他，警察长则守在床前充当男护士；这样病人在昏迷以后清醒过来，就会遇到一个人的审讯的眼光，或者另一个人枯瘦的嘴脸。

冬天开始的时候他给搬到列福尔托夫斯基医院；[1] 医院里本来并没有空的、秘密的、给犯人用的单人病房；然而这种小事用不着考虑；找到了一个没有火炉的用屏风隔出来的角落，——就把病人安置在这个南面的阳台，还派了一个哨兵看守他。这个石头的贮藏室里面冬天的气温怎样，可以根据下面这个事实判断：夜里哨兵受不了那种严寒，就到走廊上炉前烤火，要求沙〔青〕不要对值班的讲。

医院当局自己也看出来在这样接近北极的地方不可能有热带的气温；他们就把沙〔青〕搬到摩擦冻僵病人[2] 的病房的隔壁去。

我们还来不及讲到和听到我们大家的奇怪经历的一半，副官们就突然忙乱起来，卫戍区的军官们连忙立正，警察们也整装肃立；门庄严地打开了，身材瘦小的谢尔盖·米哈依洛维奇·戈里曾公爵 en grande tenue〔法语：穿着大礼服〕，肩上挂着绶带，走了进来；曾斯基穿着御前侍从的制服，连军事法庭

① 普列斯年斯柯依警察分局局长向曾斯基报告：十二月十五日把沙青送到军人医院。

② 摩擦冻僵了的病人使他恢复知觉。

检察官奥兰斯基也穿上了一种为着喜庆事情穿的浅绿色军便服。不用说，要塞司令没有来。

这个时候吵闹和笑声响得实在厉害，检察官威严地走进厅子里来，对我们说，大声讲话特别是发笑就是对于我们即将听到的皇帝陛下的圣旨的大不敬。

门开了。军官们把我们分成三组；在第一组的是索科洛夫斯基、画家乌特金[①] 和一个姓伊巴耶夫[②] 的军官；我们在第二组；在第三组的是 tutti frutti〔意语：所有其余的人〕。

第一类人的判决是大声宣读的——它很可怕：以侮辱皇帝陛下的罪名判刑，无限期监禁在席吕谢尔堡要塞监狱。

这三个人都很勇敢地听完了这个毫无道理的判决。

奥兰斯基为了表示尊严慢吞吞地、抑扬顿挫地读到侮辱皇帝陛下和皇室等等……的时候，索科洛夫斯基对他说：

"得啦，我并没有侮辱过皇室。"

他们在他的文件中间，除了诗稿以外，还找到他几次开玩笑编写的米哈依尔·巴甫洛维奇大公爵[③] 的批示，故意写了别字[④]，这就促成了他的重刑。

曾斯基为了表示他也是一个可以随随便便、不拘礼节的

---

① 阿·瓦·乌特金(约 1796—1836)：非贵族出身的俄国画家，一八三四年被捕，一八三五年判刑，关在席吕谢尔堡要塞监狱，在狱中病死。

② 列·康·伊巴耶夫(约 1804—?)：退伍陆军中尉，一八三四年被捕，后来流放到彼尔姆，一八四二年获得自由。

③ 保罗一世的儿子，尼古拉一世的弟弟。

④ 原文是"拼法错误"。

人，在宣判以后就对索科洛夫斯基说：

"喂，您以前在席吕谢尔堡待过吗？"

"去年，"索科洛夫斯基马上回答他说，"我在那儿喝了一瓶马德拉酒，好像我当时就有预感似的。"

两年以后乌特金死在要塞的牢房里。索科洛夫斯基在半死的状态中，给送到高加索，他死在皮雅契戈尔斯克。还没有丧尽的一点点羞耻心和良心促使政府在这两个人死亡以后把第三个人转移到彼尔姆去。伊巴耶夫按照他自己的方式死了：他变成了神秘主义者。①

乌特金正如他在审讯中自称的那样，"关在监牢里的自由画家"，他是一个四十岁上下的人；他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政治活动，然而他为人光明正大、容易激动，在委员会审问的时候他讲话毫无顾忌，回答问题又尖锐、又粗暴。因此，他就得死在一间墙上滴水的潮湿的牢房里面。

伊巴耶夫的罪比别人重只是在他的肩章上面。倘使他不是一个军官，他就不会得到这样的处罚。这个人偶然参加了一次什么酒宴，他大概同所有其余的人一样喝了酒，唱了歌，可是他不见得比别人唱得多些、声音大些。

轮到我们了。奥兰斯基擦了擦眼镜，清了清喉咙，便恭恭敬敬地宣读陛下的圣旨。圣旨上说，皇上审查了委员会的报

---

① 伊巴耶夫一八四一年在彼尔姆出版了一本书《解剖刀，或者对人的内心的观察》。这本不怎么大的书因为它的神秘主义受到《祖国纪事》杂志（一八四二年）的严厉批判。

告，特别考虑到犯人年纪很轻，因此下令不把我们送交法庭审判，而且向我们宣布，按照法律我们是大逆不道唱亵渎圣上歌曲的罪人，应当判处死刑，而根据其他法律也应判处流放作终身苦役。然而皇上恩德无边，并不这样判刑，却赦免了大部分人的罪，允许他们在警察的监视下居住原地，对于其中罪行较重的人，则用感化的办法处理，就是期限不定地把他们送到遥远的省份去担任文职，由地方当局监视他们。

这些"罪行较重的人"一共有六个：奥加略夫、沙〔青〕、拉赫青[①]、奥包连斯基、索罗金[②]和我。我给送到彼尔姆去。拉赫青并没有被捕，可是他也在判刑的人中间。传他来听宣判的时候，他还以为这是对他的警告，让他看见别人受到什么处罚，就作为对他的处罚。据说戈里曾公爵的亲信中有人让拉赫青的妻子惹恼了，就给拉赫青准备了这个意外的袭击。他的身体虚弱，三年以后死在流放地。

奥兰斯基宣读完毕，便由舒宾斯基上校讲话。他用了很考究的语言和罗蒙诺索夫[③]的文体对我们说，全靠了主持委员会的这位高贵的大人替我们讲情，皇上才对我们这样宽大。

舒宾斯基等待着我们大家听了这番话以后向公爵表示感谢；可是我们并没有这样的表示。

---

① 阿·科·拉赫青(1808—1838)：作者的大学同学，一八三五年被流放到萨拉托夫省。

② 米·费·索罗金：画家，一八三四年被捕，流放到科斯特罗马省。

③ 米·瓦·罗蒙诺索夫(1711—1765)：俄国启蒙运动的杰出的倡导者、学者和作家。

被赦免的人中间有几个点了点头，他们同时又偷偷地看看我们。

我们抄着手站在那里，没有做出任何举动表示沙皇和公爵的恩典打动了我们的心。

随后舒宾斯基又想出了另一个诡计，他对奥加略夫说：

"您到奔萨去，您以为这是偶然的事情吗？令尊瘫痪了躺在奔萨家里——公爵呈请皇上派您到这个城里，是为了让您在令尊的身边，可以减轻一点您的流放对他的打击。难道您也不认为您应当感谢公爵吗？"

奥加略夫没有办法，只好微微弯了一下腰。这就是他们想得到的东西。

这使得那个和善的老人高兴，随后不知为了什么缘故，他把我叫了去。我走上前去，打定了主意：不管他和舒宾斯基讲些什么，我绝不感谢；我比所有的人流放得更远，而且去的又是最糟的城市。

"您去彼尔姆。"公爵说。

我不做声。公爵有些窘，他想讲话，就说：

"我在那儿有一个庄园。"

"您要我给您的村长带什么口信去吗？"我含笑问道。

"我不会要你们这样的人带口信的——你们这些烧炭党[1]人。"随机应变的公爵接着说。

"那么您找我有什么事呢？"

---

[1] 烧炭党：十九世纪意大利独立统一前民主主义者的秘密结社。

“没有什么。”

“我以为是您唤我来的。”

“您可以走了。”舒宾斯基打断了我的话。

“对不起，上校，”我向他反问道，“我在这里提醒您，上次我在委员会受审讯的时候您对我说并没有人告发我同宴会案有关系，然而判词上还是说我是一个同这个案件有关的罪人。这里总有错误吧。”

“您想抗议圣上的决定吗?”舒宾斯基说，“您最好还是不要拿彼尔姆换成更坏的东西。我会叫人把您的话记下来。”

“我正想请您这样做。判词上说：‘根据委员会的报告。’我抗议的是你们的报告，不是圣旨。我向公爵申诉：我并没有宴会的问题，也没有唱歌的问题。”

“好像您并不知道，”舒宾斯基气得脸发白，说，“您的罪比那些参加宴会的人要大十倍。瞧他，”——他指着一个被赦免的人，——“他喝得醉醺醺地唱了肮脏的歌，事后他跪下来含着眼泪求饶。可是您到现在还毫无悔改的表示。”

上校指着的那位先生并不做声，只是埋下头来，一张脸通红。……这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他的卑鄙行为给了他一个非常好的教训。……

“对不起，我不是说我的罪大或者罪小，”我继续说下去，“不过，如果我是一个杀人犯，我就不愿意别人把我当作小偷。说到我身上来，哪怕是替我辩护，我也不愿意别人说我‘喝得醉醺醺地’做了什么事情，像您现在讲的那样。”

“要是我有一个儿子，一个亲生的儿子，他是这样执迷不

悟的话，我也要亲自请求皇上把他流放到西伯利亚去。"

这个时候警察总监插嘴说了一些杂七杂八的废话。可惜小戈里曾不在场，——这本来是他表现口才的好机会。

这一切不消说是毫无结果。

拉赫青走到戈里曾公爵跟前，要求延期出发。

"我的妻子怀孕了。"他说。

"这又不是我的错。"戈里曾答道。

一只野兽、一条疯狗在咬人的时候，也要假装正经，盘起尾巴，可是这个装疯卖傻的大官、贵族，他虽然有老好人之称……却不害臊开了这个下流的玩笑。

……我们还在这个厅子里待了一刻钟，不管那些宪兵和警官怎样再三告诫和干涉，我们还是互相热烈拥抱，讲了好久的告别话。除了奥包连斯基以外，我从维亚特卡回来前一个也没有见到。

出发就在我们的眼前了。

监狱是我们过去生活的继续；可是出发到偏僻地方去，就跟过去生活完全隔断了。

在我们朋友圈子里的青年生活时期结束了。

我们的流放可能会继续几年。我们在什么地方再见面，而且怎样见面呢，我们还会见面吗？……

我惋惜过去的生活，我不得不这么匆促地离开了它……没有说一句告别的话。我毫无见到奥加略夫的希望。有两个朋友居然在最后几天里面见到了我，但是这太不够了。

我多么想能够同我那个年轻的安慰者再见一面，像在墓

地里握她的手那样再一次握她的手。……我想通过她来送别过去、迎接未来。……

一八三五年四月九日，在我出发到流放地的前夕，我们果然见了几分钟的面。

我长久地把这一天当作神圣的纪念日，这是我一生最幸福的时刻。

……为什么每一想到这一天和我过去的所有快乐日子就使我记起那么多可怕的事情？……坟墓，深红色玫瑰花圈，两个孩子（我牵着他们的手），——火把，一群流亡的人，月亮，山下面温暖的海水，我不理解的话和刺痛我的心的话……

一切都过去了！①

① 作者写这篇回忆时，想起一八五二年他的妻子娜塔里雅在尼斯的葬仪。

第十三章

流放——市长——伏尔加——彼尔姆

四月十日早晨一个宪兵队军官把我带到总督府。在那里，在办公楼的机要房间内我的亲族可以来和我告别。

不用说这一切使人难堪，使人痛心——在旁边监视的密探、录事，向负责押送我的宪兵宣读指令，我不能单独同亲人谈随便什么话，——总之，再也想不出比这更使人感到侮辱和痛苦的处境了。

后来马车终于奔驰在去弗拉基米尔的大路上，我叹了一口气。

> "Per me si va nella citta dolente,
> Per me si va nel eterno dolore——"
> 〔意语：经过我这里走进苦痛的城，
> 经过我这里走进永恒的痛苦——〕①

---

① 这两行诗是从意大利诗人但丁（1265—1321）的《神曲·地狱篇》中引来的，这是《第三曲》的头两行，这也是写在地狱大门上的一段话的头两句。

我在驿站上一个地方写下了这样两行诗，它们对地狱的入口和西伯利亚的驿路同样地适用。

离莫斯科七里有一个叫做“彼罗夫家”的小饭馆[①]。我的一个好朋友约好在那里等我。我邀请宪兵[②] 喝一杯伏特加，他答应了：这里离城远了。我们走进里面，可是朋友不在那里。我想尽办法在小饭馆里拖延时间，后来宪兵不愿意再等下去了，车夫在准备赶马上路——忽然一辆三匹马拉的车径直冲到小饭馆门前，我跑到门口……两个陌生的出来玩乐的商人儿子吵吵嚷嚷地下车来。我朝远处看——通往莫斯科的大路上看不见一个移动的点子，看不见一个人。……坐上车往前走，这是痛苦的事。我给了车夫二十个戈比，我们就像箭似地飞奔起来。

我们的车子不停地朝前走；宪兵奉命一昼夜不得少于走两百里。在平时这倒是受得了的，可是单单在四月初不行。有些地方路上结了冰，有些地方路上满是水和烂泥，而且在接近西伯利亚的时候，一站比一站更坏。

旅行中第一件趣事发生在波克罗沃。

由于冰块在河上漂下来切断了同对岸的往来，我们失去了几个小时的时间。宪兵很着急；可是波克罗沃的驿站长又突然通知说没有马了。宪兵向他指出，驿马使用证上写明“要

---

① 奥加略夫前一天曾在这里停留，在窗台上写下一行字：“尼·奥—夫一八三五年四月九日给放逐出莫斯科。”

② 宪兵：指叶·瓦西里耶夫，克鲁季茨营房的宪兵，押送作者从莫斯科到彼尔姆。

是没有驿马，可以使用快马”。站长回答说这些马已经指定由内务副大臣使用。不用说，宪兵就争吵、叫嚷起来；站长跑去设法找居民的马。宪兵也同他一起去了。

我不高兴在驿站长的不干净的屋子里等待他们。我便出了大门，在房屋前面闲走。这是我在九个月监禁之后第一次没有一个兵在旁边看守的散步。

我踱来踱去走了大约半个小时，忽然碰到一个穿着没有肩章的军服常礼服、脖子上挂着一条浅蓝色 pour le mérite〔法语：勋章绶带〕的人。他目不转睛地看着我，走了过去，马上又回转来，带着粗鲁的样子问我：

“您是由宪兵送到彼尔姆去的吗？”

“是我。”我答道，并没有站住。

“对不起，对不起，他怎么敢……”

“请问我有荣幸同谁在谈话？”

“我是这儿的市长[①]，”不认识的人回答道，他的声音里流露出他对自己这个高贵职位的深切感觉，“请您原谅，我在恭候副大臣[②]随时驾临，可是这儿政治犯却在街上散步。那个宪兵真是一个蠢驴！”

“请您向宪兵本人讲好不好？”

“不是向他讲，我要逮捕他，我要命令打他一百下棍子，另

① 市长：即拉·季·伊兹马依洛夫上校，弗拉基米尔省波克罗沃市市长。

② 副大臣：即亚·格·斯特罗加诺夫伯爵（1795—1891），一八三四至一八三六年任内务副大臣。

外派一个警察送您去。"

我并不等他把话讲完，便向他点了点头，连忙走回驿站去了。我在窗里可以听见他在对宪兵发脾气，进行种种威胁。宪兵在道歉，不过看来并不怎么害怕。三、四分钟以后他们一起走了进来，我朝窗口坐着，并不去看他们。

我听见市长问宪兵的话，马上猜出来他很想知道我因为什么罪名、为什么而且怎样遭到流放。我坚决地不做声。市长便对我和宪兵两人信口谈起来，不知道他到底向谁说话：

"没有人愿意设身处地替我们想一想。难道我就高兴咒骂大兵、叫一个我一生从没有见过的人不痛快吗？这是职责啊！市长是城市的当家人。不论发生了什么事情，都由我负责；要是地方金库给盗窃了，——我有罪；礼拜堂烧掉了，——我有罪；街上醉鬼多了——我有罪；要是酒喝得少了——我也有罪，"（这后一句话很使他高兴，他用了更加愉快的语调讲下去。）"幸而您遇到了我，不然，您要是遇到了大臣，您这样走来走去，他会问：'怎么，政治犯出来散步?！把市长交法庭审判'……"

后来我对他的辩才感到厌烦了，就掉转脸对他说：

"您尽管按照您的职责去做吧，不过我请求您不要教训我了。我听您讲话的口气，知道您在等着我向您鞠躬求情。可是我并没有向陌生人鞠躬哀求的习惯。"

市长显得很窘。

我记得某某人常说："我们这儿全是这样，谁先开头威吓、叫嚷，谁就占上风。您同官长讲话，要是您让他提高声音，您

就完了;他听见自己的吼声,就变成了一只野兽。要是您听见他说出第一句粗话,就吼起来,他一定会害怕,会让步,他会想您是个性格刚强的人,对这种人不好太惹他生气。”

市长差了宪兵去问马的事情,便转身对我用道歉的口气说:

“我这样做是为了那个大兵的缘故,您不知道我们的大兵是什么样子,——对他们不可以有一点点姑息,不过请相信我,我能够识别人——请允许我问您是什么样的不幸遭遇……”

“我们的审讯结束的时候,禁止我们讲出去。”

“既然那样……当然……我不敢……”市长的眼光里表示出来好奇心还在折磨他。他不作声了。

“我有一个远亲,他在彼得保罗要塞里坐了大约一年牢,您知道,我,也有这种关系,——对不起,这件事我一直在担心,您好像还在生气?我是个军人,严格,习惯了职务;我十七岁就到团里服役,我性子急,可是过了一会就完全忘记了。我不会碰您那个宪兵,让他见鬼去吧……”

宪兵走了进来,报告说,马从牧场赶来,一个小时内到不了。

市长告诉他,由于我替他讲情,他饶恕了他;然后他又对我说:

“为了表示您并不生气,您不会拒绝我的邀请吧,——我的住处离这儿只有两座房子;请允许我邀请您吃一顿便饭。”

这是很可笑的事情:我同市长遇见以后居然到他家里去吃他的干咸鱼脊肉和他的鱼子酱,喝他的伏特加和马德拉酒。

他显得非常殷勤，居然把他家里的一切事情全告诉了我，连他妻子害了七年的病也讲了。吃过饭以后他带着得意的高兴从桌子上放的一只高脚盆里拿出一封信递给我，让我读他儿子写的一首“诗”，这首“诗”在武备中学课堂考试中得到当众朗读的奖励。他对我做出这样完全信任的表示以后，就巧妙地绕个弯间接地问起了我的案件。这一次我多多少少地满足了他。

这位市长使我想起了我们的朋友史〔迁普金〕① 经常讲的那个县法院秘书的故事。“九个县警察局局长都换了，可是秘书一直待下来，照常地管县里的事情。”

“您是怎样跟所有这些人搞好关系的？”史〔迁普金〕问他。

“先生，没有什么，靠上帝帮忙，我们勉强对付过去了。有的起初爱发脾气，蹬蹬前蹄，踩踩后蹄，大声叫嚷，乱骂一阵，说是要把我一脚踢开，又说要上报省长——好吧，您知道，我们究竟是下级，只好不声不响，可是心里在想：等着吧，他会吃苦头的！这不过是头一回给他们套上辔头！果然，你瞧，往后他们拉车跑得挺不错！”

……我们到达喀山，正是在伏尔加河春天发大水的时候；从乌斯隆到喀山的整段路程我们都不得不坐平底船，——十五里或者更多一些的路给河水淹没了。这是一个阴雨天。摆

① 米·谢·史迁普金（1788—1863）：俄国农奴出身的著名话剧演员。作者在他的日记（一八四四年三月十九日）里提到史迁普金讲的这个故事。史迁普金在他的《回忆录》第八章里也讲到这个故事，但《回忆录》发表较迟（在一八六四年）。

渡停了，许多大车和各种车子等在岸上。

宪兵到驿站长那里去要一只平底船。驿站长不乐意地给了他一只船，对他说还是等一等好，现在过河并不安全。宪兵急着要走，因为他喝醉了，而且他还想显示自已的权力。

他们把我的马车放在一艘小小的平底船上，我们就离了岸。风似乎平静了；半个小时以后艄翁人张起了帆，突然间平静了的风暴又厉害起来。一种巨大的力量把我们的船推向前面，我们碰到一段木头，在木头上狠狠地撞了一下，这只破旧的渡船给撞坏了，水漫上了甲板。情况很不好；不过艄翁人居然把平底船弄到了浅滩上。

一只商人的平底货船过来了；我们向它叫唤，要他们派一只小船来；拉船的人听见了我们的叫唤，可是什么也不管就过去了。

一个农民带了老婆坐着一只小小的独木船来了，问我们出了什么事情，他说："嗯，那有什么。得啦，堵住洞眼，求上帝保佑，高高兴兴地赶路。愁眉苦脸地待在这儿干吗？难怪你是个艄翁人，所以你一点办法也没有。"他说着就爬上了平底船。

艄翁人的确非常惊慌。首先，水淹到睡着了的宪兵身上的时候，宪兵跳起来，立刻动手打艄翁人。其次，平底船是公家的财产，艄翁人不停地说：

"它就要沉下去了，我怎么办！我怎么办！"

我安慰他说，要是船沉下去，他会同船一起沉下去的。

"老爷，我沉下去，那倒很好，不过如果我沉不下去，怎么办？"他答道。

那个农民和工人们用各种各样东西堵住了洞眼。农民又用斧头敲敲打打，把一小块木板钉了上去；然后他齐腰泡在水里同别的人一起把平底船拖下了浅滩，我们很快地就驶进伏尔加河道里了。水势很猛。风和雨夹雪抽打着脸，寒冷彻骨，可是不久伊凡雷帝[1]的铜像就从雾和急流中现了出来。看起来危险已经过去了，然而鞑靼人忽然用凄惨的声音叫起来："漏水，漏水！"事实上水已经从先前堵住的洞眼里很猛地涌了进来。我们正在河的当中，平底船动得越来越慢，可以预料到船就要完全沉下去了。鞑靼人脱下帽子在祷告。我的随从[2]吓得不得了，哭着说：

"永别了，我的好妈妈，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宪兵在骂人，他赌咒发誓到岸上以后要把他们统统痛打一顿。

起初我也害怕，而且风和雨又增加了一些混乱和惊慌。但是我一想到我任何事情也没有做就死去，这未免太荒谬了，我这种年轻人的"Quid timeas, Caesarem vehis!〔拉丁语：你怕什么呢，你载着恺撒！〕"[3]占了上风，我镇静地等待着最后的结局，我相信我不会死在乌斯隆到喀山的路上。生活后来

---

① 伊凡雷帝：即沙皇伊凡四世(1530—1584)，一五四七年即位，是称为沙皇的第一个俄国皇帝。

② 随从：指彼得·费多罗维奇。

③ 这是罗马统帅和政治家朱里·恺撒(前100—前44)讲的话。原话是"你怕什么呢？你载着恺撒和他的幸运"。当时恺撒坐船过河入海，遇到大风浪，掌舵人要把船开回去，恺撒就用这句话来鼓励他们。

使我们丢开了这种高傲的自信，而且为这种自信惩罚了我们；这就是为什么年轻人勇敢、又富于英雄气概，而上了年纪的人却小心谨慎、很难勇往直前。

……一刻钟以后我们就上了岸在喀山的内墙边，一身湿透了，冷得打颤。我见到头一个酒馆，便进去喝了一杯烈性酒，吃了一份煎蛋，然后到邮局去。

在村子或者小城市里，驿站长那里总有一间供旅客留宿的屋子。而在大城市里大家都住在旅馆里面，站长那里就没有给旅客预备的房间了。我给带到邮局办公室。驿站长给我看他的屋子；屋子里有女人和小孩，还有一个生病的老人躺在床上——简直找不到一个给我换衣服的角落。我给宪兵队将军写了一封信，要求随便拨一间屋子给我，我可以取暖并且烘干衣服。

过了一个小时宪兵回来了，他说阿卜拉克辛伯爵下了命令拨给我一个房间。我等了大约两个小时，并没有人来，我又要宪兵去问。他带回来的答复是，将军下令叫波尔上校拨给我房间，波尔上校正在贵族俱乐部里打牌，因此不可能在明天之前有房间。

这是野蛮的行为，我给阿卜拉克辛伯爵写了第二封信，要求他立刻把我送走，我说这样我可以在下一站找到一个休息地方。伯爵大人安寝了，信要留到明天早晨。丝毫没有办法；我脱掉湿衣，用“上级”① 的军大衣裹住身子，在邮局办公室

① “上级”：这里指宪兵；法文译本译作“邮局局长”（即驿站长）。

的桌子上面躺下来;我拿了一本厚书,再放点内衣在上面当作枕头。

第二天早晨,我差人买早饭。邮局的职员已经上班了。庶务官[①] 要我注意在办公地点吃早饭实在不好,还说他个人并不在乎,不过邮局局长会不高兴。

我开玩笑地回答道,有权出去的人才可以给赶出去,没有权出去的人,就不得不在他被拘留的地方吃、喝……

第二天阿卜拉克辛伯爵允许我在喀山停留三天,并且住在旅馆里面。

我同宪兵在城里逛了这三天。遮着脸的鞑靼女人、她们的颧骨突出的丈夫、同东正教礼拜堂靠近的伊斯兰教的清真寺,——这一切使人想到亚洲和东方。在弗拉基米尔,在尼日尼,人有一种接近莫斯科的感觉,在这里却感觉到离莫斯科远了。

……到了彼尔姆我就直接给带到省长[②] 那里。他正在举行一个盛大的招待会:他的女儿当天同一位军官结婚。他请我一定参加,我只好穿着满是泥土、尘埃的旅行短上衣[③]在整个彼尔姆上流社会中露面了。省长讲了各种各样的废话,还禁止我同波兰流放人来往,他叫我过了几天去见他,他说那个时候他会给我在省长公署找个工作。

---

① 庶务官:当时沙俄掌握机关总务的人员。

② 省长:即加·科·塞拉斯千尼克,一八三五年任彼尔姆省长。

③ 农民穿的短外衣,类似腰部带褶的男外衣。

这个省长是小俄罗斯人，他并不压迫流放人，一般地说他是一个温和的人。他是在悄悄地积攒钱财；就像一只田鼠让人看不见地在地底下打洞那样，他一点一点地贮存起食物来准备在困难日子使用。

他为了某种莫名其妙的监督和纪律的想法，命令在彼尔姆的所有的流放人每个星期六早晨十点钟去见他。他衔着烟斗出来，手里拿一份名单，查对是否都到齐了，倘使有人缺席，就派警官去查明原因，他几乎对谁也不讲话，就把我们打发走了。我就是这样地在他的客厅里认识了所有的波兰流放人，本来他警告过我不得同他们来往。

我到达的第二天宪兵走了，在我被捕以后我第一次获得自由。

自由……在西伯利亚边境一个小城里面，没有一点经验，对我应当在其中生活的环境一点也不了解。

我从育儿室到大学教室，从大学教室到朋友的小圈子，——都是理论、梦想、自己的亲友，没有一点实际的社会关系。然后是监狱，于是一切便沉淀下来。我实际接触生活还是在这里、在乌拉尔山附近开始的。①

马上开始了这种生活；我到后第二天同省长公署的一个守卫一起去找房子；他把我引到一所大的平房。不管我怎样对他解释我找的是很小的房子，或者更合适些，只是房子的一

① 作者写信给朋友说："彼尔姆使我恐怖：这是西伯利亚的接待室。"（这里离莫斯科一千四百俄里。）

部分，他还是固执地要我进去。

房东太太让我坐在长沙发上；她听说我从莫斯科来，就问我在莫斯科见到卡布利特先生没有。我对她说我从没有听见过这样的姓。

“你怎么会呢？”老太太说，“我是说卡布利特，”她讲了他的名字和父名，“得啦吧，少爷，他做过我们的副省长！”

“我坐过九个月的牢，可能因此没有听到他的名字，”我带笑说。

“大概是这样吧。那么你，少爷，要租这所房子？”

“我嫌它大，太大了，我对这个老总讲过。”

“宽敞一点，不是负担呀。”

“话是这样说，不过房子宽敞，您要的钱就多了。”

“啊，好少爷，谁跟你讲过我的价钱，我还没有开口呢。”

“不过我明白这样一座房子一定不便宜。”

“你出多少钱？”

我为了摆脱她的纠缠，就说我至多出三百五十个纸卢布。

“哦，这就很好；叫他把你的东西搬来吧，小伙子，你喝一杯腾涅立夫[1] 葡萄酒。”

在我看来她的价钱低得出奇，我租下了这座房子；我打算走的时候，她叫住了我。

“我忘记问你：你要自己养牛吗？”

“对不起，我不养。”我答道，她这句问话差点叫我感到受

---

① 腾涅立夫：西属加那利群岛中的一个岛。

了侮辱。

"好吧,那么我给你送鲜奶油来。"

我走了,一路上惊恐地想我是在什么地方,我又算是什么,别人怎么会以为我能够自己养牛呢?

然而我还来不及熟悉我的环境,省长就通知我,要把我送到维亚特卡去[1],因为另一个指定到维亚特卡的流放人[2]要求转到彼尔姆来,他有亲戚在彼尔姆。省长要我第二天就动身。这是不可能的;我以为自己要在彼尔姆待一个时期,就买了各种各样的东西,现在哪怕半价卖出去也行。省长支支吾吾地作了种种答复之后,允许我待两个整天,不过要我保证我不想方设法同别的流放人见面。

我准备第二天卖掉我的马和各种没有用的东西,警察局长[3]突然带着要我二十四小时内出发的命令来了。我对他说明省长已经准我延期。警察局长把公文拿给我看,上面明明指定他在二十四小时内把我送走。公文是同一天签署的,因此就是在他同我谈过话以后发出的。

"哈,"警察局长说,"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我们这位英雄想把责任推到我的身上。"

"我们去揭穿它。"

"我们去!"

---

① 根据六月一日沙皇的诏令。

② 即作者的同学伊·阿·奥包连斯基。

③ 警察局长:指费·伊·瓦依盖尔。

省长说他忘记了答应我延期的事。警察局长狡猾地问他要不要把公文改写过。

“值得费事吗!”省长干脆地说。

“把他捉住了,”警察局长高兴地擦着手对我说……“这个耍笔杆的官僚!”

彼尔姆警察局长属于军人做文官的一种特殊的典型。这些人在军队里运气好;没有碰到一下刺刀,也没有遇到一颗子弹,因此就给安排在市长、〔警察局长〕、庶务官这类的职位上。

他们在团里多少染上了一点心直口快的脾气,记住了各种关于荣誉不可侵犯和光明正大的警句,还有对搞文牍、耍笔杆的人的刻薄的嘲笑。他们中间年纪轻的还读过马尔林斯基[①]和扎戈斯金[②]的作品,能背诵《沃依纳罗夫斯基》[③]和《高加索俘虏》[④]的开头部分,经常引用他们反复吟诵的诗句。例如看见人抽烟他们就说:

琥珀烟嘴在他的唇边冒烟。[⑤]

他们毫无例外都深切地痛感到他们的职位比他们的才干

① 马尔林斯基:即十二月党人亚·亚·别斯土热夫的笔名,他写过一些浪漫主义的中篇小说,当时非常流行。

② 米·尼·扎戈斯金:参看第八五页注②。他是俄国历史小说的初期的代表作家,他的长篇小说《尤利·米洛斯拉夫斯基》在当时很流行,重版多次。

③ 《沃依纳罗夫斯基》:十二月党诗人雷列耶夫的叙事长诗。沃依纳罗夫斯基是马泽巴的外甥。

④ 《高加索俘虏》:普希金的叙事长诗,写于一八二〇至一八二一年。

⑤ 这一行诗是从普希金的叙事长诗《巴赫契萨拉依喷泉》中引来的,这是原诗的第二行。

低得多，只是由于贫穷他们才不得不待在这个“耍笔杆的圈子”里面，要不是因为穷，要不是因为受了伤，他们就会指挥军团，或者充当高级副官。每个人都会举一个他过去老同事的非常突出的例子，说：

“您知道——克列依次或者利季盖尔和我同时提升为骑兵少尉的。我们住在一个房间里。我们彼此称呼彼特鲁希卡，阿略沙，——不过您瞧，我不是德国人，我又完全没有后台——所以我只好做个岗警。您想，有我们这样思想的正直的人来担任警察职务是轻巧、容易的事吗？”

他们的老婆叫苦叫得更厉害，借口说在莫斯科的母亲或者姑母生病想同她们见最后一面，每年提心吊胆地赶到莫斯科去把一点钱存进钱庄。

他们就这样只顾自己地生活了十五年。丈夫怨命，鞭打警察，拳打小市民，在省长面前卑躬屈节，包庇小偷，盗窃文件，引用《巴赫契萨拉依喷泉》中的诗句。老婆也怨命，埋怨外省生活，世界上的东西不管什么都要，向申请人和商店搜刮钱财，喜欢有月亮的夜晚，她称之为“月明之夜”。

我在这里作这样的评论，因为我起初受了这些先生的骗，真的相信他们比别人好些，事实上完全不是这样。……

我从彼尔姆只带走一样对我很珍贵的个人的回忆。

在省长某一次查点流放人的时候，一个波兰天主教教士邀请我到他那里去。我在他家里见到几个波兰人。其中有一个一声不响地坐着，沉思地抽一只小烟斗。他的整个面貌上都露出来苦恼，没有出路的苦恼。他有点驼背，甚至腰也有点

歪斜，他的脸型是属于那种不规则的波兰—立陶宛类型，这类型起初使人吃惊，后来却吸引人；最伟大的波兰人法德依·柯斯秋什科就有这样的面貌。这个波兰人采哈诺维奇① 的衣服叫人看出来他非常穷。

过了几天我沿着那条彼尔姆城边界上的荒凉的林荫大道散步；是在五月的下半月，嫩叶已经展开，桦树正在开花(我记得整条林荫大道上种的都是桦树)，路上没有一个人。我们的外省人不喜欢毫无目的的散步。我信步走了好久，后来终于看见在林荫大道的另一边，就是在田野上，有一个人在采集植物标本或者只是采摘这个地区生长的色彩单调而又数目不多的花。他抬起头来，我认出了采哈诺维奇，便朝他走过去。

以后我见到了很多波兰事件的受难者；在波兰斗争中殉道者是非常多的——采哈诺维奇便是头一个。他对我讲起那些穿着高级副官制服的刽子手怎样迫害他们(那些刽子手就是杀气腾腾的冬宫暴君实行屠杀的工具)，听了他的叙述，我觉得我们的痛苦、我们的监牢和我们的审讯简直不足道了。

当时在维尔纳站在胜利的敌人一边的长官就是著名的叛徒穆拉维约夫②，他发表了这个历史"名言"而使自己遗臭万

① 彼得·采哈诺维奇：波兰爱国者，一八三三年在维也纳省被捕，罪名是图谋进行反对沙皇的武装斗争，被流放在彼尔姆。

② 叛徒米·尼·穆拉维约夫(1796—1866)：俄国反动政客，他曾参加十二月党人运动，在审讯中表示对尼古拉的无限忠诚，释放后甘心作沙皇的走狗，得到尼古拉一世和亚历山大二世的宠信。他残酷镇压波兰人民的起义，得到了"绞人者"的绰号。

年，他说“他不是在受绞刑的穆拉维约夫中间，而是在绞死人的穆拉维约夫里面”。在尼古拉的狭隘的、记仇的眼光看来，脾气暴躁的野心家和残酷无情的人是最有用的，至少是最讨人喜欢的。

那些坐在刑讯室里拷问密使[1]（和密使的朋友以及朋友的朋友）的将军对待犯人，就像自己是一个毫无教养、毫无礼貌的恶棍，而同时又十分明白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受到尼古拉的军大衣的保护，那件军大衣是浸透了波兰殉道者的鲜血和波兰母亲的眼泪的。……整个人民的这个受难周[2]还等待着他们自己的路加或者马太[3]。……不过他们应该知道：刽子手将一个接一个地给缚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并在柱子上留下他们的臭名。这将是和一八一二年的统帅画廊[4]配对的尼古拉时期的肖像画廊。

穆拉维约夫对犯人讲话总是不客气地称呼“你”，并且用下流的粗话骂他们。有一次他大发脾气，走到采哈诺维奇面前，想抓他的胸口，也许还想打他，——他遇到了这个戴镣铐的犯人的眼光，感到狼狈，就换了讲话的口气。

我猜得到他当时的眼光是什么样子：采哈诺维奇在事情

① 密使：指波兰革命者中间作联络工作的密使。

② 受难周：所谓耶稣复活节前的一个星期，受难日是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日子。

③ 路加和马太：他们都是传说中《福音书》的编述者。《新约全书》中有《路加福音》和《马太福音》，它们都是耶稣生平、言行和受难的记录。

④ 统帅画廊：指一八二六年在彼得堡冬宫修建的参加一八一二年卫国战争的统帅们的肖像画廊。

过了三年对我谈起这个故事的时候，他的眼睛还发射光芒，他额上和歪扭的脖子上的血管也鼓胀起来。

“您戴着镣铐能够做什么呢？”

“我可以用牙齿咬烂他，我可以用我的头盖骨，用我的镣铐打死他。”他声音打颤地说。

采哈诺维奇起初给流放到威尔霍土利耶，[①] 这是彼尔姆省里一个最远的城市，在乌拉尔山中间，经常积雪很深，远离所有的公路，一到冬天几乎同外界完全隔绝。不用说，住在威尔霍土利耶比住在鄂木斯克或者克拉斯诺雅尔斯克[②] 更坏。采哈诺维奇十分孤寂，就专心研究博物学，采集乌拉尔山的稀少植物的标本，最后他得到了许可移居到彼尔姆市；对他说来，处境是改善多了：他又听到人讲他本国的语言，遇见他的患难朋友了。他留在立陶宛的妻子写信给他说她动身从维尔纳省步行来找他。……他在等她。

我这样意外地给转移到维亚特卡的时候，我去向采哈诺维奇告别。他住的那间小屋子里几乎没有什么陈设；一只又小又旧的箱子放在一张简陋的床旁边，一张木桌和一把椅子，这就是他的全部家具了，——这使我想起了我在克鲁季次兵营里的牢房。

我离开的消息使他难过，不过他已经十分习惯于挫折了，

① 采哈诺维奇一八三三年被流放在切尔登，不是在威尔霍土利耶，他在一八三四年转移到彼尔姆，一八四一年移居切尔尼哥夫省。

② 鄂木斯克和克拉斯诺雅尔斯克：都是西伯利亚的大城市。

所以过了一分钟他便露出差不多是开朗的笑容说：

“这就是我喜欢大自然的原因：一个人不管到哪里，总不能把大自然从他身边抢走。”

我想留一样东西给他作纪念，就把衬衫上的小领扣取下来请他收下。

“它跟我的衬衫不相称，”他对我说，“不过我要把您的领扣一直保存到最后一天，我入土的时候还要戴上它。”

随后他就不作声在想什么，突然间他翻起箱子来。他找到一只小口袋，从里面拉出一根样式特别的小铁链，拉下几个链环，拿给我，一面说：

“这根链条对我非常珍贵，我某一个时期最神圣的纪念是同它连在一起的；我并不送给您整个链条，请您收下这些链环。我从未想到我这个从立陶宛来的流放人会把它们送给一个俄罗斯的流放人。”

我同他拥抱，告别。

“您什么时候动身？”他问道。

“明天早晨，不过我不来叫您了；有一个宪兵一直等在我的住处。”

“那么祝您一路平安；祝愿您比我幸运些。”

第二天早晨九点钟警察局长就来到我的住处，催我动身。彼尔姆的宪兵[1]比克鲁季次的宪兵温和得多，他忙着弄马车，并不掩饰他的高兴，因为可以在三百五十里路上大喝其

① 彼尔姆的宪兵：指费·布尔津，押送作者到维亚特卡的宪兵。

酒。一切都准备好了;我无意中朝街上看了一眼;——采哈诺维奇正走过。我跑到窗口。

“好,谢谢上帝,”他说,“这是我第四次走过了,我想哪怕是远远地跟您告别,可是您总是没有看见。”

我含着满眼的泪水感谢他。这种温情的、女性般的关怀深深地感动了我;要是没有这次的遇见,我在彼尔姆就毫无可以留恋的了!

……我离开彼尔姆的第二天,从大清早就下起了不停的大雨,这是林区常有的情况,而且下了一个整天;两点钟光景我们到了维亚特卡的一个很穷的村子。驿站并没有房屋。沃恰克人[①](他们是文盲)执行站长的职务,打开驿马使用证,查看上面盖的是一个印或者是两个印,嚷着:“走吧,走吧!”把马套在车上,不用说做得比有站长的地方快一倍。我想烤干衣服,让身体暖和些,吃点东西。彼尔姆的宪兵同意我的建议休息一两个小时。这是我们到达村子以前决定的。等到我走进这间不通风的、没有烟囱的小屋,我才明白在这里绝不可能弄到任何东西,而且五里以内连一家小酒馆也没有,我很后悔,正打算要求套马。

我正在考虑走还是不走的时候,一个兵走了进来,向我报告押解站的军官叫他来请我去喝茶。

“很高兴。你的长官在哪儿?”

---

① 沃恰克人:乌德穆尔特人的旧称,这是居住在西伯利亚和俄罗斯东部的蒙古族。

“就在附近的小屋里，阁下。”这个兵做了一个从左面“向后——转”大家熟习的动作。

我跟在他后面。

一个中年以上的身材短小的军官，他的脸上还留着无数的焦虑、种种生活上的操心和对长官的畏惧等等的痕迹，他带着由于十分寂寞无聊而产生的亲热来迎接我。他是这一类不大聪明的、好心肠的老军人：他们干了二十五年的苦差使，没有牢骚，也得不到提升，就像老马拖车那样，它们大概认为它们的职责就是从大清早起给套上缰绳去拉什么东西。

“您带什么人，到哪儿去？”

“您不用问，真叫人痛心；好吧，反正我的上司们已经全知道了，我们的任务是执行命令，我们没有责任；不过从人道方面看来，这是不体面的。”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您瞧，他们弄来了一群倒楣的八九岁的犹太小孩儿。究竟送他们到海军去或者去别处——我不知道。起初的命令是把他们赶到彼尔姆，随后又有了改变——我们赶他们到喀山。我押送他们走了百多里路。移交他们的那个军官说：‘真够倒楣，三分之一在路上留下来了，’”（军官指了指地下）。“准有一半人走不到目的地。”他补充说。

“是不是有什么瘟疫？”我十分激动地问道。

“不，不是瘟疫，不过还是像苍蝇一样地死掉。您知道犹太小孩儿身体差又虚弱，就像一只给剥了皮的猫，他们不习惯在泥路上一天走十个小时，吃干面包……而且是在陌生人中

间，没有父亲，没有母亲，也没有人疼他们；好吧，就咳嗽，咳嗽——咳进了坟墓。劳您驾，请问，这对他们什么用处？他们拿这些小孩儿来干什么呢？”

我没有作声。

“您什么时候动身？”

“早就该动身，可是雨下得太大了……喂，你公家的人[①]，叫小孩儿们集合！”

他们把小孩们带来排成整齐的队伍：这是我从未见过的最可怕的景象，——这些可怜的、可怜的孩子！十二、三岁的小孩也许勉强受得了，可是八、九岁的孩子……没有一支画笔绘得出这样可怕的情景。

他们脸色惨白，十分疲劳，带着惊慌的样子站在那里，穿着不合身的、领子竖起来的兵士厚大衣，用可怜的、无依无靠的眼光呆呆地望着当地驻军的兵士，那些兵正在粗暴地整顿他们的队形。苍白的嘴唇、眼睛底下的蓝圈——这说明他们在发寒热或者发冷。这些有病的孩子没有人照料，没有人爱护，让北冰洋吹过来的寒风无情地吹打，他们正在走向坟墓。[②]

同时请注意，护送他们的是一个和善的军官，他显然可怜这些小孩。然而倘使他们碰到的是一个军事政治的管家人，

---

① 公家的人：过去对军人、警察等人的称呼。

② 尼古拉一世指定犹太人担负“徭役和兵役义务”，这种“义务”使得警察有种种借口来抢劫、掠夺犹太居民，连小孩也不肯放过。

又怎样呢?

我握着军官的手,说了一句:"请小心照顾他们,"就连忙钻进了马车;我想大哭一场,我控制不住自己了。……

在尼古拉残暴的、声名狼藉的统治时期的档案署里面偷偷地埋葬了多少骇人听闻的罪行啊! 我们已经习惯了它们,每天都有人犯下这些罪行,好像它们没有什么不对,也没有人注意它们,听任它们消失在可怕的远方,静悄悄地腐烂在无声无息的官厅的泥沼里头,或者让检查制度把它们包藏起来。

我们不是亲眼看见七个从普斯科夫[①] 来的饥饿的农民吗? 他们被迫迁移到托包尔斯克省去,没有东西吃,也没有过夜的住处,待在莫斯科的特威尔广场上,一直待到德·瓦·戈里曾公爵[②] 下令由他自己出钱收养他们。

① 普斯科夫:彼得堡西南的一座古老的城市。

② 当时的莫斯科总督。

第十四章

维亚特卡——大人的办公室和饭厅——基·雅·丘菲亚耶夫

维亚特卡的省长没有接见我，却叫人传话要我第二天早晨十点钟去见他。

第二天早晨我在大厅里遇见了县警局长①、警察局局长②和两个官员；他们都站着在小声交谈，不安地时时望着门。门打开了，进来一个小个子、宽肩膀的老年人，肩膀上安放着一只像斗犬脑袋那样的头；上下颚很大，这使他更像狗了，而且更明显的是它们经常露出狞笑；他那苍老而又酒色过度的面容、灵活的灰色的小眼睛和稀少的、竖起来的头发给人留下非常讨厌的印象。

他一开头就把县警局局长痛骂一顿，因为他昨天坐车经过的道路很坏。县警局局长站在那里，稍微低下头表示尊敬和服从，对省长讲到的任何事情，他都像古时候听差那样地回答：

① 县警局局长：即谢·瓦·奥尔洛夫，这一天是五月二十日。

② 警察局局长：即米·伊·卡塔尼。

“是，大人。”

他把县警局局长骂够了，就转身向着我。他不客气地望了望我，问道：

“您不是在莫斯科大学毕业的吗？”

“我得到了学位。”

“以后在哪儿任职？”

“在克里姆林宫部。”

“哈，哈，哈！好差使！不用说，您很有空闲时间参加宴会，唱唱歌了。阿列尼曾！”他叫了起来。

走进来一个像是有瘰疬腺结核病的年轻人。

“喂，老弟，这位是莫斯科大学学士；看来他什么都知道，就是不会尽他的职责；陛下要他向我们学习这个。把他放到你的办公室里，给我送专门的报告来。您明天早晨九点钟到办公室去，现在您可以走了。不过，对不起，我忘记问您写得怎样？”

我一下子不明白他的意思。

“得啦，就是书法。”

“我什么也没有带来。”

“拿纸笔来。”——阿列尼曾拿给我一支笔。

“我写什么呢？”

“随便您，”秘书说，“您写：‘经查明——’。”

“好啦，您不会跟皇上上奏摺的。”省长讽刺地笑道。

我还在彼尔姆的时候，就听到许多关于丘菲亚耶夫的事情，可是他远远地超过了我的预料。

还有什么是俄罗斯生活所不能产生的呢!

丘菲亚耶夫出生在托包尔斯克。他的父亲可能是一个流放人,而且是属于最穷的小市民阶层。小丘菲亚耶夫在十三岁的时候就参加了一个流浪卖艺人的班子,从一个集市到另一个集市,到处表演走绳子、翻斤斗等等杂技。他同他们一起从托包尔斯克到波兰的各省,让信奉东正教的同胞们逗笑取乐。在那一带地方,不知道什么缘故,他给逮捕了,他没有身份证,就作为流浪汉同一群犯人一起步行押送回托包尔斯克。他的母亲当时孀居在家,生活过得很苦。她死了,儿子就自起炉灶;应当找一种职业;他小时候念过书,就在市议会当一名抄写员。他生性放荡不羁,并且由于他在卖艺人班子里和被押解的犯人中间受到的多方面的教育(他同他们一起走遍了俄国),他的才能又得到了发展,他成了一个精明强干的人。

在亚历山大〔一世〕统治的初期,有一位钦差大臣来到了托包尔斯克。他需要干练的文书,有人向他推荐了丘菲亚耶夫。钦差大臣非常喜欢他,要带他到彼得堡去。用丘菲亚耶夫自己的话来说,他的野心过去从未超出县法院秘书职位的范围,这个时期他对自己有了更高的评价,便以钢铁般的意志决心要发迹高升。

他果然发迹高升了。十年以后我们看见他做了当时一位负责管军需的将军康克陵的得力秘书。[1] 再过一年他已经主

[1] 丘菲亚耶夫并没有作过叶·弗·康克陵(1774—1845,反动政治活动家)的秘书;他作过符·斯·兰斯基的秘书。

管阿拉克切叶夫办公室(它控制着整个俄国)里发送公文的部门了。联军占领巴黎的时期他跟伯爵[1]一起到了巴黎。

丘非亚耶夫所有的时间都坐在远征军的办公室里不出去,而且 à la lettre〔法语:按照字义地;真正地〕没有见过巴黎的一条街。他白天黑夜都坐在那里,同他那位可尊敬的同事克来英米赫尔[2]一起起草和抄写文件。

阿拉克切叶夫的办公室就像那种工人只能在那里劳动几个月的铜矿一样,因为要是他们待长了就会死亡。连丘非亚耶夫在这个制造命令和指示、决定和法令的工厂里也终于累倒了,他要求一个比较清闲的职位。阿拉克切叶夫不会不喜欢像丘非亚耶夫这样的一个人:他没有多大的奢望,没有什么嗜好,没有个人意见,表面上老实,虚荣心却很大,而且认为服从是人的第一美德。阿拉克切叶夫用副省长的职位酬劳丘非亚耶夫。几年以后他又给了他彼尔姆省长的职位。彼尔姆,丘非亚耶夫曾经走绳子经过这个省,以后又给绳子拴住[3]走过这个省,现在彼尔姆拜倒在他的脚下了。

一个省长的权力是和他同彼得堡距离的远近成正比例的,可是在那些没有贵族的省份像彼尔姆、维亚特卡和西伯利亚,他的权力的增长就要用几何级数计算了。这种地区正是丘非亚耶夫所想望的。

---

① 伯爵:指阿拉克切叶夫。

② 彼·安·克来英米赫尔,参看第五二页注②。

③ 被押解的犯人一路上给用绳子彼此拴在一起,免得有人中途逃掉。

丘菲亚耶夫是东方的暴吏，不过他精明能干、爱活动、什么事都要插手，总是很忙。丘菲亚耶夫本来会成为一个凶狠的一七九四年国民大会的特派员，一个卡里厄[1] 那样的人。

丘菲亚耶夫生活放荡，性情粗暴，不能容忍丝毫的反对意见，他的影响非常有害。他并不受贿，不过在他死后人们看到他也发了财。他对待下属很严，要是谁犯了错误，就会受到无情的惩罚，然而他的官员贪污盗窃的行为比任何时候都更厉害。他滥用他的权势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例如，他派一个官员去侦讯一件案子，不用说，他很关心这个案件，他对那个官员说，大概会查出这个和那个，要是查出了别的来，那个官员就该倒楣了。

丘菲亚耶夫在彼尔姆至今还很有名，那里有一派拥护他、而反对新省长的人，不用说新省长在他的四周也有一群党羽。

另一方面，也有憎恨他的人。其中的一个（这是俄国畸形生活的相当古怪的产物）特别警告我，告诉我丘菲亚耶夫是什么样的人。我讲的是一个工厂的医生。这个人[2] 聪明，又很容易激动，他毕业后不久就结了一桩不幸的婚姻，以后又给派到叶卡捷琳堡，一点经验也没有，就给抛到外省生活的泥潭里来了。虽然他在这种环境中还是处在相当独立的地位，可是他仍然让环境毁掉了。他的全部活动就是拚命挖苦那些官

---

① 让·巴·卡里厄(1756—1794)：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国民大会议员，派往诺曼底和布里塔尼的特派员，以无情镇压共和国的敌人出名。

② 英译本中这里译作“这个医生叫做切包塔列夫”。

员。他当面笑他们，他装腔作势、红眉绿眼，当着他们的面讲最带侮辱性的话。因为谁都给骂到了，便没有人特别对医生的刻薄嘴生气。他用他这些攻击给自己造就了社会地位，迫使那一群没有骨气的人忍受他经常的责骂。

别人警告我，说他是一个好医生，不过脑子有毛病，而且非常没有礼貌。

他那些唠叨和玩笑既非粗俗下流，也不是索然寡味；完全相反，它们富于幽默感，而且非常尖酸刻薄；这是他的诗，他的复仇，他的怒吼，也许还有一些悲观绝望的成份。他用艺术家和医生的眼光研究了那班官员，他深知他们的庸俗的爱好和隐秘的感情，鉴于他那帮熟人既无才干而又胆小，他便毫无顾忌地随意对待他们。

他在每句话后面都要加一句："毫无关系。"有一次我随便地向他提起这句口头禅。

"您为什么觉得奇怪呢？"医生回答道，"我们讲的每句话都有一个目的，就是要人相信，所以我连忙加上世界上最有力的论证。您要一个人相信杀死自己亲生父亲毫无关系，——他就会把父亲杀掉。"

切包塔列夫从来不拒绝把一两百纸卢布的小额款子借给别人。有人向他借款的时候，他就掏出他的笔记本，详细问清楚归还借款的日期。

"现在，"他说，"让我同您赌一个银卢布，您到期准还不了。"

"得啦吧，"那个人反驳说，"您把我当成了什么样的人？"

“不管我把您当成什么人，对您毫无关系，”医生答道，“然而事实是：我做了六年的纪录，还不曾有过一个人到期归还借款，也几乎没有人过期偿还的。”

过了规定的日期，医生就会很认真地讨他赢的那一个银卢布。

彼尔姆的一个包税商出卖一辆旅行马车；医生去找他，一口气对他讲了下面这番话：

“您出卖马车，我需要它；您是有钱人，您是百万富翁；大家都为这个尊敬您，因此我也来向您表示敬意；您是有钱人，您卖不卖马车，对您毫无关系，我非常需要马车，可是我只有很少的钱。您想压榨我，想利用我的需要讨价一千五；我给您七百卢布，我要每天来讲价钱；过了一个星期您会让到七百五或者八百，——那么还不如一开头就要这个价钱？我准备出这个价钱。”

“好得很。”吃惊的包税商答道，就把马车卖给他。

切包塔列夫的趣事和恶作剧是没完没了的；我再讲两个。[①]

“您相信催眠术吗？”有一位相当聪明而又有教养的太太当着我的面问他道。

“您讲的催眠术是什么意思？”

太太对他讲了些一般人讲的那种废话。

---

① 初版中并没有这两件趣事，我重读供修订用的本书样张的时候想起了它们。（一八五八）——作者原注

“我信不信催眠术，对您毫无关系，”他答道，“不过您要是愿意，我就跟您讲讲我在这方面亲眼看见的事情。”

“请讲吧。”

“那么请注意地听我讲。”

于是他非常生动地、聪明地而且有趣地描述他一个熟人（一位哈尔科夫医生）的试验。

在谈话的中间，一个仆人送了放在托盘上面的小吃来。他走出去的时候，太太对他说：

“你忘了拿芥末来。”

切包塔列夫停下不讲了。

“讲下去，讲下去，”太太已经有点吃惊地说，“我在听呢。”

“他送了盐来吗？”

“那么您已经生气了。”太太说，脸涨得通红。

“一点儿也不，请您相信；我知道您在注意地听，我也知道，一位妇女不论她多么聪明，也不论谈的是什么事情，她总不能超过厨房的范围，——那么我怎么敢私下生您的气呢？”

他也在波里叶伯爵夫人的工厂里看病，他喜欢那里的一个家奴的男孩；他要那个男孩到他家里干活。男孩同意了。可是管理员说没有得到伯爵夫人的许可他不能放男孩走。切包塔列夫给伯爵夫人去了信。她吩咐管理员发给男孩身份证，不过有一个条件，要切包塔列夫预付五年的代役金。他得到这个答复，马上写信给伯爵夫人说，他同意她的条件，不过

请她先解答他的这样一个疑问：倘使恩克彗星[1] 穿过地球的轨道使地球脱离了自己的轨道，——这件事可能在到期一年半以前发生，那么他向谁讨还已经付出的钱呢？

我动身去维亚特卡的那天，医生很早就来了，而且说起下面的傻话来：

"像贺拉斯[2] 那样，您一次彼里〔俄语：唱了歌〕，一直到现在您还在彼列沃佳特〔俄语：迁移〕[3]"

随后他掏出他的皮夹子，问我路上是不是需要钱用。我谢绝了。

"您为什么不要呢？这对您毫无关系。"

"我有钱。"

"很糟，"他说，"世界末日要到了。"他打开笔记本写下来："经过了十五年的实践，我第一次遇到一个人，他甚至在动身上路的时候都不肯借钱。"

开过玩笑以后，他就在我的床上坐下来，严肃地对我说：

"您是到一个可怕的人那儿去。您要小心提防他，尽可能离他远些。要是他喜欢您，您给人的印象就糟了；要是他不喜

① 恩克彗星：法国天文学家让·庞斯(1761—1831)在一八一八年发现的周期彗星。这个彗星的特征是绕日运行的周期短(约三·三年)，并且有变化性，这是德国天文学家约·恩克(1791—1865)算出来的，因此人们称它做恩克彗星。

② 贺拉斯：即古罗马诗人肯土斯·贺拉修斯·弗拉苦斯(前65—前8)。

③ 这句话是玩弄文字游戏。"彼列沃佳特"这个动词有两个意义，即翻译和迁移；这里不是说从一种语言译成另一种语言，而是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

欢您,那他就会拿诬蔑、造谣以及我不知道的什么来毁掉您,反正他要毁掉您,这对他毫无关系。”

这个时候他对我讲了一件事,我后来有机会看到内务部办公厅的公文,证明确有这件事情。

丘菲亚耶夫同一个贫穷的小官员的姐姐公开发生关系。弟弟成了嘲笑的对象;弟弟想断绝这种关系,他用上告来威胁,准备写信寄到彼得堡去,总之,他吵吵嚷嚷闹得太厉害了,有一次警察捉住了他,当作狂人送交省长公署进行检查。

省长公署,院、局长,卫生局督办(一个受到当地人民十分喜爱,而且我后来也同他相熟的德国人)——全都认为彼得罗夫斯基是一个狂人。

我们的医生认识彼得罗夫斯基,给他看过病。他们为了履行形式也征求他的意见。他告诉卫生局督办说彼得罗夫斯基完全不是狂人,他建议他们重新检查一次,否则他就要上告。省长公署并不反对这个建议,可是不幸彼得罗夫斯基虽然是一个身体强壮的小伙子,却没有等到预定的第二次检查,就死在疯人院里面。

有关这个案件的报告送到了彼得堡。彼得罗夫斯基的姐姐给逮捕了(为什么不逮捕丘菲亚耶夫呢),一次秘密的侦讯开始了。丘菲亚耶夫口授了答词;他在这个案件中做出了空前的惊人的举动。丘菲亚耶夫为了马上煞住这次侦讯,并且使自己免掉第二次被迫到西伯利亚去的危险,就教唆彼得罗夫斯卡雅供认她由于年轻不懂事在亚历山大皇帝驾临彼尔姆

的时候受到皇帝宠幸，而且因此经过索洛姆卡将军[1] 的手得到五千卢布，在这以后她的弟弟就经常同她争吵。

亚历山大〔一世〕本来有那样的癖好，因此这个故事里并没有什么不可相信的地方。很不容易查出它是真是假，而且不管怎样，追查起来，准会闹出很多丑事。索洛姆卡将军回答卞肯多尔夫的问话的时候说，经过他的手送出去的钱是很多的，他记不起这笔五千卢布的事了。

“La regina en aveva molto!〔意大利语：皇后有很多情人！〕[2]”普希金的《埃及之夜》[3] 里的即兴诗人说。

现在就是这个阿拉克切叶夫的尊贵的学生和克来英米赫尔的可敬的同事，这个杂技艺人、流浪人、抄写员、秘书、省长，这个心肠很软的人，这个把健康的人关进疯人院让他们死在那里的廉洁的人，这个诽谤亚历山大皇帝来转移尼古拉皇帝的视线的人来管教我如何供职办事了。

我在这里差不多要完全靠他。他只要给大臣写上几句废话，我就会被送到伊尔库次克的某地去。其实他也用不着写什么！他有权把我遣送到任何一个交通阻塞、物资奇缺的荒凉城市卡依或者察列沃山楚尔斯克去。丘菲亚耶夫把一个年

---

① 索洛姆卡将军即阿·达·沙洛姆卡(1786—1872)，亚历山大一世的亲信，御前大臣，曾经陪同亚历山大一世巡视国内。

② 这一句意大利语在《埃及之夜》第三章中的原文是：perché la grande regina aveva molto，意思是：“因为伟大的皇后有很多〔情人〕。”

③ 《埃及之夜》是普希金的未完成的遗著(小说)，一八三五年创作。一八三七年发表。

轻的波兰人遣送到格拉左弗去，因为这里的太太小姐们宁愿同他跳玛组卡舞，不愿同这位大人一起跳。

陀尔戈鲁基公爵[①] 也就是这样地从彼尔姆给遣送到威尔霍土利耶的。威尔霍土利耶给埋在群山和积雪中间，虽然论气候它和别列左夫[②] 一样，论荒凉它比别列左夫更差，但它还是在彼尔姆省省境之内。

陀尔戈鲁基公爵属于坏的一类贵族的浪子，这种人我们现在很难见到了。他在彼得堡玩了各种各样的恶作剧，在莫斯科也是这样，在巴黎也是这样。

他的一生就是这样度过的。他是一个小型的伊兹马依洛夫[③]，又是一个没有累斯科沃那群逃亡农奴的叶·格鲁津斯基公爵[④]，换句话说，他是一个娇生惯养、粗暴无礼、非常恶劣、爱开玩笑的人，既是一个绅士，又是一个小丑。后来他的行为越出一切界限的时候，他就被勒令住到彼尔姆来。

他坐了两辆马车到彼尔姆：一辆车上坐的是他本人和他的狗，另一辆车里坐着他的法国厨子和鹦鹉。彼尔姆的人很高兴有钱的客人到来，不久全城的人都拥到他的饭厅里来了。

---

① 米·米·陀尔戈鲁科夫公爵(1794—1841)，退职上尉，一八三一年被流放到维亚特卡，然后转到彼尔姆，后来到威尔霍土利耶。

② 别列左夫：在西伯利亚鄂毕河下游左岸，帝俄时代的流放地。

③ 列·德·伊兹马依洛夫(1764—1834)：俄国将军、梁赞省大地主，以残酷虐待农奴出名。

④ 格·亚·格鲁津斯基(叶果尔·瓦赫坦盖叶维奇，1762—1852)：以对待农奴残酷出名的大地主。他在累斯科沃还收容了一群从别的地主那里逃出来的农奴。

陀尔戈鲁基和彼尔姆的一位年轻太太勾搭上了；太太疑心他对她不忠实，一天早晨突然来到公爵家里，发现他同女仆睡在一起。于是引起了一场吵闹，吵到最后这个不忠实的情人拿下了挂在墙上的短柄长鞭；这位文官太太看出了他的打算，就逃跑了；他追了出去，身上随便穿了一件晨衣；他在一个小广场上(一营兵通常在这里操练)赶上了她，就用短柄长鞭把这位吃醋的太太抽了两三下，然后从容地走回家去，好像办完了公事一样。

这类有趣的恶作剧引起了彼尔姆朋友们的公愤，当局决定把这个四十岁的顽童遣送到威尔霍土利耶去。在动身的前夕他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宴会，官员们不顾他们之间的关系不好，都来了。陀尔戈鲁基扬言要用从未有过的大馅饼招待他们。

大馅饼的确非常好，快得叫人不能相信地就吃光了。等到只剩下一点馅饼外皮的时候，陀尔戈鲁基感伤地对客人们说：

“不会有人讲我在跟你们分别的时候吝惜什么了。我昨天叫人杀了我的加尔吉来做馅饼。”

官员们恐怖地互相望着，用眼光去找寻他们熟习的那条丹麦狗，——它不见了。公爵猜到了他们的心思，吩咐仆人把加尔吉的遗骸和它的皮拿了出来；它的肉都在彼尔姆官员们的胃里面。半个省城给吓出病来了。

这个时候陀尔戈鲁基因为自己巧妙地拿朋友们开了一次玩笑十分得意，便高高兴兴地坐车到威尔霍土利耶去了。第三辆车子装了整整一个鸡棚，——鸡棚乘坐驿马旅行！路上

他拿走了几个驿站的收款簿，把它们混在一起，改了一些数字，差一点叫驿站长们发狂，因为这些人即使有帐簿在，也不是经常能够把帐目弄得清清楚楚。

俄国生活的令人窒息的空虚和缄默，奇怪地同俄国人性格的活泼甚至热烈结合在一起，使得我们中间各种各样古怪疯狂的行为特别发达起来。

在苏沃洛夫[①]的鸡叫中，就像在陀尔戈鲁基的狗肉馅饼上，在伊兹马依洛夫的野蛮行为[②]上，在玛莫诺夫[③]的半自愿的疯狂上，在"美国人"妥尔斯太[④]的狂暴的罪行上一样，我听到一种出自同源的调子，这种调子我们大家都很熟习，不过由于教育的关系在我们身上它减弱了，或者给引到别的什么东西上面去了。

我认识妥尔斯太，而且正是在他的女儿沙拉（一个诗才很

① 亚·瓦·苏沃洛夫（1730—1800）：俄国大元帅，他喜欢用意外的动作（如鸡叫等）来作弄古板拘泥的官内官员。

② 一八〇二年亚历山大一世下令调查伊兹马依洛夫少将管理他的图拉田产的情况，他在那里为了细小的事情拷打并囚禁农奴。由于地方当局的包庇，伊兹马依洛夫能够继续管理并坚持使用他那些残暴手段，一直到一八三〇年。就是在那个时候，他也只是受到剥夺田产管理权、关在一个小城里的处罚。伊兹马依洛夫和"美国人"妥尔斯太在格利包耶多夫的名剧《聪明误》里都给提到了。——英译者注

③ 玛莫诺夫：即马·亚·德米特利叶夫-玛莫诺夫伯爵（1790—1863），父亲是叶卡捷琳娜二世的一个宠臣，本人参加过一八一二年的卫国战争，又曾参加草拟贵族宪法草案；一八一七年后，在自己的田庄上隐居，说是患了精神病。

④ 妥尔斯太：即费·伊·妥尔斯太伯爵（1782—1846），有钱的地主、冒险家和决斗家。

高的不寻常的少女)逝世的时候。[1] 只要看一眼这个老人的外貌,看他那盖满灰白色鬈发的前额,看他那闪闪发光的眼睛,和大力士一般的身体,就看出他赋有多大的精力。他单单发展了他那些狂暴的激情,他那些不良的嗜好,这是毫不奇怪的事:在我们中间一切不道德的事情都可以自由发展,在一个长时期不会受到阻碍,然而有人却因为表现了合乎人道的感情,一开头就给送到卫戍区或者流放到西伯利亚去。……他横行霸道、赌钱、打架,把人弄成残废,搞得人家破人亡,接连不断地继续了二十年,到末了他才给流放到西伯利亚,从那里他又像格利包耶多夫所说"作为一个阿留申人回来了"[2],就是说,他经过堪察加到了美国,然后得到返回俄国的许可。亚历山大赦免了他,——而他在回国的第二天又继续过从前那样的生活。他同莫斯科茨冈人班子里一个嗓子很出名的姑娘结了婚,他的家变成了一个赌场,他把全部时间花在大吃大喝上面,夜夜打牌,而且在沙拉小时候的摇篮旁边经常发生贪欲酗酒、疯狂打闹的场面。传说他有一次为了表示他射击准确,叫他的妻子站在桌子上,他打穿她的鞋后跟。

他的最后一个恶作剧几乎把他第二次送到西伯利亚去。他不高兴某一个小手艺人很久了,他在他家里捉住他,绑住他的手足,拔掉他一颗牙齿。谁能相信这件事就发生在十年或

---

① 沙拉·妥尔斯塔雅:女诗人,死的时候只有十七岁。

② 阿留申人是居住在美国阿留申群岛的民族,语言接近爱斯基摩语。这句话是从格利包耶多夫的《聪明误》中列彼季洛夫的独白里引来的。(见《聪明误》第四幕第四场。)

者十二年以前呢？受害人递了呈文控告他。妥尔斯太贿赂了警察，贿赂了法官，而小手艺人说是犯了诬告罪给下了狱。当时一个有名的俄国文学家尼·菲·巴甫洛夫[①]在监狱委员会工作。小手艺人把他的案件对他讲了，这个缺乏经验的官员就提起诉讼。妥尔斯太真正吓坏了，因为审理的结果显然要判他的罪；然而俄国的上帝是伟大的！奥尔洛夫伯爵[②]给谢尔巴托夫公爵[③]写了一份秘密公函，劝他压住这个案件，不要产生这种低阶层的人对高阶层的人的公开胜利。对尼·菲·巴甫洛夫，奥尔洛夫伯爵则建议免去他的现职。……这几乎比拔牙齿的事情更难叫人相信。我当时在莫斯科，同那个不大谨慎的官员很熟。不过还是让我们回到维亚特卡来吧。

省长公署办公室比监狱坏得多。并不是由于实际工作的繁重，却是由这种散发霉味的环境的令人感到窒息的空气，简直和在狗洞里一样，还有那可怕的、愚蠢的浪费时间——就是这些使得办公室叫人受不了。阿列尼曾并没有歧视我，他甚至比我所料想的更客气；他在喀山中学念过书，因此他尊敬莫斯科大学的学士。

办公室里大约有二十个抄写员，他们大多数都是没有受过教育毫无道德概念的人；他们是抄写员和秘书的儿子，他们从小就习惯于把职务当作获利的手段，把农民当作给他们带来进

① 尼·菲·巴甫洛夫(1805—1864)：俄国作家和记者。

② 指阿·费·奥尔洛夫伯爵，参看第二八〇页注③。

③ 阿·格·谢尔巴托夫公爵(1776—1848)：俄国将军，一八四四至一八四八年间任莫斯科总督。

款的土壤,他们出卖证件,索取二十戈比和二十五戈比,为了一杯酒弄虚作假,降低自己身份,干各种各样的下流勾当。我的随从不肯再去"弹子房",说是官员们玩起欺骗手段来比任何人都坏,而且又无法给他们一个教训,因为他们是"官"。

现在我就得同这些人(我的仆人只是因为他们是官才不揍他们)一起每天从早晨九点坐到下午两点,又从五点坐到晚上八点。

阿列尼曾是办公室的主任,除了他以外,我在的那个科里还有一个科长,他也不是坏人,尽管他爱喝酒,又没有文化。四个抄写员和我在同一个科里办公。我不能不同他们谈话,和他们相熟,而且的确也同所有别的人相熟了。且不去说,要是我不这样做,这些人就会说我"骄傲",迟早给我颜色看,而且每天同这些人在一起度过几个小时,要不同他们相熟也绝不可能。此外还不应该忘记,外省人喜欢接近外来的人,特别是从首都来的人,尤其是在关于这个人流传着什么有趣的故事的时候。

我在这个苦刑监① 里坐了一个整天以后回到家中,有时候我感觉到我全身的机能都变得迟钝了,便倒在长沙发上,——疲劳不堪,十分委屈,不能够做任何工作,干任何事情。我从心眼里惋惜我那间克鲁季次营房里的单人牢房,同它的煤烟和黑蟑螂,同守在门口的宪兵和门上的锁。在那里

① 苦刑监:原文是欧洲古代用奴隶和罪犯等在底舱划桨的帆桨并用的大船,作者把他在这个办公室里的工作比做在底舱划桨的苦刑。

面我倒是自由的,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没有人妨碍我;没有这些粗俗的谈话,没有这些龌龊的人,没有这些卑鄙的思想,没有这些粗野的感情,那里只有死一样的沉寂和无人打扰的空闲。我一想到午饭以后我还得再去上班,明天也要去,有时候我就抑制不住愤怒和绝望,我便喝葡萄酒和伏特加来消愁。

更坏的是有一个同事"路过"我的住处进来聊天排遣寂寞,一直聊到上班的时候。……

然而几个月以后办公室的情况就比较好些了。

长期连续的迫害同俄国人的性格不符合,除非中间掺杂了私人的原因或者图利的打算;这并不是因为政府不想把人摧残至死,而是由于俄国人的粗心大意,由于我们的 laisser-aller〔法语:随随便便〕。当权的俄国人一般都是粗野、蛮横、不讲礼的,人很容易惹起他们发脾气、动武,可是他们不高兴持续下去地迫害一个人,他们在这方面没有足够的耐心,也许还因为他们不能从中获利。

起初他们一时兴起,想一方面表示他们的忠心,另一方面表示他们的权力,就干出各种傻事和不必要的事情,然后他们渐渐地不去理睬这个人了。

办公室的情形就是这样。当时内务部对统计的兴趣很大;它下令各地都成立委员会,① 而且发下去一些甚至在比

① 根据枢密院和内务部的命令,一八三五年一月二十五日起在各省成立统计委员会,负责登记国家财产。维亚特卡的统计委员会在一八三五年五月开始工作。

利时或者瑞士也无法实现的规划；同时还发下各种各样的精细的表格，表格上附有 maximum〔拉丁语：最高额〕和 minimum〔拉丁语：最低额〕，附有从十年内的总数得出来的结论和平均数（编制它们需要的资料，即使提前一年也收集不起来！），还附有道德方面的意见和气象的观察。并没有拨下一个钱作为委员会和收集资料的经费；这一切都得由地方警察局出于对统计的爱好来完成，最后再由省长公署办公室汇总整理。省长公署办公室的事情已经很多，地方警察局素来讨厌一切和平的和理论的工作，他们把统计委员会当作无用的奢侈，当作部里的恶作剧；然而附有表格和结论的报告还得照常送上去。

这个工作对整个办公室来说似乎是极其繁难的；它简直是办不到的；可是谁也不担心它，大家忙着的只是不要受到申斥。我答应阿列尼曾写出绪论和引言，作好表格的摘要，而且附上雄辩有力的备注、外国词、引文和出色的结论等等，不过要他批准我在家里（而不是在办公室里）从事这个繁重的工作。阿列尼曾向丘菲亚耶夫汇报了以后，同意了。

我在委员会工作报告书的引言中谈着希望和计划，因为事实上委员会什么事也没有做，这个引言使得阿列尼曾十分感动。连丘菲亚耶夫也认为引言写得很精彩。这样我在统计方面的工作就结束了，可是他们要我来主持委员会的工作。人们不再支使我做抄写的苦工了，我那个爱喝酒的科长几乎做了我的部下。阿列尼曾只是要求我每天到办公室坐短短的一段时间，表示遵守规矩。

为了表示完全不可能有认真的统计表，我把县辖城市卡依送来的报表抄引在下面。例如在各种各样荒唐的废话中间就有："溺死——二人，溺死原因不明——二人"，在共计栏内，这两个数字加在一起成为"四人"。在非常事故的项目下，则举出如下的悲惨事情："某某，小手艺人，因纵酒而精神错乱，——自缢身死。"在城市居民的道德项目下面写着："卡依城内并无犹太人。"在问到有没有拨款修建教堂、市场、养老院的时候，回答是："修建市场拨款——无。"……

统计学把我从办公室的工作中救了出来，却产生了使我同丘菲亚耶夫发生个人接触这个不幸的后果。

我有一个时期憎恨这个人；这个时期早已过去了，而且这个人也去世了，他在一八四五年前后死在他的喀山领地上。现在我心平气和地想到他，毫无怨恨，就像想到在树林里和偏僻地方遇到的一只特别的野兽，我们应当研究[1]这只野兽，然而不能因为它是野兽就生它的气；当时我不能不同他斗争：这是任何正派人所不能避免的。幸运帮助了我，否则我要吃他的大亏；不过要是我还因为他对我并未做到的损害怀恨在心，那就未免可笑而且卑鄙了。

丘菲亚耶夫只有一个人。妻子跟他离了婚。他的宠妾由他藏在省长公署的后院，这种别扭的做法好像还是有意的，她是厨子的老婆，厨子则因为不该同她结婚、给遣送到乡下去了。她并不公开露面，不过那些特别忠于省长的（也就是说特

① 英译者译作"驯服"。

别害怕说是不忠于省长的）官员们就在这位"得宠的"厨子老婆的身边扮演宫内官员的脚色。他们的妻子、女儿晚上偷偷地去拜望她，并不对外声张。这位太太手腕高强，比得上她那些杰出的前辈中的一位——波将金[①]；她知道老头子的脾气，又害怕有人夺去宠爱，她亲自给他找寻对她并无危险的女人。老头子倒感激她这种宽大的爱情，很喜欢她，他们一起生活得很顺遂。

丘菲亚耶夫整个上午都在省长公署办公。生活的诗只是从下午三点开始的。对他说来午饭并不是儿戏。他喜欢吃好的饮食，又喜欢同客人们一起吃。他的厨房总是准备十二个人的饭菜；倘使客人减少了一半，他就不高兴；倘使客人只有两个，他就很难过；倘使一个客人也没有，他就垂头丧气到杜尔西内娅[②] 的房里去吃饭了。把人找来请他们吃饱，并不是什么难事，然而他的官场身份和官员们在他面前感到的恐惧，使他们不能随便地享受他的款待，也不允许他把他的家变成饭馆。因此他只好限于邀请顾问，院、局长们（可是他同他们中间的半数都不和，也就是说他不赏识他们），少有的过路客人，有钱的商人，包税商和有些类似路易·非力浦企图介绍到

---

① 格·亚·波将金：谋杀沙皇彼得三世的阴谋分子，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宠臣。参看第三六页注③。

② 杜尔西内娅：指丘菲亚耶夫宠爱的厨子老婆。杜尔西内娅是西班牙作家米·德·塞万提斯(1547—1616)的著名小说《堂·吉诃德》中主人公堂·吉诃德的"意中人"，她本名阿尔东莎·洛兰索，堂·吉诃德暗中称她为杜尔西内娅·台尔·托波索。

选举中来的那种 capacités〔法语：资格〕[①] 的怪人。不用说，我就是维亚特卡的头号怪人。

“由于政见不同”而被流放到边远城市居住的人，虽然有些人害怕他们，可是从来没有人把他们当作普通的人看待。外省人对“危险人物”很感兴趣，犹如女人对著名的洛夫莱斯、男人对交际花那样。外省人，尤其是西伯利亚人，不像彼得堡的官员和莫斯科的阔人那样躲开危险人物。

由于十二月十四日的事情被流放的人受到了十分的尊敬。元旦日官员们访问的第一个人就是尤希涅夫斯基[②] 的寡妇。枢密官陀尔斯太[③] 视察西伯利亚，就是根据他从流放的十二月党人那里收集的资料来核对官员们报告的事实。

米尼赫[④] 从他在彼雷姆的塔上管理着托包尔斯克省的事情。省里有什么重大事情省长就去找他商量。

普通老百姓更不敌视流放人，他们一般站在犯人的一边。在西伯利亚边界一带地方，人们不用“流刑犯”这个字眼，却用“不幸的人”来代替。在俄国老百姓的眼里法院的判决不会败

---

① 指一八四〇至一八四八年这一段时期中法国在国王路易·非力浦统治下草拟的选举改革计划。其中规定有学问的人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② 阿·彼·尤希涅夫斯基(1786—1844)：俄国主计总监，十二月党人，在西伯利亚作苦工到一八三九年，以后定居在那里。一八四四年他逝世后，他的妻子玛·卡·尤希涅夫斯卡雅还在西伯利亚住到一八五五年。

③ 尼·伊·陀尔斯太(1792—1854)：到西伯利亚视察的枢密官。

④ 布·赫·米尼赫(1683—1767)：德籍，俄国元帅，一七三五至一七三九年统率俄军对土耳其作战，一七四二年后被流放到彼雷姆，一七六二年由叶卡捷琳娜二世召回彼得堡。

坏一个人的名誉。住在通往托包尔斯克省的公路旁边的彼尔姆省的农民经常在一堵小窗口放着克瓦斯、牛奶和面包，要是有一个“不幸的人”从西伯利亚逃出来偷偷地经过这里，他可以自由取食。

顺便讲一下流放人，——过了尼日尼，就开始遇到波兰流放人了，从喀山起，他们的人数激增。在彼尔姆有四十个人，在维亚特卡并不少一些；此外每个县城都有几个。

他们的生活是同俄国人完全隔开的，他们避免同当地居民有任何的接触；他们中间非常团结，有钱的人同贫穷的人像弟兄一样分享他们的一切。

我也从未看见当地居民对他们有什么憎恨或者特别好意的表示。他们把这些人看做外人，尤其因为这些波兰人里面几乎没有一个懂俄国话。

一个顽强的老萨尔玛特人①，他是波尼雅托夫斯基②部下一个枪骑兵军官，参加过拿破仑的远征军，一八三七年给批准回到自己的立陶宛庄园上去。老人动身的前夕，邀请我和几个波兰人去吃午饭。午饭后这位骑兵军官举着酒杯走到我面前，同我拥抱，并且带着军人的忠厚朴实在我的耳边小声说：“啊，您为什么是俄国人呢。”我没有回答一声，可是这句话深刻地印在我的心上。我明白这一代人并不能够使波兰得到

① 萨尔玛特人本来是公元前三到二世纪中黑海沿岸草原上的游牧民族，波兰人把反对一切外来人的民族主义者称为萨尔玛特人。

② 斯·阿·波尼雅托夫斯基(1732—1798)：一七六四至一七九五年间的波兰国王。

解放。

从柯纳尔斯基[1] 的时候起，波兰人对俄国人的看法就完全不同了。

一般说来，波兰流放人并没有受多大的压迫，可是那些毫无财产的人的境遇就很糟了。政府发给贫穷的人每月十五个纸卢布；他们用这笔钱付房租、衣食费和烤火费。在喀山和托包尔斯克那样较大的城市里，还可以找到这一类的事情，如授课、开演唱会、在舞会里演奏、画像、教跳舞等等。在彼尔姆和维亚特卡他们就没有这种谋生方法。但是不管怎样，他们决不向俄国人要求什么。

……丘菲亚耶夫邀请我去参加他那丰盛的西伯利亚午餐，这件事对我说来是一个真正的刑罚。他的饭厅类似办公室，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罢了，不像办公室那样脏，却更俗气，因为它有一种自愿而非强迫的外貌。

丘菲亚耶夫看透了他的客人，他轻视他们，有时候他还给他们看看他的爪子，一般说来，他对待他们就像主人对待自己养的狗一样：时而过分亲切，时而极其粗暴，——然而他还是叫他们吃饭，他们也还是既战战兢兢、又高高兴兴地到他那里去，卑躬屈节，议论是非，拍马屁，巴结奉承，做笑脸，低头

---

① 西蒙·柯纳尔斯基(1808—1839)：波兰革命者，参加了一八三〇年的波兰起义。他主张同俄国革命者合作推翻沙皇政府，又主张团结欧洲进步力量从专制政府的压迫下解放各国人民。他是“青年欧洲”同盟的一个组织者。他被捕后关在维尔纳的时期(一八三八年)，俄国军官还成立秘密组织，企图营救他。一八三九年他在维尔纳被处死刑。

弯腰。

我替他们红脸，替他们害臊。

我们的友谊并不长。丘菲亚耶夫不久就看出我不宜于待在维亚特卡的“上层”社会。

几个月以后他已经不高兴我了，再过几个月他就恨起我来，我不仅不去参加他的午宴，而且我完全不到他那里去了。皇位继承人[①]的到来使我免于遭受丘菲亚耶夫的迫害，这件事我们在后面就会谈到。

我得说明我绝没有做过任何事情值得他对我先是注意和邀请吃饭、后来又是愤怒和不满。他看见我这样一个独立行动的人（虽然我完全不是没有礼貌）他受不了；我对待他始终是 en règle〔法语：合乎礼节的〕，可是他要的是卑躬屈节。

他非常喜欢他的权力，权力是他辛辛苦苦地得来的，他不仅要求别人服从他，而且还要求外表上的绝对服从。不幸，在这方面他是有民族性的。

一个地主对仆人说：“闭嘴！我不许你回答我！”

一位司长听见他属下的官员发表反对意见，气得脸色发白，说：“您忘记了自己，您知道您在同谁讲话！”

皇上“因为政见不同”把人流放到西伯利亚去，因为写诗，把人长期关在牢房里，——上面这三种人都是一样，他们宁可赦免盗窃行贿、杀人抢劫，却不愿意宽恕表示人的尊严的所谓无礼行为和表示独立见解的所谓傲慢语言。

① 皇位继承人：即皇太子，后来的亚历山大二世。

丘菲亚耶夫是一个真正的沙皇的仆人。人们把他看得高，但也并不太高。在他的身上拜占庭[①]的奴性和官纪非常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他一方面在权势面前卑躬屈节，放弃了自己的意志和思想，另一方面他又蛮横地压迫下属。他本来可以做一个非军人的克来英米赫尔，他的"热心"本来也可以同样地克服一切[②]，他本来也可以同样地用人的尸首抹墙，用人的肺使宫殿干燥，因为工程兵队里的年轻人不肯做告密人，就更厉害地鞭打他们。

丘菲亚耶夫对一切有关贵族的事物都怀有一种持久的暗暗的仇恨，这是从他的痛苦的经验里得来的。对丘菲亚耶夫说来，阿拉克切叶夫办公室苦役般的繁重工作倒是他的第一个避风港，第一次的解放。在这以前他的上级们从来没有给过他一个座位，只是差遣他做些琐碎事情。他在军需部门工作的时候，军官们照军队的习惯迫害他，一位上校在维尔纳的大街上用马鞭抽打他。……这一切都在抄写员的灵魂里扎根成熟了；现在他做了省长，轮到他来压迫人，不让人坐下，用"你"称呼人，向人吼叫，而且有时候他还把世袭贵族送交法庭。

---

① 拜占庭在巴尔干半岛的东端，即现在土耳其的君士坦丁堡。公元三九五至一四五三年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拜占庭帝国自称为古代罗马帝国真正的继续，后称为东罗马帝国。旧时罗马的法律和习俗在那里仍然被遵守，只不过由于逐渐缓慢的发展，带来了一些改变。

② 克来英米赫尔：参看第五二页注②。他是尼古拉一世的宠臣，尼古拉一世颁发给他的伯爵纹章上面的题词是："热心克服一切"。

丘菲亚耶夫从彼尔姆给调到特威尔。那个省的贵族虽说低头服从和卑躬屈节，却不能同丘菲亚耶夫相处。他们呈请布卢多夫大臣[①] 把他调开。布卢多夫便委派他到维亚特卡来。

在维亚特卡他又非常自在了。官员和包税商、工厂老板和官员——他现在完全没有拘束了。……所有的人见到他都发抖，所有的人在他面前都不敢坐下，所有的人都请他喝酒，请他吃饭，所有的人都看他的脸色行事；在结婚和命名日的宴会上，第一次举杯祝酒总是"敬祝大人身体健康！"

① 德·米·布卢多夫(1785—1864)：一八三二至一八三七年间担任帝俄政府内务大臣的职务。

第十五章

官吏们——西伯利亚总督——一个贪得无餍的警察局长——一个“恭顺的”法官——一个烧烤的县警局局长——一个传道的鞑靼人——一个女性的男孩——土豆的恐怖及其他

彼得一世在俄国实行改革所产生的一个最悲惨的结果就是官吏阶层的发达。① 这是一个人为的、没有知识的、饥饿的、除了“上班办公”外什么也不会做的、除了公文格式以外什么也不知道的阶层;这是一种在法院和警察局里供职的世俗教士,他们用成千上万张贪婪的、龌龊的大嘴吸老百姓身上的血。

果戈理拉开了帷幔的一个角,让我们看见俄国的官吏阶层和它整个丑恶的面目;然而果戈理不得已地用笑来妥协了;他的巨大的喜剧才能超过了他的愤怒。而且受到了俄国书刊检查制度的束缚,他也很难接触到这个肮脏地下室的悲惨的一面,而俄国不幸的老百姓的命运却正是在这里锻造的。

---

① 彼得一世当时规定俄国官阶为十四级,不得越级升迁。

在那里,在我们匆匆经过的熏黑了的办公室的某处,有一些穿得破破烂烂的人在灰白色纸上写着,写着,又抄写在有印章的纸上,于是个人、家庭,整个、整个的村子给欺侮了,给吓唬了,给毁灭了。父亲被流放到别处去,母亲进了监牢,儿子去当兵,这一切就像响雷一样意料不到地打在他们的头上,而且大多数都是无辜受罚的。为了什么呢?为了钱。拿出钱来……不然,就要开始侦讯有关喝醉了以后冻死的某一个酒鬼的尸首的案件。头头得了钱,村长得了钱,农民把最后一文钱也拿出来了。乡警察所所长要活下去;县警局局长要活下去,还要供养他的老婆;顾问要活下去,还要教育他的孩子,顾问还是一个模范父亲。

官吏阶层在俄国的东北各省和在西伯利亚称王称霸;在那里它毫无阻碍地、毫无顾忌地自由发展……地方太远了,大家利益均沾,盗窃成为 res publica〔拉丁语:普遍的事情〕。连沙皇政权像霰弹一样的炮轰也摧毁不了这些隐藏在雪下面的一片污泥浊水的堑壕。政府的一切措施都给削弱了,一切意图都给歪曲了;它受了骗,受了愚弄,让人背叛了,给人出卖了——这一切又都是在忠心耿耿的外表下,而且是完全遵守官场规矩进行的。

斯彼兰斯基① 曾经试图改善西伯利亚老百姓的处境。

① 米·米·斯彼兰斯基(1772—1839):俄国政治家,曾提出一个温和的国家改革方案。他受到反动贵族的压力,被流放到尼日尼-诺夫哥罗德。一八一六年任奔萨省省长,一八一九年起任西伯利亚总督,一八二一年调回首都。

他在各处推行集体的原则，好像个人盗窃跟集团盗窃有所不同。他成百成百地开除老骗子，成百成百地任用新骗子。起初他把地方警察吓坏了，官吏们居然用钱贿赂农民，叫农民不要去控告他们。可是两三年以后官吏们又用新的方法来发财致富了，并不比用旧的方法差。

另一个怪人是韦里亚米诺夫将军①。他在托包尔斯克奋斗了两年，要制止营私舞弊，可是他看见毫无成效，就完全放弃，什么事也不管了。

别的更聪明的人就不去作这种尝试，却发了财，而且也叫别人发财。

"我要根除贿赂。"莫斯科省长谢尼亚文② 对一个前来向他控告某种公然违法行为的白发农民说。老人笑了笑。

"你笑什么呢？"谢尼亚文问道。

"哦，老爷，"农人说，"你饶恕我；我想起了我们的一个年轻好汉，他夸口说他能举起炮王③，他真的试过了，可是他并没有举起炮来。"

这个故事是谢尼亚文本人讲出来的，他属于担任俄国公职的一类脱离实际的人，他们以为讲讲正直廉洁的漂亮空话、

---

① 伊·亚·韦里亚米诺夫(1771—1837)：参加过抵抗拿破仑侵略的俄国将军，一八二七至一八三三年间任西西伯利亚省长。

② 伊·格·谢尼亚文(1801—1851)：一八三八至一八四〇年间任诺夫哥罗德省长，一八四〇至一八四五年间任莫斯科省长。

③ 炮王：保存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内的古代大炮的名称，是一五八六年俄国铸匠乔霍夫铸成的，炮重约三十九吨。

严厉惩办两三个偶然发现的坏蛋就可以医治像俄国贪污这样普遍的毛病(这种病在书报检查机关的庇护下得到了自由发展)。

要医治这种病有两个办法:一是把它公开,二是彻底改组整个机构,重新建立仲裁法庭、口头诉讼、民选官员以及彼得堡政府所不喜欢的一切设施中的人民的因素。

西西伯利亚总督伯斯捷尔[①] (被尼古拉处死的著名的伯斯捷尔的父亲)是一个地道的古罗马的地方总督,而且还是最厉害的一个。他在他管辖的整个地区内进行公开的一套抢劫办法,他派出的间谍们切断了这个地区同俄罗斯本土的联系。没有一封寄出省去的信不是给人拆开看过的。谁敢于在信里讲到他的行政措施,那就该倒楣了。他把第一等商人[②] 关在牢里一次关了一年,还给他们戴上足镣手铐;他拷打他们。他把官吏们打发到东西伯利亚的边境上去,让他们在那里待两年、三年。

老百姓忍受了很久;后来一个托包尔斯克的小手艺人下了决心把事情的真相呈报皇上。他不敢走一般人走的路,他先到恰克图,然后从那里同运茶叶的商队一起出了西伯利亚的地界。他找到机会在沙皇村向亚历山大〔一世〕递上呈文,请求皇上亲自批阅。亚历山大〔一世〕在呈文里读到那些可怕

① 伊·包·伯斯捷尔(1765—1843):一八〇六至一八一九年间任东西伯利亚总督。

② 彼得大帝改革时期把商人分为二等,第一等商人即大商人。

的事情，感到奇怪，感到震惊。他把小手艺人叫了来，同他谈了好久，相信了他的呈文里那些悲惨的真相。他心里不痛快，又有点为难，他对那个人说：

“师傅，你现在可以回家了；事情会查清楚的。”

“陛下，”小手艺人答道，“我现在不回去。您还不如下令把我关在牢里好。我同陛下谈话的事不会不传开，那么我就会给杀死的。”

亚历山大〔一世〕打了一个哆嗦，就向着当时担任彼得堡总督的米洛拉多维奇说：

“你给我负责他的安全。”

“要是这样的话，”米洛拉多维奇说，“请准许我把他带到我家里去。”

小手艺人真的就待在那里一直到案件结束的时候。

伯斯捷尔差不多经常住在彼得堡。我们应该记得古罗马的地方总督通常是住在罗马的。由于他在首都，由于他的人情关系，特别是由于他拿收刮来的东西到处送礼，他就避免了一切不愉快的谣言和纠纷。[①]帝国协议会[②]利用亚历山大〔一

---

① 这使得罗斯托普钦伯爵有机会挖苦伯斯捷尔。他们两人同皇上一起吃饭。皇上站在窗口，问道：“礼拜堂上面的那是什么……十字架上面的黑东西？”罗斯托普钦伯爵回答道：“我看不清楚，陛下，您不如问包利斯·伊凡诺维奇，他有一对很了不起的眼睛，他在这里看得见在西伯利亚发生的事情。”——作者原注

② 帝国协议会：亚历山大一世设置的一种咨议机构，成员由沙皇任命，一九〇五年撤销。

世〕暂时离开俄国到维罗纳[①] 或者亚琛[②] 的时机作出了“明智而正确的”决定:既然控告的是西伯利亚的事情,就应当把案件交给伯斯捷尔去处理,何况他又在这里。米洛拉多维奇、莫尔德维诺夫[③] 和另外两三个人反对这个决定,这件案子就送到枢密院去了。

枢密院审理高级官员的案件时的不公平是臭名昭著的,它包庇了伯斯捷尔,却褫夺了托包尔斯克省长特列斯金[④] 的官级和贵族身份,把他流放了。伯斯捷尔只是给撤销了职务。

到托包尔斯克来代替伯斯捷尔的卡普采维奇[⑤] 是阿拉克切叶夫一派的人。他干瘦,脾气暴躁,生就专制暴君的性格,他是一个暴君,因为他一生都在军队里服役,是一个不肯休息的活动家,他把一切都编成队,排成行,还规定了物价的最高额,可是他却把日常事务完全交给强盗们去处理。一八二四年皇上要去视察托包尔斯克。彼尔姆省内有一条很好的宽的公路,这条路已经使用了好多年,而且大概是由于土质很

---

① 维罗纳:意大利的城市。

② 亚琛:德国的城市。一八一八至一八二二年在维罗纳和亚琛召开过参加欧洲反动的“神圣同盟”的各国的会议。

③ 尼·谢·莫尔德维诺夫(1754—1845):俄国经济学家,国务和社会活动家。

④ 尼·伊·特列斯金(1763—1842):一八〇五至一八二〇年间任伊尔库次克省长。

⑤ 彼·米·卡普采维奇(1772—1840):参加过一八一二年卫国战争的俄国将军,一八二二至一八二八年间任西西伯利亚总督。

好的缘故。卡普采维奇在几个月里面修筑了一条到托包尔斯克的同样的公路。在春天道路泥泞和严寒的时候，他从远近的村子征用成千上万的民工来修路；疫病传布开来，半数民工死亡，可是"热心克服一切"——公路修筑好了。

在东西伯利亚管理得更糟。它离得太远了，消息很难传到彼得堡来。住在伊尔库次克的总督布罗涅夫斯基① "作乐"的时候，喜欢在城里放排炮。另一位总督喝醉了的时候经常在家里穿上全套法衣举行祈祷式，还有高级僧正② 参加。这一位的炮轰和另一位的信教同伯斯捷尔的封锁和卡普采维奇日夜不息的活动比起来，至少危害性少一些。

不幸西伯利亚给治理得如此之坏。它的总督的人选特别糟。我不知道穆拉维约夫③ 是什么样的人；他有聪明和能干的名声；别的人都是废物。西伯利亚有远大的前程——人们只是把它看做一个地下室，里面藏得有很多黄金、很多皮货和别的好东西，不过那里很冷，给埋在雪里，生活资料贫乏，没有纵横交错的公路，没有居民。这不是真相。

做任何事情都要靠暴力、靠棍棒的、死气沉沉的俄国政府绝不能够给予生气勃勃的推动力，促使西伯利亚用美国那样

---

① 谢·包·布罗涅夫斯基(1786—1858)：沙俄中将，一八三四至一八三七年间任东西伯利亚总督，后来任枢密官。

② 僧正：主教和总主教的总称。

③ 尼·尼·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1809—1881)：一八四七至一八六一年间任东西伯利亚总督。他是沙俄推行侵略扩张主义、侵占我国黑龙江土地的得力工具。

的速度向前进展。到了阿穆尔〔黑龙江〕河口开始通航、美国在中国近旁同西伯利亚接触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将要发生什么事情。

我早就说过，太平洋是未来的地中海。①在那个未来的时候，西伯利亚作为在大洋、南亚和俄罗斯本土之间的地区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不用说，西伯利亚会伸展到中国的边境。既然有克拉斯诺雅尔斯克②、米努辛斯克③ 和其他这类地方，人们就不会待在别列左夫和雅库次克挨冻打哆嗦。

甚至西伯利亚的俄国居民也有自己的特点，这种特点暗示着另一种发展前途。一般地说，西伯利亚人种是身体健康的、身材高大的、聪明的、非常好的。移民的子女，那些西伯利亚人，完全不知道地主的权力。西伯利亚并没有贵族阶级，同时城里也没有贵族；代表地方政权的文武官员不像贵族，倒像是战胜者驻扎在这里的敌方的守备部队。由于地区广大，农民便可以避免经常同这班人接触；商人靠金钱也很有办法，他们在西伯利亚瞧不起官吏，虽然在表面上对官吏表示恭顺，实际上却恰如其份地把官吏看做——他们所雇用的经管民政事务的掌柜。

---

① 我非常高兴地看见纽约的报刊几次引用了这句话。——作者原注

② 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西伯利亚的城市，在叶尼塞河上游，现在是苏联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边区的中心。

③ 米努辛斯克：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边区西南角的城市，沙俄时代的流放地。一八九七至一九〇〇年间列宁曾在米努辛斯克附近的村子里度过流放的生活。

使用枪炮的习惯对西伯利亚人来说是不可避免的,这也是很普遍的。西伯利亚的农民经常遇到危险,需要随机应变,因此他们比大俄罗斯人更好斗、更机灵、更容易回击别人。因为离礼拜堂很远,他们的心灵比在俄国本土更容易不受迷信的影响,他们对宗教冷淡,大部分人都是分离派教徒。有一些偏僻的小村子,教士每年只去两三次,于是施洗礼、葬礼、婚礼、听取忏悔等等一揽子同时举行。

在乌拉尔山脉的这一边,事情虽然干得斯文些,然而我在这里工作的一段时期中在省长公署办公室和省长的饭厅里所听到的官吏们滥用职权、营私舞弊的故事要是全写下来,我可以写满好几册。

"先生,这儿有一位行家,就是我的前任,"维亚特卡的警察局长在一次信任的交谈中对我说,"好吧,当然这样干也行,只是,先生,你得生就这样的本领;从某一点上看可以说他是一个谢斯拉文①,是一个菲格涅尔②。"这个由于负伤而被提升为警察局长的瘸腿少校,讲起他那位光荣的前任的事情,他的眼睛发亮了。

"有一伙强盗出没在离城不远的地方,有一两次省里得到消息,说商人的货物遇盗,包税商的管事的钱给抢走了。省长可忙坏了,一连下了几道命令。嘿,您知道,地方警察都是胆

① 亚·尼·谢斯拉文(1780—1858):俄国军官,一八一二年卫国战争中的英雄游击队员。

② 亚·沙·菲格涅尔(1787—1813):俄国军官,一八一二年卫国战争中的英雄游击队员。

小鬼；捆住一个小偷拿他惩办，他们还办得到，——然而这是一伙强盗，可能还带得有枪。地方警察毫无办法。省长就把警察局长找了来，对他说：'我知道这完全不是您的职责，可是您的办事才干促使我来请您帮忙。'

"警察局长事先已经听人讲过这件事情。他就说：'将军，我一个小时以后就出发。强盗一定在这里和那里；我带一小队人去，会在这里和那里找到他们，两三天以后我就把他们戴上镣铐送到省监牢里来。'

"先生，这不就是苏沃洛夫对付奥国皇帝的办法吗！[①] 真的，说到做到，——他带一小队人去当场捉住了他们，他们来不及把钱藏起来，警察局长全拿走了，把强盗带了到城里去。

"审讯开始了。警察局长问：'钱在哪儿？'有两个强盗回答道：'老爷，我们把钱交给你了，交到你自己手里的。'警察局长吃惊地说：'交给我？'强盗大声说：'交给你了，交给你了。'警察局长气得脸色发白，对警察分局局长说：'真放肆！'然后他说：'喂，你们这些骗子，我看你们接着就会说是我跟你们一块儿去抢劫的。你们在我的军服上面抹黑，我要给你们一点厉害看；我是枪骑兵少尉，不能让人毁坏我的名誉！'

"他叫人鞭打了他们一顿，他说：'你们招出来，钱藏在哪

---

① 指俄军统帅苏沃洛夫在一七九九年对法战争中，不采用奥国提出的持久战的计划，却照他自己的办法在六个星期内几乎占领了整个意大利北部并进到法国境内。

儿?'他们起先坚持原来的口供。只是后来他吩咐给他们两袋烟的时候,强盗头头们就喊起来:'我们有罪,钱我们花掉了。'警察局长说:'你们早就应当供认了,不该乱讲那些废话;家伙,你们骗不了我。'那个老强盗敬佩地望着警察局长,小声咕噜道:'好啦,的确我们应当向您大人学习,不是您向我们学。我们差得远!'

"您知道他就因为这件事得到符拉季米尔带[①] 吗?"

"对不起,"我打断了他对那个伟大的警察局长的颂辞,问道:"两袋烟,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我们的行话。您知道,处罚是枯燥乏味的事,所以你吩咐打人,你就点燃一袋烟;通常都是这样,烟抽完了,处罚也完了,——可是在特殊的场合,我们也吩咐用两袋烟的工夫来款待我们的朋友。警察已经习惯了,就是说,他们知道该打多少。"

关于这个菲格涅尔和谢斯拉文,在维亚特卡流传着很多的传说。他做出了奇迹。有一次我记不得是为了什么事,一位侍从武官或者大臣来了,警察局长想显示他并不是白白地穿了枪骑兵制服的,他骑马并不比别人差。为了这个目的,他就去找本地富商马希科甫采夫家的一个人,要他把自己骑的一匹贵重的灰色马给他。马希科甫采夫不肯给。

"好,"菲格涅尔说,"您不肯主动地替我做这点小事,那么我就不等您允许把马拿走。"

---

① 符拉季米尔带:穿在钮孔上的勋章带。

“好吧，我们等着瞧吧。”金说。

“好的，您会看见的。”钢说。[1]

马希科甫采夫把马锁了起来，又派了两个人看守。这一次警察局长就没有成功。

可是在这天夜里，好像有意安排似的，包税商的几间空仓房起了火，这间仓房就跟马希科甫采夫的宅子紧紧挨着。警察局长和警察们很认真地尽他们的职责；为了保护马希科甫采夫的宅子，他们甚至拆掉了马房的墙，牵走了那匹引起争吵的马，不论它尾巴上的毛或者它的鬃毛一根也没有让火烧到。两小时以后，警察局长骑上一匹白马去接受显要人物对他英勇救火的模范行为的嘉奖。这次以后再没有人怀疑有什么警察局长做不了的事情了。

雷赫列夫斯基省长在一次集会后坐车离开；就在他的马车开动的时候，一辆小雪橇的车夫在旁边张口呆望，不当心把雪橇插到了两匹辕马和两匹前导马的套绳中间。这引起了很短时间的混乱，不过并没有妨碍雷赫列夫斯基平安无事地回到家中。第二天省长问警察局长，知道不知道是谁的车夫插到了他马车的套绳中间来，他说那个车夫应该挨一顿训斥。

---

① 作者在这里有意摹仿普希金的诗《金与钢》中的讽刺诗句，原诗前四行如下：

“全是我的，”金说；
“全是我的，”钢说。
“我买来一切，”金说；
“我拿来一切，”钢说。

“大人,那个车夫以后绝不会再插到您马车的挽索中间了,我已经狠狠地训斥了他。”警察局长含笑答道。

“他是谁的车夫?”

“库拉科夫顾问的,大人。”

这个时候年老的顾问(我来的时候他就是省长公署的顾问,一直到我离开这个地方,他还保留着这个职位)来见省长了。

“请您原谅,”省长对他说,“我们训斥了您的车夫。”

顾问感到惊讶,他莫名其妙,用疑问的眼光望着省长。

“他昨天赶车插到我马车的套绳中间来了。您明白,他要是撞上了我,那……”

“可是大人,昨天我整天都在家,内人也没有出去,车夫也没有出去。”

“这是怎么一回事?”省长问道。

“大人,我昨天很忙,累得头都晕了,对不起,我把车夫的事忘记了,我说实话,我不敢向您大人报告这件事情。我的意思是马上就去处理。”

“得啦,您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警察局长,没有什么可说的!”雷赫列夫斯基说。

我讲过了这个贪得无餍的警察局长,现在再来描述另一种跟他相反的人——一个所谓温和的、心肠好的、恭顺的官员。

在我的熟人中间有一位可敬的老人,他是县警局局长,经枢密院弹劾撤了职。以后他就专门替人写状子、进行诉讼,这正是禁止他做的事情。这个人在衙门里办了很多年的事,他在三个省里盗窃和涂改官方文件,制造假证件,受过两次审判

等等。这位地方警察的老将喜欢讲关于他自己和他同事们的古怪故事,并不掩饰他对新一代的退化的官吏的轻视。

"这是些轻浮的人,"他说,"当然,能到手的他们都要,因为不拿就活不下去,不过您在他们身上看不到聪明和熟习法律。举一个例子,我对您讲一个朋友的事情。他做了大约二十年的法官,去年才死掉,——他是个有头脑的人! 尽管他给他的家属遗留下一笔钱,农民们却并不记得他的坏处。他有他自己那一套完全特殊的办法。要是有个农民来向这位法官提出什么申请,他就马上接见,——而且尽可能做得友好、高兴。他就说:

"'老大爷,你的名字同你父亲的名字叫什么?'

"农民鞠个躬,就说:

"'老爷,我叫叶尔莫拉依,父亲叫格里戈利。'

"'好,叶尔莫拉依·格里戈利叶维奇,你好,上帝把你从什么地方带来的?'

"'我们从杜比洛沃来的。'

"'我知道,我知道。好像你有几座磨坊在路——在驿路的右面。'

"'是的,老爷,是我们村社的磨坊。'

"'是个富足的村子,地是好地,是黑土。'

"'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埋怨上帝的,还不错,好老爷。'

"'对,应当是这样。叶尔莫拉依·格里戈利叶维奇,你家里的人大概不少吧。'

"'三男两女,大女儿嫁给一个年轻人,他同我们一起过了

四年多了。'

"'大约已经有了外孙吧。'

"'是,有的,小东西,您老爷。'

"'啊,谢谢上帝！生儿育女,人口兴旺。好吧,叶尔莫拉依·格里戈利叶维奇,你远道来,我们一块儿喝杯白桦酒吧。'

"农人推辞不喝。法官给他斟了一杯酒,一边说:

"'得啦,得啦,朋友,圣父们并不禁止今天喝酒、涂油。'

"'是的,的确不禁止,不过酒会惹是生非。'——于是他在胸前划了一个十字,鞠一个躬,喝了白桦酒。

"'格里戈利叶维奇,你有这样一大家人,生活大概不容易吧?要供每个人吃饭、穿衣——靠一匹驽马或者一头母牛是不行的,牛奶就不够。'

"'老爷,请原谅,用一匹马我能够做什么呢?我有三匹,本来还有第四匹,是一匹淡栗色马,可是它在彼得节前斋戒期① 里给毒眼② 看死了,我们那里的木匠陀罗费依(真可恨!),他不高兴看见别人过得好,他有一只毒眼。'

"'有这样的事,老大爷,有这样的事,老大爷。你有大的牧场吧——您大概喂得有绵羊。'

"'还不错,有几头羊。'

"'啊,我只顾跟你谈话谈久了。我还要办沙皇的公事,叶尔莫拉依·格里戈利叶维奇,我得上法院去了。你来有什么小

① 彼得节前斋戒期:在旧俄历六月底的时候。

② 毒眼:俄国旧时迷信,认为被这种眼睛看过后,人畜就会遭殃。

事情要办吗?'

"'是的,老爷,有事情。'

"'好吧,是怎么一回事?是不是吵架?快点讲,老大爷,我要走了。'

"'是这样的,好老爷,在我晚年的时候碰到了倒楣的事情……正好在圣母升天节,我们在酒馆里同一个邻村的农民争论起来,——他是个恶人,常常偷我们的树。我们还没有讲了两句话,他就挥舞拳头给我胸上一拳。我对他说:"你的拳头留给你们自己的村子吧。"我要教训他,就推他一下,可是我大概喝醉了,不然就是给鬼迷住了,我正好打到他的眼睛上;是的,我把他的眼睛打坏了,他就同礼拜堂长老一起马上去找县警局局长,他说,我要上法院打官司。'

"他这样讲他的事情的时候,这位法官(你们彼得堡的演员们哪里比得上他!)的表情越来越严肃了,眼神显得可怕,一句话也不说。

"农人看见这个,脸色发白了,把帽子放在足跟前,掏出一条毛巾揩汗。法官仍然不做声,他在翻一本小书的书页。

"'所以我就来找你,老爷。'农人说,声音也变了。

"'对这件事情我能够做什么呢?有什么理由!你干吗打他的眼睛呢?'

"'老爷,的确是这样,干吗呢……我让魔鬼迷住了。'

"'可怜,真可怜!因为这件事,一家人就要给毁掉了!啊,家里没有你怎么办?都是年轻人,可是小外孙呢——小家伙们,还有,我可怜你的老太婆。'

“农人的腿打起哆嗦来了。

“‘仁慈的好老爷，怎么好，我会给判什么罪呢？’

“‘你瞧，叶尔莫拉依·格里戈利叶维奇，你自己读读看……或者你不大识字吧？好吧，这里就是“关于伤残肢体者”的条款……“处以笞刑，并且永远流放到西伯利亚。”’

“‘不要让一个人就这样完蛋吧！不要毁掉一个基督徒吧！难道就没有办法吗？……’

“‘瞧你这个人！难道我们可以违反法律吗？当然，一切都是由人来执行的。好吧，我们可以不打三十下，改为打五下。’

“‘那么，流放到西伯利亚什么呢？……’

“‘啊，这就不由我们决定了，好朋友。’

“农民从怀里掏出一个钱袋，从钱袋里又取出一个纸包，再从纸包里拿出两、三个金币，他深深地鞠一个躬，把它们放在桌子上。

“‘这算什么？叶尔莫拉依·格里戈利叶维奇？’

“‘救救我，好老爷。’

“‘啊，得啦，得啦！你这是什么意思？说来惭愧，有的时候我也收谢礼。我的薪金少，不得不收礼；不过要收礼，总得为了什么事情。我能帮你什么忙呢？倘使是一根肋骨或者一颗牙齿也好办，然而你偏偏打在眼睛上！把你的钱拿回去吧。’

“农人完全垮下来了。

“‘我告诉你为什么：我是不是要跟同事们讲，再给省里写封信去？案子很可能到法院，那里有我的朋友，他们可以设法；只不过他们是另外一种人，你拿三个金币打发不了他们。’

“农人开始镇静下来。

“‘你不用给我什么——我可怜你一大家人;不过你不拿出两张灰票子[①] 是不济事的。’

“‘不过,老爷,上帝在上,我想不出在这个年头能够在哪里找到这一大堆钱,四百卢布呢!’

“‘我也是这样想,的确有点困难。我们可以减轻对你的处罚,说是你已经悔过,而且考虑到你当时喝醉了。……你知道人们在西伯利亚也过得下去。你要去多远现在还不知道……不用说,要是你卖掉两匹马、一头牛和一些绵羊,那就够了。不过你以后在乡下攒起这一笔钱又得要一段时间!可是另一方面说,你想留着马不卖,那么你自己就得流放到很远的地方去。格里戈利叶维奇,你想想看;时间还来得及,我们可以等到明天,可是现在我得走了。’法官说到这里,就把他先前不肯收下的金币放在衣袋里面,又说:‘这完全是多余的,我只是为了不让你难过才收下的。’

“第二天清早,这个老犹太鬼果然把用各种各样老式钱币凑成的三百五十卢布给法官送来了。

“法官答应照顾他的案子;农人经过一次一次的审讯,给吓坏了,不过后来得到很轻的处罚就放出来了,或者只是给他一个今后行为要小心谨慎的警告,或者批示‘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这么一来,农人一生都要替法官祷告了。

“从前他们就是这样干的,”这个撤了职的县警局局长说,

---

① 灰票子:指二百卢布的钞票。

“他们干得干净利落。”

……一般地说，维亚特卡的农人并不是十分逆来顺受的。因此官吏们把他们看做讼棍和不安份的人。地方警察在沃恰克人、莫尔多瓦人① 和楚瓦什人② 的身上找到了真正的金库；他们是可怜、胆小、平庸无能的人。被委派到这些芬兰族居住的县里当警局局长的人常常送给省长双倍的谢礼。

警察和官吏们对这些可怜的人做出了叫人不能相信的事情。

倘使一个土地丈量员出差经过一个沃恰克人的村子，他一定会在村子里停下来，从大车上拿出了星盘，把一根杆子插在地上，拉起了链子。一小时以后全村都恐慌起来了。“量地官，量地官！”农人恐怖地说，就像他们在一八一二年讲起“法国人，法国人！”那样。

村长同米尔③ 的人一起来行礼致意。可是土地丈量员还是一个劲地把什么都丈量过，而且记了下来。村长请求他不要量地，不要损害他们。土地丈量员要二十个或者三十个卢布。沃恰克人非常高兴，他们凑齐了钱，土地丈量员便到下一个沃恰克人的村子里去了。

倘使县警局局长和警察所所长找到了一具死尸，如果天气很冷，他们就带着死尸走遍沃恰克人的村子，他们在每个村子里扬言这是他们刚刚发现的，要在这个村子里进行侦查和

① 莫尔多瓦人：俄国东部的少数民族。
② 楚瓦什人：居住在欧俄东北部的少数民族。
③ 米尔：沙俄时代的农村公社。

审讯。沃恰克人便向他们行贿了事。

在我来这里以前几年，有一个非常喜欢受贿的县警局局长带了一具死尸到一个大俄罗斯人的村子里去，我记得他勒索两百卢布。村长召开米尔大会；米尔只肯出一百卢布，多一个也不给。县警局局长也不让步。农人生起气来，就把他同他的两个抄写员一起关在乡公所里面，一面也吓唬说要烧死他们。县警局局长并不相信这个威胁。农人在茅屋的四周堆起了干草，而且作为最后通牒，把一百卢布的钞票贴在杆子上从窗口送进屋去。这位英勇的县警局局长一定要另外的一百卢布。于是农人点燃四周的干草，这三个地方警察的穆基乌斯·斯凯沃拉斯[①] 就烧死了。这个案件后来还到了枢密院。

一般地说沃恰克人的村子比俄罗斯人的村子穷得多。

"老兄，你过得很不好。"我对一个沃恰克人说，当时我正在他那间闷热的、没有烟囱的、倾斜的小小茅屋里等待马匹，茅屋的窗是朝着后院开的。

"老爷，有什么办法呢？我们穷，我们要攒点钱对付困难的日子。"

"老人家，很难有更困难的日子了，"我对他说，斟了一杯罗木酒，"喝掉它解愁吧。"

"我们不喝酒。"沃恰克人回答道，贪馋地望着酒杯，又用

① 穆基乌斯·斯凯沃拉斯：传说中的古罗马英雄。他企图杀害伊特鲁斯坎王，未遂，将受到严厉裁判。他为了表示自己不害怕，就在祭坛的火上烧掉自己的右手。从此他得到了"斯凯沃拉斯(左撇子)"这个外号。作者在这里使用这个比喻，含有讽刺的意思。

怀疑的眼光望着我。

"得啦,喂,你喝吧。"

"你自己先喝。"

我喝了,沃恰克人也喝了。

"那你是什么人?"他问道,"从省里来办公事吗?"

"不是,"我答道,"我旅行,到维亚特卡去。"

这使他很放心了,他小心地看了看四周,然后解释地说:

"困难的日子,就是县警局局长和教士来的时候。"

我想在这里讲一点关于教士的事情。我们的教士越来越变成宗教方面的警官了,由于我们教会那种拜占庭式的恭顺,而且由于皇帝在宗教上是至高无上,这样的事是可以料到的。

芬兰族居民中一部分人在彼得大帝以前、一部分人在叶里扎威塔的统治时期中受了洗礼,另一部分人仍然信仰多神教。那些在叶里扎威塔时期受过洗礼的人大多数都暗暗地保留着他们原来那种阴郁的、原始的宗教。①

---

① 他们的全部祈祷文可以归纳为让他们种族继续传下去、收成好、牲畜健旺这些物质上的要求,此外别无所求。"尤马拉[一]保佑一只羊生两只、一粒谷生五粒、我的孩子再生孩子。"在这种对人世生活和每天面包的怀疑的想法上面,有着过去时代遗留下来的陈旧的、灰心的、不幸的、阴郁的东西。他们把魔鬼(恶魔)[二]同上帝一样地看待。我看见一个村子起了大火,这个村子的居民中有俄罗斯人,也有沃恰克人。俄罗斯人搬东西、叫喊,忙个不停,其中酒馆老板特别突出。不可能制止火势蔓延;可是开始的时候要抢救衣物倒是容易的。沃恰克人却一起躲到一座小山上去,在那里哭着,什么事也不做。——作者原注

[一]芬兰神话中最初的雷神。

[二]原文是"沙依坦",即伊斯兰教的恶魔。

每隔两三年县警局局长或者警察所所长要同一个教士一起到各个村子去检查,看沃恰克人中间有哪一些在复活节前斋戒祈祷,有哪一些没有斋戒祈祷,为什么没有。没有斋戒祈祷的人就受到迫害,给关在监牢里,挨鞭子,给强迫出钱举行圣礼;教士和县警局局长主要是来搜集沃恰克人并没有放弃旧仪式的证据。于是这个宗教的密探和地方警察的传教士就掀起一场风暴,拿到大量的贿赂,给沃恰克人带来了"困难的日子",然后扬长地走了,听任一切照旧,让他们有机会一两年后又来重复他们那一套使用鞭子和十字架的把戏。

一八三五年东正教事务总管理局认为有必要在维亚特卡省进行使传道的工作,把信仰多神教的车累米西人[①] 改变为东正教信徒。[②]

这种改变宗教信仰是俄国政府所实行的一切伟大改革的一个典型,一种门面,一种装饰品,blague〔法语:自吹自播〕,一种欺骗,一份冠冕堂皇的报告,这其间有人进行盗窃,也有人挨鞭子。

菲拉列特总主教派了一个能干的教士去主持这个传教的工作。他叫库尔巴诺夫斯基[③]。库尔巴诺夫斯基正厉害地患

---

① 车累米西人:马里人的旧称。

② 作者提到的事情是在一八二九至一八三〇年间发生的。

③ 库尔巴诺夫斯基:维亚特卡的大司祭,他曾作为地方教士的代表被派遣到雅兰斯基县主持传教工作。菲拉列特派来的教士是亚·波克罗夫斯基,不是库尔巴诺夫斯基。

着那种俄国病——沽名钓誉，他就起劲地干起来。他决定不顾一切要叫车累米西人受到上帝的圣恩。起初他试着进行传道，可是不久他就感到厌烦了。的确靠这种老办法能有多大用处呢？

车累米西人看出来是怎么一回事情，就派了他们那些粗野、狂热而又机敏的教士去见他。他们同他谈判了很久，后来就对库尔巴诺夫斯基说：

“树林里有白桦树、高高的松树和云杉，也有小小的杜松。上帝把它们都容忍了，并没有叫杜松变成松树。所以我们彼此相安无事，就像树林那样。你们做你们的白桦树，我们还是做我们的杜松；我们不会妨碍你们，我们要替沙皇祷告，要纳税，要服兵役，可是我们不愿意背叛我们神圣的信仰。”[1]

库尔巴诺夫斯基看到他同他们谈不下去，看到他没有基利尔和麦福季乌斯[2]的运气。他便找县警局局长帮忙。县警局局长非常高兴；他早就想表示自己对教会的忠诚。他是一个没有受过洗礼的鞑靼人，就是说一个虔诚的伊斯兰教徒，名叫杰甫列特-基尔杰耶夫。

县警局局长带着一小队人出发，用上帝的话去围攻车累米西人。几个村子受了洗礼。传教的使徒库尔巴诺夫斯基举

① 德国农民不愿意改信天主教的时候，也作过类似的回答（倘使上面这个回答不是库尔巴诺夫斯基个人臆造出来的话）。——作者原注

② 基利尔（827—869）是斯拉夫人的使徒，同他的哥哥麦福季乌斯（826—885）一起在色雷斯、莫埃西亚和莫拉维亚传播福音，创造了基利尔字母，把《福音书》翻译成古斯拉夫文。

行了祈祷仪式，就谦恭地回去接受法冠[①] 去了。至于传教的使徒鞑靼人呢，政府颁发给他符拉季米尔十字章，[②] 报酬他传播基督教的功劳！

不幸，这个鞑靼“传教士”同玛尔梅若的阿訇的关系搞得不好。阿訇十分不喜欢一个笃信可兰经的穆斯林居然那样有效地传播基督教的福音。到了斋月[③] 县警局局长毫不在乎地把十字章系在他的钮孔上进了清真寺，不用说他是站在众人的前头。阿訇刚刚开始用鼻子哼可兰经，就突然停了下来，说是在一个戴着基督教标志到清真寺来的有正统信仰的人[④]的面前，他不敢继续念下去。

鞑靼人中间响起了一阵埋怨，县警局局长发了慌，他不是退了出去，就是把十字章取了下来。

我后来在内务部的刊物上读到关于车累米西人出色地改信东正教的记载。文章里提到了杰甫列特－基尔杰耶夫热心的合作。可惜他们忘记补充说，他对教会的热心是十分大公无私，尤其是因为他对伊斯兰教的信仰非常坚定。

我在维亚特卡的生活结束之前，国家财产局里贪污盗窃的情况十分严重，因此成立了一个清查委员会，委员会指派调查人员分赴各省调查。从这时候起就采用了管理国家农

---

① 法冠：教士的帽子，奖给教士中间立了功的人。

② 符拉季米尔十字章：根据一八八一年出版的《维亚特卡一百年》第二卷中的记载，杰甫列特－基尔杰耶夫得到的奖品是一只钻石戒指。

③ 斋月：伊斯兰教历的九月，白天斋戒的月份。

④ 有正统信仰的人：伊斯兰教徒的自称。

民[1] 的新规章。

柯尔尼洛夫省长理应指派两名调查人员。我便是其中的一个。我应当读些什么东西！阴郁的、令人发笑的、叫人厌恶的。单看那些案件的标题就叫我感到惊奇。

“关于乡公所房屋不知消失在什么地方的案件和老鼠咬坏它的图样的案件。”

“关于缺少二十二笔国家免役金的案件，”就是说少掉了十五里的土地。

“把农民男孩瓦西里改为女性的案件。”

后面这个案件太精彩了，我立刻把它从头到尾读了一遍。

这个假想的瓦西里的父亲在他给省长的呈文中写道，十五年前他生了一个女儿，他想给她起名瓦西里莎，可是教士当时“喝饱了”，施洗礼时给她起了男孩的名字瓦西里，还登记在出生证上。这个情况看来当时并没有引起农人的担心。可是等他明白不多久就要轮到他家里出一个人服兵役、还要缴纳人头税的时候，他就向市长和警察所所长递了呈文说明情况。警察所认为这件事情很古怪。他们干脆不接受农人的呈文，说是他已经拖了十年过期了。农人就去向省长申诉。省长指派一个医生和一个接生婆对这个女性的男孩进行了一次郑重的检查。……就在这个时候不知道怎样同宗教法庭联系起来

① 国家农民：指居住在国有土地上的农民，当时西伯利亚一带的农民大都是国家农民。

了，那个喝饱了酒分不清性别的教士死了，到场的是他的后任，官司就一年一年地打下去，那位姑娘一直让人怀疑她是个男人。

请不要以为这是我编造荒唐故事来讲笑话，完全不是，这件事情同俄国专制政治的精神十分符合。

保罗〔一世〕在位的时候，禁卫军的一个上校有一次在他的每月报告中把一个住院治病的军官作为死亡呈报了。保罗〔一世〕也就把那个被当作死亡者的名字从名单上涂掉。偏偏这个军官并没有死，他的病好了。上校劝他回到他的乡下去住一两年，希望找个机会来纠正错误。军官同意了，可是上校这个办法行不通，那些继承人在圣旨上读到他们亲属的死亡，不肯承认他还活着，他们受不了这个损失，坚决要求取得财产所有权。这个活死人看见自己有第二次死亡(不仅是在书面上死亡，而且是由于饥饿)的危险，就亲自到彼得堡，向保罗〔一世〕递了呈文。保罗〔一世〕亲笔在他的呈文上批示："关于这位军官先生的圣旨既然已经下达，他的要求就不予考虑。"

这比我那个瓦西里萨—瓦西里更妙。在圣旨面前残酷的生活事实算得什么呢？保罗〔一世〕是专制制度的诗人和诡辩家！

尽管这个官场的泥水荡多么肮脏，多么令人恶心，我还要在这里补充几句。把这些丑事揭露出来，只是对那些无人过问、无人怜惜的受害者和死者表示微不足道的慰问的意思。

政府高兴把荒地分奖给高级官员。这样做也并没有什么

大的害处，不过把它们保留着来应付人口增长的需要倒更聪明些。划定这些土地界限的规章是相当详细的；航道两岸、宜于作建筑材料的树林、河流的两岸都不可以奖给人；最后在任何情况下也不可以把农民已经耕种的土地分给别人，即使农民对这些地除了长期使用外并无别的权利。①……

这些限制不用说都是纸上的。实际上把土地赐给个别占有者正是盗窃国家财产和压迫农民的一个可怕的根源。

一些收租的达官贵人经常把权利卖给商人或者努力通过外省当局违反规章侵占某些特殊的地产。连奥尔洛夫伯爵自己也偶然得到了赐给他的萨拉托夫省的大群牲畜放牧的牧场和大路。

因此无怪乎有一个晴天的早晨科捷里尼切斯基县达罗夫斯卡雅乡的农民发现他们的田地一直到打谷场和房屋都给划了出去，交给一些商人归他们私人占用。这些商人花钱向康克陵伯爵② 的一个亲戚买到了这些土地的租用权。商人们规定了这些地的租金额。这样就打起官司来。省税务局得了商人的贿赂，又害怕康克陵的亲戚，便敷衍了事。可是农民决定坚持下去；他们选出两个精明能干的农人，把他们派到彼得堡去。官司打到了枢密院。测量地界局明白农人有理，却不

① 在维亚特卡省，农民特别喜欢迁移。在树林里面常常突然开出来三四块新耕地。大块的荒地和树林（现在有一半已经开垦出来了）吸引着农民来占用这个至今无人利用的 res nullius〔拉丁语：无主物〕。财政部不得不数次承认这些土地归占有者使用。——作者原注

② 叶·弗·康克陵：一八二三至一八四四年间任沙俄政府的财政大臣。

知道怎样办才好，就同康克陵商量。康克陵干脆地承认把那些土地划出去是不对的，但是他又认为归还也有困难，因为土地划出去以后可能已经转卖，而且它们现在的主人在改良土地方面可能做出了各种成绩。因此伯爵大人认为既然国家所有的公地数量很大，那么就决定在另一个地区拿出同样大小的土地还给农民。这样一来大家都很满意，就只有农民不高兴。第一，耕种这些新地并不是简单的事。第二，另一个地区的地又是不适用的水洼地。达罗夫斯卡雅乡的农民要生产粮食，而不是要打松鸡、打山鹬，所以他们又递了一份呈文。

于是省税务局和财政部根据旧案另外立了一个新案，他们找到一条法律，按照这个条文，倘使分配的地不适用，可以增加原来数量一半的同样土地，他们下令给达罗夫斯卡雅乡的农民再加一半数量的同样水洼地。

农民又向枢密院递了一份呈文，可是不等到审理案件，土地测量局就给他们送来新地的平面图，照例是精装的、彩色的，并且画上指出风向的星星，还附有关于RRZ菱形和ZZR菱形的相应说明，而主要地却是要求按亩缴纳若干租金。农民看见不但不退还他们的土地，反而要他们为水洼地付钱，就断然拒绝缴租。

县警局局长呈报丘菲亚耶夫。丘菲亚耶夫派了一个由维亚特卡警察局长率领的惩罚队[①]去。警察局长到了那里，抓了几个人，鞭打了一顿，安定了这个乡，拿走了钱，把罪人交给

---

① 惩罚队：或译讨伐队，这个队的任务是用武力执行政府的判决。

刑事法庭，叫喊了一个星期把嗓子都叫哑了。几个农民受到了笞刑，给流放到外地去。

两年后皇位继承人经过达罗夫斯卡雅乡，农民向他递交了一份呈文，他下令重审这个案件。我根据这种情况写了一份关于这个案件的报告书。这次的重审是否有好的结果，我不知道。我听说流放的人放回来了，可是地是否退还我就没有听说了。

最后，我得讲一下著名的土豆叛乱①的故事，和尼古拉〔一世〕怎样把彼得堡文明的福利带给流浪的茨冈人的事情。

俄国农民和某一个时期全欧洲的农民一样，不愿意种土豆，好像有一种本能告诉农民：这种“不良食物”不会使他们得到力气，也不会得到健康。然而相当多的地主的田地上和国家土地的村子里在土豆恐怖之前早就种了“地苹果”了。不过对于一切自动做的事情，俄国政府总是不高兴的。任何事情都应当在棍棒下面，按照队前的示范动作，步调一致地做出来。

喀山农民和维亚特卡省一部分地区的农民已经在地里种了土豆了。土豆收完以后，部里起了这样的念头：在每个乡挖一个总窖。窖批准了，窖指定了，窖挖好了，冬天开始的时候，农民不得已把土豆送到总窖来。可是到下一个春天叫他们把冻坏的土豆种下的时候，他们就拒绝了。命令人去做明明是荒唐的事情，的确再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对劳动的侮辱了。这

① 指一八四二年的所谓“土豆叛乱”。

个反对意见被说成是叛乱[1] 呈报上去了。基谢列夫大臣[2]从彼得堡派出了一个官员;这个人聪明而又实际,他到第一个乡要农民每人缴纳一个卢布,就允许他们不种冻坏的土豆。

这个官员在第二个乡、第三个乡都照这样办。可是在第四个乡,村长断然对他说,他们不种土豆,也不给他钱。他告诉官员:"你豁免了这一些,又豁免了那一些,你当然也应该豁免我们。"

官员想用恐吓和鞭子结束这件事情,可是农人拿起棍棒把一小队警察赶走了;总督派了哥萨克兵来。附近各乡都支持农民。

只说事情发展到使用了枪和霰弹炮就够了。农人离开家逃散到树林里去;哥萨克兵像赶野兽一样把他们从密林里赶了出来;他们给抓住了,戴上镣铐,送到柯齐莫杰米扬斯克去受军法审判。

十分凑巧,在那里负责的年老的警备队少校是一个正直的老实人;他好心地说,错全在彼得堡派来的官员身上。大家都责难他,他的意见给压下去了,他本人也受到了压制;他受到威胁甚至蒙受"企图毁掉一个清白无辜的人"的耻辱。

审讯按照俄国的常规进行:农人在审问的时候挨了鞭子,鞭打作为处罚,鞭打作为警告,鞭打为了勒索钱财,整整一大

---

① 参加所谓"叛乱"的有喀山、彼尔姆和维亚特卡等省的农民,在维亚特卡省有诺林斯基等四个县的各乡。

② 巴·德·基谢列夫伯爵(1788—1872):一八三七至一八五六年间任国家财产部大臣。

群农人给流放到西伯利亚。

值得注意的是基谢列夫在审讯的期间正好来柯齐莫杰米扬斯克视察。[①] 我们以为他也许会到军事法庭去看看或者把少校找来谈谈。

他并没有这样做！

……著名的杜尔各[②] 看到法国农人对土豆的憎恨，他把土豆种分派给包税商、伙食供应商和其他政府可以控制的人，严禁他们把土豆种拿给农民。同时他又对他们发出密令，叫他们不要阻止农民盗窃这些种子。过了几年之后，法国一部分土地都种上土豆了。

巴威尔·德米特利叶维奇[③], tout bien pris〔法语：就全面考虑〕，这不是比霰弹更好吗？”

一八三六年一群茨冈人来到维亚特卡在田野里安身。这些茨冈人到处流浪，到过托包尔斯克和伊尔比特，他们从远古时代起就过着自由的流浪生活，带着他们经过长期训练的熊和完全没有训练过的孩子们，干着兽医(治马)、算命和小偷小摸的勾当。他们悠闲地唱歌、偷鸡，可是突然间省长接到了圣旨：倘使发现茨冈人没有身份证(从来没有一个茨冈人有身份证，这是尼古拉〔一世〕和他手下的人很清楚的)，就要他们在一定期限内在圣旨下达时所在地区，向村镇公社进行登记。

---

① 基谢列夫一八四二年到东北各省视察。

② 罗·雅·杜尔各(1727—1781)：法国财政大臣(一七七四至一七七六年)，进行过一些进步的改革，企图阻止即将到来的革命。

③ 巴威尔·德米特利叶维奇：基谢列夫的名字和父名。

过了这个期限又下命令：凡是适合服兵役的人都送去当兵，在其余的人当中又挑选出男性儿童，剩下的人一律永远流放出去。

这个荒唐的命令使人想起圣经中关于灭绝和惩罚全种族以及剪除一切男丁的故事，[①] 连丘菲亚耶夫也感到为难了。他把这个荒唐的命令向茨冈人下达了，一面呈报彼得堡说这个命令不可能执行。对茨冈人来说，进行公民登记需要钱（送给官吏），又需要村镇公社的同意，没有钱村镇公社不会白白接纳茨冈人。此外还需要茨冈人本身愿意在一个地方定居。考虑到以上种种，丘菲亚耶夫（这里我们得替他讲几句公道话）向部里要求免予执行或者缓期执行这个命令。

大臣在指示中答复说这个尼布甲尼撒[②] 的命令到期就得执行。丘菲亚耶夫不得已派出一小队兵去包围那群茨冈人；这个任务完成以后，警察同驻防军队伍一起来了，据说，这以后的事情简直叫人难以想象。女人披散长头发，哭叫着，疯狂地跑来跑去，伏倒在警察的足下；白发老妈妈紧紧搂住自己的儿子。然而秩序胜利了；瘸腿的警察局长带走了小男孩，带走了新兵，其余的人都由押解站送到永远流放的地点去。

小男孩带走以后，又发生了问题：把他们安置在什么地

---

① 指"上帝"残酷惩罚人们的传说，参看《旧约全书》中《撒母耳记》上，第五章、十五章；下，二十四章；《列王纪》上，第十一、十四、十六章等等。

② 尼布甲尼撒：公元前七世纪到六世纪中的巴比伦国王，以专制出名；"尼布甲尼撒的命令"指残酷无情的命令。

方？教养费从哪里来？

从前还有社会救济厅管辖的孤儿院，不用花国库的一文钱。然而尼古拉〔一世〕那种普鲁士的贞洁观念认为孤儿院对道德有危害就把它们撤销了。丘非亚耶夫先拿出自己的钱来，一面向大臣请示。大臣们从来都是一意孤行，——他们下令在新的指示下来以前把这些小男孩暂时交给养老院里的老头子和老太婆照管。

要把这些小男孩交给垂死的老头子和老太婆照管，让他们呼吸死亡的空气，指令需要安静的老年人白白地照料小孩……

真是想入非非！

我还要接下去讲一讲一年半以后在弗拉基米尔省我父亲的一个村长① 的遭遇。他是一个老练的、聪明的农人，他做马车运载的生意，有几套三驾马车，他做了二十年那个向我父亲缴纳代役金的小村子的村长。

我住在弗拉基米尔的那一年里，有一次邻村的农民请求他替他们送一个新兵到城里去。他把这个用绳子绑着的未来的祖国捍卫者带到城里，像行家老手那样充满自信心。

“少爷，事在人为，”他用手指梳理着他一脸已经花白的淡黄色胡子，一面说，“前年我们挑的一个小伙子，身体坏，很瘦弱，农人都很担心他会通不过。好，我就说：‘同胞们，你们大概能出多少钱？轮子不擦油不会动。’我们这样商量了一会

① 村长：即加·谢·纳依杰诺夫，作者父亲在弗拉基米尔省的领地的村长。

儿,米尔决定出二十五个金币。我去了省城,到税务局去谈了话,就直接去找局长,——少爷,他是个聪明人,早就认得我了。他叫人把我带到他的书房里,他的腿有什么毛病,他就躺在沙发上。我把事情对他讲明白了,他带笑答道:'很好,很好,你讲讲你带了多少来?你是个吝啬鬼,我知道你。'我把十个大头金币放在桌子上,向他深深地鞠一个躬——他把它们拿在手里玩着。他说:'可是我说,你应该送钱的人不是我一个人,你还带来多少?'我对他说,还有十个金币。他就说:'好,你怎么送掉它们呢?你自己算一下:医生两个,新兵接收员两个,办事员两个,好吧,还有其他各种零星费用凑起来不会超过三个,——好吧,你把其余的都交给我,我来安排它们。'"

"那么你交给他了?"

"我当然给了——他们非常满意地给剃了头。[①]"

村长熟习这种零头不计的算法,习惯于他那种估计,也许还习惯于他那吞没五个金币的办法,无怪乎他很相信自己的成功。然而在行贿和受贿进行的中间也可能发生不少倒楣的事情。有一次到弗拉基米尔来征集新兵的是一个侍从武官艾森伯爵[②]。村长把他的大头金币和小金币塞给他。不幸我们的伯爵,像《努林伯爵》[③] 里的女主人公那样,"不是按照父母

① 在一八七四年以前俄国新兵入伍,要把前半边头发剃光。

② 艾森伯爵:尼古拉一世的侍从武官。本书第一卷第二、三章中讲到的彼·基·艾森是另一个人。

③ 《努林伯爵》:普希金一八二五年写的长诗。

的规矩"教养大的，却是在波罗的海的贵族学校里受的教育，学到了对俄国皇上的德国式的忠诚。艾森大发脾气，对村长大吼大叫，更糟的是他打了铃；办事员跑了进来，宪兵也来了。村长从来没有想到做官的人当中会有不肯受贿的，一下子完全发昏了，不知道抵赖，也不赌咒发誓说他绝没有拿钱出来行贿，说只要他有做这种事的心思，上帝就会叫他眼珠破裂、嘴里进不了一粒粮食。他像绵羊一样让人捉到警察局去，也许他还在后悔他送给将军的钱少了，得罪了将军。

可是艾森并不因为自己良心清白，也不因为看见这个不幸的农民惊惶失措就满意了，他大概还想 in Russland〔德语：在俄国〕根除贿赂的行为，惩办坏事，树立一个好榜样，他写信给警察局，写信给省长，写信给征兵局讲村长这个未遂的滔天大罪。农人给关在监牢里等候法庭审判。但是由于那个愚蠢而荒唐的法律规定向官吏行贿的老实人和受贿的官吏应受同样的处罚，事情显得很糟，因此必须把村长开脱出来。

我连忙去见省长——他不肯管这件事；刑事法庭庭长和顾问们都摇摇头，他们害怕侍从武官的干涉。而侍从武官却息了怒变得温和了，他首先表示，他"并不想使村长受到损害，他只想让他从中得到教训，让他受到审判，然后免罪释放"。我把他这个意思对警察局长讲了，他说："问题就在这里，所有这些先生都不懂怎样处理事情；他应当把人直接送到我这儿来，我把这个傻瓜揍一顿，教训他以后不要莽撞行事，①然后

① 原文是一句俗话："未询渡头，不要涉水。"

放他回家去，——大家都很满意；可现在，你试试吧，跟刑事法庭打交道去。”

以上这两种意见很巧妙、很清楚地说明了俄罗斯帝国对法律的看法，我一直忘不了它们。

村长从祖国司法界的赫丘里斯石柱[①]之间，落进了中心的深渊里面，就是说落进了刑事法庭。过了几个月，判决书已经准备好了，对村长判处笞刑，并永远流放到西伯利亚。他的儿子和全家来找我，恳求我救出他们的父亲和家长。我自己也很可怜这个完全无辜受害的农民。我又去找庭长和顾问们，又向他们指出，他们判处村长以这样的重刑，对他们自己也有不利；况且他们自己很清楚离了贿赂就做不成一件事，而且说实在话，他们要是不像真正的基督徒那样认为任何礼物都是完美的、每一赠与都是福，他们自己就连吃的东西也没有。我要求，我鞠躬，又叫村长的儿子去更恭敬地鞠躬，我居然达到了我的一半的目的。村长被判处在狱中鞭打几下，可以留居原地，但是不准他再替别的农民讲话办事。

看见省长和检查官都同意这个判决，我放心地松了一口气，便到警察局去要求，请他们执行鞭打时减轻一点；警察局的人一半因为我亲自去向他们请求，他们感到得意，一半因为他们怜悯这个由于一件同他们都有切身关系的事情而受罪的

① 赫丘里斯石柱：直布罗陀海峡两岸的岩壁，根据传说，两岸的岩壁本是生在一起的，后来被古希腊神话中的大力士赫丘里斯把它分开了。用在这里的意思是：两大极端之间。

人,而且知道他是个有钱的农人,他们便答应我只是在形式上执行判决。

过了几天一个早上村长来找我,他瘦了些,头发、胡子也更白了。我看出来他虽然高兴,却在为什么事情发愁,思想上有什么负担。

"你在愁什么事情?"我问他道。

"就是这样,我宁愿他们干脆地一下子解决。"

"我完全不懂你的意思。"

"我是说,他们究竟什么时候处罚我?"

"那么他们没有处罚你?"

"没有。"

"他们怎么放你出来的? 你已经回家了,是不是?"

"回家,是回家了;不过我还在想处罚的事,秘书给念过了。"

我实在莫名其妙,后来就问他是不是给过他什么书面的东西。他递给我一份公文。整个判决书都写在公文上,最后说明已经遵照刑事法庭的判决在狱中执行了笞刑,"发给本人证件一纸释放出狱。"

我大笑起来。

"你不是已经受过处罚了!"

"没有,少爷,没有。"

"好吧,倘使你不满意,你就回去请求他们处罚你,也许警察会理解你的心情。"

老人看见我笑,他也微微笑了,他怀疑地摇摇头,接

口道:

“奇怪,真是怪事!”

“真是乱来一气!”许多人会这样说;可是他们应当记得只有靠这种乱来,俄国内的生活才能够照常进行。

第十六章

亚历山大·拉甫连季叶维奇·维特别尔格

在这些怪诞、龌龊、庸俗、丑恶的人物和情景、事件和标题的中间，在这些文牍主义的框框和官僚制度的常规里面，我想起了一个艺术家的忧郁的、高贵的形象，他是被政府用冷漠麻木的残酷毁掉了的。

沙皇的铁腕不仅把一件天才的作品掐死在它的摇篮里面，不仅毁坏了艺术家的创作活动，使他纠缠在法律的圈套里和警方侦查的阴谋诡计中间，它甚至企图把他的清白的姓名同他最后的面包一起抢走，并且给他加上贪污和盗窃公款的罪名。

尼古拉〔一世〕毁掉并且侮辱了亚·拉·维特别尔格之后，把他流放到维亚特卡。我就是在那里遇见他的。

我和这个伟大的艺术家同住了两年半，我看见这个坚强的人怎样在迫害和不幸的重压下渐渐地垮下来，成了官厅和兵营专制制度的牺牲品（这个制度对世界上一切事物都用征募新兵的军官和抄写公文的录事的眼光来死板地衡量）。

我们不能说他是轻易地屈服了的；他倔强地奋斗了整整十年。他初到流放地的时候，他还希望挫败敌人，替自己辩白

清楚,总之,他初到流放地的时候,他还准备战斗,他有计划,有打算。然而不久他就看清楚:一切都完了。[①]

也许连这样一个发现也不能使他屈服,可是他身边还有妻子儿女,他前面还有流放、贫困、痛苦的长长的岁月,于是维特别尔格不是按日子计算、而是按钟点计算地头发发白、人变老了。我在两年以后同他分别的时候,他看起来整整老了十岁。

以下便是这个长期受难的故事。

亚历山大皇帝不相信他打败了拿破仑,这样的荣誉使他感到沉重的负担,他直言不讳地把荣誉归于上帝。他经常倾向于神秘主义,感到精神悒郁(许多人认为这是良心谴责的表现),特别是在一连串打败拿破仑的胜利以后,他更陷入神秘主义和悒郁里面了。

当"最后一个敌兵跨出国境"的时候,亚历山大〔一世〕发布了一道诏令,[②] 他许愿要为救世主在莫斯科兴建一座巨大的教堂。

向各地征求建筑图样,决定举行一次大的悬赏征求。

维特别尔格当时还是一个年轻的美术家,他刚刚念完学校的课程,得到绘画方面的金质奖章。他原籍瑞典,出生在俄国,起初在采矿武备学校念书。这个美术家热情、古怪,倾向于神秘主义;他读了诏令,读了征求建筑图样的公告,就把他

---

① 维特别尔格一八三五年十月二十六日到维亚特卡。

② 指一八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的"关于在莫斯科为救世主基督修建礼拜堂用以感谢上帝拯救俄国免遭敌人蹂躏"的诏令。

所有的事情全丢开。他整日整夜地在彼得堡大街上逛来逛去，一个固执的想法折磨着他，这个想法太强烈了，不让他安静，于是他把自己锁在屋子里，拿着铅笔，工作起来。

艺术家没有把他的构思对任何一个人谈过。他工作了几个月之后，就到莫斯科去研究这个城市和它的四郊，然后又动手工作，躲起来，几个月不见人，也不把他设计的图样告诉人。

评选的时候到了。应征的图样很多，有的从意大利、有的从德国送来，我们的美术院院士们也送来他们的设计。这个无名的年轻人送来的图稿也在许多图样的中间。过了几个星期，皇帝来审查图样。〔对维特别尔格说来〕，这四十天是在荒野里过的日子，是考验、疑惑、痛苦地等待的日子。

维特别尔格的宏伟的、洋溢着宗教诗意的建筑设计图样打动了亚历山大〔一世〕。他在这幅图样前站住，而且他头一次对一张图发问，它的作者是什么人。人们启开了密封，看到一个美术学院学生的陌生的名字。

亚历山大〔一世〕想见见维特别尔格。皇帝同美术家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他那豪放的、生气勃勃的语言，他那丰富的真实的灵感和他的信仰的神秘主义的色彩打动了皇帝。“您借石头讲话。”皇帝说，他又把维特别尔格的设计图样仔细看了一遍。

就在这一天这个设计图样被采用了，维特别尔格被任命为教堂的建筑师和修建委员会主任。亚历山大〔一世〕不知道他在这位艺术家的头上戴上桂冠的同时也把荆棘冠冕给他戴上了。

没有一种艺术比建筑学更接近神秘主义的了;它是抽象的、几何学的、无声音乐的、冷静的东西,它的生命就在象征、形象和暗示里面。简单的线条、它们和谐的组合、节奏、数的对称,这构成了一种神秘的但同时又是不完全的东西。建筑物,教堂(庙宇),并不像塑像或者绘画、诗或者交响乐,它们在自己身上并不包含目的;建筑物需要居住的人,这是用线条勾勒出来的一席空地,这是环境,是龟甲,是软体动物的外壳,——关键就在于必须使这个容身之地同它的精神、它的目的、它的居住者相适合,就像龟甲同乌龟适合那样。教堂(庙宇)的四壁、它的拱门和圆柱、它的大门和正面、它的基座和圆顶应当表现出教堂(庙宇)中奉祀的神的特征,就像人脑的沟回必然在头颅骨上留下痕迹一样。

埃及人的庙宇是他们的圣书。方尖塔就是在大路上〔无声的〕传道。

所罗门的庙宇① 就是变成了建筑物的圣经,正如罗马圣彼得大教堂② 这个建筑物象征着脱离天主教,象征着非宗教世界的开端,象征着人类脱离宗教生活的开端。

教堂(庙宇)建筑本身经常离不开神秘的仪式、譬喻、秘密的献祭,所以中世纪的建筑者们把自己看成一种特殊的人、一种僧侣、所罗门庙宇修建者的继承人,他们还组织了秘密的石

① 所罗门:参看第二九二页注①,他的庙宇在外约旦的郇山上,后被罗马皇帝铁图斯毁坏。

② 圣彼得大教堂:这个教堂是十六世纪中勃拉芒德和米开朗琪罗修建的。

匠公会，这种公会后来就变成了共济会。

从文艺复兴的时代起，建筑学就失掉了它特殊的神秘性质。基督教的信仰一直跟哲学的怀疑作斗争，哥特式（尖拱式）建筑的拱门跟希腊式山墙作斗争，精神神圣跟尘世美作斗争。因此，圣彼得大教堂之所以具有崇高的意义，在于它的巨大规模中表现出基督教奔向生活，教堂成为多神教的了，而鲍那洛蒂[1] 在西施庭教堂[2] 的壁画上把耶稣基督画成一个魁梧的大力士，一个年富力强的赫丘里斯。

在圣彼得大教堂以后，教堂的建筑完全退化，最后成为古希腊的围柱式建筑和圣彼得大教堂的规模或大或小的摹仿。

一座巴台农神庙[3] 叫做巴黎的圣玛德兰教堂[4]。另一座就是纽约的交易所。

没有信仰、没有特殊的情况，就很难创造出什么生气勃勃的作品；所有的新教堂都带有牵强的、伪善的、不合时代的味道，例如尼古拉〔一世〕任用统[5] 来建筑的印度—拜占庭式那样的五个圆顶的五味瓶架（用葱头[6] 代替了瓶塞）或者像英

---

① 米开朗琪罗·鲍那洛蒂(1475—1564)：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著名的雕刻家、画家、建筑师和诗人。

② 西施庭教堂：在梵蒂冈。

③ 巴台农神庙：古希腊雅典人祭雅典娜女神的神庙。

④ 圣玛德兰教堂：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后修建的教堂，它的圆柱和山墙近似古希腊的神庙。

⑤ 即康·安·统(1794—1881)，俄国建筑师，莫斯科救世主基督大教堂就是他设计修建的。

⑥ 葱头：指教堂顶上的圆球结顶。

国人用来装饰他们城市的那些使建筑师感到刺眼的棱角分明的哥特式教堂。

然而维特别尔格制作他的设计图样时的情况，他的个性以及亚历山大皇帝的心境都是非常特殊的。

一八一二年的战争大大地震动了俄国人的心灵；在莫斯科收复以后好久，思想的骚动和神经的激动还不能平静下来。俄国国外的大事，巴黎的攻占，一百天的故事[①]，等待，谣言，滑铁卢，拿破仑坐船去海岛，[②] 为战死的亲人服丧，替活着的人担心，军队回国，兵士还家，——这一切就是在最粗鲁的人的脑子里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们设想一下：这样一个青年美术家，神秘主义者，赋有创作才能的艺术家，同时又是一个狂热地信奉宗教的人，他受到了上述那一切事情的影响，他受到了沙皇的号召和他自己的天才的影响。

在莫斯科附近，在莫日艾斯克和卡卢加公路之间，有一个不大的高地耸立在全城之上。这就是我在青年时期最初的回忆中谈到的麻雀山。整个城市匍匐在它的脚下，从山顶上可以眺望莫斯科的最美的风景。伊凡雷帝当时还是一个年轻的浪子，他站在这里哭着，望着他的首都在焚烧；就在这里西尔威斯特尔教士[③] 来到他的面前，并且用严厉的言辞在二十年之间使他变成一个天才的恶魔。

---

① 一百天的故事：指拿破仑重返巴黎的“百日政变”。

② 指拿破仑一世战败后被放逐到圣海伦岛的事。

③ 西尔威斯特尔（生于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六、七十年代卒）：俄国教士，政治、宗教和文学活动家，伊凡雷帝的忏悔师。

拿破仑带着他的军队绕过这座山,他的兵力就在这里垮了下来,在麻雀山的脚下开始了他的撤退。

要修建一座纪念一八一二年的教堂,难道还能够找到比这个敌人到过的最远之处更好的地方吗?

然而这还不够,还得把山也变做教堂的下层部分,从山脚一直到河边的旷野都给围在柱廊里面,在这个三面都是天然构成的基础上,建立起第二层和第三层神殿来,组成一个十分优美的整体。

维特别尔格的教堂像基督教的主要教条那样,是三位一体,不能分开的。

在山石上开凿出来的下层神殿的形状是平行四边形,像一口棺材,一个身体,它的外表就像用近似埃及圆柱支持的巨大的正门入口;它消失在山中,消失在粗糙的、没有经过雕凿的大自然里。这座神殿燃着埃特鲁利① 的高高的枝形灯架上的灯,白天的亮光从第二层神殿经过透明的基督诞生图像微弱地透射进来。所有在一八一二年战死的英雄都安息在这个地下圣堂里面,这是对那些在战场上牺牲的人举行的永久追念仪式,所有那些人,从将军到普通士兵,他们的名字都刻在墙壁上。

在这个坟墓上面,在这个墓地上面建立起四面相等的希腊十字形的第二层神殿,——伸开双手〔表示欢迎〕的、生活

① 埃特鲁利:罗马时代的意大利古国,就是今天的托斯卡纳,这里出产名瓷。

的、忧患的、劳动的神殿。通到这座神殿的那些圆柱上装饰着《旧约全书》中的人物雕像。正门前立着先知们的像，他们站在殿门外，指着他们不该走的路。《福音书》和《使徒行传》[1]的全部故事都画在这座神殿里面。

在这第二座神殿上面，作为它的顶盖，使它完备、完成的第三座神殿是圆形的建筑物。这座灯烛辉煌的大殿是用环形设计图样来表现的圣灵、不受干扰的宁静和永恒的神殿。这里既无画像，也无雕塑，只是它的外面有一圈天使长立在那里，屋顶是一个巨大的圆顶。

我现在凭记忆写出维特别尔格的主要构思。他已经把这些构思十分详细地作出来了，它们始终同基督教的神正论[2]和建筑学的优美感是一致的。

这个杰出的人为他的设计花了他一生的工夫。在他作为被告受审讯的十年中间，他就只做这一件事；在他流放期间，虽然经受贫穷艰苦，他还是每天花几个小时在他的教堂上面。他活着就是为了这座教堂，他不相信它会不给修建：回忆、安慰、光荣——这一切全在这个艺术家的公事包里面。

也许将来有一天，在这个受难者死后，另一个艺术家会抖掉这些图纸上面的灰尘，怀着敬意地发表这个建筑学上遭受

---

① 《福音书》和《使徒行传》：均见于《新约全书》。

② 神正论：一种宗教哲学学说，企图解释一方面世界上有罪恶与不公平存在，另一方面还要承认神的"至善"和"万能"的问题。

摧残迫害的记录，在这上面消耗了、浪费了一个年富力强的生命，这个生命曾经短暂地受到灿烂光辉的照耀，但是接着又落在司务长——沙皇、农奴——枢密官、讼棍——大臣们的手里，给他们磨坏、压碎了。

设计图样是天才的创作，既可怕，又很惊人——因此亚历山大〔一世〕挑选了它，因此决定按照它修建起来。有人说山承担不了这个教堂的重量。我不相信这个说法。特别是我们想起英美工程师的一切新的方法、那些火车通过八分钟的隧道、吊桥等等的时候。

米洛拉多维奇伯爵劝告维特别尔格用整块的花岗石建造底层神殿的大圆柱。因此有人对伯爵说从芬兰运来整块花岗石运费太贵了。

“正因为这样才必须把它们弄来，”他答道，“倘使莫斯科河两岸有个花岗石矿，就不希罕用它们了。”

米洛拉多维奇是一个诗人——军人，因此他懂得诗意。宏伟的事物是用宏伟的材料做成的。

只有大自然不需要什么就创造出伟大的事物来。

连那些从不怀疑维特别尔格的诚实的人也认为他的主要错误在于他担任了主任的职务，他是一个没有经验的艺术家、一个丝毫不懂官场事情的年轻人。他本来应该只做建筑师。这个意见是对的。

坐在自己家中房间里发出这种责备，当然是容易的事情。他接受这个职务，正因为他年轻，没有经验，又是艺术家；他接受这个职务，因为他的设计图样被采用了，在他看来一

切都很顺利;他接受这个职务,因为沙皇亲自要他担任,鼓励他,支持他。还有什么人不头发晕呢?……什么地方去找十分谨慎、十分清醒、十分克制的人呢?倘使有这样的人,他们也不会创作出宏伟教堂的设计图样,也不会叫"石头讲话"。

不用说维特别尔格受到了一大群骗子的包围,那些人把俄国看作营私舞弊的场所,把工作看做赚钱的生意,把职务当作发财的好机会。不难理解他们要在维特别尔格的脚下挖一个坑。但是为了要使他落进去以后就再也不能爬出来,这除了便于他们贪污盗窃之外,还应该加上由于一些人的妒忌心和另一些人的受了打击的虚荣心。

维特别尔格在委员会中的同事有总主教菲拉列特、莫斯科总督① 和枢密官库希尼科夫②;他们一开头就因为同一个乳臭小儿共事全感到委屈,特别是他毫无顾忌地发表意见,对他们的主张他要是不同意,就发言反对。

他们帮忙使他陷于困境,帮忙诽谤他,后来又十分冷静地毁掉他。

起初是神秘主义的大臣亚·尼·戈里曾③ 的下台,后来是亚历山大〔一世〕的逝世,这两件事都帮助了他们。

戈里曾的部撤销以后,共济会的组织、圣经会、路德教的

---

① 莫斯科总督:指德·瓦·戈里曾。

② 谢·谢·库希尼科夫(1765—1839):一八〇三年曾担任彼得堡省长,他是委员会成员,后来又负责调查维特别尔格的案件。

③ 指宗教事务和教育部的大臣戈里曾,参看第八四页注②。

虔信派[1] 都倒了，上述组织以喀山的马格尼次基[2] 和彼得堡的鲁尼奇[3] 为代表人物走到了荒谬、怪诞的极端，走到了野蛮的迫害，走到了痉挛性的跳舞，走到了歇斯特里的狂叫和天知道的什么古怪举动。

反过来，野蛮、粗暴、愚昧无知的东正教占了优势。这是诺夫哥罗德的修士大司祭福季依[4] 所宣传的，福季依同奥尔洛娃伯爵夫人关系密切(当然不是肉体的关系)。她是勒死彼得三世的著名的阿列克谢依·格利戈里叶维奇[5] 的女儿，她想把她的广大田产(这是叶卡捷琳娜〔二世〕从修道院手里夺取来的)[6]大部分捐献给福季依和他的修道院，她自己也沉溺溺在疯狂的狂信之中，她以为这样就可以拯救她父亲的灵魂。

但是有一件事是彼得堡政府所始终坚持的，不管它的原

① 十七世纪德国路德教的一个宗派。

② 米·列·马格尼次基(1778—1855)：反动人物，一八二〇至一八二六年间任喀山大学和教育区的督学。

③ 德·巴·鲁尼奇(1778—1860)：反动人物，神秘主义者，一八二一至一八二六年间任彼得堡教育区督学。

④ 福季依(1792—1838)：诺夫哥罗德尤利叶夫斯基修道院的修士大司祭，亚历山大一世统治时期宫廷阴谋的参加者。

⑤ 指阿·格·奥尔洛夫(1737—1807)，俄国国务活动家，他参加了一七六二年推翻彼得三世的宫廷政变，叶卡捷琳娜二世因此做了女皇。他后来担任俄国舰队总司令。他的女儿安·阿·奥尔洛娃-切斯敏斯卡雅(1785—1848)有万贯家财，同亚历山大一世和尼古拉一世的宫廷有密切的关系。

⑥ 一七六四年叶卡捷琳娜二世颁布诏令，将宗教组织的产业收归国有。(但是到她在位的末年，她又把充公的教堂产业分赏给她的宠臣。)

则、它的宗教怎样改变,这件事始终不变,——这就是不公正的压制和迫害。鲁尼奇派和马格尼次基派的暴行又反过来用以对付鲁尼奇派和马格尼次基派。圣经会昨天还受到庇护、受到称赞,说是道德和宗教的支柱,——今天却给勒令关闭、遭到查封,它的成员受到和对待伪币制造者差不多的待遇;《郇山通报》昨天还被推荐给所有的家长,现在却被查禁,认为比伏尔泰和狄德罗的著作还有毒,它的出版者拉勃津也给流放到沃洛格达去了。①

亚·尼·戈里曾公爵的下台拖累了维特别尔格,大家都攻击他,委员会控告他,总主教不高兴,总督不满意。他的答复是"粗暴无礼的"(在他的案件中一个重要的罪名就是粗暴无礼);他的下级贪污盗窃,——好像在俄国政府机关里就有人不贪污盗窃似的。可能维特别尔格的下级比别人干贪污盗窃的勾当干得多一些,因为他完全没有管理教养院和高级盗窃犯的经验。

亚历山大〔一世〕命令阿拉克切叶夫审查这个案件。他替维特别尔格感到惋惜;他让他的一个亲近的随从告诉维特别尔格说,皇上相信他没有罪。

然而亚历山大〔一世〕死了,阿拉克切叶夫下台了。在尼古拉〔一世〕的统治下,维特别尔格的案件马上朝不利的方向发展。官司拖了十年,荒谬到叫人简直不能相信。刑事法庭

① 拉勃津和他的《郇山通报》:参看第八四页注②。拉勃津于一八二二年被流放到辛比尔斯克省先吉列依城,第二年得到许可定居在辛比尔斯克市。

认为有罪的各项全给枢密院驳回了，而刑事法庭认为无罪的各项枢密院却认为有罪。内阁接受了全部指控。皇上运用“沙皇最宝贵的赦免和减罪的特权”又加判——流放到维亚特卡。

因此维特别尔格就由于“辜负了先皇亚历山大的信任，造成国家财产的损失”，给撤销了职务，流放出去了。好像他还被判决罚款一百万卢布，他的财产全部没收，给拍卖掉了，还有人散布谣言说他把非常多的钱转移到美国去了。

我和维特别尔格在一个房子里同住了两年，一直到我离开维亚特卡，我和他相处很好。他一点钱也没有；他一家人过着非常贫苦的生活。

为了说明这个案件以及在俄国所有类似的案件，我现在举出我记得特别清楚的两个细节。

维特别尔格为了工程需要，购买了商人洛巴诺夫的一座小树林；在这座树林还不曾砍伐的时候，维特别尔格又看见了另一座树林，也是洛巴诺夫的，它离河道更近，他便向商人提出拿这座树林换他先前替教堂买下的那座树林。商人同意了。树林给砍伐了，木材从河上流送出去。后来还需要更多的木材，维特别尔格又把第一座树林买下来了。这就是著名的两次购买同一座树林的罪名。可怜的洛巴诺夫因此给关进监牢，就死在那里。

第二件事情是我亲眼看见的。维特别尔格为了教堂买下了一座庄园。他的想法是同田地一起买下来的农奴可以给教

堂提供一定数目的工人，而且用这种办法可以使他们和他们的村子得到完全的自由。有趣的是我们那些地主——枢密官却认为这种办法有推行奴隶制的意思。

顺便说说，维特别尔格还想购买我父亲在莫斯科河畔鲁兹基县里的田产。在那个村子里发现了大理石，维特别尔格要求我父亲允许他在那里作一次地质考察，看有多少的蕴藏量。我父亲同意了。维特别尔格就动身到彼得堡去。

三个月以后我父亲知道石头正在大规模地开采，农民的秋播地上堆满了大理石。我父亲提出抗议，没有人理他。一场旷日持久的诉讼开始了。起初大家都想把责任全推到维特别尔格的身上，可是不幸，看来他并没有发布过任何命令，这一切都是他不在的时候由委员会办理的。

官司打到了枢密院。普遍感到惊奇的是枢密院的判决离常理并不太远：开采的石头留给地主作为赔偿被压坏的田地的损失；开采石头和劳动所花掉的国家的钱多达十万纸卢布，应当由签署开工合同的人赔偿。签署合同的人是戈里曾公爵[①]、菲拉列特和库希尼科夫。不用说，引起了叫喊和吵闹。案子到了皇上那里。

他有他的一套法律观念。他免除了那几个有罪的人的赔款，因为据他亲笔写出的理由（印在枢密院公报上），“委员会的成员并不知道他们签署的是什么。”我们姑且承认总主教

① 指德·瓦·戈里曾。

由于他的职业不得不表示谦恭，可是另外两位大官也接受了皇上如此仁慈、如此体谅下情的恩赐，我们怎么看他们呢？

然而这十万卢布从什么地方弄来呢？据说国家的财产在火里烧不掉，在水里也淹不掉。我们还可以补充一句：它却是可以给人盗窃走的。不用担心——马上派了侍从武官长火速赶到莫斯科去查明这个案件。

斯特列卡洛夫[①] 查明了一切，理出了头绪，在几天之内就把事情解决，作了结束：把地主田地上开采出来的大理石拿去支付开采的费用；倘使地主想留用大理石，他就应该付出十万卢布。对于地主不需要赔偿什么，因为由于财富的新的部分的发现，他的田产的价值反而提高了（这真是 chef-d'oeuvre! 〔法语：杰作!〕），至于农民的被压坏了的田地，根据彼得一世批准的关于水淹了的草地和踏坏了的刈草场的法律，每亩补助若干戈比。

在这个案件中真正受到处罚的人是我的父亲。也不用说，大理石的开采事件在审判中仍然构成控告维特别尔格的罪名。

……维特别尔格流放两年后，维亚特卡的商人计划修建一所新的教堂。

尼古拉〔一世〕为了在任何地方、任何事物上消除一切独

① 斯·斯·斯特列卡洛夫(1781—1856)：亚历山大一世的侍从武官长，枢密官。

立精神、一切个性、一切想象和一切自由，出版了整整一本皇帝批准的教堂建筑图样。谁要修建教堂就必须在国家许可的这些图样里面挑选。据说他禁止编写俄国歌剧，因为他认为连在第三厅办公室里工作的侍从武官里沃夫[1]编写的也不堪入目。可是这还不够——他应当出版一本皇帝批准的曲谱集才好。

维亚特卡的商人翻看了“核准的”图样以后竟敢表示和皇上的趣味不相同。尼古拉〔一世〕觉得商人送审的图样很好，他批准了它，并且向省当局发出指示要忠实地表现建筑师的构思。

“这个图样是什么人设计的?”他问御前大臣道。

“维特别尔格，陛下。”

“怎么，就是那个维特别尔格吗?”

“就是那个，陛下。”

现在突如其来地，——准许维特别尔格回到莫斯科或者彼得堡了。这个人曾经要求给他恢复名誉，却没有得到批准；他设计了一张成功的建筑图样，沙皇就叫他回来，好像有什么人不相信他的艺术才能似的。……

在彼得堡他快要穷死了，还作了最后的努力企图恢复自己的名誉。他完全失败了。他要求亚·尼·戈里曾公爵在这方面给他帮助，然而公爵认为不可能复审这个案件，他建议维特别尔格给皇位继承人写一封动人的申诉信要求经济上的照

---

① 阿·费·里沃夫(1798—1870)：俄国作曲家，编写过少数歌剧，没有什么影响。他年轻的时候在第三厅工作，做卞肯多尔夫的副官。

顾。他答应同茹科夫斯基[1]一起设法,并答应给他一千个银卢布。

维特别尔格谢绝了。

一八四六年初冬我最后一次到彼得堡,见到了维特别尔格。他完全垮下来了。连我从前非常喜欢的他那种对敌人的仇恨也开始消失了;他再没有什么希望了,他不做任何事情来摆脱困境了,经常不断的灰心绝望消耗了他的生命,他的活力完全消失。他在等待死亡。

倘使这就是尼古拉·巴甫洛维奇[2]所想望的,那么他可以满意了。

这个受难者是不是还活着,我不知道,不过我怀疑。

"倘使不是为了我的家庭,我的小孩,"我们分别的时候他对我说,"我就会逃出俄国,到外国去要饭去;我脖子上挂着符拉季米尔十字章泰然自若地向过路人伸出亚历山大皇帝握过的手,对他们讲我的设计图样,告诉他们一个艺术家在俄国的命运!"

"受难者,人们在欧洲会听到你的命运的,我向你保证这个。"我心里想道。

在维亚特卡同维特别尔格往来对我是很大的安慰。他的态度带了一种庄严和严肃的沉静,使他有一点教士的样子。他是一个道德上非常纯洁的人,而且一般地说他并不喜欢享

[1] 瓦·安·茹科夫斯基(1783—1852):俄国诗人,皇太子的教师。

[2] 尼古拉·巴甫洛维奇:尼古拉一世的名字和父名。

乐，倒更倾向于禁欲主义；然而他的严格并不损害他艺术家天性的豪华富丽。他能够给他的神秘主义加上一种姿态非常优美的形式和十分美丽的色彩，因此别人的反对意见到了口边也说不出来，人们也不忍分析、分解他幻想中若隐若现的形象和模糊不清的画面。

维特别尔格的神秘主义一部分来源于他的斯堪的纳维亚血统，这是我们在希威登包尔格[①] 身上看到的那种深思熟虑的喜欢幻想的天性，它也像在挪威的雪和冰山上日光的强烈反射。

维特别尔格的影响使我发生了动摇，然而我的现实的天性占了上风。我并不是注定要登上三重天去的，我生来就完全是一个世俗的人。我手的接触并不能使桌子旋转，我眼光的注视也不能使指环摆动。我感到思想的白日光比幻想的月光更亲切。

然而我同维特别尔格住在一起的时候比在其他任何时候更接近神秘主义。

分离，流放，我收到的信[②] 上那种宗教的过度兴奋，越来越强烈地充满了我心灵里的爱情，再加上沉重难堪的后悔的感情[③] ——这一切加强了维特别尔格对我的影响。

---

① 艾·希威登包尔格(1688—1772)：瑞典神学家，神秘主义者。

② 指娜·亚·扎哈利娜的来信。

③ 指作者同普·彼·麦德威杰娃(一八六〇年逝世)的事情，见本书第三卷第二十一章。

大约两年以后我还受到从《福音书》和让·雅克[①] 那里来的、像彼耶尔·勒鲁[②] 一类法国思想家的神秘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

奥加略夫甚至比我更早地投进神秘主义的波浪里去。他在一八三三年就开始为盖别尔[③]的大合唱曲《失乐园》作歌词。奥加略夫写信给我[④] 说："失乐园的主题就是整部人类历史。"也许他在这个时候把我们正在找寻的理想的乐园也误认为就是我们失去的乐园吧。

一八三八年我写了一些带宗教社会主义精神的历史小景[⑤]，同时我把它们当作正剧看待。在其中一部作品里我描写了古代世界[⑥] 同基督教的冲突，描写了保罗到罗马去使一个死了的年轻人复活。在另一部作品里我描写了官方教会同教友派教徒[⑦] 的斗争和威廉·佩恩[⑧] 动身到美洲、到新世界

---

① 即让·雅克·卢骚。

② 彼·勒鲁(1797—1871)：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的信徒，晚年陷于阴郁的神秘主义。

③ 盖别尔：当时有名的作曲家。——作者原注。弗·克·盖别尔(1787—1843)：东欧西里西亚作曲家，一八一七年起在莫斯科教授音乐一直到死。

④ 指一八三三年六月七日奥加略夫给作者的信。

⑤ 指作者在一八三八至一八三九年写的《罗马小景》和《威廉·佩恩》。

⑥ 古代世界：英译者译为"异教徒的世界。"。

⑦ 教友派：基督教的一个派别，举行非正式集会，不做正式教会(官方教会)的礼拜仪式，反对任何暴力和战争。

⑧ 威·佩恩(1644—1718)：英国朋友会(即教友派)教徒，得到英王特许去美洲，在宾夕法尼亚建立了独占的殖民地。

去的情景。①

在我身上福音书的神秘主义不久就由科学的神秘主义取而代之;幸而我把科学的神秘主义也摆脱了。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这个简单朴素的小城赫雷诺夫吧,我不知道是为了什么,也许是出于芬兰的爱国心吧,它的名字被叶卡捷琳娜二世改成了维亚特卡。

在维亚特卡的这种流放的孤寂生活中,在这种肮脏的小官吏的圈子中,在离开所有亲近的人、无依无靠地听凭省长支配的这种荒凉的远方,我度过了许多美好的、神圣的时刻,接触到许多热烈的心和友谊的手。

---

① 不知道为什么,我认为用诗句来表现这些小景好。也许我以为在波戈金写了无韵的五音步的抑扬格以后人人都可以写这种诗体了〔一〕。一八三九年或者一八四〇年我把两册稿本都交给别林斯基,安心地等待他的称赞。然而第二天别林斯基把它们送了回来,附一张字条,写着:"请你叫人把它们连在一起重抄一遍,不要像诗那样分行,那个时候我就会愉快地一口气读完,现在我一想到它们是诗,就读不下去。"

别林斯基打消了我这两次戏剧小景的尝试。还债总是愉快的事情。一八四一年别林斯基在《祖国纪事》上发表了一篇议论文学的长篇对话。〔二〕我们en petit comité〔法语:亲密地〕一起在狄索饭店吃午饭的时候,他问我:"我最近这篇文章你喜欢不喜欢?"我答道:"很喜欢,你谈的都很出色,不过请你告诉我,你怎么能够耐着性子同这个人谈了两小时之久、而没有一开头就看出来他是傻瓜呢?""的确是这样,"别林斯基说,他忍不住笑了起来,"得啦,老弟,这下给你抓住了!真是一个大傻瓜!"——作者原注

〔一〕米·彼·波戈金(1800—1875):俄国历史学家、作家。他的悲剧《诺夫哥罗德行政长官夫人玛尔法》就是按照无韵的五音步抑扬格写的。

〔二〕指别林斯基的论文《一八四一年的俄国文学》,在《祖国纪事》一八四二年第一期上发表。

你们现在在什么地方？你们怎样了，我的多雪地区的朋友们？我们二十年不见面了。大概你们也和我一样地老了，你们在出嫁你们的女儿，你们不再喝大瓶大瓶的香槟酒，不再用高脚小酒杯喝果子酒了。你们当中谁发了财，谁破了产，谁升了官，谁又瘫痪了？首先，我们过去那些毫无顾忌的谈话是不是仍然活在你们的记忆里，过去那些由于爱和恨而强烈颤动的心弦是不是仍然在你们身上颤动？

我还是那个样子，这是你们知道的。我相信我的消息一定会从太晤士河岸传到你们那里。我有时候想起你们，我总是怀着友爱的感情；我身边还有些当时的信件，其中有几封对我是非常宝贵的，我喜欢反复地阅读它们。

“我不害臊地向你承认我现在很痛苦，”一个年轻人① 在一八三八年一月二十六日给我来信说，“为了你指引我过的那种生活的缘故，请你帮助我，用你的劝告帮助我。我想读书，给我介绍一些书，向我介绍什么书都行，我要尽全力做去，给我一个机会，——要是你不理我，那你就太不对了。”

“我祝福你，就像庄稼人祝福使他那贫瘠的土壤产生果实的雨水一样。”我离开以后另一个年轻人写信给我说。

我引用这些话并不是出于虚荣心，却是因为它们对我十分珍贵。为了这些年轻人的呼吁和年轻人的友爱，为了在他们的心里唤起的向往，我也能忍受九个月的监禁和维亚特卡的三年流放生活。

---

① 年轻人：指安·叶·斯克沃尔左夫，维亚特卡中学教师。

当时每星期两次莫斯科邮件到达维亚特卡;拣信的时候,我多么激动地在邮局门口等待,我怀着何等颤抖的心打开火漆印,在家中来信里寻找一张写在薄薄纸上字迹非常纤细、优美的小小字条。

我从来不在邮局里读它,却默默地走回家去,推迟看信的时间,只是想着有信就感到一种享受。

这些信全保存着。我把它们留在莫斯科了。我非常想重读它们,可是又害怕摸到它们。[1] ……

信函胜过回忆,事件的血还凝结在信函上面;它们就是过去的真实面目,保存下来了,而且永不褪色。

……难道人还需要再知道、再看、而且用起皱纹的老年的手摸摸自己结婚时候穿的衣裳?……

[1] 作者在一八五三年写本篇的时候,他的妻子娜塔里雅已经病逝了(一八五二年五月)。

第十七章

皇位继承人在维亚特卡——丘菲亚耶夫的下台——
我调到弗拉基米尔——县警局局长审理案件

皇位继承人要到维亚特卡来！皇位继承人周游俄国露露面，并且到处看看！这个消息引起大家的注意，不用说省长比任何人更注意。他忙乱起来，并且做了一连串十分荒唐的蠢事：命令沿公路的农人穿上节日服装，命令城市里重新油漆板墙、修补人行道。在奥尔洛夫有一个穷寡妇有一所小房子，她对市长[1] 说她没有钱修补人行道，市长向省长报告了。省长下令拆用她的地板（那里的人行道是用木板铺的），倘使地板不够用，修理费就由国家垫付，以后再由她偿还，即使把她的房子拿来公开拍卖也行。拍卖房屋并未成为事实，可是寡妇的地板却给弄坏了。

离维亚特卡五十里的一个地方，有一幅向诺夫哥罗德人显过灵的尼可拉·赫雷诺夫斯基[2] 的圣像。从前诺夫哥罗德

---

① 市长：指彼·德·达维多夫，一八三七年任奥尔洛夫市长。

② 尼可拉·赫雷诺夫斯基：东正教教会的圣徒。

移民定居赫雷诺夫(现在的维亚特卡)的时候,他们把圣像也带来了,然而圣像忽然不见了,后来又在离维亚特卡五十里的大河上出现;诺夫哥罗德人又把圣像找了回来,可是这一次他们许愿,要是圣像留在他们那里不出事,他们每年用隆重的游行队伍把圣像送到大河一次,日期好像是五月二十三日。这是维亚特卡省主要的夏季节日。圣像由主教和穿着法衣的全体教士护送,在一只富丽的平底船上在河上整整走了一昼夜。几百只各种各样的小船、平底小船、独木船载满了农民和农妇、沃恰克人和小手艺人,形成一个五颜六色的行列,跟随着航行的圣像。在最前列的是省长的红呢覆盖的尖头木帆船。这个奇奇怪怪的场面的确很好看。远近各县的成千上万的人在大河两岸等候圣像。所有这些人都吵吵嚷嚷、成群结队地拥挤在一个小村子旁边——最奇怪的是不信东正教的沃恰克人和车累米西人甚至鞑靼人也来向圣像祈祷。因此这个节日也就有一种真正多神教的样子。在修道院围墙外面,沃恰克人和俄罗斯人送来上供的羊和小牛;它们就在当场给宰杀,由一个修士司祭念经,行祝福仪式,使它们的肉净化,肉就在院墙内一个特别的窗口出售。这些肉分成小块到老百姓手里。从前是免费分肉的,现在每块肉修士要收几个戈比。因此供献了整头小牛的农人还得为他自己吃的那块肉花费一两文钱。在修道院的院子里坐着一大群、一大群讨饭的人,瘸腿的、瞎眼的、各种残废的人,他们齐声唱着《乞讨词》。年轻的教士的儿子和城里的男孩们坐在教堂附近的墓碑上,拿着墨水瓶大声叫喊:“要写为什么人祭祷?为什么人祭祷?”农家妇

女和姑娘围着他们，讲着一些名字，男孩们毫不在乎地拿着笔沙沙地写下去，口里跟着念道："玛利亚，玛利亚，阿库林娜，斯捷潘尼达，约翰老爹，玛特辽娜……好啦，大婶，你这么多的人，这么多人，你看，你只掏出一个戈比，没有五个戈比不行：这样一大家人，这样一大家人——约翰，瓦西利莎，约娜，玛利亚，叶甫卜拉克谢雅，小卡捷林娜……"

教堂里十分拥挤，而且表现出古怪的选择，一个农家妇女把一支蜡烛递到她的邻人手里，认真叮嘱为"客人"(外来的圣像)插上，另一个农妇的蜡烛却是为"主人"(本地圣像)插的。维亚特卡的修士们和教堂执事们在整个出巡行列进行的时间里一直不停地喝酒。他们沿途在较大的村子里休息，农人们热心地款待他们，快要把他们胀死了。

这是农民世世代代习惯了的民间节日，省长却想把这个节日提前几天，为了让五月十九日到达的皇位继承人开心；他认为要是客人圣尼可拉早三四天到主人那里去，有什么不好呢？当然这件事还需要得到主教的同意；幸而主教是一个容易说通的人，他认为没有什么理由反对省长把节日从二十三日提前到十九日的打算。

省长把他接待皇位继承人的一连串巧妙的办法呈报了皇上，——好像在说，您瞧，我们怎样欢迎您的儿子。皇上看到这个日程表，很生气，就对内务大臣说："省长和主教都是傻瓜，节日保持原样，不许改动。"大臣把省长痛骂了一顿，东正教事务总管理局也把主教申斥了一番，圣尼可拉仍然按照过去的日期出巡。

彼得堡来的训令中间，有一道命令要在每一个省城里举办一次展览会陈列本地区的各种天然产品和手工艺品，展览品应当按照大自然的三界分类陈列。这种列入动物、植物和矿物三界的分类使得官吏们大伤脑筋，连丘菲亚耶夫也有些为难。为了不要出毛病，他虽然不喜欢我，还是把我叫去商量。

"好吧，譬如说，蜂蜜，"他说，"您把蜂蜜放在哪里呢？或者镀金框架——您断定它属于哪一类呢？"

他从我的回答里看出我对大自然的三界有"非常精确的"知识，就派我担任布置展览会的工作。

我正忙着陈列木制器皿和沃恰克人的服装、蜂蜜的铁筛子，而丘菲亚耶夫继续用残暴的手段准备让"殿下"开心的时候，"殿下"却愿意待在奥尔洛夫，接着奥尔洛夫市长被捕的消息又像响雷一样在省城传开了。丘菲亚耶夫脸色发黄了，他的脚步也不稳了。

皇位继承人到达奥尔洛夫前四、五天，市长写信给丘菲亚耶夫说那个家里地板给撬走了的寡妇到处诉苦，某一个有钱的商人又是城里的知名人士吹牛说，他要向皇位继承人报告全部经过。丘菲亚耶夫把这个商人处置得很巧妙：他吩咐市长怀疑这个商人是否有精神病（他喜欢彼得罗夫斯基的前例①），把商人送到维亚特卡来找医生检查；这件事情可以拖到皇位继承人离开维亚特卡省境以后，那么它也就此结束了。

① 请参看本书第二卷第十四章。

市长完全照他的话办了，商人进了维亚特卡的医院。

皇位继承人终于到了。[①]他对丘菲亚耶夫冷淡地点了点头，并不邀请省长去看他，却立刻把叶诺兴大夫找来给被捕的商人作检查。事情的真相他全知道了。奥尔洛夫的寡妇向他递了诉冤的呈文，其他的商人和小手艺人向他报告了事情的全部经过。丘菲亚耶夫的脸色更加难看了。看来事情不妙了。市长干脆讲出来他所作所为都是根据省长的书面指示办理的。

叶诺兴大夫证明那个商人是完全健康的。丘菲亚耶夫完了。

晚上七点到八点之间皇位继承人带着随员参观展览会，丘菲亚耶夫陪同他参观，用不连贯的辞句给他讲解，讲得颠三倒四，把托赫塔梅希[②] 讲成了沙皇。茹科夫斯基和阿尔谢尼耶夫[③] 看见事情不大对，就要我给他们作向导。我陪他们参观了展览会。

皇位继承人并没有他父亲的那种狭隘的严峻，那种冷酷、无情的残忍；他的脸上倒有一种善良而倦怠的表情。他大约二十岁，不过已经开始发胖了。

他对我讲的几句话是亲切的，没有他伯父康斯坦丁·巴甫

① 皇太子亚历山大·尼古拉叶维奇一八三七年五月十八日上午到达维亚特卡。

② 托赫塔梅希(约死于一四〇六年)：金帐汗国的可汗。

③ 康·伊·阿尔谢尼耶夫(1789—1865)：地理学家、历史学家、统计学家、彼得堡科学院院士；一八二八年任皇位继承人的教师。

洛维奇的那种嘶哑的、不连贯的腔调，也没有他父亲的那种教听话人吓得快要晕倒的威胁的口吻。

他走了以后，茹科夫斯基和阿尔谢尼耶夫问我，我怎么来维亚特卡的，他们奇怪维亚特卡省长公署一个小官讲起话来倒像一个正派人。他们马上表示愿意替我在皇位继承人面前讲话，而且他们果然尽力做过了。皇位继承人向皇上要求准许我到彼得堡去。皇上回答说，这样做对别的流放人就显得不公平了，然而他考虑到皇位继承人的意见就下令把我调到弗拉基米尔，这在地理上有了改善：因为离家近七百里了。以后再谈这个。

晚上在贵族俱乐部举行舞会。乐师是特地从一家工厂请来的，他们来的时候已经喝得大醉了；省长下令在舞会开始以前把他们整整关二十四小时，从警察局直接押送到乐队席的敞廊上，而且一直到舞会结束不许放任何人离开。

这个舞会就像一般为了什么特殊的重大事情在小城里举行的舞会那样，既愚蠢，又不舒服，极端寒伧而又俗气十足。警官们到处跑来跑去，穿制服的小官吏挤在墙边，太太小姐们团团围住皇位继承人就像未开化的人围住旅行家那样……顺便讲到太太小姐们的事情。在一个小城里展览会以后还举行了一个“招待会”。皇位继承人只吃了一只桃子，他把桃核扔在窗台上。官吏当中有一个喝饱了酒的高长子马上走了出来，这是县陪审官，一个出名的酒鬼，他缓步走到窗前拿起桃核，放进衣袋里去。

在舞会或者“招待会”之后，陪审官走到一位有势力的太

太面前，把殿下亲口咬过的桃核送给她；太太高兴极了。然后他又到另一位太太那里，又到第三位太太那里——她们都十分欢喜。

陪审官买了五个桃子，取出了桃核，使得六位太太非常满意。哪一位太太拿到的桃核是真的？每一位都以为她那颗桃核是皇位继承人留下来的。……

皇位继承人离开以后，丘菲亚耶夫便怀着沉重的心情准备拿他的巴夏辖区[①] 去换枢密官的安乐椅——结果事情更坏。

大约三个星期以后，邮局送来从彼得堡寄给“省负责人”的公文。办公室的官吏们惊慌起来。省长公署的收发官员跑来说他们收到了诏令。办公室主任跑去找丘菲亚耶夫，丘菲亚耶夫说他生病，不能来办公。

一个小时以后我们都知道他 sans phrase〔法语：干脆〕被撤职了。

全城都很高兴省长下台了；他的统治有一种叫人透不过气的、不干净的、官僚主义的腐败的臭气，然而不管这些，现在看见那些官吏们欢天喜地的样子，也感到厌恶。

不错，每一头驴子都朝这头受伤的野猪踢一脚。人们的卑鄙行为表现得像在拿破仑下台时候那样明显，尽管事情的大小不能比。最近一个时期我同他公开地不和，倘使不是他

① 巴夏辖区：旧土耳其和埃及高级行政长官巴夏管辖的行政区，相当于省。

本人给赶下了台，他一定会把我派到一个偏僻的小城[①]去。我尽力避开他，我也没有理由改变我对他的态度。然而别的人呢，他们就在昨天看见他的马车经过还脱下帽子，拚命巴结他，讨好他的小狗，向他的随从敬鼻烟，——现在连向他打招呼也不肯了，而且大声叫骂，攻击省里各种不法行为，其实这些罪行都是他们同他一起干的。这一切都不是新的东西，在各个时期、各个地方它经常重复发生，因此我们简直把这种卑鄙行为当作全人类的特征，至少不必为它感到惊奇。

新省长[②]来了。他是完全不同的一种人。是高个子，有一点虚胖，肤色苍白，五十岁的光景，脸上带着愉快的笑容，举止文雅。他讲起话来语法上非常正确，句子十分冗长，正像翻来覆去的明白解释反而把最简单的事情弄糊涂了。他是沙皇村高等法政学校的学生，还是普希金的同学，在禁卫军里服过役，经常购买法文新书，爱谈论重大问题，他到后第二天就送给我一本托克维尔关于美国民主的书[③]。

变化是很大的。同样的房间，同样的家具，然而不再是一个有着通古斯人[④]外貌和西伯利亚人习惯的鞑靼长官

---

① 偏僻的小城：原文是，非县行政中心的县辖城市。

② 新省长：指亚·阿·柯尔尼洛夫(1801—1856)：一八三七至一八三八年间任维亚特卡省长。

③ 指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阿·德·托克维尔(1805—1859)的著作《论美国的民主》，一八三五年，巴黎版。

④ 通古斯人：属于通古斯满洲语系的少数民族，如埃文基人、乌德盖依人等。

了,——现在却是一个空论家,更可以说是一个书呆子,然而毕竟是一个正派人。新省长是一个聪明人,不过他的聪明好像只发光不发热,就像冬季的晴天,它使人感到愉快,却不会产生什么果实。而且他还是一个极端的形式主义者,——并不是那种官气十足的形式主义者——可是我怎么解释呢?……他的形式主义是次一级的,然而它是和其他的形式主义一样地讨厌。

新省长是真正有妻室的,省长公署也就失去了它那种完全独身和多妻的特征。不用说,这使得所有的顾问官都回到他们夫人的身边。秃头的老人们也不再吹嘘他们"在情场上"的胜利了,却反而亲密地讲到他们衰老的、瘦得皮包骨头的或者胖得吓人的太太们。

柯尔尼洛夫在他到维亚特卡的前几年,从谢美诺夫斯基团或者伊兹玛依洛夫斯基团团长的职位直接被派到某地担任文职省长。他上任的时候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起初他像所有的新手那样,埋头阅读一切文件,有一天他读到别省来的一份公文,他读了两遍、三遍,仍然不懂。

他把秘书叫来,让秘书读。秘书也不能把内容解释明白。

"倘使我把这份公文发给办公室,"柯尔尼洛夫问他道,"您拿它怎么处理?"

"我就交给第三科,这是第三科管的。"

"那么第三科的科长知道怎么处理吗?"

"阁下,他怎么会不知道呢?他在这一科负责已经七年了。"

"叫他到我这里来。"

科长来了。柯尔尼洛夫把公文交给他,问他应当怎么处理。科长匆匆看了一遍,就向省长报告应当函询省税务局并通令县警局局长。

"通令什么呢?"

科长答不上来,最后只好承认事情很难讲得清楚,不过写出来倒容易。

"这里有椅子,我请您把答复写出来。"

科长拿起笔,毫不迟疑敏捷地写好了两份公文。

省长拿起公文,读了一遍又一遍,——完全不懂。

"我看,"他后来带笑对我说,"这的确是对那份公文的答复,于是我同意了,在上面签了字。以后再也没有听见提到这件事情——可见答复是完全叫人满意的。"

把我调到弗拉基米尔的通知是在圣诞节以前下达的;我很快就收拾好行李,动身了。

我热诚地同维亚特卡的朋友们告别。在这个僻远的城市里我在年轻的商人中间结交了两三个真诚的朋友。

他们每个人都抢先对流放人表示同情和友好。几部雪橇把我一直送到头一个驿站,不管我怎样推辞,我的车上还是装满了各种各样吃的东西和酒。——第二天我到了亚兰斯克。

从亚兰斯克起公路一直穿过无穷无尽的松树林。夜里有月亮,又很冷,不大的宽雪橇在狭窄的路上飞奔。这样的树林我以后没有再看见过,它们就这样接连不断地一直延伸到阿

尔汉格尔斯克，有时候小鹿穿过它们跑到维亚特卡省里来。树林中大部分都是成材的大树。笔直的松树像士兵一样经过雪橇跟前，它们都是高高的，枝上盖着雪，黑色的松针硬毛似地从雪下面竖了起来，——你睡着了，然后又醒过来，松树的兵团仍然在急行军，有时候把雪抖掉了。在林子里开辟出来的小块空地上换马：有一所修建在树丛中的小屋，马拴在树上，响起了小铃铛，两三个穿着绣花衬衫的车累米西男孩带着睡容跑了出来。沃恰克族马车夫用一种嘶哑的女中音骂他的伙伴，叫嚷着"走吧"，唱起一首二音符的歌来……又是松树，又是雪——又是雪，又是松树……

就在我走出维亚特卡省境的时候，我还得向官僚社会告别，而且它（官僚社会）pour la clôture〔法语：临别〕表现得十分出色。

我们在驿站上停下来，马车夫正在卸马，一个高身材的男人在门口问道：

"什么人路过？"

"这跟你什么相干？"

"当然相干，是县警局局长叫我来问的，我是县法院的信差。"

"好吧，那么你到站房里去，我的驿马使用证在那里。"

这个人走了，过了一会他又回来，对马车夫说：

"不要给他套马。"

这太过份了。我跳下了雪橇，走进站房去。喝得半醉的县警局局长坐在长凳上向一个也是半醉的抄写员口授什么。

角落里另一条长凳上坐着或者不如说是躺着一个戴上脚镣手铐的人。几个酒瓶、几个杯子、烟灰,还有几叠文件胡乱扔在那里。

"县警局局长在哪里?"我进去的时候大声问道。

"县警局局长在这儿。"那个半醉的县警局局长答道,我认出来他是我在维亚特卡见过的拉扎列夫。他一边说,一边粗鲁地拿眼睛瞪着我——忽然张开两只胳膊向我扑过来。

我在这里应当提一下,在丘菲亚耶夫下台以后,官吏们看见我同新省长的关系相当好,有点害怕我。

我伸出手拦住他,很严肃地问道:

"您怎么可以吩咐不给我套马?在公路上不让旅客通行,——您说是不是瞎扯?"

"我这是在开玩笑,得啦吧,您生气难道不害臊吗!"他转身对信差嚷道:"马,去叫人套马!你怎么还站在这儿,你这个流氓?"又对我说:"可以请您喝一杯搀罗木酒的茶吗?"

"那太感谢了。"

"我们是不是还有点香槟酒?……"他连忙跑去拿酒瓶,全是空的。

"您在这里干什么呢?"

"办案,先生——这个小伙子因为吃醋,同他父亲和亲姐姐吵起来,用斧头砍死了他们。"

"因此你们就在一起喝酒吗?"

县警局局长回答不出来了。我看那个车累米西人,他大

约二十岁光景，脸上没有一点凶相，完全是东方人的脸型，一对闪闪发亮的小眼睛，一头黑发。

这一切叫人看着非常不舒服，我又到院子里去了。县警局局长跑出来追我，他一只手拿着杯子，另一只手里拿着一瓶罗木酒，缠住我，一定要我喝一杯。

我为了摆脱他，就喝了酒。他捉住我的一只手，说：

“对不起，是的，真对不起，有什么办法呢！不过我希望您不要对大人说，不要毁掉一个规规矩矩的人的前程！”

县警局局长这个时候就拿起我的手亲起它来，反复地说了十多次：

“看在上帝面上，不要毁掉一个规规矩矩的人的前程。”

我厌恶地缩回手，对他说：

“您回去吧，我没有闲工夫说这种事。”

“那么我怎么替您效劳呢？”

“请您去看看，要他们快给我套好马。”

“快一点，”他嚷道，“快，快！”他亲自动手拉套绳、拴皮带。

这件事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里。一八四六年我最后一次到彼得堡，我应当到内务部办公厅去，声请护照。我正在同科长谈话的时候，一位先生在旁边走过，……他同办公厅的高级官员们亲切地握手，向科长们屈尊似地点头致意。“呸，见鬼，”我想道，“难道就是他？”

“这是谁？”

“拉扎列夫，部长的专员，很有势力。”

“他当过维亚特卡省的县警局局长吗？”

"当过。"

"先生们,给你们道喜,九年前他亲过我的手。"

彼罗夫斯基[①] 是一位选拔人材的能手。

① 列·阿·彼罗夫斯基(1792—1856):俄国国务活动家,一八四一至一八五二年间任内务大臣。

第十八章

弗拉基米尔生活的开始

……我在柯齐莫杰米扬斯克坐上雪橇的时候，雪橇是照俄罗斯方式套马的：三匹马并排，一匹驾辕，两匹拉边套，带轭的辕马愉快地摇着铃铛。

在彼尔姆和维亚特卡，套马的方式是一匹接一匹，一前一后，或者两匹马并排，第三匹马套在前头。

我看到我们的套马方式的时候，我的心高兴得跳得厉害了。

“喂，喂，把你的劲都使出来。”我对那个雄赳赳地坐在赶车位子上的小伙子说，他穿一件没有挂面子的皮袄，戴了一双手指不好弯曲的手套，他的手指头只能勉强靠拢来拿我给他的十五戈比的辅币。

“老爷，我们照办，老爷，我们照办，”他说，又叫起来：“嗨，你们，宝贝儿！”他突然转身对我说：“啊，老爷，你可要坐稳，那儿有座山，我要让马飞跑起来。”

这是一个通到伏尔加河去的陡峭的下坡，在冬天它就作为驿路使用。

他的确让马飞跑起来。雪橇不是在向前滑行，却是从右向左、从左向右地跳来跳去，马飞奔下山，马车夫非常满意，很

惭愧，我自己也很满意，——这是俄国人的脾气。

我就这样让驿马载着我跑进一八三八年——跑进我一生最美好、最快乐的一年。让我向你们讲我们是怎样迎接新年的。

离尼日尼八十里光景，我们（就是说，我和我的随从马特威依）到驿站长房里取暖。院子里非常冷，而且风大。站长是一个瘦弱、有病、带可怜相的人，他在我的驿马使用证上面批注，他写下每一个字母都要念给自己听，然而还是要写错。我脱下我的皮大衣，仍然穿着那双毛皮大靴子在屋子里踱来踱去，马特威依在烧红的炉子跟前烤火，站长还在那里嘟哝，一只木壳的钟不慌不忙地发出有气无力的滴嗒声……

"您瞧，"马特威依对我说，"很快就是十二点钟了，是啊，老爷，新年到了，"他用半询问的眼光看看我，又说："我把在维亚特卡他们送给我们的吃的东西给您拿一点来。"他不等我回答，就跑去取了几瓶酒和一小包吃的东西来。

关于马特威依我以后还要谈到他，他不仅是我的仆人，他是我的朋友，我的兄弟。他是莫斯科的小手艺人，是我也认识的那个仲伦倍格的徒弟，向仲伦倍格学习图书装订术，在这方面仲伦倍格也并不很内行，因此他就投到我这里来了。

我知道我要是拒绝就会使马特威依难过，而且说实在话，我自己也不反对在驿站里庆祝元旦。……新年也是一种驿站。

马特威依拿来了火腿和香槟酒。

香槟酒冻得很稠；火腿可以用斧头来砍，整块火腿上都有冰在发亮；然而 à la guerre comme à la guerre〔法语：随遇而安〕。

"祝新年愉快！祝新的幸福！……"的确，祝新的幸福。

我不是向回家的路上走吗？我一小时比一小时地接近莫斯科了，——我心里充满了希望。

冻了的香槟酒站长并不太喜欢——我在他的酒里加了半杯罗木酒。这种新的 half-and-half〔英语，一半对一半〕① 却十分成功。

我还邀请了马车夫，他更走极端：他在一杯起泡沫的酒里洒上胡椒，用调羹搅了一下，一口就喝下去了，他痛苦地叹了一口气，差不多呻吟似地说了一句："难过得痛快！"

站长亲自送我坐上雪橇，他非常殷勤地张罗，竟然把燃着的蜡烛落到干草里面找不着了。他很兴奋，接连地说：

"您使我过了个愉快的新年……过了个愉快的新年！"

难过的马车夫赶马出发……

第二天晚上八点钟光景我到了弗拉基米尔，住在旅馆里，这个旅馆同它那"酿米"鸡、奶油糕点和代替波尔多酒的醋在《旅行马车》中描写得非常真实。②

---

① 两种成份各半的东西，这里指两种酒搀在一起的酒。

② 《旅行马车》：这是俄国作家符·亚·索洛古勃(1814—1882)的中篇小说，开头几章在一八四〇年发表。两个地主在俄国旅行，他们曾在弗拉基米尔停留，对他们在那里吃的饮食，小说中描写得很详细。根据索洛古勃的描写，弗拉基米尔的这家旅馆非常脏，而且连被褥都没有，旅客睡觉，只能用自备的卧具，或者铺点干草将就睡一夜。至于吃，这家旅馆号称应有尽有，甚至还准备了一张菜单，上面别字连篇，不知所云。所谓"酿米"鸡(原文是 курица《с рысью》)云云，就是那菜单上写的，乍一看还以为是"山猫肉烧鸡"。问茶房有没有酒，他说什么酒都有，而且是上等好酒。旅客要一瓶拉斐特酒，茶房得意扬扬地拿上来，却是一瓶醋。至于菜汤，更是不堪下咽，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有：头发，刨花……就是没有白菜和肉。他们的什么"酿米"鸡等等，更是叫人受不了。

"今天早晨有个人来问过您,他好像在啤酒店等候。"茶房在驿马使用证上看到我的名字,就对我说,他留着从前只有俄国茶房留的那种神气十足的分头和很难看的鬓角——现在茶房和路易·拿破仑[①] 都留这样的头了。

我想不出这是谁。

"老爷,他来了。"茶房又说,便让开了。然而我第一眼看到的不是人,却是一个大得可怕的托盘,托盘上放着一大堆各种各样的好东西:甜面包和小面包圈、橙子和苹果、鸡蛋、杏仁、葡萄干……托盘后面露出我父亲在弗拉基米尔的村子的村长的白胡子和蓝眼睛。

"加甫利洛·谢苗雷奇!"我叫了一声,就跑过去拥抱他。这是我在监狱和流放之后重见到的我们自己人中间的第一个人,过去生活中的第一个人。我对这个聪明的老人看多久也看不够,同他谈多久的话也谈不完。他是我靠近莫斯科、靠近家、靠近朋友们的一个见证;我家里的人他仅仅在三天之前都见到了,他给我带来他们大家的问好。……那么,并不怎么远了!

省长库鲁塔是一个聪明的希腊人,很了解人,早已不怎么关心善恶了。他立刻了解我的情况,一点也不来麻烦我。办公室的工作他连提也没有提到,他派我同一个中学教师一起

---

① 路易·拿破仑(1808—1873):一八五二至一八七〇年间法兰西第二帝国的皇帝,称拿破仑三世。即路易·波拿巴。

去编辑《省新闻》[1] ——这是我的全部工作。

这个工作是我所熟习的：我已经在维亚特卡帮忙编过《省新闻》的非官方的副刊，我还在那上面发表过一篇文章，它几乎给我的后任带来麻烦。[2] 我描述"大河"上的节日，说供奉尼可拉·赫雷诺夫斯基的羊肉从前是分送给穷人的，现在却拿来卖钱。主教看了很生气，省长好不容易劝说他息了怒。

《省新闻》是在一八三七年创办的。[3] 原来内务大臣布卢多夫忽然有一种新奇的想法，要教会这个沉默寡言的国家里的居民公开发表意见。布卢多夫之所以出名，一是由于他担任继续编写卡拉姆辛的《历史》的工作，虽然他连一行也没有添写过，二是由于他是十二月十四日事件"审讯委员会的报告"的撰写人，这个报告还是干脆不写的好。[4] 布卢多夫是属于在亚历山大〔一世〕在位末期中出现的国务空论家集团的。这些人聪明、有教养、正直，是一些上了年纪、升了大官的"阿尔扎玛斯鹅"[5]；他们能写俄文，是爱国者，热心研究祖国历

---

① 《省新闻》：指《弗拉基米尔省新闻》；教师：即德·瓦·涅巴巴（约1806—1839），弗拉基米尔中学数学教师。

② 《维亚特卡省新闻》在一八三八年一月创刊，当时作者已调往弗拉基米尔。但作者在该报的副刊上发表过几篇短评，包括作者在这里讲的那一篇。

③ 一八三八年在俄国四十二个省内创办《省新闻》。

④ 布卢多夫：卡拉姆辛著《俄国史》的最后一卷是由布卢多夫编辑出版的。一八二六年尼古拉一世任命布卢多夫担任十二月党人案件最高审讯委员会的秘书长。

⑤ 布卢多夫是文学团体"阿尔扎玛斯"（1815—1818）的成员。阿尔扎玛斯城以产鹅出名，所以作者称布卢多夫为"阿尔扎玛斯鹅"。

史,因此就没有工夫认真注意现状了。他们全都尊重对尼·米·卡拉姆辛的永志不忘的纪念,喜欢茹柯夫斯基,背诵克雷洛夫的作品,经常到莫斯科去,在伊·伊·德米特利叶夫的花园街住宅里同他谈话(我在大学念书的时候,怀着浪漫主义的成见,并由于同尼·波列沃依有私交,我也到过那里去拜访德米特利叶夫,我当时暗中不满意他做了诗人又作司法大臣)。人们对他们本来有很大的期望,而他们同世界各国一般的空论家一样,什么事也做不出来。也许他们可以在亚历山大〔一世〕在位期间留下比较经久的遗迹,然而亚历山大〔一世〕死了,让他们空怀着原来那个做点好事的愿望。

在摩纳哥[1] 一位执政公爵的墓碑上写着这样的碑文:"在这里安息着弗洛列斯当某某世[2],他本来想对他的臣民做好事。"[3]我们的空论家也想做好事,倘使不是对他们的臣民,也是对尼古拉·巴甫洛维奇的臣民,可是他们不问店主人就自己结帐。我不知道谁妨碍了弗洛列斯当做好事,然而我们的弗洛列斯当[4] 却妨碍了他们做好事。他们给拖着参加了一切对俄国有害的事情,而他们自己只好做一些毫无用处的改革——仅仅在形式和名称上的改变。我们各个部门的长官都认为他的最高职责是过一个时期就提出一个什么方案、什么改革,通常都是朝坏的方面的改革,但有时就干脆是不好不

① 摩纳哥:地中海边法国东南的一个小公国。
② 指弗洛列斯当一世(1785—1856),是摩纳哥的公爵。
③ 原文是法文:Il a voulu le bien de ses sujets.——作者原注
④ 弗洛列斯当:指尼古拉一世。

坏、无关痛痒。例如省长办公室的秘书应当称为主任，而省长公署的秘书的名称仍然没有译成俄文。[①] 我记得司法大臣提出过一个改变文官制服的方案。这个方案的开头就是这一类冠冕堂皇的句子："特别考虑到某些文职机关制服的剪裁和缝制上缺乏统一标准，有鉴于此，"等等。

内务大臣也患了这种方案病，他用区警察所所长来代替地方陪审官。[②] 陪审官住在城里，经常到乡村去视察。区警察所所长有时也到城里去，不过他们长期住在乡下。这样一来全体农民都在警察的监视之下了，而且他采取这个措施的时候，完全知道我们的警察官员是怎样凶暴、贪婪和无恶不作的家伙。布卢多夫把警察引进农民的副业和财产的秘密，引进他们的家庭生活，引进米尔(公社)的事务，通过这个就接触到老百姓生活的最后的掩蔽部了。幸而我们的村子很多，而每个县里却只有两个警察所所长。

差不多就在同一个时候，这同一个布卢多夫有了创办《省新闻》的想法。在我国，政府虽然轻视普及教育，却以爱好文学自负；譬如，当时在英国完全没有官方的期刊，可是我国内阁的每一个部都有自己的刊物，科学院和大学也出版自己的杂志。我们有矿业刊物和制盐刊物、法文刊物和德文刊物、航海刊物和陆路交通刊物。这一切刊物的经费都是由国库开支

---

① 秘书：这个词在俄语中是外来语。

② 根据一八三七年制订的地方警察条例，取消选举出来的陪审官，他们的职务由区警察所所长代理。区警察所所长由省长任命，管理全区警务。

的,部里签订约稿合同和签订承办燃料、蜡烛的合同完全一样,只是没有竞争罢了;总决算、编造的数字和由这些数字推论出来的离奇结论都是不会少的。政府垄断了一切之后,现在又垄断讲话了,它叫所有其他的人全都沉默,它却喋喋不休地讲起来了。布卢多夫按照这个方式做下去,就命令各个省公署创办自己的《新闻》,每一份《新闻》上面都要有一个非官方的副刊,发表历史、文学以及其他方面的文章。

说了就得做,五十个省公署都为了这个非官方的副刊急得抓头发。在神学院念过书的教士、医生、中学教师凡是可以被认为受过教育不会写别字[①] 的人都给征用了。他们考虑了很久,反复阅读了《读者文库》和《祖国纪事》,又害怕又想试一下,终于拿起笔来写文章了。

看见自己的名字印出来——这是我们这个书本的时代一种最强烈的不自然的欲望。然而要决定把自己的著作公开发表,就需要有特殊的机会。这些人想都不敢想把自己的文章送到《莫斯科新闻》,送到彼得堡的杂志发表,却愿意在本地报刊上刊登它们。这样一来,那个很不好的办报宣传的习惯、想出名的习惯就扎下了根。拿到一个完全现成的宣传工具倒是不坏的事。反正印刷机是没有骨头的。

我在编辑部的那位同事是我们大学毕业的学士,和我同一个系。他死得那样惨,我讲起他来并没有心肠笑他,然而他

---

① 按照原文直译,是:"能正确使用字母 ъ(已废)",意思就是:写字不会拼错字母。

一直到最后都是一个非常可笑的人物。他绝不傻，可是他极其笨拙，极不灵敏。很难遇到一个像他这样难看的人，不仅是因为他太丑，而且还因为他的丑是大的，就是说是大型的。他的脸有一般人的一个半大，而且有些粗糙，一张鱼那样的大嘴一直伸到耳朵边，浅灰色的眼睛并不曾让淡黄色睫毛遮盖，却反而因此更加显著，他的头颅骨上盖着稀疏的几根硬头发，此外他比我高一个头，背有点驼，而且很不爱干净。

连他的姓也是很古怪的，[①] 弗拉基米尔的一个守卫就因为这个姓把他关进了警卫室。一天深夜他裹着一件大衣走过省长公署；他手里拿着一副轻便的望远镜，站在那里眺望某一颗行星；守卫因此惊慌起来，他大概认为星星是国家财产吧。

"什么人?"他向这个站着不动的观测者嚷道。

"涅巴巴。"我的朋友用沉厚的声音答道，动也不动一下。

"不要开玩笑，"守卫生了气回答说，"我在执行任务。"

"我说我是涅巴巴。"

守卫再也忍受不下去，就猛然拉起铃来。来了一个军士，守卫就把这个天文学者交给他带到警卫室去，还说：在那儿会弄清楚你是不是女人。要不是值班的军官认识他，他一定会在那里待到第二天早晨。

有一天清早涅巴巴到我家里来，告诉我，他要到莫斯科去几天，他说话的时候，露出一种不好意思的、又有点调皮的笑容。

---

① 这个人姓涅巴巴，在俄国话里面"涅巴巴"的意思是："不是女人"。

“我，”他吞吞吐吐地说，“我回来的时候就不是一个人了！”

“什么，您是说……?”

“是的，朋友，我要正式结婚了。”他害臊地说。

那个女人能够下定决心同这个心肠很好、相貌却极丑的男人结婚，她这种英雄的勇气使我感到惊奇。可是两三个星期以后我在他家里看见了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她不能说好看，却生得讨人喜欢，还有一对灵活的眼睛，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把她当作一个英雄看待了。

又过了大约一个半月，我开始注意到我那个夸西莫多①有什么不如意的事情，他垂头丧气，改校样也很马虎，他那篇《关于候鸟》的文章也没有写完，总是闷闷不乐；有时候我觉得他的眼睛好像哭过似的。这种情况并没有继续多久。有一天我走过金门② 回家，看见男孩和小店老板朝教堂的公墓跑去，警察们慌张地跑来跑去。我也到那里去了。

涅巴巴的尸首躺在教堂的围墙边上，他的身旁有一杆枪。他正对着他家的窗口开枪自杀，他用来勾扳机的绳子还在他的足上。卫生局的督办从容不迫地向四周的人说明死者没有丝毫的痛苦；警察准备把尸首抬到警察分局去。

……大自然对某些人多么凶残无情！这个受害人在他决

① 夸西莫多：雨果的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中一个主要人物，一个心地善良、相貌丑陋的“怪人”。

② 金门：弗拉基米尔的西城门，一一六四年修建。

定用他那一段绳子结束那个只给他带来屈辱和不幸的生命的时候，他心里是怎么想的呢？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父亲害瘰疬病或者他母亲害淋巴腺病吗？也许就只是这样。然而我们有什么权利要求公道、要求答复、要求说明理由呢？向谁要求呢？向生活的旋风吗？……

就在这个时候，我的生活翻开了新的一章……充满清白、明静、青春、严肃的一章，沐浴在爱情里的、隐居生活的一章。

它是属于另一卷的了。

后　　记（一）

《往事与随想》是亚历山大·赫尔岑的回忆录。中译本将分五册陆续出版。现在先出第一册。第一册包含最初两卷，即《育儿室和大学》和《监狱与流放》。第二册尚在译述中，将收三、四两卷(《克利亚兹玛河上的弗拉基米尔》和《莫斯科、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作者的俄罗斯生活的回忆到第四卷为止，一八四七年初他就远离祖国一去不返了。

回忆录的作者亚历山大·伊凡诺维奇·赫尔岑(1812—1870)是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政论家和作家。他的后半生是在国外，在西欧度过的。他在伦敦创办了“自由的俄语刊物”，成立了第一家“自由俄语印刷所”。他编印的《北极星》(丛刊，1855—1869)和《钟声》(报纸，1857—1867)在国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死在巴黎，葬在尼斯。他的著作，除了《往事与随想》外，还有《论自然研究的信》(1846)、《克鲁波夫医生》(中篇小说，1847)、《偷东西的喜鹊》(中篇小说，1848)、《谁之罪?》(长篇小说，1846—1847)、《法意书简》(1850)、《来自彼岸》(1850)、《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1851)和《俄国的人民与社会主义》(1855)等书。《赫尔岑全集》共有三十卷。

关于赫尔岑，列宁在一九一二年赫尔岑诞生一百周年纪

念日，写了《纪念赫尔岑》这篇光辉的著作，对他作了全面的评价。列宁写道：

> 我们纪念赫尔岑时，清楚地看到先后在俄国革命中活动的三代人物、三个阶级。起初是贵族和地主，十二月党人和赫尔岑。这些革命者的圈子是狭小的。他们同人民的距离非常远。但是，他们的事业没有落空。十二月党人唤醒了赫尔岑。赫尔岑展开了革命鼓动。
>
> 响应、扩大、巩固和加强了这种革命鼓动的，是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从车尔尼雪夫斯基到“民意党”的英雄。战士的圈子扩大了，他们同人民的联系密切起来了。赫尔岑称他们是“未来风暴中的年轻舵手”。但是，这还不是风暴本身。
>
> 风暴是群众自身的运动。无产阶级这个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起来领导群众了……无产阶级，一定会给自己开拓一条与全世界社会主义工人自由联合的道路，打死沙皇君主制度这个蟊贼，而赫尔岑就是通过向群众发表自由的俄罗斯言论，举起伟大的斗争旗帜来反对这个蟊贼的第一人。①

列宁称赫尔岑为“在俄国革命的准备上起了伟大作用的作家”。

《往事与随想》是赫尔岑花了十五年以上的辛勤劳动写成

① 《列宁选集》，第二卷第四二二页，一九七二年，人民出版社。

的极其重要的文艺作品。它是一部包含着日记、书信、散文、随笔、政论和杂感的长篇回忆录。它也是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一直到巴黎公社前夕俄罗斯和西欧社会生活和革命斗争的艺术记录。还有人说,它"是时代的艺术性概括"。作者自己说这是"历史在偶然出现在它道路上的一个人身上的反映"。在本书中作者把他个人的生活事项和具有社会历史意义的一些现象有机地结合起来了。

《往事与随想》的内容非常丰富。在它的前四卷中展开了十九世纪上半叶俄罗斯政治、社会、文化生活的景象。在这样一幅宽广的历史画面上活动着各式各样的人,从高官显贵、各级官员、大小知识分子、各种艺术家到仆婢、农奴。作者善于用寥寥几笔勾出一个人物,更擅长用尖锐的讽刺揭露现实生活中的怪人怪事,从各方面来反映以镇压十二月党人起家的尼古拉一世统治的黑暗、恐怖的时代。他以坚定的信心和革命的热情说明沙皇君主制度和农奴制度是俄国人民的死敌,它们必然走向死亡。

作者在后面四卷(即《巴黎—意大利—巴黎。革命前后》、《英国》、《自由俄语印刷所与〈钟声〉》和《断片》)中描写了西欧资产阶级社会各种生活景象和各个阶层的人物。家庭日常生活、大规模的历史事件和鲜血淋淋的革命斗争……十分鲜明地出现在这样一幅巨大的历史画卷上。把一八四七年后的二十多年间的人物和事件连在一起的仍然是作者这一根线。每一行文字都流露出作者的爱憎。书中散发着淡淡的哀愁,有时也发出怀疑的嘲笑和悲观的叹息,但横贯全书的始终是作

者对未来的坚强信心。

赫尔岑是出色的文体家。他善于表达他那极其鲜明的爱与憎的感情。他的语言是生动活泼、富于感情、有声有色的。他的文章能够打动人心。和他同时代的俄国诗人涅克拉索夫说:“它紧紧地抓住了人的灵魂。”

有一次俄国小说家屠格涅夫读完了《往事与随想》第五卷中叙述作者的家庭悲剧的那一部分手稿,他感动地说:“这一切全是用血和泪写成的:它像一团火似地燃烧着,也使别人燃烧……俄罗斯人中间只有他能够这样写作……”

《往事与随想》可以说是我的老师。我第一次读它是在一九二八年二月五日,那天我刚刚买到英国康·加尔纳特夫人(Mrs. C. Garnett)翻译的英文本。当时我的第一本小说《灭亡》还没有写成。我的经历虽然简单,但是我心里也有一团火,它也在燃烧。我有感情需要发泄,有爱憎需要倾吐。我也有血有泪,它们要通过纸笔化成一行、一段的文字。我不知不觉间受到了赫尔岑的影响。以后我几次翻译《往事与随想》的一些章节,都有这样一个意图:学习,学习作者怎样把感情化成文字。现在我翻译《往事与随想》全书,也不能说就没有这样的意图,我要学习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当然学习是多方面的,不过我至今还在学习作者如何遣词造句,用自己的感情打动别人的心,用自己对未来的坚定信心鼓舞读者。

我最初把书名译作《往事与深思》,曾经用这译名发表过三、四万字的“选译”。现在我根据一位朋友的建议将“深思”改译为“随想”,这样可能更恰当些。我们翻看全书,作者在叙

述往事的时候常常夹杂了一些感想，这些感想与其说是“深思”或者“沉思”，倒不如说是“杂感”。作者随时随处发表的这一类议论，就在当时看，也不见得都正确。作者学识渊博，但他的思想是有局限性、甚至也有错误的。赫尔岑是和马克思、恩格斯同时代的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著作中几次直接或者间接地提到赫尔岑，指出他的一些错误观点。①列宁也批判过赫尔岑“在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动摇不定”的立场。②我并不向读者推荐这些“随想”，我颇想删去它们，但为了保持全书的完整，我还是把它们译出来了。我曾经对一位朋友讲过我想作一些删节，朋友不赞成，他说：“应当相信读者，读者不是小学生，他们是知道怎样取舍的。”

一九七四年九月我抄完《处女地》重译稿以后，便开始翻译《往事与随想》。到一九七七年四月第一、第二两卷的译稿就完成了。我翻译这部被称为“史诗”的巨著的时候，并没有想到出版的事，我只是把它当作我这一生最后的一件工作，而这工作又只能偷偷地完成，因为“四人帮”要使我“自行消亡”，他们放在上海的那条无恶不作的看家狗一直瞪着两眼向我狂吠。“四人帮”给粉碎以后，我在一九七七年五月发表的《一封

① 例如，恩格斯说：“身为俄国地主的赫尔岑……把俄国农民描绘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体现者、天生的共产主义者，把他们同衰老腐朽的西欧的那些只得绞尽脑汁想出社会主义的工人对立起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六二三页，一九七二年，人民出版社。）

② 列宁还说：“赫尔岑已经走到辩证唯物主义跟前，可是在历史唯物主义前面停住了。”（《列宁选集》，第二卷第四一七页，一九七二年，人民出版社。）

信》里说:“我每天翻译几百字,我仿佛同赫尔岑一起在十九世纪俄罗斯的暗夜里行路,我像赫尔岑诅咒尼古拉一世的统治那样咒骂‘四人帮’的法西斯专政,我相信他们横行霸道的日子不会太久……”有人认为拿尼古拉一世的统治来比“四害”横行的日子并不妥当,因为封建已在我国绝迹。我不想替自己辩解。反正书在这里,请某些人自己看看书中有没有他们的画像。我特别请读者注意皇位继承人扔在窗台上的一颗桃核,这难道只是一百四十年前的笑话吗?

我的译文是根据苏联科学院出版的三十卷本《赫尔岑全集》第八卷(1956)和康·加尔纳特夫人的英译本第一册(1924)翻译的,主要是依靠英译本。书中的注释除了注明“作者原注”或者“英译者注”的以外,都是译者增加的。

我以前做翻译工作,都是一个人单干。去年五月《文汇报》发表了我的《一封信》以后,特别是在新华社发了我翻译赫尔岑回忆录的消息以后,不少的读者来信表示愿意给我帮助。福建师范大学的项星耀同志把他译好的四卷译稿全部寄来供我参考。[①] 我曾经请外国文学研究所的高莽同志根据原书替我校阅了第一册中的序文和第三、第六两章的大部分。今年北京大学的臧仲伦同志主动地替我校阅了第一册的全稿并且提出不少好的意见。最后,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周朴之同志不仅校阅了我的全部译文,而且还做了技术性的工作。靠了这几位新、老朋友无私心的帮助,我才可以把这部十九世纪的名

① 辽宁新民县的刘文孝同志也寄给我他翻译的第二卷的译文。

著照目前这个样子献给读者。我的译本还不能算是定稿，但是我相信，靠着大家的努力，这个译本一定可以修改得比较完善。这样的事只能发生在新中国，在今天的新社会！这是值得我们自豪的事情。我真诚地感谢给了我帮助的和来信给我以鼓励的一切见过面和未见面的朋友。

巴　金 一九七八年九月十七日

后　　记（二）

今年四月出版社把《往事与随想》中译本第一册的校样送到我这里，过两天我就动身去北京，作赴法访问的准备。五月我在巴黎旅馆里两次会见赫尔岑的外曾孙，在巴斯德学院工作的诺艾尔·利斯特博士和他的夫人（五月二日和九日），第二次他还介绍我认识他的兄弟莱翁纳尔。

我重访巴黎的时候，脑子里并没有诺·利斯特这个人。可是他在报上看见我到达巴黎的消息，就主动地跟我联系，到旅馆来看我。他第一次看见我仿佛看见亲人一样。我也有一见如故的感觉。我们谈得很融洽，主要谈赫尔岑的事情。他送了我一些有关的资料和书籍，还送给我一九六八年在伦敦重印的《往事与随想》英译本新版改订本四大册。他又介绍《往事与随想》的法译者达利雅·奥立维叶同我会见，并让她带来她的法译本前两册（一九七四——一九七六年在瑞士出版）。他知道我去尼斯扫赫尔岑墓，便打电话通知他的亲戚安·昂孚大夫在公墓等候我，要他向我说明赫尔岑夫妇葬在尼斯的一些情况。

在我返国的前一天中午，我有别的活动，刚刚走出旅馆，诺·利斯特先生在后面追了上来，交给我一封信和赫尔岑的彩

色画像的照片。像是赫尔岑的大女儿娜达丽绘的，现在在他的家里。他特地为我把画像拍摄下来。信上还说，画像的黑白照片取到后就直接寄往上海，我可以在我的译本中采用。……

我和这位和善的老人分别不过三个星期，他的亲切的笑容还在我的眼前，我刚刚根据他给我的资料校改了《往事与随想》中译本第一册的校样，我每看完一章抬起头来，好像这位老人就在旁边偏着头对我微笑，甚至在凉风吹进窗来的深夜，我也感觉到他的微笑带给我的暖意。我感谢他的深情厚谊。我和他同样热爱的赫尔岑的著作、同样珍贵的赫尔岑的纪念把我们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中法两国人民的友谊把我们紧密地联结在一起。

《往事与随想》中译本第一册出版了。这只是一件巨大工作的五分之一，要做完全部工作，还需要付出更辛勤的劳动。我有困难，但是我有决心，也有信心。敬爱的远方的朋友，您的微笑永远是对我的工作的鼓励。我常常想起您的帮助，我绝不放下我的笔。让我再一次紧紧地握着您的手。

巴　金　一九七九年五月三十日

第　三　卷

克利亚兹玛河上的弗拉基米尔(1838—1839)

第 十 九 章*

公爵夫人和公爵小姐

> 不要期待我写出关于那个时期我内心生活的长篇叙述。……可怕的事故，各种各样的痛苦比极其明快、宁静的回忆更容易写下来。……难道幸福是可以描绘的吗？
>
> 不足的地方请你们自己填补，用心领悟——我在这里要讲的是外部的一面，是环境，只是偶尔、偶尔用暗示或者用一句话接触到自己最珍贵的秘密。
>
> （《往事与随想》）①

我五、六岁的时候非常顽皮，韦拉·阿尔塔莫诺夫娜② 常常说："好吧，好吧，您等着吧，只等公爵夫人一来，我全讲给她听。"我听见这个恐吓，马上驯服了，央求她不要讲我的坏话。

---

* 第十九、二十两章，曾发表于一九八〇年第一期《苏联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① 题词是作者从一八五四年版《监狱与流放》的结尾引用来的，文字上略有改动。

② 韦拉·阿尔塔莫诺夫娜：作者的保姆。

玛利雅·阿列克谢叶夫娜·霍万斯卡雅公爵夫人[①]，我父亲的姐姐，是一个严厉而阴沉的老妇人，肥胖，威严，脸颊上有一颗痣，便帽下面露出假鬈发；她说话的时候，稍微眯起眼睛，一直到她的晚年，就是说到八十岁，她仍然略略涂脂抹粉。任何时候只要我让她看到了，她就折磨我；她没完没了地教训我，她责备我什么事都不对：不是领子皱了，就是短上衣上面有污迹，不然她就说我到她跟前吻手的姿势不好，要我重新做过。她把我教训够了，有时还要对我父亲说，她一边用她的手指尖从小小的金鼻烟壶里抓起一小撮鼻烟来："亲爱的，你应当把你这个娇生惯养的孩子交给我管教，他只要在我手里过上个把月，就会非常听话。"我知道不会把我交给她，然而她这句话仍然使我吓得发抖。

我的年岁大起来，这种恐惧也就逐渐消失了，可是我从来没有喜欢过公爵夫人的家——在她的宅子里我觉得呼吸不自由，感到不适意，就像一只落在陷阱里的兔子，惊慌地东张西望，盘算怎样逃出去。

公爵夫人的住宅和我父亲的或者枢密官的宅子完全不同。这是老式的、东正教的俄国家庭。在这个家里人们遵守斋期，出去做早礼拜，主显节[②] 前夕在门上挂十字架，在谢肉祭周做很好的油煎饼，吃玉葱烧猪肉，准时在下午两点吃午

---

① 玛利雅·阿列克谢叶夫娜(1755—1847)：作者的姑母，霍万斯基公爵是俄国古老的贵族世家。

② 主显节：旧历一月六日"耶稣显灵"的节日。

饭,九点吃晚饭。公爵夫人的兄弟们沾染到西方的影响,这使他们或多或少地摆脱掉一些祖先的老规矩,可是她的生活丝毫没有受到这种影响;正相反,她倒不高兴看见“瓦纽夏”①和“列沃希卡”② 怎样让那个法国引诱坏了。

公爵夫人住在她的阿姨美谢尔斯卡雅公爵小姐住宅的厢房里,公爵小姐是一个八十岁的老姑娘。

公爵小姐是把一个家族所有七个盛衰不同的分支的一大群亲族连接起来的活的、而且差不多是唯一的链环。在重要的节日,所有的亲戚都聚到她家里来;她使有争执的人们和好,使疏远的人接近,大家全尊敬她,她应当得到这样的尊敬。她一死,家族的联系就断了,中心失掉了,亲戚们也就彼此忘记了。

她使我父亲和他的哥哥们受了教育;在他们的父母死后她照管他们的产业,一直到他们每个人成年为止,她还安排他们到禁卫军服役,又安排他们的姐妹出嫁③。我不知道她对自己的教育成绩有多大的满意,她靠着一个法国工程师、伏尔泰的一个亲戚的帮助,把他们培养成地主、esprits forts〔法语:自由思想者〕,然而她能够获得他们对她的敬爱,她的姨侄们虽然平日不太习惯于对人服从和尊敬,可是他们尊敬这位老

---

① “瓦纽夏”:“伊凡”的爱称,指作者的父亲。

② “列沃希卡:“列夫”的爱称,指作者的伯父,即枢秘官。

③ 他们的姐妹出嫁:指作者父亲的两位姐姐玛利雅·阿列克谢叶夫娜(嫁给霍万斯基公爵)和叶丽莎威塔·阿列克谢叶夫娜(嫁给戈洛赫瓦斯扎夫)出嫁的事。

人，而且经常听从她的话，一直到她死。

安娜·包利索夫娜公爵小姐的住宅在一八一二年大火的时候居然奇迹似地没有受到损害，五十年中间不曾培修过；花缎糊的墙壁褪了色或者变黑了；水晶玻璃的枝形吊灯有些熏黑了，而且由于时间长久，变成了茶晶，屋子里有人走过的时候，它们就会摇摆起来发出叮当声，闪着微黑的光。沉重的红木家具上面精致刻花的镀金已经脱落，它们阴郁他靠墙立着；有中国嵌镶花纹的五斗柜，有铜格子装饰的桌子，洛可可式①的瓷娃娃——这一切使人想到另一个时代，和另一种风尚。

门房里坐着白发的听差，他们庄严地、沉静地做各种琐细的事情，有时候小声地念祈祷书或者赞美诗，那些书页比封面还要黑些。孩子们站在门口，不过他们与其说是像儿童，倒不如说像老矮人，他们从来不笑，也不高声讲话。

里面那些房间内是一片死寂；只是时不时地响起一只白鹦鹉的悲伤的叫声，它发音不清楚地摹仿人们讲话，总是学不像，它的嘴啄着包了白铁的栖木发出难听的声音；还有一只住在大厅里磁砖火炉小小壁台上的又小、又瘦、又老、又有肺病的猴子有时也发出讨厌的哭声。这个猴子给打扮得像一个débardeur〔法语：装卸工人〕，穿着肥大的红色灯笼裤，它使整个屋子都带了一种极其难闻的特别气味。在另一间大厅里挂了许多大大小小、各种式样、各个时期、各种年龄、各样服装的家族肖像。我对这些肖像感到特别的兴趣，尤其是因为本人

① 洛可可式：十八世纪西欧盛行的建筑和装饰的式样。

同肖像的鲜明的对照。那个在画布上彬彬有礼地微笑着、穿浅绿色绣花长袍、头发上扑粉的二十岁的年轻人就是——我的父亲。一个年轻姑娘披着散乱的鬈发，捧着玫瑰花束，脸上贴着假痣，腰身束得紧紧的，就像一只玻璃酒杯，给塞在一个巨大的箍骨裙里面——她就是那位威严可怕的公爵夫人。……

人越是走近公爵夫人的房间，就越感觉到这种肃静和循规蹈矩的顽固气味。戴宽边白色便帽的老女仆端着小茶壶走来走去，她们走得那么轻，脚步声是听不见的；有时一个白发老仆人在门口出现，他穿一件长的蓝色厚呢常礼服，他的脚步声也是听不见的；他向老女仆传达什么命令的时候，他的嘴虽然在动，却也没有发出声音。

身材瘦小、干瘪、满脸皱纹，却一点也不难看的老小姐经常坐在，或者不如说是躺在一张大而笨重的长沙发上，身子底下垫了一些靠垫，几乎看不出她来；一切都是白的：她的长袍、她的便帽、靠垫、沙发套。她那张像蜡一样白、像花边一样细的脸，同她那微弱的声音和白色的衣服，使她身上带着一种已经消逝了的、差不多接近了死亡的东西的气味。

一只英国大台钟发出有节奏的、响亮的扬扬格① ——笛克—塔克——笛克—塔克——笛克—塔克……，它们好像在计算她的生命的最后几刻钟。

在十二点到一点之间，公爵夫人走进房来，尊严地在一把

① 扬扬格：一种诗的韵脚，用在这里指钟摆的有规律的响声。

深的扶手椅上坐下,她在她那空空的厢房里感到寂寞无聊。她是寡妇,我还记得她的丈夫;他是一个身材矮小、头发花白的小老头儿,他瞒着公爵夫人偷偷地喝药酒和果子酒,他在家里是个无关紧要的人物,习惯于绝对顺从他的妻子,——虽然他有时也反对她,特别是在他喝了酒以后,不过他的反对也只是在口头上,从来没有见于行动。公爵夫人看见费多尔·谢尔盖叶维奇公爵午饭前公开喝的一小杯伏特加在他身上起了多大的作用,也很吃惊,就不去理他,让他同他那些彼此抢先大叫的黑鸟、夜莺和金丝雀整整玩一个早晨;他用小风琴训练一些鸟,又亲自吹口哨训练另一些鸟;他自己经常到野味市场去交换鸟雀,或者买卖它们;要是偶然遇到(根据他自己的看法)一个做生意的人上了他的当,他就会感到莫大的快乐。……他这样继续过着他的有利可图的生活,一直到一天早晨,他向他的金丝雀吹过口哨以后,仰面倒在地上,过了两个小时就死了。

剩下公爵夫人一个人了。她有两个女儿①;她把她们都嫁了出去,两个姑娘结婚都不是为了爱情,却只是想逃避母亲的家长专制。两个人都是在头一次分娩时死亡的。公爵夫人真是一个不幸的女人,然而她的不幸并没有使她的心肠变软,反倒使它变硬了。命运的打击并没有使她变得温和些,善良些,反而使她变得更严厉,更阴森。

现在她只有兄弟们,更重要的是她这个老阿姨了。她一生

① 两个女儿:即叶卡捷琳娜·费多罗夫娜(1788年生)和娜塔利雅·费多罗夫娜(1792—1821)。

几乎没有离开过公爵小姐，她的丈夫逝世以后，她同她更接近了。公爵小姐在自己家里什么事都不管。公爵夫人独断地当家作主，借口说照顾老阿姨和伺候老阿姨，其实是在折磨她。

还有各式各样的老太婆靠着墙壁坐在各个角上，她们有的长住在公爵小姐的家中，有的则是暂时待在这里。这些老太婆一半像圣徒，一半像流浪者，有点疯癫，又笃信宗教，有病，又非常不爱干净，她们从一家老式公馆走到另一家；在这一家吃饭，在另一家有人送给她们旧披巾；在这一处得到粗面粉和劈柴，在另一处得到粗麻布和卷心菜——她们就这样地过日子。她们到处让人嫌厌，又到处受到容忍，到处都给安顿在最差的座位上，她们到处都受到接待，由于人们寂寞无聊，尤其是由于人们爱听是非、讲闲话。这些倒楣的人物当着外人的面经常不作声，只是怀着妒忌的仇恨心彼此望着，……她们叹叹气，摇摇头，在胸前划十字，口里叽咕地数着打毛线编针数目，或者念着祷告词甚至讲些骂人的话。然而要是她们同她们的恩人和靠山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她们为了补偿先前的沉默，就大讲所有其他接待过她们、给她们饭吃、送她们礼物的恩人们的最恶毒的闲话。

她们不停地向公爵小姐讨东西，公爵小姐给她们什么，总是瞒着公爵夫人，因为公爵夫人不喜欢厚待她们，她们收到公爵小姐的礼物，作为报答，就给她送来硬得像石头一样的圣饼、自己做的没有多大用处的毛织品和编结的东西，这些东西公爵小姐后来拿去卖掉，得来的钱就花在她们的身上，尽管买的人心里并不愿意。

除了生日、命名日和别的节日以外，近亲们在公爵小姐家中最隆重的聚会是在大除夕。公爵小姐在那一天接待伊威尔圣母①。修道士和教士高举圣像唱着赞美诗走过所有的屋子。公爵小姐头一个吻十字架，她走在圣像下面，她后面跟随着所有的客人、男仆和女仆、老人和小孩。然后大家向她祝贺新年，送给她各种像送给小孩那样的小礼物。她把这些小东西玩了几天，便分送给别的人。

我父亲照例每年带我去参加这种偶像崇拜的仪式；一切都一丝不改地照过去那样，不过每年都少了一两个老年人，大家极力避免提到他们的名字，只有公爵小姐说：

“我们的伊里亚·瓦西里耶维奇不在了，祝愿他早升天国！……不知道新的一年里上帝要叫谁去？”

她疑惑不解地摇摇头。

英国钟的滴嗒声继续在计算她的日子、钟点、分秒……最后到了那致命的一秒钟。老小姐有一天早晨起来，觉得不舒服；她在屋子里踱了一阵，——也不见好；她的鼻孔出血，十分厉害；她没有力气，很疲乏，穿得整整齐齐地躺在她的长沙发上，静静地睡着了，……就不曾再醒过来。她当时已经年过九十了。

这所住宅和财产的大部分她都遗留给公爵夫人，可是她

---

① 伊威尔圣母：旧俄一位最古老最受尊敬的圣像，供奉在克里姆林宫内。赫尔岑在莫斯科的时期中，有名的贵族世家可以用马车把圣像接到自己家中，不过得贡献不少的礼品和财物。

却没有把她生活的深远意义传给她这个姨侄女。公爵夫人不懂得怎样接替公爵小姐那个在某一点上说也是优美出色的把一大家族的许多根线联系在一起的族长的角色。公爵小姐逝世以后，家里的一切一下子都显得很阴郁了，就像太阳下沉时候的山地那样；任何事物都罩上了长长的黑影。她把阿姨的住宅紧紧地关闭起来，自己仍然住在厢房里；院子里长满了草，墙壁和窗框越来越变黑；几只难看的黄狗一直睡在门廊上，门廊也倾斜了。

亲友们少来了，她的宅子冷清了，她因此感到难过，可是她没有办法改善这种情况。

她是全家老辈中唯一的幸存者，她开始为自己无用的生命担心起来，凡是可以在身心两方面扰乱她的平衡、引起她的不安或者痛苦的事物，她都无情地加以排斥，她害怕过去，害怕回忆，就把她两个女儿所有的东西，连她们的肖像在内，全搬开了。公爵小姐死后，她对阿姨也是这样——白鹦鹉和猴子也给流放到下房[1] 去了，以后又被赶出了宅子。猴子就在枢密官的马车夫的住处，让马车夫们开心，在下等烟草气味中度过它的晚年。

自私自利的活命的打算使老太太的心变得十分冷酷。当她最后一个女儿[2] 病危的时候，别人劝她离开病人回自己家

① 下房：男仆的住处。

② 最后一个女儿：指娜塔利雅·费·纳沙金娜（霍万斯卡雅），公爵夫人的第二个女儿。

去,她便走开了。她回到家,马上吩咐给她准备各种烈酒和白菜叶(她要用它们敷头),要做到噩耗传来的时候,这些东西都在手边。她没有向她丈夫的遗体告别,也没有向她女儿的遗体告别,她也不去参加他们的告别仪式①,不参加他们的葬礼。这以后她喜欢的弟弟去世,她从她外甥的几句话里猜到了这回事,便求他不要告诉她不幸的消息,也不要讲死者临终的详情细节。像这样小心提防避免动心、避免感伤,一个人是可以非常健康、消化很好地活到八十、九十!

然而我也得替公爵夫人讲一句公道话,像这种避免接触一切悲惨、不幸事情的怪诞行为在上世纪娇生惯养的贵族中间比在今天流行得多。著名的考尼兹② 在他的晚年严格禁止别人在他面前提起什么人死亡或者提到天花,他最害怕天花。奥国皇帝约瑟二世逝世的时候,考尼兹的秘书不知道怎样通知他才好,就决定说:"现在在位的皇帝是雷阿波德了。"考尼兹明白这个意思,马上变了脸色,跌坐在扶手椅上,一句话也不问。他的园丁讲话的时候,也不敢讲"嫁接",因为在俄文里"嫁接"这个词还有"种痘"的意思,害怕让他想到了天花。最后,他自己儿子去世的消息他还是偶然从西班牙公使那里听到的。鸵鸟遇到危险,就把脑袋藏在翅膀底下,人们常常嘲笑它们!

---

① 按照东正教丧礼仪式,祈祷之后向死者告别,吻死者的前额。

② 温·安·冯·考尼兹-利特堡(1711—1794):奥地利政治家和外交家,活动时间长达四十年。

公爵夫人为了完全不让人妨碍她的宁静，她设置了一种特殊的警察，由老手来负责。

公爵夫人除了从公爵小姐手里上继承来的那些流动寄食的老太婆以外，她还养了一个终身的“陪伴女人”[①]。在这个光荣位置上的是一个身体健康脸颊通红的兹韦尼哥罗德[②]小官吏的寡妇，她以自己“出身高贵”和亡夫的八级文官的身份而自豪；她是个好挑眼、爱吵闹的女人，她那条兹韦尼哥罗德的母牛死在一八一二年的卫国战争里，她因为这条母牛的早死一直不能饶恕拿破仑。我还记得亚历山大一世逝世以后，她多么认真地考虑按照级别她佩戴的丧章[③]应当有多少宽。

公爵小姐在世的时候，这个女人在宅子里毫不起作用，可是她很巧妙地迎合着公爵夫人喜怒无常的脾气和对自己健康过份焦虑的关心，她不久就像公爵夫人从前控制阿姨那样地控制了公爵夫人本人。

这位玛利雅·斯捷潘诺夫娜佩戴着级别相称的丧章，像皮球似地从早到晚满宅子滚来滚去，大声叫嚷，吵吵闹闹，骂这个骂那个，不让仆人安静，挑女仆的毛病，打小孩，拉他们的耳朵，算帐，跑到厨房里去，跑到马房里去，替公爵夫人赶苍蝇，

---

① 陪伴女人：指玛·斯·玛卡希娜，公爵夫人的陪伴女人。陪伴女人是一些穷贵族妇女，寄食在贵族地主家里，靠有钱人的恩惠生活。陪女主人消遣，或者朗读小说给女主人听等等都是她们的工作。

② 兹韦尼哥罗德：离莫斯科不远，那里有十八世纪修建的一些寺院和教堂。

③ 丧章：缀在妇女黑色丧服臂上或者领上的白布。

擦揉公爵夫人的足，照料公爵夫人吃药。家人们再没有机会见到女主人了；这个女人是一位阿拉克切叶夫，是一个位比龙[①]，一句话，是一位首相。公爵夫人是一个讲究礼节的人，虽然古板，却受过很好的教育，这个兹韦尼哥罗德寡妇的尖嗓子和粗鲁举动经常，特别是在最初一些时候，使她感到头痛，可是她后来对这个女人表示越来越大的信任，她看见玛利雅·斯捷潘诺夫娜大大地减少了家里的开支，非常赞赏，其实这笔开支本来就不算高。公爵夫人省下钱来究竟为了什么人，这很难说，她除了兄弟外就再没有亲属，而兄弟们的财产都比她的多一倍。

虽是这样，公爵夫人在丈夫和女儿去世以后确实感到寂寞无聊，有时候那个做过她女儿的家庭教师的法国老太婆[②]来看她住上两个星期，或者她那个柯尔切瓦的外孙女[③]到她家里来作客，她就非常高兴。但这都只是间或的、少有的事，而同这个陪伴女人在一起的乏味生活又不能给她满意地填补这中间的空隙。

可是她终于在公爵小姐逝世前不久，很自然地找到了一个工作，一件玩具，一样消遣。

---

① 阿拉克切叶夫是沙皇保罗一世和亚历山大一世的宠臣；比龙是安娜女皇的宠臣。

② 法国老太婆：指安娜·伊凡诺夫娜·玛泰太太。

③ 柯尔切瓦的外孙女：指当时住在特威尔省的塔季雅娜·库钦娜，作者的外甥女。

第二十章

孤　女

一八二五年中化学家[1] 接管他父亲的产业，发现情况很糟，便把他的弟妹们从彼得堡叫到沙茨科耶田庄上去；他把那里的宅子分给他们，给了他们生活费，还答应以后安排他们上学念书和就业的事情。公爵夫人也到那里去看看他们。一个八岁女孩[2] 的忧郁、沉思的面容引起了她的注意；公爵夫人叫女孩坐在她的马车里带回家去，她收养了她。

母亲[3] 很高兴，带着其余的孩子到坦波夫省去了。

化学家表示同意——这在他是无所谓的。

她们一起到了公爵夫人的家，那个陪伴女人就对小姑娘说："你一辈子要记住，记住公爵夫人是你的恩人，要祷告祝愿

---

① 化学家：指阿列克谢依·亚历山德罗维奇·雅科甫列夫(1795—1868)，作者的堂兄。

② 八岁女孩：即化学家的异母妹妹、他父亲的私生女儿、娜达丽雅·亚历山德罗夫娜·扎哈利娜(1817—1852)，作者后来的妻子。

③ 母亲：关于她的身世现在缺少可靠的材料。娜达丽雅说过她的母亲是"一个普通的农家妇女"，她的姓是阿克希尼雅或者艾克尼雅。作者父亲反对作者同娜达丽雅结婚，可能因为她的母亲"出身微贱"。

她长寿。没有她你怎么得了?"

就这样一个小女孩给带进了这所在两个难对付的老太婆阴森统治下面的死气沉沉的公馆,这两个老太婆中一个是喜怒无常、想法古怪,另一个就是毫不放松地侦察她的密探,而且态度毫不客气,完全没有分寸,这个孩子离开了对她亲近的一切,给带到完全陌生的环境里面,公爵夫人为了解闷收养她,就像人养小狗那样,就像费多尔·谢尔盖叶维奇公爵养金丝雀那样。

过了几天我父亲带着我去看望公爵夫人的时候,这个小姑娘正坐在窗前,脸色十分苍白,甚至带了点青色,她穿了一件长长的毛制品的丧服。她默默地坐在那里,神色惊惶,又害怕,只是望着窗外,仿佛不敢看任何其他东西似的。

公爵夫人叫她到跟前来,把她介绍给我父亲。我父亲对人总是冷淡不关心,他淡漠地拍了拍她的肩头,说他死去的哥哥自己都不知道干了些什么,又责骂化学家,然后谈起别的事情来。

小姑娘满脸泪水;她又坐到窗前去,又望着窗外。

对她来说一种痛苦的生活开始了。没有一句温暖的话,没有一瞥温柔的眼光,没有一点亲热的表示;在她的身边,在她的四周,都是外人,带皱纹的面孔,发黄的脸颊,虚弱无力和死气沉沉的人们。公爵夫人总是很严峻,爱挑剔,不耐烦,跟孤女始终离得远远的,使孤女从来不会想到在她那里去求保护,接近她寻求温暖,求安慰或者向她痛哭。客人们从来不曾注意过孤女。陪伴女人容忍着孤女,拿她看作公爵夫人的一

种怪念头，看作一种对她无害的无用之物；她甚至于装出她爱护小女孩、在公爵夫人面前替小女孩讲话的样子，特别是在有外人的时候。

小女孩对她的新环境始终不习惯，过了一年她还是像头一天那样感到陌生，甚至更加愁闷。连公爵夫人对她那种“严肃”也觉得奇怪，有时候看见她忧郁地在小小的刺绣架前一连坐了几个小时，就对她说：

“你怎么不玩一会儿，不去跑跑？”

小姑娘微微一笑，红了脸，谢谢公爵夫人，可是她仍然待在原处。

公爵夫人就不再理她，而且真的不去管小姑娘的忧愁，也不想办法使她高兴。节日来了，别的小孩都得到了玩具，别的小孩都在谈他们怎样游玩，谈他们的新衣服。可是小孤女什么也没有。公爵夫人以为供给小女孩吃住，她已经做得够多了；小孤女有了鞋子，还要洋娃娃干什么！她的确不需要洋娃娃，——她不懂得怎样玩，而且也没有人同她一起玩。

只有一个人了解小孤女的处境，有一个照料小孤女的老保姆，她一个人真诚地、朴实地爱着小女孩。她夜里给小女孩脱衣服的时候，常常问她：“小姐，您为什么总是这样不快活？”

小姑娘搂住她的颈项伤心地哭起来。老妈妈手里拿着烛台走出去的时候，含着满眼的泪水，不住地摇头。

岁月这样地过去了。她不诉苦，也不抱怨；只是她在十二岁就想死去。“我老是觉得，”她写道，“我是误入这个世界的，我不久就要回家去，——可是我的家在哪儿呢？……我从彼

得堡来的时候,看见我父亲的坟上有一大堆雪;我母亲在莫斯科离开了我,她在宽广的、无穷无尽的大路上消失了……我哭得很伤心,我祷告上帝快接我回家去。"①

"……我的童年是极其可悲的,极其痛苦的;我暗暗地流了多少眼泪,我多少次夜里偷偷地起来祷告,当时我还不懂祷告是怎么一回事,而且我只敢在一定的时间里祷告,我求上帝保佑让什么人爱我,对我好。我没有什么使我分心、给我安慰的娱乐或者玩具,因为要是有人给我东西,总是要带着责备,而且少不了一句话:'你不配得到它。'他们即使给我一块破布,也要我哭一场;后来我就不把这种事放在心上了;我求知识的欲望非常强烈,我只羡慕别的比我受到更多教育的小孩。不少人夸奖我,认为我有才能,而且带着惋惜地说:'只要有人肯培养这个孩子!'我暗暗地在心里接上一句:'她会一鸣惊人的。'我的脸颊发热起来,我连忙躲到一个地方去,我想象我要绘出的那些图画,我未来的学生——可是我连一小张纸、一支铅笔也得不到。……我想望死去的心愈来愈强,同时对我这个监狱和它的凶残的看守的蔑视也越来越厉害;我不停地吟诵《修道士》② 中的诗句:

秘密就在这儿:在我生命的春天里

---

① 作者在一八三八年三月十五日写信给娜·扎哈利娜,要求她"讲讲你的童年,讲讲我们最初的见面"。同年三月三十一日她写回信说要把记录回忆的笔记本给他("你来的时候我拿给你"),这段话就是从"笔记本"里摘录下来的。笔记本没有给保存下来。

② 《修道士》:俄国诗人伊凡·伊·柯兹洛夫(1779—1840)的一首诗。

我已经熟悉了人世的一切艰辛。

“你可记得好久以前有一回我们在你们家里，还是在那所宅子里，你问我读过柯兹洛夫的诗没有，你就给我念了这个地方？我打了一个冷噤，勉强忍住眼泪，笑了笑。”①

在她的心上经常响着那种十分忧郁的音调；她从来没有完全摆脱过它，只是在她偶尔非常高兴的时候，它才暂时沉默。

她逝世前两个月光景②，回顾她的童年，她这样写道③：

“在我的周围全是衰老、丑恶、寒冷、死亡、虚假；我受的教育是从责骂和侮辱开始的，它的后果便是——跟所有的人疏远，不相信他们的怜爱，厌恶他们的同情，沉溺在自己的内心生活之中……”

然而要做到这样沉溺在自己的内心生活之中，不仅要有非常深邃的灵魂、让自己随意在其中潜隐，而且还需要有坚定的独立自主的力量。很少的人能够在这种不友好的、庸俗的、难堪的、没有出路的环境中过自己的内心生活，有时精神无法支持，有时身体遭受摧残。

孤苦伶仃的生活同在这样幼小年纪遭到的粗暴待遇在她

---

① 上面的话是从娜·扎哈利娜一八三七年十二月五日给作者的信中摘录下来的。

② 在一八五二年。

③ 在一八五九年汉堡版德文本《一个俄国人的回忆录》第四册中，这一句作“她写信给她的空苏艾诺说”。扎哈利娜称她的好朋友娜塔利雅·土奇科娃为“我灵魂的‘空苏艾诺’（西班牙语‘安慰’的意思）”。空苏艾诺又是法国乔治·桑的小说《空苏艾诺》的女主人公。

的心灵上留下了一道黑影，留下了一条永远不能完全长好的伤口。

一八三七年她写道："我不记得什么时候我自动地、发自内心地喊过一声'妈妈'，我扑到什么人的怀里毫无顾虑地忘了一切。从八岁起我对一切都感到陌生，我爱我的母亲……可是我们彼此不了解。"①

望着这个十二岁少女的苍白色的脸，望着她那四周有黑圈的大眼睛，望着她那无精打采的倦容和摆脱不了的忧郁，许多人都会认为这是一个命中注定的肺结核病过早的受难者，这一类受难者从童年时代起就给罩上死的阴影，显出一种早熟的沉思与美丽的特殊痕迹。她说："要不是我们的见面救了我，我就经不住这场斗争。"

我了解她、理解她太迟了！

到一八三四年公爵夫人把穿着毛制品长衣的她介绍给我父亲已经九年了，可是在这之前，我还不能够重视这个在我身边发展、成长的很有才华的生命。这是不难解释的。她不好意思，而我想的事情太多；我可怜这个老是忧伤地、孤寂地坐在窗前的孩子，但是我们很少见面。我难得去公爵夫人家，而且大都不是出于自愿；公爵夫人更不常带她到我们家来。何况公爵夫人每次来访几乎总是留下不愉快的印象，她经常为了一些琐碎事情跟我父亲争吵不休，他们分别一两个月，见了面还是互相挖苦，不过是用了一些友好词句掩饰，好像用糖衣

① 摘自一八三七年十二月一日的信。

包着毒药一样。公爵夫人说："我的好兄弟，"我父亲就回答道："我的好姐姐。"他们还是照样地争吵下去。公爵夫人一走，我们总是很高兴。此外，还不要忘记当时我完全沉醉在政治理想和科学研究中，生活在大学里和同学们中间。

在这黑暗、漫长的九年中间，她周围全是些愚蠢的伪君子、自高自大的亲戚、讨厌的修士司祭和肥胖的神甫太太，受到陪伴女人虚情假义的照顾，给关在宅子里，不许走出长满荒草的凄凉院子和屋后小园，在这样的环境里面，除了忧伤，她的生活里还能有什么呢？

根据上面的话我们已经明白，公爵夫人收养这个女孩，并没有特别关心她的教育。女孩的品行由她亲自管教；这包含着遵守礼节和养成一整套的虚假作风。女孩每天大清早起就要束紧自己的身子，梳好头，端端正正地坐着；只要不到损害女孩健康的程度，这样做也可以；然而公爵夫人不仅束缚了女孩的腰，同时还束缚了她的心灵，扼杀一切真诚、坦白的感情，在女孩愁闷的时候，要她露出笑容，做出愉快的样子，她想哭的时候，却要她讲亲切友好的言辞，而且强迫她对一切事物都不加区别地表示好感——一句话，要她经常作假。

起初公爵夫人借口说念书早了没有用处，不让这个可怜的小姑娘学习；后来，就是在三、四年之后，她听厌了枢密官甚至外人的指责，才下决心安排她在花钱最少的条件下念书。

因此她就利用一个上了年纪的家庭女教师，这个女教师认为自己受过公爵夫人的恩惠，并且有时还要找公爵夫人帮忙；这样学法语的学费就降到了最低的限度——而教学质量

也就 à bâtons rompus〔法语：马马虎虎〕了。

俄语教学的代价也是同样低廉的；为了教授俄语和其他一切功课，公爵夫人请了一个教士寡妇的儿子来担任教师，公爵夫人对这个寡妇有过恩惠——不用说，她并没有多花费什么：由于公爵夫人向总主教讲了好话，寡妇的两个儿子当上了大教堂的教士。作女孩教师的是他们的哥哥，一个穷的教区的教堂执事，要养一大家人；他生活艰难，不会计较报酬，也不敢同他弟弟们的恩人讲条件。

难道还有比这更可怜、更贫乏的教育吗？然而一切都进行得顺利，而且产生了很好的效果：一个人身上只要有可以发展的东西，那么一点点的推动也就够了。

这个贫穷的、秃头的、又高又瘦的教堂执事是属于热情的空想家一类的人，这种人不论年龄不论贫苦都治不好他们的梦想，正相反，贫苦倒助长了他们那种神秘的沉思、冥想。他们的信仰接近于宗教的狂热，它是真诚的，而且并不缺少诗意。在他们（一个缺衣少食的家庭的父亲和一个寄人篱下的孤女）之间很快地就产生了相互的了解。

在公爵夫人家里，教堂执事不过是一个无依无靠而又性情温和的穷人，别人平时对他也只是点一点头，或者勉强讲一句话。连陪伴女人也认为不应当对他客气。可是他并不理会这些人，也不在乎他们的态度，只顾热心地教课，女学生的聪明好学感动了他，他也会使她感动到落泪。这是公爵夫人所不能理解的，她责骂女孩爱哭，而且很不满意教堂执事，说他使女孩神经失调。她说："这太那个啦，完全不像个小女孩。"

然而老人的话在年轻姑娘的面前打开了另外一个世界，在我们的世界里宗教本身变成了规定饮食的事情，成为遵守斋期、夜里上礼拜堂等等，而且由恐惧发展来的宗教狂热和欺骗同时存在，在我们这个世界里一切都受到限制，一切都是弄虚作假；都是照老一套办事的，并且狭隘得使心灵窒息，而新的世界却是动人的。教堂执事把一本福音书交给了女学生，她长久地不肯释手。福音书是她读到的第一本书，她同她唯一的女朋友、保姆的侄女、公爵夫人的年轻使女萨沙[1]一起反复地阅读。

后来我非常熟悉萨沙。她是在马车夫住处和厨房之间出生的，从来没有离开过女仆房，她在什么地方受到教育，怎样受到教育，我一直不了解；然而她的确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她是一个无辜的牺牲者，这种被农奴的身份不知不觉地扼杀在仆婢室里的牺牲者比我们想象到的多得多。她们不仅得不到丝毫酬报、丝毫同情，没有快乐的日子，没有欢乐的回忆，而且连自己也不知道，连自己也料想不到在他们身上什么东西正在毁灭，而且有多少正在逐渐死亡。

太太烦恼地说："小丫头刚刚给教会做事情就突然躺下去死了……"七十岁的女管家[2]发牢骚说："如今那些使女，比小姐都不如。"然后就去吃蜜粥[3]参加葬后宴[4]了。母亲哭

---

① 萨沙：即萨沙·威尔里娜，玛·阿·霍万斯卡雅公爵夫人的青年女仆。

② 女管家：指带钥匙的女管家。

③ 蜜粥：葬礼举行后待客的蜜粥。

④ 葬后宴：葬礼以后为追悼亡人而设的酬客宴。

着,哭着,也喝起酒来,事情就这样完结了。

我们匆匆地从旁边经过,对我们跟前发生的惨痛事情视若无睹,自以为我们有更重要的事,只消用几个卢布和一两句好话就可以应付过去。可是突然间我们吃惊地听见了非常可怕的呻吟,这是世世代代遭受摧残的心灵的控诉,我们好像从梦中醒来一样惊问:这心灵,这力量是从哪里来的?

公爵夫人杀死了她的使女——当然是无意地,不自觉地;她拿种种琐碎事情折磨她,摧残她,使她一生抬不起头,她用侮辱,用粗暴、冷酷的态度虐待她。有好几年她一直不准她出嫁,只有后来在她那痛苦的面容上看到了肺痨的症状,才表示同意。

可怜的萨沙,你这个被农奴制度玷污了的丑恶的、该死的俄罗斯生活可怜的受害者,死给了你自由!你还是比别的人幸福得多:在公爵夫人家的阴森的囚奴生活中你遇到了一位朋友,你非常爱她,她的友情暗中跟随着你一直到送你进入坟墓。她为你流了不少的眼泪;她临终前不久还在怀念你,悼念你,把你看作她童年时期唯一光辉的形象!

……两个年轻的姑娘(萨沙年长一些)经常起身早,家里的人还在睡觉的时候,她们走到院子里,在晴朗的天空下一起念福音书,一起祷告。她们为公爵夫人祷告,为陪伴女人祷告,她们祈求上帝使这些人的心胸开朗;她们给自己想出种种的考验:整整几个星期不吃肉,幻想着修道院的生活和死后的日子。

这样一种神秘主义适合青春期年轻人的特点,适合这一

种年龄，在这种年龄一切都还是秘密，一切都还是宗教神秘剧，在这种年龄觉醒起来的思想还不曾从晨雾中明亮地照出来，这晨雾也还没有让经验和激情所驱散。

后来在静寂、安宁的时刻，我多么爱听这些童年祷告的故事，这童年的祷告一方面是一个充实的生活的开始，另一方面又是一个不幸的生存的结局。一个受到粗暴恩惠的折磨的孤女和一个陷在毫无希望的深渊里的女奴，这两个少女在荒凉的院子里为压迫她们的人祷告，她们的形象使我的心充满了感动，我的心灵里有了一种罕见的和平。

这个纯洁、优美的姑娘在公爵夫人荒谬、愚蠢的家里得不到一个亲人的重视，然而不单是教堂执事和萨沙，而且所有的男女仆人都对她表示了尊重和爱戴。这些普通人不仅把她看作一位善良、和蔼的小姐，他们还在她身上看到更崇高的品质，为了这个，他们尊敬她，他们相信她。公爵夫人家仆人的姑娘出嫁的时候总要请求她亲手给她别上一条绸带。一个年轻使女（我还记得她叫叶连娜）突然感觉到胸口刺痛；后来发现她患的是严重的胸膜炎，已经治不好了，给请来了教士。姑娘给吓坏了，问母亲是不是就要死去；母亲哭着告诉她，上帝要召她去了。病人便偎在母亲怀里含着热泪央求她请小姐来亲自用神像祝福病人升入天国。她来到病人跟前，病人拿起她的手，放在自己的前额上，反复地说："给我祷告吧，给我祷告吧！"年轻的小姐自己也是满脸泪水，小声祷告起来——病人就在祷告的时间里死去了。屋子里所有的人围着病床跪下、划着十字；她给死者阖上了眼睛，吻了吻变冷的前额，走出

了房间。①

只有枯燥无味、眼光短浅的人才不懂这个浪漫的时代;这种人同病弱的人一样可怜,在那些病人的身上青春期的神秘主义过了青年时期仍然长久地存在下去。在我们这个时代注重现实的人中间是不会有这种情况的;然而十九世纪世俗的影响怎么能够渗进公爵夫人的家里去呢?——这个家给封闭得这样密不通风!

然而缝隙终于给找到了。

我那个"柯尔切瓦的表姐"② 有时候到公爵夫人家来作客。她喜欢这个"小表妹"③,就像人们通常喜欢小孩,特别是遭遇不幸的小孩那样,可是她并不了解她。后来她惊讶地、几乎是惊惶地发现她那不同寻常的天赋,"表姐"对什么事都容易感情冲动,她马上决定纠正她那不关心的态度。她找我要

① 在我保存下来的信件中,有几封萨沙在一八三五至三六年写的信。萨沙当时待在莫斯科,而她的女友跟着公爵夫人到乡下去了。我读了这些单纯的、热情的心灵的私语不能不深深感动。她写道:"难道您真的要回来吗?啊,倘使您确实要回来,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您不会相信我怎样时时刻刻想念您,差不多我一切的愿望,我一切的思想,一切,一切,一切都在您身上。……啊,娜达丽雅·亚历山德罗夫娜,您多么美,多么和善,多么高尚,多么——可是我表达不出来。的确,这不是抄来的词句,这是直接从我内心发出来的。……"在另一封信里她感谢"小姐"常常给她写信。她说:"这太好了,不过这是您,您啊。"她用下面的词句结束这封信:"老是有人来打扰,我的天使,我满怀着真诚的、无限的爱拥抱您。您祝福我吧!"——作者原注。上面提到的信并未保存下来。现在只保存了六封萨沙写给娜达丽雅的信(1838—1839),由莫斯科列宁图书馆手稿部收藏。

② "表姐":指塔·库钦娜。

③ 小表妹:指娜达丽雅,她其实是塔·库钦娜的"小阿姨"。

雨果、巴尔扎克的著作，或者任何其他新书。

"'小表妹'是个天才，"她对我说，"我们要尽力帮助她发展。"

"大表姐"(想到这个称呼，我不禁失笑，因为她是个娇小的姑娘)把她自己脑子里想过的一切：席勒的理想和卢骚的理想、从我这里找来的革命思想和她自己那里来的在恋爱中的少女的幻想，一口气全传给她的徒弟了。后来她又偷偷地借给她法国的小说和诗歌；这些书大部分都是一八三〇年以后出版的。尽管它们有种种缺点，可是它们大大地激发了思想，使年轻的心受到火和精神的洗礼。在那个时期的长短篇小说和诗歌里面，不管它们的作者是不是有意，到处都有社会的动脉在强烈地跳动，到处显露出社会的疮疤，到处都听得见饥寒交迫的无辜的劳动奴隶的呻吟；在当时这种怨声和呻吟还不曾被人看得像罪行那样地可怕。

我不用说，"表姐"借书从来未经挑选，也不作任何解释，我认为这并没有害处；有些人从来不需要别人的帮助、支持和指引，在没有栅栏的地方走起来更安稳。

不久又添了一个人，她加强了柯尔切瓦"表姐"的世俗的影响。公爵夫人终于决定聘请一位家庭教师，为了省钱她请了一位刚刚在女子中学毕业的俄国姑娘。①

在我们国内请一位俄国家庭女教师花费并不大，至少在

① 俄国姑娘：即艾米利雅·米·阿克斯别尔格。娜达丽雅的家庭教师和朋友。

三十年代是这样。然而尽管她们有种种的缺点，她们还是胜过大多数从瑞士来的法国女人、胜过大多数无限期休假的卖笑女人和退职女演员，那些女人拚命抢夺家庭教师的饭碗，当作她们最后的谋生手段——干这一行她们既不需要才能，也不需要青春，只要能够讲几句地道的法国话，又有 d'une dame de comptoir〔法语：女掌柜的〕风度（这种风度在我国外省各地常常被看作"最佳风度"）就行了。俄国家庭女教师是从女子中学或者孤儿院出来，她们受过正规的教育，而且没有外国女人身上那种市侩的 pli〔法语：味道，习惯〕。

现在的法国女教师和一八一二年以前到俄国来的那些女人不同。那个时候法国还少有市侩气，到俄国来的女人属于另一个阶层。她们里面一部分是侨民和破落贵族的女儿、军官的寡妇、尤其是军官的弃妇。拿破仑替自己的部下完婚，就像我们的地主替家奴完婚那样，不大考虑到爱情和兴趣。他想通过婚姻把他那些火药贵族① 和旧的贵族结合起来；他希望他的斯卡洛祖布们② 由他们的妻子来驯服。他们习惯于盲目服从，遵命结了婚，可是不久发现她们太古板，不宜于参加营房和野营的娱乐晚会，便遗弃了她们。这些可怜的女人流浪到英国、奥地利和俄国。那个经常到公爵夫人家来的法国女家庭教师就是这一类人。她讲话时面带笑容，谈吐文雅，

① 火药贵族：即军人贵族。

② 斯卡洛祖布：四幕剧《聪明误》中的一个人物，一个性情粗暴的上校，一个粗野人的典型。

从无恶声厉色。她一举一动无不循规蹈矩，没有片刻忘记自己的身份。我相信她夜里躺在床上不是睡眠，倒是在考虑怎样睡才合乎规矩。

年轻的女子中学毕业生是一个聪明、勇敢、精力充沛的姑娘，她有一般寄宿学校学生的那种热诚，又生就光明磊落的天性。她活泼、热情，给她的学生和朋友的生活带来更多的生命与活动。

她和一天天憔悴下去的萨沙的忧伤、悲戚的友情所产生的效果也是凄凉、哀伤的。这种友谊再加上教堂执事的教诲和毫无生趣的生活使得这个少女跟世界隔绝，跟人们疏远。年轻、活跃、愉快，同时对一切梦想和浪漫事物都表示同情的第三者非常及时地来到她跟前，把她拉回到地上来，拉回到实际的、真实的地面上来。

起初学生接受了艾米利雅老师的某些举止；她脸上经常露出笑容，谈话也显得活泼了；但是一年以后，两个少女的个性互相影响取得了平衡。无忧无虑的、可爱的艾米利雅在学生的坚强性格面前屈服，完全受学生的支配，用学生的眼光看事物，用学生的思想去想一切，生活在学生的欢笑和友谊之中。

我快要在大学毕业的时候，到公爵夫人家去的次数多了起来。我一去，那个年轻姑娘显得很高兴。有时候她两颊发红，说话也有生气，可是接着她又恢复了平时那种沉思的宁静，使人想到冷冰冰的雕塑美人，或者席勒的不让任何人亲近

的“外国的姑娘”①。

这不是孤僻，也不是冷漠，而是内心的活动——别人不了解她，她也*不了解*自己；与其说她知道，倒不如说她隐隐约约地预感到她内心有些什么。她那美丽的外形好像并不曾完工，还差一点什么；只要有一星火花，或者拿雕塑家的凿刀动一两下，就可以断定：她是注定了在不毛的沙地上憔悴、枯萎，不了解自己，也不了解生活呢，还是反映出激情的火光，让激情控制自己，而且活下去（也许是受苦），的确是受苦，然而*过着丰富的生活*。

在我们长期分别的前夕，我才在她那半带孩子气的脸上第一次看到生命的痕迹。

我还记得她那异常清亮的眼光，她那突然间改变了意义的整个面貌，仿佛给一种新的思想，一种新的火渗透了……仿佛秘密已经猜到、内心的雾也已消散。这个时候我给关在监牢里面②。我们告别十多次，还是不愿意分开，最后我母亲（她同 Natalie〔法语：娜达丽〕③一起到克鲁季茨基营房来看

---

① 《外国的姑娘》：见席勒的诗《Das Mädchen aus der Fremde》（德语：《外国来的姑娘》）。

② 指一八三五年四月九日作者在流放前夕同娜达丽的会面。

③ 我很清楚用法语翻译人名听起来多么不自然；但是名字是多年用惯了的，怎么好随意改变呢？何况在我们俄国一切非斯拉夫语的人名都缩短了，而且念起来不响亮，我们这些或多或少“不是在老辈的法律下”〔一〕受过教育的人，在我们青年时期就把我们的名字“罗马化”了，而当权的人却又把它们“斯拉夫化”。一个人升了官在宫庭里有了权，就把名字的写法改变了；例如斯特罗加诺夫伯爵〔二〕一直到死都被称为*谢尔盖依*·*格利哥雷维奇*，而戈里曾公爵始终被称作*谢尔吉依*·*米哈*

我)下了决心站起来要走了。年轻的姑娘打了一个哆嗦,脸色发白,使出很大的力气紧紧捏住我的手,反复地说:"亚历山大,不要忘记妹妹啊。"

宪兵打发她们出去,然后走来走去。我扑倒在床上,一直望着门,那个光辉的形象就是在门口消失的。我在心里说:"不,你的哥哥不会忘记你。"④

第二天我就给押往彼尔姆去了,可是在我谈到离别之前,我还要讲一讲我入狱前妨碍我更好地了解 Natalie 和更密切地接近她的是什么。我在恋爱!

是的,我在恋爱,青春时期的、纯洁的恋爱的回忆对我是十分甜蜜的,就像在明媚的春天,在花香、鸟语中在海滨散步那样。这是一个充满美好事物的梦,而且它也像梦通常那样

依洛维奇。后一个改变写法的例子还可以在因十二月十四日事件出名的罗斯陀甫采夫将军〔三〕身上找到:整个尼古拉·巴甫洛维奇统治时期他始终是雅各夫,就像雅各夫·陀尔戈鲁基〔四〕那样,可是亚历山大二世登基以后,他却变成伊阿各夫,跟上帝的弟兄一样了。——作者原注。

〔一〕"不是在老辈的法律下":引自普希金长诗《努林伯爵》。

〔二〕谢·格·斯特罗加诺夫(1792—1882):俄国国务活动家,一八三五至四七年任莫斯科教育区督学。谢·戈里曾是他的前任。

〔三〕雅·伊·罗斯陀甫采夫(1803—1860):帝俄侍从武官长,反动政客,对十二月党人的活动进行过告密。

〔四〕雅·费·陀尔戈鲁基(1659—1720):俄国国务活动家,外交家,彼得一世的亲信。

④ 作者给她写了一封告别信:"这一夜我很悲哀,很悲哀,娜达丽!娜达丽!我离开莫斯科失去的太多了——我失去了我的一切。啊!分别之情,被迫分别之情太难堪了。……我们什么时候再见面呢?这里一片黑暗,可是你的友情照亮了一切——流放人永远、永远不会忘记他的好妹妹。"

地消失。

我在前面已经讲过，在我们的朋友中间很少女人，特别是我可能接近的女人；我同“柯尔切瓦的表姐”的友情起初十分热烈，以后就逐渐地平静了。她结婚以后，我们不常见面，后来她走了。我需要一种比男性友谊更温暖、更温柔的感情，这种模糊的渴望一直在我心里徘徊。一切都齐备了，只是缺少一个“她”。在我们相熟的一个人家里有一位年轻姑娘[①]，我和她很快地做了朋友。一个奇怪的机会使我们彼此接近。她订了婚，突然发生纠纷，未婚夫抛弃她到边区去了。她感到绝望、忧伤和屈辱；我怀着真诚、深切的同情看着她受到忧愁的折磨，憔悴下去；我不敢提起那个原因，只是设法使她散心，安慰她，给她送小说去，我亲自高声读给她听，对她讲整篇故事，有时为了在这位忧伤的姑娘身边多待些时候，我竟然忘记预备大学的功课。

她的眼泪渐渐地少了，有时她脸上还露出笑容；她的绝望变成了悒郁，不久她对过去的事感到了害怕，她跟自己作斗争，从内心的 à point d'honneur〔法语：荣誉观念〕出发，保卫过去来对抗现在，就像一个军人虽然知道已经打了败仗，他还在保卫军旗那样。我看见天边残留的最后的云片，我感到陶醉，怀着跳动的心，轻轻地、轻轻地从她的手里把旗拔出来，她不再捏住旗不放了——这个时候，我恋爱了。我相信我们的爱。她写诗给我，我为她写了整篇散文体的论文，后来我们在一起

---

① 年轻姑娘：指柳特米娜·瓦·巴谢克，作者好友瓦津·瓦·巴谢克的三妹。

幻想未来，幻想流放，幻想监牢，她对一切都作好了准备。在我们的幻想中生活的外貌从来不是光辉灿烂的；我们注定要同一种巨大的权势进行战斗，在这场战斗中要取得胜利，几乎是不可能的。我读了山狄纳[1]的《残废者》以后对她说："做我的盖塔纳吧，"我经常想象她会跟着我到西伯利亚的矿坑去。

"残废者"就是写文章讽刺希克斯特五世[2]的诗人，教皇答应对他不处死刑，他便自首。希克斯特下令砍掉他的双手，割去他的舌头。这个不幸的受难者脑子里装满了无法倾吐的思想，他的形象当时很能吸引我们。受难者的忧郁而疲乏的眼光带着感激和残余的欢乐停留在一个少女的身上，只有在这个时候它们才得到平静，那个少女以前爱过他，在他遭逢不幸之后也并没有抛弃他；她名叫盖塔纳。

这次初恋的经历很快就过去了，然而它是十分真诚的。也许连这种爱情也应当早早消逝，否则它就会失去它那最好的、最香的品质，它那十九岁的年纪，它那没有污点的新鲜气息了。铃兰会在冬天开花吗？

我的盖塔纳，难道你不是带着同样的笑容回忆我们的见面？难道在二十年以后你想到我，你的回忆里还会有辛酸的滋味？对我来说，这样会是很痛苦的。你在哪里？生活过得

---

① 山狄纳：法国的小说和剧本的作者，本名包·约·克沙维叶（1798—1865）。

② 希克斯特五世（1521—1590）：从一五八五年起作罗马教皇。

怎样?

我已经生活过了,现在正走着下坡路,我遍体鳞伤,精神上"残废"了。我不再找寻任何盖塔纳了,我回顾过去,想起了你的面影,我非常愉快。……你还记得拐角上的窗口吗?就是对着小巷的那堵窗,我每次离开都要弯进小巷,你总是站在窗前用眼光送我远去,要是你不站在窗前或者你不等我弯进小巷就离开窗口,那我会多么难过!

我并不想同你实际上见面。在我的想象中你永远保留着你那年轻的面貌,你那 blond cendré〔法语:浅灰色的〕鬈发,你就保留着这样吧;至于你要是回忆起我,那么你想到的也是一个身材挺拔的年轻人,他有闪光的眼睛和热情的语言,你就这样地回想我吧,你不会知道这双眼睛已经失去光采,不会知道我已经发胖,额上有了皱纹,脸上早已失去从前那种容光焕发、生气勃勃的表情,奥加略夫曾经叫它做"希望的表情",但希望已经消失了。

我们彼此都应当保持从前的印象……不论阿喀琉斯[①],不论狄安娜[②] 都不会老。……我不愿意像拉林同公爵小姐见面那样同你见面:

"表妹,你可记得格兰狄逊?——"

"什么?格兰狄逊?……啊,格兰狄逊!"

"他住在莫斯科,住在西米恩附近,

① 阿喀琉斯:古希腊神话里特洛亚战争中的希腊最大的英雄。

② 狄安娜:罗马神话中月亮和狩猎的女神。

圣诞节前夕还来看过我，

他刚刚给儿子娶过了亲。”①

……逐渐熄灭的爱情的最后火焰把监狱的拱门照亮了一会，用旧日的幻梦温暖了心，然后各人走自己的路。她到乌克兰，我去流放地。从此我再也没有听到她的消息②。

① 引自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夫盖尼·奥涅金》第七章四十一节（查良铮译），拉林和公爵小姐都是书中人物。

② 塔·库钦娜（“柯尔切瓦的表姐”）后来做了柳特米娜的嫂嫂，以后曾谈到她，这样说：“她不声不响地过她那不幸的生活。她没有讲过诉苦的话，也从不曾责怪过谁；她把一切痛苦，一切苦恼都锁在自己的心里。……她始终忠于她的纪念，也许还忠于她的感情……”

第二十一章*

分　离

"啊，人们，凶恶的人们，你们拆散了他们……"①

我给娜达丽写的第一封信② 就是用这样的句子结束的，可注意的是在信末署名的时候，我不敢用"赫尔岑"〔德语：心爱的人〕③ 这个词，我就写："你的哥哥"。

那个时候，我的妹妹对我是多么宝贵，而且我怎样常常想念她，从这个事实就看得出来：在尼日尼，在喀山，在到达彼尔姆的第二天，我都写了信给她。"妹妹"这个词表明了我们的感情里所含有的一切；我过去非常喜欢它，现在还是喜欢它，使用这个词不是作为感情的限制，恰恰相反，是作为各种感情

---

* 本章曾发表于一九八〇年七月号《长春》。

① 俄国民歌。

② 第一封信：作者在一八三五年四月二十九日从彼尔姆寄出的信。娜达丽是作者的堂妹，后来作了作者的妻子。

③ 赫尔岑：作者的父亲没有同作者的母亲正式结婚，他用"赫尔岑"（心爱的人）这个德语词作为作者的姓。

的融合;友爱、爱情、血统关系、共同的传统、家庭的环境、习惯的密切联系都结合在一起了。我以前从未用这个称呼唤过任何人,这个称呼对我是非常宝贵的,因此我后来常常用它来称娜达丽。

在我完全理解我们的关系之前,也许正因为我并不完全理解它,我还遇到了另一次考验,这个考验并不像我同盖达纳[①] 的遇合那样留下愉快的回忆,它征服了我,给我引起了许多悲痛和内心不安。

我在监狱里关了九个月以后,给抛进了一个对我完全陌生的世界,我当时很少生活经验,起初我自由自在无所顾忌,新的地方、新的环境使我眼花缭乱。我的社会地位改变了。在彼尔姆,在维亚特卡,人们对待我和在莫斯科完全不同;在莫斯科我是一个住在父母家里的年轻人,这里在这个泥沼里,我独立生活,人们把我当作一位官员,其实我完全不是官,我不久便看出我不用花费力气就可以在伏尔加河中下游左岸和卡马河东岸的客厅里充当上流绅士的角色,成为维亚特卡的知名人士。

在彼尔姆,我还来不及看清楚四周的情况,我去向她租借房屋的那位房东太太就问我要不要菜园,养不养奶牛! 这句问话就使我恐怖地看出来我从最高学府学生生活的高度摔了下来,跌得多么深。然而在维亚特卡我结交了当地的整个上流社会,特别是年轻的商人,他们比中心地区的商人更有见

① 盖达纳:作者友人的妹妹。

识,虽然他们也同样喜欢吃喝玩乐。办公室的文牍事务妨碍着我的学习,我过着不安定的闲散的生活,由于我生性特别敏感,或者更可以说容易激动和缺乏经验,我很可能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故。

由于 de lápprobativité〔法语:喜欢〕讨好别人的心思,我不加区别地到处迁就,对人表示好感,谈上十句话就交了朋友,对人过份亲热,一两个月以后我才明白自己的错误,但是为了顾全礼貌并不做声,就拖着虚情假意的沉重锁链一直到有一天它给荒唐的争吵弄断为止,在争吵中别人责骂我任性偏激,忘恩负义,反复无常。

在维亚特卡起初我并不是一个人。有一个古怪、滑稽的人同我住在一起,这个人在我一生的十字路口,在每一个重要关头,总要出场,他落在水里使我认识了奥加略夫①,在我经过陶罗根② 出国境时,他在俄国土地上挥着手帕告别,他就是卡伊·仲伦倍格③,我在叙述我的流放生活的时候忘记提到他。

事情是这样:我给送往彼尔姆的时候,仲伦倍格准备去参加伊尔比特④ 的集市。我父亲平日总是喜欢把简单的事情弄得复杂,他要仲伦倍格到彼尔姆给我布置房屋,旅费由他负

① 奥加略夫:作者的友人,诗人。

② 陶罗根:一八四七年作者经过这里出国境,去西欧。

③ 卡伊·仲伦倍格:德国人,作过奥加略夫的家庭教师,即卡尔·伊凡诺维奇。

④ 伊尔比特:彼尔姆省伊尔比特河上一个小城市。

担。

仲伦倍格到了彼尔姆热心地工作起来。就是说他购买并不需要的东西:各种陶器、锅子、杯子、玻璃器皿,他还亲自到奥布瓦[①]去ex ipso fonte〔拉丁语:直接从产地〕买一匹维亚特卡马。[②]等到他把一切办好,我却给转移到维亚特卡去了。我们只得把买来的东西半价卖出去,离开了彼尔姆。仲伦倍格忠实地照我父亲的意志去办事,认为他应当跟随我到维亚特卡去"布置"我的住处。我父亲很满意他的这种忠诚、无私,便决定他同我住在一起的时候付给他一百卢布的月薪。这比到伊尔比特去更有利、更可靠,——因此他就不急于离开我了。

在维亚特卡,他不止是买一匹马,却买了三匹,其中有一匹是归他的,虽然他花的是我父亲的钱。这几匹马大大地提高了我们在维亚特卡上流社会中的地位。我在前面已经讲过,卡尔·(伊凡诺维奇尽管年过五十,面貌上又有很显著的缺陷,他却是一个好色之徒,而且居然得意地相信所有的女人和姑娘接近他,就像灯蛾绕着燃烧的蜡烛飞来飞去那样危险。卡尔·伊凡诺维奇当然不肯白白放过马的作用,他也充分利用它来追逐女人。而且我们的环境对他也有用处。我们家有一座阳台,面对着院子,院子后面便是花园。仲伦倍格穿一双喀山半高统红皮鞋,戴一顶金线绣的室内小帽,披一件高加索短

① 奥布瓦:彼尔姆省的一个乡镇。

② 维亚特卡马:当时俄国骑马的人都认为维亚特卡马很名贵。

棉袄,口里衔着一只琥珀大烟嘴,每天上午十点就在阳台上“值班”,装出在读书的样子。小帽和琥珀——这一切都是有目的的,那就是向着住在隔壁房屋的三位小姐。小姐们对新来的人也感到兴趣,她们好奇地注视着在阳台上抽烟的东方玩偶。卡尔·伊凡诺维奇知道她们什么时候而且怎样偷偷地卷起窗帘,认为他的事情很顺利,就朝着他朝夕思慕的那个方向优雅地吐出一缕轻烟。

不多久花园就给我们提供了同女邻居认识的机会。我们的房东有三座房屋,却只有一所公用的花园。两座房屋都住了人:我们租用了一座,房东和他的继母同我们住在一起,他的继母是一个肥胖、臃肿的寡妇,她就像生母那样地而且非常妒忌地照管着他,因此他只好背着她偷偷地同花园里的小姐们讲几句话。另一座房屋里住的是小姐们和她们的父母;第三座房屋没有人住。过了一个星期,卡尔·伊凡诺维奇已经同我们花园里的小姐们很熟了,常常一天几个小时给她们荡秋千,跑来跑去为她们拿斗篷和阳伞,一句话,他对她们 aus petits sion〔法语:十分殷勤〕。小姐们对他比对任何人都随便,因为他比凯撒的妻子[①]更少人怀疑,只要看他一眼就可以完全放心了。

我晚上也常常到花园里散步,这是由于合群性,就是那种

① 凯撒的妻子:凯撒怀疑妻子不贞,要跟她离婚,有人规劝他,说他自己并非没有毛病,为什么对妻子要求过严。凯撒答道:凯撒有毛病不要紧,但凯撒的妻子不应当在道德方面受到怀疑。仲伦倍格生得十分丑。

使人做着自己并不想做而别人都在做的事情的合群性。到那里去的人除了房客以外，还有房客的朋友。他们在那里交谈和注意的无非是向小姐们献殷勤和暗中互相监视。卡尔·伊凡诺维奇带着维多克[①]的警惕性进行感情方面的侦察，他知道谁同谁经常在一起散步，谁对谁有意思。在我们花园里所有那些秘密警察的眼中，我是一块危险的绊脚石；那些女士们和先生们很奇怪我居然不露声色，他们挖空心思也调查不出我向谁献过殷勤，我特别喜欢谁；这的确不是容易的，因为我对谁也没有献过殷勤，而且所有那些小姐我都不特别喜欢。最后他们厌烦了，感到受了委屈，认为我骄傲、喜欢嘲弄人，小姐们的友谊也明显地冷淡起来——尽管她们每个人同我单独在一起的时候还要用最危险的眼光盯住我。

就在这种情形下面，一天早晨卡尔·伊凡诺维奇告诉我，房东家的女厨子一早就打开了第三座房屋的百叶窗，在洗刷窗子，一家新来的人租用了这座房屋。

花园里一直谈论着新来的人的详细情况。那位陌生的太太也许是由于旅途劳顿，也许还来不及整理衣物，又好像瞧不起我们似地不肯出来见面，大家想方设法在窗口或者在穿堂窥探，有的人看到了，有的人白白守候了整整几天；看到的人说她脸色苍白，没精打采，一句话，外貌动人，不难看。小姐们说她多愁善病。省长公署一个年轻官员活泼又很聪明，只有

① 弗·欧·维多克(1775—1857)：法国冒险家。他的名字后来成为骗子的通称。

他一个认识这一家人。他从前在另一个省份工作，同他们在一起，众人就缠住他打听不休。

这个活泼的小官员很高兴自己知道别人都不知道的事情，就没完没了地大谈新邻居的美德，他把她捧上了天，称她为首都的太太。

“她聪明，”他反复地说，“动人，有教养，不过她不会瞧得起我们这伙人。啊，我敢发誓，”他突然转身对我说，“我有个很好的主意，请您维护维亚特卡上流社会的荣誉，去追求她。……好吧，您不是从莫斯科来的吗？您还是流放来的，您当然会写诗，这是上天赐给您的。”

“看，您在瞎扯，”我对他笑道，可是我的脸红了，我真想见她。

几天以后我在花园里遇见了她，她的确是一个很可爱的淡黄色头发的女人；那位谈论过她的先生把我介绍给她，我很兴奋，无法掩饰我的激动，正如我那位介绍人掩饰不了他的笑容那样。

我那出于自尊心的不好意思已经消失，我同她相熟了。她非常不幸，她用虚假的平静欺骗自己，心里空虚，一天天地憔悴下去。

尔——太太① 是一个热情不外露的女人，这种性情只有在淡黄色头发的女人中间才找得到。她们用温和、宁静的外表掩盖着火热的心；她们一激动脸就发白；动了感情，眼睛并

① 尔太太：她的真实姓名是普拉斯科维雅·彼特罗夫娜·美德威杰娃，一八六〇年逝世。

不发亮,反倒马上暗起来。她那带倦意的眼光好像一直在追求什么,因此给弄得精疲力尽,她那不知餍足的胸膛起伏不定。她整个身体有一种不安静的、电流似的东西。她在花园里散步的时候常常脸色突然发白,惊恐不安或者内心激动,回答问话也是心不在焉,连忙回到屋子里去。我正是喜欢看她这个时候的表情。

她的内心活动我不久就看清楚了。她不爱她的丈夫,也不能爱她的丈夫;她二十五岁,他已经过了五十,这点差别她可以不放在心上,然而教养、兴趣、性情的悬殊就太大了。

丈夫很少出房门;他是一个枯燥无味、冷酷无情的老官僚,一心想当地主,而且像所有的病人和几乎一切丧失财产的人那样地脾气暴躁。她嫁给他的时候才十六岁,当时他还有点家产,可是后来他把钱在牌桌上输光了,只得靠做官维持生活。他迁居到维亚特卡以前两年,就逐渐衰弱,腿上一个伤口发展成了骨疽。老头子愁眉苦脸,爱发脾气,为自己的病担心,用不安而又毫无办法的猜疑眼光望着妻子。她忧伤地、自我牺牲地照料他,然而这是在履行职责。儿女也不能使她完全满足——她那颗空虚的心总是在追求什么。

一天晚上在闲聊中我说我很想送一幅肖像给我的“表姐”,可是在维亚特卡我找不到一个画肖像的人。

“让我来试试,”女邻居说,“我过去用铅笔画肖像还可以。”

“我太高兴了。什么时候呢?”

“要是您方便,就在明天午饭前吧。”

“那就定了。我准明天一点钟来。”

这个时候她的丈夫也在场;他一句话没有说。

第二天早晨我收到女邻居的一张便条。这是我第一次收到她写的便条。她很有礼貌地、小心地通知我,她的丈夫不满意她答应给我画肖像,并且请求我原谅病人那种反复无常的怪脾气,她说他应当得到宽恕,最后她建议改一天给我画肖像,不告诉她的丈夫,免得打扰他。

我热烈地、也许可以说是非常热烈地感谢她,不过我不赞成她提出的偷偷画肖像的办法,然而我们这两张便条却使我们亲密多了。她对待丈夫的态度(我从来不曾接触这个问题)现在由她讲了出来。在她和我之间不知不觉地形成了一种秘密的了解,一种反对他的联盟。

晚上我去拜访他们,只字不提画肖像的事。要是她的丈夫稍微聪明一点,他就会猜到发生了什么事;可是他并不聪明。我用眼光感谢她,她用微笑回答。

不久他们搬到省城的另一个区里去了。我头一次到他们家去的时候,看见她一个人在家,在那间还没有完全布置好的客厅里弹钢琴,眼里满是泪水。我请求她弹下去;然而琴声不能协调,她总是弹错,手打哆嗦,脸色也变了。

"这儿多气闷!"她说,连忙离开了钢琴。

我默默地握着她的手,这是一只柔弱的、发烧的手;她的头像沉重的花冠,仿佛痛苦地屈服在某种力量下,俯向我的胸膛,她把她的前额在我的额上紧贴了一下,立刻走开了。

第二天我接到她的一张便条:她有点惊惶,竭力想给昨天发生的事情罩上一层烟雾;她在字条上面说,我去的时候她正

处在神经紧张的状态，又说，她不大记得昨天的事情，她感到抱歉，——但是这些话的一层薄薄的面纱掩盖不住字里行间明显地透露出来的热情。

我又去探望他们。这一天她的丈夫稍微好了些，不过他搬到新居以后就没有能起床。我十分激动，引他们发笑，讲俏皮话，讲各种无聊的废话，引得病人笑个不止，不用说，这都是为了掩盖我和她的窘态。而且我觉得这种笑可以使她神往，使她陶醉。

……两个星期过去了[①]。丈夫的病越来越重，到晚上九点半钟他就要求客人离开，他更虚弱，更消瘦，痛得更厉害。一天晚上，九点钟光景，我向病人告辞，尔——太太送我出来。一轮满月照进客厅，在地板上斜斜地铺上三条淡紫色的光带。我打开窗，空气新鲜、洁净，迎面扑了过来。

"多好的夜晚啊！"我说，"我真不想离开。"

她走到窗前。

"您在这儿待一会儿吧。"

"不行，我这个时候要去给他换绷带。"

"换好了来吧，我等着您。"

她不回答，我捏住她的手。

"您还是来吧。我求您……您来吗？"

"真的不行，我先要穿上便衣。"

---

① 在一九四七年以前的《往事与随想》旧版（包括一九二一年的柏林版）中，这一句以下，到"享受好天气"为止的两三页文字都给删去了。

"您就穿便衣来吧，我有几次早晨来看见您还穿着便衣。"

"要是有人看见您呢？"

"谁？您的仆人喝醉了，让他去睡吧，至于您的达利雅[1]……看得出她爱您胜过爱您的丈夫，——而且她对我也很友好。那么又有什么不得了的呢？好吧，要知道现在不过九点过一点儿，就说您托我办一件事，要我等一下……"

"没有点蜡烛……"

"就叫人拿蜡烛来。何况这个夜里亮得像白天一样。"

她还是犹豫不决。

"你来吧，你来！"我在她的耳边小声说，我第一次称她："你"。

她打了一个哆嗦。

……我等了她半个多小时……屋子里非常安静，我听得见老头子的咳嗽和呻吟，他慢吞吞的谈话声，和一张桌子移动的声音……喝醉了的仆人一边打口哨，一边在门房里长凳[2]上铺好床，嘴里还骂了几句，过一分钟就打起呼来。……女仆走出卧房的沉重的脚步是最后的声音。……于是完全安静了，又是病人的呻吟，然后又是静寂……忽然听见沙沙声，地板也发出嘎吱声，还有轻轻的脚步——白色短上衣在门口闪现了。……

她太激动了，开头简直讲不出一句话来，她的嘴唇冰冷，她的手也是冷冰冰的。我觉得她的心跳得很厉害。

① 达利雅：普·彼·美德威杰娃的女仆。

② 长凳：指当作长凳用的长板箱。

"我实现了你的愿望,"她终于说话了。"现在放我走吧。……再见……为了上帝的缘故,再见,你也回家去吧。"她悲戚地央求道。

我紧紧地抱住她,紧紧地把她搂在胸前。

"我的朋友……走开吧!"

这已经不可能了。……Troppo tardi〔意语:太迟了〕……在她的心和我的心跳得这样厉害的时候,要离开她,这是人力办不到的,而且是非常愚蠢的。……我没有走——她留了下来。……月亮把它的光带移到了另一边。她坐在窗前,伤心地哭着。……我吻她的湿润的眼睛,用一绺一绺的发辫揩去眼泪,发辫落到她那苍白无光的肩头;月光照在肩上没有反光,只现出柔和、暗淡的颜色。

我不忍丢下她一个人在这里哭,我压低声音对她讲了一些话。……她望着我,眼睛里透过泪水闪烁着幸福的光,我微微笑了。她好像了解我的心思,双手盖住脸,站了起来,……现在真的是该走的时候了,我拉开她的手,热情地吻了它们,也吻了她——我就走了。

我走过女仆的身边,不敢看她的脸,她默默地让我过去。显得沉重的月亮在往下落,像一个红红的大圆球。朝霞出现了。空气十分清新,风吹在我的脸上,我深深地呼吸,我需要新鲜空气。我快走到家,太阳出来了,好心的人们遇见我,很奇怪我这么早就起来"享受好天气"。①

① 旧版中删节的文字到这里为止。

我沉溺在这种爱情的陶醉中有一个月的光景;然后我的心好像疲倦了,衰竭了;我开始感觉到一阵阵的烦恼;我小心地掩盖它们,努力不要相信它们,我心上发生的变化使我惊奇,——可是爱情一天天地冷了。

在那个老人的面前我感到不舒服,同她在一起我感到窘,也感到厌恶。并不是因为这个人对一个既不能爱他、而他想爱她又力不从心的女人拥有世俗和教会所认可的私有权,我觉得自己有错。只是我对自己扮演两面派的脚色感到丢脸:假仁假义和心口不一是我平日最反对的两大罪恶。在勃发的情欲占上风的时候,我什么也不管,然而情欲开始冷下来时,我就考虑起来了。

一天早晨,马特维[1] 走进我的寝室,报告我,尔——老人"去世了"。我听见这个消息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我翻了一个身,并不急于起来穿衣服。我不想看见死者。维特别尔格[2]走了进来,他穿得整齐。"怎么?"他说,"您还在床上! 难道您没有听说发生了什么事情? 喂,可怜的尔——太太现在是一个人了。我们去看看,赶快穿好衣服。"

我穿好衣服——我们走了出去。

我们发现尔——太太昏过去了,或者在一种神经性的昏睡状态中。这不是在装假;丈夫的逝世使她想起自己无依无靠的处境;她孤孤单单带着几个小孩,住在异乡,没有钱,没有

① 马特维:作者的听差。

② 维特别尔格:作者的友人,一个被流放的美术家。

亲戚朋友。而且她以前受到大的打击时也会发生这种神经性的昏厥，一连持续几个小时。她躺在那里，脸色像死人一样苍白，脸发冷，双眼紧闭，时不时喘一口气，间或中断了呼吸。

没有一个女人来给她帮忙，向她慰问，帮她照料小孩，照料家务。维特别尔格陪着她；那个充当过预言家的官员和我一起料理后事。

老人又黑又瘦，穿着制服躺在桌上，皱起眉毛，仿佛还在生我的气。我们把他放进了棺材，两天以后把他葬在坟墓里。葬仪结束，我们又回到死者的家；孩子们穿着缝得有丧章的黑衣服，挤在角落里，他们与其说是悲伤，不如说是惊讶和害怕；他们小声交谈，踮起脚走路。尔——太太坐在那里，不讲一句话，两手支着头，好像在思索。

就是在这个客厅里，就是坐在这张长沙发上，我曾经等待过她，一面倾听病人的呻吟同喝醉了的仆人的咒骂。现在一切都是那么阴暗。……在丧葬的环境中，在神香的香雾中，我悲伤、不安地回想起我至今还不能忘情的那些话，那些时刻。

她的悲痛逐渐平息，她对待自己处境的态度也坚强了些；然后她那张憔悴、忧伤的脸让另外的思想渐渐地照亮了。她带着一种激动不安的探索眼光注视我，仿佛她在等待什么——问话……答复……

我不作声，——她害怕，焦急不安，开始怀疑起来。

这个时候我才明白她的丈夫其实是我替自己辩护的一个借口，——我的爱情已经淡下来了。我不是对她没有感情，绝不是，不过这不是她所需要的那种感情。现在另一种思想方

式吸引着我，先前那一阵热情奔放似乎只是为了迷住我，使我明白另一种感情。只有一件事我可以用来替自己辩护，这就是我在恋爱的时候是真诚的。

在我张惶失措、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在我胆小、软弱、期待着时间和环境意外地改变的时候，时间和环境却使我的处境更加复杂了。

丘菲亚耶夫看见这个年轻貌美的寡妇无依无靠，一个人给抛在陌生的遥远地方，他作为"一省之父"来向她表示最慈爱的关心。起初我们都以为他真心同情她。可是不久尔——太太惊恐地发觉他的关怀并不简单。在丘菲亚耶夫之前的两三个省长就把维亚特卡的太太们当作情妇，丘菲亚耶夫学他们的榜样，毫不迟疑就直截了当地向她表白爱情。不用说，尔——太太拿冷淡的鄙视回答他，讥讽他人老心不老。丘菲亚耶夫不肯认输，继续厚颜无耻地纠缠。他看见事情没有进展，就使她明白，她的小孩的命运都给捏在他的手里，没有他帮忙，他们不用想靠公费上学念书；至于她呢，要是她不改变对他的冷淡态度，他就不会给出力。这个受到侮辱的女人像一头受伤的野兽似地跳了起来。

"请出去！不准您的脚再跨进我的门槛！"她指着门对他说。

"咳，您好大的脾气！"丘菲亚耶夫说，他想用一句笑话掩饰过去。

"彼得，彼得！"她朝着门房喊道，丘菲亚耶夫害怕了，他担心事情闹出去，急得喘不上气来，又羞又窘，跑进了自己的马车。

晚上尔——太太把事情的经过全部讲给维特别尔格和我

听了。维特别尔格马上就明白那个色鬼虽然碰了钉子自讨没趣逃跑了，可是他绝不会放过这个可怜的女人——丘菲亚耶夫的性格我们全知道。维持别尔格决定不顾一切地援救她。

迫害不久就开始了。给孩子们申请补助的呈文看来就要遭到否决。房东和小店老板讨帐也特别坚决。天知道还会发生什么事情；让彼得罗夫斯基关在疯人院里死去[1] 的人不是好惹的。

维特别尔格家中人口多，生活困难，可是他毫不犹豫，邀请尔——太太在他的妻子到达维亚特卡后两三天搬到他的家里去住。尔——太太在他那里很安全，因为这个流放人的道德力量很强大。他的不屈不挠的意志，他的高贵的相貌，他的豪放的语言，他那蔑视一切的微笑，连维亚特卡的谢米雅卡[2]也害怕。

我住在这座房屋的另一部分，和维特别尔格同桌吃饭；这样我们就住在一个屋顶下面了，本来我们应当分隔两地的。

在这样接近的生活里，她明白往事是一去不复返的了。

为什么她偏偏在我极其动摇不定的时期遇到我呢？她本来可以得到幸福，她也应当得到幸福。悲惨的过去结束了，她有可能得到新的、和谐的、爱情生活！可怜的、可怜的尔——！爱情的暴风云不可抗拒地涌到我的身上，来势这么热烈，这么

① 这是丘菲亚耶夫搞的一件冤案。

② 谢米雅卡：季·尤·谢米雅卡(1420—1453)，兹韦尼哥罗德和加利奇—柯斯特罗马封地的公爵，以残暴和道德败坏出名。这里指丘菲亚耶夫。

令人陶醉，这么叫人神往，然后又消失得无踪无影，这是不是我的错？

……我彷徨无主，感觉到苦难就要到来，不满意自己，生活在惊慌不安之中；我又喝起酒来，想在闹中取乐，消愁也好，不能消愁也好，总觉苦闷重重排遣不了，我等着 Natalie 从莫斯科寄来几行书信，就像在充满尘埃的炎热中等待清新的空气那样。这个快成年的少女秀美的形象越来越光辉地超出我的情感骚动之上出现在我的眼前。我对尔——太太的爱的冲动使我看清楚了自己的心，打开了它的秘密。

我对于不在我跟前的堂妹的感情越来越深，但是把我同她联在一起的感情是什么，我却不明白。我对这感情已经习惯，并没有留心它有没有发生变化。

我的信中的语调越来越不安；一方面我深深感觉到自己不仅过去对尔——太太犯了罪，而且我的沉默又使我对她犯下新的撒谎的罪行。我觉得我堕落了，我不配接受另一个人的爱情……而爱情却是不断地生长。

“妹妹”这个称呼使我感到拘束，现在我对友爱已经不满足了，这种温和的感情显得冷漠。她的来信每一行都流露出她的爱情，然而我还是觉得不够。我需要的不单是爱情，而且是明显的表白，我就写道：“我向你提出一个奇怪的问题：你是不是相信你对我的感情——只是友爱？你是不是相信我对你的感情——也只是友爱？我不相信。”[①]

① 摘录一八三五年十月十四日作者写给娜达丽的信。

“你好像有些不好意思，”她回答道。“我知道你的信使你比使我更吃惊。放心吧，我的朋友，它绝对不会改变我的什么，它不会使我对你的爱增加一分，或者减少一分。”①

但是话说出来了；“雾消散了，”她写道，“天又晴朗、又明亮了。”②

她愉快地、毫无顾虑地把整个身心献给她所说的那种感情，她的信是一首少年时期的情歌，从孩子般的小声私语开始，发展到强烈的抒情诗。

“也许你现在坐在书房里，”她写道，“没有写字，没有看书，只是若有所思地抽雪茄烟，眼睛望着不明确的远方，有人走进来向你打招呼，你也不回答。你的思想在什么地方呢？你的眼光在看哪里呢？不用回答，让它们到我这儿来吧。”③

“……让我们回到童年吧，让我们指定一个小时，在这一个小时里我们两个人都在室外，在这一个小时里我们可以相信除了距离再也没有其他什么分隔我们。那么晚上八点钟你大概也有空吧？前几天我在这个时间走到门口台阶上——可是马上又转身回去了，我想你是在屋子里。”④

“……看你的信，看你的画像⑤，想到我的那些信，想到

① 摘录一八三五年十二月三日娜达丽的回信。

② 摘录一八三六年一月二日娜达丽的信。

③ 摘录一八三六年九月三日娜达丽的信。

④ 摘录一八三七年五月六日娜达丽的信。

⑤ 画像：一八三六年九月亚·维特别尔格绘的作者的肖像，作者的父亲作为生日礼物送给娜达丽。

手镯[1]，我真愿意一步跨过一百年，看看那时它们的命运怎样。那些我们当作神圣的东西，那些医治了我们身体和心灵的东西，那些我们谈论过的东西，那些在我们分别的时期给我们彼此代替过对方的东西，所有这些武器我们用来防止人们的侵犯、防止恶运的打击、防止自己的损害，在我们死后它们会怎样呢？它们还会保存着它们的力量、它们的灵魂吗？它们会唤醒、会温暖别人的心吗？它们会讲述我们的故事、我们的痛苦、我们的爱情吗？它们会得到哪怕一滴眼泪作为酬劳吗？我想到你的画像有一天会挂在不知谁家的书房里，没有人注意，或者说不定一个小孩会拿它来玩，打碎玻璃，损坏面貌，我多么难过。”[2]

我的信却不是这样：[3] 在饱满的、热烈的爱情的中间透露出自怨自艾的、追悔的痛苦声音，尔——太太的无声的责备

---

① 手镯：作者一八三七年三月三日给娜达丽的信中提起收到她送来的手镯，这是她用自己的头发做的，她还写了这样的话：“我拿我四分之三的辫子都放在这里了。”

② 这一段话是从娜达丽一八三七年三月二十八日和二十九日写的两封信中摘抄下来凑在一起的。

③ 娜达丽的信和我的信在文体上相差很大，特别是在我们开始通信的时期；后来逐渐接近，最后就一致了。在我的信中除了真挚的感情外，还有不自然的造句，雕琢的、卖弄的文字，看得出来雨果派和法国新小说家的影响。她的信中就没有这样的东西；她的语言朴素，有诗意、真诚，看得到的唯一的影响就是福音书的影响。当时我总想写得漂亮，却写得很坏，因为这不是我熟悉的语言。在脱离实际的环境中生活，而又读书过多，反而使一个年轻人长期不能自然地、朴素地讲话、作文；一个人只有在他的文体确定而且形成自己的风格时，他的智力才开始成熟。——作者原注。

折磨着我的心，在我的明朗的感情上投下了阴影；我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说谎的人，可是我并没有讲过假话。

我怎么承认呢，怎么在一月里对尔——太太说我八月里向她求爱是错误呢？她怎么能相信我的话的真实性呢？要说是有新的爱情倒容易使人相信，说是变了心，倒更简单。那个不在这里的人，她的遥远的形象怎么能和眼前的这一位竞争呢？另一股新的爱流怎么能通过那个熔炉出来变得更明确、更强烈呢——这一切我自己也不明白，不过我觉得这一切全是真实。

而且尔——太太本人用蜥蜴般的难以捉摸的机灵敏捷回避了任何认真的解释；她觉察出了危险，一面在寻找谜底，同时又避开事实。仿佛她已有预见我的话会揭露可怕的真情，这样一来一切都完结了，因此她总是在她感到危险的时候打断了话头。

她起先观察她四周的人，有几天她把一个年轻、活泼、动人的德国少女当作她的情敌，其实这个少女在我的眼里不过是一个小姑娘，我喜欢她，我同她接近，不感到拘束，正因为我们在一起彼此都没有想到爱情。过了一个星期她看出来葆琳娜[①] 一点也不危险。不过我还得讲几句葆琳娜的事情，才可以把故事讲下去。

在维亚特卡社会救济厅的药房里，药剂师是个德国人，这

① 葆琳娜：即波利娜·特罗姆彼得尔，作者在维亚特卡流放期间的朋友，后来同斯克沃尔左夫结婚。

是不足为奇的。我们奇怪的是他的助手是俄国人，却姓包尔曼。我同这个人认识了；他的妻子是维亚特卡一个小官吏的女儿，她的辫子是我所见过的最长、最密、最好看的一条。起初药剂师费迪南·鲁尔科维乌斯本人不在，我经常同包尔曼一起喝“冒汽的饮料”和由药剂师艺术加工的“健胃的”药酒。药剂师到勒佛尔[1] 去了，他在那里认识了一个年轻姑娘，向她求婚。她刚刚才认识他，就答应同他结婚，这是一般少女尤其是德国姑娘常有的事；她一点也没有想到他要把她带到什么样的荒野里去，可是结婚以后他们要动身的时候，她就害怕起来，又感到绝望。药剂师为了安慰他年轻的新娘，便邀请她的一位远亲，一个十七岁的少女陪伴他们到维亚特卡。这位年轻姑娘并不知道“维以亚特卡”是个什么地方，就更轻率地答应了。两个德国姑娘都不会说一句俄国话，而在维亚特卡，会讲德国话的人不到四个。连中学的德语教师也不懂德国话，这件事使我非常吃惊，我居然直率地问他怎么教德语。

“按照文法书、按照对话书[2] 教。”他回答道。

他向我说明他原来是数学教师，但是数学课并不缺少教师，他就暂教德语，因此他只拿一半的工资[3]，两个德国姑娘

---

① 勒佛尔：即爱沙尼亚的首府塔林。

② 对话书：指学习外语的会话手册一类的书。

③ 然而“开明的”地方当局却任命著名的东方学专家威尔尼柯夫斯基做维亚特卡中学的法语教员，威尔尼柯夫斯基是柯瓦列夫斯基和米茨凯维奇的朋友，因费拉列特派一案被判处流放罪。——作者原注。

正无聊得要死，看见一个会讲德国话的人，虽然他讲得不好，但至少可以使人明白他的意思，她们非常高兴，就请我喝咖啡和一种清凉饮料〔德语：Kalte Schale〕。她们把她们所有的秘密、愿望和希望全告诉了我；两天以后她们就拿我当作朋友，而且用甜食、桂皮糕来招待我。两位姑娘都是受过很好的教育，也就是说她们把席勒[①]记得很熟，会弹钢琴、唱德国歌曲。她们两个人相同的地方就只是以上这些。药剂师的夫人有高高的身材，金黄色头发，动作慢缓，人长得十分好看，却常常面带睡容，显得无精打采；她非常善良，有这样身体的人的确也很难做坏事。她始终相信她的丈夫就是她的丈夫，她平静地、不变地爱着他，下厨房、洗衣服，在空闲时候读小说，而且及时顺利地给药剂师生了一个身体虚弱的金黄色头发的女儿。

她的朋友身材矮小，皮肤略带黑色，是个淡褐色头发的女人，非常健康，一双黑色大眼睛，有一种独立自主的气概，是一般老百姓的健壮美的典型；她的举止和谈话中都显示出旺盛的精力，有时候药剂师(他是一个枯燥无味、十分吝啬的人)对妻子讲了几句不礼貌的话，他的妻子听了嘴唇上落着微笑，睫毛上现出泪珠，葆琳娜在旁边红着脸狠狠地瞪了正在生气的

费拉列特派：又称为“品德之友”，十九世纪最初二十多年中间在维尔纳大学成立的波兰学生的秘密团体。他们的宗旨是增长学识、救济穷人、宣传正直、公平的理想。诗人米茨凯维奇就是这个团体的成员。一八二二到二三年他们受到迫害，成员被逮捕，有的人给判处徒刑，有的人被流放出去，还有一些人就给送到军队服兵役。

① 席勒：参看第一一三页注③，这里指席勒的著作。

药剂师一眼，他立刻平静下来，装出忙碌的样子到实验室去了，在那里他把各种不干净的东西捣碎，拌在一起，用来恢复维亚特卡官员们的健康。

我喜欢这个能够保护自己的天真的姑娘，我也不知道事情是怎样发生的，可是我对她第一个讲了我的恋爱，并且给她看了几封娜达丽的来信。只有长年生活在陌生人中间的人才懂得重视这种真诚的谈心。我很少谈我的感情，但有些时刻我非常愿意吐露自己的胸怀，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甚至现在还是如此。何况那个时候我只有二十四岁，而且刚刚明白我在恋爱。我能够忍受分离，我也受得了沉默，可是遇见另一个单纯到毫无做作的刚成年的少女，我就忍不住向她吐露我的秘密。她因为这个多么感谢我，她对我也有很大的帮助！

维特别尔格同我的谈话总是严肃认真的，有时候也使我厌烦；我同尔——太太的那种难以忍受的关系折磨着我，使我在她面前感到狼狈。晚上我常常去找葆琳娜，朗读些无聊的小说给她听，听她那响亮的笑声，或者听她特别为我唱的《外国的姑娘》，[1] 她唱这首歌的时候，她和我都想到另一个遥远地方的姑娘；云散了，我心里充满真实的快乐与宁静的舒畅，安静地回到家去。这时药剂师已经泡制好他最后的合剂，涂好了他最后的膏药，就过来拿一些荒谬的政治问题来麻烦我——不过总是在我喝了他配的“药”，吃了 der Frau Apothe ker in〔德语：药剂师太太的〕白白的小手做的鲱鱼色拉之后。

---

[1] 《外国的姑娘》：席勒的诗。

……尔——太太很痛苦，我由于可怜的软弱等待着时间给我带来意外的解决，就让我这种半欺骗的状态延长下去。我上千次地想到尔——太太那里去，跪倒在她的脚下，对她讲出一切，忍受她的愤怒和她的轻视。然而我害怕的不是她的恼怒(我倒高兴接受它)——，是她的泪水。一个人要对坏事有丰富的经验，才能够受得了女人的眼泪，才能够在热泪还顺着发烫的脸颊流下来的时候怀疑它们是否真实。何况她的眼泪是真诚的。

许多时间就这样过去了。外面在传说我的流放期快要结束。看来我坐上马车奔向莫斯科的日子近了；熟人的面孔在我的眼前闪现，在这些面孔中间，而且超过这一切的是我朝夕思念的脸庞；但是我刚刚沉醉在这样的美梦中，我就看见尔——太太的苍白的、哀愁的面颜，她仿佛坐在马车里我的对面，满眼泪水，带着痛苦和责备的眼光望着我，我的快乐消失了，我同情她，我非常同情她。

我不能再处在这种尴尬的境地，下了决心，鼓起勇气要冲出去。我给她写了一封完全的自白书。我激动地、坦白地告诉她全部真相。第二天她没有出房门，说是有病。一个罪人由于害怕被揭发所感到的痛苦，我那一天完全感受到了。她又患了神经麻木症——我不敢去看望。

我需要更多的自省；我把维特别尔格拉来同我一起关在我的书房里，对他讲了全部的事情。起初他吃了一惊，随后他不像审判官的样子，却用对待朋友的态度听我讲下去；他不拿问话来折磨我，不向我宣传陈腐的道德，只是想帮助我设法减

轻缓和这次的打击——只有他一个人能办到。他对他所爱的人的感情从来是十分热烈。我本来害怕他的严格作风，然而他对我和对尔——太太的友谊超过了这个。对，我可以把这个不幸的女人托付给他，是我完全毁了她这凄惨的一生；她在他的身上找到了强大的精神支持和权威。尔——太太像尊敬父亲一样地尊敬他。

早晨马特威依交给我一封信。我几乎整夜都没有闭眼，我焦急不安地用打哆嗦的手启了封。她用柔顺的、高尚的和深切哀伤的调子给我写信；我的雄辩的花朵掩盖不住下面的毒蛇，在她那些和解的语言中间还可以听见一颗受伤的心压低的呻吟和用了最大努力忍住的痛苦的叫喊。她为我的新生活给我祝福，祝愿我幸福，她称娜达丽做"妹妹"，向我们伸出手来，表示忘记过去，表示今后的友谊——好像是她有错！

我反复读着这封信，边读边哭。Qual cuor tradisti!〔拉丁语：你背叛了什么样的心！〕

以后我还见过她；她向我伸出友谊的手，可是我们在一起感到拘束，好像我们两个人都隐瞒了什么，每个人都害怕提到什么事情。

一年前[1] 我听到了她的噩耗。

我离开了维亚特卡，关于尔——太太的回忆长时间折磨着我。以后我静下心来，就动手写一篇以尔——太太为主人公的中篇小说。我描写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的一个年轻贵

[1] 一年前：指作者写这篇回忆的时间的一年前，即一八六〇年。

族,他抛弃了爱着她的女人,和另外的女人结了婚。那个爱他的女人憔悴而死。她的死讯对他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变得忧郁、深思,后来甚至神经错乱。他的妻子是温顺和自我牺牲的模范,她想尽了办法,在他暂时平静的时候带他到处女修道院去,同他一起跪在不幸女人的墓前要求她的宽恕和保佑,从修道院的窗里传来祷告词,轻柔的女性的声音唱着宽恕的歌,——年轻贵族的病治好了。中篇小说没有成功,[1] 我写这篇小说的时候,尔——太太并不曾想到去莫斯科,只有一个人猜到我和尔——太太之间的关系,那就是“永久的德国人”[2] 卡·伊·仲伦倍格。一八五一年我母亲遇难[3] 以后,我们就没有再得到他的消息。一八六〇年一位旅行者告诉我他认识八十岁的卡尔·伊凡诺维奇,给我看卡·伊写的一封信。在这信的“附言”里那个人告诉他尔——太太病逝,还说我哥哥[4] 把她葬在新处女修道院里面!

我不用说,他们都没有读过我的中篇小说。

---

[1] 中篇小说:这篇小说没有写完,题目是《叶列娜》,写于一八三六到三八年,作者给娜达丽看过。

[2] “永久的德国人”:即“流浪的德国人”,指仲伦倍格,他作过作者好友尼·奥加略夫的家庭教师。这个外号是从“流浪的犹太人”的典故来的。

[3] 遇难:指轮船沉没、作者的母亲葬身海里。

[4] 哥哥:指叶戈尔·伊凡诺维奇,长期病人。由于奇怪的巧合,他好久就爱上了美德杰娃。——法译者注。

译 后 记

亚历山大·赫尔岑是十九世纪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思想家和作家(1812—1870)。我正在翻译他的主要著作《往事与随想》,这是他的回忆录,作者自己说它是"历史在偶然出现在它道路上的一个人身上的反映"。在这部书中作者把他个人的生活事项同具有社会历史意义的一些现象有机地结合起来了。本书内容很丰富。在前四卷中展开了十九世纪上半叶俄国政治、社会、文化生活的景象。在这样一幅宽广的历史画面上活动着各式各样的人物,从达官显贵、各级官员、大小知识分子、各种艺术家到听差、仆婢、农奴。作者善于用寥寥几笔勾出一个人物,更擅长用尖锐无情的讽刺揭露腐败的官僚机构和现实生活中的怪人怪事,从各方面来反映以镇压十二月党人起家的尼古拉一世统治的黑暗恐怖的时代。他以坚定的信心和革命的热情说明沙皇君主制度和农奴制度是俄国人民的死敌,它们必然走向灭亡。

本书第一卷《育儿室和大学》和第二卷《监狱与流放》已由我译出,编为《往事与随想》第一册,即将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刊行。在这里发表的是本书第三卷《克利亚兹玛河上的弗拉基米尔》的前两章。

我的译文是根据苏联科学院出版的三十卷本《赫尔岑全集》第八卷(一九五六年)和康·加尔纳特夫人的英译本第二册翻译的,主要是依靠英译本。这次发表前,我又根据汉弗莱·希金斯修订过的英译本(一九六八年伦敦版)第一册和达利雅·奥立维叶翻译的法译本(一九七四年瑞士洛桑版)第一册校改了译文。译文中的注释除了注明"作者原注"者外,都是中译者增加的。

巴 金 一九七九年九月十六日

附 录

致项星耀信

一 (1988.2.9)

星耀同志:

信收到。我患感冒,最近稍好一些,因此未能早写回信。关于赫尔岑回忆录出版的问题,我没有意见,请您自己决定吧,对于读者,当然一次出齐最好。英译本可以借给您,倘使您方便,请您到我家来,坐一个小时,顺便把书带去,时间就定在本月十一日(星期四)下午三点半,可以吗?

祝

好!

巴　金 二月九日

二 (1990.11.21)

星耀同志:

我长期患病，精力衰退，收到来函，无法早写回信，请原谅。

朱曼同志带交的书也已收到，谢谢。我托他带一包书给您，这是在港台新出的译文选集，纪念本，流传不多，奉赠一部，表示对您全译《往事与随想》的敬意。尊译出版后如能赐寄一部，那就感谢不尽了。

祝

好！

巴　金 九〇年十一月廿一日

三 (1990.12.23)

星耀同志：

信悉。我也想写点文章谈谈赫尔岑回忆录的事，可是我长期患病，靠药物延续生命，最近几个月实在无法写出什么，请原谅。希望几个月后病情有好转，能执笔写点什么，那时会跟您联系。

祝

好！

巴　金 十二月廿三日

四 (1992.3.31)

星耀同志:

二十六日来信收到。知道赫尔岑的《回忆录》即将发排,我十分高兴。您的全译本仍用《往事与随想》的译名,我当然同意,而且我应当感谢您替我偿还了一笔欠了几十年的大债,(我一九二七年就计划翻译这部大书! 后来又有朋友帮忙,您也是其中之一,我只译出五分之一;而且"随想"二字还是采用一位读者朋友的建议。)赫尔岑是我的"老师",他的"回忆"是我最爱读的一部书。但是几年来我疾病缠身,写字吃力,有话写不出,也无力写,只好等我身体养好点,或者您的译文出版时,再拿起笔写出我的喜悦。再一次感谢您。

祝

好!

巴　　金 三月卅一日

五 (1993.12.22)

星耀同志:

来信读悉,我早就该给您写信了,谢谢您的信,也谢谢您的书,特别是厚厚的三册赫尔岑的大书,您终于把它们送到中国书市来了。在这个金钱重于一切、金钱万能的时代读到您介绍的好书,我实在高兴。可是我现在又老又病,不但写一篇

推荐好书的文章，连一封短信，描写二十年代我在沙多—吉里阅读赫尔岑著作时的激动，也感到困难。朋友们庆祝我"九十华诞"，我知道自己越是接近衰亡，已经到了个人生活不能自理、写字习惯把笔划重叠放在一起的地步了。以后怎么办？我往哪里去？

我还想读一遍赫尔岑的书，但是疲劳，无时无刻不感到的疲劳会干扰我读完这部书，因为我的日子不多了。

写这封信只为了两件事情：一、感谢您的赠书；二、请您原谅我没有能写出介绍赫尔岑的文章。但是您我都相信再高的黄金潮也冲不垮崇高的理想，用不着我再在这里唠叨了。我活下去，就要反对"拜金主义"。

祝

好！

巴　金　十二月廿二日

致臧仲伦信

一（1978.3.23）

仲伦同志：

本月十九日我回到上海，才读到您月初的来信。谢谢您的信，也谢谢您那些意见。我回来后患感冒在家里休息，精神不好，一时也不能一一查对。我翻看了两三处，如“战斗”一共继续了四天四夜，“哥哥们”的血，都是照英译本译的。但有一处“创伤既然相同，伤口便长合得快”，一看就明白是我弄错了。不能怪英译者。我当时就感到不对，但自己也不理解这一句的原意，还是译错了。像这样的例子还不少。我接受您的意见，将来重译《家庭戏剧》时，一定参考您的意见修改译文。因此我希望您把您的全部意见寄给我看看。此外我还有一个请求，您愿意不愿意，有没有时间替我校一遍《往事与深思》的新译文。这部书的第一卷、第二卷我已译完，准备看一遍后送到出版社去。倘使您愿意校阅它，我就把底稿寄上。我翻译这部书，也感到吃力，是边译边学习，翻译也是为了学习。我写第一部小说时正在读这部书，从我的文笔上也看得出赫尔岑的影响。我还是要慢慢地译下去，译完它，也希望得

到更多人的帮助。对您的意见我再一次表示感谢。

祝

好！

巴　金 二十三日

二（1978.7.30）

仲伦同志：

七月九日来信早收到。我的生活还是十分忙乱，因此没有能写回信，很抱歉。您的意见很好。我这十几天在校改《往事……》，您的意见我已看到第六章，百分之九十我都采纳了。我觉得您不仅相当熟悉这部书，而且您的确是"肯花时间，肯下功夫"。您的意见对我有大的帮助。我已把前五章修改过的译稿和您的意见交给译文出版社编辑（也是我这部译稿的责任编辑）周朴之同志了。您的意见以后会保存起来，因为您也为这部书花了不少功夫。最近周朴之同志通知我希望能在八月内发稿，我答应九月中旬改完交稿。他提的意见我在八月中旬可以解决。因此写这信问您，是否可以把您的意见分批地提前寄来，以便我能够在九月初校改完毕，按期发稿。请您考虑。我只是讲我的希望，如来不及，迟一点交稿也不要紧，请不必介意。

祝

好！

巴 金 七月三十日

三 (1978.8.8)

仲伦同志:

两信和校稿都收到,谢谢。我最近又忙起来了,因此工作不但搞得慢,而且草率,幸好得到您和周朴之同志的帮助,否则我不敢把译文拿出去了。关于书名您提的意见有道理,我正在考虑,下个月发稿的时候会决定的。英译本作"My past and thoughts",thoughts用得很对,那就是"随想"之类吧。

您第二函中提到的更正的地方,我会照您的意思改正。您看得仔细,认真,这是值得学习的。有时候我没有接受您的意见,我保留着我原来的译文,可能我还想保留我写文章的"风格"(?)。我常常把翻译当作"再创作",一面学习,一面也把自己的感受和体会放进去。但我现在也只能说是试译而已。

别的话下次再谈。

祝

好!

芾 甘 八月八日

四 (1978.9.2)

仲伦同志:

信和稿早收到，谢谢。没有早写回信，只是因为我为发稿事花去我所能支配的时间（我中间我还去过北京一趟，住了三天，开完会就回来了）。昨天校完了全稿，交给周朴之同志，他还得做些技术上的工作，九月内发稿，不会有问题。

对您的工作，我没有话说，您很认真，也很细心。您提出的校改意见我大部分都采用了。我没有采用的大都是“妙趣横生”、“我行我素”、“凡夫俗子”一类的我国习惯语，或者北京的土话。这样改：虽然文章流畅些，但和全书不大协调。我把您的意见也交给周朴之同志了，他整理全文时，还可以参考。总之，这部书不大好译，我总希望能搞得好一点。

书名决定改为《往事与随想》。感谢您提醒我。我一直不满意“思考”、“沉思”、“深思”这类的译法，而且也不满意赫尔岑在书中的一些议论。却始终没有想到改变书名。用“随想”二字，适当得多。明明是随时的感想。

第三、四卷还是要请您校改，但估计最快也在一年以后了。

还有一件事得在这里讲一下，请您不要介意。我知道您是不在乎的。过去出书不付稿费，用不着提。今后有稿费了，明年出书时我要出版社付两成校对费。届时请您不要客气。

祝

好！

巴　金 九月二日

五（1978.9.25）

仲伦同志：

信早收到，我最近还是很忙乱，写了《往事》的《后记》，又写了些文章，因此没有早写回信。现在我已把《往事》第一册的稿子交给译文社的周朴之同志了。我还要看一次校样。这样第一册的工作就可以告个段落了。

校对费的事要到明年才会办好。您也不必客气，到时再说吧。本来出版社是不发稿费的，我也不愿拿稿酬。但现在照制度办事，明年出书要给稿费，我也不能拒绝。那么您也不便谢绝了。

我在《后记》中提了您的名字，是表示感谢的意思。不止您一个人，我还提了另外几位朋友的名字，他们对我这个工作都帮过忙。这篇《后记》可能在《吉林文艺》上发表，发表时都用××代替，因为我来不及事先征求大家的同意。但在书上印出真名是不要紧的，因为这是真实情况。

感谢您查出"四贼醋"的意思。现在还有一个问题要请您帮忙解决。原书107页末段：

"不管是农奴，还是尚未被所属村庄释放的农民，只要通过了入学考试，每个人都可以进大学。"

我的原意是：

"除了农奴或者被所属农村公社开除出来的农民……"

我是根据英译文翻译的。（Its doors were open to every-

one who could pass the examination, who was neither a serf, a peasant, nor a man excluded from his commune.)后来在《世界文学》发表时一位朋友替我改成现在那个样子。最近发稿，我和周朴之同志考虑一阵，还不能解决。还是请您帮忙，您看怎样翻译好。希望您出个主意。

别的话下次谈。

祝

好！

李芾甘 九月二十五日

六（1978.11.15）

仲伦同志：

来信早收到。最近我身体不大好，来找的人又不少，因此抽不出写信的时间，请谅。您要我介绍可译的书，据我看可译的书很多，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名著还有不少没有译成中文，高尔基的作品也还有些需要重译。您如果直接写信跟人民文学出版社外文部联系，他们可能推荐一些选题。我只知道这两个出版社要出一种西方文学名著丛书。听说最近在开会讨论，详情我也不知，也未看到书目。我看，只要是名著，只要是好书，您译出来总有出版的机会，我也可以向出版社推荐。

别话下次再谈。

祝

好！

巴　金 十五日

七（1988.7.9）

仲伦同志：

来信收到。您要《随想录》合订本，我这里还有，已经挂号寄上了，请查收。项星耀同志的全译稿一次在人文出齐，对读者来说是件好事，他这样做是得到我同意的，而且我把英译本借了给他。我已经没有精力、也没有时间翻译下去了。我喜欢赫尔岑的回忆录，自己不译，就不应当阻碍别人翻译。让读者早日读到全书，才是我的心愿。现在条件差，出书不易。但过三五年情况会有改变，赫尔岑的书出版几种译本是有销路的。您有兴趣，您可以译下去，也可以从头译起。您会译得很好。好的书不妨有几种译本，但目前还有困难。那么就让星耀同志的译本早日问世吧。我的生命是靠药物来延续的，我担心自己等不到那一天了。

祝

好！

巴　金 八八年七月九日

八（1994.8.2）

仲伦同志：

来信收到。好久没有和您通信了，我写信一直很困难。

最近刘麟同志协助王仰晨同志编辑《全集·书信集补遗》,我曾托他代我向朋友们索回一些旧信,希望能得到您的帮助。

《十月》杂志打算发表我的旧信,只要您同意,当然可以。不过希望能给我看看(复印件),有无不妥的地方,我担心伤害别人。

项星耀同志翻译的《随想》已经出版了,书店宣传不够,因此您也不知道。《随想》全书一次出齐,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您我都曾为这部书尽过力,应当多宣传、介绍。

祝

好!

巴　金 九四年八月二日

致周朴之信

一 (1978.9.8)

朴之同志:

仲伦同志来信,对您上次提的两个问题作了说明。现在把原信转给您看看,用后仍请寄还。

我现在开始考虑写后记,可能本月中旬写好。到时挂号寄上,请勿念。

祝

好!

巴　金 八日

二 (1978.10.20)

朴之同志:

来信收到。巫宁坤同志的通信处是:合肥安徽大学外语系,请转告汉亮同志。

赫尔岑的照片,下个星期内可找出来,届时会通知您。

倘使方便,还要请您代购《车轮》和《雪球》各一册,谢谢。

祝

好！

巴　　金 十月廿日

三 (1978.10.22)

朴之同志：

前信想已收到。巫宁坤同志今天有信来，他在安徽师范大学外文系教书。我在上一信中写错了他的通讯处，不知您是否已经告诉了汉亮同志，请您代为改正。

照片过两天找出来，届时打电话通知您。

此致

敬礼！

巴　　金 十月廿二日

四 (1979.2.13)

朴之同志：

《后记》校样看过寄上，请您再看一遍，有没有还需要改正的地方。谢谢。正文校样如能给我看一遍，当然很好。要是有困难，那就算了。一切拜托您。

祝

好！

问候昳丽同志。

巴　金 十三日

五 (1979.3.5)

朴之同志：

从北京回来，看到您的信。我病了好几天，拖至今天才写回信，请原谅。德洪同志来谈起您的病情，他要我劝您：一、多休养；二、注意营养。请您考虑。

我下月初要去法国访问(两周)，本月内赴京集中，《往事》的校样只好以后再看了。最近生病，又忙，翻译的工作暂时停下来了。

请您好好休养，等我从巴黎回国，会来拜望您。

祝

好！

问候您的夫人！

巴　金 三月五日

六 (1979.6.9)

朴之同志：

您好！有一件事拜托您，请您代问出版社：我想把第一部的作者画像换上一幅彩色画像，也是作者的女儿娜达丽绘的。

画像的彩色照片是作者的外曾孙送给我的。他后来还送了一幅黑白照片，但不大清楚，还是彩色照片好。倘使出版社同意换彩色照片，就请派人到我处取去。要是不换，通知我一声就行了。

祝

好！

问候昳丽同志！

巴　金 九日

七（1979.6.27）

朴之同志：

来信收到。赫尔岑彩色画像下面请印上这样的字句：

赫尔岑画像　　娜达丽绘 1865 年

巴黎 Noël Rist 城

至于如何排列，请您斟酌决定。

天气太热，请多多保重。

祝

好！

问候昳丽同志。

巴　金 二十七日

我已通知出版社：第一册出版后，请从稿费中抽出二成直

接汇给北京大学俄语系臧仲伦同志，作为该册的校对费。也请您对出版社讲一声。拜托拜托。　　又及

八 （1979.6.30）

朴之同志：

刚才昳丽同志来过电话，我已回答了。我记得娜达丽没有结过婚，她一直住在西欧，现在查一下，果然是这样。那么署名就这样子吧：

娜达丽雅·亚历山彼得罗夫娜·赫尔岑绘。

天热，请保重身体。

祝

好！

巴　金 卅日

九 （1979.7.2）

朴之同志：

信悉。我看，就照您的第二个建议干脆用"娜达丽"吧。

匆复。祝

好！

问候昳丽同志

巴　金 二日

家庭的戏剧

〔俄〕赫尔岑 著

《家庭的戏剧》,一九四〇年八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一九四三年一月桂林文化生活出版社一版;一九四七年四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再版(以上书名均作《一个家庭的戏剧》)。一九五四年六月上海平明出版社初版;一九五五年三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初版;一九六二年七月上海文艺出版社一版。

第一章

一八四八年

“了解事情太多，却没有力量去处理它们——没有毅力对甜的、苦的同样地接受，而在苦的面前退缩——这多可怜！”（娜达丽[①] 在一八四六年年底写信给奥格辽夫[②] 说。）“我了解那一切太透彻了，可是我仍然不能使自己过得快乐，而且连放任也做不到。对我身外好的事物我非常了解，我能够适度地尊重它，可是我的灵魂中只有那阴郁的思想，它折磨我，使我痛苦。请你援助我，跟我一起说，没有一样东西使你满足，你对什么，对什么都不满意，然后你来教我怎样享乐，怎样高兴，怎样过得快乐，——我有着一切可以使我快乐的机会，只要我能够发展我这方面的能力就好了。”

这些话和我在别处引用过的她这个时期的日记的片段都是在我们的莫斯科争执的影响下写的。她的忧郁的一面又达

---

① 娜达丽·亚历克桑特洛夫娜·查哈林娜（1817—1852），赫尔岑夫人（查哈林娜是她母亲的姓）。

② 尼可拉·奥格辽夫（1813—1877）：俄国进步诗人，赫尔岑的莫斯科大学的同学，他一生的好友。

到了最高峰；格拉诺夫斯基[①] 一家人的疏远使娜达丽非常难过，在她看来我们的整个圈子都崩溃了，只剩下我们孤零零的和奥格辽夫在一起……那个差不多还是小孩的女人[②]，娜达丽爱她像爱自己的妹妹一样，她比别人跟我们更疏远。因此，以任何代价脱离这个圈子的事在当时便成了娜达丽的坚持的 Idée fixe〔法语："固执的念头"或"定见"〕了。

我们离开了俄国。[③]

最初是巴黎的新奇景象，其次是觉醒的意大利和革命的法兰西，这些占据了我们整个的心灵。个人的疑虑让历史征服了。

这样我们住到了六月的日子[④]。甚至在那些可怕的、流血的日子以前，五月十五日这天就打破了我们的重新升起来的希望。

"二月二十四日[⑤] 以来还不满三个月，人们还穿着他们堆障碍物时候穿的皮鞋，然而法兰西已经疲乏不堪，她愿意屈

---

① 丁·格拉诺夫斯基(1813—1855)：俄国历史家，莫斯科大学教授。他和赫尔岑因学术上的讨论发生隔阂，后来更发生思想的分歧。莫斯科的争执，即指和友人疏远的事。

② 指 E.Б. 格拉诺夫斯加亚，格拉诺夫斯基的妻子，她比娜达丽小七岁。

③ 赫尔岑全家在一八四七年一月十九日由莫斯科出发，三月底到达巴黎。

④ 指一八四八年六月起义。在二十三日至二十六日的四天里，巴黎工人跟资产阶级发动政府的国民军在巴黎城内外巷战，失败，被捕者一万余人，其中多数被枪决。

⑤ 指一八四八年的二月革命。二月十四日巴黎临时政府成立，宣布共和，国王路易·菲力浦逃往英国。

服了。"[①]十五日[②] 那天并没有流一滴血,这是一个预报大风暴的晴天霹雳。在那一天我好像用一种洞察力看透了资产阶级的心灵,看透了工人的心灵,我感到了恐惧。我在两方面都看到强烈的流血的渴望——工人方面的长期积累的憎恨和资产阶级方面的贪婪残忍的自私。这样的两个阵营不能够同时存在,每天这么接近地挤在一起,——在家中,在街上,在工场内,在市场上。一个可怕的流血的冲突(它带来的不是什么吉兆)逼近我们了。别人都不曾看见,只有那些正在忙着促成它的保守派[③] 明白;我最亲近的朋友都带着微笑谈起我的神经过敏的悲观论。对于他们,端起枪死在障碍物上倒比勇敢地面对事实容易得多;他们通常不想去了解发生的事情,只愿意战胜他们的反对者;他们只想按照自己的主张去做。

我跟大家越离越远。我受到一种空虚感觉的威胁,——但是突然在一个大清早,街上响起鼓声和人群集合的声音,报告灾祸开始了。

六月的日子和以后的日子是很可怕的;它们造成了我一生的转折点。我要在这里重复一个月后我写过的几段话:

"女人拿痛哭来减轻她们心里的痛苦;我们却不能哭。我愿意用文字代替眼泪,——我不是要描写和解释这些流血的

---

① 《法意两国的通信》第九篇。——作者注

② 在五月十五日,群众侵入国会,在骚乱中宣布将国会解散,同时成立社会主义的临时政府,不久国民军开到,将群众驱散。

③ 六月起义可说是国会促成的,国会要统治全法国,而且它选出后的第一炮便是发布停闭国家工厂的法令,这更激起工人的愤怒。

事件，我只想谈谈它们，把话语、眼泪、思想和愤怒尽情倾吐。我怎么来描写，来搜集证据，来判断呢！——我耳边还响着枪声、马队的践踏声、炮车经过死寂的街道的隆隆声；个别的详情细节不时地在记忆中浮现：一个受伤的人躺在担架上，一只手按着腰，几滴血流到手上；装满了死尸的大马车，双手绑着的俘虏，巴士底广场上的大炮，爱里赛大街上圣·德尼门的兵营，还有，在阴惨的黑夜里的人声：'哨兵，注意！'"我的脑子在发火，我的血在沸腾，我怎么能够描写那些事情呢？

"束手坐在家中，不能够走出大门外，只听见四周远远近近的枪声、炮声、叫声、鼓声，知道在你近旁血在流，人们被刀砍、枪刺，知道人们就在你旁边死亡——这事情已经可以杀死一个人，或者逼他发狂了。我没有死，可是我变老了；在六月的日子以后我好像从一场大病恢复过来一样。

"然而那开始却是多么堂皇。二十三日下午四点钟，午饭前的时候，我沿着赛纳河岸散步，向市政府走去；店铺关着门，一队一队的国民军带着凶恶的面孔朝各个方向开走；天空布满浓云，落下一阵小雨。……我在新桥站住了，一道强烈的电光从浓云中闪出来，雷声接连地响着，在这一切中间我还听见圣许尔毕斯礼拜堂钟楼的拖长的有规律的警钟，又一次被出卖了的无产阶级用警钟声号召他们的弟兄拿起武器来。礼拜堂与河边的一切建筑让几道从密云下面射出来的灿烂的日光照得非常好看；鼓声在四面八方响起，炮队从加鲁塞尔广场慢慢地开过来。

"我听见雷声和钟声交响，却惋惜我不能够饱览巴黎的全

景,——好像我在向它告别似的。在那一刻我热烈地爱着巴黎;这是我对这个大城市的最后的敬礼了;在六月的日子以后,它在我的眼里变成了可恨的东西。

"在河对岸,人们正在大街小巷里堆障碍物。我现在仿佛还看见那些搬石头的人阴暗的身形;女人和小孩在给他们帮忙。一个年轻的工艺学校学生爬到一处显然是堆好了的障碍物上,插起一面旗帜,用悲痛、严肃的低声唱起了《马赛曲》,所有那些堆障碍物的人也加入合唱,从障碍物石头后面升起来的伟大歌曲的合唱打动了人们的心……警钟一直在响。炮车带着隆隆声经过桥头,伯多将军[①] 站在桥上用望远镜观察'敌人'的阵地……

"在那个时候还有完全阻止冲突的可能,那么还可以拯救共和国与全欧洲的自由,还可以维持和平。但是那个愚蠢、笨拙的政府不能够这样做,议会不肯这样做,而反动派却渴望着复仇、流血,和报偿二月二十四日的事情,《国民报》[②] 的老板又供给他们以执行的人。……

"六月二十六日的晚上,在《国民报》征服了巴黎以后,我们听见每停一会就响起来的有规律的枪声。……我们互相望着,大家的脸上都没有一点人色。……'在枪毙人,'我们异口

① 伯多(M. - A. Bedeau, 1804—1863):法国将军,参加过镇压六月起义的行动。

② 《国民报》(*Nationale*):巴黎的日报,是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的机关报。在路易·菲力普统治时期,一般反对政府的资产阶级便团结在《国民报》的周围。二月革命后《国民报》一派在临时政府中占多数。

同声地说，都掉开眼睛不再彼此相看了。我把我的前额压在玻璃窗上。这样的几分钟会激起人十年的憎恨，一生的复仇：宽恕这几分钟的人是应该倒楣的！

“战斗一共继续了四天四夜，以后便是安静的戒严状态；街道仍然封锁，很难看见一辆马车；傲慢的国民军兵士们脸上带着残暴和愚蠢的凶恶表情，守护着他们的商店，拿枪刺和枪托来威吓人。一群一群喝醉酒的凯旋的青年机动队[①]在街上游行，唱着《为祖国死》[②]，那些十六七岁的小孩夸耀着他们手上染的哥哥们的血；女店主从她们的柜台后面跑出来，把花抛给这班战胜者来祝贺他们。加威聂雅克[③]把一个屠杀了几十个法国人的坏蛋放在他的马车里到处展览。资产阶级胜利了。然而在城外圣安东乡的房屋仍然在冒烟，炮弹打坏的墙壁倒塌了，房间的内部暴露出来，给人看见石头上的伤痕，残破的家具还在燃烧，穿衣镜的碎片还在发光……屋主到哪儿去了呢？居住的人到哪儿去了呢？没有一个人想到他们。……人们在有些地方撒灰沙，可是血迹还看得见。先贤祠附近不许人通过，因为先贤祠给炮弹打坏了；大街上张着帐篷，马在啃爱里赛大街上平日小心培养的树木；在协和广场上到处都是干草、胸甲骑兵的胸甲和马鞍，兵士们在推勒里王宫花

① 青年机动队（Garde mobile）：一八四八年法国有这样的一种组织。

② 《为祖国死》：当时流行的爱国歌。

③ L.E.加威聂雅克（1802—1857）：当时的陆军部长，残忍无情地压服了六月起义。

园里栅栏旁边煮汤。甚至在一八一四年巴黎[①] 也没有见到这种景象。

“又过了几天——巴黎开始恢复了它平时的面目。大街上又出现了一群一群逛街的人，打扮时髦的太太们坐着四轮马车和单马双轮车出来欣赏断墙颓屋和激烈战斗的遗迹……只有街上来来往往的巡逻队和成群的俘虏使人记起那些可怕的日子。只有在那个时候过去的事情才清清楚楚地重现在我们的眼前。拜伦描写过夜间的战斗；它那鲜血淋淋的详细情景都让黑暗掩盖了；一到天明，那时战斗早已结束，它的痕迹——一把军刀、一些浸透鲜血的衣服——就现了出来。我们的心灵里现在升起来的正是这样的一个黎明，它照亮了可怕的荒凉的情景。我们的一半的希望，一半的信仰被杀死了，否定和绝望的思想萦绕在我们的脑际，它们在那里生了根。人绝不会想到我们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而且经过了近代怀疑论的考验以后、我们的心灵里还留着很多的东西来给摧毁的。”[②]

娜达丽在这个时期写信到莫斯科说：“我望着孩子们，哭起来，我害怕了。我再也不敢愿望他们活下去，也许有一天他们也会得到这样可怕的命运。”一个酷爱孩子的母亲的心中会生出这种思想，而且居然有勇气在信里写出来，她一定熬过了多少的痛苦。

---

① 指一八四六年三月三十一日英、俄、普、奥联军攻陷巴黎。

② 见著者的论文集《从彼岸来》第二篇《暴风雨后》。

这几句话里有她身经目击的一切的回声，在这里面人看得见装载尸首的大马车，双手给反绑着让人咒骂的俘虏、还有那个可怜的又聋又哑的小孩，他因为听不见“走开！”的命令，给枪弹打死在离我们大门几步光景的地方。这怎么能不在她的心灵上留下这样的影响呢？况且她不幸又是一个对于任何悲惨的事情都了解得那么深刻的女人……连生性快乐的人也会变成忧郁，怀着满腔怨愤，心里疼痛难堪，一种极大的耻辱使得日常的生活失去了常态。

现在重新在娜达丽的心灵里升起来的并不是一种由理想而来的无中生有的悲哀，也不是她少女时期的眼泪和基督教浪漫主义的回忆，这是一种真实的苦痛，是一个女人的肩头挑不起的重担。娜达丽对公众事情的热切的关心并不曾冷淡；它反而变成了一种极大的痛苦。这是一个姊妹的悲痛，一个母亲的眼泪，在为那个刚刚打过败仗的荒凉的战场哀哭。事实上她正是拉雪尔在她的《马赛曲》中所歪曲了的脚色。[①]

我厌倦了这些没有结果的讨论，我抓起我的笔，带一种内

---

① E.拉雪尔(1820—1858)：当时法国著名的悲剧女演员。赫尔岑在一八四八年六月革命失败后写的《暴风雨后》里曾谈到拉雪尔的《马赛曲》。他说：“现在拉雪尔在唱《马赛曲》了。……你们该记得这个喜欢沉思的瘦瘦的女人：她不戴珠宝，只穿一件白色衣服，用一只手支着头；她慢慢地朝前走着，带着忧愁的眼光，开始低声唱起来。……歌声中含的苦恼差不多到了绝望的程度。她召唤人们起来参加战斗，可是她自己并不相信会有人响应她的呼声。……这是恳求，这是良心不安的声音。突然间从这个瘦弱的胸膛里发出一声呻吟，一声暴躁的、带醉意的叫喊：

武装起来，公民们！……

拿不干净的血来浇我们的犁痕……

心的愤激，杀死了我自己旧日的指望和希望。一直在损害我、折磨我的那种力量，现在消耗在这些诅咒与愤懑的篇幅上面了，甚至在今天我把它们重读一遍，我还会在纸上感觉到不可遏止的愤怒与沸腾的热血。……这是一个出路。

她却没有这样的出路。早晨有我们的孩子，晚上又是我们的愤激、热烈的争论——解剖专家跟没有治好病的坏医生之间的争论。

她在受苦，我不但不安慰她，反而给她斟上怀疑与讥讽的苦杯。倘使我当时用了后来在她患病的身体上所用过的一半的看护去安慰她患病的心灵，那么我绝不会让这腐蚀人的悲哀在各处生根的。我帮忙培养了它们，加强了它们，却不曾明白她是不是忍受得了，而且是不是有力量对付它们。

我们的生活安排得非常奇怪。我们很少有亲密谈话与和平休息的安静的夜晚。我们还不懂对外人关上大门。在这一年年底各国的亡命者，无家可归的避难者①开始从各处来到我们这里。在他们的孤寂与烦闷中，他们寻找一个表示友谊的屋檐与热烈的欢迎。

她接着用刽子手的硬心肠的口气唱下去。她的兴奋、沉醉使她自己也吃了惊，因此她唱第二节的时候，声音就更弱，更扫兴……她又发出战斗的呼声，流血的呼声。……一下子她身上的女人气占了上风；她跪下来，血的呼声变成了祷告，爱胜利了，她把旗子紧紧贴在胸上……对祖国的神圣的爱！……可是她已经不好意思了，她连忙站起来举着旗子，喊着：'武装起来，公民们！……'，跑进去了……"

① 一八四八年可说是欧洲的革命年。法国二月革命发生，国王逃亡后，欧洲各大国人民都受到革命潮流的鼓动，匈、意、德、爱尔兰等国几乎同时发生革命，革命失败后，一部分的革命者亡命英、法。

关于这件事她这样写着：

一八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我讨厌中国的影子戏。我不知道我看见些什么人，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见他们，我只知道，我看见许多许多的人——全是好人；我觉得，有时候我会高兴和他们在一起，可是现在次数太多了，生活真像春天的滴水声，滴着，滴着，滴着。

"整个早晨从睁开眼睛起我就在照料沙夏①，照料达达，整个白天也都是这样。我不能够集中我的思想，连一分钟也不能。我心乱得很，有时候我觉得很不舒服；到了晚上孩子们都上床睡了，——好，看起来我应该休息了……不，好人们开始随随便便地走进来，而且正因为他们是好人，更叫人受不了；不然我倒很清静了，而事实上我并不是单独的，——可是我又不觉得他们在这儿，好像屋子里满是烟雾，熏得人眼痛，叫人感到呼吸困难——于是他们走了，没有留下一点东西……明天来了，依旧是一样的情形，后天来了，还是同样的情形。我不能够对任何别的人说起这个，别人会以为我在诉苦，会猜想'我不满意我的生活'；你了解我，你知道我绝不肯和世界上任何人交换我的处境；你知道这只是一时的愤激，厌倦——只要呼吸一口新鲜空气，我便会完全恢复过来。……

"倘使我必须将我心里所想过的一切完全说出，我得说，

① 沙夏：赫尔岑夫妇的长子亚历山大·亚历克桑特洛维奇的爱称（一八四八年他八岁）；下文的达达是他们的大女儿娜达丽亚·亚历克桑特洛夫娜的爱称（一八四八年她三岁）。

我有时候望着孩子们会害怕起来……是怎样的冒昧，怎样的大胆，把一个新的生物带到生活里来，却又没有，没有任何可以使他的生活幸福的东西。……这太可怕了，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是一个罪人；倘使由自己有意识地做去，那么取去生命比给予生命倒更容易。我还没有遇见一个人使我可以用这样的话说到他：'倘使我的孩子像他那样，'这就是说，倘使我的孩子的生活是像他的那样……我的见解越来越单纯了。沙夏出世后不久，我希望他成为一个伟大的人物，后来我又希望他成为这样那样，现在我所希望的不过是……"

她的信写到这里就打住了，因为我们的小女儿达达得了伤寒症；在十二月十五日她又加上几句："好，我的意思是我不去管孩子们将来成为什么样的人物；只要他们生活快乐，幸福，别的都是无关轻重的了……"

一八四九年，一月二十四日——"我有时真想也学学别人像老鼠似地跑来跑去，对转来转去的事感到兴趣，不再像现在这样，在这种忙碌中间，在这些紧要的事情中间，闲着不做一事。……要做自己高兴做的事是不可能的；一个人觉得和自己周围的那些人完全不协和，这是多么苦痛的事——我不是说我的最亲密的小圈子，可是人怎么能把自己完全关在这个小圈子里面，不可能。

"我想走开，走得远远的……我们从前在意大利的时候要是想走开，倒很好！

"可是现在……那就毫无意思了！在三十岁，还有那同样的憧憬，那同样的渴望，那同样的不满足——是的，我高声地

说出来——那同样的不满足……刚写到这个字，娜达霞[①] 就走过来，她热烈地吻我。不满足？——我太幸福了，生活太使我满意了……可是

为什么眼光
要注视这世界？
为什么心灵
渴想在上空飞翔？[②]

“我只对着你才像这样地讲话——你会了解我，因为你是和我一样地脆弱；可是和别的人在一起，不管是比我强或比我弱的人，我都不愿意像这样地讲话，我不愿意他们听见我现在讲的话。我跟他们讲的是另外一些事情。我那种淡漠的态度连我自己也害怕；只有那么少的事情、那么少的人引起我的兴趣……大自然——在厨房里是绝对找不到的；历史——在小屋子里是绝对找不到的，然后，我一家人，还有两三个别的人——全在这儿了。然而大家都是多么善良，非常关心我的健康和柯立亚[③] 的耳聋病。”

一月二十七日——“我终于没有力量再望着临死时的痛苦了——它们继续得太久，生命却是这么短促；我让自私心抓住了，因为牺牲自己对人并无好处，至多也不过证实了那句俗话：‘跟人一块儿死，死也愉快。’可是我讨厌死。我还想活下

① 娜达霞：达达的又一爱称。
② 引自旧俄民间诗人 A.柯尔卓夫(1809—1842)的《鹰之歌》。
③ 柯立亚：赫尔岑夫妇的幼子，耳聋。一八四九年时五岁。

去……我想逃到美洲去。……我们所信仰的、我们所认为可能实现的只是一个预言，还是一个过早的预言。多么苦，多么凄惨！我真想小孩似地哭起来。个人的幸福算什么？……公众生活像空气似地包围着你，如今这空气里充满了临死前的传染瘟疫的气息。"

二月一日——"娜……娜……①，我的朋友，你要知道在我们自己的私人圈子外面是多么黑暗，多么凄惨！啊，倘使我们能够把自己关在这个圈子里面，而且忘记，忘记这个窄小圈子以外的一切，那是多么好。……叫人透不过气来，叫人忍受不了。……这种纷扰真叫人忍受不了，它的结果在几百年以后才会见到；我太脆弱了，不能够升在这种纷扰上面，而远远地看到未来——我退缩，我给毁掉了。"

这信函的结尾一段是："我真愿意我没有一点力量，使我连自己的存在也感觉不到；我感到自己的存在时，我便完全觉得一切存在的事物间的**不调和**了。"

兆 候

反动胜利了；透过淡青色的共和国的影子，人可以看见那些觊觎王位者的面貌，国民军到处逮捕劳动者，警察厅长派人

---

① 英译本作"娜达霞"，指娜达立亚·土奇科娃。柏林版原本注："这些话都是写给娜达立亚·亚历赛叶夫娜·土奇科娃的。"娜达立亚(1830—1913)：土奇科夫的小女儿。一八四八年一月中旬在罗马她第一次和娜达丽见面，她小于娜达丽十二岁，但两人成了非常知己的朋友。一八五〇年她同奥格辽夫结婚。

到各个树林、各个古墓去搜捕逃匿的人。军警以外的职员便从事侦探和投递秘密报告的工作。

直到这年秋天，我们周围还有我们自己的朋友，我们用我们自己的语言（指俄语）吐露我们的悲哀和愤怒，土（奇科夫）一家[1]住在这所宅子里，马（利亚）·费（多洛夫娜）[2]也跟我们住在一起，安（宁科夫）[3]和屠（格涅夫）差不多每天都到我们家里来；但是大家都把眼光望着远远的地方，我们这个小小的圈子开始破碎了。巴黎染满了腥血以后，再也留不住他们；大家都准备离开，并不是为了什么特别紧要的事情，多半是想逃避这种精神的压迫，逃避六月的日子，但是六月的日子已经成了他们的一部分，而且一直跟着他们。

为什么我不跟他们一块儿走呢？那个时候还可以救出很多来，我也不会贡献了这样的牺牲，牺牲了我自己这么多，来作为献给一个残酷无情的神的祭品。

我们跟土（奇科夫）一家，跟马（利亚）·费多洛夫娜分别的日子是我的生活中一个特别不吉的预兆，然而我对这个警告跟对以前上百个别的警告一样，毫不注意地把它放过了。

每一个人只要他经历过不少的事情，一定记得危机开始发生或者风向转变的日子和时刻、以及一连串平时不大注意的小节；这些兆候或警告决不是偶然来的，它们是后果，也是

---

① 这一家人包括娜达立亚·叶林娜和她们的父母。——英译者

② 马·费：赫尔岑夫妇的好友，叶夫金尼·科尔席的姊妹。——英译者

③ 巴威尔·安宁科夫(1813—1887)：俄国文学批评家，又是小说家伊凡·屠格涅夫(1818—1883)的好友。——英译者

就要发生的东西的萌芽，也是那个暗中酝酿或者已经存在的东西的揭露。我们并不注意这些心理的兆候，我们轻视它们，把它们跟撒出来的盐或吹灭了的烛一样看待，因为平时我们过分看重了自己的独立性，骄傲地想着单靠我们自己来支配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友人动身的前一夜，他们和三四个别的知己朋友在我们家里相聚。走的人应该在第二天早晨七点钟到火车站；大家都不想将这一夜睡过去，倒愿意在一起度过这些最后的钟点。起初我们都很兴奋，这是在分别的时候常见的，后来渐渐地大家全让愁云罩住了。……谈话失去了兴趣，大家都打不起精神，杯中斟满的酒没有人喝。勉强说笑也提不起人们的兴致。有人看见天亮便拉开窗帷，让一道青白色的光线照在我们的脸上，这使人想起古狄尔① 画中的罗马人的欢宴。

大家都很郁闷。我心烦得连气也透不过来。

妻坐在小沙发上，土奇科夫的幼女娜达立亚，娜达丽称她为"我心灵上的安慰（空苏艾诺）"②，她跪在旁边，她的脸贴在

---

① 托马士·古狄尔（1815—1879）：法国画家。这里指他的名画《没落的罗马人》。

② 娜达丽称娜达立亚为"Consuelo di mi alma"（我心灵上的空苏艾诺）。空苏艾诺是法国浪漫主义作家乔治·桑（1804—1874）的小说《空苏艾诺》（*Consuelo, 1844*）中的女主人公，她是个"有着崇高灵魂和伟大心肠"的少女（"空苏艾诺"是西班牙文的"安慰"）。小说中有这样一段："他跪下来，他的大眼睛里充满泪水，他用西班牙语叫道：'啊，空苏艾诺，空苏艾诺！我到底找到你了。'少女吃惊地用西班牙语答道：'空苏艾诺？先生，您为什么叫我这个名字？''我叫你安慰，因为在我的孤寂的生活里，我可以得到安慰了……'"

娜达丽的胸口。她热情地爱着我的妻子，不忍心离开她，自己到荒凉的乡下去；她的姐姐[1] 哀愁地站在她的身旁。“空苏艾诺”含着眼泪低声在说什么话，离她两步光景是马(利亚)·费(多洛夫娜)，她忧郁地默默坐在那里；马(利亚)·费(多洛夫娜)早已习惯于服从命运了，她了解生活，她的眼光只表示“别了”，而透过那个少女的泪水闪露出来的却是“再见”的意思。

于是我们送他们动身。那个高而空阔的石头造的车站里，寒冷彻骨，门不停地开闭，发出大声，风从四面吹进。我们在角落里一张长椅上坐下。士(奇科夫)去照料行李。门突然开了，两个喝醉了的老年人吵闹地闯进车站来。他们的衣服上黏着泥，脸也变了相，他们的一切都叫人联想到野蛮的酗酒放荡。他们咒骂着走进来。一个要打另一个，那个人闪开了，却捏起拳头用尽力气还击，正打在他的脸上。这个老醉汉飞跌下去。他的头碰到石头地，发出敲碎物件的尖锐的响声；他尖声叫起来，抬起他的头，血流下来，染红了他的灰白头发，还流在石头地上。警察和旅客们愤怒地扑过去把另一个老头子抓住。

我们从昨天晚上起就过于疲劳而且非常激动，我们的神经也过度紧张，不过我们还能保持镇静，但是那个老人的头骨撞在地上时响彻这个大厅的可怕的回声，在我们大家的心上产生了一种类似歇斯底里的影响。我们家庭和我们整个圈子平时都是正常的；没有一点神经衰弱和歇斯底里的现象，然而

[1] 即叶林娜·亚历赛叶夫娜，她后来跟赫尔岑的友人沙金结婚。

这个却是我们无法忍受的了；我觉得自己浑身发颤，妻几乎要晕倒了。于是铃声响起来……时间到了，时间到了！——我们突然留在栅栏后面，孤孤单单的。

对于送别的人再没有比法国警察在火车站的安排更叫人讨厌、令人痛心的了；他们夺去了送行者的最后两三分钟……友人还在那里，火车头还没有叫，列车尚未开动，你希望看见他们坐定，看见火车开出，然后望着它走得远远的，变为一片尘土，一阵烟，一个黑点，一直到最后什么也望不见为止——然而如今一道围篱，一道栅栏，和一个警察的手臂却隔在你们中间……

……我们默默地到了家。妻一路上小声哭着——她为了失去她的"空苏艾诺"难过；她时时拉紧她的披肩，问我："你记得那个声音吗？——它还在我的耳边响。"

到了家我劝她躺下休息，我自己坐下读报；我读着，我读社论，读附刊小说，读杂录，我看表——还不到正午；这么长的日子！我去看安(宁科夫)；他在三五天内也要走了；我们一起出去散步，在街上比在家读报更凄凉：我感到和良心的责备类似的苦恼。

"到我家去吃午饭吧，"我说，我们回家去了。

妻很不舒服，这晚上我们过得毫无趣味，简直无聊。

"那么决定了，"分别的时候我问安(宁科夫)，"你在这星期末走?"

"是。"

"你在俄国会过得很苦。"

"有什么办法，我一定要走；我不会住在彼得堡，我要到乡下去。你看，在这里有什么好处。你住下去也许会后悔的。"

在那个时候，我还可以回国，我还没有断绝我的归路。列比约和加立叶① 还不曾写他们的秘密报告，但是在我的心里，事情已经决定了。然而安(宁科夫)的话不愉快地刺激着我那紧张过度的神经，我想了想，答道："不，我没有选择的余地，我得留在这里；倘使说我现在有什么懊悔，就是那一回在莫伯尔广场障碍物后面一个工人给我一支枪，我没有把它接过来。"

许多次，在绝望和软弱的时刻，苦杯满得溢出来了，我的整个生活似乎只是一个延长的错误，我怀疑我自己，我怀疑最后的东西，剩下来的东西，在这种时候一句话又回到我的心头："我为什么不接过那个工人的枪留在障碍物后面呢？"要是一颗流弹打在我身上，我至少还可以带着一点点信念进入坟墓。……

时间又慢慢地捱下去……一天又一天……黯淡而无聊。……人忽然晃了进来，做了一天朋友，又过去了，不见了，完结了。接近冬天的时候，从各国来的亡命者，别的遭难船上得救的船员开始出现了；他们充满希望与自信，以为目前在全欧洲得势的反动势力不过是一阵过境的狂风，一个小小的挫折；他

① 列比约和彼埃尔·加立叶：二人在那段时间里先后当过巴黎警察局局长。

们指望着第二天,第二个星期,他们的时刻就会到来。……

我觉得他们是错误的,不过我却高兴他们有这种错误。我极力想打破自己的定见,我在跟我自己斗争,我生活在一种激动易怒的状态中。在我的记忆里那个时候就像一天昏迷、热狂的日子……在痛苦的时候我各处彷徨,不断地找寻遗忘——我在书本中,在喧嚣中,在闭户闲居的家庭生活中,在朋友的聚会中找寻,我希望这些能够使我分心;但是在任何时候都缺少一样东西,欢笑不使我快乐,酒只增加我的苦闷,音乐刺痛我的心,热烈的谈话每每以忧郁的沉默结束。

内心的一切全毁坏了,什么都被推翻了,只有混乱,明显的矛盾;我又把一切全打碎,又是什么都没有了。早已完成了的精神生活的基本原则又成为问题:许多事实冷酷无情地从各方面现出来,驳倒了它们。疑惑把我们已经得到的一点点东西践踏了,它现在撕毁的不是教会的法衣,不是学者的礼服,却是革命的旗帜……疑惑从一般的抽象观念转到实际生活去了。理论上的否定与变成了行为的疑惑是不同的,在它们中间有一道鸿沟;思想是大胆的,舌头是无畏的,它毫不费力地说出心里害怕的话;心里还存着希望和信念,跑到前面的脑筋却不承认了。心落在后面,因为它在爱,脑筋宣告判决的时候,心还有些留恋。

也许在年轻时期,生命里充满着蓬勃、旺盛的气象,而且前面还有那么多的东西的时候,失去一两个信念不过是给别的新信念留下空地位;也许在老年时期,由于厌倦,对万事万物都毫不关心,——在这两种时期中这些危机都更容易度

过；然而“在我们生活的中途”①，它们向我们要的代价太高了。

这一切究竟是什么意思？开玩笑吗？我们所珍爱的、我们所为之奋斗的、我们所为之作过牺牲的一切神圣的东西都已经被生活出卖了，被历史出卖了，为着它的利益出卖了；它需要发狂的人来做酵母，却不管他们清醒后的结局；他们满足了它的需要，——那么就让他们躺在医院里度他们残废的余生吧。羞耻，怨恨！那些忠厚的朋友在你身边耸耸肩头，对你的懦弱、你的躁急感到惊奇，他们等着明天，永远耽心，永远忙着同一件事情，什么也不明白，什么也不能阻止他们，他们永远向前进，却始终不曾更进一步……他们判断你，安慰你，责备你——多无聊，多难堪的刑罚！他们自己称为“信仰的人”，“爱的人”，以表示和我们“怀疑的人”，“否定的人”相反，他们不知道把一个人一生的指望连根拔去是怎么一回事，他们完全不知道世间还有所谓**真理病**，他们从没有带着诗人的那种“大声悲叹”：

> 我从受伤的心里挖出了它，鲜血淋淋
> 我大声哭着，我将它放弃。②

献出了什么珍宝。

那些没有清醒时期的狂人是幸福的；他们完全不知道内

---

① nel mezzo del camin di nostra vita，这是但丁的《神曲》的第一行。但丁(1265—1321)：意大利诗人。

② 引自德国诗人席勒(1759—1805)的《放弃》。

心的斗争，只有外部的原因、坏人和恶运才使他们受苦，然而就他们的内心来说，什么都是完整无恙的，良心是安静的，他们是满足的。因此别人的苦痛的绝望在他们看来便是饱暖心灵的任性和享乐、有闲人的空洞的嘲讽。他们看见一个受伤的人不注意他的木拐，便断定手术对那个人毫无影响；他们绝不会想到为什么那个人未老先衰，而且断腿是不是会在天气转变或者刮风的时候发痛。

我的合乎逻辑的自白，我的受到损害的思想在其中奋斗过来的病症的历史都保留在我的论文集《从彼岸来》[①]里面。在那些论文中我攻击了我剩下来的最后的偶像。我用嘲讽对它们（指偶像）报了痛苦和出卖的仇。我不曾嘲弄我的邻人，我揶揄我自己，而且我又着了迷，我已经梦想自己得到了自

① 赫尔岑在一八四八年六月的起义失败以后，对西欧文明感到绝望，他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幻想破产了。他的这种"精神上的悲剧"，他用感人的笔调在《从彼岸来》中表现了出来。

《从彼岸来》的第一篇文章《暴风雨前》写于一八四七年年底，其余各篇都是在六月的流血的日子以后一八四八年到一八五〇年中间写成的。一八四八年革命失败，反动势力胜利以后作者的精神状态和思想都反映在这个集子里面。一八五〇年作者第一次出版了这书的德文本，只收了五篇论文，另外附了一封《给黑尔威格的信》和一封《给马志尼的信》。在以后的版本中作者删去了这两封信。俄文本初版一八五五年在伦敦刊行，除了德文本收的五篇论文外，又收入一八五〇年作者在法文和德文刊物上发表的三篇论文。第八篇论《多诺索—柯得斯和罗马王玉连》的论文脱稿在第七篇之前。在一九〇五年圣彼得堡版七卷本《赫尔岑文集》中，《从彼岸来》就只有七篇论文，*Omnia Mea Mecum Porto* 便是最后的一篇。第二篇文章《暴风雨后》在发表之前，曾由作者友人抄录原稿在俄国境内秘密传播。诗人涅克拉索夫曾写信告诉小说家屠格涅夫："我读到《暴风雨后》哭了，这太感动人了。"

由，但是结果我又给绊倒。我对话语和旗帜失掉了信仰，我对于那被尊为神圣的人道和那唯一的西方文明的救世教堂感到了幻灭，然而我仍旧相信着少数几个人，我相信我自己。我看见一切都已崩溃，我想救出我自己，开始新的生活，和两三个人一起走开，跑得远远的，避开……那些多余的人……我骄傲地写下我最后一篇文章的题目：*Omnia mea mecum porto*！[①]

生活，在各种事件的漩涡里，在公共利益的演变中受了损害，失去了形和色，枯萎了。它变成孤立了，又退回到年轻的多愁善感的时期去，没有青春、没有信仰。将我自己作为赌注，[②] 我的船不得不在礁石上碰碎了。船沉没。我活着。不错，我保全了性命，但是我失去了一切……

伤　寒　病

一八四八年冬天我的小女儿达达病了。她不舒服了很久，后来有点发热，过后又似乎退了热。那个有名的医生赖叶，劝我们不管冬季的寒冷天气带她坐车出去走走。这一天

---

① 拉丁文："我的一切都带在我身边。"这是古希腊七贤之一的庇亚士（纪元前五五〇年左右）的名言。他是薄利恩勒人。波斯军队进攻希腊得胜，薄利恩勒的居民预备逃难的时候，庇亚士却不准备行装，有人惊奇地问他，他昂然回答道："我的一切都带在我身边。"后来罗马的政治家和哲学家西塞罗（纪元前106—13）也说过这同样的话。

这是《从彼岸来》的第七篇文章，一八五〇年四月三日在巴黎写成，同年发表于德文杂志 *Demutsche Monatsschrift*。

② 原文是意大利文：faro da me。

天气非常好，可是并不暖和。我们把她带回家的时候，她的脸色异常苍白；她说要吃东西，等到人把肉汤端上来，她已经在我们身边沙发上睡着了；过了几个小时，她一直在睡。医科学生阿道夫·福黑特（博物学者福黑特的兄弟）碰巧在我们家里。

"你们看这个孩子，啊，这不是自然的睡眠，"他说。她脸上那种死人似的青白色使我害怕，我把手放在她的额上，完全冷了。我亲自去找赖叶。幸好他在家，我就拉他到我家里来。那个小东西还没有醒。赖叶抱起她，用力摇着，又叫我大声唤她的名字……她张开眼睛，说了两三句话，又闭上眼睛，死一样地沉沉睡去了；人几乎觉察不出来她还在呼吸。她就这样地过了好几天，没有什么大变化，她不吃，而且差不多连水也不喝。她的嘴唇变成黑色，她的指甲成了深青色，满身发出了点子——这是伤寒症。赖叶差不多什么事都不做，他等待着，守着病人，他并没有给我们多大的希望。

孩子的面容很可怕；我每小时都等着她死去。妻脸色灰白，默默地，整天整夜坐在小床前，她的眼睛罩上一层珍珠似的光泽，这泄露出她的疲倦、受苦、竭尽的精力和过度紧张的神经。有一次在夜里一点到两点之间我忽然觉得达达不呼吸了。我望着她，不敢露出我的恐怖。妻猜到了这个。她说："我的头发晕，给我一点水。"我把杯子递给她的时候，她已经不省人事了。伊（凡）·屠（格涅夫）在我们这里，他是来分担我们这种忧愁的时刻的，他便跑到药店去买阿摩尼亚精。我呆呆地站在两个失去知觉的身体中间，我望着她们，没有一点办

法。女仆擦着妻的手，用水打湿她的太阳穴；过了几分钟她醒转来了。

“怎么回事？”她问道。

“好像达达睁开了眼睛，”我们的善良的好鲁易丝说。

我看达达，她似乎醒过来了；我轻轻地唤她的名字；她张开眼睛，动着她那发黑的、干燥的、裂开的嘴唇微笑。从这一分钟起她渐渐地好起来。

世间有不少的毒药比孩子的病更残酷、更痛苦地毁灭一个人，我知道它们，不过我以为再没有比这一种慢性的毒更可怕的了，它慢慢地消耗一个人的精神，静静地腐蚀他的力量，而且叫他扮演一个无能为力的袖手旁观者的脚色来侮辱他。

一个人，只要他有过一次把一个小生物抱在他的怀里，觉得那个身体渐渐变冷、变重、最后变成了石头，只要他听见那个脆弱的生物用来求怜悯、求救助、求保全生命的最后的呻吟，只要他看见桌子上面放着罩上粉红缎子的美丽小棺材和滚花边的白色小衣服、衬托着黄色的小脸，那么他在每次小孩生病的时候都会想到：该不会再有一个小棺材放在那张桌子上吧！

灾难是最坏的学校！固然一个经验丰富的人比别人更能够忍受灾难，但这只是因为他的心灵受了伤、变软弱了。一个人所遭受的忧患会使他慢慢地衰老而且更加懦弱。他失去对于明天的信心，事实上没有这种信心什么事都做不出来：他对任何事情都更淡漠、不关心，因为他已经习惯于那些可怕的思

想了，到后来他便自私地害怕受苦，这就是说，他害怕再感到连续的锐敏的痛苦，连续的苦闷，关于这种痛苦的记忆不会像密云从天空消散，它们永不消失。

一个病儿的呻吟给我引起莫大的内心的恐怖，使我起了寒颤，我因此不得不努力抑制这种纯粹刺激神经的记忆。

就在这一夜以后，第二天早晨我头一次出去在街上闲走；天气很冷，人行道上铺了薄薄的灰白色的霜；不管天气寒冷，不管时候这么早，马路上已经挤满了行人；卖报小孩高声叫卖《公报》——五百多万选票把神圣的法兰西放在路易·拿破仑的脚下。① 没有仆人的冷清清的门房里终于找到了一位主人！

……正是在这种忧患与紧张的时期，一个人进到我们的圈子里来，他给我们带来了另外一连串的灾难，他毁了我们的私生活，像六月的凶日子毁了我们的公众生活那样。这个人很快地接近我们，他逼着我们同他结为亲密的朋友，不给我们考虑的时间。……在平时我很容易结交朋友，不过要跟人成为知己却需要长久时间；然而这一次（我再说一遍）并不是寻常的时候。

我们的神经完全没有受到庇护，而且时时发痛；甚至随便的会见、细小的过去纪念物都会使人浑身颤栗。例如，我记得

① 一八四八年十二月，路易·拿破仑（拿破仑一世的侄儿）得到五，四三四，二二六票当选为法国总统。

在炮轰以后三天的光景,我在圣安东乡散步;一景一物都仍然留着激烈战斗的新鲜痕迹,残破的墙垣还立在那里,障碍物也不曾被人拆去,受了惊的脸色苍白的妇人在寻觅东西,小孩们在瓦砾堆中搜索。……我在一家小咖啡店门前椅子上坐下来。怀着一颗发痛的心看那可怕的景象。一刻钟过去了。一个人轻轻地把一只手放在我的肩上,——这是多威亚特,[1] 一个年轻的热心人,他以前在德国像路格那样地宣传一种新天主教,后来在一八四七年便迁到美国去了。

他脸色苍白,面部在搐动,长发散乱,他还穿着旅行服装。

"我的上帝!"他说,"我们居然又碰见了!"

"你什么时候来的?"

"今天来的。我在纽约听到二月革命,听到欧洲各地发生的一切事情,我连忙把我能卖的东西全卖掉。拿起我所有的钱,怀着充满希望的快乐的心,上了轮船。昨天在哈佛尔,我才听见人说起最近发生的事情,我绝对想不到情形会变得这样坏。"

我们两个人又对看了一次,两个人的眼里都充满了泪水。

"我不要在这个该死的城里住一天,单单住一天也不行!"多威亚特激动地说,他真像一个年轻的利未的先知[2]。"去

[1] 多威亚特(Doviat):德国革命者。参加天主教神甫隆格领导的新天主教活动。下文的路格即德国哲学家和著作家安诺德·路格(1802—1880),他宣传左派黑格尔学说。

[2] 指古以色列人中利未族的祭司。

吧！我要走开！再见，我到德国去！”

他真的走了，给关在普鲁士监狱里，在那里住了六年。

我也记得《加地立那》的上演，这是那个刚强的大仲马[①]当时在他的历史剧院中演出的。……要塞里装满了犯人，容不下的就成群的给送到沙都狄弗[②]去，或者充军远方，他们的亲戚像不安的鬼魂似地到处奔走，从一个警察局到另一个警察局，要求那里的人告诉他们谁战死，谁活着，谁枪毙；然而大仲马已经把六月的日子用罗马时代的背景[③]在舞台上演出了。我看过这个戏。起初并没有什么；加地立那[④]影射勒德吕—何南，[⑤]西塞罗[⑥]影射拉马丁[⑦]，全是装满辞藻的古

---

① 亚历山大·仲马（1803—1872）：法国小说、戏剧家，小说《三剑客》的作者。《加地立那》是他与马格合著的五幕史剧。他的历史剧院在一八四七年二月开幕。

② 沙都狄弗（Chateaud' If）：也可译作伊弗堡，在马赛，以前是囚禁罪犯的地方。

③ “罗马时代的背景”原文是“罗马的拉地克拉弗（laticlave）”。拉地克拉弗是古罗马元老衣服上表示尊严的紫色长带。英文本即译作“罗马的背景”。

④ 加地立那（L. C. Catilina，纪元前108？—62）：罗马政治家，曾任非洲总督，纪元前六二年兵败身亡。

⑤ 勒德吕—何南（1808—1874）：一八四八年革命的领导人之一，临时政府的内务部长。后来他靠近资产阶级反动势力，大肆镇压巴黎无产阶级一八四八年的六月起义。一八四九年六月十三日巴黎街中的骚动失败后逃亡英国。

⑥ 西塞罗：古罗马的雄辩家、哲学家和政治家，纪元前六三年任罗马执政官，制止了加地立那暗杀执政官和洗劫罗马城的阴谋，以他的著名演说激起人民反对加地立那。

⑦ 拉马丁（1791—1869）：诗人和政治家，自由主义者。一八四八年临时政府的外交部长。

典句子。起义给压服了。拉马丁说着“vixerunt”[1]大步走过舞台;场面换了。广场上遍地死尸;远处有一道红光,垂死的人带着临死的痛苦躺在死人中间,死人身上还盖着血污的破衣服……我差一点透不过气来。不久以前,就在这所戏院的墙壁后面,在通到戏院的那些街上,我们不是看见了这样的情景吗! 而且死尸不是用纸板做的,淌的血也不是颜色的水,却是从年轻的身体里流出来的。

我差不多歇斯底里地冲了出去,我咒骂那些热烈地鼓掌喝彩的小市民……

在那些痛苦的日子里,一个人不能够在酒店或戏园中坐下去,不能够留在家里或书斋内,却热狂地走到外面,精神错乱,内心颓丧,带着深的创伤,准备着辱骂他所遇见的任何人,——在这个时候,每一句同情的话,每一滴为着同样悲哀而流的眼泪,每一句从相同的憎恨里出来的咒骂都有不可思议的力量。创伤既然相同,痛处也更容易接近。

……在我还很年轻的时候,一本法国小说给了我很深的印象。小说名叫《亚米尼乌斯》,我以后就不曾再见到它。大概它并没有多大的价值,不过在当时它对我却有很大的影响,而且使我好多年都不能忘记。直到今天我还记得书中的重要

[1] vixerunt(拉丁文):“他们已经死亡”,赫尔岑用在这里指法国资产阶级道德上和政治上的死亡。他的《从彼岸来》第四篇的标题便是这个拉丁字:vixerunt。(这篇文章是一八四八年十二月一日在巴黎写成的。作者在文章里阐明了他的这种意见。)

情节。

我们从公元初期的历史中都知道一点关于两个不同世界的遇合与冲突的事，一个是古老的、古典的文明世界，腐败而衰老，生产力已竭尽；另一个是野蛮的世界，它野得像森林中的野兽，不过充满着尚在睡眠中的力量，它还是各种各类倾向的杂乱的汇合——我们都知道这两个世界的接触在公开的、公众生活一方面的影响，却不知道它在与宁静的家庭生活细节有关的一方面所引起的后果。大体的事实我们是知道的，不过说到那些直接依赖着这些事实的人，虽然他们的生活因这些事实而遭毁灭，并且在他们是用眼泪代替了血，残破的家庭代替了毁灭的城市，被人遗忘的坟墓代替了战场，可是实际上关于这些人的生活，我们并没有一份记录。

《亚米尼乌斯》的作者（我已经忘了他的姓名）就想把这两个世界（一个从森林进入历史，另一个却从历史走到坟墓）在一个家庭里遇合的情形表现出来。世界历史如果缩减成个人的闲谈，它便和我们更加接近，也更加生动，而且我们更容易领会它。我对《亚米尼乌斯》感到很大的兴趣，我甚至用它那样的文体写出了好些历史场面，而且警察总监曾斯基[1] 在一八三四年曾对它们作过批评的分析。但是不用说我写那些文章的时候，我绝对想不到有一天我也会遇到这同样的冲突，而

[1] 列·米·曾斯基：少将。一八三四至一八四五年任莫斯科警察总监。一八三四年七月二十四日赫尔岑在莫斯科侦讯委员会第一次受审时就由曾斯基主持审讯。

且这两个世界的遇合会毁了我自己的家庭。不管别人的意见怎样，我觉得在我们对欧洲人的关系中间有着不少的相似之点。我们的文明是外表的，我们的腐败是粗野的，我们的粗硬的头发在发粉下面直立起来，在我们的擦了白粉的脸颊上还看得见晒黑的颜色；我们有野蛮人的狡猾、兽类的凶狠和奴隶的机巧，到处都有我们的人积了钱，做了守财奴，然而我们跟那种遗传的不可捉摸的西欧腐败的微妙的诡谲却离得很远。在我们中间智慧的发达有着净化与保证的作用，例外是很少的。一直到最近，在我们中间，文化都是一道阻拦邪恶坏行的栅栏。①

在西欧却不是这样。因此在我们俄国人，一个人接触了我们所视为神圣的东西，他了解我们所宝贵的思想，他大胆地说出我们通常默默想着或者对友人轻声说着的心思，我们很容易对他献出我们的一切。我们并没有考虑过，那些使我们的心悸动、使我们的胸膛起伏的话有一半在欧洲已经成了寻常的道理和口头禅；我们忘记多少败德的激情（古代的虚假的激情）已经混杂在一个属于这种衰老文明的现代人的心灵中了。他从小就想处处占先，渐渐地自私自利，又加上妒嫉和自尊心；还有那不知餍足的放纵和卑不足道的利己心，他把这个看得比一切关系、一切感情都更重要……他要扮演一个脚色，在舞台上露面，他要付出任何的代价来保持他的位置，来满足他的激情。然而我们的同胞，这些草原的儿子，受到一下、两

① 这一段话是在一八五七年写的。——作者注

下打击，常常看不见它们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它们就把他打昏了，过了许久他才清醒过来，他好像受伤的熊一样，暴跳狂冲，折断四周的树木，不断地咆哮，跑回洞里去，——但是太迟了，他的敌人已经用手指指着他责骂了。……由于这两种生长与教育的差别，还会产生更多的根，流出更多的血来。

……有一个时期我曾经严厉地痛斥过那个破坏了我的生活的人。有一个时期我曾经急切地渴望将他杀死。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已经有七年了；我是一个真正的现代人，我的复仇的欲望也已经消耗尽了，长期的继续不断的分析缓和了我的激情的判断。在这七年中间我已经明白了我自己的限度和许多人的限度，捏在我手里的不是匕首，而是一把解剖刀，我不用诅咒与辱骂，现在却静静地坐下来写出我的心理病理学的故事。

第二章

一八四八年六月二十三日的前几天，一天傍晚我回到家里，我看见我的屋子里有一个陌生的客人，他带着忧郁和狼狈的样子走过来迎我。

“怎么是你！”我后来才说出话来，我笑着，把手伸给他。“这是可能吗？我完全不认识你了……”

这是黑尔威格，他修了面剪了头，胡子和唇髭全剃光了。他很快地交了恶运。两个月以前他被一群崇拜者簇拥着，他和他的妻子坐一辆很舒适的大型旅行马车，从巴黎去参加巴登的进军[1]，他是被德意志共和国邀请去的。现在他回来了，他从战场逃出来，一大堆漫画跟在后面挖苦他，敌人在嘲笑他，朋友在责备他。不过一瞬间的工夫什么都改变了，一切都破灭了，而且不仅这一点，在这残破的景物后面还有一个未来的毁灭的预兆。

我离开俄国的时候，奥格辽夫给我写了一封介绍信把我介绍给黑（尔威格）。奥格辽夫是在黑（尔威格）的最光荣的时

---

[1] 巴登的进军：一八四八年四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四日在巴黎的八百个革命的德国侨民组成“德意志民主军团”，由黑尔威格率领，越过莱茵河，企图支援巴登的起义。四月二十七日侨民军与符腾堡政府军优势的兵力作战，经短时间的激烈战斗后被迫退却，人员半数被俘。

期中认识他的。奥格辽夫平时在思想和艺术的问题上非常深刻，可是并不会判断人。在奥格辽夫看来，凡是不使人讨厌、不粗俗的人都是很好的，尤其所有的艺术家都是好人。我后来知道黑(尔威格)是巴枯宁① 和沙左诺夫两人的好朋友，不久也就跟他处得很熟，不过我们并不算知己，在一八四七年秋天我到意大利去。后来我回到巴黎，他已经不在那里。我在报上读到他的不幸遭遇的记载。差不多就在六月起义的前夕他回到了巴黎，他在巴登犯过错误以后第一次得到友谊的接待，还是在我的家里，因此他常常到我们家里来。起初我跟他中间还有很多的隔阂，使我们不能成为亲密的朋友。他没有那种纯朴、坦白的天性，没有一切坚强而有才能的人所不可缺少的那种完全开阔的心胸，这在俄国人中间又是每个有才智的人差不多都有的。他不坦白，不光明，他害怕别人，喜欢偷偷地享乐；他有一种柔弱的女人气，他重视琐碎事情，重视生活的舒适，他有一种极端的 rücksichtslos（德文：不顾一切的）利己心，这种利己心到了天真和无耻的程度。对这些缺点我以为他自己只应该负一半的责任。命运把一个这样的女人放在他的身边：她用她的似是而非的爱情和过分的照顾煽起了他的利己的倾向，鼓舞了他的种种弱点：使那些弱点在他的眼睛里变成了美德。他在结婚以前很穷，——她给他带来财富，她使他享受豪华，她成了他的保姆、他的管家、他的护士，

① 密海尔·巴枯宁(1814—1876)：赫尔岑之友，无政府主义者。下文的尼可拉·沙左诺夫(1815—1862)：赫尔岑的大学同学，他的革命团体的成员。

她成了一个连一分钟也离不开的最下级的必需品。她对那个"承继歌德和海涅的地位的"诗人怀着一种永久的崇拜，huldigung〔德语：忠诚〕，恭顺到了极点，同时她却用资产阶级的豪华的鸭绒被毁坏了、闷死了他的才能。我每次看见他甘心情愿接受这种让妻子供养的丈夫的位置，我总要替他耽心，而且我应该承认我看见他们不可避免地一天一天走向经济破产的情形，我并不是不高兴，我看见爱玛不得不离开她的"金边的"住宅（我们常常这样称它），同时还把她的"爱神们"①（幸而并不是农奴，不过是铜像罢了）一件一件地半价卖出去，我对她的眼泪并不表示一点同情。

我要在这里停顿一下，让我略微叙述他们以前的生活与他们的结婚，他们的结婚便是说明现代德国精神的最好的典型。

德国人，尤其是德国女人，有很多虚假的激情——这是指那些虚构的、幻想的、带做作的文学的爱好。这是一种überspanntheit〔德语：夸大狂〕，……一种书本上的热情，一种人为的、虚伪的兴奋，时时刻刻准备受到大的感动或者大的震惊，并不去管有没有充足的理由。

这不是故意装假，这是认识错误，这是一种心理上的放纵，爱美的歇斯底里症，这病症并没有给她们什么损害，不过引起了她们的许多眼泪、许多快乐和悲哀、许多消遣和感触、

① "爱神们"：原文为"阿莫尔（希腊神话中的爱神）与丘比特（罗马神话中的爱神）"（Амуры N Купидоны），这是从俄国剧作家格里鲍耶陀夫（1795—1829）的著名讽刺剧《聪明误》（或译作《智慧的痛苦》）第二幕第五场男主人公恰次基的独白中引用来的："这些阿莫尔和丘比特一个一个地全卖掉了！！！"

wonne〔德语:喜悦〕。甚至于像贝丁娜·冯·阿尔宁[1] 那样敏慧的女性,一生也不能够免掉这种德国病。病的形式或许有变换,它的内容或许不同,然而也可以说,心理上处理材料的方法还是一样。一切都不外乎各种变化不同的、大同小异的色情的泛神论,即是对大自然、对人所采取的一种宗教上性爱的,与理论上钟情的态度,这种态度里也包含着那些寺院中基督的新妇(即修道的贞女——译者)或者世俗的女信徒(她们在祷告中得到了性爱的喜悦)中间的浪漫的贞洁或者理论上的淫荡。她们都努力想做真正犯淫罪女人的……精神上的姊妹。她们这样做是由于好奇心以及她们对于犯规(她们自己绝没有勇气去做)的同情。她们随时准备着宽恕别人的罪过,即使别人并不要求她们这样做。她们中间最热烈的人并不进入实际生活便经历了激情的各个阶段。她们在别人的书本里,或者在她们自己的原稿上,仿佛代替别人地(per contumaciam)经历了一切的罪过。

在所有热情的德国仕女中间有一个非常普遍的特征,这就是她们盲目崇拜天才和伟大的人物;这种宗教是从威玛时代[2] 起的,是从维兰德[3]、席勒、歌德的日子起的。然而天才

---

① 贝丁娜·冯·阿尔宁(1788—1859):德国浪漫派诗人和小说家L.J.阿尔宁的妻子,歌德和贝多芬的朋友。著有《歌德跟一个孩子的通信》(1835)等书。

② 威玛时代:威玛是古萨克斯-威玛大公国的首都,在查理-奥古斯特(1775—1828)统治时期中,威玛是德国文化的中心,歌德、维兰德和席勒都在这里住过相当长的时期。

③ C.M.维兰德(1733—1813):德国诗人、文学家。

并不多见，海涅住在巴黎，洪波尔特[1] 又太老，太实际，她们便怀着一种饥饿似的失望去追逐那些优秀的音乐家和不算坏的画家。弗南兹·李斯特[2] 的形象像闪电一般掠过所有德国女人的心头，给她们刻下了高高的前额和往后梳的长头发的印象。

全德国共同崇拜的伟人究竟少见，她们便注意到那些有一点小名声的本地的天才；所有的女人都爱上了他，所有的少女都 schwärmten für ihn.〔德语：为他疯狂〕。她们都给他绣背带、绣拖鞋，她们秘密地送给他各种纪念品，不让他知道自己的姓名。

四十年代中在德国发生了一种很大的思想的骚动。人们也许期待着像浮士德那样在书本上消耗了半生的人有一天也会像浮士德那样想走到广场上见见阳光。我们如今知道这都是枉费心机，新的浮士德又从奥埃巴黑的地窖[3] 中回到书斋去了。然而在那个时候，尤其是对于德国人，情形却是两样，当时每一次革命精神的表现都得到热烈的拥护。

黑(尔威格)[4] 的政治诗正出现在这个时代的全盛时期

---

① 亚历山大·洪波尔特(1769—1859)：德国博物学者和著作家。

② 弗南兹·李斯特(1811—1866)：匈牙利作曲家和钢琴家。

③ 地窖：歌德诗剧《浮士德》中的一场："莱比锡的奥埃巴黑的地窖。"这是个喝酒的地方。地窖里充满着劣酒和劣等烟草的气味，充满着喧嚷、笑闹和歌声。这是人间享乐的一种方式。怀着追求快乐的目的从"书斋"出来的浮士德在这里感到厌恶，他开始厌倦了，他要走开。梅菲斯特(魔鬼)又把他带到"女巫的厨房"里去。

④ 乔治·黑威尔格(Georg Herwegh, 1817—1875)，他的《一个活人的诗篇》第一、第二卷，于一八四一至一八四三年在苏黎世出版。

中。我在那些诗里面从未发现多大的才能；只有他的妻子能够拿他跟海涅相比，不过海涅的过分的怀疑态度已经跟当时的风气不合了。在一八四〇年到一八五〇年中间德国人爱好的不是歌德或伏尔泰[①]，而是改编成德国形式的《马赛曲》和贝朗瑞[②] 的歌曲。黑(尔威格)的诗原作(拉丁语：in crudo)的结尾喜欢用一句法文口号，用叠句"Vive La République!"(共和国万岁！)，在一八四二年这样的叠句曾使人兴奋欲狂。在一八五二年这些诗就让人忘记了。不可能再有人读它们了。

当时的民主主义的桂冠诗人黑(尔威格)从一个宴会到另一个宴会，受着全德国的款待，最后到了柏林。人们争先恐后地邀请他，到处举行宴会和晚会欢迎他，每个人都要见他，连国王也想跟他谈话，宫廷医生新来因就介绍他去见了国王。

在柏林，离王宫不过几步光景有一所银行家的住宅。银行家的女儿早已爱上了黑(尔威格)。她从未见过他，也不明白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不过她读过他的诗，她觉得她的天职便是使他快乐，把家庭幸福的蔷薇花编在他的桂冠上。她在她父亲举行的晚会中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她完全相信这就是他，而且他真的变成了她的他。[③]

---

① 伏尔泰(1694—1778)：法国诗人和哲学家。

② P.J.贝朗瑞(1780—1857)：法国诗人。以短歌著名，他常作歌为被压迫者讲话，很得人民爱护。

③ 这是一八四二年秋天的事。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接见黑尔威格，称赞他的诗才，却惋惜他会有那种过激的见解。银行家的女儿就是爱玛·席格蒙特，她的父亲其实是个受过洗礼的犹太富商，而且是王宫的家具采购人。

这个果断的、富于进取心的少女勇敢地开始进攻。起初这个二十四岁的诗人害怕结婚，尤其是跟一个声音响亮而且带阔小姐气派的、并不漂亮的年轻女人结婚，他不愿意；光荣前途的大门在他面前大开着，——他要家庭的安适，要妻子做什么用呢？可是银行家的女儿在目前给他一口袋金子，供给他到意大利、巴黎等处旅行，供给他司特拉斯堡的面饼和羌若的上等葡萄酒……诗人穷得没有办法；他不能永远住在伏伦的家里，——他踌躇又踌躇——后来……接受了她的好意，却忘了向老伏伦（卡尔·福黑特的祖父）道一声谢。

爱玛自己时常对我说诗人怎样小心、仔细地跟她商量嫁妆的事情。他甚至于从苏黎世[①]寄来家具、窗帘等等的图样，而且限定在婚期以前把它们完全办好，——他这样坚持着。

这中间并没有爱情；便应该有别的东西来代替它。爱玛明白这一点，她决定用别的手段来巩固她的势力。他们在苏黎世住了一些时候，她又带她的丈夫到意大利，然后又同他住在巴黎。在巴黎她给她的 schatz〔德语：宝贝〕布置了一间书房，里面有的是柔软的沙发、厚厚的天鹅绒帐幔、贵重的地毯、小小的铜像：她给他安排了一种空虚闲适的生活。这是他从没有经历过的，他喜欢这种生活，可是同时他的才能却渐渐地消失了，他没有写出什么作品；这件事又使她不安，她责备他

① 苏黎世：瑞士北部苏黎世州的首府，一个人口众多的工业城市。黑尔威格为了避免服兵役，于一八三九年离开德国。

不该这样，而同时她又不断地把他拖进资产阶级的豪华生活里去。①

她自己绝不是愚蠢的女人，而且她比他有更多的力量和精力。她的教养是纯粹德国式的，——她读书很多，可是读的并非必要的书，她研究过每个问题，然而并没有把一件事情了解清楚。她完全没有女性的温柔，这给人一个不愉快的印象。从她的刺耳的声音到她的笨拙的举止和瘦削的面貌，从她那冷冷的眼睛到她那种爱谈模棱两可的话题的习惯，她的一切都是带男性的。她当着每个人公开地爱抚她的丈夫，好像老年人爱抚少女一样②：她看他的眼睛，故意望着他，把别人的注意引到他身上去，她拉直他的围巾，梳光他的头发。她把他称赞到惹人厌恶的程度。这使他在生人面前有点窘，但是在熟人中间，他就毫不在意，好像正在专心做事的主人，并不留心他那忠心的狗怎样舐他的皮鞋向他讨好似的。有时候他们在客人去了以后会为这件事吵一次架；可是第二天这个崇拜丈夫的爱玛又会开始她那种溺爱的把戏，他也会为了他的安适生活，为了她热心照料一切的缘故再忍受下去。

下面一个故事比什么都更可以说明她把她的“心肝宝贝”

① 我举一个例子说明她对他的关心会走到怎样的极端。有一次在意大利，黑(尔威格)不满意他们用的香水。他的妻子立刻写信给乔凡尼·玛利亚·法利娜订购上等纯香水，给她的丈夫寄到罗马来。这时他们却离开了罗马，吩咐人把他们的信件、包裹转到拿波里去；他们在拿波里住不久，又到别处去了，仍旧吩咐人把他们的信件转到另一个地方……几个月后一只装着香水瓶的盒子到了他们在巴黎的住所，却要他们付出一笔不小的“旅费”。——作者注

② 爱玛和黑尔威格同岁，都是一八一七年出生的。

宠坏到什么样的程度。

有一回，伊凡·屠格涅夫吃过午饭以后去看他们。他看见黑(尔威格)躺在沙发上。爱玛在擦他的脚，她看见客人进来便走开了。

“你为什么不擦了？擦下去！”诗人疲乏地说。

屠格涅夫问道：“你生病吗？”

“不，一点儿也不，不过这太舒服了。……啊，现在有什么消息？”

他们继续谈话，同时爱玛也继续给他擦脚。

她相信每个人都赞美她的丈夫，便喋喋不休地讲他的事情，并不管这是否会叫别人讨厌，或者她的这些关于他神经衰弱和任性苛求的故事对他有无好处；在她看来这一切都是非常可爱的，而且值得永久、永久刻印在人们的记忆里面；这一点引起了别人的反感。

她常常说：“我的乔治是一个极端的利己主义者，他给宠坏了(zu verwöhnt)；可是谁比他更有权利给人宠坏呢？所有的大诗人一生都是任性的孩子，他们全给宠坏了。……那天他给我买了一枝非常好的茶花；等他回到家里，他很不愿意把它给人，他连看也不给我看，他把花藏在橱里，一直到它枯萎了，——so kindisch!〔德语：这么小孩气!〕”

这是她亲口对我们说的话。这种偶像崇拜使爱玛把她的乔治拉到了一个深渊的边缘，其实他已经落在那里面了，虽然他还没有灭亡，可是他已经沾染了满身的耻辱。

二月革命的喊声把德国唤醒了。心在悸动，谈话在各处

传播，议论和怨声传遍了这个分成三十个部分的德意志联邦。在巴黎的德国工人成立了一个俱乐部，来商量他们应该做些什么事情。法国临时政府也鼓励他们，不过不是鼓励起义，却是鼓励他们离开法国；他们的睡梦确实多少给法国工人惊醒了。不用说，在弗罗公① 发表了送别祝福和哥西及叶②发表了抨击暴君和专制者的激烈演说以后，这些可怜的人回到德国去多半会受绞刑或者遭枪决，或者得到二十年的徒刑；然而他们并不顾虑到这种事。

巴登的远征决定了。但是什么人可以做他们的解放者？什么人可以统率这支由几百个和平的工人和匠人组织的新的armée du Rhin〔法语：莱茵军〕③？什么人？倘使不是这位大诗人，背上背着七弦琴，手里拿着宝剑，骑着他在他的诗中所梦想的“战马”，还有谁呢？——爱玛这样想。他会在战争之后歌唱，在歌唱之后战胜；他会被选做独裁者，他会出席各邦君主的会议，向他们宣布他的德国的愿望；在柏林他的铜像会在菩提树下④ 建立起来，在老银行家的住宅里也可以望见，他的名字也会流传无数年代，让人歌颂不绝……在那些诗歌里，这个忠诚的好爱玛，她跟着他像他的一个佩刀剑的随从，

---

① 斐迪南·弗罗公（1800—1866）：一八四八年二月的法国临时政府的秘书。

② 马克·哥西及叶（1808—1861）：法国的政治家和革命者。——英译者

③ “莱茵军”：一七九〇年及其后驻扎在司特拉斯堡的法国革命军队。

④ 菩提树下：柏林的一条大街，路旁种有四排菩提树和栗树，东头有腓特烈大帝的铜像。

一个仆人，一个传令兵，她 in der Schwert - fahrt〔德语：在行军中〕一直保护着他，她也许不会被人忘记的。她在奈夫·德·柏地·尚街的尤曼拉店里定做了一件黑、红、金黄三色（德国国徽）的女用骑马军服，买了一顶有黑、红、金黄三色帽章的黑天鹅绒帽子。

爱玛托朋友们向那班德国工人提出诗人的名字；他们还没有找到一个领导人，而且记得黑尔威格的诗鼓舞他们参加革命，他们便选他做领袖。爱玛说服他接受了这个位置。

这个女人究竟根据什么理由把她那么敬爱的人推到这个危险的地位去呢？究竟他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什么情形里表现过他的镇定、他的临机应变的才能、他的思想敏捷、他的观察正确和他的勇敢呢？——这都是一个外科医生施手术、一个游击队领袖统率他的部队的时候所不可缺少的。这个软弱的人究竟在什么地方找到力量来刺激他的一部分神经加倍活动、而同时把另一部分压制到毫无感觉呢？她自己既有决断，又能自制，因此她这种行为倒使人对她不能宽恕了，——她忘记了她的丈夫听见一点声音就会惊跳起来，遇到任何灾难都会改变脸色，受到一点肉体的痛苦就会心灰意懒，碰到任何危险都会张皇失措。这是一种可怕的严重考验，在这里一切托辞都没有用，在这里人也不能拿诗和散文救助自己，在这里可选择的道路只有两条：一边是放在坟墓上的桂冠，另一边是逃亡与耻辱，——究竟是什么使她把她的丈夫带进这种考验里面去呢？她所期望的是另外一些东西，——她后来在谈话和信函中无意地把它们讲出来了。

巴黎的共和国差不多没有经过战斗便宣告成立,在意大利革命也正得势,从柏林甚至从维也纳来的消息也明白地报道那些王位已经在动摇了;谁也难想到巴登公爵或符腾堡王能够抵抗革命思想的进攻。说不定自由的喊声一起,兵士便会丢开他们的武器,人民会热烈地欢迎起义者,诗人就会宣告共和国的成立,共和国就会推举诗人做独裁者——拉马丁不是做过独裁者吗?以后,那位独裁者诗人便走遍德国各地作凯旋游行,带着他这位头戴黑、红、金黄三色帽子的爱玛,去接受文武两方面的光荣……

实际上事情却不是这样。巴登或斯瓦比亚的头脑简单的兵士既不知道什么诗人,也不知道什么共和国;可是他却非常知道纪律和他的伍长,而且由于他的奴隶根性,他还爱纪律、爱伍长,而且盲目地服从他的长官。农民事先完全不知道革命党人的计划,革命党人也没有一个认真的计划,并且事前没有一点准备。便是像黑克尔[①] 和威立赫[②]那样勇敢的人也不能够做出什么事情,——他们也失败了,不过他们并没有临阵

① F.K.F.黑克尔(1811—1881):德国民主、社会党的领袖之一,他在德国革命爆发的时候,企图使"准备议会"成为一个永久的议会。他率领了一队革命者进入巴登,后来战败,亡命瑞士,又移居美国从事耕种。在美国内战时期他组织了一个德国联队,指挥着一旅德国志愿兵。——英译者。

② 威立赫:著者在另一处讲到威立赫时有这样的话:"他是一个心地洁白、性情善良的人,一个普鲁士的炮兵士官;他参加革命,成了一个共产主义者。在黑克尔领导的起义中他指挥炮兵为人民作战,等到革命完全失败才去英国。他到了英国,身边没有一个钱,他想以教授数学和德文为生,可是他的运气很差。他便抛弃他的教本,不顾他的军官身份,勇敢地去做一个普通工人……。"

脱逃，同时他们幸而没有一个崇拜他们的德国女人跟在他们身边。

开火的时候，爱玛看见她的吓得脸色苍白的乔治眼里含着恐惧的眼泪，准备丢开他的军刀逃到什么地方去躲藏起来，——她便帮忙完成他的毁灭。她冒着炮火站在他的前面，要他的同志们救出这位诗人。兵士们胜利了。爱玛自己甘冒受伤、被杀、被俘（即是先受一顿鞭打、然后被送到司潘道或拉席塔特[①] 禁锢二十年）的危险，掩护她的丈夫逃出了危险区域。

他在战斗开始就躲藏在一个附近村庄里。[②] 他跑到一个农民家里去。哀求农民把他隐藏起来。农民起先还不能决定，他害怕兵士们来搜查，可是后来终于叫他进到院子里。农民四处找寻，找到一只空桶，便把他藏在桶里，上面再盖着稻草，农民是冒了受笞刑、遭禁锢、而且家屋遭洗劫的危险这样做的。兵士们果然来了，农民并没有出卖诗人，却送了一个信给爱玛，让她来带走她的丈夫，把他藏在一辆大车里，她自己也换了服装，坐在车夫座位上，这样载着他出了国境。

"救你的人叫什么名字?"我们问他道。

"我忘记问他，"黑（尔威格）安静地回答。

他那些给激怒了的同志气愤地攻击这位不幸的诗人，同时还责备他发了财，住着"镀金的"住宅，责备他那种贵族的优

① 拉席塔特：德国的要塞，当时是囚禁犯人的地方。

② 据说事实并非如此。

柔性格等等。他的妻子对自己所做的事情的关系不明白到了极点，她居然在四个月以后出版一本小册子替她的丈夫辩护，在这本小册子里她叙述了她自己的功劳，却忘记她的故事在他身上投下了什么样的阴影。

不久便有人出来攻击他不仅临阵脱逃，而且浪费公款，藏匿公款。据我想，他并没有侵吞公款，不过同时我相信钱大概给这一对军人夫妇任意乱花在一些毫无必要的用途上面了。巴·安(宁科夫)亲眼看见他们在雪威店里购买肚皮里填塞麦蕈的火鸡和肉馅饼，并且把酒和别的东西装在将军的旅行马车里面。钱是弗罗公按照临时政府的指示给的；这笔款子的数目据两方面所说相差很远：法国人说有三万法郎，黑(尔威格)却声明他所收到的还不到这个数目的一半，不过他的旅费是法国政府付出的。在这个罪名以外，那些回来的起义者还附加说，他们失败以后到了司特拉斯堡，又饿，又没有衣服穿，身边一个钱也没有，他们去找黑(尔威格)求帮助，他却拒绝了——爱玛甚至不许他们和他见面——而他自己却住在一家豪华的旅馆里穿着“黄色摩洛哥皮拖鞋”。他们为什么把这一对拖鞋看作奢华的标记，我不知道，但是我听见他们十多次提起这对黄色拖鞋。

这一切仿佛是一场梦。三月初这班 in spe〔拉丁文：未来的〕祖国解放者还在巴黎举行庆祝宴会；五月中旬他们战败了，又跨过法国边境逃回来。黑(尔威格)回到巴黎，也就醒悟了，知道他的到达光荣的小路给堵住了，现实生活严酷地使他记起他自己的限度；他明白他的地位——他妻子的诗人和临

阵脱逃的独裁者——是很不利的。……他必须开始新的生活，否则他便会堕落到底。我还幻想(这便是我犯了最大错误的地方)他会改掉他的性格的缺点。我还幻想我在这方面比任何人都更能够给他帮忙。

我每天都听见这个人对我说这一类的话(他后来还写在信里)，我怎么能不这样想呢？他对我说："我知道我的性格的可怜的弱点，——你的性格比我的更爽朗、更强，——请你支持我，做我的哥哥，做我的父亲……我没有一个亲近的人，——我的友爱都集中在你的身上；你用了爱和友情可以使我变成无论什么样的人。请你对我不要太严厉，请你和蔼一点，宽容一点。让我握着你的手……而且我实实在在不会放掉它，我要守住你。……我在某一件事情上并不比你差，也许我还要超过你：这就是在我对我亲爱的人的无限的爱慕上。"

他不是在说谎，不过这一番话并没有给他加上一个责任。他不是在说谎，不过他并没有准备为真理贡献什么。他去参加巴登起义，也并不是存心要在战斗的时候离开他的同志，可是一看见危险他就逃走了。只要是在没有冲突、没有战斗的时候，只要是在用不着努力或牺牲的时候，一切都会进行得非常好，——也许经过许多年，也许经过一生都没有问题……可是倘若在路上遇到了绊脚石，那么不幸、罪恶行为、羞辱都会来了。

为什么我当时不明白这一点呢？

在一八四八年年底，黑(尔威格)差不多每天晚上都到我

们这里来。他在家里很闷。爱玛实在把他烦够了。她从巴登远征回来，一点也没有改变。她对过去发生的事情也没有深刻地考虑一下。她还是和从前一样，热爱她的丈夫，感到满足，喜欢讲话，好像他们夫妇是凯旋回来似的，至少他们背上没有带一点伤痕。只有一件事情使她焦虑——这就是缺少金钱，而且她很明白地知道不久连一个钱都会没有了。他所参加的失败了的革命并不曾解放德国，也没有把桂冠放在诗人的头上，但是它却把那个老银行家（爱玛的父亲）完全毁了。她不断地努力消除她丈夫的忧郁的思想；她却从没有想到只有这些忧愁的思想或者可以拯救他。

浅薄、轻浮的爱玛对于深刻的内心的东西毫无要求，在她看来这种东西只能够产生痛苦。她天性很单纯，好像两拍子的简单调子一样——遇到一切难题都爱用她那"或此或彼"（entweder oder）来一刀斩断乱麻；往左往右在她都没有关系，只要她能够脱身出来，再赶上前去。到什么地方去呢？她自己也不知道。她常常在谈话中间忽然插入一段逸事或者一点实际的见解——虽然它的实际属于最不高明的一类。她相信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像她那样有许多实际的判断力，因此她不但不用娇媚来掩饰她的事务才干，她反而卖弄风情似地把它们表现出来。我还应该说她从没有表示出一点真正实际的判断力。无事自扰，小题大做，议论物价，议论厨子、家具、物品，这跟事务才干完全不相干。在她的家里所有的东西都是杂乱无秩序的，因为她的偏执狂支配了一切；她随时都是小心提防着，留心看她的丈夫的脸色，她把他个人的任性看得比一

切主要的生活必需品更重要，甚至比他们的儿女的健康与教育还重要。

黑(尔威格)很自然地想离开家庭，在我们这里找寻和谐的宁静；他把我们的家看作一种理想的家庭，他爱这里的一切，崇拜这里的一切，我们和我们的儿女他都一样地爱。他梦想跟我们一起去一个遥远的地方——从那里静静地旁观漆黑一片的欧洲悲剧的最后一幕。虽是这样，然而除了对于一般事物他和我们有相同或极相似的理解外，我们中间却少有共同之点。黑(尔威格)要利用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他专为他自己打算，他胆怯地、同时又自负地追求人们的注意，他一面怀疑自己，一面又相信自己的优越。这一切使他成为喜欢卖弄而且反复无常的人，有时候他是故意地忧闷，故意地仔细，或者故意地疏忽。他永远需要着一个正像爱玛那样的可以同时做他的向导、他的心腹、他的朋友、他的奴隶的人，这个人在不需要的时候应该忍受责备和冷淡的待遇，可是只要他一招手就应该马上跑回去，而且带着笑容顺从地做他所命令做的事情。

我也在追求爱和友情，追求同情，甚至追求别人的赞美，我努力争取它们，可是我绝没有这种在 dépit〔法文：忧闷〕和在分辩解释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女性的狡猾，这种求人注意求人宠爱的永久的渴望。也许我的极端的真实、我的过分的自信、我的行为的健康的真诚——我的 laisser - aller〔法语：大意〕——也是从虚荣心来的，也许我是由它们把灾难招致到我的头上来的，然而情形确是如此。在欢笑和在悲痛中，在爱

和在公众利益中，我诚恳地献出了我自己，我可以完全忘记自己地快乐或悲伤。我有坚强的体力和毅力，因此我独立不倚，信任自己，我准备随时援助别人，可是从不求别人可怜我，给我帮助或支持。

我和黑（尔威格）有着这样相反的两种气质，所以我们中间有时候很难不发生一点不愉快的冲突。可是第一，他对我比对别人更加小心；第二，他悲痛地向我承认他的不是，这样完全解除了我的武装；他并不替自己辩护，不过拿友情的名义恳求我宽恕他那种软弱的性格，他自己已经承认、而且责备这种弱点。我好像是他的一种监护人，我在别人的面前庇护他，我劝诫他，他顺从地接受了我的意见。他的这种顺从是爱玛极不喜欢的，她妒嫉地嘲笑它。

一八四九年来了。

第三章

心的迷乱

在一八四九年我渐渐在黑(尔威格)身上看出了各种变化。他那喜怒无常的性情越发喜怒无常了;他时常感到难堪的忧郁和软弱。他的岳父破产了;剩下的一点钱要留给家里其余的人作生活费……贫穷更不客气地叩着诗人的门。……他想到这个就要打颤,而且完全失掉男人气概。爱玛弄得筋疲力尽,东西借贷,赊欠物品,出卖她的东西——竭力使他看不出来他们的真正处境。她自己不但连必需的东西都不要,而且也不给孩子们做一件内衣,为着使她的丈夫可以在蒲洛文沙兄弟公司[①]吃顿午饭,买一些无用的东西。他只向她要钱,却不知道钱从哪里来,而且他也不想知道。我为这件事责备过爱玛,我对她说她是在毁他,我也曾向他提起,——他坚决地不肯听我的话,她也在使性,一切事情还是照从前那样。

他虽然害怕贫穷到可笑的程度,但是这还不是他的苦闷的原因。在他为他自己悲叹的时候,他说来说去总是同样的

① 蒲洛文沙兄弟公司:当时巴黎的一家大饭店。

一套话，我听得讨厌起来。黑(尔威格)永远抱怨他自己的软弱，同时又责备我，说我不需要亲切和温存，说他在憔悴、毁灭，没有一个人伸手援救他，说他是这样寂寞、这样不幸，所以他想死去，说他对爱玛虽然十分尊敬，可是他那敏感、纤细、与众不同的心灵受不了她的严厉粗暴的接触，甚至受不了她的“响亮的声音”：他这样反复地诉苦，终于叫我听得厌烦了。然后他又热烈地向我保证他对我的友情是多么深远……在他这种狂热的、失常的激动状态中，我开始看出来一种特殊的情感，这使我吃惊，使我为他、同时也为我自己警惕了。在我看来，他对娜达丽的友情已经有了一种更多激情的性质。……这个时候我不能有什么举动，我只好沉默，我开始忧愁地预料着我们正从这条路走向大的灾难，结果我们的生活里一定有什么东西给毁掉。

……一切都毁掉了。

他反复地谈他的绝望，他不断地哀求人照顾他，哀求人给他一句温暖的话，他始终离不了这样的话……哭诉，不停地哭诉……——这一切在一个女人的心上自然会发生很大的效力，何况还是这样的女人，她那好不容易得来的宁静刚刚给毁坏了，而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这种非常悲惨的环境又在使她痛苦。

娜达丽有一次对我说：“你缺少一种东西，不过对于你这样的性格，没有它倒也很合适：你不了解人想望一个母亲、一个朋友或者一个姊妹的温柔爱护的心情，正是这种想望在折磨黑尔威格。我了解这心情，因为我自己也感觉到它。他是

一个大孩子，而你却是一个成年人；一件细小事情都会使他快乐或者叫他伤心。一句冷酷的话对他差不多是致命的打击，我们应该爱惜他。……在另一方面说，你看他为了一点点小的照顾，为了一点点亲切，为了一点点同情，就多么感激地感谢别人！……”

这是真的?!……然而不，倘使真是这样，他一定会在告诉她以前自己先对我说。……我始终没有泄露他的秘密，我并不曾提过一句，我只惋惜他没有对我说。一个秘密是可以保守的，只要它不曾在任何人面前泄露，而且也只有在对任何人都不泄露的时候。倘使他说出了他的爱情，那么他绝不能够对一个在精神上和他如此亲近的人沉默，而且隐藏着一个和那个人有着如此密切关系的秘密。可是他并没有说出来……我这一次也忘记了那本题作《亚美尼乌斯》的旧小说。

……一八四九年年底我从苏黎世到巴黎去交涉取回被俄国政府扣留的我母亲的款子。我离开日内瓦的时候，跟黑(尔威格)分别了。我到了伯尔尼又遇见了他。我看见他拿着《从彼岸来》的校样正在对特列佛斯的西蒙①朗读里面的几段。他看见我连忙跑过来，好像我们几个月没有见面似的。我在这天晚上离开伯尔尼，他连一分钟也没有离开过我，他反复地

① 路德维席·西蒙(1810—1872)：特列佛斯的律师。一八四八年被选为德国国民议会中极左派的议员。一八四九年他亡命瑞士，特列佛斯法庭将他缺席判决死刑。他在一八五五年出版了一本题作《亡命记》的书。——英译者注

说着最热情、最友爱的话。他这时候为什么找不到力量对我坦白地公开承认呢？……我当时对他还怀着好感，那么一切事情会处理得合乎人情。他送我到驿站，跟我道了别，他把身子靠在大门上，驿车经过大门开走了，他还留在那里揩眼泪。……这差不多是我还真正爱着这个人的最后一分钟了。……只有在思索了一个整夜以后，我才想到一个字眼，我不能把它从我的头脑中去掉："——灾难，灾难！……将来会有什么结果呢？"

我的母亲不久便离开巴黎。我住在爱玛的家里，不过实际上就只有我一个人。我需要这样的孤寂；我要背着人清清静静地思索，我究竟应该怎样做。娜达丽来了一封信，说起她对黑(尔威格)的同情，这给了我一个机会，我决心写信给她，说明我的意思。我的信[①] 的语气是悲痛的，但也是安静的；我求她平心静气、仔细地检查一下她自己的内心，我求她对她自己要坦白，对我也要坦白，我还要她记住我们两个人是被过去的一切、被我们的一生过于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在我们中间不能有任何隐匿的事情。

"我接到你九日的信"(娜达丽回信说，这封信还保存着，差不多所有别的信都在政变的时期中烧毁了)，"我也坐着，只是惊愕地想：这是什么缘故？我哭着，哭着。也许这全是我的错，也许我不配活下去，不过我的心情恰恰和晚上我一个人静静地给你写信的时候一样。我在你面前，在全世界面前都

---

① 指一八五〇年一月九日的信。

是没有罪的，我的心灵里也没有一点自责的感觉。我在我对你的爱情里面生活惯了，犹如我在上帝的世界中生活惯了一样；倘使我不在这里面生活，我也就不会在别的地方生活下去！从这个世界里逐出来，——到哪里去呢？——我须在别处重生。我不能跟它分离，犹如我不能跟大自然分离一样，我从它里面出来，我又走回到它里面去。我从没有一刻有过另外的感觉。这是一个宽广的、丰富的世界；这样丰富的内心的世界我还没有见过，也许它太宽广了，也许它把我的存在和它的需要过于扩大了——在这种满足之中，有一些时候（这是在我们的共同生活的开始就有了的）在我的心灵深处有一种像细毛那样的东西隐隐地搔痛我的心灵，然后一切又是愉快的了。……”

娜达丽在另一封信里又说：“这个没有满足的东西，这个闲着的、而且被摒弃了的东西追求着另外的同情，而且在黑（尔威格）的友情里找到了它。”

这并没有使我满足，我再写信给她：“不要害怕看到你自己的内心深处，不要勉强去寻找解释。你靠着强辩不会逃出漩涡的，它仍然会把你冲走。在你的信里有一种我不熟习的新的调子，这不是忧郁的调子，却是另外的一种……现在一切都还握在我们的手里……让我们拿出勇气来彻底解决。我们既然把那个折磨我们心灵的秘密用文字表现出来了，那么黑（尔威格）便是我们的和声中的一个失调，否则我就是。我准备带着沙夏到美洲去，然后我们会看清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这对我是很痛苦的，不过我要竭力忍受；在这里住下

去我更痛苦——而且我实在受不了!"

她带着恐怖的叫声回答我这封信,她从来没有起过跟我分离的念头;"你怎么能够!……你怎么能够!……——我离开你……好像那是可能的!……不,不,我只想到你身边来,立刻到你身边来。……我就要收拾行李,几天以后我就会和孩子们一起在巴黎了!"

她离开苏黎世的那天又写信给我:"就像经过了风暴和遇险以后一样,我回到你身边来,回到我的故乡来,我充满着信仰,我充满着爱。我只希望你的心境和我这时候的一样就好了! 我比以前什么时候更快乐! 我还是一样地爱你,不过我现在更认识你的爱了,而且我欠生活的债也都偿清了,——我不再指望什么,也不再要求什么。至于那些误会!——我感激它们,它们使我明白许多事情,它们就会过去,而且会像乌云那样地消散的。"

我们在巴黎的会面[①]并不是快乐的,不过它使我们深切地、真实地承认:我们生活的根已经十分牢固,就是风暴也不能将它们拔起:要把我们分开,并不是容易的事。在那个时期的长谈中间有一件事情使我很惊奇,我把它仔细研究了几次,每一次我都相信自己不错。娜达丽还保留着对黑(尔威格)的爱情,可是他不在她面前的时候,她好像呼吸得更畅快,

---

① 这是一八五〇年一月底的事。娜达丽带着孩子们于一月二十六日凌晨到达巴黎。全家住在和平路的米拉波旅馆。第二天娜达丽写信给黑尔威格说:"直到这一天我还不明白我多么离不开亚历山大;一点点疑心就会杀死他。……"

她好像从什么魔术符咒的圈子里逃出来了一样；她怕他，她觉得他的心灵里有一些狠毒的力量，她害怕他那种无限的利己心，她到我这里来找寻支持和保护。

黑(尔威格)虽然不知道我和娜达丽中间来往的信札的内容，他却猜到我的信里一定有什么不好的话。事实上，把别的一切事情撇开不谈，我也很不高兴他。爱玛挣扎着，哭着，用尽方法来使他满足，送钱给他用，而他不是不回她的信，便是写信挖苦她，而且不断地向她要更多的钱。

我保存下来的他写给我的信，与其说是朋友的函札，不如说是充满焦虑的情书。[①] 他含着眼泪责备我的冷淡，他哀求我不要撇弃他，他失掉我，失掉以往的完全明朗的同情便不能够生活，他诅咒我们的误会和那个“疯狂的女人”(指爱玛)的干涉，他渴望着开始一种新的生活，——在遥远地方的生活，跟我们在一起过的生活，他又称我做父亲、哥哥、知己朋友。对这一切我用了各种口气回答他：“你要想想看，你是不是能够开始新的生活，你是不是能够摆脱……堕落腐败和腐烂的文明，”——我两次向他提起阿乐哥[②]，那个老茨冈对阿乐哥说：“骄傲的人，走开罢，你只求你一个人的自由。”[③] 他用眼

① 在赫尔岑的文件中还保存着黑尔威格用法文写的二十封信(自一八四九年十二月至一八五〇年七月)，其中十九封都是写给赫尔岑的，只有一封是给娜达丽的。赫尔岑并未了解黑尔威格的用意。所有这些信主要地是为着娜达丽写的，而且她全读过。娜达丽写给黑尔威格的信全保存下来，后来由黑尔威格的儿子马赛尔送给伦敦不列颠博物馆了。娜达丽却烧毁了黑尔威格写给她的信。

② 阿乐哥：俄国大诗人普希金(1799—1837)作长诗《茨冈》中的主人公。

③ 这是阿乐哥杀死了他妻子的情人后，他岳父对他说的话。

泪和责备来回答我这封信，可是并不曾坦白地吐露他的胸怀。他在一八五〇年中间的信函和我们在尼斯的最初几次的谈话揭露了一件可怕的事情……这是什么？是欺骗？是背叛？是说谎？……不，还是那件旧的东西——就是我常常责备西欧人所具有的那种优柔寡断的两重性格，我许多次反复思索过我们这个可悲的戏剧的一切细节，我总要停下来惊愕地想：这个人怎么一次也没有吐露过他的胸怀，连一句话也没有，连一点真实的感情冲动的表示也没有。他既然觉得不能对我坦白，他怎么能够设法越来越亲密地接近我，而且在他的谈话里还触到那些心灵中的圣地（要触到它们，必须不亵渎完全的、相互的诚实才行）呢？

当他猜到了我的疑心，不仅坚守他的秘密，而且更热烈地向我保证他对我的友情，一面又更加努力用他的绝望来感动那个心意彷徨的女人的时候，——当他开始消极地用他的沉默欺骗我、一面又恳求她（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不要疏忽地漏出一句话，使他因此失去我的友情的时候，——这便是犯罪的开端了。

犯罪！……是的……以后的一切苦难都是它的简单的不可避免的后果——死阻止不了这些苦难，忏悔也阻止不了这些苦难，因为它们不是惩罚，却是后果。……事情一经做过，完全无法改变，因此后果会传到下代。赔偿、悔改可以使一个人跟他自己、跟别人和解，忏悔可以救赎一个人，但是他的行为的后果会走它们自己的可怕的路。为了逃避它们，宗教发明了天堂——它的外厅便是寺院。

……我被驱逐，离开了巴黎[1]，差不多同时爱玛也给驱逐出法国。我们决定在尼斯住一两年(这个地方当时还属于意大利)，爱玛也到了那里。这以后不久，就是在快到冬天的时候，我的母亲要到尼斯来，黑(尔威格)要跟她一道来[2]。

为什么我同娜(达丽)到那个城市去呢？我和别人都想过这个问题，不过这实在是一个很小的问题。就是撇开我到什么地方黑(尔威格)也能到什么地方这个事实不提，我能够用地理的和别的外部的方法来避免侮辱么？

黑(尔威格)到达后的两三个星期中间，他带着一位绝望到了最后阶段的维特[3] 的神气，这种神气非常显著，所以一个经过尼斯的俄国医生相信他开始发狂了。他的妻子平常总是含着眼泪：——他待她很坏。她会跑到娜(达丽)的房间里哭几个钟头，她们两个人都相信今天明天他就会投海，或者用手枪打死自己。娜(达丽)的苍白的脸颊和焦虑的表情，还有她甚至跟儿女在一起的时候，也露出来的那种惊惶不安、心中有事的神情，使我很清楚地看出来她内心的痛苦。

我们谁都没有说出一个字，但是在表面的平静中，我看见什么凶恶的东西逐渐地逼近——好像有一对发光的点子不断地在树林边上时隐时现，表示一只猛兽等在那里。万事都急

① 赫尔岑全家于同年六月十七日离开巴黎。

② 同年八月二十二日黑尔威格到了尼斯。

③ 维特：歌德的小说《少年维特的烦恼》中的主人公，因失恋而自杀。

速地向着一个结局进行。这个结局却因奥尔迦[1] 的诞生延迟了。

① 奥尔迦：赫尔岑的幼女，一八五〇年十一月二十日诞生于尼斯。

第 四 章

又一年(一八五一年)

新年前娜达丽把她在画家居约[1] 那里订购的一幅水彩画拿给我看。

这里面的是我们宅子前面的阳台,还有一部分的房屋和院子,孩子们在院子里玩,达达的山羊也躺在那里,娜达丽自己在后面阳台上。我以为这幅画是送给我的,但是娜(达丽)说她打算把它送给黑(尔威格),作为新年的礼物。

我很不高兴。

"你喜欢它吗?"娜(达丽)问道。

"我非常喜欢这幅水彩画,"我说,"要是黑尔威格允许的话,我也要订一幅。"

娜达丽从我的苍白的脸色和声音,便知道这句话是一种挑战,而且还是内心的大风暴的一个证据。她望着我,眼里含着泪水。

"你拿去罢,"她说。

---

① J.居约(1810—1876):当时的著名画家,出生于尼斯的法国人。

"绝不，这太儿戏了……"我答道。

我们没有再说下去。[1]

我们在我的母亲那里度过一八五一年的元旦。我非常烦躁不安；我坐在福黑特[2] 旁边，一杯又一杯，不停地斟满他的和我自己的酒杯，我还不断地说着尖锐的、讽刺的笑话。福黑特大声在笑。黑(尔威格)带着愁烦的眼光皱着眉头默默地望着。后来他明白了。他喝了祝贺新年的酒以后，还举起他的杯子，并且说他的唯一的希望是：新来的这一年不要比过去的一年更坏，他全心全意地希望着这个，不过不见得有把握。他反而感到一种不吉的预兆，他耽心一切、一切都会毁灭。

我没有说一句话。

第二天早晨我拿起我从前写的小说《谁之罪》[3] 翻看，我读了柳冰卡的日记和最后的几章。难道这是我自己的命运的预言，就像奥涅金[4] 的决斗是普希金的命运的预兆吗？……但是我的内心的声音对我说："你是一种古怪的克鲁采弗尔斯

---

① 这张画还是送给黑尔威格了，娜达丽亲笔在画上题了字："苍白的娜达丽在阳台上"(德文)和"娜给乔"。最后用俄文写上日期："一月四日，星期六。"

② 福黑特：卡尔·福黑特(1817—1898)，德国博物学者。

③ 《谁之罪》：赫尔岑的长篇小说，一八四五年出版。下文的柳冰卡即柳波尼加或柳波芙，《谁之罪》中的女主人公。她和她丈夫的朋友别里托夫恋爱。柳波芙的日记在《谁之罪》的《后篇》中。

④ 奥涅金：普希金的长诗《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主人公。他在决斗中杀死了他的朋友年轻诗人连斯基。普希金自己后来也在决斗中被害。

基[1]——，而且，老实说，他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别里托夫[2]呢？他的高尚的真诚在哪里？我的含泪的自我牺牲又在哪里？”在我相信娜达丽沉溺在一时的迷恋中的时候，我更相信我应该为着这件事跟他战斗到底，使他不会把我从她的心上赶走。

……果然不出我的预料：娜达丽自己先跟我谈这件事情。

经过了关于那幅水彩画的争论和在我母亲家里的新年聚会以后，再要敷衍下去，是不可能的了。

我们的谈话是痛苦的。我们两个都不是站在前一年那样的高的水平上面了。她感到惊惶不安，她害怕他离开，又想她自己走开，回到俄国去住一年，可是她又害怕走。我看见她在踌躇，我看见他用他的利己心要把她毁掉，……她不会有抗拒的力量。他的沉默激起了我的憎恨。

我又对她重说一次：“我把我的命运放在你的手中。我再求你把一切衡量一下，把一切估价一下……我仍然准备接受任何的决定，——我可以等候一天，等候一个星期，不过这次的决定必须是最后的决定。”我又说：“我觉得我已经到了我的力量的限度了；到现在我还可以循规按理地行事，不过我也觉得我不能够长久这样。”

“你不要走开，你不要走开！”她淌出眼泪说，“你走了，我

---

① 克鲁采弗尔斯基：柳波尼加的丈夫，他为了妻子的幸福，愿意牺牲自己。他整天“发狂地喝酒”，借酒浇愁。

② 别里托夫：《谁之罪》中的男主人公。他爱上了友人的妻子，最后为了顾全友人的幸福离开了俄国。

不能够活下去。"

她这样的话并不是轻易说出来的。"他必须走。"

"娜达丽,你不要着急,不要这样着急地就作出最后的决定,正因为这是最后的决定了。……等等罢,……你想想——你要考虑多久都可以,不过请你给我一个最后的回答。像这样的情感的反复涨落,我实在受不了……它们使我变愚蠢了。我现在变成了一个褊狭的人,我要发狂了。……任凭你要我怎样都行,不过这一次必须是最后的决定……"

就在这个时候我母亲带了柯立亚坐车来邀我们到门托勒去;我们全家出去上车的时候,看见马车里少一个座位。我指着空座位要黑(尔威格)坐下。黑(尔威格)平时虽然不是一个精细周到的人,这个时候他也不肯坐。我看看他,猛然把门碰上,对车夫说了一声:"走!"剩下我们两个单独地站在住宅前面的海滨。[①] 我觉得我的心上仿佛压着一块石头;他沉默着,脸色白得像一张纸,他躲避我的眼光。我为什么不对他明说,或者把他从岩上推到海里去呢?一种神经的软弱阻止了我。他对我说起诗人的痛苦,又说生活安排得非常坏,弄得一个诗人到处给人带来不幸。他自己受苦,也使每个跟他亲近的人受苦。……我问他读过乔治·桑的《奥拉斯》[②] 没有。他记不

---

① 赫尔岑和黑尔威格都没有上车。

② 《奥拉斯》:乔治·桑的长篇小说。书中的主人公奥拉斯是个有虚荣心的,优柔寡断的冒险家,为人自高自大,缺乏道德的勇气,他的财产就是他那副漂亮脸孔。

起了。我劝他读这小说。他便到威斯公地[1] 去找这本书。

我以后就没有再看见他了。

在六点到七点的中间，我们都坐在饭厅里用午餐，他不在。他的妻子走进来，她的眼睛哭肿了；她说他的丈夫病了——我们大家互相望着——我觉得我真可以把我手里拿的小刀刺进她的身体去。他把自己关在顶楼上他的屋子里面。他用这种 étalage〔法语：装模作样〕自绝于人。……以后我对待他就用不着顾虑了。

后来外人都走了，孩子们也睡了，——我们夫妇单独在房里。娜达丽坐在窗口哭。我在屋子里踱来踱去，血就在我的太阳穴跳动；我简直透不过气来了。

"他走了，"她终于开了口。

"我想那是用不着的；应该我走。"

"天呀……"

"我走。"

"亚历山大，亚历山大，你不怕会后悔吗！……你听我说：救救我们大家。只有你一个人能够这样做。他毁了，他振作不起来了，——你自己知道他多么敬重你；他那种疯狂的爱，他的那种疯狂的友情，还有他知道他使你受痛苦的自觉……而且更坏的……他想走开，想在我们的眼前消失……所以你一定不要把事情弄得更复杂，不然的话，他会自杀的。"

"你相信吗？"

---

[1] 威斯公地：本地的书店。

"我完全相信。"

"他自己这样说过吗?"

"他自己,还有爱玛。他已经把他的手枪擦干净了。"

我忍不住大笑起来,问道:"这是他在巴登用的那支手枪吗? ——他倒应该把它擦干净,它一定落到污泥里去过。不过你也可以对爱玛说,我愿意抵偿他的生命。我愿意给他的生命保险,不管多大的数目都行。"

"你当心你会为你的笑后悔的,"娜达丽说着,悲痛地摇她的头。

"只要你愿意,我就去劝阻他……"

"那么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结果么,"我说,"那是难预料的,而且更难躲开。"

"我的上帝! 我的上帝! ——我们的孩子,可怜的孩子,他们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呢!"

"你早就应该想到他们!"我说。

不用说这是我对她说过的话中间最残酷的。我当时气得太厉害了,我不能够合乎人情地了解我说的话的意义。我觉得有什么东西在我的胸中、我的脑里搐动,我不仅可以说出残酷的话,我也许还可以做出流血的事情。她完全给悲痛压倒了;接着是一阵沉默。

过了半点钟,[①]我愿意喝干我的苦杯,又对她发出几句问

---

① 下面一部分的话是从一八五二年三月我写给豪格的信中摘出来的。——作者注

话，她一一回答了。我觉得我自己已经完全破碎了，野蛮的复仇的冲动、妒忌的刺激和受到损害的自尊心使我迷醉。任何刑罚和绞刑架，都不能使我感到恐怖！我的生命不值一个钱了。这是逼着人做出任何疯狂、可怖的行为的一个主要条件。我不说一句话，我抄着两只手站在客厅里那张大桌子前面，……我的脸完全扭成了怪相①。

沉默继续下去。我忽然掉过眼睛去看她，我吃了一惊：她的脸上罩着一层死色，——一层青白色；她的嘴唇是白的，她的嘴痉挛地半张开；她不说一句话，只用空虚的、疯狂的眼光看我。这种无限的痛苦和无言的悲痛的神情立刻镇定了我的激情的骚动；我可怜她，眼泪顺着我的脸颊流下来。我真想跪在她的脚前，求她的宽恕。……我在沙发上坐下，坐在她的身边，拿起她的手，把我的头放在她的肩上，轻轻地用温和的声音安慰她。

我的良心折磨我，——我觉得我做了一个残酷的审问官，做了一个拷问者……难道这是必要的吗？难道这就是一个朋友的帮助吗？这就是同情吗？难道我失掉了我的教养、我的人性，我在妒忌和愤怒突然发作的时候，居然能够拷问一个不幸的女人，扮演蓝胡子② 那样的脚色吗？

几分钟过去了，她没有说一句话，她还不能够说一句

---

① 赫尔岑写给豪格的很长的回信中有一句："我向你承认，我有过杀死娜达丽的冲动。"

② 蓝胡子：据中世纪法兰西的传说，蓝胡子是个杀死六个妻子的丈夫。

话，——于是她抱住我的颈项抽泣起来。我让她躺在沙发上，她疲乏得没有一点力气，她只能说："不要害怕，我的朋友，这是好的眼泪，感动的眼泪……不，不；我绝不离开你。……"

她的激动和带痉挛性的抽泣使她不能支持下去，她闭上了眼睛，——她晕过去了；我把香水倾倒在她的头上，打湿她的鬓角；她渐渐安静下来，睁开眼睛，捏住我的手，又落入半昏迷的状态中，这样地继续了一个多钟头；我仍然跪在她的身边。后来她睁开眼睛，看到我的平静的、悲戚的眼光，——眼泪还顺着我的脸颊在流，她对我微微一笑……

这是一个转机。从这一刻起很强的魔法便开始减弱了，毒药也减少了它的效力。

"亚历山大，"她的精神稍微恢复了些，她便对我说，"你去了结你那件事情，你答应我，——我一定要看见你把它了结，不然我便不能够活下去，——你答应我一定不用流血去了结它，你想想我们的儿女……你想想要是没有你、没有我，他们会变成什么样子。"

"我答应你要尽我的能力避免冲突，再大的牺牲我也不顾惜，不过为了这个你得保证一件事：他必须明天离开，——至少要到热那亚去。"

"这一定照你的意思办到……我们要开始新的生活，一切过去的事情都让它过去吧。"

我热烈地拥抱她。

第二天早晨爱玛到我的屋子里来。她头发散乱，眼带泪

痕,穿一件短罩衫,腰间束一根细带子,样子非常难看。她带着悲痛的神情慢慢地走到我面前。在平时我看见这种德国人的夸张的做作,一定会大声笑起来。……现在我却没有笑的心思。我不请她坐下,而且也不掩饰我并不高兴她来看我。

"您有什么事情?"我问道。

"他要我来的。"

"您丈夫要什么东西,"我说,"他自己可以来,不然,也许他已经自杀了?"

她把两只手抄在她的胸前。

"您就这样说——您?!他的朋友?!……我真不明白您!难道您还不了解在您眼前演的悲剧吗?……他的纤弱的体质不能够在他跟她分开以后,也不能够在他跟您决裂以后继续活下去。是,是,他不能跟您决裂!……他为了他带给您的苦恼正在哭着,——他要我来告诉您,他的生命捏在您的手里,他要求您把他杀掉……"

"这简直是喜剧,"我打断了她的话。"您看,什么人会像他这样请别人去杀他,而且叫他的妻子去请人?我讨厌这种庸俗的传奇剧里的把戏。我不是一个德国人。"

"Herr Herzen!〔德语:赫尔岑先生〕!"

"黑尔威格夫人,您为什么要担任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使命呢?您当然想得到我这个时候不会对您说什么愉快的话。"

"这是一个注定了的灾难,"她停了一下说,"您跟我同样地受到了它的打击……不过您看,您的气愤和我的忠诚是多么地不同……"

“太太，”我说，“我们扮演的角色不同；我求您不要拿它们来比较，恐怕倒是您应该红脸。”

“绝不！”她生气地说，“您不知道您在说些什么。”然后她又说：“我要把他带走，我不让他再像这样地过下去，——您的希望会实现的。不过您在我眼睛里不再是那个我十分敬重的人、乔治的最好的朋友了。不，您要是那个人的话，您一定会跟娜达丽分开，——让她走，也让他走，——我会跟您同孩子们留在这里。”

我大声笑起来。她的脸变得通红，她带着因恼怒而发颤的声音问我：

“这是什么意思？”

“您为什么在谈正经事的时候开玩笑？”我对她说：“不过这也够了。这是我的哀的美敦书：您马上到娜达丽那里去，您一个人去，您去跟她谈；倘使她愿意走，我就让她走，我不会妨碍任何人或者任何事情，不过请您原谅我，我不要您留在这里，我自己还可以料理家里的事情。不过，您听我说……倘使她不愿意走，那么我跟您丈夫同住在一个屋顶下，今晚上就是最后的一次了。过了这一夜我跟他绝不会一块儿活着住在这里。”

一小时以后，爱玛回来了，她忧郁地通知我（听她的语气好像她要说：“看您的坏心的成绩！”）：

“娜达丽不肯走；——她为了虚荣心毁掉了一个伟大的人物，——我要救他！”

“是吗？”

"所以我们在一两天就走……"

"怎么一两天？这是什么意思？明天早晨！——您忘记了我们的条件？"（我重说这番话，我并没有违背我答应娜达丽的诺言，我相信爱玛一定会带他走开。）

"我真不明白您！我从前简直把您太看错了！"这个疯狂的女人说，她又走了。

这次她的外交工作就容易了，——过了十分钟光景她又来说，他对一切都同意：他答应离开，答应决斗，但是同时他又要她来告诉我，他立过誓不举起手枪对着我的胸膛开枪，不过他愿意死在我的手里。

"您看，他总是跟我们开玩笑……连法国的国王也只是让一个刽子手处死的，[①] 并不是由一个知己朋友来动手。那么你们明天动身吗？"

"我真不知道应该怎样办。我们一点儿也没有准备。"

"一切都可以在天黑以前准备好。"

"我们的护照还得拿去签字。"

我拉铃；罗加[②] 进来了。我告诉他，爱玛夫人请他把他们的护照马上拿去签字，说要到热那亚去。

"可是我们连旅费也没有。"

"你们到热那亚去要很多钱吗？"

"六百法郎。"

---

① 指路易十六(1754—1793)上断头台的事。

② 罗加：意大利人。一八五一至一八五二年在赫尔岑家当厨师兼听差。

“我拿给您罢。”

“我们还欠这儿店里的帐。”

“大约要多少?”

“五百法郎。”

“您不要耽心,——祝您一路平安。”

她受不了这种调子:她平日把自尊心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为什么?”她说,“为什么对我这样? 我,您不应该恨我,轻视我。”

“您说,对您不应该?”①

“不,”她哽咽地说,“不,我只想说,我从前像一个姊妹似地真诚地爱过您,我不愿意走的时候不跟您握手告别。我尊敬您,您也许有理,不过您是一个残酷无情的人。要是您知道我过着怎样的日子!”

“可是您为什么一生都做奴隶呢?”我对她说,把我的手伸了给她;在那个时候我是不能够有同情的。“您应该得到您这样的命运。”

她蒙着脸走了。

第二天早晨十点钟,诗人雇了一部马车,装上他的各色各样的箱子、篮子,mit Weib und Kind [德语:带着妻儿]往热那亚去了。我站在开着的窗前,——他很快地就钻进了马车,我连他的影子也没有看见。爱玛跟厨子、女仆握了手,便上了车坐在她丈夫的旁边。我再想象不到比这种资产阶级的出门更

① 英译本作“那么对他就应该?”,大概是根据一种“变文”翻译的。

丢脸的事了。娜达丽心里非常难过。我们两个人到乡下去散步,我们这次的散步也是不愉快的,新的、发痛的伤口上还在流血。我们回到家里,最先遇见的人却是黑尔威格的九岁的儿子何拉斯。这是一个顽皮的孩子,还是一个小贼。

"你从哪里来?"

"从门托勒。"

"出了什么事?"

"妈妈有个字条给您。"

"Lieber Herzen"〔德语:亲爱的赫尔岑〕,她写道,好像我们中间并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似的,"我们要在门托勒住两三天,旅馆房间太小,——何拉斯妨碍乔治工作,——请你答应我们把他留在你们那里住几天。"

这种不知趣的举动倒使我惊愕了。爱玛同时还给卡尔·福黑特写信,要他去他们那里商量事情。……这样就把局外人拉进我们的事情里来了!我请福黑特把何拉斯带去,对他们说,我们没有空房间。

"可是我们的屋子还有整整三个月的租期,我们还可以使用它们,"爱玛托福黑特来对我说。

这完全是真的,不过租金是我付的。

不错,在这个悲剧里面,和在莎士比亚的悲剧里面一样:在令人惊心动魄的声音之外,在生命死亡、信仰丧失、思想消失的时候的呻吟之外,同时还有无聊的口角、刺耳的笑声和市场上那种欺诈的行为。

爱玛有一个女仆,名叫让莱特,是法国布罗温斯省的女

子，漂亮而且很知自爱；她还留在这里住一两天，等着押他们的行李搭轮船到热那亚去。第二天早晨让莱特轻轻地推开我的书斋的门，问她是否可以进来单独地跟我说几句话。这是从来不曾有过的事；我以为她是来要钱的，正打算拿钱给她。这个好心的布罗温斯女子，她脸红到耳根，眼里含着泪水，递给我爱玛在小商店买东西欠帐的各种帐单，她说："太太吩咐我这样做的，不过我觉得没有得到您的同意，我不能够做，——您看，太太叫我在店里买各式各样的东西，她叫店里把它们添记在这些帐单上……我不先告诉您是不能做的。"

"你来告诉我，是很对的。她叫你买些什么东西?"

"单子在这儿。"

在单子上面写着几匹麻布，几打手帕，全套小孩的贴身衣服。

人说凯撒[1] 同时可以做三件事：读、写、口述叫人笔录。那么这也是同样的多才多艺吧：——在家庭破灭、人感到农神的大镰刀的冷锋挨到颈项[2] 的时候，还能够想着用便宜的办法得到麻布和小孩的长袜。德国人的确是了不起的民族!

---

① 凯撒：即求利阿斯·凯撒(公元前 100—44)，罗马的大将、政治家和历史家。

② 指"死亡逼近"。

第五章

我们如今又清静了，可是这情形和从前的不相同，——一切都带着风暴的痕迹。信仰与疑惑、疲劳与焦躁、烦厌与愤怒是一种酷刑，然而最使人难堪的却是生命线已经折断，而且那种使生活过得极其舒适的可宝贵的无忧虑、无牵挂的心情也已丧失，并没有一样可以视作神圣的东西留了下来。因为做过的事已经做过，再也不能变动了。我一想到过去就要为将来耽心。好几次我们夫妇单独用午餐，两个人差不多一点东西都不动，一句话也不说，就站起来，揩去眼泪，离开了餐桌，还看见那个好心的罗加脸上带着怒容，把菜端开，他一边走一边摇头。闲散的日子，不眠的长夜……苦痛……苦痛，我喝着各种各样的酒，白兰地、老培勒① ……夜里我一个人喝，白天我同恩格尔孙② 一起喝，——在尼斯那样炎热的天气。俄国人借酒浇愁的毛病并不像一般人所说的那样坏。昏沉的睡眠究竟比烦恼的失眠好，第二天早上的头痛、不舒服也比空着肚子愁闷好得多。

---

① 老培勒：一种酒的牌子。

② 恩格尔孙(1821—1857)：一个崇拜赫尔岑的俄国青年。一八五〇年秋天他和新婚的妻子到尼斯，第一次和赫尔岑见面。有一个时期他跟赫尔岑很熟。

黑(尔威格)寄给我一封信。我把它原封退回。他就给娜(达丽)写信,一封一封地寄来。他又给我写了一封信,——我仍然原封退回。我烦恼地旁观着这件事情。这时候应该是彻底考验的时期、和平的时期、避免一切外界的影响的时期。然而那个人不断地把信寄来,他装作心乱的样子,而且不时威胁着说要自杀,甚至要做出最可怕的犯罪行为,在这个时候怎么能够有和平、有自由呢?例如他在信上说,他有时发起狂来,想杀死他的小孩,把他们的尸体抛出窗外,满身染着他们的血来见我们。在另一封信里他又说,他要来在我面前自杀,一面对我说:“你看你把这个非常爱你的人逼到这个地步!”同时他又不断地要求娜达丽设法使我跟他和解,把一切过错都挑在她的肩上,并且建议请他来做沙夏的教师。

他许多次都提到他的实弹的手枪。娜达丽仍然完全相信这种话。他只要求她为他的死祝福。我劝她写信告诉他(她后来同意了),她相信他的话不错,除了死外,再没有别的路。他在回信里说她的话来得太迟了,他现在有的是另一种心境,他觉得他没有充分的力量来做那件事,不过如今所有的人都把他抛弃了,他要到埃及去。这封信使他在娜达丽的眼里大大地丢脸。

在这件事情以后奥申义[①] 从热那亚来,他笑着告诉我们

---

① 费立却·奥申义(1819—1858):意大利的革命者,“青年意大利”(秘密革命团体)的成员。一八五八年一月十四日他在巴黎投炸弹刺杀拿破仑三世(1808—1873)未遂被捕,同年三月十三日被处死刑。

那一对夫妇怎样打算自杀的事。……奥申义知道黑(尔威格)在热那亚,便去看他们夫妇,恰好遇见黑(尔威格)在大理石的海滨马路上散步。奥申义听说他的妻子在家,便去看她。她立刻告诉奥申义,他们决定绝食自尽,这种自杀方式是她丈夫为他自己选定的,不过她愿意分担她丈夫的命运,——她要求奥申义照料他们的儿女何拉斯和阿达。

奥申义吓呆了。

"我们已经有三十个钟点没有进饮食了,"爱玛继续往下说:"请你劝他吃点东西,给人类救下这一位大诗人,"她哭了起来。

奥申义出去,在阳台上站了一下,立刻又走回来,给爱玛带来一个好消息:黑(尔威格)站在街角吃糟野味。爱玛非常高兴,便按铃叫了一盆汤。这个时候她丈夫带着忧郁的表情进来了,他并没有提起烧野味,可是盛汤的盆子还摆在桌上。

"乔治,"爱玛说,"我听见奥申义说你在吃东西,我很高兴,所以我也决定叫一盆汤来。"

"我心里作呕,我吃了一小块糟野味,——不过这是没有用的;饿死是最痛苦的,——我要服毒。"

他的妻子抬起眼睛望天花板,她又看看奥申义,好像在说:"你看,他是无法挽救的了。"他也喝了一点汤。

奥申义已经死了,不过听见他讲的这个故事的人中间还有几个活着,例如卡尔·福黑特、莫狄尼、[1] 查理·埃特蒙……

---

[1] 莫狄尼:意大利革命者,马志尼的友人。下文的查理·埃特蒙是波兰革命者贺也次基的笔名。

这些把戏使娜达丽十分难过。他使她丢了脸，他使我丢了脸，这是她非常痛切地感觉到的。

春天黑(尔威格)到苏黎世去，却叫他的妻子到尼斯来(这又是一种无耻的、不漂亮的举动)。经过了这一切事情以后，我想休息了。我利用我入瑞士国籍的机会，① 同恩格尔孙到巴黎和瑞士去。

娜达丽来信的口气是很平静的，她的心灵似乎更舒畅了。

我在回来的旅途中，在日内瓦遇见了沙左诺夫。他一边喝酒，一边用完全不关心的态度问我：

“你家庭的事情怎样?”

“还是从前那个样子。”

“你们那回事情，我完全知道，我是怀着朋友的同情来问你的。”

我吃惊而且打颤地望着他；他一点也没有注意到。这是什么意思?！我还以为完全没有人知道我们的事情。现在这个人喝着酒，突然跟我谈起来，好像它是一件极寻常、极寻常的事。

“你听到的是什么一回事? 你从什么人那里听来的?”

“黑尔威格自己告诉我的。我坦白地对你说，我并不以为

① 赫尔岑为了避免警察的干涉，不让他们时常来找麻烦，曾要求归化瑞士。瑞士的夫赖堡行政区同意他为该区的公民。赫尔岑利用这机会到瑞士夫赖堡去。

你做得对。为什么你不让你的妻子走,或者你自己离开她?你原谅我,我说这是你的软弱! 你本来可以开始一个新的、充满朝气的生活……"

"可是你凭什么认为她愿意走开? 难道你相信我能够放她走或者留住她吗?!"

"你逼她,——自然不是在肉体上,是在精神上;你用你的言语,用你的痛苦逼她。不过我看见你现在这样镇静,我很高兴,我没有料到你还是这样镇静,——我应该对你老老实实地说出来。黑尔威格离开你们的家,第一,因为他是个胆小鬼,他很害怕你;第二,因为你的妻子答应过他,只等你稍微安静一点,她就到瑞士来。"

"这是卑鄙的谣言!"我大声嚷起来。

"这是他说的;我敢向你发誓。"

我回到旅馆,人很不舒服,身子有气无力,连衣服也没有脱掉,便往床上一倒,我仿佛处在一种近乎疯狂或者死亡的境界中。……我究竟相信不相信那些话? 我不知道,不过我不能说我完全不相信沙左诺夫的话。

我反复地对我自己说:"那么我们的诗意的生活就这样地断送在欺骗中,而且在中途意想不到地断送在一个西欧式的流言蜚语里面了……哈,哈,哈! ……他们可怜我,他们爱惜我,他们由于怜悯才给了我一点休息时间,我好像是一个受罚的兵士,鞭打到一半,因为脉搏微弱,给人抬到医院去受精细的治疗,养到他身体强健,再使他受另一半的笞刑。……"我受了欺负,受了侮辱,我丢了脸。

晚上我怀着这种心情写了一封信；我的信里一定带着愤怒、绝望和猜疑的调子。我后悔，我非常后悔那个背后的侮辱、那封恶意的信①。

娜达丽用了非常悲痛的话回答我。她说："我宁愿死去；你的信仰破碎了，每一句话都会使你记起过去的一切事情。我应该怎样做呢？我怎样才能够使你相信我呢？我哭了又哭。"

黑尔威格说了谎。

她以后的来信都是很悲痛的；她可怜我，她想治好我的伤，她自己一定受了多大的苦！……为什么那个人会来向我重述这种谣言？……为什么又没有别人在我的身边阻止我寄发那封在犯罪的狂怒中写成的信？

---

① 赫尔岑的原信由娜达丽保存下来了，全文如下：

"一八五一年六月二十八日，日内瓦，某咖啡馆。

"我这个时候的感觉你自己可以判断。

"他把什么都对沙左诺夫讲了，讲得那么详细，我一听见就透不过气来。他说，他可怜我，不过事情已经做了；又说，你求他不要作声，过几个月等我安静一点，你就离开我……

"我的朋友！我连一个字也没有添加。沙左诺夫向我问起，好像你在生病似的。他说话的时候我简直像死人一样。我现在向你要求一个彻底的答复。这可以压倒一切的胡思乱想。沙左诺夫一定全知道了。……我要求真话。……马上回答我；每一句话我都会仔细考虑。我的心要破碎了。……你把这个叫做有连贯性的发展。

"我明天到夫赖堡去。我从没有像现在这样绝望过。给我回信，地址写：吐林，存局待领。

"难道人们真的这样讲你吗？啊，上帝，上帝，我为了我的爱情受了多大的苦。……再还有什么呢？……回信……回信寄吐林！"

第六章

《海洋之夜》[①]（一八五一年）

一[②]

在七月七日到八日夜里一点多钟，我坐在吐林的加利聂亚诺宫的台阶上；广场上空空的没有人；离我不太远，有一个乞丐在打盹；一个看守兵慢慢地踱来踱去，用口哨吹着什么歌

---

① 《海洋之夜》（*Oceano Nox*〔拉丁文〕）：法国浪漫主义诗人维克多·雨果（1802—1885）的诗题。

② 这一节（到现在还未发表过）在《往事与随想》中属于要在很久以后才发表的一部分，我是为了这一部分才写了其余各篇的。奥申义的《札记》中叙述一八五一年十一月十六日惨痛事故的几行文字，引起大家对我遭到的不幸表示了最大的同情，因此我便把下面的第二节在一八五九年的《北极星》上先发表了。——作者注

作者所说的"一部分"就是这本小书的全文。作者生前曾在《海洋之夜》的标题下面发表了其中的三节：这一节和叙述十一月十六日惨痛事故的第二节，再加上描写娜达丽患病、她的最后的挣扎以及她的死亡的一节。第三节还有一个小标题：《一八五二年》，但在这一节中凡是与黑尔威格有关的文字全删去了。一直到一九一九年苏联国家出版局出版了《往事与随想》的完全本，赫尔岑回忆录的这一部分才第一次跟读者见面。

奥申义的《札记》，指奥申义的《回忆录》。

剧中的曲调,手弄着枪发出响声……这是一个充满地中海热风气息的、炎热的、潮湿的夜。

我非常快乐,我好久不曾有过这样的快乐了;我又觉得我还年轻,而且充满精力,我还有朋友,还有信仰,我还是和十三年前一样地充满爱情。我的心多年来没有像这样地跳动过;它跳得像在一八三八年三月的日子里那样,那一天我用大衣紧紧裹住身子,靠在波瓦尔斯基街一根灯柱上等候克彻尔来。①

如今我也是在等待一个约会,还是和那个女人的约会,也许我还带着更多的爱情在等待它,虽然我的爱里搀杂了悲哀和忧郁的调子,可是在这一夜它们差不多是听不见的了。在那次我在日内瓦的途中遭逢到苦痛、绝望的疯狂的危机以后,我已经好多了。娜达丽的温柔的信函,那些充满悲痛、眼泪、

---

① 赫尔岑在另一则回忆(《一八三八年三月三日到五月九日》)里写道:"第二天早晨五点半钟我靠了一根灯柱站着,等候克彻尔,他走进公爵夫人家的便门里去了。我不想描写我靠着灯柱等候的心情;这种时刻是一个人自己的秘密,因为它们是言语形容不了的。克彻尔向我招手。我走进了便门;一个孩子(在我离开以后他已经长大了)引我进去,他友好地向我笑了笑。我进了外厅,那个地方我从前有一个时候进去总要打呵欠,现在我却想跪下去吻每一块地板。阿尔卡基把我引进客厅,便出去了。我精疲力尽地坐在沙发上;我的心跳得太厉害了,使我难受起来,而且我还害怕。……她穿一身白衣服走了进来,非常美;我们三年的分别和她所经历的那些斗争使她的面貌和表情完全成熟了。她用她的轻柔优美的声音说了一句:'是你?'我们默默地坐在沙发上面"……赫尔岑偷偷地从流放地(弗拉基米尔)回来找娜达丽,两个月以后娜达丽跟着他逃到弗拉基米尔。他们在那里正式结婚。"

尼·克彻尔(1809—1886)是赫尔岑的大学同学和好朋友。

痛苦和爱情的信函治好了我的伤痛。她来信说她从尼斯到吐林和我见面，她很想在吐林停留几天。她的意思不错：我们应该单独地在一起，仔细地看入彼此的内心，洗去彼此伤口上的血迹，揩干彼此的泪痕，最后，查明白看我们两人在一起是不是还可以得到幸福，——这一切都应当发生在我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连儿女也不能在我们的身边，而且还应该在另一个地方，不能在我们旧时的环境里，在那里那些家具、那些墙壁都会在不适当的时候唤起我们的记忆，说出我们半忘却了的言语。

驿车应该在一点到两点之间从柯尔·地·吞达[①]那方面开来，我坐在阴暗的加利聂亚诺宫前等待它：驿车就在这里附近拐弯。

我是在这一天的早晨从巴黎经过蒙·生尼来的；[②] 我在费得尔旅馆开了一个陈设相当精致的大房间，有寝室和起居室。我喜欢这种过节日的样子，这正合式。我吩咐了准备两个人的简单的晚餐，便出去在城里各处游览，等着夜晚到来。

驿车到站的时候，娜达丽认出了我。“你来了！”她说，在窗口对我点头。我打开车门，她投身在我的怀里，她那么高兴

---

① 柯尔·地·吞达：临海的阿尔卑斯山上的山道。——一九四六年列宁格勒版俄文本注

② 赫尔岑在一八五一年七月七日到吐林，但并不是从巴黎来的，他在六月二十五日就离开巴黎了，七月五日从夫赖堡回到了日内瓦，所以他是从日内瓦来的。蒙·生尼：意大利人称为蒙特·切尼西奥（即切尼西奥山），是法意两国中间的阿尔卑斯山的主峰。

地抱着我的颈项,她脸上露出那样的一种爱与感激的表情,因此她的信里的话就像电光似地闪进我的心里来:“我回来,像一只船经过了风暴、遇险和灾难以后,回到它自己的港口——虽然已经破碎,可是它得救了。”

一瞥的眼光,两三句话,这就很够了……一切都解释了,而且了解了;我拿起她的小旅行袋,用手杖把它挂在我的背上,我伸出手臂给她,我们快乐地走过那些清静的街道到了旅馆。旅馆里除了看门人外全睡了。在那张铺好桌布准备开晚餐的桌子上,立着一对没有点过的蜡烛,还有面包、水果和一瓶葡萄酒;我不愿意唤醒别人,我们自己点燃蜡烛,就在空餐桌旁边坐下,我们互相望着,两个人马上都想起了弗拉基米尔的生活。

她穿一件白色的细纱衣服,或者是细纱短衫,这是因为天气炎热在旅行中穿的;当初我从流放地回来跟她头一次见面的时候,她也穿一身白衣服,她的结婚的新装也是白色的。虽然她脸上还留着激动、焦急、思虑、痛苦的深的痕迹,可是连这脸上的表情也叫人想起她那个时候的面容。

而且我们还是同样的两个人,只是我们现在握着彼此的手,不像两个自命不凡的年轻人,充满了自信和骄傲:自夸着相信自己,相信对方,而且相信自己的命运异乎寻常;我们只像两个久经人生战斗的老兵,我们不单试出了我们的力量,也试出了我们的弱点……我们刚刚在沉重的打击和无法挽救的错误下,保全了自己。我们重新在人生的路上出发,并不计较从前的事情,两个人共同挑着过去的痛苦的担子。

我们不得不挑起这个担子用更谦虚的脚步向前走去，不过在我们的长久痛苦的心里仍然安全地保留着安定的、成熟的幸福所需要的一切。通过了恐怖和隐沉的痛苦，我们看得更明白：过去的岁月和环境、儿女和在外国的生活把我们不可分地连接在一起了。

在这一次的会面中一切都解决了，断掉的线又接在一起，虽然留下痕迹，可是比以前更牢了，断骨上破折的地方有时候就像这样地长合。悲痛的泪在我们的眼里还不曾干去，可是它们又用一根新带子(深切的互相怜惜的感情)将我们系在一处。我看见她的斗争、她的痛苦，我看见她多么地虚弱无力。她看见我衰弱、不幸，受人侮辱，而且侮辱别人，准备牺牲自己并且准备犯罪。

我们为着彼此付过了太高的代价，并不知道自己价值若干，也不知道各人为着对方付出多少。我在一八五二年的开始写道："在吐林，这是我们的第二次的婚礼。它也许比第一次的还有更深刻、更重大的意义，在这一次的婚礼中我们完全明白我们彼此重新担负起来的全部责任；在这一次的婚礼中我们还看得见过去那些可怕的事情。……"①

那个打击本来可以毁灭我们的爱情，但是靠了一种奇迹爱情居然没有死去。

最后的几片乌云也远远地散去了。我们谈了很多，谈了

① 赫尔岑在这里引用了他在一八五二年三月写给豪格的回信中的一段话。

很久……好像我们分别了多年似的；一直到灿烂的阳光透过百叶窗缝射进房里的时候，我们才离开空餐桌站起来……

三天以后我们一起坐驿车经过里维拉回到尼斯去。热那亚在我们的眼前过去了；门托勒在我们的眼前过去了，门托勒，我们以前常常怀着一种完全不同的心情到过那里；摩纳哥在我们的眼前过去了，车子溅起那里的天鹅绒似的草和天鹅绒似的沙到海里去。它们都快乐地招呼我们，好像久别的老友一样；我们看见了小小的葡萄园、玫瑰花丛、橙子树、宅子前面的海，和正在海滩上玩的孩子们……他们现在认出我们来了，跑过来迎接我们。我们到家了。

我感谢命运给了我这些日子和以后的四个月的光阴：用它们给我的私生活作一个光荣的收场。我感谢命运，这个老东西，她还给那些判定作牺牲的人戴上用秋花编成的华丽花冠，而且即使是暂时也罢，她还用她的罂粟花和芳香装饰了他们去刑场的路。

那些使我们分开的鸿沟已经没有了，障壁也移开了。这不就是我一生中都放在我手里的那只手？这不就是那同样的眼光？——不过它有时让泪水弄模糊了。“你安心罢，妹妹，朋友，同伴，一切都过去了，——我们还是像在我们年轻的、神圣的快乐的时候一样！”

“……在痛苦以后（你多半知道它的深浅），会有几分钟充满最大幸福的时间；所有在你的幼年时期和青年时期中你所珍爱的信仰不仅成为真实，它们还经过了很大的磨炼，不曾失去它们的新鲜与芬芳，它们还带着新的光辉与新的力量开出

了花朵。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快乐过，"她在给俄国友人的信里写了上面的话。①

自然，还有一种过去所遗留的渣滓，人触动它就要受到惩罚：这是一种破碎了的内心的东西，这是一种微微睡着的恐惧与痛苦。

过去不是一张可以改正的校样，它是一把断头机上的大刀；只要它落下一次，便有许多东西不能再合拢来，总有一样东西不能恢复原状。它仿佛是金属铸成的，形状分明，不能改变，而且有青铜那样的深暗颜色。人照例只忘记那些值不得记忆的或者他不了解的事物。要是一个人能够忘记两三件事故，这样或者那样的事，这样的一天，这样的一句话，那么他就会是年轻、勇敢、强壮的；然而他却带着它们，像一把钥匙一样地沉到底去。一个人不必做麦克佩斯，去见班各的鬼，② 鬼并不是刑事法庭的裁判官，良心的痛苦也不是，可以称做裁判官的是那些永远不能从心上抹去的事件。

---

① 这是她在一八五二年三月写给娜达立亚·土奇科娃（奥格辽娃）的信。原信如下：

我还躺在床上。我没有充足的力量站起来走路，可是我的心灵里充满了生气，——我不能够沉默。（紧接上面引用的一段）我的体力恢复得多慢！七月不远了，我会活到那个时候吗？啊，我真愿意活下去，为着他，也为着我自己；我不提孩子们。为着他活下去，好医治我使他受到的一切的创伤；为着我自己活下去，因为我已经懂得如何认识他对我的爱情，而且我在他的爱情里感到从来没有过的幸福。

② 这是英国伟大的剧作家莎士比亚的悲剧《麦克佩斯》的故事。麦克佩斯杀死了苏格兰国王邓肯，夺取了王位，并且差人暗杀了他的同僚班各将军。他在宫中开宴时班各的鬼魂出现，坐在他的座位上。只有他一个人看得见。

但是人不应当忘记;那是一个弱点,那是一种虚伪;过去有它的权利,它是事实,人应该处理它,不应该忘记它,——我们两个人取着同一的步调向着这个目标走去。

……有时候局外人的一句平常话,或者一件触目的东西,会像一片剃刀割在我的心上,血流出来,痛苦到了不能忍受的程度;然而同时我会遇到那一对充满惊惧的眼睛,它们带着无限的哀怨望着我,仿佛在说:“是的,你不错,这是没有办法的,不过——”我便努力把聚拢起来的阴云驱散。

这神圣的和解时期,——我含着眼泪想起它来……

……不,不是和解,这个字眼不合式。字句好像是现成的衣服,凡是同样身材的人穿起来,在某种程度上都可以说是合身,可是分别地说,它们对每个人都不合式。

我们用不着和解:我们从没有争吵过,——我们固然为着彼此受苦,可是我们从来不曾分开。甚至在最阴郁惨淡的时期中,我们中间那种不可分离的一致(我们从没有怀疑过它)和那种彼此间深厚的尊重仍旧安然无恙。与其说我们和解,倒不如说我们像两个发过高热后病愈的人;昏迷已经过去,我们用朦胧无光的眼睛对望,我们又互相认识了。我们经历过的痛苦在我们的记忆中还很鲜明,我们仍然感到疲乏,不过我们明白一切的苦难已经完结,我们如今又平安地到岸了。

……娜达丽以前有几次起过一种念头,现在这个念头越来越强地占据了她的心。她想写下她的自白。她不满意它的开头,便烧毁了那些稿纸;只剩下一封长信和一张原稿。……根据这一点东西我们便可以断定那损失是多么可惜……读着

它们不由得我不吃惊，我觉得好像伸手挨到了一颗温暖的、受苦的心，我仿佛听见多年来一直隐藏着、现在刚刚觉醒起来的那些无声的密语。在那张残稿的字里行间，我看得出由艰苦的挣扎产生新的毅力、由痛苦产生思想的过程来。要不是那个意外的事故残酷地打断了这部著作的完成，它一定是一种珍贵的文献，可以填补由女人的逃避的沉默和男人的以女人保护者自居的傲慢态度两者所造成的缺陷。然而一个最无情的打击落在我们的头上，把一切全打碎了。

二

在一个无底的海中，在一个无月的夜里，
永埋在黑暗的海洋之下。……

雨　果

一八五一年的夏天就这样完结了。我们差不多完全清静了。我母亲带了柯立亚和斯皮曼[①]到巴黎去看玛利亚·加斯帕洛夫娜·奈黑尔。我们夫妇便带着其余的孩子在家里安静地度日。一切的风暴好像都过去了。

十一月里我们接到母亲的信说她马上动身，不久又接到她在马赛寄发的信，说她第二天(十一月十五日)搭轮船到我们这里来。她不在这里的时候，我们搬了家，新居也在海边，

① 斯皮曼：柯立亚的德国家庭教师。下文的玛利亚·加斯帕洛夫娜·爱尔恩是一八四七年跟赫尔岑全家同路离开俄国的一个友人，一八五一年她在巴黎和德国音乐家奈黑尔结婚。

在圣爱伦的郊外。这所住宅里有一个大花园,我们早给我母亲留了一间屋子,这个时候便用鲜花把满屋装饰起来;我们的厨子带着沙夏出去买来了一些中国灯笼,我们把它们挂在墙上、树上。一切都预备好了;从下午三点钟起孩子们就在阳台上眺望;后来在五六点钟之间天边现出一串黑烟,几分钟以后轮船也看得见了,好像是一个不动的黑点,却逐渐地扩大起来。宅子里忙乱了一阵。弗郎沙[1]跑到玛头上去了,我也坐上马车赶到那里去。

我到了码头,轮船已经到了,好些小船正靠在轮船四周,等着检疫人员允许乘客登岸。其中的一只靠近了画船,弗郎沙站在船上。

"这是怎么一回事?"我问道,"你就已经回来了?"

他不回答我;我看了他一眼,我的心就沉下去了:他的脸色发青,全身打颤。

"你怎么了,你生病吗?"

"不,"他答道,一面避开我的眼光,"可是我们家里的人并没有来。"

"没有来?"

"轮船在那边出了事,所以有些乘客没有来。"

我连忙跳进一只小船,叫人马上开船。

到了轮船上面,我便看到一种凶兆,而且全船非常静。船主正等着我来;这一切都是太不寻常了,我知道会有什么可怕

① 弗郎沙:赫尔岑家的厨子,是一个中年的意大利人。

的事情。船主告诉我，我母亲搭的那只轮船在叶耳岛和大陆之间让另一只轮船撞沉了，大部分的乘客被他和另一只经过那里的轮船救了起来。"您家里的人只有两个年轻女子在我这里，"他说了，便引我到前面甲板上去，——众人还是像先前那样阴沉地、不声不响地走开了。我茫然跟在船主后面，连一句话也不问。我母亲的外甥女，原先在巴黎我母亲那里作客，她是一个细长身材的女子，她躺在甲板上，披着一头散开的湿头发；在她旁边是那个平日照料柯立亚的女仆。这个少女看见我，想坐起来讲话，然而不能够；她掉开头哭起来了。

"到底出了什么事情？他们在哪里？"我痛苦地抓住这个女仆的手问道。

"我们一点也不知道，"她答道。"轮船沉了，我们给拖出水来已经半死了。一位英国太太拿她的衣服给我们换上。"

船主悲戚地望着我，和我握手，一面说："您千万不要灰心；快到叶耳去，说不定您会在那里找到您家里的一两个人。"

我留下恩格尔孙和弗郎沙照料这两个女子，自己昏昏沉沉地坐车回家；我的脑子里只有混乱和颤栗，我只希望我们的家是在千里以外。可是不久我就看见树丛中有亮光，而且越来越多；这是那些灯笼，它们给孩子们点燃了。仆人们站在大门口，达达和娜达丽也在那里，娜达丽手里还抱着奥尔迦。

"怎么，你一个人？"娜达丽安静地问道。"你至少也该把柯立亚带回来。"

"他们不在，"我说："他们搭的船出了事。他们不得不改

乘别的船，这只船没有把他们全载来。鲁易莎[1]来了。”

“他们不在！”娜达丽大声说。“我现在才看见你的脸：你眼睛阴暗，你整个脸在搐动。看在上帝的份上，究竟出了什么事情？”

“我要到叶耳去找他们。”

她摇着头，一面还说：“他们不在，他们不在！”过后她就默默地把她的前额靠在我的肩上。我们一句话也不说，走过了林荫路，我把她引进饭厅；我们走过那里的时候，我低声向洛加说：“看在上帝的份上，那些灯笼！”……他明白我的意思，马上去把灯笼吹熄了。饭厅里一切都准备好了：有一瓶冰着的葡萄酒，在我母亲的座位前面放着一束花，在柯立亚的座位前面放的是新玩具。

这个可怕的消息很快地传遍了全城，我们家里开始挤满了朋友，福黑特、德西叶[2]、贺也次基、奥申义都来了，甚至还有完全陌生的人；有的人来打听出了什么事情，有的人来表示他们的同情，有的人来给我们进各种各样的劝告，不过这些劝告大半毫无用处。然而我也不是不知道感恩的人：当时我在尼斯得到的同情，使我深深感动。面对着命运的这种无情的打击，人们清醒过来，而且感到他们中间的联带关系了。

我决定就在这个晚上到叶耳去。娜达丽想和我同去；我劝好了她留在家里；而且这个时候天气突然变了，西北风刮得

① 鲁易莎·查伯尔：赫尔岑母亲鲁·伊·哈格夫人的外甥女。
② 德西叶·狄·莫特：法国化学家，赫尔岑的好友。

像冰一样冷，大雨倾盆地下着。我要得到通行证才可以通过瓦尔桥到法国地界去[1]；我便去找法国领事雷翁·毕勒；他正在听歌剧，我同贺也次基到戏院里他的包厢去找他。毕勒已经略略知道这回事情，便对我说：

“我没有权答应您，然而在这种情形下面，要是不答应就等于犯罪。我自己负责给您一张国境通行证。请您在半点钟以后到领事馆来取罢。”

和我们同来的人大约有十二个，他们都在戏院门口等我。我告诉他们毕勒答应了签发通行证。

“你回家去罢，什么事情都不要你操心，”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其余的事我们会办好；我们去领通行证，拿到局里去签字，我们去雇驿马。”

我的房东也在场，他跑去找马车；一个旅馆老板愿意把他的马车拿出来，不要钱。

晚上十一点钟我在倾盆的大雨中出发。这是一个可怕的夜；有时风吹得非常厉害，连马也停脚不前了；那个就在这一天把他们埋葬了的海还在狂吼，还在冲打海岸，它在黑暗中差不多看不见了。我们上了埃斯特勒山，雨就变成了雪，马一颠一簸地走着，几乎跌倒在滑脚的冰上。车夫弄得精疲力竭，有几次他想把身子弄暖和一点；我便把我带的小瓶白兰地给了他，而且答应给他双倍的钱，只求他把马赶得快一点。

---

① 尼斯现在是法国南部的城市，但是当时还属意大利，所以赫尔岑从尼斯到法国地界要领通行证。

这是为了什么呢？难道我还相信我能够找到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他们中间可能有任何一个给救起来了吗？我听到那一切消息以后，便很难想象这是可能的了，——然而无论如何我想去看个明白，到那个地点去看，去找回一点东西，一件遗物，甚至看到一个目击灾祸的证人……至少我得找到证据，知道的确毫无希望。我得做一点事，离开家，定一定神。

在埃斯特勒山换马的时候，我走下车来；我的心痛着，我向四周一看，我差不多要哭出声了；近旁就是一八四七年我们住过一个晚上的那家旅馆。我记得那些像华盖一般罩着山顶的大树，现在山前的风景并没有改变，只是那个时候早晨的太阳正照在山顶；如今山顶却让灰色的、不像是意大利的云掩盖了，有几处还给积雪染成了白色。

当时的情景还很鲜明的印在我的脑子里，一点也没有遗漏；我记得主妇拿一只兔子款待我们，她用了多得吓人的大蒜来掩盖兔子肉的腐臭味；我记得蝙蝠在我们房里飞来飞去，我得到鲁易莎帮忙，用一块毛巾把它们赶了出去；我们呼吸到南方的温暖的空气，这是第一次……

那时候我写过这样的话："从阿维尼翁起，人便感到而且看见南方了。住惯了北国的人第一次和南方的自然界接触就充满庄严的快乐：他觉得自己变年轻了，他想唱歌，想跳舞，想哭；一切都是这么光辉，这么明亮，这么快活，这么繁盛。过了阿维尼翁，我们便要越过滨海的阿尔卑斯山。我们在月光里登上埃斯特勒；我们下山的时候，太阳正往上升，群山从朝雾里现出来，阳光染红了白得耀眼的积雪的山顶；四周有一片新

绿，有花，有浓暗鲜明的阴影，有大树，有上面长了些缺少生意的草木的岩石；空气使人感到愉快，非常澄清，非常新鲜，而且容易传声；我们的谈话和鸟的叫声比平时响亮许多；忽然路略略转一个弯，就看见一根灿烂的光带环绕着群山，在那里带着点点银光闪耀的，便是地中海了。”①

现在在四年以后我又到了这个地方……

我们赶到叶耳，天已经黑了；我立刻到警察局去；局长带一个巡官陪我先去找港务局局长。打捞起来的东西都存放在他那里；可是里面没有一件他们的东西。接着我们就到医院去。一个遭难的人快死了；别的人告诉我，他们看见一位老太太，一个五岁光景的男孩和一个有一部宽而密的金黄色胡须的年轻人……他们一直到最后都看见这三个人，这样看来这三个人也和所有其他的人一样，沉到海底去了。然而我又生出了疑问：这些讲话的人虽然也像鲁易莎和女仆那样弄不清楚自己是怎样遇救的，可是他们又怎么会活着呢？

打捞起来的死尸放在一个女修道院的地下殡葬所里。我们从医院又到那里去；修女们出来接待我们，用礼拜堂的蜡烛照着路把我们引到殡葬所去。在地窖里面放着一排盖着的匣子；每只匣子里有一具尸体。局长叫人把匣子打开；它们好像是给钉子钉牢了。巡官叫一个警察去拿了一把凿子来，又叫他把盖子一只一只地撬开。

这种检验尸体的办法是万分痛苦的。局长手里拿着一本

① 见《法意两国的通信》(第五信)。——作者注

记事册，每只匣子打开的时候，他就打起官腔问道："您当着我们承认您不认识这个尸首吗？"我点了点头。他用铅笔在记事册上画了一个记号，便转身叫警察把盖子关上。我们又走到第二只匣子跟前。警察揭起盖子；我带着一种恐怖看了死者一眼，我看到不认识的面貌，我的心又放下了，可是实际上想到他们三个人竟然不留一点痕迹地消失了，孤寂地躺在海底，受着海浪终日的颠簸，比看见他们躺在匣子里更可怕。一具尸体没有棺木，没有坟墓，已经是很可怕的了，而我们连我们死者的尸体也没有。

我找不出一个我们的人来。一具尸体给了我很深的印象：一个二十岁左右的美丽的少妇穿一身布罗温斯省人的漂亮衣服；她露出胸膛（她怀里本来有一个小孩，不用说，是给波浪冲走了），还有奶汁从她的乳房上滴下来。她的脸色完全没有改变。她那种晒惯了太阳的黝黑的肤色使她看起来就像一个活人。

巡官忍不住赞了一句："好个美人儿！"局长并不作声；警察关上了盖子，对巡官说："我认得她，她是这里近郊的一个乡下女人，她到格拉斯去看她的丈夫。好，现在够他等了。"

我的母亲，我的柯立亚，我们的善良的斯皮曼，就这样不留痕迹地消失了。他们的东西没有一样留下来；打捞起来的东西里面没有一样是他们的，连一块破布也没有。他们的死是毫无疑惑的了。所有遇救的人不是在叶耳岛，就是在那只载鲁易莎来的轮船上，——船主故意编造了故事来安慰我。我在叶耳岛听见人说，有一个失掉了全家的上了岁数的人不

愿意住在医院里，独自步行到什么地方去了，他身上没有一个钱，而且人差不多要发狂了；还有两个英国少女给送到英国领事馆去了，她们失掉了母亲、父亲和哥哥！

这个时候天快亮了；我雇好了马。在我动身之前，侍者把我引到那一段突出到海中的岸上去，在那里他指给我看轮船遭难的地方。海还在沸腾，还在颠簸，由于前一天的风暴，海水还是浑浊而带灰色；远远地有一块特别的地方，那里的水好像是一种较浓的透明的液体。

“轮船载得有油，您看，还在那里浮着，那里就是出事的地点。”

那一块漂浮的油迹就是一切了。

“那里深吗？”

“有一百八十公尺的光景。”

我站了片刻；早晨很冷，尤其是在海边。像昨天那样的西北风还在吹，像俄国秋天里那样的云布满了整个天空。别了！……一百八十公尺深，在一块漂浮着的油迹下面。

> 你可怜的遭难的死者，没有人知道你们的命运，
> 你们在黑暗的海洋里飘荡，
> 给暗礁碰伤你们冰冷的前额……①

我带着可怕的确信回到家里。刚刚好起来的娜达丽经不起这一下打击。从我母亲和柯立亚遭难的那天起，她就再没

① 这是雨果的诗《海洋之夜》第三节的头三句。

有恢复健康了。恐怖和痛苦还留着，进到了她的血里。有时候在黄昏，在夜间，她好像在求我帮助似地对我说："柯立亚，柯立亚是常常跟我在一起的；可怜的柯立亚，他会多么害怕！他是多么冷啊！而且有鱼，还有龙虾！"她便拿出他的小手套（这是在女仆的衣袋里寻着的）；接着就来了静寂，是这样的一种静寂，在这个时候，生命不断地流出去，好像水闸已经开放了。我看见这种转变成神经衰弱症的苦闷，我看见她的发亮的眼睛和一天一天消瘦下去的身体，我第一次疑惑起来，我是不是能够救她。……日子在痛苦难堪的半信半疑中度过去，——我有点像一个定了罪的死囚，在等候执行死刑的期间，一面还抱着希望，一面又确切地知道自己逃不掉刀斧。

第七章

一八五二年

新年又来了；我们在娜达丽的床前迎接这个新年；她的身体终于支持不住，她不得不躺了下来。

恩格尔孙夫妇、福黑特，还有两三个亲近的朋友在我们这里。我们都不快活。巴黎的十二月二日[①]像一块石头压在我们的心上。……一切事情（不论是公的或私的）都急急趋向毁灭，而且已经往下走得很远了，要它们中途停止或者改变方向，是不可能的；人只有茫然地、痛苦地等待着，等它们早日达到毁灭的结局。

我们喝了照例的祝贺的酒。在十二点钟我们勉强露出笑容，我们的心里却只有死亡和恐怖，我们都不好意思再说出对这个新年还有什么愿望。向前看比朝后望更可怕。

病更确定了：左侧发生了肋膜炎。

---

① 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二日路易·拿破仑（当时的法国总统）实行政变，宣布解散国会，逮捕共和党人，将总统任期从四年延长至十年，并将政权掌握于他一手。第二年他便改行帝制和即帝位，称为拿破仑三世。

她在生与死之间徘徊了两个星期，可怕的两个星期，可是这一次生命战胜了。有一夜在痛苦难堪的时刻，我问朋非士大夫①："过得了这个夜晚吗？"

"过得了，"朋非士说。

"您讲真话吗？请您不要瞒我！"

"我对您讲实话——我担保……"他停顿一下，又往下说："我担保三天，您不相信，请您去问福黑特。"

这是赫德森·洛② 的所谓"会好起来"的反面，它来得好。③

病慢慢地好起来，跟着她的病愈，一道最后的希望的光微微照亮了我们的惊惶不安的生活。

她的精神的力量先恢复了……有一些时候非常令人惊奇，——这是就要绝响的音乐的最后的和音……

在她的病有了转机以后不多几天，有一个清早④ 我走进书斋，在沙发上睡着了。我一定睡得很熟，因为我没有听见人走进来的声音。我醒过来，看见桌子上有一封信，——黑尔威格的笔迹。他有什么理由写信给我？而且在经过了那一切的

---

① 朋非士大夫：尼斯的名医。

② 赫德森·洛(1769—1844)：英国将军。拿破仑一世被流放到圣海仑岛时他是这个岛的总督。

③ 作者和朋非士的对话在有些版本中给删去了。"会好起来"的原文是"会种起树来"，全文是："我们看到在这样炎热的气候，我们待在这里，没有树荫，连一棵树也没有。他(赫德森)却对我们说'会种起树来的'。这句话多么叫人受不了！"(见拉斯—卡兹的《圣海伦岛回忆录》)。

④ 指一八五二年一月二十八日。

事情以后，他怎么还敢写信来?! 我并没有给他任何一个借口。我拿起那封信，打算原封退回，可是我看见信封上写着“内有一份光荣的挑战书”，便把信拆开了。这封信的措辞叫人发恶心，而且是很无耻的。他说我用了诽谤他的手段把娜达丽迷住了，说我利用了她的软弱和我在她身上的影响，说她出卖了他。最后他把罪名加到她的身上，并且说命运已经在我和他之间决定了取舍，——“它把你的后代[①] 和你的母亲都淹死在海里。我本想合乎人情地了结这件事情，你却要用流血手段来了结。现在我准备好了，我向你要求决斗。”[②]

这封信是我这一生受到的第一个侮辱。我像一只受伤的野兽似地，带着一种愤怒的呻吟跳起来。这个坏蛋为什么不在尼斯？……为什么这个时候偏偏有一个垂死的女人睡在走廊的另一头?!

我把头在冷水里浸了两三次以后，便去找恩格尔孙(我母亲死后他就住在她的屋子里)，我等他的妻子出去了，告诉他，我收到了黑(尔威格)的一封信。

“那么你真的收到它了?”恩格尔孙问道。

“怎么，难道你在等着，你已经知道，你已经料到它吗?”

“是的，”他说，“我昨天听见说过。”

“什么人说的?”

---

① 这封信是用法文写的，在这里，原文是 Votre progéniture。

② 这封信我再没有读过，以后只把它开过一次。一八五三年，十月二十三日是娜达丽的生忌，我在那天没有读它就把它烧毁了。——作者注

"卡尔·福黑特。"

我捧住我的头,我觉得我要发狂了。我们对这件事情完全保持沉默,连我的母亲和马(利亚)·加(斯帕洛夫娜)也从没有向我提过一次。在我的朋友中间我同恩格尔孙最接近,可是我对他也只简单地说过一回:那一次我们两个人在巴黎郊外散步,他向我问起我跟黑(尔威格)决裂的原因,我便简单地回答了他。我去年在日内瓦听见沙左诺夫谈到那个坏蛋讲的胡话的时候,我惊愕、痛苦万分,然而我怎么能够想象到就在我四周,就在我身边,就在房门外面,每个人都知道,每个人都在谈论那个我认为是深深埋在几个人中间的秘密……而且他们连我还没有收到的信都已经知道了。

我们去找福黑特。福黑特告诉我两天以前爱玛拿一封她丈夫寄来的信给他看,她丈夫在那封信里写着:他要寄给我一封可怕的信,他要把我"从高处"(他说是娜达丽把我抬到那上面去的)推下来,他还说要使我们丢脸,为了这个缘故,他不惜杀死自己的儿女,把我们大家(连他自己也在内)都送到刑事法庭的罪人席上去。最后他又对他的妻子说(她把信给福黑特、查理·埃特蒙、奥申义全看过了!):"只有你是纯洁的,无辜的,你应该做复仇的天使,"我想这大概是说她应该杀死我们。有些人说他因为爱情,因为跟我决裂,因为他的自尊心受到伤害,弄得神志昏乱了。这是不确实的。这个人从没有采取过危险的或者不小心的步骤,所谓疯狂只是在言语上,他的狂暴是在文字上。他的虚荣心受到损害,对于他沉默比较任何丢脸事情更难忍受,我们生活里重新得到的和平与宁静使他不

能够安宁。这个小市民，他很像乔治·桑的奥拉斯，他谈着要向他所爱的女人和他所称为兄长与父亲的人报仇，而且他是一个小市民的德国人，他用冒牌席勒式的传奇剧的句子来威胁别人。

就在他给我写这封信、给他的妻子接连地写那些疯狂的信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他正和一个年纪不小的、路易·拿破仑从前的情妇[①] 同居，而且花着她的钱。这是一个放荡的女人，在苏黎世名声很坏。他日夜跟她在一起，他用她的钱过奢华的生活，他坐在她的马车里面到处跑，并且在大旅馆中大吃大喝。……不，这不是疯狂！……

"你打算怎么办？"恩格尔孙最后问我道。

"我去，像杀一只狗那样地杀掉他。他是一个胆小的懦夫，这是你知道的，每个人都知道的，——事情对我完全有利。"

"可是你怎么能够去？……"

"问题就在这里。我同时写信告诉他：他没有权利向我要求决斗，倒应该由我惩罚他，因此我自己会选择武器和时间来惩罚他，我现在不会离开生病的女人去做那种事情，他的无礼不值得计较。"

我就照这个意思给沙左诺夫写信，问他是否愿意在这件事情上给我帮忙。恩格尔孙、沙左诺夫和福黑特都很恳切地接受了我的要求。我没有想到我的信是一个大错，这使他以

① 指某柯黑夫人（见一八五二年六月三十日给玛利亚·奈黑尔的信）。

后可以借口说，我已经接受了他的挑战，而后来又反悔地拒绝决斗了。

要拒绝决斗，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需要更多的意志力，再不然就需要更多的软弱。

封建性的决斗在现代社会中还有一个牢固的地位，这暴露出来我们的社会并不是像它在外表上那样地“现代”。很少有人敢于攻击这个建立在贵族荣誉和军人自尊心上面的圣物；的确，很少有人独立自主到能够不怕受罚地侮辱这个血腥的偶像，忍受别人加到他身上的“胆小”的罪名。

要证明决斗的荒谬，这是多余的事，——在理论上除了少数强暴之徒和剑术教师以外，没有一个人承认决斗是正当的行为，可是在实际上每个人都会接受决斗的挑战，来证明（不知道向谁证明）他的勇敢。

决斗的最坏的地方便是它袒护所有的恶棍，它给他一种光荣的死，不然就使他成为一个光荣的凶手。

一个人给人揭发在打牌时候作假，——他便坚决要求决斗，好像他既然不害怕手枪，就不会打牌作假似的。现在把打牌作假的人跟揭发他的人同样看待，这是多么可耻的事！

决斗有时候倒可以作为逃避绞刑架或者断头台的方法，虽然甚至在那个时候理由也并不充足；而且我不了解：为什么一个受大众轻视的人，虽然他也许会害怕断头台的大刀，却绝不怕他对方的剑锋。

死刑却有它的好处，在判刑以前先有审讯，审讯可以把一个人判处死刑，但是并不能剥夺他揭发他的仇人（死的与活的

一样)的权利。在决斗中一切都是秘密的,一切都让人藏起来。这是一种属于那个好勇斗狠的时代的制度,在那种时候人们手上的血还不曾全干,所以佩带杀人的武器竟然被视作贵族的标记,练习杀人的技术也被当成一种职责。

只要世界一天受着军人的支配,决斗就不会废止;但是我们可以勇敢地要求,应该由我们自己来决定——什么时候我们会向一个我们并不信仰的偶像低头;或者什么时候我们要昂起头做一个完全自由的人,而且在跟神道和当权者战斗之后,我们还敢于向那血腥的中世纪的神明裁判法[1] 挑战。……有多少人带着骄傲与胜利的面容经历了一切生活的苦难、监狱、贫穷、牺牲与劳苦、宗教裁判所的拷问以及我所不知道的其他种种,后来却死在某一个顽童或者坏蛋的无耻的挑战上! 以后再不应该有这样的牺牲者了。决定一个人的行动的原则应该在他本身,合乎他的理性,倘使这个原则在他本身以外,那么即使他多么勇敢,他也只是一个奴隶而已。

我既没有接受黑(尔威格)的挑战,也没有拒绝它。对他的惩罚在我是精神上的必要,也是肉体上的必要,——我竭力在想一种确实可靠的报仇方法,这个方法绝不能给他增加一点荣誉。至于用决斗或者就简单用刀来达到这个目的,在我都是一样。他自己提出了解决的方法。他给他的妻子写信说(她照例把信拿给她认识的每一个人看),不管过去的一切,我

① 这是中世纪一种宗教的裁判法。有嫌疑的罪犯必须用手握着热铁或把手伸入沸水,不受伤的人便无罪。

还是比我周围那一群家伙高明，是福黑特、恩格尔孙、哥洛文(！)[①] 那班人把我教坏的；只要他能够跟我见面一分钟，一切都会解释清楚。他还说："只有他（指的是我）一个人能够了解我；"这是他在寄发了给我的那封信以后写的信！

诗人就下结论说："所以我最盼望的是赫尔岑会接受这个不要证人的决斗。我相信我们两个人一开口就会拥抱起来，过去的一切就完全忘掉了。"

原来他所提议的决斗是一个带戏剧性的和解的方法。倘使那个时期我能够离家五天或者一个星期，我一定会到苏黎世找着他，实现他的愿望，——那么他一定不会活到现在。

我接到信以后过了几天，奥申义在早晨九点钟来看我。奥申义由于某种生理上的奇怪原因，正热情地爱着爱玛；这个漂亮的、热情的南国青年和那个丑陋的、不活泼的德国女人中间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共同点，这是我完全不能了解的。他早晨的来访使我吃惊。他很诚恳地、而且明白地对我说，黑（尔威格）来信的消息引起他那个圈子里的人的反感，许多我们共同的友人提议组织一个荣誉法庭。接着他就替爱玛辩护，说她除了盲目地爱她的丈夫而且奴隶般地对她的丈夫服从以外，并没有过失，他说他自己亲眼看见这回的事情使她多么痛苦。他又说："你应该伸出手给她，你应该惩罚罪人，但是你也

① 依·哥洛文：俄国军官。一八四五年在巴黎出版《尼古拉统治下的俄国》，说尼古拉不会俄文拼音。他在亡命者中间有着不好的名声。赫尔岑讨厌这个人，说：凡是俄国军官、地主所能有的缺点他全有了。

应该替一个无辜的女人雪冤。”

我给他一个坚决的、无条件的拒绝。奥申义太聪明，他知道我不会改变主意，便不再坚持他的主张了。

他谈到组织荣誉法庭的时候，还告诉我一个消息，他已经把这件事情的原委写给马志尼[①]，并且征求马志尼的意见去了。[②] 这不又是可怕的吗？团体组织了，判决书起草了，写信给马志尼去了，——我事先一点都不知道，而且这一切有关的事情，在一个星期以前还没有人敢在我面前提起。

我在奥申义走后，便拿出信纸给马志尼写信。我现在遇到一种威门法庭[③] ——一个自己组织的法庭了。我说奥申义告诉我他写了信，我害怕他没有把我的事写得明白正确，因为关于这件事我从没有对他谈过一句，我愿意自己来叙述我的故事，而且我希望他（马志尼）给我一点意见。马志尼立刻回信说：“我以为最好还是把这件事埋葬在沉默里面，不过我怀疑你目前是不是可以办到，因此我劝你还是勇敢地发起进

① G.马志尼（1805—1872）：意大利爱国者，意大利独立运动和民主运动的领袖，秘密革命团体“青年意大利”的领导人。

② 荣誉法庭并未成立，不过我后来收到一封含有对黑尔威格的判决书性质的信，后面签署着那些对我很亲近的名字，在签名的人中有着英勇的殉道者毕沙加勒、莫狄尼、奥申尼、柏尔丹尼、麦狄奇、麦查加波、哥圣欢等。——作者注

卡罗·毕沙加勒是拿波里的公爵，具有社会主义的思想，参加马志尼领导的一八五七年的热那亚暴动，失败，战死。其余的人都是意大利的革命者，马志尼的友人。

③ 威门法庭（Court of Wehm）：一种古德意志的秘密法庭，组织来惩罚那些逃避了刑法的人。

攻，让我们来组织一个法庭。”

我还相信这样的一个法庭是可以成立的，这也许是我最后的幻想。我错了，而且为了这个错误我付出了很高的代价。

和马志尼的信同时来的还有一封豪格的信，马志尼知道他是我的亲密的朋友，便把奥申义的信和我的信都给他看过了。我和豪格在巴黎第一次见面以后，他就在加里波的[①] 的部队里服务，他自己在罗马附近的战斗[②] 中显露了头角。这个人有许多好的品质，也有不少荒谬的和不成熟的东西。他一直在他的兵营中做着一个普通奥国中尉的好梦，突然匈牙利人起义和维也纳障碍物的警钟把他惊醒了。他马上抓起武器跑出去，并不是去残杀起义的人民，却是去参加他们的队伍。这个转变太突然了，它留着不自然和不完全的痕迹。

他是一个耽于梦想但有些急躁的人，慷慨，忠诚，而且自尊到了傲慢的程度，他又是一个德国大学生，一个军官学校学生，一个中尉。他对我有着真诚的友爱。他写信说，他就要到尼斯来，求我在他未到以前不要采取任何步骤。“你离开了你的祖国，像弟兄一般地来到我们这里；你不要以为我们允许我们任何一个同国人在做过他以前那些背叛行为之后，又加上造谣中伤，而且还用他的无耻的挑战来把事情完全掩盖，你不

---

① G.加里波的(1807—1882)：意大利爱国者，将军，意大利独立和统一运动的军事领袖。

② 指一八四九年罗马共和国成立的战争。共和国消灭后，加里波的和马志尼都亡命国外。一八五四年加里波的重回意大利领导独立和统一的斗争。

要以为我们会把这样的一个人放过，而不加以处罚。不，我们对我们共同责任的看法绝不是这样。一个俄国诗人给一个西方冒险家的枪弹杀死[1]，这已经够了，——一个俄国革命家不应该死在西方冒险家的手里！”

我写了一封长信回答豪格。这是我第一次的自白。我把经过的一切全告诉了他，我等着他来。

……同时在旁边那间寝室里，一个逐渐衰弱的、伟大的生命在它跟身体的病症和可怕的预感的艰苦斗争中间，慢慢地死下去。我日夜地守在病榻旁边：她喜欢我照料她吃药，我给她弄香橙水。夜晚我燃起壁炉，等到她静静地睡着的时候，我又怀着希望，我还想我能够救活她。但是也还有些痛苦难堪的时刻。……我摸着她的消瘦的、发热的手，我看见她的忧郁的、焦虑的眼睛带了哀求和指望看着我，我听到那些可怕的言语：“孩子们会没有人照料了，他们会变成孤儿了，一切都会完结的，你只是在等待……为着孩子们的缘故，你全丢开罢，你不要去防御那污泥……让我，我来保护你。——你会弄清白的，只要我的身体能够稍微强健一点就好了。……可是不，不，我不会再好起来了。你不要丢开孩子们啊！”——我对她无数次重说着我的诺言。

在这些谈话的某一次中间，娜达丽突然问起我：“他给你

[1] 指普希金被G.C.唐德司在决斗中杀死。唐德司起先是贝利公爵夫人的侍从，公爵夫人把他荐给俄皇尼古拉一世，由荷兰驻俄大使收为义子，他杀死普希金以后被逐出俄国。后来他做了拿破仑三世的侍从。——英译者注

写了信吗?"①

"写了的。"

"把信给我看。"

"你看它做什么?"

"我想看看他能够给你写些什么……"

我倒有点高兴她提起那封信;我迫切地想知道究竟他揭发她的某一件事情里面有没有一点点的真实。我始终不敢问她,可是现在她自己亲口问起那封信,我不能够抑制我的愿望,我想着我的疑惑不会消失,而且在她的嘴唇永远闭上以后它也许还会增加,我自己也感到恐怖了。

"我不想把信给你看,不过你告诉我,你说过这样的话……?"

"你怎么能够想到这种事!"

"是他写着的。"

"这简直叫人不能相信——是他亲笔写的……?"

我把信摺起来露出那一段,拿给她看。……她看了一遍,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伤心地说:"多么下贱!"

从那个时候起她的轻视就变成了憎恨,她以后再没有说过一句宽恕他、怜悯他的话,连一点暗示也没有。

在这次谈话以后,不多几天,她给他写了下面的信:

① 她已经听见了关于那一切的传闻,据我想这不是偶然的。马(利亚)·加(斯帕洛夫娜)寄来的信里隐约地提过那封信,马利亚在巴黎从梅尔骨诺夫那里知道了那一切。——作者注

您的迫害和您的不名誉的行为,使我不得不把我对您写过几次的话,在一些证人的面前再写下来。是,我的迷恋是很大的、盲目的,可是自从您离开这里以后,您那背信的、下等犹太人的性格,您那不受控制的利己心,已经把它们的丑恶的真面目完全露出来了,而同时亚(历山大)的高贵和忠诚却是一天一天地增加。我的不幸的迷恋只成为一个新的台座,为了把我对他的爱情在那上面安放得更高。您想拿污泥涂在那个台座上面,可是您一点也不能破坏我们的结合,它现在比从前更坚强、更稳固。您对一个女人的诽谤和告发,不过引起亚(历山大)对您的轻蔑,您用这个下贱手段玷辱了您自己。您曾经不断地说起要虔诚地尊重我的意志,热烈地爱着孩子们,如今这尊重和这热爱在什么地方呢?并没有多久以前您还发过誓说,您宁肯自己从地面消失,不愿给亚(历山大)带来一刻的痛苦。我不是时常对您说过我连一天也不能够跟他分离,倘使他离开了我,纵然他死了,——我到死也要过孤单的生活!……至于我允许您将来和您再见,我确实说过这样的话——我那个时候还怜惜您,我希望合乎人情地跟您分别,——但是您却使我不能履行我的诺言了。

自从您离开以后,您就开始折磨我,您先要求我答应一件事,接着又要求另一件事情。您说只要您能够带走一点点希望,您愿意销声匿迹多少年,到埃及去。您看见这种话没有用处,您又接连地提起一些荒谬的事情,都是

不可能的、可笑的，最后您就拿公布来威胁我，想使我跟亚（历山大）完全分开，想使他动手杀您，跟您决斗，最后您又拿可怖的犯罪行为来要挟。这些威胁对我并没有效力，您反复用的次数太多了。我现在对您再说一次我在上一封信里说过的话："我留在我的家中——我的家便是亚（历山大）和我的儿女。"倘使我不能够留在这里做母亲，做妻子，我也要留着做保姆，做女仆。"在我跟您中间并没有一道桥。"您使我如今连过去也憎厌了。

娜·赫（尔岑）

一八五二年，二月十八日，在尼斯。

几天以后信从苏黎世退回来。黑（尔威格）没有拆开，便将原信退回；这信是作为保险信寄出的，上面还盖着三个火漆印，现在跟回执一起退回来了。

"要是这样，这封信一定要读给他听，"娜达丽说。

她差人把豪格、德西叶、恩格尔孙、奥申义和福黑特请了来，她对他们说：

"你们知道我多么想替亚（历山大）辩护，可是我整天给困在床上能够做什么呢？我的病多半不会好了，——那么让我和平地死去，我相信你们会实现我这个最后的要求。那个人把我的信退回来了。我求你们中间哪一位在证人的面前把信读给他听。"

豪格拿起她的手说：

"我拿我的生命作保证，您的信一定会读给他听的。"

这个真诚的、豪爽的动作使我们大家都受到感动，怀疑派的福黑特出去的时候兴奋得跟狂热的奥申义一样，奥申义一直到他最后的日子，始终保持着对娜达丽的敬重。一八五七年年终，他去巴黎以前我最后一次见他[①]，他还带着感情（也许还带了一点暗中的责备）谈起娜达丽。拿我们两个人来说，奥申义绝不是那种可以让人责备为道德破产、言行不一致的人！……

……有一天晚上，其实已经夜深了，我跟恩格尔孙忧郁地讨论了很久。后来他回到他的房间，我也到楼上去。娜达丽睡得很好；我在她的寝室里坐了几分钟，便到花园里去。恩格尔孙的窗开着。他愁闷地站在窗前，抽一支雪茄烟。

"看来，命运就是这样，"他说着便向我走来。

"你为什么不睡觉？你为什么出来？"他问我道，他的声音里带一种激动不安的颤动。他抓住我的手继续说下去："你相信我对你的无限的友爱吗？你相信在全世界中我没有一个比你更亲近的人吗？让我来对付黑尔威格！用不着什么法庭，也用不着豪格；豪格是一个德国人；把替你复仇的权利给我，我是一个俄国人。……我想好了一个完整的计划；我需要你的信任、你的祝福。"

他带着苍白的脸色站在我面前，抄着两只手，刚刚出现的

---

① 奥申义在第二年（1858）一月十四日在巴黎勒伯勒节街投弹行刺拿破仑三世，失败后被斩首。拿破仑三世因为奥申义生得漂亮，便下令把他的头浸在硫酸里面。

晨光照在他的身上。我深深地感动，我快要含着眼泪扑过去抱住他的颈项了。

“我宁肯马上灭亡，就从地面上消失，我不愿意让这件把很多我尊为神圣的东西牵连进去的事情弄糟！我不知道你相信不相信？然而没有你的信任，我的手就没有自由。你坦白地告诉我：是，或者不！倘使不，——那么再见罢，大家都该倒楣！你、我也会倒楣！我明天就走，你不会再听到我的消息了。”

“我相信你的友情，相信你的真诚，但是我耽心你的想象和你的神经过敏，我也不大相信你的实际的才干。在这里所有的朋友中间你是跟我最亲近的，可是我应该承认，我害怕你也许会引起麻烦，使你自己受到损害。”

“那么你以为豪格将军就有实际的才能吗？”

“我不是这样说，不过我想豪格是一个更实际的人，正如我认为奥申义比豪格还要实际一样……”

恩格尔孙不肯再往下听了。他用一只脚跳舞，又唱歌，最后他又安静下来，对我说：

“你碰到，你碰到，意想不到的事情了！”

他把手放在我的肩头，低声添上这样的话：

“我正是跟奥申义，跟世界上最实际的人一块儿想出整个计划的。啊，父亲，把你的祝福赐给我们。”

“可是你肯答应，你做任何事情都预先告诉我吗？”

“肯。”

“那么把你们的计划告诉我。”

“我不能够，无论如何，我现在不能够……”

接着是一阵沉默。他要做的事情是不难想到的……

“再见，”我说，“让我想想，”我忍不住又加了一句：“是什么使你告诉我这个呢？”

恩格尔孙了解我的意思。

“是我那个倒楣的软弱！不过没有人知道我告诉过你。”

“可是我知道，”我答道，我们就分开了。

我一方面耽心恩格尔孙的安全，另一方面又害怕会发生什么不幸事故，这对于病弱的娜达丽将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因此我不得不阻止恩格尔孙实行他的计划。奥申义播着他的头，对这件事情表示惋惜。……这样我不但没有惩罚黑（尔威格），我反而救了他，不过这自然不是为了他，也不是为了我的缘故！这完全没有“温情”或者“大量”的意味。

事实上对于这个已经现出原形的英雄，怎么能够有大量和同情呢？爱玛有点警觉了，她因为福黑特谈起她的乔治的时候，讲话不客气，就跟福黑特吵了架，她请求查理·埃特蒙写信给黑尔威格劝他安安静静地住在苏黎世，不要再引起任何事故，否则对他只有不利。我不知道查理·埃特蒙怎样写法，他的工作并不是容易的。然而黑（尔威格）的答复非常精彩。他最先说：不论福黑特或查理·埃特蒙，他们都不配论断他；后来他又说，是我破坏了我和他中间的约束，因此全部责任都应该由我一个人担负。他谈了所有的事情，而且甚至替他自己那种口是心非的两面行为辩护了以后，又下结论道：“我甚至不知道这是不是可以称为背叛。那班小人还在谈钱的事情。

为着彻底解决那个无聊的控告起见，我可以公开地说：赫尔岑花掉几千法郎，作为支付我们在苦闷时期中共同度过的那些消闷和愉快的日子的代价，这并不算多！”查理·埃特蒙说：“这真了不起！这真漂亮！不过这是 niederträchtig（德语：卑鄙无耻）。”

贺也次基[①] 回答黑尔威格说，对这种信的唯一回答便是手杖，他们下次见到面，他马上给黑尔威格一顿手杖。黑尔威格不做声了。

① 查理·埃特蒙便是贺也次基的笔名，他讲的是法国话。

第 八 章[1]

春天一到，病人稍微好了一点。她会在一把扶手椅上坐大半天，她可以自己梳头，这是她生病以来的第一次，最后她还可以听我给她念书不觉得吃力了。

我们正在计划，等她的身体再好一点，我们就到塞维尔[2] 或者加的斯去。她希望早点恢复健康，她很想活，她想去意大利。

自从信退回以后，就再没有一点风波了，好像凭他们夫妇

---

① 在莫斯科列宁图书馆手稿部保存着这一节的一部分的原稿，是写在一张大半张信纸上面的；信纸背面有亚历山大·亚历克桑特洛维奇·赫尔岑（亚·赫尔岑之子）的笔迹："《往事与随想》第五部中的《妈妈的死》；娜·亚·奥格辽娃手抄稿。"这份手抄稿上还有一标题：《一八五五年五月三日》。以后是这样的文字："今天是五月三日——三年前这一天我们举行了葬礼。"以下的两短行涂掉了："葬礼是归结。我等着死——它并不是偶然到我家来的。女人的心胸多么忍受不了这个。"以后便是跟现在这个版本一样的正文，不过有一些小的编辑上的修改。再后有一些重要的变文。——一九四六年列宁格勒版原本的编者

这一节在作者生前曾作为《海洋之夜》的第三节发表过，小标题是《一八五二年》，而且跟上一节"这是就要绝响的音乐的最后的和音"（见中译本第九〇页）紧紧连接着。显然是作者生前发表这两节回忆时，故意把有关黑尔威格的一部分删去了。在一九〇五年圣彼得堡版七卷本《赫尔岑著作集》内《往事与随想》第五部中，《海洋之夜》是第四十八章，《一八五二年》是第四十九章，这是第五十章，另有小标题《死》。

② 塞维尔：西班牙南部的一省。下文的加的斯在西班牙的西南部。

的良心也觉得他们已经走到一个人很少到过的界限，而且跨过了它，又停下来休息了。

娜达丽还不曾下过楼，她也并不着急要到楼下来：她打算在三月二十五日我的生日那一天第一次下楼。她做了一件白色西班牙梅里羊毛布的束带上衣，预备在那天穿，我又给她在巴黎订购了一件貂皮大衣。两天前她自己还写了或者要我写下来那天除了恩格尔孙夫妇、奥申义、福黑特、莫狄尼和帕切里夫妇[①] 外，她还想邀请的客人的名单。

就在我生日的前两天奥尔迦伤了风，在咳嗽：这个时候城里发现了流行性感冒。娜达丽夜里起来两次，到孩子的房里去看奥尔迦。这是一个温暖的夜，但有风暴。她早晨醒来，就得了厉害的流行性感冒，——她咳得很痛苦，到了傍晚又发起热来。

不用说她第二天不会起床了；在发了一夜的寒热之后，第二天她非常虚弱，而且病也增加了。一切重新出现的、虽然微弱、但是我们紧紧抓住的希望都破碎了。不自然的咳声给我们带来一种凶兆。

她不肯让我辞谢客人。所在以午后两点钟，我们不等她，就焦虑地、忧郁地坐下来用餐了。

帕切里夫人带来她丈夫为我的生日所作的一首歌。她是一个沉静、悒郁、而心地非常善良的女人。好像有什么忧愁的事情一直搁在她的心上；也许她的肩头挑的贫穷的担子太重

① 帕切里夫妇：赫尔岑家的尼斯友人。

了，不然便是在那些永远没有间断的音乐功课之外，在那个平凡、软弱，而且深知自己天分不及妻子的男人的热恋之外，生活还使她更希望另外的一点东西。

在我们家里，她比在她的别的学生家里得到更亲切的待遇和更热烈的欢迎，她用南方人的热情爱着娜达丽。

吃过饭她上楼去陪病人坐了一会，她出来的时候，脸色白得像一张纸。客人们请她唱一遍她带来的歌。她在钢琴前面坐下，在键盘上弹了一个和音，开始唱起来，忽然她带着惊恐的眼光看我一眼，就迸出了眼泪，让她的头落在键盘上面，痉挛地低声哭着。我们的宴会就这样地完结了。

客人们几乎没有说一句话就悄悄地散去了，仿佛有一块石头压在他们的心上似的。

我到楼上去。可怕的咳声继续响着。这是葬礼的前奏曲。

而且葬礼有两次！

在我的生日以后不到两个月，帕切里夫人也给埋葬了。她骑驴子到门托勒或者罗加布朗去。意大利的驴子即使在夜间登山也不会失脚。然而这一次驴子却在白天跌倒了，这个不幸的女人跌下来，滚到尖利的岩石上面，带着可怕的痛苦当场死去。……我在卢加诺接到这个消息。①

那么她也是没有了。……nurzu（德语：尽管做去）……以后还该什么怪诞荒谬的事情接着来呢？

---

① 这是娜达丽去世以后的事。卢加诺是瑞士的一个城市，在卢加诺湖畔。

在一切都给阴云笼罩了以后……又来了一个阴郁的、死气沉沉的黑夜，它在我的记忆中非常模糊，要形容它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是无益的。……这是一个痛苦、焦虑、不眠的时期，这是麻痹地意识到恐怖、同时意识到自己的精神衰弱和身体异常强壮的一个时期……

宅子里的一切都崩坏了。有一种特别的混杂和纷乱，一种无谓的奔忙，仆人们都弄得疲劳不堪——同时跟着死的逼近，又来了新的是非、新的龌龊行为……命运并没有给我一点安慰，人也不肯怜惜我；他们好像在说：他的肩头很宽，就让他挑着吧！

在娜达丽逝世的三天前，奥申义交给我一张爱玛写给娜达丽的字条。[①]她要求娜达丽"宽恕那一切对不起她的事情，宽恕大家"。我告诉奥申义，我现在不能把信拿给病人看，不过我非常看重那种引起爱玛写这些话的感情，我愿意接受它们。我不但这样，并且在娜达丽最后的安静的时间中，我还轻

---

① 这一段在一九〇五年圣彼得堡版中是删去了的。这是一八五二年四月二十六日晚上的事，应该是在娜达丽逝世前六天。爱玛听说娜达丽病重，几次想来看她，没有得到许可，便写了这样的两句话：

"娜达丽！请宽恕一切，请宽恕大家，然后让一切永远忘掉吧。我衷心地握您的手。永别了！

爱玛·黑尔威格。"

娜达丽也在这一天，在爱玛送来字条之前，给黑尔威格写了最后一封信，这封信和娜达丽写给黑尔威格的其他的信（娜达丽要他全烧掉），都保存下来了。

娜达丽这样写着：

轻地对她说：

“爱玛要求你的宽恕。”

她讥讽地微微一笑，并不说什么。她比我更知道那个女人。

晚上我听见弹子房里有人高声谈话，——那里原是我们的亲近的朋友平时聚谈的地方。我走进那个房间，看见他们谈得很起劲。福黑特正在大声讲话，奥申义在解说什么事情，脸色比平时苍白。他们看见我进来都不做声了。

“你们在谈什么事？”我问道，我相信一定又有什么新鲜的龌龊行为。

“是这回事，”恩格尔孙答道，“我们守着秘密有什么用处？然而这样一件条顿人的精制品，它真是漂亮得很，我敢打赌，要是以前有过这种事情，我就用脑袋走路！……豪侠的爱玛差奥申义来对你说，你既然宽恕了她，那么为了证明起见，就请你把你从前替他们还债的时候她给你的那张一万法郎的借据[②]还给她。Stupendisch teuer，stupendisch teuer！（德语：贵

“‘——一线生机’——用来做什么呢？总是我自己受到满身责备，自己担起罪名来替你辩护。请安心吧，虽然你有充分的愿望和充足的手段，不用我的帮助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请安心吧；倘使我在任何一个能够了解的人面前讲话（不然我就不会讲话，不然这就是对于我认为最神圣的东西的最大的亵渎），我不会是在替我自己辩护。

“你伤害了我吗？你应当比我知道得更清楚——我只知道我的祝福会永远跟着你，不论任何地方，任何时候。

再说——就是多余的了。”（根据E.H.卡尔的英文转译。）

赫尔岑不知道有这封信。

② 这张借据是用法文写的，至今还保留着。

得吓人，贵得吓人！）"

奥申义有点不好意思，便接着解释道：

"我想她发昏了。"

我拿出她的字条，交给奥申义，我对他说：

"告诉那个女人，她讨价太高了；倘使我要拿她的悔悟的感情估价，我也不会估价到一万法郎。"

奥申义并没有把字条带去。

在她的临危的病榻旁边，我竟然给拖到这种污泥里去：这是什么意思？是疯狂还是恶意，是堕落还是愚蠢？

四月二十九日的晚上马（利亚）·加斯帕洛夫娜到了。娜达丽一天一天地等着她。她求过马利亚好几次，要她来，因为她害怕恩格尔孙夫人会把管教孩子们的权抓在手里。她每点钟都盼望马利亚来；马利亚的信一到，她就叫豪格和沙夏到瓦尔桥去接她。然而不管这个，跟马利亚·加斯帕洛夫娜见面却使她十分激动。我记得她发出跟呻吟差不多的微弱的叫声，唤道："马霞，"[①] 以后就不能再说一个字了。

她生病时已经怀了几个月的孕，朋非士和福黑特都以为她这种特殊情形对她的肋膜炎的治愈有帮助。

马（利亚）·加斯帕洛夫娜的来促成了她的生产，这比我们所预料的容易得多；婴儿活着，可是她的力量却耗尽了。接

① 马霞：马利亚的亲密的简称。

着是可怕的虚弱。婴儿是在清早[①]出世的。到了傍晚，她要我们把婴儿给她，又要把孩子们唤来。[②]医生吩咐过房里需要绝对的清静。我求她不要做这件事。她温柔地望着我。

"你，亚历山大，你也听他们的话?!"她说。"当心，你以后不要因为夺去我这一刻的光阴后悔啊：我现在觉得好些了。我要亲自把婴儿给孩子们看。"

我把孩子们叫了来。

她没有力气抱婴儿，就把他放在她身边，她带着快乐的发光的面貌对沙夏和达达说：

"这是另一个小弟弟。你们要爱他。"

孩子们高兴地跑去吻她，又吻婴儿。我记起来几天以前娜达丽曾经望着孩子们念了下面的诗句：

> 但愿年轻的生命
> 在我的墓门游戏![③]

我充满了悲痛，默默地望着这个垂死的母亲的"神化"。……孩子们走了以后，我求她休息，不要讲话。她也想休息，然而她不能够：泪水从眼里流下来。

"记住你答应我的话。……啊，想起他们孤零零地留在世

---

① 清早：一八五二年四月三十日的早晨。婴儿名弗拉基米尔。

② 莫斯科列宁图书馆收藏的手抄稿中这下面还有一句："我悲痛地远远站着，死很显明地在她整个的美丽的面貌上出现了。"——一九四六年列宁格勒版《往事与随想》编者注

③ 引自普希金的诗《我在热闹的街上散步》。

界上，没人照料，……又在外国，这是多么可怕！……难道就没有救了？"①

她把她那交织着恳求和绝望的眼光停留在我的脸上。这些变化（这些从可怖的绝望转到病愈的梦想的变化）在最后那几天里不可言说地割着我的心。在我差不多完全失掉信心的时候，她会握着我的手对我说：

"不，亚历山大，不能够这样，这太愚蠢了，我们还要活下去，盼望虚弱会过去就好了。"

希望渐渐地溜走了，是它自己慢慢地淡下去的，代替它的便是那说不出的忧郁的、静静的绝望。②

"我不在了的时候，"她说，"一切总会安排好的；现在我不

---

① 一九〇五年圣彼得堡版《往事与随想》中就只有这一句话。一九四六年列宁格勒版编者注：列宁图书馆收藏的手稿中，"救了"以下，有一段重要的变文："孩子们出去以后，她哭了起来，很久不说一句话，后来拿起我的手放在她的胸上，说：'亚历山大，倘使……记住你答应我的话。……我害怕他们孤零零地留在世界上。'她又哭了。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就不作声了。她带着恐怖的表情摇摇头，又用说不出的痛苦的眼光望着我。'你放心吧，'我说，'凡是人所能做到的事我都要办到。……''真的吗，'她说，好像希望的光在她的心上亮了一下，也在我心上亮一下。她不想死。在最后那些时刻她常常、常常说：'是的，我想活，我应当活……为了辨别是非，为了你的胜利，为了孩子们（不会有人像我这样爱他们了）。'然而有一些时候，肉体的痛苦、耽心、侮辱，还有过去的回忆又使她生出另外一种心情……她不止一次地说：'看起来，孩子们多么需要我，可是我不在了的时候，一切还不是一样地照常进行。'"

② 一九四六年列宁格勒版《往事与随想》中在这里有一行作者的小注："这篇原稿是三年前写的。——亚·赫。"一九〇五年圣彼得堡版中没有这个注。作者的这一部分的回忆是在一八五八年写完的。这里所谓"三年前"，大约是一八五五年。

能够想象你没有我怎样活下去，看起来孩子们多么需要我，可是你想一想——就是没有我他们也会一样地长大成人，而且一切都会照常进行，好像以前一直是这样的。"她还说了几句关于孩子们、关于沙夏的健康的话；她看见沙夏到了尼斯以后身体好多了，而且福黑特也承认这个，她很高兴。"好好地照应达达，你待她要很仔细，她个性深沉而含蓄。"她又叹息说："啊，只要我能够活着等到我的娜达丽[1]来就好了！……"过了片刻，她又问道："孩子们都睡了吗？"

"睡了，"我说。

从远处传来一个孩子的声音。

"这是奥琳卡，"[2]她说，并且微笑了，这是她最后一次的微笑。"你去看她要什么？"

一到夜里，她就烦躁不安，她不作声，却向我示意她的枕头放得不舒服；可是我把枕头给她放好以后，她依旧不能安静，她带着痛苦甚至带着烦恼继续不停地把她的头移来移去。后来她沉沉地睡去了。

到了半夜，她的手动了一下，像是要喝水；我拿了一茶匙橙子汁，搀着糖和水去喂她，她的牙齿却闭得紧紧的；她已经不省人事了。我吓得发呆了。天刚刚亮，我拉开窗帷，带着一种木然的绝望的感觉看出来：不仅她的嘴唇，连她的牙齿在几

① 娜达丽：指娜达立亚·土奇柯娃，现在是娜达立亚·奥格辽娃了。

② 奥琳卡：奥尔迦的爱称。她是赫尔岑的小女儿，一八五〇年十一月二十日生于尼斯。

个钟头里面都变成了黑色。

这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会有这种可怕的昏迷，为什么会有这种黑色?!

朋非士大夫和卡尔·福黑特整夜坐在客厅里。我去把我所看到的告诉了福黑特。他避开我的眼光，不回答一句话，跟着我上了楼。已经用不着回答了。病人的脉搏差不多停止跳动了。

在正午的光景，她恢复了知觉，把孩子们叫了来，可是连一句话也没有说……

她以为屋子很暗。在白天这样的事情是第二次了。她问我为什么不点蜡烛（桌子上正燃着两支蜡烛），我又点了一支，可是她看不见，她还说房里很黑。

"啊哟，我的朋友，我的头痛得很！"她说，此外还说了两三句话。

她拿着我的手（她的手已经不像一只活人的手了），用它盖住她的脸。我对她说了几句话，她含糊地回答着，她的知觉又失去了，而且就再也不曾回来了……

我等着她再说一句话……一句话……或者结局马上到来！她继续保持着这种状态一直到第二天早晨，就是从五月一日正午或者一点钟光景到五月二日上午七点钟。

多么残酷的、可怕的十九个钟头！

有时她恢复了一半的知觉，清清楚楚地说她想脱掉那件法兰绒衫，那件短睡衣，要我给她一方手帕，以后就不再要什么了。

有几次我开始说话;我觉得她是听见了的,可是不能开口答应一声,一种深的痛苦的表情在她的脸上现了一下。她两次紧紧握住我的手,这并不是发作性的,这是有意做的。到了早晨六点钟,我问医生还会支持多久。

"不会多过一个小时。"

我便走进花园去唤沙夏。我想让他永远记住他母亲弥留的情况。我和他上楼的时候,我告诉他什么样的一种悲哀在等着我们。他完全明白我的意思。

他脸色苍白,而且差不多要晕倒了,他跟着我走进房去。

"我们挨着身子跪在这里吧,"我指着床头那块地毯对他说。

她满脸都是临死前的汗,她的手抽筋似地抓住她的短睡衣,好像要脱掉它。她发出几声呻吟、几个声音,这使我想起了瓦津[1] 临死的挣扎——于是连这些也停止了。

医生拿起她的手,然后放开了它,它像一件东西似地落了下去。

孩子低声哭着。我记不大清楚开头做了些什么事情。我跑开,跑进厅子里面,在那里遇到查理·埃特蒙,我想对他说几句话,可是我说不出来,从我的胸膛里发出一个连我自己也没有听见过的声音。我站在窗前,惘然若失地痴痴望着下面毫无感觉地动着的、闪光的海。

于是我突然记起了那句话:"好好地照应达达。"我很耽心

---

① 瓦津·巴谢克(1808—1842):赫尔岑的大学同学,一个西伯利亚流放人的儿子。

那个孩子给吓坏了。我先前吩咐人不要告诉她,可是这靠得住吗?我把她找了来,我们两个关在书房里,我叫她坐在我的膝上,我慢慢地、一点一点地使她到最后才知道“妈妈死了”。她浑身打颤,脸上红了几块,眼泪涌了出来。……我带她到楼上去。那里的一切都已经改变了。娜达丽躺在一张装饰着鲜花的床上,好像还活着似的,在她的身边睡着婴儿,他也是在那个晚上死去的。屋子里装饰着白布,而且撒满了鲜花。意大利人在任何事情上都有艺术的趣味,所以知道用点什么东西来安慰死的惨痛。那个受了惊的孩子给这种美丽的环境感动了。

“妈妈在这里,”她说;可是等我抱起她、她用她的小嘴去吻她母亲冰冷的脸的时候,她忽然歇斯底里地哭了起来。

我再也不能忍耐了,我走了出去。……

过了一点半钟,我又独自坐在那个窗口,又茫然望着海,望着天。门开了,达达一个人走进来。她走到我跟前安慰我,用一种受了惊的低声对我说:

“爸爸,我是个好孩子,不是吗?我哭得不多。”

我万分悲痛地望着这个无母的孩子。我心里想道:“是的,你应该做一个好孩子。你不会知道母亲的宠爱、母亲的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代替它们。你的心里会开着一个缺口,你不会感受到那最好的、最纯洁的献身的爱了,那是世界上唯一没有私心的献身的爱。你将来也许会感觉到的,可是绝没有人会替你感觉到这个。一个父亲的爱怎么能够跟一个母亲的爱的痛苦相比呢?”

娜达丽躺在鲜花中间。百叶窗已经拉下了。我坐在床前椅子上，就是我平日坐的那把椅子；四周非常静，只有海水在窗下轻轻地响动。好像有细微的、非常细微的呼吸将盖在她脸上的纱微微地吹了起来。

悲哀和烦恼缓缓地沉静下去，好像苦难已经不留一点痕迹地过去了，仿佛给连它本身代表什么也不知道的死亡的那种毫不在乎的从容态度揩掉了。我守着，我守了一个整夜。倘使她真的醒了起来，又怎样呢？

她并没有醒起来；这不是睡，这是——死。

那么这是真的了！

……地板上以及顺着楼梯下来都洒满了橘红色的天竺葵。花香甚至到现在还使我像触电似地颤抖，我记起那一切的详情，连每一分钟都不遗漏；我又看见饰着白布的房间，还有罩上套子的大镜；在她的身边，躺着那婴孩的黄色的身体，他睡着了、没有醒过来，他的身上也盖满了鲜花；她的冷冷的、冷得可怕的前额……我没有思想，没有目的，急急走进花园里去。我们的弗郎沙躺在草地上，像一个小孩似地哭着。我想对他讲一两句话，却发不出声音，我又跑回那里去。一位我不认识的太太，穿着全身的黑衣服，后面跟着两个小孩，她轻轻地开了门，——她要求我允许她念一篇天主教的祷告辞，——我自己也准备跟她一起祷告。她跪在床前，小孩们就跪在她旁边，她喃喃地念着拉丁文的祷辞。小孩们轻轻地跟着她念。后来她对我说：

"他们也是没有母亲的孩子，他们的父亲又在远方。您参

加过他们奶奶的葬礼。”

他们是加里波的孩子。

……在二十四小时以内，我们的院子里、花园里就聚集了一大群亡命者。他们是来送她到墓地去的。福黑特和我两人把她放进棺里——棺木抬出去了——我脚步稳定地跟在后面，一面拉着沙夏的手，一面想：人给牵到绞刑台去的时候，就是这样地望着人群吧。

街上有两个法国人（我记得里面有一位是福格伯爵）带着憎厌和嘲笑，指着我们这个行列，说不该没有牧师。德西叶大声责备他们。我很吃惊，对他做了一个手势：肃静是最要紧的。棺木上面放了一个大花圈，是用深红色小朵蔷薇花做的。我们每个人都摘了一朵，这好像一滴血，滴在每个人的身上。

我们上山的时候，月亮升了起来，海也在闪光，这海对于杀死她的事情也是有份的。我们把她葬在突出在海中的山坡上，在这里一边望得见埃斯特勒，另一边望得见哥尔尼西。这周围也是一个花园。那么她依旧躺在万花丛中，就好像她躺在床上那样……

两个星期以后，豪格记起了她的最后的愿望和他的诺言，他同德西叶准备到苏黎世去。

马利亚·加斯帕洛夫娜要回巴黎去了。大家都劝我让她把达达和奥尔迦带走，我自己带着沙夏到热那亚去。

想到要跟她们分别，我非常痛苦，可是我已经不相信自己了。我想，这样办也许对她们真有好处；要是对她们有好处，

那么就这么办吧。我只求马利亚不要在五月九日以前把她们带走，那天是我们结婚十四周年纪念日，我想和她们在一起过一天。

在纪念日以后的第二天我把她们送到了瓦尔桥。豪格送她们到巴黎。我们望着海关人员、巡官和各种警察在麻烦来往的旅客。

豪格丢失了我送给他的那根手杖，他到处寻找，很不高兴。达达哭着。卖票员穿着制服，坐在马车夫旁边。四轮驿车顺着德拉基娘街开去了，我们，德西叶、沙夏和我走回桥这面来，雇了一部马车，回到我住的地方。

我现在没有家了。孩子们一走，家庭生活的最后的痕迹也消失了。一切都带着独身者的样子。两天以后恩格尔孙夫妇也离开了这个地方。一半的屋子都关起来。德西叶和埃特蒙搬到我家里来住。女性的成份完全没有了。只有沙夏的年龄和容貌还使人想起这里曾经有过别的东西……而且使人记起一个不在了的人。①

后　　记

（一八六〇年九月九日在布勒毛斯记）

……在葬礼后五天，黑尔威格写信给他的妻子说："这个

① 一九〇五年圣彼得堡版《往事与随想》中《海洋之夜》第三节《一八五二年》到这里就结束了。

消息使我非常难过。我充满了阴郁的思想。把虎哥·浮司葛诺[1] 的 *I Sepolcri* 用第一班邮件给我寄来。”

在以后的一封信里[2]他又写着：“现在我同赫尔岑和解的时候到了。我们的争吵的原因已经不存在了，……只要我能够跟他——面对面就好——他是唯一能够了解我的人！”

是的，我了解他！

① 虎哥·浮司葛诺(1778—1827)：意大利著名诗人。*I Sepolcri* 是他的诗集《坟墓》。

② 这两封信都是托人带到尼斯的。——作者注

追　　记[①]

豪　　格

豪格同德西叶一天早晨到了黑(尔威格)在苏黎世住的一家旅馆。[②] 他们问侍役他是不是在屋子里,听说他在,他们吩咐侍役不用通报就带他们到他的房间去。黑(尔威格)看见他们,脸白得像一张纸,浑身发抖,他站起来,一言不发,把身子靠在一把椅子上。

"他的样子真难看,——恐怖的表情把他的脸扭成了怪相,"德西叶后来对我说。

"我们到你这里,"豪格对他说,"是来实现我们亡友的愿望:她临死前在病榻上写了一封信给你,你借口说这封信是伪造的,是别人强迫她写的,不拆开信看,就原封退了回来。她亲自委托德西叶·狄·莫特同我两个来向你证明那封信是她亲笔写的,而且是出于她自愿的,她还要我们把原信大声读给你听。"

---

① 《追记》在一九一九年第一次发表,已是作者逝世后四十九年了。

② 这是一八五二年七月一日的事情。

"我不要，不要……"

"你坐下，听我读吧，"豪格提高声音说。

他们坐下来，豪格拆开信，却从里面抽出了一张黑(尔威格)亲笔写的字条。

那封信(我是故意用保险信寄出的)退回的时候，我把它交给恩格尔孙保存。恩格尔孙给我看，信封上的火漆印有两个是重盖的。

"你可以相信那个坏蛋已经读过了信，"他说，"因此才把它退回来。"

他把信拿到蜡烛前面照给我看，现在装在信封里的不是一张信纸，有了两张。

"谁封的信？"

"我封的。"

"除了信再没有别的东西吗？"

"什么也没有。"

于是恩格尔孙拿了一张同样的信纸，和一个同样的信封，再盖上三个火漆印，然后跑到药店去；他在那里把两封信都秤过：那封退回的信比另一封重一半。他一路上又唱歌又跳舞，一到家便对我叫起来："我猜对了！我猜对了！"

豪格取出了字条，大声读了一遍信，然后才看字条，字条一开头便是咒骂和责备，他把字条递给德西叶看，又问黑(尔威格)道：

"这是你的笔迹吗？"

"不错，不错，是我写的。"

“那么信是你拆过的了。”

“我没有向你解释我的行动的义务。”

豪格拿回字条，撕碎它，对着他的脸掷过去，一面说：

“你真是个卑鄙的东西！”

黑（尔威格）慌张起来，抓住拉铃的绳子，用尽力气拉着。

“你要做什么？你发疯吗？”豪格说，就抓住黑（尔威格）的膀子。黑（尔威格）用力挣开了，冲到门口去，打开门，大声叫起来：

“杀人！杀人！”（德语：Mord! Mord!）

听见这种发狂的拉铃声和叫声，许多人一齐跑上楼到他的房间来：茶房们和这条走廊上各个房间的客人全来了。

“警察！警察！杀人！！”现在黑（尔威格）站在走廊上叫喊了。

豪格走到他面前重重地打了他一记耳光，对他说：

“听着，你这混蛋（德语：schuft），这是给你喊警察的酬劳。”

这个时候德西叶便回到房里去，把他们的姓名和地址写下来，一声不响地递给他。一群看热闹的人挤在楼梯上。豪格向旅馆主人道了歉，就和德西叶一路走了。

黑（尔威格）马上跑到警察局去，请求法律的保护，来对付那些派来暗害他的人，他并且反复地询问他能不能为着打耳光的事对他们提出控告。

警察局长当着旅馆主人在场，问明了这个案子的详细情形，他表示那两个人既然在青天白日之下这样地走进旅馆来，

并且还留下自己的姓名和地址，不见得就是受人雇用的凶手。至于进行诉讼，他觉得这倒是很容易的，而且他几乎可以断定豪格会被判决缴纳一笔数目很小的罚款，或者短期的监禁。

"不过在您这个案子里有点不方便的地方，"警察局长又说，"就是为了要使那位先生得到惩罚，您必须公开地证明他的确打了您一记耳光……据我看来您最好还是不要去计较，否则谁知道会泄露出什么事情来。"

警察局长的道理胜利了。

我那个时候在卢加诺。我把事情仔细想了一下，我觉得很不安：我知道黑（尔威格）不会向豪格或者德西叶挑战，不过我却不能确定豪格会安静地离开苏黎世，不再有其他的动作。倘使豪格向黑（尔威格）挑战[①]，那么，我打算处理这件事情的办法就完全给他破坏了。德西叶的善意的聪明，我是可以完全信赖的，然而他那法国人的气质又太重了。

豪格为人固执到任性的程度，又像小孩子那样地爱发脾气。他总是喜欢跟人吵架，起先跟贺也次基吵，后来跟恩格尔孙，以后他又跟奥申义和意大利亡命者们争吵（他终于使他们成为他的敌人）；奥申义带着他特有的微笑，微微摇头，非常好笑地说：

"Oh, il generale, il generale Aug!"（意语：啊，将军，熬格将军！）

卡尔·福黑特对事情素来有透彻的、实际的见解，只有他

① 他的确这样做过了，——不用说，黑（威尔格）并没有接受。——作者注

一个人可以使豪格听话。他对豪格很不客气，他挖苦他，他骂他，——豪格却服从他。

“你找到了什么制服我们这位孟加拉将军的秘诀？”我有一次问福黑特道。

“Vous l’avez dit”(法语：你已经说出它了)，福黑特答道，“你已经猜到了那个秘诀。我能制服他，就因为他是一个将军，而且他相信他是一个将军。一个将军知道服从纪律，他不能够反对上级官员：你忘记了我是一个帝国的代表。”①

福黑特说得很对。几天以后，恩格尔孙在谈话中不曾留心到他是在豪格面前讲话，他无意间说出来：

“这种混蛋只能是一个德国人。”

豪格生了气。恩格尔孙便向他(豪格)解释，说是自己一时大意，这种无聊的话是顺口说出来的。豪格却说，他生气的并不是因为恩格尔孙当着他的面说这种话，倒是因为恩格尔孙对于德国人抱着这样一种见解。他走出去了。

第二天很早他去找福黑特，看见福黑特还睡在床上，便叫醒他，把恩格尔孙的侮辱告诉他，并且要求他做证人，还请他把挑战书给恩格尔孙送去。

“怎么，你以为我也像你那样发昏了吗？”福黑特问他道。

“我没有忍受侮辱的习惯。”

“他并没有侮辱你。人有时候说话是随便的，——况且他

① 卡尔·福黑特是一八四八年德意志统一运动中基森选出的国民议会的代表。

道过歉了。”

“他侮辱了德国。——应该使他明白，他当着我的面侮辱一个伟大的国家不能不受到惩罚。”

“但是为什么只有你一个人才是德国的代表呢?!”福黑特大声对他说。“我不也是一个德国人吗？难道我就没有像你那样的替德国辩护的权利——或者比你更多的权利吗?”

“当然，要是你肯保卫它，我就让给你做。”

“好，不过你既然交给我，我就希望你以后不要干涉。你静静地坐在这里，等我去看看，恩格尔孙是不是真有那种意见，或者这只是一句无意间说出来的话，——那么我们就会把你的挑战书撕掉。”

半点钟以后福黑特到我家里来。我完全不知道前一天发生的事情。福黑特走进来，像往常那样地大笑，一面问我道：

“你们的恩格尔孙是不是在到处乱跑？我已经把我们的将军关在家里了。你想象看，他居然因为恩格尔孙说起倒楣的德国人的时候不客气，就要同恩格尔孙决斗；我说服了他，说这是我的特权。事情已经解决了一半了。现在你应该使恩格尔孙安静下来，倘使他不是在发高烧的话。”

恩格尔孙简直没有想到豪格会气得这么厉害；起先他还想亲自向豪格解释，打算接受挑战书，后来就放弃了这个主意，我们把豪格请了来。这天早晨“帝国的代表”便丢开他的水母和海灯[①]，坐在我家里，一直到豪格与恩格尔孙两人一面

[①] 卡尔·福黑特是一个博物学者，而且是十九世纪中一个优秀的生物学家。

喝酒，吃着米兰式的肉片，一面友好地谈起来，他才回去。

我从卢加诺又到琉森[1]，在琉森我便遇到了一个新的问题。就在我到的那天，德西叶告诉我，豪格写了一篇打耳光的回忆录，把整个事情全写出来了；他想发表它，德西叶费尽唇舌，才用这个理由（他不能事先不征求我的同意就发表这样的文章）劝阻了他。豪格没有想到我会不同意，便答应等我。

“你要尽力阻止这篇不幸的 factum〔法语：事实陈述书〕发表出来，”德西叶对我说：“它会把整个事情弄糟，——它会使你、使你所宝贵的纪念、使我们大家成了永久的笑柄。”[2]

晚上豪格把原稿交给我。……德西叶没有错：我绝对受不了这样一个打击。在这篇文章里他用一种对我和对死者的非常热烈的、友爱的调子叙述一切事情，写得很可笑，在那个充满眼泪和绝望的时期中，我觉得很可笑。通篇文章写成了散文体的《堂·卡罗斯》[3] 的风格。一个人能够写出这种东西，他一定重视他的作品，不用说没有经过斗争他是不会放弃它的。我现在担任的并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这篇文章是为着我的缘故，为着友爱的缘故而写的，并且写得很公平、很诚实、很光明；——现在我不但不对它表示感激，我反而必须给他去掉那个在他的脑子里已经生了根、并且把他抓得牢牢的

---

① 一九四六年列宁格勒版《往事与随想》编者注：“赫尔岑一八五二年七月十四日到琉森。”琉森是瑞士的城市。

② 英译本作“它会使你，使我们大家，使我们那么宝贵的纪念都成了永久的笑柄。”这是根据一种变文（一九二一年一月柏林版原本译出的）。

③ 《堂·卡罗斯》：席勒的五幕诗剧。堂·卡罗斯便是剧中的主人公。

思想。

我不能够妥协。我仔细思索了好久，我下了决心给他写一封长信；我感谢他的友情，可是我请求他不要发表这篇回忆录。我说："倘使关于那件可怕的事情的确需要发表文章的话，那个不幸的权利也应该属于我一个人。"

我封好信，在早晨七点钟给豪格送去。豪格回信说："我不赞成你的意见；我给你、也给她建立了一个纪念碑，我把你放到一个高得不可接近的峰顶上，要是谁敢提一个字，我就会使他闭嘴。不过你有权利决定你自己的事情，倘使你要写，我自然就让你写。"

他整天露出不快活同烦躁的神气。到晚上我忽然想起一件可怕的事情："倘使有一天我死了，他就会竖起那个纪念碑来，"因此在向他告别的时候，我一面拥抱他，一面说：

"豪格，不要跟我生气；的确，在这样一件事情上面，再没有比我更好的裁判官。"

"我并没有生气，我只是不痛快罢了。"

"好，你既然没有生气，那么让我把你的原稿带去，你就把它送给我吧。"

"我很高兴送给你。"

有趣的是，从这个时候起豪格在文学方面对我就有了一种成见，后来在伦敦有一回我向他说起他给洪波尔特[1] 和

---

① 亚历山大·洪波尔特(1769—1859)：英译本作"加里波的"，德国博物学家。

麦启孙[①]写信，文章过于雕琢，而且词藻富丽，他含笑答道：

“我知道你是一个长于论理的作家，你有一种属于冷静的理性的文体，但是诗和感情另有一种不同的语言。”

我又一次感谢命运，我不仅拿走了他的原稿，而且在我动身去英国的时候，我把它烧毁了。

打耳光的新闻传布得很远，很广，在《新苏黎世报》上突然刊出了一篇黑（尔威格）署名的文章。他说，那一记“出名的耳光”并没有打过，相反的，他“推开了豪格，使得豪格的背在墙壁上擦过”。——除开别的一切不说，凡是知道豪格的身体强壮与举动灵敏和这个巴登远征军领袖的虚弱与不灵活的人，都明白这件事是不可靠的。他更说这是赫尔岑男爵用俄国金钱筹划的一个范围广大的阴谋的一部分，他还说那两个我他的人是我雇用的。

豪格和德西叶立刻在同一份报上发表了一个严正、简明、慎重、尊严的声明，说明那件小事的经过情形。

我又在他们的叙述后面附加道，我雇用的人除了仆人外，就只有黑（尔威格）一个，他在这以前的两年内都是靠我的钱生活，而且在我的欧洲朋友中间就只有他一个人欠我一笔不小的款子。这个武器是我素来很讨厌的，现在我却用它来保护我的受到诽谤的友人。

对我这个声明，黑（尔威格）又在同一份报上答辩道：他从

① R.I.麦启孙（1792—1871）：英国地质学家。

不需要向我借钱，而且他也不欠我一个铜板。（钱是他的妻子借来给他用的。）

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医生从苏黎世写信给我说，黑（尔威格）派他来向我挑战。

我请豪格代我回答说，现在，跟从前一样，我仍然认为黑（尔威格）没有资格向我提议决斗；我说，他的惩罚已经开始了，我要继续走我自己的路。我们应该注意，在爱玛以外仅有的两个接近黑（尔威格）的人（这个医生和李却·瓦格纳尔①，那个前程远大的音乐家）对黑（尔威格）的品格都不尊敬。这位送挑战书来的医生并且附言："至于这回事情的是非曲直，我完全不知道，我也不想参加一点意见。"他在苏黎世还对他的朋友说："我怕他不会实行决斗的，他不过想惹起一场吵闹，可是我不肯让他作弄我，拿我开玩笑。我对他说过我衣袋里还要放一支实弹的手枪。这是对付他用的！"

至于李（却）·瓦格纳尔，他写信来向我抱怨豪格太粗暴，并且说，他对于这个他"所爱的、所怜悯的人"不能下一个严厉的判决，还说："他需要宽大、体贴的待遇，那么他也许还可以从他那琐碎的、女流气的生活中，他那反常的放荡行为中自拔出来，恢复他的力量，露出他另外的一种面目。"

在一切的恐怖之外，再加上为着金钱的吵闹，这是很无聊的，然而我知道这对他却是一个严重的打击，这个打击是整个资产阶级的社会（这就是说，瑞士和德国的全体舆论）很了解，

① 李却·瓦格纳尔（1813—1883）：德国音乐家，乐剧的建设者。

而且很重视的。

黑(尔威格)夫人当初写给我一张一万法郎的借据,后来又想用几句说得太迟了的后悔的话换它回去,那张借据还在我的手里。我把它交给一个公证人。

那个公证人一手拿报纸,一手拿借据,去找黑(尔威格),要他解释明白。

"您看,这不是我的签名,"他说。

公证人把他妻子的来信拿给他看,她在信里写着,钱是她替他借的,而且他事前也知道。

"我一点也不知道,而且我从没有叫她这样做过;不过您可以写信到尼斯去问我的妻子,——我跟这件事没有一点关系。"

"那么您的确不记得您委托过您的太太?……"

"我不记得。"

"这倒是很不幸的事;这么一来这个简单的债务问题就换上另外一种性质了,您的对方可以控告您太太诈欺取财,escroquerie〔法语:欺诈〕。"

诗人听见这样的话毫不惊慌,他英勇地答道,这不是他的事情。公证人把他的答复告诉了爱玛。我也没有追究这件事。不用说,他们也没有偿还借款。

"现在,"豪格说,"现在到伦敦去?! ……我们不能够就这样地放过那个混蛋。……"

几天以后我们就从莫勒旅馆的四楼上看窗外的伦敦大雾了。

一八五二年秋天我迁到伦敦居住[①]，跟着我的移居，我结束了我的生活中最痛苦的一部分，而同时我的故事也就在这里中断了。

一八五八年写毕

再　记

今天是一八六三年五月二日……十一周年纪念日。当初站在她墓前的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一个在近旁……有些已经不存在了，还有一些离得很远——这不仅是地理上的远。

奥申义的头血淋淋地从断头台上滚下来。

恩格尔孙的尸首（他逝世前跟我闹翻了）睡在海峡群岛上。[②]

德西叶·狄·莫特，那个化学家兼博物学家，还是和从前一样地温厚、善良，不过他现在干起召魂术和灵动术[③] 一类的事情来了。查理·埃特蒙是拿破仑亲王[④] 的朋友，现在在卢森堡宫当图书管理员。

---

① 一九四六年列宁格勒版《往事与随想》编者注："赫尔岑在一八五二年六月八日至九日从尼斯出发，第二天到热那亚，六月二十二日从热那亚到卢加诺，七月十四日到琉森，八月中旬离开瑞士，经过巴黎，于八月二十五日到达伦敦。"

② 恩格尔孙一八五五年死在英国海峡群岛之一的泽稷岛上。

③ 召魂术和灵动术：这都是骗人的把戏。当时在欧美一部分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间颇为时髦。召魂术旧中国也有。灵动术就是用手指尖接触桌子使它转动的把戏。

④ 拿破仑·约瑟·查理·保罗（1822—1891）：拿破仑三世的堂兄弟。

卡尔·福黑特没有什么改变，而且比任何人更忠于自己。

豪格，我在一年前见过。他为着一些小事在一八五四年同我争吵起来，没有告别，就离开了伦敦，跟我断绝了联系。一年前我偶然知道他在伦敦。我送信给他说，“她安葬十周年纪念日到了；为着毫不重要的原因生气是可耻的事；那个神圣的纪念早已把我们拴在一起了；即使他已经忘记，我却还记得他当时如何慷慨地向我伸出他的友情的手。”

我知道他的性格，便先发动，我去找他。他很高兴，很感动；然而即使是这样，我们的见面比任何的离别都更凄凉。

我们起先谈一些人，一些事故，想起过去的种种细节，然后停了下来。我们看得出，彼此间无话可说：我们成了完全陌生的人了。我竭力使谈话不要中断，豪格也用尽他的力量；他在小亚细亚旅行中间的种种事故都谈到了。最后它们也谈完了，——又是一阵使人难堪的沉默。

“啊！”我掏出表来看了一下，突然说，“五点钟了，我还有一个 rendez-vous〔法语：约会〕。我得离开你了。”

我说了谎：我并没有约会。豪格好像也觉得压在他肩上的石头落下来了。

“就五点钟了？我今天要到克拉彭去吃午饭。”

“你要花一个小时才到得了那里，我不耽搁你了。再见。”

我走出来到了街上，我快要……“大笑”吗？——不，哭了。

两天以后他到我家里来吃早饭，——又是同样的情形。他说第二天就要离开伦敦，事实上他却住了好久，不过我们已经够了，我们不想再见面了。

特丁顿[1] 出发之前(一八六三年八月)

奥(格辽夫)在诺夫哥罗德的时期中曾经歌唱过“Cari luoghi io vi ritrovi”〔意语：亲爱的地方我又要见到你们了〕；我又要见着它们，而且我害怕见到它们。

我还是走那条路经过埃斯特勒山到尼斯。一八四七年我们也曾走过这里，下了埃斯特勒，第一次进入意大利。一八五一年我又经过这里到叶耳去找我母亲和我儿子的遗迹，可是我什么也没有找到。

不容易变老的自然界还是跟从前一样，可是人改变了。我第一次跨过滨海阿尔卑斯山的时候，我正在追求丰富的生命，追求快乐……后面有小片的云，故国的天空罩着一片愁惨的青色……在我们的前面却是无云的晴天。三十五岁的年纪，我年轻，而且充分感觉到自己精力旺盛，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

第二次我带着悲痛，精神恍惚，经过这里，我来找寻轮船遇险遭难者的遗体，——不仅我后面满是可怕的阴影，而且前面的一切也很黯淡。

第三次我到孩子们那里去，到她的墓前去，——我的愿望不大：让我的脑子得到一点休息，希望我四周有一点和谐，我

① 特丁顿：英国东南部密德尔塞克斯州的一个小城。

寻求和平、疲劳与衰老中的这种 noli me tangere (“安静”)[1]。

到达以后

一八六三年九月二十一日我来到墓前。四周很静:海也无声,只有风在路上扬起尘柱。墓石的沉默和柏树的轻微的沙沙声使我感到古怪和陌生。她不在这儿;这里没有她,——她活在我身上。

我从墓地又到那两所宅子去:修氏家和杜以斯家。两处都没有人住。为什么我又来召唤这些不会说话的原告见证呢?……这是阳台,我那一次带着难堪的痛苦在这里,在蔷薇和葡萄园中间走来走去,望着荒凉无人的远方,精神有些错乱,我胆怯地希望得到安慰和援助,我在人们中间找不到它们,我就在酒里找寻。

长沙发还在这里,它现在盖满了尘土,还有些小框、小架,——就是这张长沙发,在我们那次谈话的极其痛苦的夜里,她疲乏不堪地坐在它上面,而且失去了知觉。……

我拉开杜以斯家寝室的百叶窗。……还是旧日的风景。我转过头去:床,床垫已经拿下来,放在地板上,好像丧事就是几天前的事情。……这间屋子里少了、失去了一些东西!……可怜的受难的女人——我虽然无限地爱她,可是我自己也参加了杀死她的罪行!

---

[1] noli me tangere:拉丁文,原意是“不要挨我”。据《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二十章中载,耶稣复活以后对站在坟墓外面哭着的抹大拉的马利亚说:“不要挨我。”这里的意思是:让我安静。

附　录

赫尔岑日记摘录（四则）

一　一八六三年二月二日

近来我很少想到在这本书里记下什么——新的痛苦，不幸，烦忧。这本书可以叫做悲叹之书吧。

波兰的起义，俄国军官的命运，我遇到的病痛、争执、误会——还有分离，我又想起了那句老话："一个人受苦的能力会大得无限，享乐的能力却小得可怜！"

幸福、和谐——这一切全飞走了，不过一瞬便逝，难得留一点痕迹，——而悲伤、病痛、等待灾难来临——这一切却继续下去，一直继续下去，而且割得更深，像犁一样，还留下不少深沟。

二　一八六三年九月二十四日

在热那亚，费得尔旅馆

Cari luoghi io vi ritrovi〔意大利文：亲爱的地方我又要见到你们了〕。——我经过我在一八四七年走过的那条路到了意大利。然后在一个非常好的秋天的日子，我从埃斯特勒山下来到戛纳，再到尼斯。一八五一年，我得到我母亲、我儿子

和斯皮曼遇难的消息二十四小时以后到叶耳去，又经过这里。这已经是十二年前的事情了。我很想再看一次这些地方，然而我害怕又置身在那同样的环境里面。不容易衰老的自然界还是从前那样，可是人改变了。第一次我到这里的时候，我正在追求背景光辉灿烂的丰富的生活。

阿尔卑斯山在我们前面，我们头上没有一片阴云，我身心愉快，充满勇气，奔向前程。

第二次我挑着悲痛的担子。在我前面是遭难船，在我后面是我的遭难的生活。

现在我到我的孩子们那里去，为着我个人我没有别的指望，只求：脑子得到休息、无忧无虑，让我有一个和谐与安静的环境，疲劳与衰老中的 noli me tangere。

我们在土伦与尼斯间离开了铁路，坐马车到叶耳去。十二年中间一切旧的痕迹都给擦掉了。我连从前住过的旅馆也找不到了。拿破仑[1] 的那种"修建狂"连这里也没有放过。……那个时候我找不到尸首，找不到遗物，现在我找不到房屋，找不到地方。

再没有更彻底的损失了。

我们堂皇地进了尼斯。铁路还没有修好；我们坐在公共马车车顶上，天黑了，月亮升起来，好像是一个夏天的日子！靠近早晨的时候，吹起了西北风，带来一阵急雨，我们听见了海水的凄凉的私语。

---

① 指拿破仑三世，当时的法国皇帝。

那个声音一直使我不舒服,在十二年以后我第一次回来给她上坟,听到这样的声音,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它是最可恨的了。

然而这个墓地多么好!她的遗体并不落在地底下的黑暗里,却是高高地放在山上,……远远地横着阿尔卑斯山,下面就是海……一根断弦把整个曲子毁了……可是这样的一根弦——它割断了将一切系在一块儿的结,把网打开了。

我在墓地上跟自己生气,地很凉,石头也很凉……只有在这个时候我才了解,没有墓碑会产生怎样痛苦的印象。没有形式,没有标记,没有一行文字,没有一样实体的象征,事实上,人就什么也抓不住了。

意大利的雪檐![1] 我又在它旁边过去了。它看见我们怀着新生的希望,一八五一年从吐林同车回家。那些美丽的Cari luoghi〔意大利文:亲爱的地方〕比墓地更鲜明地唤起了我的过去的回忆,她的光辉的形象在深蓝色海水和群山的背景上浮现出来——我带着这个形象睡着了,一下子所有过去的可怕的事情全忘记了。

在尼斯我又去看我们那两所住宅[2]。两所房屋都空着,我可以在那些屋子里穿来走去。宅子里面的一切都跟过去一样,……百叶窗关着,屋子里垫起了很厚的灰色尘土,而且使人感到气闷。看起来好像我们不过离开了几天似的。我望着

---

① 雪檐:冻结在岩石边缘的雪块。

② 两所住宅:指"修氏家"和"杜以斯家",赫尔岑一家在尼斯这两所房屋里住了两年多(1850—1852)。

这些看够了可怕事情的不会说话的见证,就想:我为什么召唤它们来做过去的见证呢?我很想离开它们逃走,走开,我虽然不怕证据,不怕控告——我却害怕回忆。

我在她死亡的那间屋子里拉开了百叶窗。我看到了熟悉的海、岸和教堂的景象……她曾经几次描绘过它们。床架还放在原处——垫子已经拿下来,堆在床前地板上,——丧事也许就发生在昨天。以前在我们家的厨子来了,修氏住宅的园丁也来了,我还遇见当时在我们家里的女仆。我在他们的脸上看到了真诚和好心的喜悦。他们在我们家里的时候我们遇到的两次灾难,把他们跟我更贴近地系在一起了。在他们对我的好意里含有同情和怜悯的成份。面貌没有大的改变,只是稍微老了一点。

是的,都是在这里发生过的事情!

三 一八六三年九月二十七日在欧尼斯轮船上,Civita Vecchia(其威塔·维基亚)[1]

我们停在一座要塞的围墙前面。……除了天空以外,一切都很丑陋,而且叫人看了不舒服。……法国兵在岸上踱来踱去——一个裸着全身的孩子游水到轮船跟前来,他坐在一只小船上,使我想起弗郎德南[2]画中的小孩。我不能够到教皇的岸上去,——我就待在甲板上。快到夜间我们驶进了拿

① Civita Vecchia:罗马的轮船码头,美丽的港口。

② 弗郎德南:法国画家。——柏林版原本注

波里;我到我的孩子们那里去,好像去过冬节一样。其实离我的除夕也不会久了。但愿那个不在了的人活在他们的身上,但愿他们年轻生命的花朵再一次围绕在我的身边。再到工作上去,再到那条每天变得更坚实的路上去,这条路我们一块儿走着[①],就像我们三十年前在一八三三年出发的时候走过那样! 亚门!

四 一八六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在苏黎世

两年……再两年……还是一样混乱……苏黎世……在这里开始了那个以五月二日的葬礼为结束的悲剧。在这里我写了最初那些充满疑惑、充满恐怖、充满隐藏的希望的信函。在这里他[②] 住了好几年。

我望着这个城市就像尤利栖斯[③] 望着他在上面洒了自己的血、留下自己给撕掉的肉的石岩。说起来奇怪,我喜欢见

① 柏林版原本注:"跟奥格辽夫一起。"奥格辽夫是赫尔岑一生的好友。一八二五年十二月党人革命失败后,他们两个孩子站在莫斯科郊外麻雀山上庄严地宣誓,要继承十二月党人的革命事业。一八三三年他们在莫斯科大学毕业,继续参加进步青年的团体活动。一八三四年,奥格辽夫和赫尔岑先后被捕。一八三八年他到赫尔岑的流放地弗拉基米尔,访问赫尔岑夫妇,住了一个短时期。一八四二年他到诺夫戈罗德去看赫尔岑。一八五六年他离开俄国,到伦敦以后又参加赫尔岑的刊物编辑工作。

② 指黑尔威格。

③ 尤利栖斯:希腊人叫做阿突修斯,是古希腊传说中特洛伊战争里一个主要的希腊英雄。他留下妻子在家,自己去参加特洛伊战争,去了二十年才回到家里,看见妻子还在等他。他在回家的路上遇见荒岛上的一只眼睛的怪物波吕贝摩斯,同伴们给怪物先后撕裂支解吃掉了好几个,他设法和其他四个同伴逃了出来。

到这些染着血的石岩。我记起那种连续不断的痛苦——短时间的激情和一个孩子[1] 的和平的面容,——在悲哀和紊乱中间他那无忧无虑的眼光,我怀着爱心望着花园,望着我平日同他一块儿在那里散步的林荫路。

为什么没有人猜到我心上还剩得有多少爱,在我身上耗费了多少、多少爱?连她[2] 当时也忘了它,只有在后来才完全了解它。娜(达丽)呢,真可怜她永不会了解那一面了!

只有坚强的人才承认自己的错,只有坚强的人才谦虚,只有坚强的人才宽恕——而且的确只有坚强的人才大笑,不过他的笑声常常近似眼泪。

---

① 指作者的遭难死去的八岁小儿子尼可拉(柯立亚),他在苏黎世聋哑学校学习。

② 她:大概是指娜达立亚·奥格辽娃(即土奇科娃)。

关于《家庭的戏剧》

《家庭的戏剧》(*A Family Drama* 或 *Семеиная драма* 或 *Рассказ о семейной драме*)是亚历山大·赫尔岑的回忆录《往事与随想》的一部分。伊凡·屠格涅夫生前见过这一部分的原稿,他后来对人说:"这是用血和泪写成的。"C. Garnett 的英文译本(六卷本)是根据一九二一年柏林版的俄文原本译出的。在这个唯一的"特许翻译"的英文译本中,《家庭的戏剧》是第五部的第三篇,一共有四章。在一九四六年列宁格勒国家文艺出版社版《往事与随想》[①] 中,这却是第五部的最后一部分,一共有八章,还有一章附录:《豪格》。两种本子在内容上并没有大的差异。英译本是以年代分章的,英译本的第一章就是列宁格勒版的第四十三章和四十四章,第二章就是第四十五章《心的迷乱》,第三章就是第四十六章、四十七章和四十八章,第四章就是第四十九章和附录。英译本中没有一八六三年写的《出发之前》和《到达以后》两小节文章(《追记》排在

---

① 在一九五六年莫斯科科学院出版社版《赫尔岑全集》(三十卷本)第十卷,《往事与随想》第五部中,《家庭的戏剧》的标题改作《关于家庭戏剧的故事》。但内容并没有大的变动。

第四章的最后),但在第三篇篇末却刊出了内容跟那两小节差不多的四则日记作为 Addenda(补充或追加)。一九四六年版俄文原本中没有这四则日记,只有编者的一个小注:"赫尔岑各年的日记中还有几节在内容上跟家庭戏剧的故事有关。如一八六三年九月二十四日的日记在内容上就跟故事的最后两小节相似(全集第十六卷,第五〇二页以下);还有一八六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的日记——也是讲那件事情的(第二十一卷,第一五一页以下)。"

小注中提到的"最后两小节"是《出发之前》和《到达以后》。这里所谓"全集"指的是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五年在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出版的 M. K. 列门克编辑的二十二卷本《赫尔岑全集》,其中第十三卷到第十五卷便是《往事与随想》。

前面提到的英译本的"特许翻译权"大概是从赫尔岑的大女儿娜达丽亚(即达达)那里得来的。娜达丽亚活了九十二岁,一九三六年死在瑞士罗散她的住宅内。英译本所根据的一九二一年柏林版俄文原本也应该是在她的许可下刊行的。这个本子和一九四六年版俄文原本在分章上的不同,以及在用字上的一些小的差异,似乎都可以归在"变文"里面。《家庭的戏剧》早在一八五八年就全部写好了(其中大部分是在一八五二年到一八五五年间写成的)。但一八五九年在《北极星》上发表的却只有《海洋之夜》中叙述作者的母亲和幼子乘船遇难的一节。关于《家庭的戏剧》,作者不愿意在他生前发表一行文字。我们在一九〇五年圣彼得堡版《往事与随想》第五部(见七卷本《赫尔岑文集》第三卷)中看到的《海洋之夜》也只有

三节，可是与乔治·黑尔威格有关的文字全删去了，这是作者自己删改的（既然有删节，因此也有一些改动。作者生前没有编好一个定本，“变文”的出现更是可能的了）。一九〇八年版波兰 A. 布吕克勒尔教授的《俄国文学史》（英译本）中有过这样的疑问：“难道作者的家属永远不让我们见到娜达丽的历史的这一部分吗？”

这个疑问终于得到了答复：娜达丽历史的这一部分在一九一九年由苏联国家出版局印出来了。接着柏林版的《往事与随想》俄文原本又在一九二一年出版，英文译本也在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中间出齐。到了这个时候，乔治·黑尔威格的儿子马塞尔·黑尔威格也不得不把他们家里保存的娜达丽写给黑尔威格的信拿出来，希望替他的亡故的父母辩护。他把这些信和其他许多有关的文件全部捐赠给伦敦不列颠博物馆了。

娜达丽写给黑尔威格的信大约有一百五十封。她不断地要求他烧毁这些信。她写过：“要是你不讨厌我，你就烧掉，烧掉我写给你的一切。”她也写过：“特别要烧掉这封信，我不愿意让别一个人的手挨到它。”可是黑尔威格始终不曾照她的意思做过。他把信慎重地藏起来，而且在娜达丽本人忘记写明日期的那些信上用铅笔记下收到的日期。一八七〇年八月二十七日赫尔岑逝世后七个月，曾经在赫尔岑家作过家庭教师的玛尔维达·冯·梅森堡[①] 由作曲家瓦格纳尔介绍，写信给黑

①. M. V. 梅森堡（1816—1903）：德国女作家，赫尔岑女儿的教师，著有《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回忆录》等书。

尔威格，代表赫尔岑家属，要求他退回娜达丽的信件，并且表示愿意交还他从前写给赫尔岑的信，作为交换条件。黑尔威格回信拒绝，他不愿意"放弃这个防御将来可能有的诽谤的好武器"。他还说："无论如何，孩子们跟他们母亲的情书不相干。"

巴　金 一九七九年

代　跋

树基：

关于赫尔岑的回忆录，我本来有不少的话可说，可是已经没有太多的时间让我夸夸其谈了。好在我写过两篇后记，最近又找出几位友人的信，它们可以告诉读者一些事情。我自己也许没有想到我完成不了这部书的翻译，一九二八年我第一次读到回忆录的英译本，我充满信心要把这部巨著译出来。一九三六年我开始选译回忆录的片断，我还向鲁迅先生说过，我要全部翻译这部“大书”。一九四〇年我在上海翻译了《家庭的戏剧》；“文革”后期我开始翻译回忆录的第一卷，我把它当成我这一生最后的一件工作，我在散文《一封信》中也表示了做完这件工作的决心。你可以想到当我告诉项星耀同志我无法完成这件工作时我心里是多么难过！项星耀同志当时已经翻译了四卷，他把译稿送给我，支持我翻译出版。我很感激他，但我把他的译稿送还给他，让他继续翻译下去，现在他的译文已经全部出版，这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正如我在给他的信中说的：“再高的黄金潮也冲不垮崇高的理想”。我谢谢他替我偿还了一笔欠了几十年的债。

我和臧仲伦同志的友谊同样是建立在赫尔岑回忆录的基

础上的。仲伦同志在北大教书，没有见过我，他也是一位赫尔岑的爱好者，他知道我翻译赫尔岑回忆录就主动与我联系，他愿意替我的译文校对。他读过我译的《家庭的戏剧》，曾提出宝贵意见。他为我校阅了第一册的译稿，回忆录的书名《往事与沉思》，我便是根据他的建议改为《往事与随想》。从这里我得到启发，我为我晚年的主要著作《随想录》找到了名字。因为这些，我衷心感谢他。我记得，后来我因病住院，他还到华东医院探望过我，他为我不能译完全书感到惋惜。我希望他继续把赫尔岑介绍过来，中国读者需要这类的著作。

附录中还收了我给周朴之同志的信。他是《往事与随想》(第一册)的责任编辑。他抱病工作，为我的译文花费了很多精力。他早已离开了我们，最近重读我给他的信的复印件，想到一些事情，抑止不住思念之情。

我常说，我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为什么我反复讲我要译完全书，因为我担心自己完成不了这件工作。人说我很有毅力、很坚强，其实我很软弱，我写了许多文章，翻译过不少作品，这都是与自己斗争的结果。我也有失败的时候，那就失信于读者，欠下了还不清的债。除了这部书之外，还有妃格念尔的回忆录《俄罗斯的暗夜》、克鲁泡特金的《俄法狱中记》，前者只留下一章《我的幼年》，而后者译好的一章也已不知散失在哪里了。这十年来，我经常在回答朋友的书信中抱怨杂事的干扰，我也不断地与杂事斗争，我想抓住有限的时间，可是我的身体越来越虚弱，许多想做的事情都无法完成了。我没有

精力校阅全部译文，这第二个"全集"能够出版，全靠你的支持和帮助，你了解我，我用不着在这里表示感谢了。

巴　金 九五年十月十六日

[General Information]
□□=□□□□□□ □□□
□□=□□□
□□=729
SS□=10447689
□□□□=1997□06□□1□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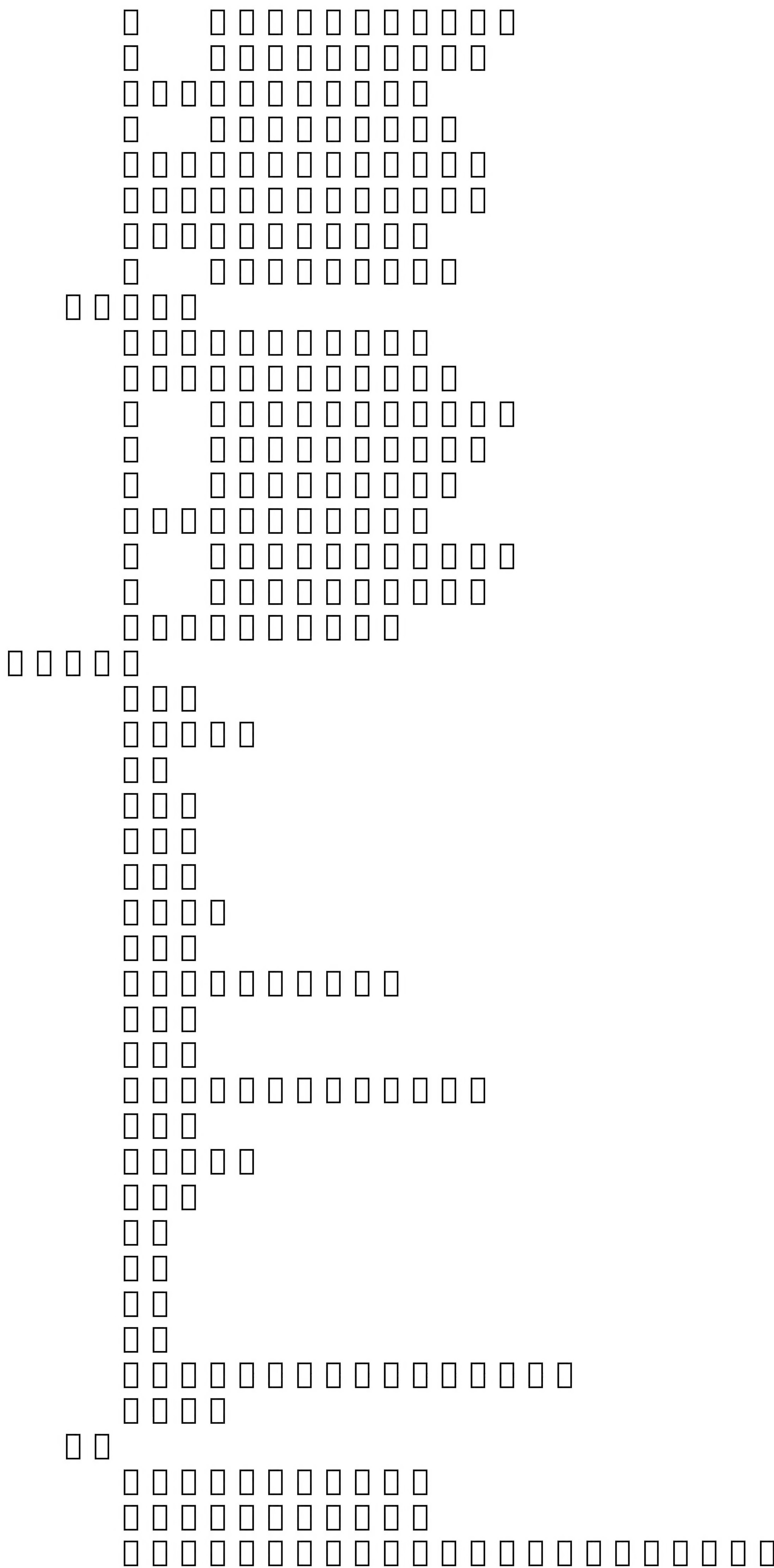
[illegible]1812—

[illegible]1834—

[illegible]1838—

[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Civita Vecchia[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